

中國文化大革命史

天地翻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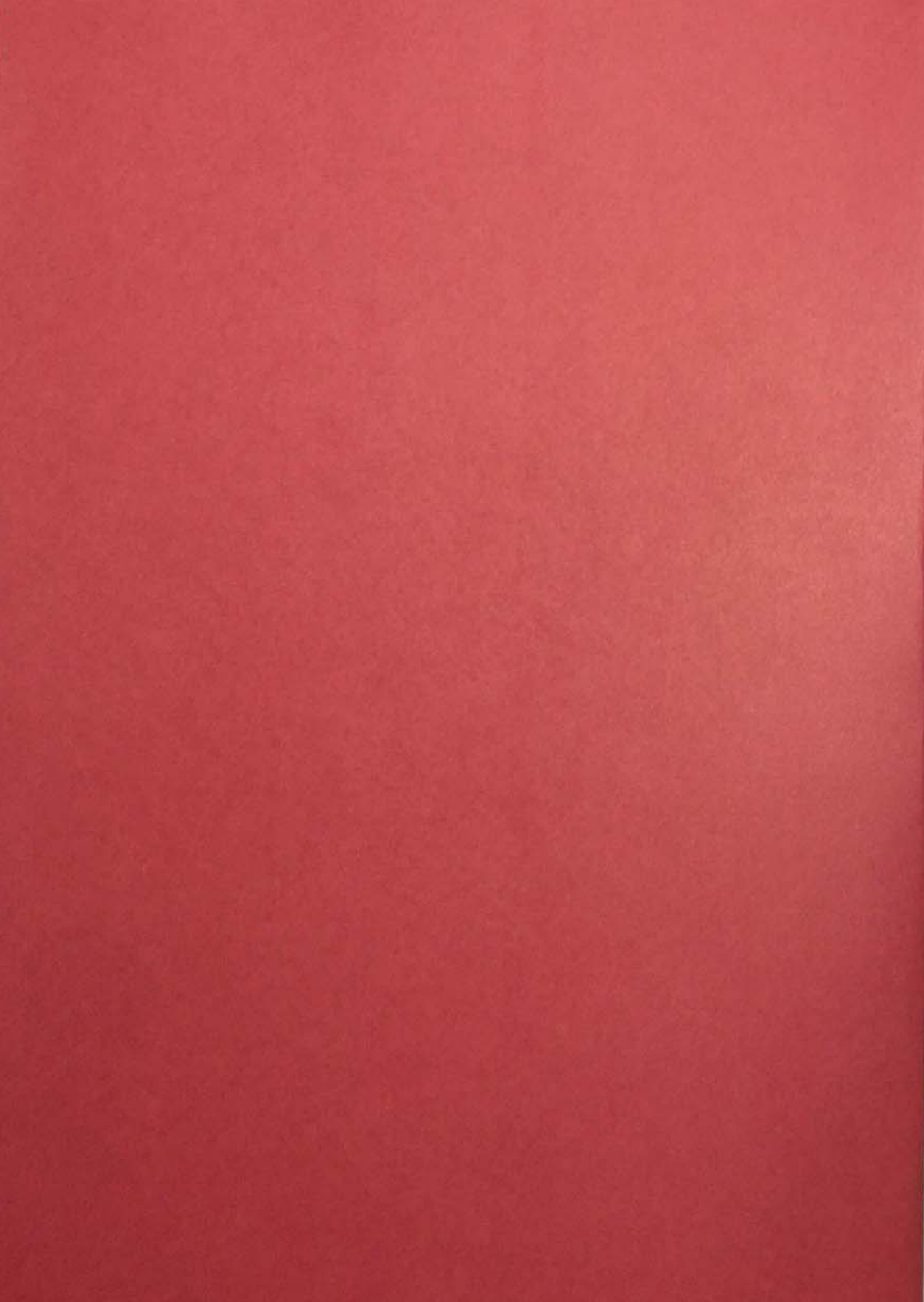
楊繼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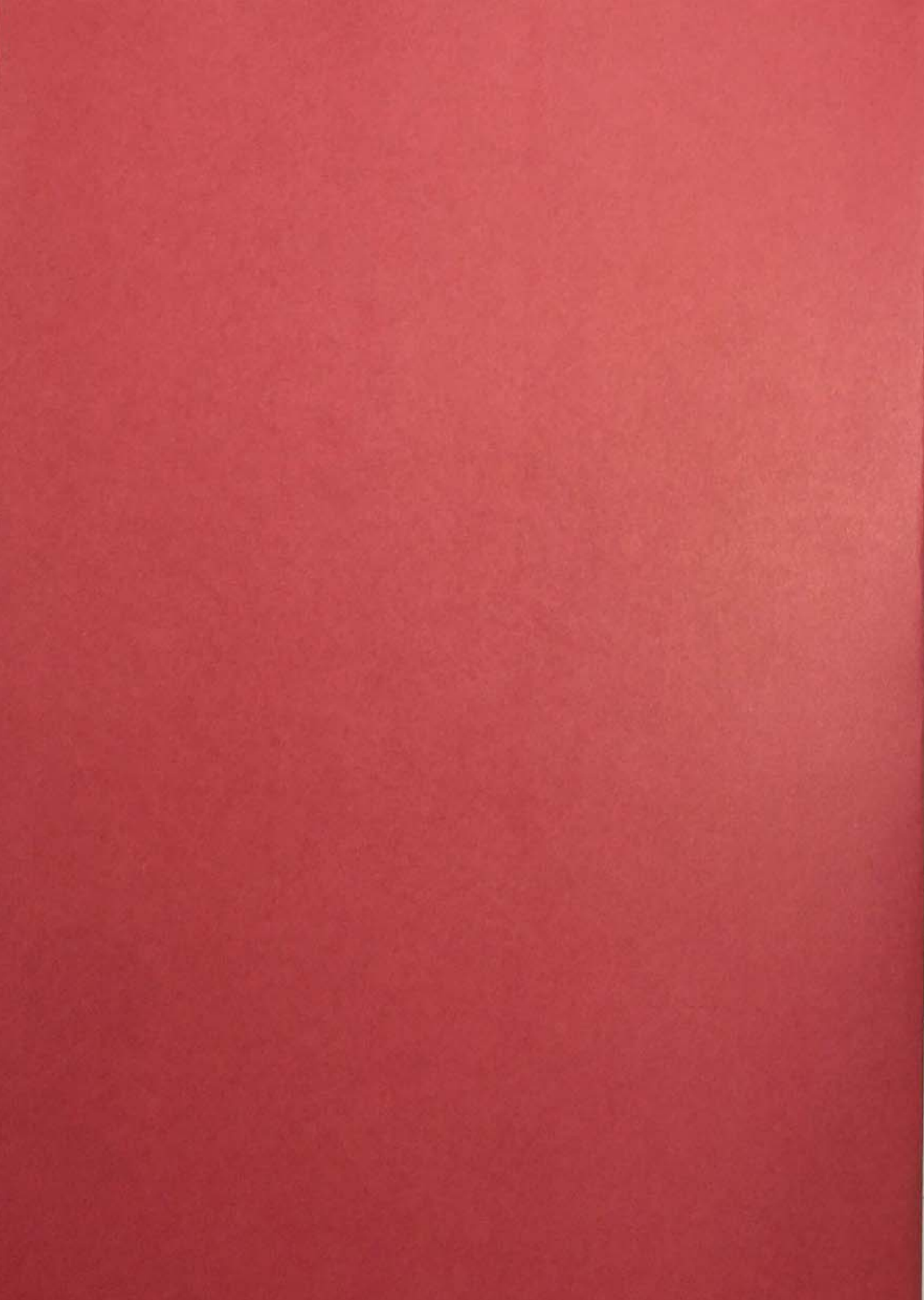
上篇



楊繼繩

新華社高級記者，著名學者。1966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在新華通訊社任記者、編輯35年。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五屆理事。發表新聞、通訊、評論數以千篇計。出版專著有：《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技術貿易學》、《社會奧秘之門》、《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墓碑》等。1984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作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中國文化大革命史

天地翻覆

楊繼繩 著

上篇



www.cosmosbooks.com.hk

書 名 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上篇）
作 者 楊繼繩
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 109-115 號
智群商業中心 15 字樓（總寫字樓樓）
電話：25283671 傳真：2865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30 號地庫/1 樓（門市部）
電話：28650708 傳真：28611541
印 刷 美雅印刷制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字樓 A 室
電話：23420109 傳真：27903614

出版日期 2016 年 12 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 2016
ISBN 978-988-8257-54-6

總目錄

前言	11
導論	17

上 篇

第一章 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40
二、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50
三、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	54
四、反右傾運動	60
五、七千人大會	63
六、八屆十中全會	72
七、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81
八、中蘇論戰：反修防修的思想動員	93
九、舉國進行革命大批判	97
一〇、簡短的結論	101

第二章 點燃「導火線」

一、毛澤東秘密制造「導火線」	106
二、彭真是劉少奇「山頭」的重要骨幹	110
三、彭真的對抗	116
四、「二月提綱」	120
五、毛澤東出手反擊	123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礙：打倒彭陸羅楊

一、羅瑞卿倒臺	133
二、陸定一倒臺	146
三、「剝筍政策」的勝利	152

第四章「五月會議」：文革正式發動

- 一、全體一致通過「5.16通知」……159
- 二、防政變殃及賀龍……162
- 三、圍攻80歲的朱德……172
- 四、中央文革小組成立……175
- 五、毛澤東的桃花源：「5·7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則」
- 六、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181

第五章 劉少奇的「反右運動」

- 一、從清華文革談起……190
- 二、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組反右……197
- 三、劉、鄧搞的新的反右鬥爭……200
- 四、全國各地都抓右派……207
- 五、毛澤東反對派工作組……212

第六章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的幾件大事

- 一、毛澤東「炮打司令部」……222
- 二、林彪成了接班人……224
- 三、「十六條」……228
- 四、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造反……231

第七章 紅衛兵 紅八月

- 一、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240
- 二、「血統論」風潮陡起……244
- 三、清華「8·24」事件……252
- 四、破「四舊」惡風肆虐……256
- 五、千家啼哭萬戶愁……262
- 六、紅色恐怖升級……265
- 七、「西糾」和「聯動」……271

第八章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一、各地官僚們為自保壓制造反……288

- 二、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96
- 三、十月中央工作會議……299
- 四、批判資反路線的後果……303

第九章 群眾組織的興起、活動和消亡

- 一、紅衛兵和造反派……308
- 二、造反派的隊伍狀況和政治訴求……312
- 三、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鬥爭……318
- 四、毛澤東告別造反派……324

第一〇章 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風暴」

- 一、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臺……332
- 二、「安亭事件」……339
- 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347
- 四、上海「一月風暴」……351
- 五、探索新的國家組織形式……357
- 六、奪權！奪權！奪權！……364

第十一章 經濟維權者的悲劇

- 一、底層勞動者的權利訴求……368
- 二、「全紅總」的組織狀況及其活動……372
- 三、上海的經濟主義和反經濟主義……377

第一二章「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

- 一、革命元老們的抗爭……386
- 二、各地的「二月鎮反」……394
- 三、對「二月逆流」的反擊……408

第一三章 文革中的軍隊和「三支兩軍」

- 一、八屆八中全會以後的軍隊領導……414
- 二、「山頭」林立 嚴重腐敗……416
- 三、軍隊里的造反和鎮壓……418

- 四、「5·13事件」：美女轉乾坤？……428
- 五、「三支兩軍」：軍隊全面主導文革……431
- 六、詭譎的楊、余、傅事件……435

第一四章 「全國山河一片紅」

- 一、建立革委會的艱難歷程……452
- 二、「復舊」和「反復舊」……460
- 三、湖北：長江濁浪……466
- 四、貴州：雷聲不息……479
- 五、重慶：炮火連天……489
- 六、廣西：血涌邕江……501

第一五章 「武漢事變」和毛澤東的戰略轉變

- 一、1967年春夏武漢文革形勢……520
- 二、中央對武漢問題的處置方針……522
- 三、武漢軍方抵制中央的處置方針……526
- 四、「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行為……529
- 五、中共中央的應對措施……534
- 六、八月失控和毛的戰略轉變……539

第一六章 清查「5·16」之謎

- 一、起因：激進學生惹起禍端……552
- 二、升級：扭轉形勢的戰略部署……556
- 三、清查「5·16」的幾個高潮……560
- 四、外交部清查「5·16」……565
- 五、農林口清查「5·16」……569
- 六、糧食部清查「5·16」……572
- 七、其它中央單位的清查「5·16」……577
- 八、各地清查「5·16」……578

下 篇

第一七章 清理階級隊伍

- 一、清隊的指導思想和法律依據……592
- 二、清隊的政策樣板……595
- 三、受害者以千萬計……600
- 四、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都受到打擊……608
- 五、株連眾多的重大集團冤案……616

第一八章「一打三反」

- 一、「一打三反」運動的開展……633
- 二、大批思想者被搶絕……638
- 三、無辜的受害者……655
- 四、制造全民恐怖……656
- 五、殘酷地扼殺最后的聲音……658
- 六、毛澤東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659

第一九章 掌權者施行的集體屠殺

- 一、北京郊縣大屠殺……663
- 二、湖南道縣大屠殺……667
- 三、江西瑞金大屠殺……674
- 四、廣西大屠殺……676
- 五、云南沙甸事件……678
- 六、其它地方的大屠殺……683
- 七、集體屠殺的總體情況和根本原因……684

第二〇章 八屆十二中全會：徹底清除劉少奇

- 一、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688
- 二、將劉少奇定為叛徒集團的頭子……694
- 三、再批「二月逆流」……707

第二一章「九大」：從團結到分裂的大會

- 一、高度集中的秘密會議……714
- 二、政治報告起草中的爭論……718
- 三、選舉和選票……722

- 四、微妙的「中央政治」……727
- 五、「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關係……730
- 六、毛澤東對「軍事官僚專政」的憂慮……735

第二二章 霧鎖廬山：九屆二中全會

- 一、上山前的第一輪博弈：要不要設國家主席……743
- 二、上山前的第二輪博弈：關於「政治武器」……746
- 三、上山前的第三輪博弈：誰是林彪的接班人……750
- 四、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753
- 五、「大有炸平廬山之勢」……756
- 六、毛澤東拋出了陳伯達……763

第二三章 從批陳整風到林彪出逃

- 一、華北會議和改組北京軍區……774
- 二、批陳整風，毛等待林彪檢討……779
- 三、毛澤東南巡，將火直接燒向林彪……791
- 四、「小艦隊」紙上談兵……796
- 五、林彪葬身溫都爾汗……803
- 六、「9·13」事件迷團重重……811

第二四章 批林整風：批左還是批右？

- 一、毛澤東要批右，周恩來要批左……822
- 二、批林整風匯報會……S30
- 二、批判周恩來……837
- 四、毛澤東起用鄧小平……845
- 五、第十次黨代會和軍區司令互調……852

第二五章「批神批孔」中的斗爭

- 一、批林批孔運動的背景……860
- 二、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865
- 三、批林批孔中的鬧劇……871
- 四、李慶霖事件……874

- 五、幾個省的批林批孔運動……876
- 六、中央發文件限制造反派……889
- 七、四屆人大的組閣之爭……892
- 八、批判江青一個月……896

第二十六章 從全面整頓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一、鄧小平全面整頓……908
- 二、毛澤東轉變了態度……917
- 三、毛澤東要鄧小平肯定文革……924
- 四、全面反擊右傾翻案風……932
- 五、各地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938
- 六、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給后代……943

第二十七章「四五運動」

- 一、圍繞悼念周恩來活動的斗爭……950
- 二、廣場反叛的深層：思想的反叛……958
- 三、壓制民情使抗議升級……970
- 四、激烈沖突，強制清場……974

第二十八章 文革落幕

- 一、毛澤東逝世……986
- 二、劍拔弩張……991
- 三、十月政變……1000

第二十九章 文革后的大清查

- 一、揭批查運動擴大化……1020
- 二、還是采用文革的思維和手段……1044
- 三、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擴大化……1045
- 四、清理「三種人」……1047
- 五、清查三種人運動的雙重標準……1052
- 六、大清查的正面作用……1058

第三〇章 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 一、經濟建設目標：「備戰?備荒?為人民」……1066
- 二、經濟建設的手段：抓革命，促生產……1071
- 三、國民經濟的增長與波動……1076
- 四、效益差 管理亂 科技水平低……1080
- 五、工人、農民家徒四壁……1082
- 六、根本問題是經濟體制……1086

第三一章 文革期間的外交

- 一、「世界革命中心」的驕傲……1092
- 二、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勢有所好轉……1098
- 三、從「兩條線」到「一條線，一大片」……1102

第三二章 官僚體制下的改革開放

- 一、文革后中國的政治光譜……1112
 - 二、一股洶涌的民主浪潮……1117
 - 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1122
 - 四、權力市場經濟制度……1128
 - 五、階層固化和階層沖突……1134
 - 六、制衡權力 駕馭資本……1139
- 文革大事記……1142

前言

著名作家王蒙¹說過：「誰能解釋與進一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干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干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干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²王蒙說的「這個活」，對我有極大的誘惑力，我早就躍躍欲試。雖然這是一個極其復雜和危險的領域，一旦進入，我就充滿激情。顯然，「這個活」是一項大工程，我能夠為這項工程添一小片磚瓦，也算盡力了。

從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華大學參加文革，此間還到全國十多個城市串連，親身經歷了文革初期的一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會氣氛。1968年1月，我到新華社任記者。此后幾年，採訪了一些與文革有關的事情。不過，親歷也好，採訪也好，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對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願望。2007年我寫完《墓碑》以後，就轉向對文革的研究。雖然文革通史已經出版了多本³，我還是願意將我經歷和理解的文革過

¹ 王蒙，中國當代作家，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长，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

² 王蒙：《中國天機》，安徽文藝出版社。

³ 已出版的文革通史(中文)是：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人民日報出版社，2006年；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在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中譯本，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張萬舒：《狂熱的年代》，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2年。

程寫出來，供大家批評。

官方文革史局限于原來的意識形態，局限于原來的政治制度，這就難免違背文革的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個人情感影響，還原文革的本來面目；站在人類文明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認識文革。

對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僅僅是讓后人知道那段痛史，而是為了弄清鄧小平時代及后鄧時代⁴社會不公平、政治腐敗的原因和尋求擺脫社會危機的出路。這是因為，鄧小平時代及后鄧時代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續。所以，對文革的研究要突破中共中央1981年那個決議的限制。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這一段歷史作了官方的結論。這個決議根據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為了達成改革開放的共識，當時這種妥協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共識，就不可能有以後三十年改變中國的偉大活劇。但是，歷史學家在還原文革真相時，不能像政治家那樣折衷、妥協。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⁵把毛澤東1956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思想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既違背歷史真實，也難以說服人。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

⁴ 鄧小平以後的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代都屬後鄧時代。

⁵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頁

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⁶。這一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在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布，最後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老革命家、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鬥爭考驗的劉少奇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一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臺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5·16通知」出來後，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對抗。這一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普通民眾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擔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也是出于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1973年8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不存在「四人幫」。此時，老干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1969年4月以後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後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不是他們利用

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頁。

毛澤東，他們只是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一些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

1976年的十月政變以後，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確」。所以，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幹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在某個階段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大力鎮壓群眾、參與迫害干部的事實，也掩蓋了一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在官修文革史對干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數百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一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盡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喬治·奧威爾說⁷：「當我動筆寫一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美的書。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是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揭露謊言，還原真相，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官方確定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感情糾葛。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沒有客觀就沒有真實，沒有冷靜就沒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場，也不站在文革親歷者的立場，那麼站在甚麼樣的立場呢？我同意丁東先生的看法：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

8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對寫中國近代史的要求是：「敘事客觀，分析深入」⁹。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時追求的目標，我盡可能用中性描述來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是不容易的。

⁷ 喬治·奧威爾(1903-1950)，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著有《動物莊園》、《一九八四》等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

⁸ 丁東：《文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三味書屋，2010年5月4日。

⁹ 吳大猷：《最近兩百年中國史總序》，引自陳永發《中國共產黨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社，臺北。

第一，當代人寫當代史，很容易帶進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會有損「敘事客觀」，第二，我學識不足，要「分析深入」確有困難。不過，我在寫這本書時，時刻銘記著吳先生的這八個字。

文革是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鬥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闊空間維度中反復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復復的鬥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一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一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一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史是艱難的。你提出任何一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你寫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你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人們在文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處境，有著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相對於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來說，我是後學。後學有後學的好處，不需要從零開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點。我閱讀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敘事的文革通史，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對重要專題的深入探究，有地區文革史，有文革理論探索。我在讀這些著作時，在我頭腦里深深地記下了以下名字：高皋、嚴家其、王年一、卜偉華、席宣、金春明、麥克法夸爾、王友琴、周倫佐、何蜀、王紹光、王力、陳曉農、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徐景賢、聶元梓、余汝信、劉國凱、徐友漁、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謙、高華、印紅標、韓鋼、蕭喜東、丁東、陳益南、唐少杰、錢理群、張博樹、朱學勤、陳奎德、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楊曦光、舒云、丁凱文、徐海亮、啟之、司馬清揚、周孜仁、華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陸、李遜、董國強、鄧振新，等等。更可貴的是，還有一些學者甘當其他研究者的踏腳石，默默地從事史料的收集、整

理和鑒別工作。這項工作意義深遠。傅斯年說，從某種意義來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良霄、顧菊英伉儷的《十年文革大事記》，還有《記憶》、《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館》這類文革史料電子刊物的編輯者，他們做出了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在幾年的研究寫作過程中，時刻對這些先行者懷著深深的敬意。徐友漁、丁東、卜偉華、余汝信、李遜、叢文滋審讀了這本書的初稿全文，何蜀、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審讀過初稿的部分章節。審讀者提出了大量的寶貴意見。在此，我對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2015年8月 北京

導論

1966年及以后的10年里，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那場文化大革命，每個參與的人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他們的生活、命運和心靈都受到了重要影響。這場運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更為深刻。

毛澤東開始認為半年、一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結束。但在進行過程中出現了原來沒有想到的情況。他沒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拋出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王力、關鋒、戚本禹；他沒有想到1968年軍隊內部出現不可調和的爭鬥，不得不拋出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希望「九大」以后轉入「斗批改」，沒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現分歧，最終釀成震驚世界的林彪事件。實踐的反復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離了它初期的目標，只能在進退維谷的泥潭中掙扎。林彪事件之后，毛還是想將運動撥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時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來。這樣，繼劉、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對象。一個新問題接著一個新問題，用后一個錯誤糾正前一個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問題導向，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場。

文化大革命像錢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動。每一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每一波都制造了一批新的「敵人」。隨著文化大革命原動力減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強，觀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濤逐漸衰減，最終波平浪靜，直至文化大革命失敗到完全被否定。

一波又一波的反復，一次又一次的折騰，老百姓像面團一樣被反

復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澤東卻以鳥瞰人寰的氣魄說：「試看天地翻覆！」¹用「天地翻覆」作為本書的題目，辛酸自有入知。

文化大革命發生、進程、結局和后果的深層動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的制度中尋找，要在當年奉行的意識形態和毛澤東堅持的道路中尋找。

文化大革命中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野蠻、黑暗、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權力是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其根據是，劉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毛澤東大權旁落。于是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剝奪劉少奇的權力。

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經不起分析。第一，1959 年在廬山會議上，毛 7 月 23 日的一次講話就把掌握兵權的彭德懷元帥搞下了臺。1965 年底到 1966 年上半年，毛召開幾次會議就把彭、陸、羅、楊四個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劉少奇何必興師動眾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平生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僅是奪取劉少奇手中的權力，能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等重要嗎？第三，毛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經把劉少奇打倒了，權力拿到了手，為什麼今后還要七八年一次？毛、劉當時都是六七十歲的人，再過七八年他二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他們之間還有什么權力鬥爭？第四，毛並沒有「大權旁落」，如果真正大權旁落了，他能力排眾議發動文化大革命嗎？

¹ 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鯤鵬展翅，九萬裏，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此詞寫於 1965 年秋，本意是反對國際修正主義的，《詩刊》1976 年 1 月 1 日發表，中國人卻聯想到文化大革命反復折騰的“天地翻覆”。

不可否認，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權力不是賞心悅目的玩物，而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政治目標就是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國向何處去？」。在這一點上，毛、劉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隊伍。

走社會主義道路，利用政權的力量，統籌全局，實現社會公平，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中共領導人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什麼條件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速度是穩一點還是快一點？毛和劉是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秩序」，即經過一段時間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經濟水平以後，再搞社會主義。毛認為，資本主義一旦發展起來，就會造成復辟，只有不停頓地繼續革命，才能實現共產黨的既定目標。他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就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之時。

劉少奇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他的鬥爭目標是地、富、反、壞、右、腐化墮落的基層干部和不聽話的知識分子；毛當然是 1949 年以來打擊各路「階級敵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鬥爭目標重點在黨內，在高層，因為只有黨內高層才對中國發展方向有決定性作用。無疑，三年大饑荒是加劇毛劉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紅旗」的失敗，還想再找機會建立他的烏托邦。他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所有的被壓迫者都獲得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他要建立一個「一大二公」的、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政企不分的社會組織，依靠這樣社會組織進行集體化的大生產。要建成這樣的社會組織，就必須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限制按勞分配原則，在經濟上建自給自足。他堅信「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商品經濟對社會、對人的思想有強烈的腐蝕性，按勞分配是社會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他認為，如果放任小生產發展、追求物質利益，放棄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黨就要變修，國就要變色，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他這種設想在 1958 年提出來過，經過試驗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來，而且在實踐中有些比 1958 年更徹底。

如果說，毛澤東建立制度的出發點是「善」，那麼，用政權的強制

來實現虛幻的「善」，最終必然釀成了空前的「惡」，必然將民眾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實，社會主義這個「善」，只是知識分子設計的一種美好的願望。屬於集體主義這個大范疇的社會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的權利為前提的，是違背人性的。毛澤東為了建成社會主義，他試圖改變人性。用強權將社會主義目標構建的制度必然是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社會主義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沒有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澤東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歸罪于「修正主義」，歸罪于「階級敵人」。

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為他建立這種烏托邦掃清道路。令毛憂慮的是，不僅劉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線，劉少奇周圍的一批人都站在劉的一邊。劉少奇這些人並沒有達到背離社會主義的程度，但他們確實看到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困難而畏縮不前。劉少奇等人收拾大饑荒的殘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與毛的路線背道而馳。毛對這些不符合他的路線的作法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不同意走他這條道路的高級幹部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毛認為，要按他這條路線走，就得讓千百萬人接受他的路線，就得動員千百萬人齊心協力。大規模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不僅是為了打倒劉少奇，主要是為了實現他的路線，建立他設想的美好社會。所謂「反修防修」就是為毛澤東的主張掃清障礙，所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是改造人性，為烏托邦清理心靈的基地。

毛澤東企圖按他的夢想在中國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這個夢想一旦付之實施，「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²毛澤東所指引的中國道路在大饑荒年代已經製造了人間地獄³。為這條道路來掃清障礙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一次製造人間地獄。

² 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陸衡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15頁。

³ 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實論證了這個結論。

毛澤東選擇的道路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為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下掃政治賤民⁴，上打官僚集團。每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觀點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臉，至親好友為路線不同而分道揚鑣。1966年秋，我到貴陽串聯，一下火車，一群小學生就圍上來質問：你是什么觀點的？我在湖北串聯聽說，夫妻二人正在包餃子，一邊包著一邊談文化大革命，談著談著，就吵了起來，把包好了的餃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數之多，參與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絕後的。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主動參加的，政治賤民們為沒有參加的資格而苦惱。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但是，群眾是怎樣被運動起來的？當然是靠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崇高權威。但毛還得用意識形態來號召和鼓動群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通過教科書、媒體、會議等一切形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每一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一個人的頭腦，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話語體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是懷著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運動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勞動者的節日」(列寧語)那種快感。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著成千上萬的人向著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這種意識形態來源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同情勞動者，反對壓迫和剝削，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因而具有極大的魅力。它那嚴密

⁴ 這裏說的政治賤民是指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和國民黨執政時留下來的左右官員。他們政治地位低下，當時的意識形態時時刻刻批判他們，把他們當作危險人物。

的理論體系也使很多知識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讓千百萬人願意為這個「主義」獻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剩餘價值學說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剝削。這是一種片面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剩餘價值理論沒有把資本、科學技術、企業經營管理當作生產力的要素，從而得出資本剝削勞動的結論。

要消滅剝削就得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從消滅剝削這個角度來說，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馬克思還指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他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解決的「固有矛盾」。⁵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⁶毛澤東高舉「造反有理」的旗幟，反剝削、反私有制、反資本主義，這些主張和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認為，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必須經歷的五個發展階段，通過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歷史規律的必要。當時官方教科書一再強調，歷史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阻礙歷史規律者必然被歷史前進的巨輪碾得粉碎。這就是說，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這種歷史決定論不僅被理論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紀的實踐否定。但它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人們能夠通過認識歷史規律來控制和計劃社會的發展。」這一看法必然導出極權主義的政治。

按照這個意識形態。地、富、反、壞、右、國民黨反動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都是阻礙歷史發展規律的絆腳石，清除他

⁵ 歷史證明，現代股份公司和現代金融制度已經解決了這個矛盾。當然，金融制度還需要完善。

⁶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頁。

們是為了實現「天律」，是「替天行道」。在這個神圣而高尚的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只有階級情分，沒有私人情分。「親不親，階級分」，背后告密和當面揭發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對政治賤民的屠殺當然不會有負罪感。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兇惡的一面全都煽動起來了，還穿上了崇高而正義的外衣。

所謂階級，本來是一種經濟範疇。如果消滅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就不應該有階級了。1936年的蘇聯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認為蘇聯社會中「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永遠鏟除。」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是全新的社會成員。舊的階級特殊性正在消失。⁷然而，像蘇聯這樣以集體主義為宗旨的政權是扼殺個性、違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沒有強力鎮壓，這樣的政權一天也不能維持。革命隊伍以外的敵人消滅了，就在革命隊伍內找敵人；經濟範疇的階級消滅了，就在政治範疇和思想範疇上劃分敵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一些人被判處了死刑。緊接著開展了對高層大屠殺的「肅反」運動，以後揪出了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蘇聯一方面說消滅了階級，一方面不停地鎮壓。他們這樣做了，但沒有形成一套理論。1956年的中國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放棄階級鬥爭，還逐漸形成了一套階級鬥爭的新理論。這套理論的發端與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有關。中共認為蘇共正在向修正主義偏離。中共的新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學工作者、中央黨校教授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⁸），「毛澤東思想就是這個階段的馬列主義」。艾思奇的這一說法來自中央高層。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

⁷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7-379頁。

⁸ 艾思奇認為，第一個里程碑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第二個里程碑以列寧、史達林為代表，第三個里程碑以毛澤東為代表。每一個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時代特徵，都解決了它所面臨的時代提出的問題。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紅旗》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檔》稱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此時艾思奇已逝世兩年。

濟學教科書》，他在 2 月 25 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⁹1964 年，艾思奇在多次內部報告中傳播「第三個里程碑」的觀點。兩三年後，「第三個里程碑」進一步發展成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¹⁰是：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報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就是「斗私、批修」，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之後、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消滅了私有制以後，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認為蘇聯變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質利益作為激勵人的手段。

⁹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周恩來與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23、226 頁

¹⁰ 這是本書作者的概述，全文請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1967 年 11 月 6 日編輯部文章。

為了防止人的自私、貪圖享樂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蛻化、政權變質，毛澤東強調「精神」，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強調「精神可以變物質」。在政治領域要「興無滅資」，在私人領域「要斗私批修」。毛澤東企圖用這個意識形態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個人利益、一心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會」——他心中的烏托邦。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矛頭指向了領導幹部。在全社會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況下，這個理論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連著名哲學教授馮友蘭也站到支持這個理論的行列之中。

雖然一再聲稱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但畢竟是和毛澤東的名字聯在一起的。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人格化。意識形態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毛澤東的權威又強化了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毛澤東不僅是最高的政治權威、最高的軍事權威，還是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威。在皇權時代，士以「道」自重。他們以「道」來批評政治，并希望按「道」來建立政治社會秩序。「道」就是那時的意識形態。可見意識形態的權威高于政治權威。明末學者明確提出「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可以用「聖人之權」批評、限制「帝王之權」。毛澤東集「理」和「勢」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聖人」，沒有獨立于毛澤東之外的批評政治權威的「理」。這樣，全國只有一個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啞巴。這就實現了中國人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意識形態一旦成了人們的信仰，人們就會為實踐這一意識形態赴湯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動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大知識分子，雖然自己被批得體無完膚，但還要爭先恐後地批判他人。他們在被迫自殺時，還要留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遺書，要求子女聽毛主席的話。這些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都被意識形態所俘獲，普通百姓就更難逃脫意識形態的天網了。

意識形態成了宗教，毛澤東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幾十萬人集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手一揮，廣場上就掀起狂熱的浪潮，這是羅馬教宗望塵莫及的壯觀場面。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勝過宗教的狂熱。

在意識形態煽動起來的狂熱的群眾運動中，人們沒有個性，也沒有理性。他們變成一個群體，他們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這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完全不同。只要他們公認的領袖發出號召，千百萬人會真誠地、奮不顧身地、爭先恐後地做出種種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兩軍對壘，忠厚善良的人會血口噴人，正派廉潔的人被輿論壓迫得承認有罪，濫殺無辜被認為是「除惡務盡」，……。在做這些荒唐事時，平和謙遜的人們也會變成野蠻的暴民。不管這些人在群體行動中如何殘暴，然而他們都是專制者最恭順的臣民：在專制者面前，他們像虔誠的教徒一樣，用種種的宗教儀式，不停地向他們的上帝表達忠心。

用傳統觀念看來，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墮落到極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種把整體目標置於一切之上，為整體目標的實現不顧一切，也是一種道德觀。正如哈耶克說的：「像國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一類運動背後所蘊含的道德情感的強度，也許只有歷史上偉大的宗教運動與之相比。」，不過他又說：「哪里存在一個凌駕一切的共同目標，哪里就沒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規則的容身之地。」¹¹共同目標就是共產主義(它的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群眾無私地投入領袖設定的偉大目標，是極權制度的一個特點。

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捨，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重建它昔日的輝煌。這是徒勞的。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21世紀還有人宣稱「理論自信」¹²。其實，他們說「理論自信」，實際是「理論心虛」。這正如中國民間的一個歇後語：「走夜路吹口哨——為自己壯膽」。

¹¹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馮興元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43頁

¹² “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中央編譯局原局長衣俊卿提出來的，他因招收博士後的過程中接收金錢和女色的賄賂而下臺。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就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災難不能僅歸結為毛個人品質，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

毛處在特權制度金字塔的頂端，他享受著最優厚的特權；毛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當然會被權力這種最強的腐蝕劑所腐蝕。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歸結于毛的個人品質和操守，那就過於簡單。用對執政者個人的道德的批判來研究政治與歷史，不可能窮究事情的本質。所以，我在這本書里不評價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在論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時說：「要是只把這歸結在某個人的錯誤或林彪、『四人幫』的邪惡狡猾上，就太簡單了。」¹³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¹⁴

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這個制度實行了高度的經濟壟斷、政治壟斷和思想壟斷。在經濟國家所有制為主的基礎上，把每一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都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國家政權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每一個毛孔。盡管當時是中國皇權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在皇權專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皇家的願望，實際上皇家權力很難深入到中國版圖的每一點、落實到每一個人。那時還有蠻荒之地，化外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依靠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車間田頭，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

¹³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中共黨史研究》1983年9月30日

¹⁴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盡頭，到了極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一種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我不能為這種制度取一個名稱，totalitariansystem(譯為「極權制度」)可以作為它的近義詞。

多少年來，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即中國人是原子化的個體。這些「原子」文化水平低下，對外界知之甚少。毛澤東用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把這些「原子」聚集起來，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彈」，他可以用這「原子彈」來對付任何人。中國人口 10 億，即在 1 后面 9 個零¹⁵。毛澤東是 1，是被視為救星的偉大導師和領袖；9 個零是缺乏自我權利意識的群眾，他們為毛的烏托邦作出無私的奉獻。沒有這 9 個零，毛澤東不能成為偉大的領袖；沒有毛澤東這個「1」，9 個「零」就毫無意義。這就是極權制中領袖和群眾的關係。

這個嚴密而嚴酷的制度是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構成的。由於社會被行政權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團幾乎是治理國家的唯一依靠。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亞南¹⁶說：「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¹⁷在極權政治條件下，特權更為嚴重。

皇帝通過治官來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職責，也是皇帝最大的難題。中國古語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澤東也面臨這個難題。毛澤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一員，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體。他是董事長，不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他需要官僚集團實現他的意志，但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恪守職責的一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團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為「公」，後者為「私」。

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一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他懷著深深的憂慮。

¹⁵ 這裏說 10 億是便於表達思想。1966 年總人口 74,542 萬人，1976 年總人口 93,717 萬人。

¹⁶ 著名經濟學家，《資本論》最早的中譯者

¹⁷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第 190 頁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一，但他對這個制度並不滿意。他發現，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和他的初衷不一樣。中央部委的「條條」和地方政府的「塊塊」交織成禁錮社會的鎖鏈，官僚們通過這個嚴密的鎖鏈對社會、對百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鉗制。1958年毛曾通過下放中央部委的權力來打破蘇聯體制，結果造成混亂。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下放權力。但這種排斥市場的「行政性分權」，多次進入了「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是多方面的：他對等級制¹⁸、官僚高高在上不滿，這和他骨子裡的民粹主義、和他年輕時一度相信的無政府主義相抵觸，也和他終生相信馬克思主義相抵觸。他對官僚們用物質利益作為調動積極性的手段不滿，他擔心這種作法會把社會引向人欲橫流的境地。他對官僚們欺壓百姓和特權腐敗不滿，他擔心特權和腐敗會使掌權者成為人民的對立面，他當然熟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

1964年7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澤東下了很大功夫參與修改、定稿，甚至親自改寫了一大段話：「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毛澤東批評蘇聯，也警示中國

1964年12月12日，陳正人¹⁹上報了《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幾天以後，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

¹⁸ 毛是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在延安時王實因批評“衣分三色，人分五等”而受到迫害。這裏說他反對“等級制”主要是指僵化的科層制度。

¹⁹ 陳正人，井岡山時代的革命家，時為中共中央委員、時任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

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²⁰請注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說的「特權階層」包括「官僚主義者階級」和附著在「官僚主義者階級」上的、被「官僚主義者階級」捧為「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特權階層」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義者階級」。

無獨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²¹在《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的貪婪而不能滿足，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并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²²吉拉斯指出，該階級的權力并非基于擁有財富，而是對於國家所有財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階級》里的宣判：新階級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²³這個新階級就是官僚特權階級。

雖然毛澤東和吉拉斯都認為共產黨政權里有一個新階級，但他們的出發點和解決辦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階級》認為：「共產主義對於我是一種理想的幻滅」，造成這一幻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與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暴政，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毛澤東卻維護斯大林，企圖建立一個超越斯大林體制的烏托邦。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比吉拉斯落后了一

²⁰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頁。

²¹ Milovan Djilas, 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當選為南斯拉夫副總統兼國民議會議長，並內定為鐵托的繼承人。由於他的一些主張超過了鐵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職務，1954年他主動退黨。

²² 密洛凡·吉拉斯：《新階級》，陳逸譯，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理論室，大字本內部版，第47、78、93頁

²³ 同上，第90頁。

個時代。毛對這個制度的一切不滿和憂慮沒有觸及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為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建立的極權制度。

毛澤東企圖從國家理論的探索中找出路。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號召幹部讀六本書：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這幾本書都分析了國家的本質。可見毛澤東對國家問題的專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國家問題。

人們痛恨國家，又離不開國家。痛恨它，是因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官僚主義的溫床。在毛澤東推薦的這幾本著作中說國家機器「像蟒蛇一樣把活生生的市民社會從四面八方網羅起來(纏繞起來)」，是「與社會分離而獨立社會之上」的「寄生贅瘤」，還有「國家是禍害」、「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說法。為什麼又離不開國家呢？因為國家有三重性：階級國家；官僚國家；公共國家²⁴。人們痛恨的是階級壓迫的國家、官僚特權的國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眾事務的國家。

國家是人類的社會性的產物。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他們在一起生活、娛樂、尋求食物和配偶，個體之間難免有衝突，有糾紛，這就需要權威來判斷曲直，定了曲直以後還不服從，就得由權威來懲罰。柳宗元說：「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²⁵作為一個群體社會，需要有一個組織機構來處理公共事務。如果沒有公共國家，則公共事務無人管理，是非曲直難以分別，內部紛爭不可調和，對抗外部的侵犯沒有力量。所以，人類不能無政府。政府、軍隊、警察、監獄，都是公共產品，都是保證人類社會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必需品。

什麼是階級國家呢？就是「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的國家²⁶，

²⁴ 孫越生：《官僚主義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頁。

²⁵ 柳宗元：《封建論》。

²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頁。

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²⁷就「是用來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²⁸林彪說得更明確：「政權是鎮壓之權」。鎮壓誰呢？鎮壓對政權有威脅的人，鎮壓不服從者。

什么是官僚國家呢？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社會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于社會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卻有大于克蘭代表的『權威』。」²⁹于是，官僚們就「由社會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在沒有權力制衡的專制制度下，「社會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們一旦變成了「社會的主人」，由于人性惡的一面，就必然對被統治者進行壓迫和盤剝。

國家機器，這是一個能量強大的怪物。一旦沒有國家機器這個權威，不僅公共事務沒人管理，而且人類會在自相殘殺中消滅。但是，它一旦建立起來，就會成為社會的「贅瘤」，就會伴生出龐大的官僚集團。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其所以經久不絕，是因為國家機器會產生階級壓迫和官僚特權；國家機器其所以必要，是因為人們畏懼破壞力很強的無政府狀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就是在無政府狀態和行政權威反復較量的過程，最終行政權威取代了無政府狀態。可惜這種行政權威還是官僚集團的行政權威。

當時中國所面對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官僚集團，而是龐大的官僚體系嫁接在極權主義制度樹干上，從而形成了極權主義官僚體系。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的統治下，不僅在官民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第一重緊張關係），在官僚體系內部也存在著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是因為干部任命制、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造成的，也與「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有關。處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頂端的毛澤東，處在兩重緊張關係的焦點上。他常用第一重緊張關係來制衡第二重緊張關係，用民粹主義的口號來緩和第一重緊張關係。用民眾的力量來平衡極權主義的官僚體系，就是鼓勵群眾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重緊張關係互相交織、互相糾結，使政治

²⁷ 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頁

²⁸ 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頁

²⁹ 轉引自《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頁

鬥爭失去了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界線，廣大參與者成了角斗場上左沖右突的群氓。

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的種種針對官僚集團的鬥爭都是通過官僚集團實行，都是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他發現，過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為自己動手術那樣，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他自己直接成為底層群眾的代表，甩開官僚集團，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火燒」官僚，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³⁰

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實現「天下大亂」，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讓無政府狀態長期存在，要恢復秩序實現「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沖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揮動他的左手，鼓勵造反派沖擊官僚，讓造反派將官僚們「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銳的條件下，哪能「燒而不焦」？³¹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揮動他的右手，讓官僚們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們「不要整他們」³²，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經結下深仇大恨的情況下，重新掌權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最終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當作「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的工具、用來敲打官僚集團的石頭——造反派，最終被這架不可能停止轉動的官僚機器壓得粉碎。

³⁰ 王力雄也有這一看法，王：《中國從文化大革命得到什麼？》，2006年4月寫於阿克蘇、北京

³¹ 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共230萬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00萬幹部的19.2%，雖未立案審查，但被錯誤批鬥、關押的幹部和受株連的人為數更多。其中，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占同級幹部總數的75%；有6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的冤假錯案近兩萬件，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頁

³²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的談話。

歷史上的大劫難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對文化大革命的補償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遺產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權力規避毛澤東和極權制度對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官僚體制沒有改變，歷史的大補償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團，廣大群眾繼續吞咽專制制度的苦果。

無論從意識形態層面、道路層面和制度層面來分析，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時，就可以判定文化大革命已經失敗，因為革命委員會完全是舊制度的復歸，沒有一點制度創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後，進一步表明文化大革命失敗，毛澤東因此健康大為惡化；鄧小平出山後搞「全面整頓」，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1976年的「四五運動」，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經喪失民心，文化大革命失敗已成定局。

文化大革命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化大革命領導人被捕。文化大革命一度摧毀的舊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已完全恢復。

中國人為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葉劍英提供的這組數字，學界有不同的看法，還有其它不同的受害者數據。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雖然數字不能確切，但可以確切地說，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大劫難。此外，文化上的嚴重破壞和經濟上的巨大損失無法估計。

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

償的。」³³文化大革命這場大劫難也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而補償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遺產之中。文化大革命到底留下了哪些遺產呢？

第一，摧毀了官方長期塑造的共產黨和官員的美好形象，文化大革命前那種對黨組織的盲目信任、對官員的盲目尊敬已不復存在。文化大革命打破了 1949 年、特別是 1957 年以來，共產黨不可批評的神話。對共產黨奴隸式的服從已被懷疑和批評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機」來概括這種現象，而這種對政治權力的不信任恰恰是從臣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的必要條件。

第二，摧毀了長期灌輸的意識形態。文化大革命依賴意識形態而發起、而運行，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使意識形態大廈崩潰，中國人從此擺脫了幾十年的精神桎梏，從荒唐的意識形態神話中覺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五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多數人不相信共產主義。官方認為這是「信仰危機」。這種對精神枷鎖的「信仰危機」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條件。

還有「信心危機」，群眾對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那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喪失信心，從而產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對新制度的探索。

正是官方感到的「三信危機」，使得群眾思想空前活躍，普通百姓的獨立意識開始形成。1976 年的「四五運動」，1978 年的西單牆，1989 年的北京政治風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運動。這種思想解放運動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也是以後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條件。

第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殘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惡昭彰。它不僅傷害普通百姓，也傷害到整個官僚集團特別是鄧小平這類高層。丟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屠刀，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第四，「無法無天」的「群眾專政」不僅傷害了普通百姓，也傷害到高層官僚。官僚們復職以後重視法律建設。雖然官僚們構建的法制與真正的法治社會相距甚遠，但畢竟邁開了走向法治社會的一步。

輝煌一時的意識形態的大廈已經是一片廢墟，鐵桶般的極權制度

³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49 頁

已經百孔千瘡。多數民眾已經覺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負的官員準備行動，改革開放的列車轟隆而來。從此中國進入了加速現代化的重要時代。這就是歷史對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的補償！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著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對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究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強調，「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³⁴「跟隨林彪、江青一伙」實際就是跟隨毛澤東。如果鄧小平提出的這個用人標準是正確和必要的話，他們卻採取了雙重標準。文化大革命后清查「三種人」時，對「恐怖的紅八月」中骨干人物卻大加保護，在改革開放以后有一些人還走上了領導崗位，因為他們是官僚的后代。而對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個文件³⁵，要求對文化大革命的頭頭「記錄在案」，還要求今后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必須看這些檔案。為了落實這個文件，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校的大學生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對一些人限制使用，從而壓制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麼，不改什麼。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繼承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化大革命前那個政治體制：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后代和親友)在改革開放中成為新的權貴。

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

³⁴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³⁵ 《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中組發[1983]6號，1983年4月23日）。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光盤。

收益的分享錯位：勞動者、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較少的權貴集團卻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條件下，權貴們都搶占一切有利的先機：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參軍；普通百姓子弟務工務農的時候，他們的子弟被「推薦」上大學。第一波出國鎂金的也是他們，利用父兄的權力地位下海經商成為億萬富翁的也是他們。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後，沒有記住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³⁶，除了對造反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著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化大革命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私人大老板，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化大革命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哈耶克說：「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³⁷文革以後的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的世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內，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官僚們志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³⁸，即權力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一個一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係的社會集團之中。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這個社會一切罪惡的淵藪。建立一種制衡權力、駕馭資本的制度是全社會必然的要求。這個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

³⁶ 在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拉鋸」的地方，共產黨將地主的財產分給農民，共產黨的軍隊走了以後，對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稱為「還鄉團」。1975年10月，賈放允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行前鄧小平要他放手「整頓」，「不要怕當還鄉團」。

³⁷ 弗·奧·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02頁

³⁸ 吳敬璠先生把「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稱為「權貴資本主義」。

第一章

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



建國之初，毛澤東樹立絕對權威，圖為北京遊行隊伍中的毛澤東像。

文革前，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前一個事件可以從后一個事件中看到結果，后一個事件可以從前一個事件中找到原因。眾多事件一一演變，矛盾不斷積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更為重大的事件。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30萬人集會，毛澤東在集會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世紀華族與外族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李鴻章說的「三千年未有的變局」。在這之前，外族是和華族地域相鄰的、文化較低的民族，華族文化一直處於中心地位，進入中原的勝利者也被華族文化同化。自19世紀以來，與華族發生關係的外族是已經進入了工業文明的國家，其科技、經濟和文化都比華族要高。歐洲人要向海外開拓市場和尋求原料，遠渡重洋來到了中國。但中國還處在農耕時代，於是發生了工業文明和農耕文明沖突。在兩個文明的沖突中，中國屢屢失敗。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一次又一次割地賠款，使中國人痛心疾首。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顛覆、腐敗的滿清政權，但以後又是連年軍閥混戰，民眾所受的痛苦甚于清朝。不少仁人志士紛紛尋求救國之路。在當時條件下，邏輯嚴密、思想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吸引了一批知識分子。俄國人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成為中國人的楷模。在中國人尋求救國之路的時候，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危機，而蘇俄呈現蒸蒸日上的勢頭，一些西方著名知識分子也贊美蘇俄。走俄國人的路——這是當時一批革命志士的結論。在蘇俄的幫助下，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俄國人成功的時候正是孫中山需要幫助的時候。早在1914年，他制定革命黨黨章的時候，把一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大大加強。他考察俄國革命黨的組織，覺得其跟本綱領與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異，俄國的革命方略有很多可借鑒之處。他承認列寧是他的同志。¹民國十二年（1923年）正月廿六日，孫中山和列寧的代表越飛發表了宣

¹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出版社，2012年，第122頁。

言，聲明兩國在各行其主義的條件下實行合作。同年夏，孫中山派蔣介石赴俄考察紅軍和共產黨的組織。1924年初，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聯俄容共的政策。同年夏，蔣介石回國，孫中山讓他組建黃埔軍校。然而，到俄國考察的蔣介石看到了俄國制度的一些問題，他認為中國不能仿效蘇聯的制度。1927年，蔣介石和共產黨分道揚鑣，清剿共產黨，屠殺共產黨人。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一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發展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政思想。日本侵華為共產黨提供了發展機會，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的過程中，共產黨的軍隊從幾萬人發展到百萬人以上，還建立了國中之國的「革命根據地」。承擔抗日主戰場任務的國民黨則精疲力盡，其政權因專制腐敗也喪失民心。抗日戰爭勝利后，經過三年國共內戰，蔣介石被趕到臺灣。于是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幾十年的戰亂，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創造了條件。但是，蘇聯的專制制度建立在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基礎上，成為一個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的特征是：

政治高度集中，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極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文化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

這是一個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他通過控制官僚體系來控制全國。官僚體系就在中國共產黨內。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下運行的。共產黨雖然強調對人民負責和對黨負責的一致性，然而，在任命制的官僚體系下，每一級官員的權力來源都是上級的任命，不是來自人民選舉。在通常情況下，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官員對任命他的上一級官僚負責，很少對人民負責。官僚集團和億萬百姓就形成了一種對立的格局。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一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一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所以，不僅共

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毛澤東說：「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深入到每一個工廠、車間、農業生產隊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一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于行政領導之上，實施絕對領導。而各級黨組織，第一把手又凌駕于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于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于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國家領導人，實際上，高層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復討論過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一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一錘定音」。對重大問題的爭論又不能達成共識時，就靠「路線斗爭」來解決。所謂「路線斗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一批人戰勝另一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一批人下臺，堅持「正確路線」的一批人上臺。這種路線斗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你死我活」的，因為路線斗爭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

中國共產黨其所以能夠牢牢地掌握政權，主要是靠軍隊，從 1946 年 6 月到 1950 年 6 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 807 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建立政權以後，又靠槍桿子保衛政權，軍隊家的國防軍，而是黨的「黨衛軍」。「黨指揮槍」是軍隊的最高原則。黨指揮槍，不是空洞的原則，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錢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

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²。這一整套監軍辦法使得每一位軍官的軍事行為和思想狀況都在黨組織的掌控之中。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的官僚體系來控制全民。

壟斷思想，壟斷真理，全體一致的喜笑怒罵

除了緊緊地抓住「槍桿子」以外，還緊緊地抓住「筆桿子」：對輿論高度壟斷。毛澤東時代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權威大報，一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一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一樣。各省在中共省委直接領導下都有一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官員。發甚麼稿，用甚麼樣的「版面語言」，嚴格服從黨組織的意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國外的真實情況，國內的負面信息，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臺以外，還以「偷聽敵臺」的罪名逮捕、判刑。

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選題、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對官方意見的注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任務。沒有學術研究，只有「理論宣傳」。一些學術刊物，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與中共中央意見不一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頭等任務。

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實現

² 這套監軍辦法請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0年，第36-39頁。

了「全民一致地嬉笑怒罵」。一場又一場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使得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思想和獨立人格。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他既是「國王」又是「教皇」。

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老統治術，在這個制度中發展到了十分精緻、十分嚴密的程度。全國百姓的心靈都被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控制，都變成了政治愚民。

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

計劃經濟當時被當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³。由於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⁴，所謂計劃經濟，實質是統制經濟。在農村，實行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工商業都由國家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詩：「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當時在中國廣為傳誦，不僅是因為符合中國的現狀，也顯示革命者的驕傲、自豪的氣概。中國農民沒有刷牙的條件，很多家庭連牙刷也沒有在統制經濟情況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行政權力支配。財富是公有的，每個人也是公有的。私人領域完全被剝奪。

³當時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無產階級專政。

⁴「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這一論斷，楊繼繩著《鄧小平時代》中有詳細的分析，見《鄧小平時代》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5-27頁，第309-312頁

統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經濟基礎，是官僚特權的肥沃土壤。極權政治又是實施統制經濟的必要條件。由于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官僚們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意願，隨意支配國家財富。老百姓的生活資料，都得仰仗官僚們分配。在這個制度下，「不服從者不得食」。

這個政權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購買生活數據的票證只能在戶口所在地領取。人們被鎖定在戶口所在地。絕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終生的活動半徑不超過 50 公里。在政府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人，住房和一切都是單位按級別配給的，離開了單位就失去一切。當局為每一個幹部和工人設有自己看不到也不能看的檔案，記錄每一個人的表現，秘密檔案決定每一個人的命運。

政治專制起源于秦始皇，公有制、計劃經濟来源于馬克思。這就是毛澤東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鉗制，老百姓的個人自由被徹底剝奪。中國的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中國人的工作、生活、思想、行為、話語、都在國家權力牢牢的控制之中。

嚴密和嚴酷的統治是靠官僚集團施的。每一個人都被鎖定在官僚權力方格中。官僚決定每一個人的命運。主宰和被主宰，壓迫和被壓迫，剝奪和被剝奪，形成了尖銳的官民矛盾。這種矛盾在政權強大的壓力下隱藏著，一旦釋放出來有，就成為沖擊官僚集團的強大力量。

特權社會，官民矛盾尖銳

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

1950 年 4 月出臺的〈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是最低一級的 28.33 倍。⁵1955 年 8 月，統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最局和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 31.11 倍。⁶1956 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達 36.4 倍。⁷那

⁵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34 頁表中數據計算。

⁶同上，據第 444 頁表中的數據計算。

⁷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45 頁。

么，被共產黨視為不平等、從而作為革命對象的國民黨政權工資差別有多大？1946年國民黨政府最高工資是最低工資的14.5倍。⁸遠遠低于共產黨政權的工資差別。

官員住房按級別享有特權。中央和各省的高級干部都住進了當地最高級的高牆大院。天津市一級領導占有遵義道的外國人留下的高級別墅，局級的干部占有了「五大道」的小洋樓。上海市1956年將各級干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規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園精美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園精美住宅」，一級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園精美住宅」等。制度還規定，幾級以上的干部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對不同級別的干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火車軟臥和飛機，只有13級以上的高級干部才可以乘坐。醫療也是按級別享受不同的待遇。高級干部享受種種醫療和保健特權。

高級干部的食品是特別供應的，簡稱「特供」。中央機關和各省級機關的領導人，都有一套特供體系。從原料生產、采摘、檢測、加工、制作、化驗、包裝，到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都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避暑勝地、海濱浴場都被開發為干部休假的場所。一到暑期，高級干部帶著妻子兒女到療養勝地享受特權。北京和各省會都有供高級干部享樂的場所。

在體制內，衣、食、住、行，都要講等級，食堂吃飯分大灶、中灶、小灶，用甚么辦公桌，坐甚么椅子⁹，都要講等級。這些等級，將人的地位的差別，用物質享受的差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低等級的人不滿。

1958年10月投入使用的北京養蜂夾道俱樂部是中央高級幹部吃喝玩樂的場所。建築豪華，靜謐的後湖和北海相連。從各文工團選來漂亮的女演員為中央領導人作舞伴。從北京的十大飯店抽調了招待員和高級廚師、理發師、高級修腳師。公安部則派來了警衛部隊和保衛

⁸ 同上，第450頁

⁹ 1956年整風反右時，新華社國內部編輯馮東書貼出「屁股的等級」的大字報，差一點被打成右派。

人員。在這裡想吃甚么就有甚么，即使在大饑荒年代，也是一應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長的要求定做。不到一年，養蜂夾道就容納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領導人決定在西面占用 7 公頃地，再擴建三座大樓，供高級幹部們吃喝玩樂等。他們要求這個所謂的「08」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這樣浩大的工程，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擔不了，就通過薄一波、呂正操、孫志遠等，打著中央的旗號，到各地搞建築材料、設備。在建設過程中，他們一看到不順心的地方，就拆了重蓋。單單是電梯門就反復改了二十次左右。這座樓一直蓋了六年，花了近 1 千萬元，到文革前尚未完工。樓內地下室修有射程 50 米的打靶場，四周都有隔音設備。這裡的房間也分幾等，有部長級的房間，有中央領導人的房間。招待費由國家財政實報實銷。

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行宮。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為此大興土木。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這些地方是招待高級幹部的特殊場所。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天津迎賓館等等。這些豪華賓館都是在大饑荒那幾年建造的，極盡奢華，警衛森嚴，老百姓不能接近。在大饑荒年代，山西省委在風景名勝地晉祠，修建奢侈豪華的晉祠賓館。在餓死人最多的 1960 年代初，中共中央華北局在這裡「學習毛主席著作」。官員們白天讀書，晚上到太原市看戲。京劇界名角馬連良、裘盛戎、張君秋、李世濟等都紛紛從北京前來獻藝。而更高一級幹部，就在晉祠賓館五號樓看古裝戲。看完戲后，高官們通宵達旦地玩麻將。在賓館南樓一天一元錢伙食費，每頓都有雞、鴨、魚、肉。晉祠賓館每棟樓都自設廚房，為高級幹部單獨開伙。華北局書記李雪峰住一號樓，每天五元錢伙食費，吃的是山珍海味。那時沒有空調，就在會議室四角放置冰塊降溫。賓館的游泳池 24 小時開放，消毒、淨化、加熱三大系統日夜循環。當時作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青年幹部李輔參加了這次「讀書會」，看不慣高官們的特權，文革一開始就貼大字報揭露，成為省委機關的造反

派。¹⁰

大饑荒年代，四川省餓死了上千萬人，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在重慶潘家坪每晚聽堂會（即把演員叫來，專門為他演唱），聽完了吃夜宵。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下鄉考察，由當時蘭州最高級的飯店——蘭州飯店派專車為他送飯。信陽地區餓死了 100 多萬人，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1960 年 7 月的信陽地委擴大會議，地點選在著名的避暑勝地雞公山。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一邊避暑，一邊為自己開脫責任。吃的有雞鴨魚肉，每天睡夠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當時沒有上山的汽車，官員們是饑餓的農民用滑桿抬上山的。

11

應當說，就官員腐敗的程度而言，文革前不如改革開放以後。因為當時中國普遍貧困，官員腐敗的物質基礎不如後來。在官員中，有些人還堅守苦命年代艱苦樸素的作風。但是，從整體上看，和官僚特權階層相對立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底層百姓，還有被被打成政治賤民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底層勞動者、政治賤民與享受特權的官僚們的尖銳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官僚階層除了有權，還有「勢」。「勢」是他們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權力可以直接實施壓迫，「勢」不僅可以獲得特殊利益，還可以對低層產生心理壓力。權和「勢」的雙重作用，使得官員和廣大民眾成為利益懸殊的兩個階層。

官民矛盾產生的原因，不僅僅是官僚特權和各級官員對民眾的壓迫，還有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造成的階層隔膜。由於官員和普通百姓處在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視角，信息又不平等共享，相互之間就會有誤解和猜疑。即使是善良的、想為民做事的人，一旦身處官位，就會站在官員的立場思考，其中不少看法是與民眾對立的。本來，官僚集團中有相當多的好官，但底層百姓把身居高位的人都當成享受特權的官僚。千百年來，官員把自己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既可載舟，也可覆舟」的水，對百姓時刻保持警惕，處處防備他們，限制他們。百姓

¹⁰ 李輔.《所思所憶七十年》?溪流出版社, 2012 年, 第 192 頁。

¹¹ 2000 年 12 月, 原信陽地區婦聯主任李瑞英在北京的家中接受本書作者的採訪。

中一旦有反抗行為，就施行鎮壓。官員這種心態和作法，進一步強化了官民之間的隔離和對立。

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潛伏著深刻的危機

在極權制度下，不僅有尖銳的官民矛盾，在官僚體系內部，很難和諧地解決權力繼承和權力分配的問題，最高統治者和官僚集團之間，這部份官僚和另一部份官僚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對民眾鎮壓和官僚集團內部的鬥爭，是這個制度得以維持的手段。這個制度內部有強大的張力，這個張力使每一個人感到緊張、恐懼。這個制度忽視個體，把個體當作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不把人當人看」。所以每一項政策的推行都要伴隨著殘酷的鬥爭。中國當時一種通行的說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句話可以作另一種解釋：如果沒有鎮壓，一切都不靈。鎮壓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蘇聯式的制度沒有鎮壓就不能維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鎮壓不斷：土改運動屠殺的地主不計其數¹²。鎮壓反革命運動至少殺了 71 萬。¹³其中有大量冤魂！中國和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的鎮壓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的，「群眾專政」在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就形成了。這就使得每次鎮壓都沒有法律依據，「無法無天」，因而更加殘酷，且嚴重擴大化。

1957 年的整風運動，類似文革的預演，整風實際是號召群眾「火燒」官僚，反右實際是鎮壓 1956 年的「造反派」。我相信毛澤東開始是想揭露一下官僚黑暗，沒有想到這把火如此之猛烈，危及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組織反擊。結果五、六十萬知識分子受到打擊，成為政治賤民，從此中國更是萬馬齊瘡。反右阻止了一切對共產黨的批評，批評黨支部書記就是反黨，官僚們更是肆無忌憚。「四清」運動又是一次文革的預演，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四清」主要是整農村的基層幹部，並沒有觸動上層官僚特權階層。每一次整治官僚集團的政治運動都被官僚們作為打擊異己的機會，最終結果，不僅強化了官僚特權，也加劇了官

¹² 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中有大量屠殺地主的史料，見該書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137-154 頁。

¹³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216-217 頁。

民矛盾和官僚內部的矛盾。

由于最高領導者一言九鼎、獨斷專行，這個制度是最容易犯決策錯誤的制度；由于不允許批評，出現了決策錯誤以後又很難糾正。一個又一個錯誤，不僅加劇了社會矛盾，也加劇了領導集團的意見分歧和內部矛盾。

最高權力的繼承歷來是專制制度的難題。皇權專制時用無可爭議的自然條件——長子繼承來解決危機，但爭奪皇位的殺戮不段。共產黨一黨專政也有繼承人危機。毛澤東晚年：他對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不滿¹⁴，繼承人危機樓日益突出。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說：「我們都是70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要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喊『萬歲』的。」¹⁵他這段話，實際上是否定了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二、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產生文化大革命的跟本原因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但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發動起來。對毛澤東的神化自延安開始。劉少奇、王稼祥、彭真等起了帶頭作用。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又用政權的力量進一步神化毛澤東。社會科學界、文藝界、教育界，都無時無刻地、竭盡全力地，用各種方式、各種手段神化毛澤東。中央領導人林彪、劉少奇、周恩來等在神化毛澤東中起了帶頭作用。毛澤東被捧成了太陽，官僚們自己就成了明月。當好了毛澤東的奴才，是當百姓主子的必要條件。

¹⁴ 戚本禹回憶江青一文中說：在中央1947年撤離延安的時候，成立了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後來到了西柏坡，又合到一起了。毛對江青說：「我從陝北來到河北，看到劉少奇代理中央期間，有些事情簡直是胡作非為，搞土改，不經中央同意，不經我同意，就亂發指令。什麼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干部打到一大片。推行一些過左的政策，搞得農村很不安寧。」「他們發什麼文件也不經過我。甚至提省一級的干部也不經過我批准。把中央工作委員會時的工作習慣一直帶到了北京。」這時毛就對劉不滿。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共識網，2005年8月2日。

¹⁵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592頁。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把神化毛澤東、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3月10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是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甚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¹⁶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它人積極表態效忠。3月18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么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¹⁷劉少奇唯恐緊跟不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

¹⁶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頁。

¹⁷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的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12-213、215頁。

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¹⁸

在這次成都件議上，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¹⁹ 其它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贊揚。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干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²⁰ 1959年9月9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說：「我這個人，歷來積極提倡『個人崇拜』的。……我在很長時間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周恩來在毛澤東因大饑荒而威信降低的情況下，更加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林彪的倡議下，1961年首先在軍內出版了《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將這本小紅書推廣到全國、全世界。在這期間一直到文革前夕，林彪在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上發揮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他發表了很多令人肉麻的神化毛澤東的言論。他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²¹ 「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²² 「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毛澤東思想統帥切，推動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話，就是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²³ 「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

¹⁸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的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52頁。

¹⁹ 同上，第215頁，244頁，288頁。

²⁰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798-799頁。

²¹ 轉引自1966年1月25日《解放軍報》

²² 林彪：〈在中央政治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²³ 林彪：〈對口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指示〉，1965年11月10日。

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²⁴「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²⁵「毛主席是我黨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永遠的普遍真理。誰反對毛中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²⁶

文革前夕，毛澤東已經擁有絕對權威，毛澤東的指示已經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毛澤東的話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一切社會標準。毛澤東是真理的化身，他的言論是判別真理的唯一標準。各種狀況已經深入了大多數人的心中，已經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在文革中被迫自殺的人臨死前留下的遺書，幾乎都要表示對毛的忠誠。

毛主席著述是中國人的聖經，黨號召人們必須天天讀。《毛主席語錄》1963年底在軍隊內部風行以後，以後越印越多。1966年8月初，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發動二、三百家印刷廠同時印制。據統計，僅1967年這一年，就出版《毛澤東選集》9,100多萬部，等於文革前十五年出版總數1,100多萬冊的8倍；《毛主席語錄》印了3.69億冊，連同以往出版的共有6.28億冊。《毛主席像》印了12.14億張，至1969年3月，毛主席像章已制作了22億個，當時全國7億人口，平均每人3枚多。²⁷1969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提出的1969年的〈計劃綱要（草稿）〉中的第一項任務就是，高質量地全力保證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內出版《毛澤東選集》1至4卷兩千萬部，《毛主席語錄》和《最高指示》3億冊。²⁸

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一發表，人們三更半夜地起來敲鑼打鼓地慶祝，「傳達不過夜，執行不走樣」。抄錯了毛指示中的一個字，就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是和對全民的愚化相伴隨的。毛澤東是真理

²⁴ 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1966年12月6日。

²⁵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²⁶ 同上。

²⁷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357頁。

²⁸ 柳隨年、吳敢群：《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6頁。

的化身，只要他一個人思考，就能施惠于天下。他一個人的腦袋了億萬人的腦袋。他一個人成了神明，萬人就成了政治愚民。在神化毛的同時，在全國掀起了對毛的忠誠運動。為了表現忠誠，還創造了系列的政治祈禱的形式：每次開會都要山呼「毛主席萬歲！」要求各單位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文革中還流行一種以頂禮膜拜的動作串組成的「忠字舞」。

對最高執政者的神化是就極權制度的需要。極權制度將國家決策集中到最高執政者那里，他為甚么不會犯決策錯誤？因為他是「哲王」，是智慧超人的圣主。而現實是不會有這樣的人，只好把最高執政者神化。這樣做，就可以使被統治者對他臣服，他的旨意就能暢通無阻的被執行。

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億萬政治愚民同時并存，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條件。在文化革命前夕，這個條件基本具備了。

毛澤東有了如此巨大的權威，就算他的想法絕對正確的，能夠使群眾運動按他的設想、他的意願發展嗎？他能控制運動中每一個環節的發展方向嗎？他能判別各種事件的是非曲直、從而使各種政治力量心悅誠服嗎？這是天真的願望。而「思想」和「指示」可以有著不同的理解，沒有法律那樣的確定性；各人都可以「打著紅旗反紅旗」，都可以把「思想」和「指示」為我所用。何況他的指導思想并不正確。群眾運動一開展起來，就有其自行發展的邏輯，任何權威都難以控制，勢必造成不可收拾的長期動亂。

三、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

從 1958 年到 1962 年期間，中國出現了大饑荒，餓死了 3, 600 萬人。²⁹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濟寧，在四川省、貴州省的=少地方，一些家庭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啃光了，鳥糞、老鼠、

²⁹ 大饑荒詳情請看楊繼繩：《墓碑》，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8 年至 2014 年再版十三次，有英、法、德、日等多種文字的譯本。

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³⁰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尸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據可靠資料的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國有數千起。³¹

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于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產生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紅旗」，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

所謂「三面紅旗」即：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大躍進就是經濟上高速度發展，即傾全國之力實現政權確定的某一經濟指標。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化的極端化，也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一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甚么作物，種多大面積，用甚么方式種植，

農民和生產小隊的干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銷售。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甚么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農民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們的生活數據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採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斃。

「大躍進」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大躍進期間，浮夸風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³²，說畝產糧食幾千斤、幾萬斤。產量吹得這么高，國家從農民那里征購的糧食就多。農民的口糧、種子、牲畜的飼料都被國家拿走了，還不能完成國家的征購任務，就懷疑農民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用種種刑罰摧殘被認為「瞞產私分」

³⁰ 一种白色的泥土，颗粒细腻，成份主要是三氧化二铝。

³¹ 2009年7月，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向作者提供的数据：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的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有1289起。青海省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加上四川、山东、河南及全国各地，说人吃人事件数千起应当没有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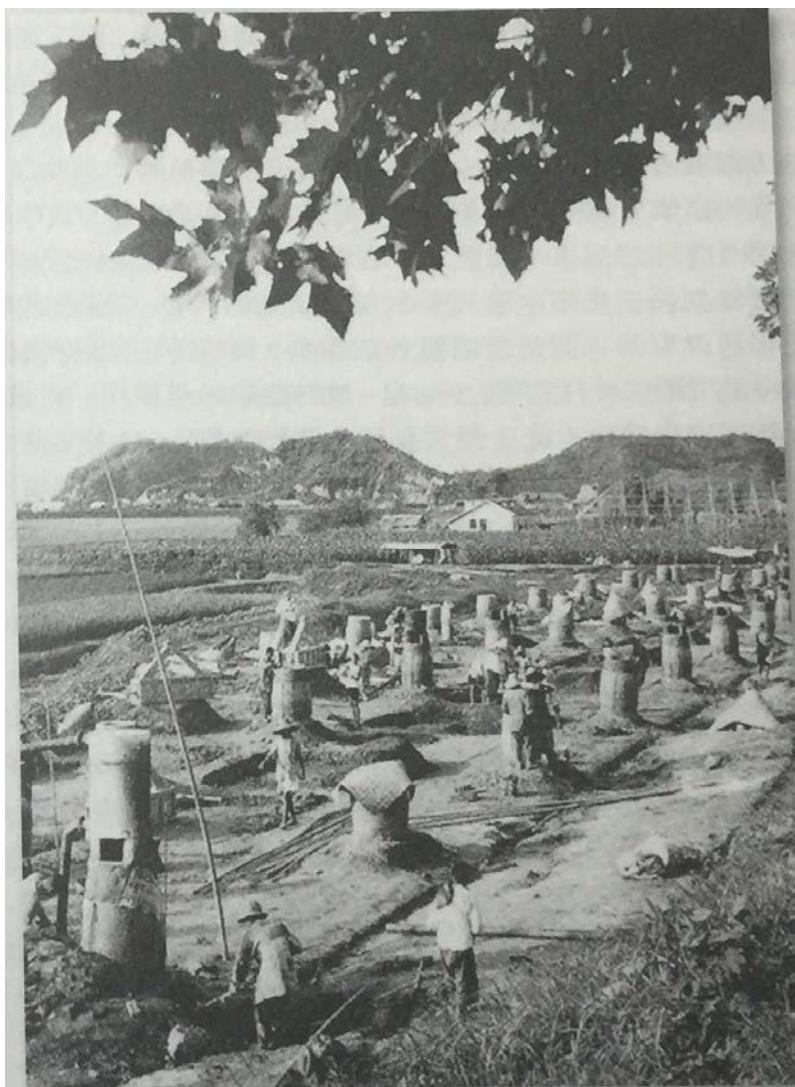
³² 苏联1956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共产党也跟着自豪，中国取得了甚么成就，也称为「放卫星」。如粮食产量比原来高很多，就称为放了「卫星」。



各地紛紛以虛假的高紀錄、高指標相互誇耀



大躍進浮誇盛行，畝產越吹越烈，
征購糧食就越多，導致出現餓死3,600萬人的大饑荒。



大躍進中農村建立起來的小高爐群

的基層幹部和農民。

在人民公社里設有公共食堂，農民的口糧集中到食堂。家庭不讓生火，鍋碗被收繳。打飯要排長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里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食堂的飯菜質量很差。公共食堂為幹部多吃多占、貪污腐化創造了條件。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慘劇各地都有。公共食堂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腸胃里。

地方政府不讓饑民求救。信陽地區公安局就扣壓了求救信 12,000 多封。³³不讓饑民逃荒。河南省潢川縣設立收容所 67 處，共收容企圖出外逃荒的農民 9,330 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殘 2,195 人。³⁴

大饑荒期間，有不少農民是被幹部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 2,104 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 254 人。³⁵據不完全統計，光山縣共打死、逼死社員 1,065 人，其中，當場打死 226 人、打后死亡 360 人，被逼自殺 479 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 29 人，打殘 46 人。³⁶對不聽話的農民、因饑餓而偷吃的農民，實施的刑罰有數十種之多，殘忍致極。貴州省湄潭全縣在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被活活打死的群眾 1,324 人，打傷致殘的 175 人，關押死的 200 余人。³⁷

造成大饑荒的錯誤的政策能持續多年而得不到糾正，其原因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反對黨。對毛澤東的政策只能歌頌，不可批評。

1958 年毛澤東、劉少奇在「三面紅旗」的問題上沒有分歧，而且劉說的話比毛更激進。但劉發現得早，轉彎比毛快，而且對「三面紅旗」有動搖。這使毛產生對劉的不滿情緒。

³³ 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教訓》，載《百年潮》1998 年，第 12 期。

³⁴ 喬培華：《信陽事件》打印未刊稿，2000 年 7 月 19 日，第 86 頁。

³⁵ 楊蔚屏：《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報告》，1960 年 10 月 15 日，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號：2406。

³⁶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於息縣情況的調查》1960 年 10 月 9 日，河南省檔案館，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號：3017。

³⁷ 劉興盛：《歷史的悲劇 沉痛的警示——1959 年貴州省「湄潭事件」始末》，《炎黃春秋》2007 年，第 11 期。

對餓死 3 千多萬人的責任，又成為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糾結。文革中北京市委內部的一個群眾組織揭發了「暢觀樓事件」：1961 年 1 月，彭真讓北京市委秘書長項子明組織、鄧拓指導，十多人在暢觀樓用了十多天時間，查閱了 1958 年以來下發的中央文件，「尋找中央和毛澤東的錯誤和缺點」，寫了近 2 萬字的材料，名為〈中央文件摘要〉，以「絕密」件送給彭真等人。這份揭發材料還說，「暢觀樓事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楊尚昆、鄧小平的指使下，讓中央辦公廳查閱 1958 年以來的文件。」³⁸楊尚昆的一條罪狀就是「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機密」³⁹可能就是指這件事。這是在追查餓死幾千萬人的責任。一部權威歷史書說：「暢觀樓報告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成了對毛本人工作的嚴厲批評。」⁴⁰康生得知此事後，專程到上海將此事密報毛澤東。對餓死人責任的追究，加劇了上層的政治鬥爭。

從行業上看，文革的發動，是以文藝界為「突破口」；從內容上看，文革是在大饑荒問題上做文章。⁴¹毛澤東挑明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是「罷了彭德懷的官」，就是堅持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就是掩蓋大饑荒的責任。在一些地方，文革是以大饑荒為引爆點的。1966 年夏天，鄭州大學就貼出了一份光山縣一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大字報描述了「信陽事件」中光山縣大規模餓死人的慘狀，稱吳芝圃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河南造反派頭頭黨言川的一大罪狀就是支持揭露大饑荒。⁴²大饑荒中貴州

³⁸ 引自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編：〈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第 344 頁）也持這一看法。另有學者認為暢觀樓清查文件是毛在七千人大會前提出的，並不是毛劉對抗，見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載《領導者》2013 年，第 4 期，第 149 頁。北京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項子明組織人在暢觀樓查文件是 1961 年 12 月，不是 1 月。彭真讓項子明組織人查文件是受中央書記處的委托，查的是中央書記處轉發的文件，為七千人大會作準備。

³⁹ 〈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中發〔66〕277 號文件）。

⁴⁰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 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第 344-345 頁。

⁴¹ 王年一先生也有這種看法，見王年一〈試論「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中共黨更研究》1983 年 9 月 30 日。

⁴² 張一哲：〈大饑荒與文革〉，載《昨天》第 23 期（增刊）。

省餓死了兩百萬人。1966年12月，貴州工學院學生張再興貼出大字報，揭露他的家鄉餓死人的情況。接著就組織調查團，對貴州餓死人的情況進行調查。⁴³在四川，造反派也貼出大字報，揭露李井泉在四川餓死800萬人的責任。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說：「1958年毛澤東經濟路線的徹底失敗是文革爆發的直接歷史原因。」⁴⁴這一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紅旗」，而「三面紅旗」包含著毛澤東心愛的烏托邦，1958年，烏托邦的試驗失敗了，他還要尋找再一次試驗的機會，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四、反右傾運動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7月14日，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上書批評「三面紅旗」，7月23日，毛澤東嚴厲批評彭德懷，國防部長彭德懷、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外交部部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一記周小舟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隨之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各地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彭德懷。

四川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都、重慶兩市召開一個月的省委擴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在會議中共揭發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嚴重右傾動搖的、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共61人。會上選擇了8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重點批判。⁴⁵在農村開展了殘酷的反右傾鬥爭。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對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人施加的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⁴⁶

⁴³ 鄧振新：《貴州風云》，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86-96頁。

⁴⁴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載《知識分子》，1986年。

⁴⁵ 廖伯康：〈歷史長河里的漩渦——回憶四川「蕭李廖事件」〉，打印未刊稿，二稿，第19頁。

⁴⁶ 同上，楊繼繩《墓碑》第234-246頁。

浙江

揪出了「沙、楊、彭」反黨集團。沙即沙文漢，楊即楊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負責幹部。基層也相應地開展了大批判。1959年11月3日至10日，溫州永強公社，在群眾大會上批判了63人。被批的人戴高帽游街、罰跪、被吊打。遂昌縣西屏公社水南大隊，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開了十一次斗爭會，被斗爭的20人，斗爭會上，將斗爭對象排列跪在兩條長凳上，舉起雙手，從開始一直跪到結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用槍托打手臂，從凳上跌下來民兵就用槍托打屁股。⁴⁷

甘肅

揪出了省委力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問題，批評了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反右傾運動中，說真話的人，都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斗爭的脫產幹部⁴⁸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級幹部151人。⁴⁹

青海

揪出了「以張國聲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其中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撤銷了他們的職務，對他們進行批判斗爭。⁵⁰程光遠在文革初帶頭造反。

貴州

1958年8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廬山會議后，常頌已死，

⁴⁷ 〈中央轉批浙江省委「關於溫州、金華地區少數地方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違反政策情況的報告」〉，195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59）1010號，亥。

⁴⁸ 農村公社以下的幹部不拿國家工資，不是脫產幹部。

⁴⁹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干問題的檢查報告〉，1962年12月3日省委第三屆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3）第6號。

⁵⁰ 〈中央同意青海省委關於以張國聲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錯誤的決議〉，195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文文件（發至省軍級），中發（59）822號，酉。

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

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廬山會議上已被打倒，又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指責「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一樣的，並和周小舟一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

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

河南

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閻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陝西

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一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岳邦珣等人。

廣東

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一書記王蔭軒等 24 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其中有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

山東

批判山東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趙健民，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廣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王卓如也受到批判。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各省基層都開展了殘酷的鬥爭。

據 1962 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⁵¹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

⁵¹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第 367 頁。

分子的全部。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1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⁵²

1957年反右派鬥爭，近60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個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甚么，都是「最高指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⁵³這樣，不僅毛犯錯誤的機會增加，黨內矛盾也在暗中積累。

五、七千人大會

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1961年他回家鄉調查以後，看法有了轉變。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一樣的調子。

為了解決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問題，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由於黨內認識不一致，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經濟形勢仍很嚴峻。

196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規模較大的幹部會議，以便統一思想。16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1）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汗，這才能夠

⁵²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收入《鄧小平文選》時題為〈克服當前困難的辦法〉，並刪除了這個數字，見《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19頁。

⁵³ 林彪：〈關於1966年全軍工作方針的指示〉，1965年11月18日。載《林副主席語錄》（1969年5月印）第34頁。



1961年11月12日，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左一）說形成困難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引起毛十分不快。

接受教訓。(2)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3)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4)這幾年黨內過火斗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后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⁵⁴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一、二部份，后送第三部份）將報告的第一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晚11時，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送給毛澤東（第三部份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前兩部份。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三天作報告，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份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交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后成為正式報告。⁵⁵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四級（中央、大局、省、地），后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于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于1962年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討論最初集中于「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

56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后，多數人都是這麼說的。但有代表說，「三

⁵⁴ 吳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5期。

⁵⁵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46-47頁。

⁵⁶ 《楊尚昆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下冊，第112頁。

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甚么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⁵⁷

代表們對劉少奇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 21 人組成：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 月 18 日，彭真說：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甚么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裏，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圣人，圣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么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冷臺。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

58

彭真這段話留下了后患。文化大革命就從打倒「彭、陸、羅、楊」開始，這是后話。針對彭真等人的意見，周恩來站出來維護毛澤東，他說：

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

⁵⁷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第 75 頁。

⁵⁸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第 1026-1027 頁。

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裁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聃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⁵⁹

周恩來發言后，陳伯達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⁶⁰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后，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一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它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很不愛聽的。

第一，大躍進以來農業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一部份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

⁵⁹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110頁。

⁶⁰ 簿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26-1027頁。

的。

第四，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三面紅旗」還需要經過實踐考驗。⁶¹

「成績和錯誤的比例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三面紅旗』還需要經過實踐考驗」都是和毛澤東的看法相對立的。「馬鞍形」是毛澤東指 1956 年因「反冒進」出現了經濟一度下降，毛批評「反冒進」才出現了大躍進。劉少奇卻說大躍進（即毛澤東說的「反反冒進」）造成了「馬鞍形」。

會后，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對整理者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⁶²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劉少奇同整理講稿者的談話，總會傳到毛的耳朵里。事隔多年之后的 1967 年 2 月 3 日，毛在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團長卡博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一些問題。」⁶³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后于 1 月 30 日或 31 日結束，可是 29 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一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⁶⁴，會議接著開下去。

1 月 29 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份地、

⁶¹ 摘自《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18-443 頁。

⁶² 1994 年 7 月 1 日訪問鄧力群記錄。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第 285 頁。

⁶³ 毛澤東：〈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1967 年 2 月 3 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1968）第三，88 頁。張素華查閱了毛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原始記錄，沒有看到這樣的內容，見《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 281 頁。

⁶⁴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第 1019 頁。

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一干二淨，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65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一定會有一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⁶⁶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⁶⁷

據說林彪這個講話是軍人鼓動的結果。吳法憲說：「軍隊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燒火』。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

⁶⁵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143-145頁。

⁶⁶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190頁。

⁶⁷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92頁。

澤東的威信。」「這些人當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講，最后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慫恿林彪出來講話。」⁶⁸林彪是代表軍隊的，國家是軍人打下來的，劉少奇的勢力上升這麼快，他們不滿意。他們推林彪出來講話，實際是他們對劉少奇勢力上升有意見。這種情緒在 1954 年的高崗事件中就表現出來了，但那次事件劉少奇是勝利者。軍人怎能忍下這口氣？一有機會就要發泄。

據江青在文革中講話透露，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心里憋著一肚子氣哩」，只有對林彪在會上的發言「內心是感激的」。⁶⁹

30 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他說：「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⁷⁰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落腳點還是集中：「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

從林彪和周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一，聽『船公』的話」。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必要性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一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這兩條都與大饑荒有關。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

⁶⁸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第 546 頁。

⁶⁹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歷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5 頁。

⁷⁰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第 17 頁。

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一個同志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志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一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就會實現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 5 千萬噸。」省糧食廳解仙清同志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鉅到哪個洞里去了，下面發生這麼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⁷¹

像甘肅這樣的簡報應當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甚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即：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一，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一」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 1958 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于毛。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

⁷¹ 〈甘肅省的省級單位十九級以上的黨員幹部學習討論擴大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中對中央、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和中央有關部門提出的意見〉1962年2月28日〕省委辦公廳匯集，甘肅省檔案館。

他是會牢牢地記在心里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一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盟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到誰」心里初步有了底。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在八大以后分第一線和第二線，第一線主持日常工作，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毛在第二線掌握大局。第一線中的朱德年事已高，不管多少事。陳云后來退出，第一線只有劉、周、鄧三人。就大饑荒問題，第一線和第二線出現了矛盾，七千人大會以后，矛盾加深了。中共主流史學家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2月7日散會，2月8日毛澤東就乘專列去武漢了。從這時起，劉少奇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發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但他在一旁對劉少奇進行了考察。

六、八屆十中全會

七千人大會以后就是「西樓會議」。「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甚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后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⁷²劉少奇說自己現在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⁷³

3月16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

⁷²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51-1052頁。

⁷³ 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85頁。

東匯報。毛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現在的主要還是對困難估計不足。」⁷⁴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七千人大會」后]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征詢過一些領導干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⁷⁵這些省委書記拿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相比，當然要好一些。毛澤東覺得省委書記是支持他的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云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⁷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后，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支持包產到戶的講話。為了緩解饑餓，1961年，各地大面積推行包產到戶。1962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70%。⁷⁷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⁷⁸包產到戶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使毛澤東憂慮的還有「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

⁷⁴ 劉少奇：〈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1962年5月11日），載《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4-446頁。

⁷⁵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3頁。

⁷⁶ 同上，第1058頁。

⁷⁷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1274頁。

⁷⁸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84-1085頁。

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干部甄別平反。但有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但彭德懷奮起為自己申辯。

1962年7月6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田家英向毛陳述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的意見。田家英說完后，毛問他：「你主張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個體經濟為主？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下午，陳云立即拜見毛澤東，向毛闡述了分田到戶的意見。毛澤東聽后沒有表態，陳云後來回憶說，談話以后，毛很生氣。⁷⁹

7月8日，毛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到菊香書屋開會，毛明確表示不贊成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7月10日，毛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游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甚么？壓不住陣腳了？為甚么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云、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 you，鄧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甚么？」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一吐為快：「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后怎麼辦？」⁸⁰

大躍進失敗以后，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盡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

⁷⁹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5卷，第110-111頁。

⁸⁰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頁。

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里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持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干涉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⁸¹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后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里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匯報后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⁸²這就是「三和一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后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17日，劉同羅瑞卿、王任重、謝富治等談公安工作，要求認真檢查、徹底揭露幾年來打死人，傷害群眾的情況。劉說：「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⁸³劉的這番話會使毛聯想到赫魯

⁸¹ 朱良：〈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義罪名的真相〉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

⁸² 閻明復：〈從我親歷的幾件事看康生〉，載《炎黃春秋》2005年，第5期

⁸³ 《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51頁。

曉夫對斯大林的清算。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离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階級斗爭」的毛澤東，隨時準備開展新的斗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四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⁸⁴。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份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一部份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化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麼些人，沒有干劲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干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⁸⁵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也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干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

⁸⁴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第29-30頁。

⁸⁵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4-1077頁。

「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干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份，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份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干，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

「他沒有聯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⁸⁶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

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彭德懷沒有能夠參加七千人大會，他得悉劉少奇的講話后大哭一場。⁸⁷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送一封長信（即「八萬言書」），詳述了自己的歷史，請求中共中央全面審查，並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甚么「反黨小集團」，也沒有「里通

⁸⁶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4-1088頁。

⁸⁷ 王年一：〈漫談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版。

外國」的問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彭德懷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19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⁸⁸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個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⁸⁹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項目組以賀龍為主任。⁹⁰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打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征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并能活到中共執政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⁹¹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并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能鬥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把和高崗和饒漱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反黨集團」。高崗憤而自殺身死。⁹²《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閻紅彥

⁸⁸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92-1093頁。

⁸⁹ 同上，第1093頁。

⁹⁰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0頁。

⁹¹ 楊繼繩：〈高崗兩任秘書談高崗〉，載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評論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3年，第83-104頁。

⁹² 同上。

⁹³看到樣書后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后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小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甚么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 72 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⁹⁴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干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⁹⁵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⁹⁶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階級本來是經濟範疇，即在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中，才能說明階級的存在。到1957年，中國土地改革已經完成，農村地主、富農的土地已經被剝奪，工商業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再根據甚么來劃分階級呢？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不容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是去年整風才發現的。」⁹⁷「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這是一種危險的、有害的提法。但是，中央黨校哲學教授

⁹³ 閻紅彥，陝西省安定（今子長）縣瓦窯堡人，在陝北革命根據地屬謝子長派，和劉志丹有分歧。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文革前為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在群眾造反運動中受到沖擊，1967年1月8日在昆明自殺。

⁹⁴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96頁。

⁹⁵ 同上，第1096頁。

⁹⁶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0頁。

⁹⁷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1958年11月21日上午于洪山。

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⁹⁸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講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后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份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⁹⁹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大饑荒無疑使毛澤東的權威受到影響，也使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面臨危機。七千人大會上毛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經過兩年的醞釀，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祭起階級鬥爭這個法寶，扭轉了政治形勢。

毛的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

⁹⁸ 文革初，艾思奇這個講話的油印稿在大學生廣泛傳閱，本書作者看過。《艾思奇全集》沒有收錄。

⁹⁹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文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6-197頁。

論」的雛型，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理論的雛型。

一旦吹響了階級鬥爭的號角，各級黨組織都把抓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他們以階級鬥爭的眼光，尋覓「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下級將這些「新動向」向上級匯報，上級又將這些「新動向」向下級通報。各種報刊和各級會議，都大造階級鬥爭的輿論。階級鬥爭的氣氛越來越濃。於是，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開始了，這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稱「四清運動」。

七、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大饑荒剛結束時的「整風整社」運動是「四清」運動的前奏。各省的「整風整社」是以「六級幹部會」的形式開展的。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份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的經驗是：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¹⁰⁰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¹⁰¹問題。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¹⁰²，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¹⁰³毛

¹⁰⁰ 〈中央轉發廣東省委關於農村「三反」問題的兩個文件的批語〉，1960年6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07頁。

¹⁰¹ 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

¹⁰² 〈對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的批語〉，1961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17頁。

¹⁰³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3-534頁。

澤東在 1960 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1960 年 11 月 15 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¹⁰⁴他沒有從制度上尋找大饑荒的原因，卻認為大饑荒的責任是「國民黨殘余」奪取了部份權力。他要通過階級鬥爭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余」的手中奪過來。

「整風整社」中揭發出來的事情是駭人聽聞的。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藉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從根本上還是制度原因。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干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余分子。為甚么殘余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整風整社」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¹⁰⁵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于 1960 年 12 月 20 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扎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運動中揭露出了幹部腐敗和專橫的大量事例。由于干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干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是另一個「整風整社」的典型。黑龍

¹⁰⁴ 〈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1960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 349 頁。

¹⁰⁵ 〈中央轉批湖北省委關於沔陽通海口公社整風整社第二階段總結報告〉。196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80 號。

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大饑荒那幾年，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干部逼得自殺身亡。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干部大吃大喝。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進入公社后，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干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干部普遍進行「五查」：查家庭出身，查個人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工作組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接著，像當年斗爭地主一樣斗爭壞干部。最后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¹⁰⁶

整風整社對農村干部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河北省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風整社運動中，共揭發出各種犯錯誤干部174,757人，占干部總數的13.9%，預計處理37,412名，占干部總數的2.98%。在運動中，在「把一些『五風』嚴重的社隊看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或死官僚主義分子奪了權，把犯『五風』錯誤的干部，當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進行了批判斗爭，并把這些干部集中到縣社進行『訓練』，實際是批判。據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共『集訓』了6,763名」。¹⁰⁷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

「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¹⁰⁶ 東北局農委工作組、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1961年2月15日，吉林省檔案館，全宗號：1；案卷號：212。

¹⁰⁷ 《中共河北省委整風整社辦公室、監察委員會關於1960年冬到1961年春農村整風整社運動的組織處理工作總結》，1962年4月28日，河北省檔案館，全宗856，目錄1，案卷221。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了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問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規定（草案）〉（簡稱「后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二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后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份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八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總想在村里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整了很老實的黨支部書記李自旺。¹⁰⁸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忽視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隊長為蕭風，曾是新華社記者，此時是河北省委副秘書長）。他們進村時，不是采用毛深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

¹⁰⁸ 2004年9月我倒延慶縣找到了李自旺，他在縣城里一家木器廠看大門。這家木器廠的老板就是當年本村的一位富農子弟。此時李自旺因中風說話不清。老板為了照顧他才讓他在這裡打工。

一樣，扎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¹⁰⁹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稱贊。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于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王光美在河北省作了「桃園經驗」的報告后，1964年6月到8月，劉少奇帶她到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雲南等省作「桃園經驗」的報告，親自為王光美站臺。此外，還有不少地方聽了她的報告錄音。¹¹⁰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關的負責干部作了一個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后患。參加會議的歷史學家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臺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臺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并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臺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干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后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干甚么？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臺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干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¹¹¹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

¹⁰⁹ 王光美：《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1964年7月5日，見《批判材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第471-570頁）。

¹¹⁰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頁。

¹¹¹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頁，出版時刪掉了「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婆娘』」這句話。

「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奇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甚么。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¹¹²「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說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¹¹³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普遍意義」。¹¹⁴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斗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劉

¹¹²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20-321頁。在延安時毛澤東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劉少奇，現在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澤東的這一改變意味深長。

¹¹³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573頁。

¹¹⁴ 〈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4）第527號。

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很多冤假錯案。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云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作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在這裡作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1964年10月改組了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去昆明開會的貴州領導們帶回兩個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的兩個月的時間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斗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關進監牢。¹¹⁵

四清工作是劉少奇掛帥的。在他掛帥的這場運動中，共逼死干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¹¹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復查證明，其中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後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匯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匯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

¹¹⁵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后：對一篇當代史回憶文本的解讀〉（修訂全本）載《領導者》2006年1月號（總第12期）。

¹¹⁶ 羅冰：〈毛澤東發動社教運動解密〉轉引自宋永毅：〈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貢獻〉，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10年，第227頁，卜偉華認為此數據可疑。

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117

王光美在她的書里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沒有說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看，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后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¹¹⁸

1963年春夏之後，全國的大饑荒已經結束，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干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定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定，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

廣大農民，對大饑荒時期基層干部不顧人民死活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們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占、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干部。「四清」運動給了農民這個機會。

在「四清」中，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饑荒」的種種苦難，說干部如何打他們，說家里人是怎么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干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臺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農村干部恐慌、絕望，有人自殺。據青海省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干部自殺。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

¹¹⁷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0頁。

¹¹⁸ 黃錚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1285頁。

多名干部自殺。¹¹⁹

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下午，在人大會堂河北廳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就四清運動的性質和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爭論。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后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復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甚么矛盾解決甚么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甚么『四清』『四不清』運動，甚么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甚么社會里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甚么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甚么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甚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

¹¹⁹ 尹曙生：〈從批尸鬧劇看「四清」〉，載《炎黃春秋》，2010年，第7期。

誰就要被打倒。¹²⁰

《毛澤東年譜》記錄了12月20日下午的這場爭論。劉少奇說：「陶鑄同志提出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是這樣提，還是說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問題的壞干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毛澤東問答：「地富反壞是后臺老板，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也不好混，窮得要死。地主、富農已經搞臭過一次了，至于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們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們的。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整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毛引杜甫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說：「就是要搞那個兒大的。」李葆華問：「矛盾的性質是甚么？」劉少奇說：「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叉在一起。」毛說：「甚么性質？反社會主義性質就行了。」¹²¹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118廳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范及科學家在一桌，其它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¹²²毛澤東說：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話呀！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麼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在晚餐上，毛澤東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認識和提法，說甚么「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人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¹²³顯然，毛說「翹尾巴」是指王光美；說他「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是指劉少奇。

12月27日下午，毛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毛

¹²⁰ 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115-118頁。

¹²¹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1-453頁。

¹²²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31頁。

¹²³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6頁。

澤東在陳伯達的發言中插話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董必武談到文件規定縣級以上的幹部定期調換好，過去封建王朝三年一換時，毛說：「現在十五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¹²⁴

12月28日下午，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后，毛澤東到會作了長篇講話。他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前，他要來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眾讀了憲法和黨章中有關條文，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的話，那末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人家講幾句話？」¹²⁵會前，鄧小平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集的一般匯報會，就對毛說：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認為，鄧小平不讓他開會，劉少奇不讓他講話，剝奪了黨章、憲法給他的權利。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么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那次中央會議上，有一天毛主席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么，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¹²⁶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一把手講話被第二把手打斷了，不給一把手繼續講完的時間，即使一般單位也是不正常的。

12月28日，中央工作會議閉會了，與會的省委書記都陸續返回了。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這次會議，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會后江青請曾志在人大會堂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在休息室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然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

¹²⁴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7頁。

¹²⁵ 同上，第458頁。

¹²⁶ 陳曉農：《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東方出版社，北京，2010年，第277頁。

些話的嘛！」毛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說：「有的走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省委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中央工作會議又在 1965 元旦以後繼續開。¹²⁷

毛澤東說劉少奇在他頭上拉屎，不僅是這一次。1961 年 3 月，毛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初稿，他讓人打電話叫劉少奇到廣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東北、華北各省、是自治區負責人工作會議，能不能晚兩天來？毛聽後大發脾氣，寫了一個條子給陶鑄，讓陶鑄到北京把劉少奇叫來。省委辦公廳主任吳南生趕緊為陶鑄準備專機，但是，這邊專機剛準備好，北京的專機來了，劉少奇不請自來了。¹²⁸吳南生好生奇怪。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吳南生調出毛給陶鑄的那個條子，只見上面寫著：「是哪個皇帝騎在我頭上拉屎，現任命陶鑄為特命全權大使到北京接駕。」可能是陶鑄看到條子給鄧小平打了電話，說主席生氣了，少奇同志趕快來吧。劉少奇就立即來到了廣州。這張條子當時在中南局檔案館，後移存中央檔案館。¹²⁹

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甚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¹³⁰

毛澤東在 1970 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 1965 年 1 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7 年 1 月 17 日，毛澤東在會見一個外國黨負責人談話中說：

「我們黨內有黨，這點你們過去不知道。表面上一團和氣，實際上是斗得很厲害。」「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麼搞法。」¹³¹

¹²⁷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31-432 頁。轉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第 268 頁。

¹²⁸ 《劉少奇年譜》下卷，第 508 頁：劉少奇 3 月 14 日飛往廣州。

¹²⁹ 吳南生同楊繼繩、蕭東連的談話，2007 年 10 月 19 日，在吳南生家中。

¹³⁰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 118 頁。

¹³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第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同外賓的一次談話說：過去我們「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爭，在農村的斗爭，在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法，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¹³² 甚么形式呢？就是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全面的階級斗爭。

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二十三條」以後，毛澤東對怎樣具體推進四清運動很少再談。他認為四清運動不足以解決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1965年5月，毛澤東重新登上井崗山，寫下了一首《念奴嬌·井崗山》詞：「猶憶當時烽火起，兒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聲雞唱，萬怪煙消云落。」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湖南社教運動的情況。毛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心中正在醞釀著一場氣勢磅礴的「風雷」，以便「一聲雞唱，萬怪煙消云落。」¹³³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四清」納入文化大革命之中。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四清」被納入文化大革命之中。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大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四清運動表現了毛、劉的政見分歧，激化了毛、劉之間的矛盾。而北京大學四清的反反覆覆，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誘發點。這以後再談。

八、中蘇論戰：反修防修的思想動員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的同時，開展了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9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

1461頁。

¹³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62頁。

¹³³ 同上，第1384頁。

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是恩格斯的遺囑執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施坦根據馬、恩以後的新情況，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伯恩施坦著有《社會民主黨內的修正主義》一書，他認為修正主義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者它的解釋進行批評」的思想觀點。¹³⁴這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此後，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中共批判修正主義應當發端於1956年。

1956年，中國面臨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經濟上的階級消滅以後，還要不要搞階級鬥爭？對這個問題斯大林有現成的答案。

1936年，蘇共對形勢的估計是：「資本主義成份已經完全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已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獲得了勝利。……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永遠鏟除。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在國民經濟的部門確立起來。」因此，斯大林宣布，剝削階級已經消滅，「蘇維埃社會是由工人和農民兩個友好的階級組成。」¹³⁵

1956年的中國和1936年的蘇聯情況一樣：社會主義公有制取得了全面勝利。從階級這個概念的本來含義來說，階級已經消滅了。能不能用斯大林的答案解決中國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一點上有創造性的發展。雖然公有制取得了全面勝利，但毛不承認消滅階級，還認為有階級鬥爭。經濟上的階級消滅，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還沒有消滅。1957年的反右鬥爭，就是對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敵人的鬥爭。毛的這些想法逐漸形成了一套理論。這套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這就是艾思奇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這套理論後來發展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產生於批判修正主義、是用來反對修正主義的。文革中把劉少奇說成「中國的赫魯曉夫」，正是批判修正主義的應有之義。

¹³⁴ 殷敘彝主編《伯恩斯坦文選》，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0-411頁。

¹³⁵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7頁。

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僅向蘇共代表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面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3月中旬，毛澤東認為，這個報告「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一方面，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另一方面，秘密報告無論從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主要是不恰當地全盤否定斯大林。」¹³⁶也有研究者認為，對赫魯曉夫的這個報告，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斯大林，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審閱和修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與政的歷史經驗〉，文章對斯大林的功績作了充份的肯定，對斯大林的後期錯誤進行了分析。蘇共二十大以後，發生了波茲南事件¹³⁷、匈牙利事件¹³⁸。中共中央認為，這些危及社會主義制度的事件，是因全面否定斯大林引起的。195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強調「對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批評，但必須在肯定和維護他正確方面的前題下進行。」1957年2月毛澤東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

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撰寫、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

¹³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黨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第337頁。

¹³⁷ 又稱波茲南六月事件，1956年6月，波蘭發生了針對波蘭統一工人黨政府的大規模罷工事件，並引起流血衝突。

¹³⁸ 又稱匈牙利十月事件，是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發生在匈牙利的由群眾和平游行而引發的武裝暴動。

于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9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羅馬尼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直接批評中共。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1961年10月，蘇聯共產黨舉行第22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蘇共綱領」。這個綱領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等一系列理論和政策。赫魯曉夫在主題報告中還公開批評不贊成蘇共觀點的阿爾巴尼亞，影射中共。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提前回國以示抗議。周率代表團專門到斯大林墓獻了花圈。中共中央認為，1961年蘇共中央提出的蘇共綱領草案和通過這個草案的蘇共二十二大，是「現代修正主義」觀點系統化標志。蘇聯共產黨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了權，蘇聯這個國家已經被修正主義者改變了顏色。

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資本主義復辟」是相通的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為了打好「反修」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崔琦。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從1963年9月6日發表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開始，到1964年7月14日發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為止，共發表了9篇長文，合稱「九評」。每一篇文章先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顯著位置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以激揚高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

對〈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毛澤東親自改寫了一大段話，揭露蘇聯的「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

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毛修改的這一段論述，不僅批評蘇聯，也表現出他對中國現實的憂慮。

「九評」沖淡了大饑荒在中國人心中的記憶，也迎合了中國人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當時，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聽到廣播電臺對「蘇修」慷慨激昂地斥責時，油然而生起一種快感。

現在回過頭來看，「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路線推到了極左。正是毛及其同事們堅持的斯大林主義，把中國推進了死胡同，導致了「文革」這場大災難。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毛澤東逐漸產生了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野心。他一方面停止了原來承諾的新民主主義，加快了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一方面經濟建設上搞「大躍進」，企圖趕超蘇聯。大躍進失敗後，他還不甘心。毛澤東審閱過的、發表於1964年2月4日《人民日報》的〈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指出：「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以後，他們當然也就喪失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為首』的地位。」

「……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這種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長期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轉移的。」毛澤東審閱過的、發表於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更明確指出：「……20世紀初葉，革命中心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隨後，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轉到了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要把中國打造成世界的革命中心，要當國際共運的領袖，就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使中國成為「純潔」的社會主義樣板。這正是文化大革命要做的事。

九、舉國進行革命大批判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會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

先要搞意識形態。」1963年10月26日，周揚¹³⁹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一次會議上作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任務。

1964年7月，中央成立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在文化學術領域搞批判的事。組長為彭真¹⁴⁰，副組長為陸定一¹⁴¹，成員有康生¹⁴²、周揚、吳冷西¹⁴³。做具體工作的還有胡繩、姚臻、范若愚等。開始批判周谷城、陽翰笙，後來批判到楊獻珍。再後來批判翦伯贊和吳晗。

在中共中央的號召下，各級黨委、各個部門，更加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各行各業都開展革命大批判。上世紀60年代初，報紙、廣播、會議、課堂，都充滿著大批判的火藥味。

在哲學界，批判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今稱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的觀點。1963年11月，楊獻珍在印發給黨校學員的一個教學資料中寫道：「對立統一，一分為二、合二而一，是一個意思。」1964年4月，楊獻珍在給黨校新疆班學員講課中也提到「合二而一」，認為可以用「一分為二」來表達統一物的兩部份，也可以用「合二而一」來表達「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中央黨校兩位教員據楊獻珍的思想寫了題為〈「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文章，在5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發表後在學術界引起爭議。此事傳到毛澤東那里，毛當即表示：「合二而一」是矛盾調和論。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¹⁴⁴得知毛澤東的態度以後，康生讓《光明日報》先發表幾篇贊成「合二而一」或雖然不贊成但參與學術討論的文章，接著組織文章批判、反擊。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康生修改的署名文章〈就「合二而一」問題同楊獻珍同志商榷〉，直接點名批判楊獻珍。在這以後，《光

¹³⁹ 周揚，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¹⁴⁰ 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

¹⁴¹ 陸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¹⁴² 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理論小組組長。

¹⁴³ 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

¹⁴⁴ 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7頁。

明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以及各家報刊相繼發表了大量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的文章。據統計，到 1964 年底，在半年多時間內，各地主要報刊發表批判文章達 500 多篇。¹⁴⁵1965 年 3 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委會給中央上報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說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一伙，是小赫魯曉夫。」說楊獻珍「有計劃、有組織地向黨發起了進攻。」不久，中共中央撤銷了楊獻珍副校長的職務。這一事件，使楊獻珍在文革中被送監獄達八年之久，兩人（孫定國、黎明）被迫自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受批判者 150 多人，社會上受牽連的人無法統計。¹⁴⁶

在經濟學界，開展了對經濟學家孫冶方的批判。孫冶方通過總結大躍進失敗的教訓，分析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政策中的問題。強調企業要搞好經濟核算，要重視利潤。提出了企業要以經濟效果為中心等一系列看法。他的這些看法都被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

在歷史學界，開展了對北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翦伯贊的批判。重點批判他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歷史主義」是指研究歷史的方法，翦伯贊反對片面強調「以論帶史」的提法，主張歷史研究要在大量史料基礎上得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批判者認為「歷史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認為「讓步政策」「根本上歪曲了毛主席關於中國農民戰爭歷史作用的理論。」甚么是讓步政策呢？早在 1951 年 2 月，翦伯贊在《學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指出：「在每一次大暴動之后，新的統治者，為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當時，還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書¹⁴⁷，為文革中揪叛徒作了輿論準備。

文藝界的革命大批判自 1951 年批判電影《武訓傳》以後沒有停止過，時起時伏。新一輪文藝大批判起源于毛澤東的兩個批示。

¹⁴⁵ 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60 頁。

¹⁴⁶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570 頁。

¹⁴⁷ 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重要將領，被洪秀全封為「忠王」，戰敗被捕后寫了「自述書」，后人將之稱為「自白書」。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的〈文藝情況匯報〉（12月9日編印）上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容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¹⁴⁸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將來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¹⁴⁹

在這兩個批示的前后，文化部和幾個重要文化團體的領導人成了批判對象，如齊燕銘¹⁵⁰、夏衍¹⁵¹、田漢¹⁵²、陽翰笙¹⁵³、邵荃麟¹⁵⁴等。與此同時，一大批文藝作品也受到批判。受批判的電影有《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紅日》、《兵臨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鋪子》、《聶耳》、《怒潮》、《不夜城》、《兩家人》、《逆風千里》等。受批判的戲劇有《李慧娘》、《謝瑤環》，受批判的小說有《三家巷》、《苦斗》等。一些文藝觀點也受到批判，如「寫中間人物論」、「有鬼

¹⁴⁸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36頁。

¹⁴⁹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91頁。

¹⁵⁰ 齊燕銘，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

¹⁵¹ 夏衍，作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

¹⁵² 田漢，劇作家，時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藝術局局長。

¹⁵³ 楊翰笙，戲劇家，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黨組書記。

¹⁵⁴ 邵荃麟，作家，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黨組書記。

無害論」等。

真是烽火連天、硝煙瀰漫。

1964年11月，毛在聽取一個匯報時說：「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里，究竟多少在我們手里？20%？30%？大部份不在我們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里。整個文化部都垮了。」¹⁵⁵毛澤東的這個看法，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從文化領域作為突破口的原因吧？

在對文藝界的大批判中毛澤東夫人江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來很少露面的江青，1964年6月23日在周恩來召集的全國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她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好好辨方向」，她說：「如今的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6月26日，毛澤東對江青這個講話作出批示：「講得好。」¹⁵⁶江青說她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哨兵」。這話不假，她一直為毛澤東監視著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一發現有違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新情況，就向毛報告。1951年對《武訓傳》批判，她是最先發現「問題」的「哨兵」；文革前對文藝作品的批判，她也起了「哨兵」作用。為了掃除舞臺上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江青親自出面，組織並參與創作現代京劇。《紅燈記》、《蘆蕩火種》、（后改為《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等，最后形成了「八個樣板戲」。江青也被人稱為文化「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毛澤東最忠誠、最堅決的支持者。

一〇、簡短的結論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制度。國家壟斷一切社會資源，嚴密控制每一個人的生活。壟斷經濟，壟斷思想，壟斷信息。高度壟斷的政權是靠官僚集團來維持的。龐大的官僚集團，壓制著廣大群眾，享受著不同等級的特權，官民對立相當嚴重。為了防止官僚脫化變質和緩解官民矛盾，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發動群眾

¹⁵⁵ 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4頁。

¹⁵⁶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6-557頁。

揭露官僚集團的黑暗面。然而，產生黑暗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揭露黑暗勢必沖擊這個制度，但這又是毛澤東不能允許的。一批又一批沖擊制度的人們被這個制度吞沒，更加激化了官民矛盾。毛想尋找一種形式，不通過官僚體系，直接地、公開地發動群眾來揭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蠅化變質。通過多年的摸索，他終於找到了這種形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個政權動用一切社會力量對毛澤東大力神化。使得毛澤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毛澤東的指示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一切社會標準。他的言論是判別是非、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是和對全民的愚化相對應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億萬政治愚民同時并存，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條件。毛澤東的號召一出，政治愚民們就會沿著毛指出的方向狂奔。

最高領導者獨斷專行，最容易犯決策錯誤；不允許批評決策者，出現了決策錯誤又很難糾正。毛澤東為了實現他心中的烏托邦，1958年搞了「三面紅旗」，餓死了三、四千萬人。為了保衛「三面紅旗」，開展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以彭德懷為首的上千萬人受到迫害。圍繞大饑荒以後的善後恢復，毛澤東和劉少奇產生了分歧，毛認為劉少奇等人的恢復措施是復辟資本主義。對餓死幾千萬人責任的追究，加劇了上層的政治鬥爭。「三面紅旗」失敗了，毛澤東沒有放棄他的烏托邦，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創造實現烏托邦的條件。

階級本來是經濟範疇，消滅了私有制，就應當消滅了階級。毛澤東突破了馬、恩、列、斯的理論。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經濟上消滅了階級，毛澤東從政治上、思想上尋找階級敵人，繼續開展階級鬥爭。在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他更反對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指導思想。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觸動了毛澤東的痛處。毛澤東認為，蘇聯共產黨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了權，蘇聯這個國家已經改變了顏色。毛還認為，蘇聯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不僅批評蘇聯，也警

示中國的官僚集團。

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自 20 世紀 60 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到文革前夕，整個社會徹底意識形態化。幾乎每一個人都被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魔力俘獲，自覺地為意識形態而戰。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條件。

這樣的制度，這樣的道路，這樣的意識形態，必然釀成一個又一個事件。前一個事件是後一個事件的原因，後一個事件是前一個事件的結果。一連串的事件——演變，矛盾不斷積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更為重大的事件。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二章

點燃「導火線」



《海瑞罷官》的作者，明史專家吳晗



姚文元（左一）受命毛澤東寫批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索



《海瑞罷官》的海瑞，京劇名角馬連良飾演



彭真抗拒刊登姚文元文章，結果以「反對毛澤東」的罪名下台

一、毛澤東秘密制造「導火線」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姚文元。在當時大批判的環境下，大多人以為又是一篇普通的批判文章，沒有引起注意。然而，這篇文章卻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對章伯鈞、羅隆基無限上綱、羅織罪名的吳晗¹，成了文革的第一個犧牲品。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革的起點，這表明了「文革」和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聯系，也就是和大饑荒的聯系。

這篇文章從起草到發表，向中共中央第一線領導保密八個月之久。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中宣部也不知道。這完全是毛澤東個人決定的²。處在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毛，獨自決定重大問題是司空見慣的事。陳伯達、王力在他們的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到這件事，這兩位毛身邊的大筆桿子也沒有參與此事就更不尋常了。

毛澤東組織這篇文章還是來自大饑荒的糾結。早在1959年4月的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就提出要學習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還提議找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寫些文章。³毛為甚么提出這個問題？大概是因為1968年大躍進以來沒有人敢向他講真話；也可能是他看到官僚們追求享受、欺上壓下的情況后，試圖讓官僚們學習海瑞的清正廉明、剛直不阿、敢講真話。沒想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真的當了一回海瑞，卻觸及了毛澤東心愛的「三面紅旗」，惹惱了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毛又說有「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之分。說彭德懷是「右派海瑞」。⁴

根據毛澤東1959年4月提倡學習海瑞、宣傳海瑞的意見，胡喬

¹ 吳晗：〈我憤恨，我控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7月7日。

²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最新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³ 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月5日，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6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1-12頁。

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第754頁。

木⁵找到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請他寫一篇全面評價海瑞的文章。吳晗是中共黨內明史專家，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解釋歷史、常用歷史影射現實。中共建政以前吳晗曾借罵朱元璋之名罵蔣介石。中共建政以後，又改寫了《朱元璋》一書，大唱贊歌。名為捧朱元璋，實際捧的是毛澤東。在極權政治下能夠以發表作品而成名的知識分子，大多是這個樣子。胡喬木和吳晗談話間，吳晗答應再寫一出以海瑞為主人公的戲。在此之前，吳晗已經寫了〈海瑞罵皇帝〉的文章，1959年6月在《人民日報》上署名劉勉之發表了。1959年9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論海瑞〉，因是在批判彭德懷之後。胡喬木給這篇文章加了個尾巴，寫了罵右傾機會主義的話，表示與彭德懷劃清界限。⁶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要求吳晗為他寫一出海瑞的戲。1960年底劇本寫成，名為《海瑞罷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演出。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政治嗅覺敏感的江青和康生認為這出戲「與廬山會議有關」、「有政治錯誤」。他們把劇中的「退田」和現實中的「包產到戶」聯繫起來；把劇中的「平冤獄」和現實中的「翻案風」聯繫起來。其實，「翻案風」和「包產到戶」是1962年的事，吳晗在寫劇本時還沒有發生。毛澤東還是聽從了他們的意見，決定對這出歷史劇進行批判，讓江青找人當槍手。

1964年10月江青在北京找到李希凡⁷。李希凡是搞文藝評論的，1954年他和藍翎批評《紅樓夢》研究權威俞平伯受到壓制，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從而一舉成名。1964年他是《人民日報》文藝部的編輯。他畢竟是一位書生，把批《海瑞罷官》理解為寫一篇純粹的學術文章，認為要把《海瑞罷官》與1962年的單干風聯繫起來很難。江青只好另找槍手。1965年2月，江青到了上海。早在1963年，江青就與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談過批《海瑞罷官》的事⁸，1964年4月柯慶施在廣東養病，就推薦當時分管文教的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承擔此事。組

⁵ 胡喬木，在延安時期就是毛澤東的秘書，此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宣部副部長，號稱中共一支筆。

⁶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頁。

⁷ 另一說法是1964年6、7月間找李希凡，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10頁。

⁸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第1卷，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30頁注12。



《海瑞罷官》劇照

織寫文章本來是文教書記份內的事。張春橋向江青推薦了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華東局內刊編輯部副主任兼文藝組組長的姚文元主筆撰寫，張則代表上海市委予以積極協助。⁹1965年3月的一天，江青見了姚文元，交代了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任務，交給他一本1961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藝》，上面刊登吳晗的劇本。為了幫助姚文元寫好文章，張春橋從復旦大學歷史系調來教師朱永嘉準備資料。到第六稿時朱永嘉才知道是寫批吳晗的文章。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寫了八個月，寫到第十稿，由毛澤東親自審定。¹⁰毛澤東看了三遍。¹¹可見毛對此文的重視。1965年9月陳丕顯（柯慶施1965年4月9日逝世后陳丕顯接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給江青帶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就批判吳晗一事向彭真打了招呼，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說，吳晗的有些問題可以批判。¹²他的意思是，「有些問題」可以批，但沒有說吳晗這個人可以批。這應該是就吳晗問題毛和彭真的第一次交鋒。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幾天，11月初，上海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文章的最后定稿。參加者有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兩個文教書記張春橋和楊西光，還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賢，朱永嘉。會議是在康平路165號樓上朝北的一個大會議室里開的。陳丕顯在會議室里來回踱著方步，他對張春橋講，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勞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當天早晨，姚

⁹ 據1960年代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的唐榮智回憶，江青到上海找柯慶施以後，柯找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俞銘璜，說：主席要批北京市委修正主義，要組織人寫文章。將、柯、俞討論后形成了十個題目，其中有「有鬼無害論」、「評《海瑞罷官》」。俞銘璜自己寫了〈有鬼無害論〉，在1965年5月6日、7日的《文匯報》兩天連載。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是俞銘璜讓姚文元寫的。不就俞銘璜去世了，柯慶施也去世了，就由華東局轉手給上海市委接著抓。見金大陸等採訪唐榮智：〈「文革」從華東局開始發動的三件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¹⁰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公司，香港，2003年，第5頁。

¹¹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最新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69頁。

¹²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后〉，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6期。

文元還在睡覺，陳丕顯就給姚文元打電話，祝賀他文章發表了。¹³

1965年9月，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要他到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彭德懷于11月28日下午離京赴川。11月30日，即彭德懷到達成都當天，《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此文。彭德懷是在12月4日看到的，當即大怒，說這是打了我彭德懷一耳光。¹⁴

姚文元的文章在《文匯報》發表后，上海《解放日報》11月12日在第二版轉載。11月24日《浙江日報》、《大眾日報》（山東）、《新華日報》（江蘇）、《福建日報》轉載，11月25日《安徽日報》轉載，11月26日《江西日報》轉載。這些省是華東局屬下的，這些報紙是在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打了招呼以后才轉載的，魏文伯知道姚文元這篇文章是毛支持的。

上海的報紙批評了北京市的副市長，北京有甚么反應呢？毛密切關注北京的動向。

二、彭真是劉少奇「山頭」的重要骨干

毛澤東批吳晗有兩個目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阻止「彭德懷翻案」，開展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階級斗爭；具體目的是試探彭真，這是一個「套」，讓彭真上鉤。彭真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他雖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經常參加常委會議。他在書記處分管人大常委會、公安、政法方面的工作。

毛澤東之所以注意彭真，是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彭真直接追究毛教「大饑荒」的責任，更主要原因是他是劉少奇「山頭」最重要的骨干。

彭真和劉少奇有很深的歷史淵源。1936年劉少奇任北方局書記，彭真是北方局組織部長。在白區黨，彭真是僅次于劉少奇的第二號人物。193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討論華北工作。

¹³ 同上。

¹⁴ 王春才：《元帥的最后歲月——彭德懷在三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頁。

劉少奇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劉少奇就讓彭真駐晉察冀，以北方局名義協同聶榮臻指導冀晉、平漢鐵路東及平津兩市黨的工作。原北方局成員劉瀾濤、黃敬、林楓、安子文、姚依林、胡錫奎、林鐵、劉仁、李葆華、李大章、宋一平、劉錫五等分別擔任了晉察冀、太行、晉綏等根據地黨的領導職務。從這時開始，以劉少奇為核心、由彭真為骨干的劉少奇的班底逐漸形成。

由于劉少奇批評王明¹⁵最得力，毛在同「國際派」的鬥爭中需要劉少奇。1941年10月3日，毛澤東發電報讓在蘇北的劉少奇回延安。劉少奇1942年2月動身。2月13日毛澤東打電報給陳毅、劉少奇說「少奇返延，須帶電臺，並帶一部份得力武裝沿途保衛。」2月20日又來電報：「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幹部為骨干，須加挑選與訓練。」毛還讓彭德懷派人調查路途安全情況。¹⁶

深受劉少奇信任的彭真也獲得毛澤東的信任。1943年3月，毛澤東親自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林彪擔任副校長。林彪只掛副校長的頭銜，不到中央黨校去視事。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由彭真主持。彭真利用黨校這個位置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為毛澤東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提高了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加強了劉少奇的勢力。1943年7月，劉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時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調入黨校，擔任二部副主任，成為彭真的得力助手。1944年，彭真晉升為中組部部長。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籌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安排了一批劉少奇擔任北方局書記時的部下。由此，劉少奇系統成了中共黨內重要「山頭」之一。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中央書記，這是最早的「毛劉體制」。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加上了周恩來、朱德兩人，組成了五人主席團，這五人主席團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穩定的領導集體。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七大」時，劉少奇被毛定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白區組織代表團參加「七

¹⁵ 王明（1904-1974），又名陳紹禹。1926年加入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取得了中央領導權，在黨內推行了一條以教條主義媚蘇親蘇為特征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是毛澤東的政治對手。

¹⁶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766頁。

大」，彭真是白區代表團的主席。經劉少奇等人的努力，「七大」上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雖然名列第三，實際是第二把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所謂「61人叛徒集團」又歸順在劉少奇「山頭」之下。這些人包括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廖魯言、徐子榮、王其梅等61人。1935年1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可以讓關押在北平監獄的一批共產黨的幹部履行敵人規定的「簽字」手續出獄，解決幹部不足的燃眉之急。劉少奇同意柯慶施的建議，並上報中央，經當時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同意，從1936年9月開始，斷斷續續地履行了手續，離開了監獄。這61人有19人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犧牲，或在建國前後逝世；另有一人叛變，被中共處決。「文革」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和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楊成武1967年6月20日講話說：他們這些人，每年照一次相，聚一次餐。¹⁷

藉助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劉少奇這個「山頭」的幹部占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領導的重要位置並且有繼續擴張之勢。1953年2、3月間，劉少奇提出關於中共中央人員安排名單，劉起草，征求高崗意見，高崗認為這個名單不解決實際問題。4、5月間，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有薄一波，沒有林彪。據說是因為林彪那時身體不好，已經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實際是鄧子恢負責。這個名單不知怎麼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十分重視，讓機要秘書把這份名單直接送給他信任的高崗看，看后就讓機要秘書帶了回去。事先高崗不知道有這個名單。毛澤東對安子文提的這個名單很不滿意，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批評安子文：一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哪來這麼大的權力搞這麼一個名單？安子文當即作了檢討。毛主席說，這次到此

¹⁷ 楊成武1967年6月20日講話中引用林彪的講話中提到此事，見〈王林日記摘抄〉（1967年7月30日）載《昨天》2012年，第1期。



高崗之墓

這止，不許對外泄露。高崗以為，安子文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是劉少奇讓搞的。高崗覺察到毛主席在這件事上對劉少奇不滿，他沒有聽從毛主席不外傳的交代，在與一些領導干部個別交談中，講了這個名單問題，借以攻擊劉少奇。¹⁸

劉少奇「山頭」膨脹不僅引起了毛澤東的不安，也引起了其他「山頭」的不滿。最先挑戰劉少奇的是高崗。

1952年高崗從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調進北京，毛澤東十分信任他。當時有一個說法：「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當時調進京的五個大局書記：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副書記鄧子恢（書記是林彪，鄧子恢主持工作），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副書記習仲勛（書記是彭德懷）。高崗排在第一位。有人猜測，毛準備讓高崗替代劉少奇當接班人。

高崗和毛在一些問題上看法一致。如：為防止農村兩極分化，盡快實行農業集體化。毛澤東對高崗講了很多對劉少奇不滿的話。高崗在中央高層散布了這些話，還跟一些高級干部私下議論劉少奇。高崗批評劉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批劉的天津講話¹⁹，說劉反對山西的合作化，說劉反對開除富農黨員，等等。毛主席對高崗說，劉少奇這個人沒有過社會主義關，現在要幫他，幫不過來就讓他當議長（當時還沒有人大）。然而，這時毛還不想打倒劉少奇。劉少奇、周恩來聯手對付高崗。從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講了很多私房話。高崗後來在檢查中說：「我對劉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聽別人講的，是我檢的。」「別人」指誰？是毛。高崗進京前，毛讓他查東北的敵偽檔案，看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的表現如何。到1953年底，由于種種風聲，高崗和劉少奇相比，毛覺得還是高崗的危險性更大一些。劉還主動檢查，高崗不檢查。高有軍隊的老關係，有東北地盤，劉沒有。另外，如果高崗把毛的私房話都端出來，那毛不

¹⁸ 高崗秘書趙家梁與楊繼繩的談話，見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3年，第87頁。

¹⁹ 1949年4月，劉少奇至到天津視察工作，和天津的資本家開了幾次座談會，鼓勵資本家在恢復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其中有「剝削有功」的話。

成了分裂黨、反黨？毛審時度勢，反覆權衡，才決定把高崗出來。²⁰同時還把和高崗沒有多大聯系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牽連進來，打成「高饒聯盟」。高崗看到毛澤東不支持他，憤而自殺了。這就是 1954 年的「高饒事件」。

「高饒事件」以後，黨內對劉少奇的不滿有增無已。1962 年春天，高崗夫人李力群在勞動部上班，人事司通知她立即回家。原來是林彪夫人葉群來接她，葉群說：「101（林彪在東北打仗時的代號）從杭州回來，要我接你和孩子到毛家灣去，想看看你和孩子們，想問問你們的情況。」林彪同李力群除了談到高崗的案子以外，還對李力群說「力群同志，你很年輕到延安參加革命，你不了解我們共產黨內政治鬥爭的情況，都是為了個人的權威和利益。劉少奇從華中來，七大後當了二把手，就開始搞山頭，拉宗派，重用坐過監牢的人，如薄一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黨內有很大勢力。劉少奇當了黨內二把手，他是否滿意了？有沒有想法？為甚么就開始拉派？天知道。毛主席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說話，看行動，看表現。黨內對劉少奇有意見的人不只高崗一個人，在東北，我林彪是一個，王鶴壽、何凱、陳云、李富春、陳正人。到北京後，首先是毛主席對劉少奇有意見，對劉少奇不滿，從生活作風到工作方面都不滿，甚至懷疑劉少奇的歷史。」²¹

高崗秘書趙家梁說，毛想把劉拿下來不是 1964 年，也不是 1962 年，而是 1953 年。這個歷史將來會有人證明。從高崗問題上我感覺到了。為甚么讓高崗查敵偽檔案？為甚么對高崗說劉對他幫助不大？說劉和他不合拍，不行則把他挪挪地方。說劉可以搞些出出風頭、迎來送往的事，我才不願干這些事呢。這些話要不是高崗講出來，別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後劉作為接班人是公認的。毛是不是想換一換？1953 年 6 月 15 日，毛在政治會議的報告中說，講到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講到右傾情緒，講的是鄧子恢，實際內容是劉少奇的。1958 年初毛批「反冒進」，名義上是批周恩來、陳云，實際還是批劉。對此，

²⁰ 高崗秘書趙家梁與楊繼繩的談話，見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3 年，第 93-94 頁。

²¹ 陝西省橫山縣高崗與革命研究會編：《憶高崗同志》，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 年，第 88 頁。

劉少奇很明白的，所以他總是主動作檢查，1953年財經會議上主動作檢查，八大二次會議又主動作檢查，成都會議又作檢查，沒有人讓他檢查，為甚么總是要作檢查？²²

到了1965年，毛澤東想整劉少奇是決心已定的。

要整劉少奇，先得斷其臂。彭真首當其衝。

彭真和賀龍、羅瑞卿的密切關係也使毛澤東憂慮。彭真和賀龍在延安時就結下了友誼，進入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賀龍喜歡釣魚，有時將釣的魚送給彭真。彭真有空閑也去賀家串門。賀龍夫人薛明被安排到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是得到了彭真的關照。羅瑞卿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公安部部長和總參謀長期間，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關係。每年國慶節，在28、29日晚，幾個特種游行隊伍舉行預演排練，彭真親臨審查時，羅瑞卿幾乎每次都去陪同。²³

有學者說，毛澤東組織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給彭真放下「釣魚鉤」，因為那時毛還信任彭，還交給彭重要任務，讓彭當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其實，交給彭重要任務不一定是信任他。毛還讓劉少奇主持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呢，這個會議通過了「5.16通知」，難道能說此時毛對劉信任嗎？

三、彭真的對抗

在姚文發表的第三天，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和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沙英給上海《文匯報》打電話，詢問姚文的背景。上海沒有正面回答。《文匯報》駐北京首席記者要求范瑾組織反映文章，范瑾向北京市委宣傳部請示如何回答，宣傳部負責人說：「你就說今天天氣哈哈！」²⁴

²² 高崗秘書趙家梁與楊繼繩的談話，見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天賴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3年，第98-99頁。

²³ 張道一：〈毛澤東為何擔心彭德懷要反他〉，新華網2011年5月18日（張道一是彭真的秘書）。

²⁴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范瑾的罪行：補充材料之一》，北京日報文化革命運動辦公室，1967年，第18頁。本書轉引自麥克法夸爾、沈麥克《毛澤東的最后革命》，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19頁。

北京各報刊多次向市委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讓轉載。

見北京不轉載姚文，毛澤東 11 月 17 日到上海，讓上海印發單行本向全國征訂。24 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新華書店征求訂購數字，大多數地方都有覆電。北京新華書店奉命不覆，電話詢問也不表示意見，直到 29 日，才覆電同意。²⁵

11 月 26 日，彭真告訴北京市委，吳晗問題的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²⁶

11 月 28 日，在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出面協調之後，彭真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問題，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中宣部部長周揚、許立群、姚溱等人參加會議。彭真問：「吳晗現在怎樣」鄧拓回答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說：「甚么『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²⁷

打破這個僵局的還是陳丕顯。11 月 25 日，陳丕顯在上海將文章的背景告訴了羅瑞卿，并托羅瑞卿轉告周恩來。11 月 29 日，《解放軍報》奉羅瑞卿之命轉載，第二天周恩來讓《人民日報》轉載。²⁸

僵持了十八天，11 月 30 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按照彭真的意見寫了一個編者按，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并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按語的最后一段，引用毛澤東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斗爭。這是周恩來加的。²⁹

12 月 12 日，《北京日報》、《前線》雜誌同時發表鄧拓的文章，署名向陽生，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把對《海瑞

²⁵ 《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5.16 通知」附件）。

²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黨史第 2 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754 頁。

²⁷ 郝懷明：〈文革初的中宣部〉，《炎黃春秋》，2010 年，第 12 期。

²⁸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後〉，共識網，2011 年 6 月 12 日。

²⁹ 《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5.16 通知」附件）。



彭真在文革萬人批鬥大會

罷官》的批判，從政治問題拉到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上去。這篇文章是在彭真親自指導下寫的，最后由彭真親自修改，經過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³⁰

12月21日毛澤東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人談話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研究歷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³¹12月22日毛澤東同彭真、康生、楊成武談話，又講了前一天同陳伯達等談的那些意見。彭真說，根據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志同彭德懷有甚么組織聯系，第二天毛約彭真談話，毛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后作政治結論。³²

12月24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顯然是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³³

12月26日，27日上海市委向彭真匯報情況，談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據9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的，彭真未置可否。他說，對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為二」，還說吳晗問題要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彭真批評上海轉載北京各報按語不該把《解放軍報》按語放在第一篇，應當把《北京日報》的按語放在頭一篇。彭真還說：吳晗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反右派鬥爭時都是左派，鄧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陽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樣寫的。

北京的對抗，加深了毛澤東認為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看法。

作為身處高層的老練的政治家，彭真沒有那麼遲鈍。他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文章是毛親自支持的。退一步說，如果早先彭真的對抗不

³⁰ 同上。

³¹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5卷，第547-548頁。

³² 同上，第548頁。

³³ 《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5.16通知」附件）。

了解毛的意圖，毛 12 月 21 日點出了《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以后，還堅持將評《海瑞罷官》限制在學術範圍之內，那就是向毛挑戰了。今天看來，彭真他如此大膽地對抗毛澤東是正確的，也是需要政治勇氣的。他后面有沒有劉少奇支持呢？但現有的資料無法證實。彭真等人組織的「二月提綱」更是對毛澤東的一次挑戰。

彭真對抗毛澤東，咬住了毛澤東拋出的魚鉤。

四、「二月提綱」

毛澤東點出批判《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以后，一些批判文章進一步升級。1966 年 1 月中旬，中宣部收到《紅旗》雜誌編委關峰和《紅旗》雜誌歷史組姐長戚本禹各寫的一篇批《海瑞罷官》「要害」的文章，因為文章上綱很高，能不能公開發表沒有把握捉。于是就上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966 年 2 月 3 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這個小組是 1964 年 7 月由毛澤東提議成立的，負責領導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工作。組長是彭真、組員有陸定一（中宣部長）、康生（中共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長）、1964 年以來的文藝、思想大批判都是這個小組領導的，批判《海瑞罷官》當然也是他們的職責。這次參加會議的除五人小組的人以外，還有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等。會上批評了關峰等左派。彭真強調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關係。說吳晗與彭德懷沒有聯系，《海瑞罷官》與彭德懷沒有聯系，吳晗問題是學術問題。2 月 4 日許立群和姚溱，根據彭真的意見，在釣魚臺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批評加以約束，把批評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并限于學術範圍之內，不贊成搞成政治批判。³⁴

2 月 5 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討論了「二月提綱」（草案），臨開會前，彭真把「二月提綱」（草案）送給常委。上面寫著：

³⁴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最新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71 頁。

「此件因時間匆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在會上，許立群口頭匯報情況。彭真插了一句話，沒有念「提綱」。這次討論后經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同意。于2月7日用電報發給當時在武漢的毛澤東。五人小組送給常委和毛澤東的「匯報提綱」沒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署名是姚臻加上的。³⁵

2月8日，是決定「二月提綱」命運關鍵的日子。這一天早晨，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田家英等，從北京西郊機場乘專機飛往武漢。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到武漢機場迎接，並讓他們立即到東湖毛的住處匯報。至于匯報會的情況，至今其說不一。這是因為，毛澤東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對其政治對手的談話總是模稜兩可的。龔育之當時也是到武漢人員之一，沒有參加匯報會。他聽到許立群匯報會后回到招待所說：「現在好了！問題都解決了！」許讓龔育之給北京他的秘書打個電話，告訴姚臻一句話：〈匯報提綱〉順利通過。³⁶但是，《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5·16通知」附件）說毛對「二月提綱」沒有反對，也沒有說贊成。³⁷毛澤東批評許立群以後，龔育之問許立群：在武漢匯報的時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說的？許立群說，他沒有聽懂毛主席的意思。許立群對龔育之說的和「大事記」上講的有幾件事是大體一致的：（1）在匯報會上毛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說，他站在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官的人一邊，不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可以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說吳晗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于形成緊張局勢。（2）彭真說對這次批判要做政治結論。毛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決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3）彭真提到關鋒、戚本禹等左派也寫過影射雜文，罵過中央，要不要對左派整風解決一下。毛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后再說」。

³⁵ 《王力反思錄》（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12頁。

³⁶ 龔育之：〈「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張化等編《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286-287頁。

³⁷ 王力說：按周恩來的經驗，凡是毛只劃圈的，還不要急著去辦，如果毛支持的話，他會明確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個文件，毛連圈都沒有劃，可見其態度。《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13頁。

武漢匯報后，彭真寫了一個中央批語，這個批語沒有送給毛審閱，彭真給中央常委打電話，說文件已經毛主席同意，盡快發給全黨。

2月12日至14日，彭真對上海市委說，「匯報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問題都解決了，也不需要跟你們談了。上海市委提出：「提綱」中「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等還需要研究。13日，彭真指定胡繩同張春橋談話。胡繩對張說，不能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聯系廬山會議，並且說是毛主席的意見。胡繩說，這是彭真同志要他這樣講的。³⁸

2月12日，經鄧小平簽發，「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黨。在這個文件前面中央的按語說：「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二月提綱」）指出，討論「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姚文元的文章正是缺乏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則，就是以勢壓人。顯然按語是批評姚文的。

1966年3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打電話詢問「二月提綱」到底是針對著誰的？「左派」指的是誰？代表彭真的許立群回答說，這是指阿Q，誰身上有癩疤就是誰！并責問上海發表姚文元時為何不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里去了？³⁹張春橋得知彭真的答覆后說：「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文章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⁴⁰得知彭真這個電話，強化了毛打倒彭真的決心。

五、毛澤東出手反擊

看到彭真等如此對抗，毛澤東進一步把話挑明了。1966年3月

³⁸ 《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5.16通知」附件）。毛3月17-20日、28日、29日、30日談話內容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8、572頁有記載。

³⁹ 同上。

⁴⁰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62頁。

17 日至 20 日，毛澤東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話中談到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時說：過去我們是蒙在鼓里的，許多事情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甚么人手里，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毛是指以鄧子恢為部長的農村工作部因 1962 年扶持包產到戶被毛撤銷）。⁴¹

3 月 28 日、29 日，毛澤東同康生談了兩次話，說：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壞人，要解散，告訴彭真，不要包庇壞人了，要向上海道歉。30 日毛又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說，1962 年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甚么吳晗寫了那么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澤東指出，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 9 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⁴²

4 月 2 日，周恩來在河北邯鄲給毛寫信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⁴³經康生批准，《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題目是《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

⁴¹ 鄧子恢為部長的農村工作部因支持包產到戶 1962 年被撤銷。

⁴² 《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5.16 通知」附件）。

⁴³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香港中文大學，2008 年，第 68 頁。

實質)。4月5日,《紅旗》發表了關鋒、林杰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這幾篇文章被彭真、許立群壓了兩個多月。

周恩來表明了態度,支持毛澤東;大批判升級。形勢對彭真很不利。

4月9日至12日,被緊急從外地召回北京的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參加。先由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接著彭真表態,說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康生系統地批評了彭真在這次學術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陳伯達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了彭真的一系列嚴重錯誤。最後,周恩來和鄧小平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個會議決定:(1)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這個小組後來轉為中央文革小組。⁴⁴

4月16日《北京日報》用3個版面,批判鄧拓、廖沫沙、吳晗三人,市委機關理論刊物《前線》加了編者按。這是北京市委搞的。北京市委以為把鄧拓拋出來就沒事了。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當天廣播了。可新華社又奉命撤銷了北京市的按語。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批彭真,討論撤銷「二月提綱」。毛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朝里有人,各大區、各省市都有。」「2月3日搞了一個五人小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⁴⁵

毛說「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就是在1966年2、3月間,彭真組織人整左派關鋒、戚本禹的材料。王力回憶說:

這時北京發生了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主席,是姚臻、許立群幫他辦的,沒有找我。吳冷西也知道這件事。我聽吳冷西說了后,很緊張,馬上給

⁴⁴ 《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5.16通知」附件)。

⁴⁵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80頁。

彭真打電話。我說你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鋒、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文件已經送走了，這果然闖了大禍……當時我建議彭真跟關鋒、戚本禹緩和關係，他也接受了，請他兩人吃了一頓飯。後來戚本禹給彭真寫信，說過去對彭真了解不夠，這次接觸后改變了印象。他還夸彭真有偉大的政治家的胸懷，等等。後來從彭真家查出這信，江青對戚本禹大為不滿。這又成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⁴⁶

4月16日，為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央領導人從北京飛到杭州。葉劍英來得晚，問李雪峰：「這個會是干甚么，3月不是剛開過會？」李雪峰說：「我也不知道。」葉劍英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見面談話，他對毛的秘書徐業夫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談20分鐘，請你轉達。」毛不見。大家覺得事情大了。飯后散步時，六大區書記沒有一個人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講話。會議結束後，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窮和彭真一道乘飛機回北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路上，三個人面對面坐著都沒說話。⁴⁷在中國共產黨內，人與人的關係是政治關係，階級關係，除此之外無別的關係，不能有私人友誼。一旦毛對某人政治上不信任，其他人馬上和此人劃清界線、保持距離，甚至落井下石。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二月提綱」的主要起草者許立群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說，楊耳從前的尖銳性哪里去了⁴⁸1950年，許立群以楊耳、賈霽的筆名批判《武訓傳》的兩篇文章是那場大批判的發難之作，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輪到他挨批判了，從此被關押八年。

⁴⁶ 《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17頁。

⁴⁷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等編《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第594-596頁。

⁴⁸ 龔育之：〈「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張化等編《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286-287頁。

參加這次杭州會議的楊成武事後對邱會作說，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說：「中央分為一線，二線，沒有說要兩個中央。我離開北京在外地時，常委議了兩條，中央的工作以一線為主，我有甚么意見會向北京提出來，我不在外地發指示；同時，也希望北京有甚么大的問題，也向我打個招呼。他們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就做決議，發指示，這是甚么問題，大家想想吧。」，楊成武對邱會作說：「老邱，要進行反擊戰了。」⁴⁹指毛要對劉、彭反擊了。

4月28日，毛在杭州同陳伯達、康生談話，繼續批評彭真。毛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階級鬥爭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⁵⁰

彭真回北京以後還沒有失去自由。5月10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他北京市的工作。5月11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向李雪峰交代到北京市委後應當注意的事。他俯身對李雪峰說：「你去了之後……」剛開始講，聽見後面有甚么人拿材料念。彭真火了，態度激昂，回身朝背后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萬歲的！」意思是說他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他還把此當作他的政治資本。坐在主席臺上的劉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停止了。⁵¹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讓彭真倒臺了。倒臺前還念念不忘是他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

1966年4月，毛動手整劉少奇的得力助手彭真的時候，劉少奇和陳毅在東南亞訪問，他對杭州會議整彭真的事毫無所知，還把從國外帶回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一份。1966年4月19日，他從緬甸仰光回到昆明。他們原計劃對云南這個邊陲省份作些考察，這時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讓他們立即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到杭州剛住下，周恩來匆匆趕來向他介紹他出訪這段時間內國內發生的事。面對毛咄咄逼人和黨內上層力量對比的情況，

⁴⁹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32頁。

⁵⁰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81頁。

⁵¹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等編《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第597頁。

劉少奇沒有辦法抵抗，只好就接受了毛對彭真的整肅。

就在彭真等人搞「二月提綱」的時候，江青於1966年2月2日到30日，在上海搞了一個文件，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地紀要〉。毛澤東讓陳伯達專程到上海與張春橋共同修改。這個紀要，也可以說是「二月紀要」，是和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綱」針鋒相對的。這個紀要說：「建國以來，文藝界基本沒有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個紀要號召「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和姚文元寫的評《海瑞罷官》那篇文章一樣，這個紀要是也是江青秉承毛的意志搞出來的，她組織陳伯達、張春橋、劉志堅、陳亞丁等人寫出稿子，毛三次親自審閱修改，加寫了一些段落，還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題目。其所以抬出林彪，是為了請出林彪這座「尊神」。3月19日，江青致信林彪，請林彪審批「紀要」，林彪給幾位軍委副主席寫信，對「紀要」作出了高度評價。1966年4月10日，這個「紀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11號）下發到縣團級。4月16日，周恩來認為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對「紀要」的評價還不夠高，要求重寫。根據周恩來的意見，重寫的按語，對這個「紀要」作出了更高的評價，還特別強調「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⁵²「紀要」不僅僅「以毛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出的文化革命的號令，而且是讓軍隊為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

文化革命的大幕終於拉開了。在此期間，中央報刊接二連三地發出火藥味很濃的社論：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個社論是將「紀要」改寫而成的。第二天，全國各報轉載了這篇社論。

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⁵²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48-49頁。

《解放軍報》發表的文章調子最高，總是提前透露一些信息。這表明，有「槍桿子」在后面支持。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一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

有了林彪和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在南方遙控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于5月4日開幕，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被擺上了祭壇。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礙：打倒 彭陸羅楊



毛澤東的「剝筍政策」，打倒彭、陸、羅、楊，
成為全面展開文革的重要準備。

彭、陸、羅、楊，是當時對被整的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的合稱。1966年4月下旬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了彭真以後，彭真基本倒臺了。在這之前已經解決了楊尚昆和羅瑞卿的問題。

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那篇文章發表的同一日，就免去了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名義上調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實際上被審查。1966年5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中發〔66〕277號文件）。關於楊尚昆的問題，文件說：「楊尚昆同志的主要錯誤如下：（1）他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¹（2）他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機密。（3）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係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4）他還有其他的嚴重錯誤。」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掌握著中央警衛團，負責毛澤東的安全和管理毛澤東的生活起居罷。把他調離中南海，換上毛信得過的汪東興接任，毛澤東就感到安全了，楊尚昆事後回憶說：「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係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²讓楊尚昆下臺，主要還不是和彭德懷的關係，而是他與劉、鄧的關係。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的講話中說：「彭德懷是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激起公憤。……楊尚昆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只是抱了腿。」周恩來點明，楊尚昆下臺的真正原因是毛認為他「抱了劉鄧的腿」。³羅瑞卿實際掌握著軍隊，和劉少奇、鄧小平關係不錯，為了安全，毛澤東先對

¹文革後，官方說楊尚昆記錄毛的談話，是工作的需要。戚本禹在〈回憶江青同志〉中提出了新的資料：楊尚昆在主席身邊安放傾聽器的事是他通過機要室康一民來搞的。把傾聽器安裝到了主席的臥室裏來了，連衛生間的肥皂盒裏面都安上了。後來，公安部派專家把竊聽器拆出來，主席讓把這些東西連同楊尚昆、康一民的檢討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給江青保存。竊聽器是鈕扣狀的，是中央調查部從美國進口的。當時中央調查部是楊尚昆負責的。

²蘇維民：《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3頁。

³〈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

他下手。

一、羅瑞卿倒臺

羅瑞卿是解放軍的十位大將之一。⁴毛澤東過去很信任羅瑞卿，稱他「長子」(chang zi, 即高個子)，毛對關係密切的部下稱外外號，如「羅長子」、「柯大鼻子」(柯慶施)、「譚老板」(譚震林)等，表示平等、親切、幽默。毛讓羅擔任了公安部長、中共中央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等多項重要職務。羅瑞卿是毛澤東的一把刀。毛用這把刀鎮壓反革命、肅反、反胡風集團等，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1965年12月，「刀」終於砍到他自己頭上。

羅瑞卿和林彪的關係也很深。1930年林彪當紅四軍軍長時，羅是41師的政委；林任一軍團團長時，羅是軍團保衛局長；在延安，林是紅軍大學校長時，羅是教育長。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林彪一主持軍委工作，就提名已經離開軍隊十年的羅任總參謀長，取代黃克誠。羅是紅一方面軍的。新軍委中，紅一方面軍的干部占主導地位。紅一方面軍是毛的「家底」。這樣一個被毛、林十分信任的高級干部怎么被打倒的呢？

吳法憲認為，羅瑞卿下臺，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下決心的是毛澤東。批評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的是毛，決心召開批羅的上海會議并親自坐鎮的是毛，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羅的是毛，決定撤銷羅的職務、并分別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是毛。⁵

實際上，在林彪向毛提出羅的問題之前，葉劍英等人就提出過了。

羅瑞卿當總參謀長的頭三、四年內，和林彪的合作比較好。在這期間，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具體主持。⁶1962年秋天開始，林彪戰爭年代留下的舊

⁴十大名將是：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賡、譚政、肖勁光、張云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

⁵《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66頁。

⁶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2006年9月第1版，第539-540頁。

傷復發，有時十分嚴重，不得不向中央請假養病。這樣。主持軍委的工作自然就落在當時軍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賀龍身上。從此，軍隊內部逐漸形成了賀龍、羅瑞卿的格局，羅瑞卿與賀龍之間的關係也由此漸行漸近。羅瑞卿與林彪原本密切的關係反而漸行漸遠，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漸顯現。

邱會作認為，開始羅未必是存心對林封鎖，認為他和林的關係好，林又是不管小事的人，林的身體不好，事無巨細地匯報，反而打擾林。後來羅以為林的身體不會再好起來，沒有希望了，就倒向了賀龍。⁷在一次擴大的中央軍委會上，羅讓負責中央保健工作的傅連璋介紹林彪的病情。傅連璋說：「我們對林總的身體，過去和現在都是在盡醫生的職責，我們的作用是有限的」言外之意，林彪身體不可能好轉。羅瑞卿就開始嫌棄林，說「病號就是養病，要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看到羅的疏遠，林彪不得不對羅說：「如果我們沒有工作關係，你一百年不來我這裡也沒有關係，你是總參謀長，我還是你的上級吧，你的情況我一點不了解怎麼辦？軍隊的工作我是要對中央負責的。」⁸

軍隊內部對羅瑞卿這場鬥爭，與軍隊內的「山頭」有關係。

軍隊里有多個山頭。第一個是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到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合后所形成的紅一方面軍，在以后的戰爭中，林彪成為骨干人物；第二個是由賀龍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二方面軍，第三是張國燾、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割建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在延安時期被清算而脫離革命，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又在西征路中損失太大，這個山頭影響減小，但留下一些幹部。這三大紅軍主力在抗日戰爭中分別整編為八路軍 115 師，林彪為師長；八路軍 120 師，賀龍為師長；八路軍 129 師，劉伯承為師長；新四軍，皖南事變后陳毅為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抗日時期的四支部隊組成四支解放軍：彭德懷領導的第一野戰軍、劉伯承領導的第二野戰軍，陳毅、粟裕領導第三野戰軍，林彪領導的第四野戰軍。

1958 年軍隊內部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首肯

⁷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404 頁。

⁸ 同上。

后，由鄧小平、彭德懷掛帥，整了劉伯承、粟裕，蕭克等一批人，1959年廬山會議，又整了彭德懷、黃克誠等人。1959年中央軍委改組后，毛澤東任軍委主席，軍委副主席則是林彪、賀龍、聶榮臻。這體現了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軍中的掌權。

文革前夕，能夠和林彪陣營相對立的，只有二方面軍賀龍的山頭。1949年以來，賀龍這個山頭的人始終是團結的。賀龍還在彭德懷下臺、徐海東生病的時候，把能夠拉過來的三軍團（彭德懷）、十五軍團（徐海東）「無家可歸」的人都收在自己的門下。賀龍把他們團結得很好，他說：「茅臺酒勝過黨性。」賀龍還同最高層的一些人，如鄧小平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賀龍在黨內鬥爭中是能起砝碼作用的人物。

羅瑞卿疏遠林彪、靠近賀龍以后，軍內逐漸形成兩個陣營，賀龍、羅瑞卿為一個陣營，林彪與其他老帥們形成另一個陣營。

軍隊高層「陣營意識」十分強烈。平時相安無事，關鍵時候就顯現裂痕。本來是第一方面軍的羅瑞卿，卻投向了第二方面軍的賀龍，這不只得罪了林彪，也得罪了軍內其他老帥。「在軍委內部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是支持林彪的，這樣，賀龍在中央軍委內部幾乎成了孤家寡人。」⁹這樣，羅在將帥間的處境自然不好。葉劍英、聶榮臻對羅的不滿除了山頭因素以外，還有工作上的因素。

1963年秋，葉劍英從總參編輯的《軍訓簡報》上看到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報道，很感興趣，12月親赴南京軍區考察。年底，葉劍英向中央軍委寫報告介紹了郭興福教學法，建議軍委在全軍予以推廣。這份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贊揚。¹⁰1964年1月底，羅瑞卿代表中央軍委在南京軍區主持召開全軍訓練會議，會議就開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作了部署。葉劍英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后來，葉劍英向邱會作轉述林彪的話說：「羅這個人很會裝自己的『腰包』。在南京軍

⁹《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1版，第370頁。

¹⁰中央工作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談到此事：「1964年葉劍英同志親自抓了郭興福教學法，召開了現場會議，并向中央軍委建議在全軍推廣。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這一建議，并表示很贊揚。羅瑞卿一看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興師動眾，親自召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現場會議，把功勞據為己有，並乘機搞起來大比武，推廣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區著手總結的郭興福軍事訓練方法，他開始不注意，後來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勞硬搶過去了。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興師動眾地搶功，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¹¹1964 年底開始的全軍大比武，賀龍、羅瑞卿全力投入，展示軍隊在他們領導下比林彪主持軍委時更好。林彪、葉劍英、聶榮臻冷眼旁觀。後來，大比武成了羅瑞卿沖擊政治、反對「突出政治」的一條罪狀。

羅瑞卿分管國防工業，聶榮臻則主管國防科委，雙方工作有交叉，難免有些矛盾。在發生矛盾時羅對聶最不夠尊重，得罪了聶榮臻。

1965 年 6 月，葉劍英將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叫到軍事科學院他家中，就羅瑞卿問題交底。葉對邱說：「我才從林總那里回來，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主席說，『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今天就同你談長子的問題。」「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一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注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一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帥都不放在眼里，劉帥、徐帥和你（葉）就更不在話下。』」「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一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為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對長子的問題，我告訴林總，已按照主席的意圖同聶帥、劉帥、陳老總、楊成武都談過，還要很快同有關同志打招呼。」「要盡量多爭取一些人，讓他們不到長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過，胡子（指賀龍一本書作者注）的問題不要對外人提起。」「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一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長子急于上臺，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臺。第三，胡子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胡子、

¹¹ 《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10 頁。

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是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¹²葉劍英說 1965 年 6 月「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可見，在 6 月之前，毛就向葉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

羅瑞卿「身上有刺」、「霸道」這種個人作風，當然會引起些矛盾。但是，主要問題不在羅的個人作風上，而是權力配置失衡（蕭東連也持此見）。1965 年，羅瑞卿擔任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中央對臺工作小組負責等 13 項重要職務。每天收到文件堆積如山，四個秘書幫他處理文件。¹³在羅瑞卿日理萬機的同時，一些元帥和大將無事可做。自從 1950 年代廣東反地方主義以後，葉劍英調離廣東，一直沒有具體工作，閒得無聊，只好釣魚。¹⁴另外，在權力格局上，羅瑞卿掌管全局，其他老帥只負責部門工作（葉劍英管軍訓、聶榮臻管國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這種權力配置，加上羅的個性，難免不發生「怠慢將帥、越級上報和決斷，引起將帥眾怒」（韓鋼語）的情況。在極權政治下，權力分配主要取決于一把手的意志，一把手相信誰，就讓誰擔任重要職務。權力分配和職務升降都是暗箱操作，必然造成你爭我奪，爾虞我詐。如果分工、接班的事都按民主程序辦事，就不會出現這類問題。

將帥不和的問題本來可以通過調整權力分配來解決，對毛來說，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何必開展殘酷的鬥爭？原來，在毛澤東那里，有比將帥不和更為重要的、深層的憂慮。這就是羅瑞卿倒向賀龍和劉、鄧。1962 年後，羅瑞卿和劉少奇走得很近。1965 年 1 月，羅瑞卿被劉少奇主持的三屆人大增補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并向羅許諾，如林彪身體不好，還是羅來接林的班，這些引起了毛的猜疑（毛對賀龍是不放心的，本書第四章要專門介紹）。到 1965 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基本成熟。要倒劉得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怎能放心？

¹² 《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 1 版，第 378-379 頁。

¹³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40 頁。

¹⁴ 葉的養女戴晴同本書作者的談話，2013 年 7 月 25 日，于《炎黃春秋》編輯部。實際上葉劍英還管軍事訓練。

在打倒劉之前，必須先清除高層的障礙。就在這個時候，將帥間的爭斗為毛提供了機會。毛抓住了這個機會加緊部署。

1965年8月葉劍英看望林彪時，明確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今天主席叫我來，羅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羅的事以后由中央解決。」¹⁵

1965年秋，受毛澤東的委托，林彪、葉劍英開始就羅瑞卿的問題向下面「打招呼」。主要是葉劍英找些人談，有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幾位元帥和軍委辦公會成員楊成武、蕭華和邱會作。後來又有李天佑、吳法憲、李作鵬、許世友、黃永勝、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等。葉劍英在「打招呼」時說：「羅瑞卿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上，想早上臺；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賀龍）歷來喜歡搞山頭，羅就幫助他挖林總的老部下。主席叫林總管軍隊，林總的身體不好，讓他們代管一下，就出現這麼大的問題！」葉劍英特別強調：「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代這麼辦的。¹⁶

11月26日，周恩來在上海向毛匯報工作，羅瑞卿參加。周講完后，羅說他準備第二天到蘇州看望林彪。毛說，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¹⁷大禍臨頭的羅瑞卿可能渾然不覺，也可能知道了要挨整向林彪求助。羅到了蘇州，葉群借口林彪身體不好，沒讓羅進去。

1965年12月1日，葉群乘吳法憲安排的飛機從林彪養病的蘇州到杭州。毛在杭州常住兩個賓館，一個是劉莊，一個是汪莊，這次接見葉群是在汪莊。

林彪讓葉群帶一些材料呈送給了毛。¹⁸這些材料是：（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給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對羅總長的幾點具體意見〉；

¹⁵舒云：《林彪畫傳》，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550-551頁；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林彪秘書最后的回憶錄》，皇福圖書，2008年，第225頁。此轉自丁凱文等：《文革之中的羅瑞卿事件》。

¹⁶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1頁。被打招呼可能沒有吳法憲，在上海會議開始時他還不知道羅瑞卿有甚么問題——《吳法憲回憶錄》第557頁。

¹⁷《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44頁。

¹⁸《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66頁。

(4) 1965年6月張秀川〈羅總長對突出政治的錯誤看法〉；(5)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給林彪的信；(6) 1965年5月20日林辦工作人員的揭發材料；(7) 1965年10月15日張秀川給林彪的信；(8) 1965年4月15日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9) 張秀川：〈羅總長對主席思想的錯誤觀點〉；(10) 雷英夫：〈羅總長對待主席指示的幾個問題〉。另外還有蘭州軍區〈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的報告〉。

林彪11月30日給毛的信內容是：「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在聯系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葉劍英講的），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信中說的「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顯然是指葉劍英等人。

上海會議召開之前，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到杭州向毛澤東系統地匯報了羅瑞卿問題。毛澤東聽匯報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並同林彪同志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你們告訴林彪同志注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解決。」¹⁹

葉群奉毛之命到杭州，除了交上這些材料以外，還向毛澤東作了4小時55分鐘²⁰的匯報。

12月2日，毛澤東對林11月18日報送的蘭州軍區的報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²¹這是指羅瑞卿的。

甚么是「突出政治」？林彪曾有解釋：「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們的頭腦，用毛澤東思想回答和解決各種現實問題。突出政治就是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

¹⁹ 《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1月版，第393頁。

²⁰ 《張耀祠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76頁。有的書說葉的匯報六、七個小時，有的說五個小時。張當時在場掌握毛會見客人的時間，是可信的。

²¹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45頁。

毛澤東思想去統帥一切，推動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話，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²²毛澤東歷來重視政治工作，一直強調「政治掛帥」。他對林彪的這種說法是贊賞的。說羅瑞卿不突出政治，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²³，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上海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還有軍委常委，中共中央各大局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各軍、各兵種各總部主要領導人。共有61人，其中軍隊高級將領34人。這次會議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事的，軍隊里在會上管事的是蕭華、劉志堅。

據邱會作回憶，12月6日晚，空軍司令部通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8時請邱部長帶秘書和警衛員，到西郊機場上飛機，去參加重要會議。」接著，中央警衛局來電話，核實帶的秘書和警衛員的名字。12月7日，同機從北京飛往上海的有劉伯承、葉劍英、賀龍、李作鵬等。賀龍不知道到上海開甚麼會。劉伯承是知道的。在飛機上劉伯承故意逗賀：「賀胡子，到上海開甚麼會呀？」賀龍說：「除了打仗的事，要我們去干甚麼？我把軍用地圖都帶來了。」劉笑著說：「打仗，我們沒用了。我們都是黃忠²⁴的哥哥了。」賀龍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連打倒總參謀長的會，毛主席都不給他打招呼，說明毛對賀龍已經另眼相看了。上海會議以後，葉劍英就取代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²⁵

會議于1965年12月8日舉行。會議分為三個組，每組20人。第一組召集人是鄧小平、陳毅；第二組召集人是謝富治、李井泉；第三組召集人是周恩來、賀龍。楊成武回憶說：我們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參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賀龍、陳毅、陸定一，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和我。還有葉群。周恩來宣布開會後，葉群首先發言，她說：「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

²²林彪：〈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指示〉，1965年11月10日。

²³吳法憲說，整個會議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周恩來協助，毛和林二人既沒有參加編組，也沒有在會上露面，但每天會後由毛召集中央常委會談，聽取匯報和作出決定。《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558-559頁。

²⁴黃忠，《三國演義》中寫的一位老將軍，民間說某人老了還能干，就說他是「老黃忠」。

²⁵《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393-394頁。

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翟月英（劉亞樓夫人）對我講，劉亞樓在病重時要她把羅瑞卿的四條意見轉告我葉群。四條意見是（1）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臺，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臺的；（2）要我照顧好林總身體，勸林總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3）部隊的事情讓他羅瑞卿負責；（4）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我葉群。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 101（林彪代號）當面談。」²⁶

葉群還說：「還有一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裡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好，沒有聽完就讓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甚么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道呢！』這完全是逼林總交權，讓位。他這是存心折磨林總，氣林總。」葉群聲色俱厲，心情激動，一下子講了幾個小時。

雷英夫也揭發了所謂羅瑞卿反對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²⁷雷英夫是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楊成武認為，可能是特意安排雷英夫來揭發的，因為作戰部長王尚榮已經參加會了，雷英夫有甚么資格參加會議？

上海會議時羅瑞卿在雲南考察。會議的第三天晚上，周恩來讓吳法憲派一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把羅瑞卿接到上海來。周特別交代，要吳法憲親自掌握好這架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只準往東飛，不準往西飛。吳法憲理解是防止飛機到印度和緬甸。周恩來還告訴吳法憲，這架飛機到上海后只能三個人接，一是代表東道主的陳丕顯，二是公安部長謝富治，三是吳法憲。不要告訴任何人羅到了上海。²⁸吳法憲對駕駛員時念堂說：「這次專機飛行，配發給你們幾把手槍。在空中如果有特別行動，你們要聽中央的，你們要監視

²⁶中央工作組 1966 年 4 月 30 日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說：「1965 年 2 月 10 日、15 日，劉亞樓同志在羅瑞卿的指使下，向葉群同志講了四點意見，希望她勸林彪同志接受。這四條意見是（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臺；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體，這一點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總再不要多管軍訓的事情了；第四、交給羅去管，勸他多尊重羅，要相信羅，軍隊的事情放手讓羅去管。」「關於這件事，劉亞樓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聽說過，楊成武、吳法憲同志也聽到劉亞樓同志臨死前說過。」

²⁷陳虹：〈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炎黃春秋》，2005 年，第 10 期。

²⁸《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 560 頁。

他們的行動。」²⁹

羅瑞卿到上海的時間是 12 月 11 日下午 2 點多，沒有讓他到會場，而是拉到建國西路 618 號院子（曾做過波蘭領事館）里軟禁起來了，一進屋，周恩來和鄧小平就找他談話，周、鄧已經在這里等他了。周、鄧指出他的問題：概括起來有三條：一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是反對突出政治；三是向黨伸手。羅瑞卿說他沒有伸手，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沒有封鎖林彪，該向林彪講的都和他講了。有些問題他向周總理、毛主席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也是屬於他職權範圍內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後來，周、鄧又一次向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沒有這三條，有別的，可以檢查別的。」「別的有甚么呀？」羅瑞卿不理解別的究竟指甚么，反問了一句。「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周總理和鄧小平回答了他。「關係不好！關係不好！」羅瑞卿淒然地重復著這句話。³⁰看守羅的警衛是從北京帶來的 8341 部隊擔任。上海會議期間，沒有讓羅參加會議，只是背靠背地揭發批判。會議 15 日結束。羅瑞卿不服，他給周恩來打電話，要求見毛主席，見林彪，當面說清楚，周恩來不讓見。

31

會議沒有簡報，又是小組會，互相不通氣。邱會作在西北組。西北組組長劉瀾濤發言說，羅瑞卿「搶班」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是搶葉帥軍事訓練的成果，搞大比武，這實際是撈政治資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賀龍在會上是最積極的，見人就罵「長子」。他說：「他媽的，長子是婊子養的。他用公安部的辦法，在黨內、軍內干私貨，真卑鄙！」葉劍英大聲說：「搬掉兇神，解放元帥！」還說：「你們受壓當然不好受，但你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你們還是要客氣一點，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們就不客氣了。他跟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里的！」³²

²⁹石念堂回憶，孫煥英整理：〈秘密押解羅瑞卿總長追記〉，《軍事史林》2004 年，第 11 期。

³⁰陳虹：〈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炎黃春秋》，2005 年，第 10 期。

³¹同上。

³²《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395 頁。

上海會議一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由楊成武任代總長。葉劍英也升為軍委副主席，不久以后又兼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工作。羅下臺，葉劍英地位上升。

1966年3月4日，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批判羅瑞卿會議，軍隊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領導等前后共95人出席了會議。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主持，鄧小平在開幕時露面后即赴三線考查，會議實際主持者則是葉劍英。羅點點在她的書中寫到3月4日午羅瑞卿進入會場的情景：「數月不見的與會者，原來都是爸爸最親密的同志，現在都變成了路人或仇敵，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一幅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發羅瑞卿反黨、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同羅瑞卿劃清界限。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是懷著敵對的眼光看著羅瑞卿。」³³會議開了35天。與會者都踴躍發言。除事假病假外，共有86篇發言稿，其中有單獨發言的，有聯合發言的。

在京西賓館的批羅會議上，彭真試圖遏制會上的過激情緒。說：「現在憤慨的人，將來冷靜下來后會后悔的。」4月24日，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四人聯名向毛寫信，揭露彭真在批羅會議上的「惡劣表現」。³⁴6月27日，劉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介紹文化革命時說：「在這次會議作出決議的過程中，發現了彭真的問題，彭代表中央參加處理羅瑞卿問題，但彭真在作結論時，在關鍵問題上，包庇了羅瑞卿，這暴露了彭真、羅瑞卿之間的不正常的關係。」³⁵

據邱會作回憶，京西賓館的批羅會議上沖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向主席匯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蕭華的揭發和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葉劍英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發言，都是份量很重的。蕭華本來是和羅走得很近的人，為甚么這麼賣力氣揭發？對這個問題，邱會作和葉劍英有一段對話：

³³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第212頁。

³⁴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38頁。

³⁵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昨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6月27日下午，人大會堂安徽廳，鄧小平主持。

1966年1月底，葉劍英副主席叫我去談話。……葉帥問我：「在上海會議期間，你同別人談到蕭華有甚么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只是在陶鑄同志那里聽到過蕭華不宜掛帥（任軍委秘書長）的話，我也插不上嘴。」……我問「葉帥，是怎麼回事呀？」他回答說：「有些要緊的事。」他說：「沒有掛上帥的人（指蕭華沒有當上軍委秘書長）恐怕心里總會在想甚麼吧？」我回答說：「可能總想找張路條（指整別人表現自己）回來吧。」葉帥帶著驚奇的口氣反問：「路條？」我說：「嗯，到別人門下去了的人（指蕭華和羅瑞卿搞在一起了）現在要回來，不拿路條表現一下自己就不好進門。」我這樣回答。此時，葉帥面帶笑容說：「真高見！你的話我懂了。」³⁶

從這段對話可以得知，為甚么在政治運動中，一個人挨整時，給他致命一擊的常常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謂「路條」，就是出賣朋友換取毛的信任，即「投名狀」。

梁必業，中將，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是羅瑞卿小圈子的重要人物。梁必業揭發說：1962年羅同他談得最多的是林彪的病情。首先是關心的口吻，后來就談后事了。羅說：林總的身體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規律，無法抗拒。我們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梁必業還說：從1964年開始，羅瑞卿方針是：「冷林，熱賀」（對林彪冷，對賀龍熱）四個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擴大林彪的病情，宣揚胡子（指賀龍）的親政，要使大家相信，林彪只是熬時間。梁還說：羅再三強調，突出政治是突出個人的作用，沒有自己的人哪還有政治？在各總部、各大軍區、各兵種都要搞兩套人馬（即擁林和擁賀的兩種人）。只有這樣才能平衡。羅再三交代，對同我們合作的人要特別關心，現在有很大的作用，將來有更大的作用。³⁷主持批羅議的葉劍英把大會揭發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業揭發的記錄稿交給羅看了，羅通宵未眠，坐臥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殺了。他自殺前在梁必

³⁶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396頁。

³⁷ 《邱會作回憶錄》，上冊，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00頁。

業的發言記錄稿上寫了兩句話：「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集團」³⁸。在整羅瑞卿的時候，被指摘跟著羅跑、被視為羅的「心腹」人用書面材料揭發了羅在他們「小圈子」里的言行。

1966年3月18日早飯後，有人打電話來通知羅，會不開了。對於這個會，羅怕開，又更怕不開。開會，是大家批他一個人；不開會，就意味著會議的主持者們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計劃，意味著對他的批判又要升級。他在絕望中跳樓自殺（未死，腿受傷）。自殺前留給妻子郝治平的遺書是：

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

永別了，要叫孩子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我們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們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³⁹

在京西賓館，羅瑞卿自殺並沒有停止對他的批判，而是參加批判會的人更多了。羅在醫院里，揭發批判是背靠背的。

當時中央在杭州開政治局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也是杭州會議的一個內容。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杭州政治局會議上，毛問：「為甚么跳樓？」然後說：「真沒出息！」劉少奇說：「羅長子盛氣凌人，鋒芒畢露，他對老帥都打擊。自己不認真檢討，過不了關就自殺，沒出息。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他是堅決向黨對抗。」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詩興大發，吟誦了「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的詞句。

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央工作小組在1966年4月30日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列出了羅瑞卿的幾個錯誤是：（1）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例如，羅反對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難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難道還有次活嗎？」；（2）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澤東軍事路線，擅自決

³⁸同上，第407頁。

³⁹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第214頁。

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3) 目無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4) 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5) 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6〕268號文件轉發了這個報告。

這幾條當然是桌面上的，真正的問題應當是本書上面介紹的情況，即羅瑞卿與賀龍走得太近，而賀龍又與劉少奇、鄧小平關係較近。要整劉少奇，就不讓軍隊掌握在賀龍、羅瑞卿手里。毛利用早已存在的將帥矛盾，拋出羅瑞卿，牢牢地控制了軍隊。

二、陸定一倒臺

陸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長。他倒臺的爆發點是一個非政治事件。這就是他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簡稱嚴慰冰事件。

1966年5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主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坐在主席臺上。毛澤東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開會之前，每個人的桌子上放著一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手書。上面寫著：

我證明：(1) 我和葉群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2) 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3) 老虎、豆豆是我和葉群的親生子女；(4) 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都是造謠。

林彪 1966年5月14日。⁴⁰

聶榮臻元帥拿著林彪手書，生氣地對主席臺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很快文件被收回了。

堂堂國防部長林彪元帥，為甚么要寫這個東西？他是針對陸定一的老婆嚴慰冰的。大約從1960年起，到1966年1月，在五年多時間里，嚴慰冰寫了幾十封匿名信。其中有一封信是一首打油詩，是1966

⁴⁰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北京，第501頁。

年 1 月 26 日發出，寄給當時的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曹荻秋，讓他轉給林彪。信中寫到：「摟了一個騷婆子，生了兩個兔崽子。封官進爵升三級，終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雙眉倒，六神無主亂當朝。七竅生煙抽鴉片，拔（八）光了頭上毛。機關算盡九頭鳥，十殿閻王把帖招。」明顯是罵林彪的。這幾十封匿名信 90% 是寫給林彪一家的。林彪一家包括兩個孩子，人到哪里，匿名信就寄到哪里。信的內容主要從挑撥林豆豆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亂編亂罵，說豆豆不是葉群生的，說豆豆長得像劉少奇。林彪秘書張云生看了嚴慰冰信的復印件，信中說葉群「是王實味的情婦」，是「封建貴族加現代特權」。⁴¹嚴慰冰的信給林家造成了影響，豆豆有一段時間不相信葉群是她母親，多次吵鬧。葉群到處找人證明她的清白，當年的馬伕、警衛員都找了，鬧得林家不安寧。中共中央重視此案，公安部組織力量偵破，還指定駐京單位的黨委書記親自掛帥破案，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都親自指導過破案。

1966 年 2 月初，彭真約陸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上午 10 時左右，陸到了彭家里。彭把公安部轉來的一疊材料交給陸定一，就是嚴慰冰的匿名信。彭真說：「林彪是黨的副主席，寫他的匿名信，這個問題就被認為是政治問題。許多信署名王光 X，發信的地址是用王光美母親辦的托兒所地址，自然是被看作是挑撥中央常委之間的關係。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寫的，等于公開的傳單。陸對彭說，自己不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⁴²1966 年 4 月 28 日嚴慰冰被捕。

嚴慰冰為甚么寫匿名信？《陸定一傳》說，在延安整風時，嚴慰冰得知葉群有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的問題，向所在單位作了反映。葉群和林彪結婚后很霸道，嚴看不慣。直接的原因是葉群歧視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兒林曉琳，嚴對此很憤慨。陸定一對他的傳記作者說，「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⁴³

在審查嚴慰冰期間，周恩來對陸定一說，你最好到外地去，時間越長越好。3 月 6 日，陸定一離開北京到南方。5 月 6 日，陸定一

⁴¹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 年，第 47 頁。

⁴²陳清泉、宋廣涇：《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年北京，第 485-486 頁。

⁴³同上，第 488 頁。

接到汪東興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讓他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8日，陸定一從合肥乘汪東興派來的飛機回到北京。⁴⁴

在批判陸定一的會上，陸定一作了一個檢查，他說：「我同嚴慰冰生活二十五年，她寫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同志們說我知道，是有道理的。二十五年，還會不知道？這對於我，是有口難辯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確實不知道她寫匿名信。在莊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不能說假話。現在嚴慰冰在公安部，請審問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寫匿名信，請把我當成反革命的主謀犯和同謀犯，加重對我的刑罰。」林彪聽后連聲說：「天天在想變天，天天在想變天。」他質問陸定一：「跟你老婆勾結在一起，用寫匿名信的辦法，長期誣陷葉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麼？請講清楚！」陸定一答道：「嚴慰冰寫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沒跟我商量過，也沒給我看過。我本人也沒發現過。」林彪：「你老婆的事，你會不知道？」陸定一：「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林彪：「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⁴⁵林彪質問陸定一：「你為甚么害我？我這個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甚么干這樣的壞事？用意何在？」陸定一說我確實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說了臟話：「你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嗎？」批判成了鬧劇。⁴⁶

周恩來在會上對陸定一不僅批評、痛罵，還把茶缸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了。⁴⁷楊成武走到陸定一跟前，把拳頭伸到陸定一的眼下晃了晃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⁴⁸

會后，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會議的資格。鄧小平讓李富春和李雪峰跟陸定一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李富春只說了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一同志出席這個會議。」陸定一大聲說：「雪峰同志，我是搞共產主義的，我希望

⁴⁴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北京，第491-495頁。

⁴⁵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9頁，王力回憶錄中明確否定了這一說法。

⁴⁶《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⁴⁷《邱會作回憶錄》，第438-439頁。

⁴⁸同上，第440頁。

能看到共產主義！」⁴⁹

說陸定一倒臺是受老婆的牽連，那就過於簡單了。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陸定一直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在組織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中、在胡風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思想批判運動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但自 1960 年代初以後，毛澤東對他就不滿意了。1993 年 12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的〈文藝情況匯報〉上批示、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對思想界、文藝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那個紀要中說，文藝界建國以來，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些都是陸定一領導的部門。教育界也是中宣部管轄的，毛澤東對教育界也不滿意。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北京採取對抗態度。在這個問題上，陸定一和彭真是一致的。這使得毛澤東對陸定一和中宣部很不滿。

1966 年 3 月 17 日至 20 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話中指出，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毛澤東警告：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⁵⁰1966 年 3 月 28 日至 3 月 30 日，毛澤東同康生談了兩次話中明確批評了中宣部，毛澤東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周恩來在 5 月 21 日批判陸定一的發言中說：「陸定一是從夫妻老婆店發現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個時期他們出來反對林彪同志，因為林彪同志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得力。」「陸的老婆從 1959 年罷彭德懷的官以後，一直到現在寫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個規律，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寫信也最多的，用公開明信片寫是發宣言式的。」⁵¹周恩來把嚴慰冰事件和陸定一聯系

⁴⁹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等編《回首「文革」》第 599 頁。

⁵⁰鄧子恢主持的農村工作部因支持包產到戶，被毛澤東下令撤銷。

⁵¹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



彭真



陸定一



羅瑞卿



楊尚昆

在一起了，和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聯系在一起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為了從政治上徹底打倒一個人，還得從根本問題上把這個人釘死。如：是不是當了叛徒，是不是階級異己分子。陸定一出身于無錫一個殷實官僚家庭，南洋大學畢業，1925學生時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從陝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2千多元遺產，將1千元作為黨費交給中共駐南京辦事處為辦事經費，1千元給為革命犧牲了的前妻親屬用于尋找失散的女兒費用，剩餘幾百元錢，留為治病開支。共產黨員不能繼承剝削家庭的遺產，陸定一繼承了。因此，被認定為階級異己分子而受到嚴厲處置。

陸定一始則被軟禁，戴高帽、掛黑牌、受批斗；，繼而被隔離審，遭刑訊逼供，嚴刑拷打：「審訊人員一擁而上，緊手銬的緊手拷，揪耳朵的揪耳朵，陸常被搞得不斷失聲慘叫，聞者心寒」，「每次審訊都把陸搞得臉腫、耳腫、手腫和流血」，由于銬得過緊，「致使手銬扣進肉內，造成手腕潰爛化膿」。⁵²陸定一于1968年4月未經審判被投入秦城監獄。在獄中，因寫申訴，惹惱專案組，「被第二次帶上手銬，連吃飯、睡覺、大小便都不給松銬，只有在半個月一次的洗澡時才被摘下來，半小時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帶上。鐵銬套在手腕上，皮膚被磨破，露出鮮紅的肉，鉗心一樣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銬里，連衣袖也磨破，殷紅的血水滲在袖上。」⁵³陸定一既被徹底妖魔化了，這個妖魔已經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揉擰，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當年盛行一時的「宜將剩勇追窮寇」，「痛打落水狗」的口號，這使迫害者義正詞嚴，斗志昂揚。

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為罪名開除了陸定一黨籍。此時林彪、陳伯達早已倒臺，文革已是強弩之末。在許多老干部獲得了解放的時候，中央反而對陸定一做出這樣嚴厲的處置，真是發人深思。

〈陸定一冤案十三年紀實〉一文提到「中央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對陸案做過三次指示，一次是1966年7月：「陸定一在蘇聯，據說蘇

⁵²韓宗平：〈陸定一冤案十三年紀實〉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

⁵³陳清泉《在中央高層五十年——陸定一傳奇人生》第291頁。

修給他 1 萬盧布。將來，可能搞他個里通外國。」一次是 1976 年 2 月：陸定一「要答辯，你們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獄，現在暫不理。」最后一次是 1978 年 10 月 18 日：「陸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來。說不給他結論不出來，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國了。」⁵⁴按照文革后的政治規則，這位被隱其名的「中央有影響的人物」，一定是受到尊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抓捕「四人幫」兩年以後，1978 年 12 月 2 日，陸定一獲得自由。他失去了 13 年的自由。

三、「剝筍政策」的勝利

林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的講話中為「彭陸羅楊」定了性。5 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彭陸羅楊」說成是「四大家族」。這是借用對國民黨高層的「蔣宋孔陳」的說法，在共產黨的詞典里「四大家族」是罪惡的代名詞。周恩來在 5 月 21 日講話中說：「『四大家族』已經奪了我們許多陣地」，「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占領的陣地，是剝筍政策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應該慶賀。」「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一個一個被奪走了，現在一個一個地奪回來。」陳伯達在 5 月 24 日講話中：「『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反對『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偉大的決策。」

周恩來這次講話中提到「剝筍政策」。他對此有一個解釋：「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後可採取剝筍的政策。」「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黃張周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對他們都是採取剝筍政策，使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林彪插話：不是他們剝掉我們，就是我們剝掉他們，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應貫徹到社會主義革命整個歷史時期。）「剝筍政策」是毛澤東在杭州會議期間說的。他把打倒彭真、羅瑞卿比做剝筍。一只筍，有點爛了，把

⁵⁴韓宗平：〈陸定一冤案十三年紀實〉載《炎黃春秋》2006 年，第 8 期。

外面幾片剝掉，還可以吃。劉少奇說：「剝筍政策十大革命時期鮑羅庭提出的，搞國民黨右派要一層層剝掉，剩下一個筍心。你不剝他，他就剝你。把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剝掉，這是一個好辦法。剝不掉，他就要上臺推翻我們，改變政策。」⁵⁵

1966年5月23日，中共政治局全票通過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正式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的全部職務。接著，中共中央又於5月24日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把他們打成了「反黨集團」。這一通知地方發到縣團級。

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審查組，下設四個組審查彭羅陸楊。

明末清初有一首流傳很廣的《剃頭歌》：聞道頭需剃，如今盡剃頭。有頭皆要剃，不剃不成頭。頭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彭、羅、陸、楊「剃」了不少人的頭，現在他們被別人「剃了頭」。在1965年底給彭陸羅楊「剃頭」的人，以後都被「剃了頭」。挨整中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仿《剃頭歌》作《整人歌》：聞道人須整，如今盡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整人，是極權制度的特征，也是維持極權制度的手段。

打倒彭陸羅楊，與其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之一，不如說這是毛澤東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準備。搞掉了這四個人，他感到在北京安全了一些。毛澤東1965年10月離開了北京，一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回到北京。其間，連十分重要的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也不參加。文革研究者米鶴都認為，這是毛為自己的安全考慮。這個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彭陸羅楊打倒后，毛還是不放心。在改組北京市委的時候，向北京增派了兵力擔任衛戍任務，林彪5.18講話談政變時說，毛主席調兵遣將，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部署。毛還授意周恩來成立了「首都工作組」，以保證首都安全。

彭、羅、陸、楊已經被擺在階級鬥爭的砧板上。群眾專政的鐵拳

⁵⁵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6月27日下午，人大會堂安徽廳。鄧小平主持。

不斷地向他們猛擊。

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一夜之間，多位副部長以上的領導人被抓走了。其中有彭真、劉仁、萬里、夏衍、田漢等。這些被抓走的人去向不明。這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行為，組織者事先打聽清楚了被抓者的住地、路線，準備了車輛，據說他們通訊聯絡工具是高級干部的保密紅色電話機。他們都穿著軍大衣。後來才知道抓人的是四個藝術院校團體的紅衛兵，帶頭的是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⁵⁶她帶領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于臺基廠7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他們強行沖進了大門，把彭真從被窩里綁架走，然後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里。周恩來得知是葉向真抓走了彭真，就找到葉向真要人。葉向真就和周恩來談判。周恩來承諾：「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群眾大會。」周還同葉向真商定，把葉的「游斗彭真」的計劃改為「斗爭彭、羅、陸、楊的大會」，周恩來還對葉向真說：「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嗎？開會時我保證把四個人人都送過來。」葉向真相信周恩來不會欺騙她，把彭真等交給了周。⁵⁷12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毛澤東主義公社等四個組織的代表時說：「我們完全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首先鼓勵你們。」「你們的行動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僅五分鐘就解決問題了，干得漂亮！你們把警備衛戍司令部都給瞞過了。你們的行動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沒有缺點，你們如何配合中央，請大家考慮。」葉向真開了文革期間隨意綁架人的先河，開創了群眾亂揪領導干部的先例。清華大學「捉鬼隊」1月6日「智擒王光美」就是

⁵⁶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秘書的證言》，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4年，第49-50頁。

⁵⁷葉向真：〈我和父親的「文革」歲月〉，載《家國光影——開國元帥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周海濱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0年1月24日，周恩來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周恩來說：「1966年底他們搞突然襲擊，將彭、羅、陸、楊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漢、楊瀚笙，還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後讓他們游街，我們打電話問戚本禹是誰搶走的。他說『可能是葉向真，我打聽打聽』不到五分鐘，他說是葉向真，後來把葉向真叫來。她說是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樂團這些單位搞的，關在和平里中央樂團意見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這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動，這樣做超過了武斗，變成了綁架。後來，很多地方也跟著搞起來了。」《王大賓回憶錄》第100頁也介紹了這一情況。

受了葉向真這次行動的啟發。

周恩來讓軍隊把彭真要了回來，關押在五棵松的衛戍區的一個師部，什麼時候批斗，什麼時候提走。周恩來沒有食言，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多家群眾組織聯合起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會。會上巨幅橫標寫著：「誓死保衛毛主席，斗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參加批判會的有36,000多人。會上唱語錄歌，還唱《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他拼！》的新歌。那次大會斗爭了很多人，除彭、陸、羅、楊意外，還有一大批領導幹部陪斗。被批斗的人被反扭著雙臂，彎腰90度，呈「噴氣式」，頭髮被人揪著，隨時將頭提起按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時摔斷了腿，是用籬筐抬去的。

這次批判彭、陸、羅、楊的大會在全國起了示范作用。文革期間，特別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領導幹部就失去了安全感，今天主持會議，明天就可能被揪斗。有些老干部不明不白被抓走。他們和他們家屬整天處於恐怖之中。

毛知道幹部被批斗的情況。1967年秋，毛澤東在鄭州接見河南省領導，他和紀登奎有一段談話。毛問：「聽說你坐了100多次飛機？」紀登奎說：「這對我大有好處。」毛澤東還問，「坐飛機」是個甚麼樣子？紀登奎站起來比劃、做示范，毛澤東也跟著學「坐飛機」的樣子，彎腰，手向後舉，還問「是這樣嗎？」毛澤東問紀登奎，「坐飛機」甚麼感覺？紀登奎說，「啊呀，腰酸的很，感覺就和割麥子差不多。」

58

⁵⁸紀坡民：〈紀登奎是怎樣成為「支持造反組織的領導幹部」的〉。

第四章

「五月會議」：文革正式發動



毛澤東發動文革，害怕發生宮廷政變，要除掉一批他不信任的人，其中包括賀龍。



1966年，年屆80高齡的朱德，毛也起疑心，發動多人圍攻他。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不同意毛澤東的作為，趕到絕望，懸樑自盡。



《三家村》作者鄧拓，被污叛徒，服毒自殺，遺書還寫上「毛主席萬歲！」

1966年5月發生的事件很多：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文化革命綱領性文件「5·16通知」通過；毛澤東發表了「五七指示」，描繪了他心中烏托邦；北大最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第一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改組北京市委。

這段時間報刊的輿論越來越猛烈，社會上硝煙四起。

這裡說的五月會議是指1966年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外，還有有關部門負責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成員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共76人。¹這麼重要的會議毛讓他不信任的人劉少奇主持，自己不參加。會議主要議程有兩項：一是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5月24日，會議決定對彭、羅、陸、楊所謂「陰謀反黨集團」問題進行專案審查；二是通過中共中央的〈通知〉（即「5·16通知」），揭批彭、羅、陸、楊的情況在第三章已作介紹。這裡只介紹會議其他方面的情況。

這是毛澤東在千里之外卻控制自如、全面貫徹自己意圖的一次會議；這是由劉少奇主持的、自己挖自己的牆角、甚至是為自己挖掘墳墓的會議；²

這是劉少奇主持下揭發批判和他意見一致的彭、陸、羅、楊的會議；這是通過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5·16通知」的會議，這個文件的通過標志著文化革命的正式發動；

這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

這次會議開了23天，時而大會，時而小會，時而看文件，時而討論。會議大體進程是：

會議前四天，康生、張春橋、蕭華介紹情況：康生傳達毛澤東自1962年以來有關批判彭真、陸定一等人的講話或者批示；介紹了會議將要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後來稱之為「5·16通知」）的起草經過，特別強調毛澤東修改了七遍，並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澤東親

¹ 很多著作都說江青參加了五月會議，據閻長貴多方核實，江青當時在上海，7月20日才回北京。

² 戚本禹對余汝信說，這次會議，名義上是劉少奇主持，實際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來，周比劉更能領會毛的意圖

自加的。張春橋介紹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后文藝戰線「兩條路線斗爭」的情況等。蕭華介紹羅瑞卿問題和批羅會議情況。在張春橋講話之后陳伯達作了系統揭發批判彭真的發言。會議頭四天的情況介紹為整個會議定了調子，為不在現場的毛澤東意圖的貫徹打下了基礎。整個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輪流主持。

在五月會議上，又一次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在他身后，如果有人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³周恩來說：「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直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后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學毛著，做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系起來。」⁴周恩來把忠于毛澤東當做保持「晚節」。陳伯達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從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份來看，確實是這樣的。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恩、列經過的要多，列寧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主席有五十年的經驗。」⁵說毛澤東超過馬克思，林彪在5月18日的講話中講過，陳伯達只是重復。

一、全體一致通過「5·16」通知

5月16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因為是這一天通過的，所以叫「5·16通知」。這個「通知」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意思。據「通知」起草的參與者王力回憶，1966年3月，康生和趙毅敏到杭州向毛匯報有關國際共運的問題，魏文伯參加，江青在座。毛大發脾氣，推翻了

³ 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⁴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

⁵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4日。

中央決定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意見，大罵「二月提綱」，罵彭真，罵北京市委，罵吳晗，罵中宣部，罵他們整左派的材料。康生回來以後，由鄧小平主持會議傳達毛的意見。會議決定向全黨發通知，撤銷「二月提綱」，讓王力起草通知。王力只起草了一句話：以前中央某日發的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予以撤銷。毛得知後說，這個不行，沒有說實質性問題，要再起草個文件。起草小組是4月16日成立的，成員是江青定的，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陳亞丁、關鋒、戚本禹、穆欣。名義上是由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由於陳伯達、康生在杭州開會，起草小組實際由江青主持，張春橋是秘書長。地點在錦江飯店後面那個樓。⁶4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了很多批判「二月提綱」的話，王任重作了記錄。用王任重的記錄整理出來的就是「5·16」通知的基礎。⁷起草小組的主要任務，是對毛對文件草稿每增改一次，就議一次，有甚么意見，給毛回話。在這個基礎上每天都改，改的稿子每天都由上海送到杭州讓毛再改，毛不僅是修改，還增加了大段大段的話。毛改後再交給起草小組進行文字處理。杭州會開了幾天，稿子就修改了幾次。後來發表「5·16通知」，毛親筆加的內容用黑體字標了出來，沒有用黑體字的地方，也是按毛的意思寫的。⁸五月會議上討論「5·16通知」時，陳伯達、康生堅持一個字也不能改。

「5·16通知」全文不到5千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二月提綱」，說「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文件指出「二月提綱」十個錯誤，並對這些錯誤一一分析批判，在批判中闡述毛的觀點。文件說，「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

⁶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14頁。

⁷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等編《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第595頁。程曉農：《曾撥打最後口述會議》，東方出版社，北京，2010年，第286-287頁，兩本書都有同樣的記載。

⁸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13-214頁。

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文件在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指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鈎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甚么平等嗎？」「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甚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甚么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文件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這個文件說：「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這個文件最後說：「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份注意這一點。」

幾個月以後，大家都知道「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在5月16日通過這個「通知」時，劉少奇知道是指他嗎？閻長貴說，當時康生、張春橋都不知道，以為是指彭真。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劉

少奇是應該知道的。但這個針對他的文件卻在他的主持下一致通過了。毛澤東雖然遠在千里之外，卻對會議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不僅是因為多年的個人崇拜造就了他的絕對權威，而且是全黨早就接受了他這樣的思想。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概念已經融化的血液中，成了人們行動的指南。

「5·16通知」有一個附件，就是《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據說這個附件是康生搞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很少提及。不過，如果站在客觀立場，去掉其中強烈的政治色彩，還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

戚本禹目擊「5·16通知」舉手通過的情況。先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請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表決，沒有反對意見。其后，劉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員說，你們也表表態，這樣，列席者也紛紛舉手，算是出席、列席會議的人都一致通過，但后者應不計入票數。⁹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致通過了「5·16通知」，使它具有合法性，成了當時全黨對文化大革命的共識。5月19日，「5·16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7號）發到縣團級，以后逐步擴大傳達範圍，成為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一年以后的1967年5月16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5月17日的會議上，劉少奇說：過去填表時一直填富農成份，后來到花明樓看了，應該是地主。周恩來說：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影響，對階級鬥爭認識不夠，對北京的問題沒有察覺。鄧小平作了檢查，說書記處這麼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林彪沒有檢查，但說他的家庭是地主，沒有看得那麼清楚。這麼多高級領導人都講自己的出身，難怪三個月后「血統論」橫行。

二、防政變殃及賀龍

5月18日，林彪發表講話¹⁰，從批評彭、羅、陸、楊開始，大講

⁹ 余汝信：《與戚本禹面對面》。

¹⁰ 戚本禹對余汝信說，林彪「5·18談話」，是周恩來要他講的，林彪說：「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講」，指的就是周。余汝信：《與戚本禹面對面》。

政變。他為甚么要講這樣的話？因為毛多次講要防止在我國發生反革命政變。¹¹

毛擔心政變是從蘇聯那里來的。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發生了「不流血政變」，把赫魯曉夫趕下了臺，毛澤東對中國是否會發生這類事情，保持高度的警惕。毛的衛士陳長江說：「有一次我們很緊張，毛主席無論如何睡不著覺，走到門口問我：『你們哨兵帶槍沒有？有壞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訴主席：『不僅帶了手槍，沖鋒槍和機關槍，子彈也帶很多。我們幾十個人能對付一、二百人。』主席點頭滿意。」¹²1965年底和1966年3、4月間，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幾位領導人：如果北京發生政變，你怎麼辦？蕭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后，主席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¹³

1964年紀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時候，周恩來率團赴莫斯科。11月7日晚間，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賀龍同蘇聯元帥崔可夫等軍界領導人談話時，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當場頂了回去并向周恩來報告，周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質問。勃列日涅夫以馬林諾夫斯基「酒后失言」作掩飾。周恩來立即指出，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¹⁴周恩來提出正式抗議。周這樣做，有出于維護中共和國家尊嚴的考慮，同時也給毛澤東吃一顆定心丸。周非常清楚，擔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黨內分歧日益加深的情況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蘇共搞掉赫魯曉夫靠軍方支持。所以毛澤東特別警惕北京發生軍事政變。極權政治是陰謀政治，最高領導人最警惕高層的陰謀活動。而在極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要推翻最高領導人，宮廷政變是最常用

¹¹ 《王力反思錄》（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3頁。

¹² 轉引自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83頁。

¹³ 王年一：〈漫談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版。

¹⁴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第46頁。

的方式。馬林諾夫斯基為甚么對賀龍談政變呢？作為軍事家的毛知道，如果中國發生政變的話，賀龍是最重要的力量，最有搞政變的可能。對毛澤東來說，馬林諾夫斯基一語點破了，這就決定了賀龍必死的命運。

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來說，賀龍是有大功的。1927年大革命以後，當時不是共產黨員的賀龍，把自己帶出來的一支軍隊交給了共產黨，並擔任總指揮參加了南昌起義。從此共產黨有了自己獨立領導的軍隊。南昌起義失敗以後，賀龍回家鄉白手起家搞起了紅二軍，和任弼時一起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由此逐步形成了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二方面軍。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賀龍對毛澤東不是很順從的。1950年代，他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後來中央撤銷西南軍區，把賀龍調到北京管體育。賀龍不滿意，說：「為甚么要撤銷大軍區啊？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怕我們造反！」他還說這是「杯酒釋兵權」。¹⁵賀龍主持的國家體委有一個國防體育俱樂部，該俱樂部被認為是「一支反革命地下軍，一旦時機成熟，即成為反革命政變的急先鋒」。¹⁶

中共軍隊中有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三大山頭。通過多次黨內的路線鬥爭，各個山頭都有削弱，但賀龍為首的紅二方面軍這個山頭還比較完整，賀龍有兵權，他還愛交朋友，經常和軍方的人走動，被懷疑為「拉山頭」。在極權政治的和平時期，軍事首腦私下活動最容易被懷疑。羅瑞卿靠近賀龍，既增加了他自己的政治風險，也增加了賀龍的政治風險。

1966年8月25日，總參外事局有人貼大字報反對楊成武，賀龍的老部下王尚榮、雷英夫在大字報上簽了名，賀龍辦公室的幾名工作人員也參加了。楊成武當時是林彪、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當時懷疑是賀龍背後搞的，是想奪總參的權。聯繫到賀龍和羅瑞卿的關係，毛澤東委托林彪在一次軍委常委會上打了招呼。打招呼會只有賀龍沒有

¹⁵ 《打到三反分子賀龍》（第一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整理，紅代會國家體委運動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翻印，第2-3頁。

¹⁶ 1967年底，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給康生的報告，《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第91頁。

參加。這個會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林彪開場白說：「主席交代我和總理分別召開兩個小會，把賀龍同志的問題通通氣。總理那邊會已開過了，向主席匯報說效果很好。我按主席交代向大家說點賀龍的歷史和現實的情況。」林彪先說了賀在湘鄂根據地肅反的錯誤，又說文化革命開始以後賀龍的動態。一是有些不安和異常；二是到他那里去的人很頻繁，是個「政治俱樂部」；三是他隨身帶槍，警衛人員揭發他帶著槍去見主席。林彪傳達完後因身體不適就退席了，葉劍英組織繼續開會。軍委常委們對賀龍進行了批評和批判。陳毅、聶榮臻的發言非常尖銳。平日很少說話的劉伯承也作了批判發言。結束時，葉劍英交代會議內容絕對不許外傳。會後，還擴大了一些兵種正職首長秘密到葉劍英家看過揭發賀龍歷史上通敵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¹⁷

李作鵬、邱會作的回憶錄都記錄了葉帥同他們打招呼的情況。邱會作回憶說：「大概在1966年秋天，在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車到京西賓館後，由蕭華、楊成武帶隊換乘兩輛大轎車到葉帥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上車後還拉上窗簾。蕭、楊在車上說，臨走前總理特別打電話交代，到葉帥家看材料重點是看通敵問題。……」「到了葉帥的會客室，葉帥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來看一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會議室桌子上放了十幾份材料，都是賀龍部下說的一些事。其中有總理提供的一封信，是賀寫給國民政府里任職的舊交的。周恩來說要注意賀龍投敵問題，就是指這封信。¹⁸李作鵬回憶錄說的時間、地點、事件和人物和邱會作的回憶基本一樣。葉帥對大家說，這次看賀龍的材料是

¹⁷ 程光：《心靈的對話》（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70-71頁；《邱會作回憶錄》第524頁說：林彪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談賀龍問題是1966年9月6日，地點是在人大會堂四川廳，蕭華辦公室主任鄭漢濤等作了記錄。《邱會作回憶錄》第884頁也提到1966年9月初林彪這次講話，但沒有具體內容。可能是程光在編書時找到了林彪講話，補充了進去。

¹⁸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第884-885頁，《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新出版社，第566頁。

根據毛主席「在小範圍打招呼」的指示而進行的。¹⁹

與此同時，葉劍英還向各大軍區領導人打招呼。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回憶，1966年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元帥和當時的總政主任蕭華找蘭州的冼恒漢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齊到北京西山葉的住處，向他們打招呼說，賀龍是大土匪，是大軍閥，國民黨層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壞等等，叫他回去以後向張達志傳達，叫王恩茂、左齊向郭鵬傳達，要他們搞好思想轉彎。²⁰

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正在北京，蕭華通知他參加一個會議。黃不想去，說北京的事跟他沒有太大的關係。蕭華說，會議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蕭華帶他到西山，會議由葉劍英主持，講打倒賀龍的事。劉伯承元帥作了長篇發言，說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講了幾個小時。黃永勝還說，彭德懷項目組、賀龍項目組，都由周恩來總負責。²¹

據邱會作回憶，1966年12月，中央文革提供材料說，夏天毛主席不在北京時，劉少奇、王光美與賀龍有來往，有活動。中央文革還拿出了那封從原國民黨一個要員那里搞到的賀龍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向蔣介石寫的「乞降信」，還翻出了夏曦和賀龍在根據地謀殺段德昌等紅軍將領的事。²²

這裡說的原國民黨要員應當是李仲公，文革前他是國務院參事、民革中央常委。

李仲公的後人介紹，1968年春，周恩來收到了李仲公給他的一個材料，另附信一封，信中說：「久未謁見，時在念中。茲有一事，我手中有賀龍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幫助向蔣投誠的兩封親筆信，是這個大叛徒叛黨的鐵證。如由信內送上。慮交不到落入別人之手。擬請于萬機之時召見片時，當面奉呈，并補陳有關情況，親聆教導。特此函達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禮！1968

¹⁹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新出版社，第568頁-569頁。

²⁰ 冼恒漢自述：《風雨八十載》，電子版。

²¹ 黃正著：《軍人永勝》，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66頁。

²² 程光：《心靈的對話》（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71頁，邱會作說的時間不對，應是1968年春天以後的事。

年3月29日。」

一封信是1929年5月16日寫的，其有「近閱報章，始知馮逆²³叛狀益彰，全國聲討，弟亦為黨員一分子能不憤慨？甚愿率所部萬余健兒就近直搗逆巢，滅此朝食，以報黨國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為荷，余不一一，諸希亮察，如能幫忙，即請設法示覆，以便正式派人晉京面候教益矣。」1929年5月26日信中有「前言皆系至誠，務求敬代陳主席，請求一切為盼。」²⁴李仲公當時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黨部）書記長，人們認為他是蔣介石的「親信」。賀龍希望李仲公將信轉給「主席」（蔣介石）。李仲公沒有轉。

李仲公向周恩來交出賀龍的「乞降信」是1968年3月29日，有文字為證，不會錯的。葉劍英向軍頭們就賀龍問題打招呼，邱會作和李作鵬回憶都是1966年秋，也不會錯。這裡有一個疑問：李仲公是1968年3月29日將「乞降信」送給周恩來的。1966年深秋葉劍英向軍頭們打招呼時，為甚么有這封「乞降信」？這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在李仲公交「乞降信」之前，中央已經知道了，我估計這種可能性不大；第二種可能性是，葉劍英讓軍頭看的材料中沒有這封「乞降信」，而是其他的「敵我性質」材料。這有待檔案公開以後解疑。

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我們至今不知道成鈞、許光達、廖漢生對賀龍有甚么揭發，毛澤東說的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包括賀龍的所謂向蔣介石的「乞降信」？

僅憑這兩封信就斷定賀龍投靠蔣介石是不夠的。賀龍寫這兩封信也可以從積極方面理解：這是在當時嚴酷的鬥爭環境中所採用的一種

²³ 馮逆，指馮玉祥，當時馮反對蔣介石。

²⁴ 李幼華：〈「李仲公誣陷賀龍」事件始末〉，《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斗爭策略。南昌起義失敗以後，向蔣介石顯示一個姿態，以減國民黨的軍事清剿的壓力，謀求革命隊伍發展空間。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參加軍委會議成員時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²⁵有關部門開始調查賀龍等的平反問題。²⁶據稱，李仲公的揭發信在1974年9月23日被鑒定完畢，說是偽造的。為甚么1968年春不作鑒定、而在毛說整錯了賀龍以後才作鑒定？1978年6月，國務院參事室作了一個決定。決定說：「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兩封偽造信陷害賀龍同志的問題，審查小組報經中央批准，認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的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代。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生活費80元，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此時李仲公已92歲，重病在身，家屬沒有把這個決定告訴他就逝世了。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講政變很有特點。他先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失掉一切。」要「念念不忘政權。」然後他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到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篇文章。「從我國歷史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接著他列舉了古、中外大量政變的例子，聽起來感到毛骨悚然。林彪這篇講話，後來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²⁵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14頁。

²⁶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89頁。

在林彪講政變以後的三天，5月21日，周恩來也在會上講政變。他說：「林彪同志講的亞非拉地區61次政變，也可以看出國內因素是主要的。」「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奪取我們的真諦，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搞政變。第三要防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修正主義搞政變基礎是一文一武，掌握筆桿子、槍桿子，兩個都占領了就動手，但最重要的是當權，彭真是大黨閥。」怎樣「三防」呢？周恩來說，一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造反；二是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造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一個一個被奪走了，現在一個一個地奪回來。周還說：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政府也毀掉。

5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到了「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他說：「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也講政變。他說：「今年2、3月初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陰謀策劃政變。陰謀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計劃之一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一個學校派去一個營的軍隊，這個事實是千真萬確的，并在北大、人大看過房子的。……陸平黑幫給他們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長郭影秋完全知道這件事。」²⁷1980年，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時，對這件事情的解釋是：1966年2月，中央軍委為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在北京組建一個團，歸衛戍區建制，負責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就到一些大學找空房子。²⁸如果真是像解釋的這樣，也是合情合理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極權政治下的權力高層歷來如此。

1967年2月，裝甲兵有兩個干部訪問李作鵬時問道：「傳單說許

²⁷ 康生在北師大關於「二月兵變」的講話，1966年7月27日。

²⁸ 錢鋼：〈「二月兵變」真相〉，《解放軍報》，1980年12月7日。

光達是賀龍兵變中的總參謀長是事實吧？」李作鵬回答：「有那么回事，總參謀長是事實。」又問：「二月兵變是怎么回事？」，李答：「去年二月兵變，賀要調一軍（賀的老部下）到北京來，由于中央識破了陰謀，才使兵變未遂。」²⁹「九一三」以後，李作鵬成了林彪集團的骨干，這個「訪問記」成了李作鵬誣陷賀龍的罪證。

1966年5月15日，根據毛澤東關於「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給毛澤東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報告。該報告提出組建一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工作組」。³⁰毛「保衛首都」的指示，實質內容就是防止北京發生政變。首都工作組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即對周恩來負責，周恩來對毛澤東負責。首都工作組處理問題權限和指揮權限，不受原機構或部門的管轄。戚本禹說：「首都工作組是個很神秘的機構，是由葉劍英負責的，它只向總理匯報工作。而無需向任何部，（包括中央文革）通報情況的。所以我們中央文革連陳伯達和江青都沒有人知道它的事。」³¹

據首都工作組成員張民回憶，當時首都工作組擬制了呈報毛澤東的四個文件：

（一）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擴編方案：首都警衛師、北京市公安總隊、第63軍189師、第24軍70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擔負首都警衛任務；

（二）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整方案：（1）首都警衛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一師。（2）北京公安總隊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二師。（3）第70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三師，保留原番號不變。（4）189師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四師，保留番號不變。

（三）中央軍委關於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調整擴編的命令。

（四）關於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動的命令。以上文件打印兩份，一份送周恩來，一份送毛澤東。1966年5月29日，毛澤東批示：「照

²⁹ 錢鋼：〈「二月兵變」真相〉，《解放軍報》，1980年12月7日。

³⁰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1-32頁。

³¹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2015年8月。

辦」³²

這樣，北京衛戍區共有四個師。不就，根據葉劍英指示，天津的196師和宣化的193師，必要時也可以由北京衛戍區調動。十個月以後，從沈陽軍區調38軍進駐京畿，38軍是原四野的頭號主力，是林彪指揮順手的部隊。

在做這幾件事時，周恩來要求首都工作組的工作人員不讓打電話談調部隊的事。所有文件只打印兩份，一份給他，一份由他轉呈毛澤東，而不發給林彪。甚至到茶爐房里開會，把服務員都打發走了。³³

1966年6月1日，上述部隊開始調動。這一天黎明，坦克、汽車的轟鳴聲驚醒了北京西郊酣睡的人們，一隊隊解放軍戰士沿著大路疾進，天亮時，他們已經分別進駐了南苑、長辛店、清河地區。

6月3日，北京衛戍區在京西賓館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楊成武宣讀了中央軍委關於調整擴編北京衛戍區的命令。楊成武說：衛戍區的具體任務按周總理和首都工作組以及葉帥的指示辦。³⁴參加會議的張民回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賀龍元帥，他到的時間比較早，進了禮堂后臺的休息室就一屁股坐在沙發里，表現出一種沉默寡言、憂心忡忡的神態，與以往相比判若兩人，我看他的氣色也不太好，面容憔悴，好像剛剛大病一場的樣子。過去那種愛說愛笑的影子一點也看不見了。」³⁵

對政變時容易受到攻擊的中央廣播電臺、電視臺、國家通訊樞紐等處進行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對機場、水庫、發電廠、監獄等要害地方進行了勘測。位於西單的電報大樓上，用望遠鏡可以看到毛的住處，立刻宣布為軍事禁區。

首都工作組周密地布置了防止政變的工作，毛澤東感到北京安全了，7月18日他回到了北京。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完全控制了局勢，他不允許這樣的超級機構繼續存在下去，1967年2月，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停止辦公，有關工作由總參謀作戰部辦理。此時，組長

³²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74-75頁。

³³ 同上，第80頁。

³⁴ 同上，第74-76頁。

³⁵ 同上，第77頁。

葉劍英成了「二月逆流」的主將。

三、圍攻 80 歲的朱德

五月會議氣氛緊張，人人自危，紛紛發言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紛紛表示對毛效忠，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大家都極力表現自己堅定的立場。彭真和陸定一作了檢查后，除了康生、林彪、陳伯達作了上綱很高的批判以外，賀龍、張鼎臣、楊成武、李先念、陳毅、薄一波、劉少奇、聶榮臻、余秋里等都作了批判發言。李先念說：吳晗的要害是罷官，彭真的要害是政變。³⁶

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還因為他說了一些與當時政治氣氛不一致的話，責令他作檢查。因此，圍斗 80 歲的朱德，成了這次會的一個插曲。³⁷

5 月 23 日，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劉少奇主持。朱德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后，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后，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 20 年代井崗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后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言辭激烈，時間很長。林彪說：「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后，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陳毅質問：「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朱德說：「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陳毅說：「我看你是要黃袍加

³⁶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 年，第 87-88 頁。

³⁷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一文中說：「在討論通過 5?16 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許世友一些人就提出來問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是誰？他們問總理，總理說，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說說的，並沒有所指。他們就又去問劉少奇，劉少奇就說主席說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岡山的時候就反對毛主席。這樣就在那個會上劉少奇他們組織了批斗朱德。」戚的這一說法可供參考。

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贊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薄一波說：「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朱德辯解：「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 80 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周恩來說：「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斗爭，前一半應歸功于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在那里，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后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³⁸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批判朱德的會議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後來形成的「四人幫」，卻是文革中的受難者劉少奇。對朱德批斗最兇的不是康生和後來形成的「四人幫」，而是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甚至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當皇帝」「是定時炸彈」。積極參與批判朱德的中央領導人薄一波、烏蘭夫、張鼎丞等人，後來都在文革中受難。會議的主持人和批判的主要人，文革以後都被尊為無產階級革命家。

批評朱德不是從這裡開始。早在 1959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12 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批評朱德。這個會是傳達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捎帶也批評了朱德。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評朱德時，朱德就坐在他身邊。林說：「今天當著全軍干部的面，對朱德同志是要進行批評的。他是不承認毛主席是黨的領袖的。朱德同志總認為自己功勞很大，其實他名聲很大，功勞不大。戰爭年代，朱德同志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我黨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劉亞樓對邱會作和蕭向榮說：「朱德是總司令嗎？他是彭德懷的總司令。在廬山會議上朱

³⁸ 周恩來這裡說的是紅軍長征時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主張南下，毛主席北上。當時朱德在張國燾的部隊里，他和其他幾位領導人說服張國燾北上了。北上以後，張國燾的部隊被派往黃河以西，被馬家軍打敗，幾乎全軍覆沒。張國燾成了光桿司令，在接受批判中逃離延安。

德支持彭德懷反對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朱德是真總司令，當然，他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才把朱德問題分開。」劉亞樓說：「林總對朱德的批評，不是他個人的意見，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³⁹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儀隴縣，畢業于云南陸軍講武堂。1911年10月在云南參加辛亥革命武裝起義。1915年12月參加反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法戰爭」。1917年7月任滇軍旅長，1921春任云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朱德比毛澤東大7歲，在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活動初期，朱德是唯一的一位有指揮作戰經驗的職業軍人，也是參加革命前社會地位最高的人。1922年8月在德國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他率領余部轉至湖南南部，和他在云南講武學堂的老同學、時為革命軍16軍軍長的范石生合作，使部隊獲得了喘息機會。1928年4月率部上井崗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隨即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紅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朱毛」成了中國革命領導人的代名詞。

朱德的權力自1949年以后基本被剝奪，只給一個委員長的空頭職務。1966年朱德已經是80老翁，應該說對毛的權力沒有甚么威脅，為甚么毛對他還不放心？為甚么林彪、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他群起而攻之？

朱德雖然沒有任何權力，但聲望很高，他對「文革」的態度至關重要。1959年批彭德懷時他不積極，1965年批羅瑞卿他也不積極。所以，毛要發動一場攻勢，重重敲打一下朱德，一是防止朱德對文革提出批評意見，另一個目的是警告其他高級干部，即使朱德這樣的老帥也必須俯首帖耳，絕不能成為「文革」運動中的絆腳石。朱德在軍隊中威望很高。毛澤東要搞文革怕軍隊不穩，擔心有人會擁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德弄出來，掃一下威風，除掉了有人打出朱德的旗號反毛的可能性。

³⁹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46頁。

四、中央文革小組成立

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毛澤東任命陳伯達⁴⁰為組長，康生⁴¹為顧問（8月2日，陶鑄被任命為顧問，1967年1月被打倒）。江青、王任重、劉志堅⁴²、張春橋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鏗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7人。郭影秋、楊植林、鄭季翹、劉文珍、張平化等也一度是早期的中央文革的成員。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實際是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特殊機構。毛甩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央文革成為直接指揮文革的常設機構。以後的實踐證明，陳伯達只不過是名義上的組長，江青是主事、鬧事的組長，而作決定、把關的實際組長是周恩來。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陳伯達生病外出期間，由江青代理文革組長的職務。

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開會。毛澤東7月18日從上海回到北京。江青早兩天從上海回到北京做了幾件事：（1）建立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專門把釣魚臺16號樓作為中央文革辦公室，讓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軼歐、穆欣為副主任。除了正副主任外，只有三五個助手。（2）建立信息收集系統——辦《快報》。抽調100名團以上的政工幹部作為中央文革的聯絡員、巡視員，以《紅旗》、《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記者的名義，到各地、各部門了解文革情況。辦公室人少，聯絡員人多。（3）建立碰頭會制度。每天下午3點碰頭，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參加。周恩來、陶鑄參加。經常是中央文革開完碰頭會以後，到一個單位去參加群眾大會，發表講話支持造反派。⁴³從此，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碰頭會只討

⁴⁰ 陳伯達：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八大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

⁴¹ 康生：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運動中，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協助毛澤東把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務」。1950年後長期養病，1958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曾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第4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⁴² 劉志堅，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⁴³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33頁。據閻長貴回憶，江青是

論一般性問題，重心轉到釣魚臺這邊來了。文革初期，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常委碰頭會同時存在。1967年以後，大事都由文革碰頭會來解決，但中央常委碰頭會還存在，開會的次數不多。

後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個一個被打倒了，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江青十分張揚，對陳伯達頗指氣使。陳伯達形象地用手揪著自己的耳朵對他的秘書說：「她對我三娘教子似的訓斥」陳伯達不願意召開文革小組會議，多次受到毛的批評。1967年2、3月間開始，中央決定以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名義來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個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有關的中央黨政軍領導人都參加。⁴⁴中央碰頭會決定文革中的各項重大問題，各種文件都由周恩來簽發。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周恩來的中央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了。以前，他作為國務院總理，只處理國家行政事務，而黨務和軍務分別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負責。從批判羅瑞卿到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還參與軍隊和黨里的事，周和林彪、葉劍英配合默契，關係緊密。

五、毛澤東的桃花源：「5·7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則」

毛澤東一直強調「有破有立」。「5·16通知」是「破」，是想破除十七年建立的一些制度。他想「立」甚么呢？他有一個設想，不過，他這個設想是烏托邦，是他心中的桃花源。1958年試驗失敗了，但他沒有放棄。他心中的桃花源由兩部份組成，經濟和社會體制是「五七指示」，政治體制是「巴黎公社原則」。而這些和中國古代的「大同世界」的某些設想相關。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對軍委總后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作了批示。這就是著名的「5·7指示」，是毛澤東造就共產主義新人的設想。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后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

20日回北京的。文革史專家余汝信認為，辦公室首任主任為穆欣，戚本禹、曹思歐為副主任。

⁴⁴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4年，第45-46頁。

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這樣的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小工廠，生產一比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冢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義務教育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甚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了。

毛澤東

1966年5月7日。

5月15日，中共中央將「五七指示」轉發到全黨，要求全黨有步驟地實施。在轉發的通知中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文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發展。」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都應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公布了「五七指示」中的主要內容，並加以闡述。社論說：如果按毛的這個指示做，就可以大大提高全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可以逐步縮小三大差別，促進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可以實現全民皆兵，形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7億人民都會成為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五七指示」構想了一個桃花源式的社會組織。通過這個社會組織消滅「三大差別」，進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

如果說「五七指示」是毛澤東對經濟社會體制的構想，那麼，巴黎公社原則，就是對政治體制的構想。他想用這兩個構想來代替十七年建立的制度，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

甚么是巴黎公社⁴⁵原則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有闡述：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出的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同時監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一向作為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成公社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這樣」；「從上到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舊政府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鏟除，而舊政府的合理職能拿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仆」；「公社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公社真正的秘密在於：它實質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

⁴⁵ 1871年，法國在普法戰爭慘敗誘發巴黎民眾起義。起義者與1871年3月18日成立了政權——巴黎公社（正式成立是3月28日），5月28日，這個政權被消滅。對他的標書和評論有很大的分歧。馬克思認為它是世界歷史上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嘗試，給以很高的評價。《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詳盡的介紹和評論。

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這樣，「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⁴⁶

馬克思接著說：「勞動一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一個階級的屬性了。」《法蘭西內戰》是文革中必讀的書，中央要求干部、黨員反覆閱讀學習。

對於巴黎公社原則，恩格斯有一系列解釋：⁴⁷

他說：「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

他說：「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個全部國家機器完全拋棄為止。」

他說：「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甚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如何讓掌握公權的官員只為公眾做事，而不成為公眾的主人，是古今中外的難題。馬克思從巴黎公社受到啟發，認為用「公社」代替國家，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他的設想是很難實現的烏托邦。

毛澤東不僅接受了馬克思的「公社」原則，還特別鐘愛「公社」這個詞。1958年搞了人民公社，遭遇失敗，但他不甘心，想通過文革繼續探索。他把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稱之為「巴黎公社宣言」文革中政府機構被沖垮以後，毛澤東讓王力電話通知最早奪權的上海和黑

⁴⁶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5-378頁。

⁴⁷《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4、336頁。

龍江，讓兩地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⁴⁸

巴黎公社原則、「五七道路」和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構成了毛澤東烏托邦的藍圖：（1）消滅社會分工、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實現了「個人全面發展」；（2）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建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從而消滅剝削、實現社會平等；（3）實行供給制，消滅工資級別。⁴⁹在分配上，反對物質刺激，堅持政治掛帥；（4）黨政不分，議行合一，行政和立法、司法合一；（5）公社由普選出的代表組成，可以隨時撤換；（6）廢除常備軍，用武裝的人民代替；（7）地方自治。

為了達到以上目的，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性，「斗私批修」、發動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沒有私心的「共產主義新人」。

他有生之年實現不了這個宏願，就提出七、八年搞一次，通過多次文化大革命來實現這個理想。

毛澤東設想的「五七道路」最后能落實的是全國建立了成千上萬的「五七干校」，大批知識分子和當權者不喜歡的干部在這里勞動，成了「流放地」、「勞改營」、清查「5·16」的場所；巴黎公社呢？曾想在上海試驗，結果也落空了，舊的官僚機器被鏟除了，新建立起來的還是官僚機器！

為甚么說毛澤東這一套設想是桃花源呢？他設想的是消滅分工的社會，而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分工越來越細緻；他設想的是沒有商品交換的社會，在高度分工的社會，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互通有無。沒有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的社會，社會必然停滯；他設想的是一個平均分配的社會，而沒有分配上的激勵，一定是效率極低的社會。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的政治體制是：行政、立法、司法三合一；沒有常備軍和警察，用群承專政來代替，他設想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都不能超

⁴⁸ 《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09頁。

⁴⁹ 1966年12月6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現在要實行供給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礎大號。」12月4日，康生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提到：「我們工廠里，舊的經濟規律沒有變，在交換問題上，商品等價交換的規律沒有變，工資仍然是按勞付酬，資產階級法權殘余還存在。」12月18日江青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造反派代表的講話中提到「最近我們把級別搞掉」王力回憶道1966年12月，毛曾明白表示，要實行供給制，取消薪金制。

過工人的工資，誰來執行？他設想可以隨時撤換公職人員，誰來撤換？

一定有一位高于公共機構的、權力無邊的超級人物。顯然，這是一個在超級人物統治下的、不是法治的極權社會。

毛澤東的這一套設想反映了他理論上的系統錯誤。毛澤東給中國人帶來那么多災難，都是源于他一套理論上的系統錯誤，都是源于用強大的政權力量實踐他這一套錯誤的理論。我不懷疑他的真誠。但是他越真誠，越執著，對中國人危害越大。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群眾「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他的「新世界」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為烏托邦而奮鬥的文化大革命，也注定不可能成功。

六、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聶元梓，北京大學黨委委員兼哲學系黨總支書記。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七人貼出了〈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大字報⁵⁰。大字報就在北大飯廳的山牆上。1956年大鳴大放的時候，譚天榮⁵¹的大字報也是貼在這裡。看著這張大字報，有人說，譚天榮又出現了；有人說，這是反黨反革命大字報；當然也有贊成的。本來去上課的學生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飯廳外面，三個一群五個一伙爭論得熱火朝天，而且人越來越多。

大字報寫道：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5月14日陸平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從理論上便于駁倒

⁵⁰ 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陸平，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珮云，北大黨委副書記。

⁵¹ 譚天榮，1956年帶頭寫大字報批評共產黨的學生，後成為全國著名在右派分子，受迫害二十多年。

就怎樣做，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緻，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制，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接著，大字報一一批駁宋碩的上述觀點，然後呼吁：「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

這張大字報全文 1, 400 多字，內容空洞，但調子很高。當年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這種風格。大字報貼出後，北大黨委連夜召開會議，對聶元梓等的大字報進行了批評，還組織了成千張大字報反擊，組織一些人圍攻寫大字報的人，同他們辯論。

大字報的起因是北京大學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1964 年 7 月，張磐石（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帶一個 10 人小組到北京大學調查。他們一個系一個系地找總支書記談話，動員大家給陸平和北大校黨委的工作提意見。說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也找到聶元梓，聶對學校和陸平的工作確過有意見，就放開談了。

8 月 29 日，張磐石調查組寫了一個調查報告（「一號報告」），對北大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這與當時毛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應當是一致的）。

1964 年 11 月，210 人的社教工作隊進入了北京大學。工作隊由五人小組領導。五人小組組長是張磐石，成員有劉仰嶠（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龐達（中宣部教育處副處長）、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成員有來自 22 個省市的宣傳部長、教育廳長、重點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

龐大的工作隊進校以後，甩開校黨委，「扎根串聯」，依靠聶元梓這樣一批左派開展階級鬥爭。運動目標一開始就對準北大黨委。11 月 12 日，在機關總支大會上，工作隊員當場點了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名。11 月 19 日，張磐石寫了「二號報告」，說北大黨委實際上走資本主義道路。1965 年 1 月 11 日，張磐石在會上說，十天來，在全校 20 個點上，全面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鬥爭氣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銳，生動活潑、熱火朝天。然而，這次會後，各單位面對

面的斗爭更加激烈。大會批，小會斗，無限上綱，無情打擊，學校出現了混亂。工作隊黨委副書記（上海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對工作對這樣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見。在 10 月 21 日，彭真把陸平和張學書找到他的住處，表示同情和支持陸平。清華大學黨委也不同意工作隊的作法。中宣部領導人對工作隊的斗爭也不滿意。1965 年 1 月 23 日、24 日，陸平、彭珮云在一個會上發言，對北大工作隊提出了批評。在北大黨委和工作隊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2 月 20 日，陸定一在對十個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隊作報告時指出，陸平是好人犯錯誤，認為工作隊對陸平的問題下結論太早了。3 月 3 日，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討論了北大社教的問題，認為北大是比較好的學校，陸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錯誤，不存在改換領導的問題。根據書記處的會議精神，3 月 5 日，陸定一來到北大，給校黨委常委和工作隊作報告，指出北大要落腳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同時，把社教工作隊的五人領導小組擴大為八人領導小組，校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戈華、彭珮云也進入了領導小組。張磐石「頂牛」。3 月 17 日，常溪萍給鄧小平寫信，反映對張磐石的意見，建議中央派人檢查北大的社教工作。3 月 21 日，陸定一約陸平談話，對他說，毛主席說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錯誤，放心好了，以後第一書記還是要你做下去。3 月 30 日，鄧小平和彭真批評了張磐石。

1965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宣部召開北大社教工作隊全體工作隊員大會，北大校黨委參加。4 月 29 日，陸定一代表五人小組在大會上宣布，撤銷張磐石北大工作隊長職務，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任隊長。領到成員由原來的八人小組改為九人小組，增加了常溪萍。6 月，彭真在人大會堂小禮堂向全體工作隊員和北大黨員幹部作報告，他否定「北大是資本主義的熔爐」「北大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學校」的說法，說陸平是好人犯錯誤。彭真講話之後，北大社教轉入整風學習階段，校系兩級領導人 250 多人集中住在國際飯店。整風學習領導小組組長是許立群、副組長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後面由彭真指揮。北大社教整個「翻了燒餅」：原來的左派成了右派，原來的右派成了左派。工作隊將社教前期的左派和積極分子反映黨委的材料交給了陸平等被批判的人，聶兀梓等受到批評和斗爭。會氣氛緊張，前一段社教

積極分子被隔離，甚至限制人身自由。聶元梓等人不服，「頂牛」頂得厲害。聶還到中央上訪，並寫信給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正斗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國際飯會議和社教運動也就停下來了。⁵²

國際飯店會議結束後，陸平領導的校黨委決定，北大的干部、教師和學生也組成工作隊，到農村去參加社教運動。社教工作隊的負責人都是陸平那一派的，那些批評陸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隊，說是準備放下去就不回北大。聶元梓的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職務也被別人取代了，她被分配到懷柔縣搞「四清」。5月19日晚，北大黨委傳達中央文件。大家聽了「5·16通知」如晴天霹靂。同時傳達的，還有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組織處理的定性，大家十分震動。聶元梓幾個晚上沒睡好，翻來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況，思考北大與北京市委、與彭真的關係問題。在北大社教后期壓制聶元梓等人的恰是文件中指出來的幾個人：彭真、陸定一，許立群等。她想再給毛主席、劉主席寫個報告，匯報一下北大的情況。於是，聶元梓找了哲學系的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讓他找了系里的老師宋一秀、楊克明、高云鵬、夏劍豸，討論寫報告的事。他們都是北大社教前期的積極分子。楊克明說：寫甚麼報告？就寫一張大字報吧！第一張「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就這樣出籠了。⁵³

聶元梓在她的回憶中一再強調：「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那麼，這張大字報跟康生夫婦沒有關係嗎？

1966年初，康生夫人曹軼歐帶著工作組到北大來蹲點。張恩慈本來是哲學系的教師，剛調到中央機關工作不久，現在又跟著曹回到北大。曹軼歐到北大來，到處找人談話。也找了聶元梓。曹軼歐告訴聶元梓，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問題還應該繼續解決。聶元梓說還是準備下去。曹軼歐說，那你在國際飯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聶元梓才沒有走。在寫大字報之前，他們覺得要請示一下，

⁵²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7-203頁。

⁵³ 《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115-116頁。

請示誰呢？寫陸平的大字報當然不能請示陸平。他們決定請示曹軼歐。聶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寫張大字報，不知道

行不行，想請示一下曹軼歐。曹軼歐在西頤賓館的客房接見了聶元梓和楊克明。⁵⁴聶元梓匯報說，聽了「5·16通知」，我們想給陸平寫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里面，不知道行不行。曹軼歐說，「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要發動群眾，大字報可以寫。聶元梓后來說，她向曹軼歐請示，只是從組織原則出發，沒有講具體內容，更沒有帶著大字報底稿給曹看。

大字報貼出當晚，聶元梓打電話給張恩慈，說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學校里亂了，群眾對大字報有爭論，面對這個局面，應當怎么對待？中央有甚么態度？請他幫助請示。大約一個小時以后，張恩慈來到北大 22 樓楊克明家里，寫大字報的 7 個都在這裡守候。張恩慈見到他們，沒有多講甚么，他只說領導要我們把大字報抄一份給他，送給中央文革和黨中央看看。

多年來，聶元梓一直堅持這張大字報不是在康生的支持下寫的。2010 年，90 歲的她給《炎黃春秋》的一封信中說：「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與康生的老婆曹軼歐并無關聯。沒有曹軼歐或者沒有我聶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樣會寫這樣的大字報的，也同樣會被毛主席批示廣播的。因為這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目的而決定的。」⁵⁵

6 月 1 日，毛澤東在杭州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⁵⁶毛還給康生、陳伯達打電話，說這張大字報是 20 世紀 60 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義更大。

6 月 1 日晚 8 點，中央廣播電臺全文播放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毛澤東稱贊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緊接著發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其中寫道：《凡是反

⁵⁴ 1990 年代，張恩慈、楊克明都不承認他們和聶一起建國曹思歐。可能是聶自己去見的曹思歐。

⁵⁵ 聶元梓：〈我對《夜半抄家記》的意見〉，《炎黃春秋》，2010 年，第 1 期。

⁵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第 1407 頁。

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甚么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有人說毛在文革中給群眾以民主，這篇評論員文章，給所謂民主劃出了一條明確的生死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和黨中央的指示是不能反對的。人們只能跪著造反，跪在毛的跟前造反。中央廣播電臺全文播放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出乎聶元梓的意料。幾天來這張大字報引發的是是非非給她心頭造成的壓力，一掃而光。她非常興奮，真是「紅色電波傳喜訊」。

當天晚上，張承先（時為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率少數工作隊員進了北京大學。從此，北京大學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樣板。每天到北大參觀的、看大字報的人如浪潮涌動。6月3日，新華社同時發布了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大黨委這兩條使人震撼的消息。

「第一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經報紙、電臺大規模的宣傳以後，全國所有的大學都向校黨委「開火」。反黨委和保黨委兩種力量開展了激烈的鬥爭。各校大字報鋪天蓋地。

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革命進行到底。」顯然，毛說的「積極分子」，就是造反派。

在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有兩個重要人物自殺身亡。一個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一個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鄧拓原來是人民日報社領導人，1958年因毛對他不滿被調離人民日報。大饑荒之後，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撰寫《三家村札記錄》

雜文。「文化大革命」開始，被打成所謂「三家村集團」，5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紅旗》雜誌批評他的文章，文章說他是叛徒。5月18日，鄭拓在家中服安眠藥自殺。在寫給黨組織遺書中說：「我這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在我離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文革中被迫自殺的人當中，不少人在遺書中喊出這樣的口號。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⁵⁷的表現。這正是嚴酷的極權制度造就的病癥。

田家英從1948年開始就為毛澤東當秘書。開始頗受毛的信任。從大饑荒以後，他在思想上和毛就產生了距離，主張包產到戶。1966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到田的住所找他談話。安子文向他宣布：楊尚昆反黨反社會主義，田家英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決定對田家英停職反省。讓田家英交出全部文件。並當場清點帶走了全部文件。5月23日，田家英懸梁自盡。田家英為甚么自殺呢？田家英的老朋友李銳說，是因為田家英對毛已經絕望了。大躍進失敗以後，田家英多次和李銳談過：經過這次失敗，毛今后不會再亂折騰了。而文革開始了，家英原來的期待落空了。毛有空時會用毛筆寫些字，如抄點古詩甚么的，有些寫了就扔了，田家英對警衛人員說，不要丟了，放在紙簍里我來清理。他收集了很多。田家英自殺前把收藏的毛的手跡都撕毀了，撕得很碎，然後放在馬桶里沖走了。⁵⁸

「5·16通知」的傳達，聶元梓等大字報的公布，使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勢。各地的占主導地位的官僚集團怕這把火燒到自己身上，急忙拋出主管文藝的或與他們有分歧的官員，急忙拋出大批知識分子，成為文革初期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們讓這些受害者作群眾批判斗爭的靶子，也是他們抵抗群眾運動的擋箭牌。從6月到8月，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中共批轉、簽發了十幾個文件，這些文件點了

⁵⁷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斯德哥爾摩效應，或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人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這一說法起源於1973年8月23日歹徒搶劫斯德哥爾摩市一家銀行時，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

⁵⁸ 楊繼繩：《中國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3年，第340-341。

近兩百名黨內的重要幹部，50多位大學校長被打倒。如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賀綠汀等。據中宣部當時的統計，從1965年5月8日到8月10日，短短三個月的時見內，全閩各地報刊點名批判的人數就有174名。在報刊上點名的是被批判的「牛鬼蛇神」中的極小的一部份，沒有點名而受批判的不計其數。從5月到8月底這期間，有許多人死于非命。如李達、江隆基、趙宗復、鄭思群、高云生、陳傅綱、李敬儀（以上都是高校領導人）、老舍、南漢宸、姚溱、黃紹竑、良卿法師、陸進仁、陸家訓、陸修棠、余心清、黨晴梵、傅雷、陳夢家、陳正清（與妻子何慧一起自殺）、言慧珠、余楠秋、俞大夢、楊嘉仁、李翠貞、白辛、唐漠、徐韜、許政揚、楊嘉仁（與妻子程卓如一起自殺）、仝俊亭、汪篋、王思杰（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王宗一、吳恕求、吳敬澄、席魯思、安然、陳笑雨、程賢策、胡正祥、祈式潛、孫梅生、黃國璋、謝家榮、黃必信、李翠貞、劉克林、劉盼遂、許政揚、李平心、孔厥、葉以群、姚漱喜、余楠秋（夫妻同時自殺）、姚啓鈞、韓俊卿、張震旦、張冰潔、張宗穎（和妻子呂乃樸一起服毒自殺）、張輔仁、張光華、史明遠等，還有卞仲耘、華錦、趙香蘅等一大批中學領導人和中小學教師。⁵⁹這些人之死，與當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風潮有關，不是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也不是造反派的責任。這個期間造反派還沒有起來。

⁵⁹ 郝懷明：《文革中在閻王殿》，香港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117頁、125頁。郝懷明將這個時間段以後死亡者列入了這個時間段的死亡名單，本書作者參照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和其他資料進行了修正。

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毛、刘表面相安无事，其实政见分歧已越演越烈，1965年，毛已下决心整掉刘少奇

毛澤東通過發表姚文元文章、下達「5·16通知」、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利用報刊大造輿論等多種非常手段，點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劉少奇、鄧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機會，採取共產黨的常規手段，壓制和撲滅文化革命之火。¹

劉、鄧最主要的常規手段就是向各單位派工作組。這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多次採用的辦法。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關部門開會研究運動問題，決定由陳伯達率工作組進《人民日報》²，派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率工作組進北京大學。6月4日，剛剛成立的北京新市委仿效北京大學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周恩來后來說：「整個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單位的工作組將近1萬人，這些人是從各地各戰線、全國調來」³。工作組在各校的主要任務，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一、從清華文革談起

我當時就讀的清華大學是文革的一個典型。劉少奇派王光美在這里控制工作隊，直接指揮清華文革；毛澤東親自給清華附中寫信，支持造反，還派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

6月17日，我們從延慶縣四清工作隊回校。一進校門，就好像進入了大字報的海洋。除了所有的牆壁貼滿了大字報以外，在大禮堂前草坪周圍、在西大操場周圍，都用席子扎成一大圈「牆」，席子上貼滿了大字報。主要道路兩邊也都扎上了席子「牆」，也貼滿了大字報。大字報，開始是用毛筆寫在白紙上（後來太多了，就寫在舊報紙上），張貼在牆上或席子上，它是用來揭露、批判領導人和表達個人意見的一種表達形式。

¹劉少奇鄧小平採取和毛相對立的措施，有不同的說法，王年一認為，毛澤東「先后給江青、康生、林彪交底」，劉少奇、鄧小平「不了解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所以才產生分歧。（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6-27頁）；另一種看法認為，不能低估劉少奇、鄧小平的政治悟性。劉少奇、鄧小平對毛的反抗有其自覺性。我同意后一種看法。

²陳伯達帶工作組進入《人民日報》是經毛同意的，是為了控制報紙的發稿權，與進駐一般單位的工作組不同。

³周恩來：〈在清華大學對全體師生的講話〉，1966年8月5日凌晨於清華東大操場。

大字報有揭發校黨委的，有批判個別老師的，有批判和揭露北京市委和彭、陸、羅、楊的。有一些揭發高級干部特權的大字報，使我對老革命家們多年的敬仰減除了大半，原來他們是這個樣子啊！雖然那時的腐敗和新世紀初的腐敗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大家都很貧窮的時候，那樣的腐敗和特權也讓人難以接受。

大字報的另一個內容是「蔣校長姓『馬』還是姓『修』」的爭論。蔣校長是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北大聶元燾等7人的大字報一廣播，「火」已經燒到清華來了。

當時清華黨委一直強調清華和北大不同。企圖以此壓制師生對黨委的揭露。6月2日，我系一年級（熱002班）學生貼出〈蔣南翔究竟站在甚麼立場上？〉的大字報，其它系的一年級學生也貼出了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這些反黨委的大字報不多，卻遭到很多大字報的圍攻。有人貼出大字報介紹1957年反右情況，以此警告反對黨委的人。6月4日，「自九三」⁴班的七位同學貼出大字報〈這些問題說明了甚麼？〉矛頭指向校黨委，劉濤（劉少奇之女）在上面簽了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6月2日，他們拿着這張大字報的草稿到《解放軍報》社，報社的編輯宋瓊對稿件作了修改，還出了小樣，準備見報。因上級沒有批准，就拿回來貼了大字報。⁵6月5日，劉濤、賀鵬飛（賀龍之子）等七名高幹子女貼出〈清華黨委應採取積極態度領導文化大革命〉，以居高臨下的語氣，對黨委發號施令。

當時，清華的高幹子弟十分活躍，還搞了一些秘密活動。陳繼芳（開始反蔣南翔，後來反工作組，成為井崗山兵團總部領導成員）回憶：「有一天，劉濤、賀鵬飛來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樓一個房間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十多個人。那是一次神秘的會議，就像電影中看到的地下黨開會一樣——一樣的通知形式，一樣的召開方法，李黎風（李井泉之子）激動地宣布：『清華大學校黨委是修正主義的！蔣南翔是黑幫，我們要重炮猛轟！』還說：『前一階段，大家站穩了立場，你們都是清華的左派，經受住了黨的考驗，黨中央支持你們！』劉濤說：『黨

⁴自動控制系1963年入校（1969年畢業，所以稱為9字班）。

⁵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時代藝術出版社，香港，第7頁。

中央感謝你們！黨中央要清華左派組織起來！』她的話使我們激動萬分，由於是秘密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低轉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在這次會議上，我還結識了喬宗淮（喬冠華之子）、胡勁波（胡克實之子）等高幹子弟。」⁶劉濤說的「黨中央」當然是指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此時毛澤東還沒有回北京，這幾位高幹子弟不可能知道毛澤東的態度。

高幹子弟在揭露、批判蔣南翔時起了主要作用。我們當時認為，他們的大字報可能反映了他們父輩的看法。為甚么這些劉少奇、賀龍等毛澤東將要打倒的高級幹部，急急忙忙地要打倒蔣南翔？文革初期有一個詞，叫「拋出」。高校黨委「拋出」一些知名知識分子（當時稱為「反動學術權威」），而手握實權的高級領導就「拋出」高校黨委書記。大概這是劉少奇等對抗毛澤東、實現自保的策略之一。

6月8日下午，北京市委電話通知清華大學黨委，將派工作組進入清華。當天下午，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⁷到校，晚8點，周赤萍在校黨委辦公室同劉冰、胡健、艾知生三位黨委副書記見面。周赤萍指着他們三人問：「學生貼大學報說你們是黑幫，你們是不是？請回答我。」他們三人回答：「我們是共產黨員。」周問：「你們執行甚么路線？」他們三人回答：「我們執行的中共中央路線，毛主席的路線。」三位副書記和周赤萍吵了起來。周赤萍宣布：「從現在起學校的工作由工作組領導。明天工作組進校，學校黨委停止工作。」⁸第二天，以葉林⁹為首的工作組共513人進駐清華大學，接管了校內一切權力。6月15日，陶鑄在高教部講話，宣布蔣南翔停職反省。所有因揭發黨委受到壓制的學生和教師一下子解除了壓力。

工作組進校以後，立即任命各系文革領導班子。高幹子弟被任命了重要職務。每一個小班的文革小組也由工作組任命。我被任命為「汽六一」班文革小組組長。每班有一個工作隊員。負責我班的是林業部

⁶陳繼芳：《潮起潮落》，2001年印本，第22頁。

⁷周赤萍，解放軍中將，冶金部副部長，后任福州軍區政委，1971年「9.13事件」后被定為林彪死黨。

⁸劉冰：《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第53頁。

⁹葉林：國家經委副主任。

來的趙女士。她的直接上級是負責我們年級的王茂林先生，也是林業部來的。

工作組為甚么信任我？除了家庭出身、預備黨員這兩個條件以外，因為我貼了校黨委的大字報。我擔任團支部書記五、六年了，為什麼也貼校黨委的大字報？主要原因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被當時的革命氣氛所感染。往深處想也有個人原因。在 1964 年「清理思想運動」中，給我留下了一個政治「疙瘩」。在那場運動中，要求每一位同學都「向黨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懺悔一樣，交代自己心中的與黨不一致的「一閃念」。黨委承諾不打擊，不記檔案，不影響畢業分配。作為團支部書記，我是班上清理思想運動的負責人。為了落實系里的要求，我動員大家講出了各人的「一閃念」。青年學生有甚么可講？逼得沒辦法，有的女同學連對某男同學的「一閃念」也講出來了，說這是「資產階級思想」。我自己講甚么呢？在上下的壓力下，我搜索枯腸，想起了這年暑假回家鄉經歷的一件事。回到村里幾天，一位我稱她為細孀（沒有親戚關係，這是對年長者的尊稱）的農婦，請我幫她寫一封信。這封信是寫給她在新疆的一位朋友的，說是在家里日子不好過，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幫她寫了，但事后心里嘀咕：她是地主的女兒，為甚么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蘇聯挨着的！我是新黨員，這事不能不告訴黨組織。我就把這事告訴了村里的黨小組長。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我心里還是嘀咕：如果村里為這事整她，整死了怎麼辦？我心里產生了同情和恐懼（一年后得知，她既沒有去新疆，生產隊也沒有整她）。清理思想時，我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和心理活動講了出來。我講完后，政治輔導員幫我分析，說：你能向當地黨組織匯報是正確的，但你對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壓力，說明你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當時報紙上正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政治輔導員把我的「一閃念」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掛上了鉤。過了不久。校黨委組織部長在西階梯教室為我們系講黨課。他講到「甚么是黨性」時舉了一個反面例子：有一個預備黨員，暑假回家，幫地主孀孀寫信，幫地主孀孀逃到新疆。事后，還怕當地把他孀孀整死，懷着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我開始不知道講誰，正琢磨時，又聽他說：這位預備黨員，就是你們系里的！我想，這不是說我嗎？我立即寫了一個

紙條，說你講的事實不對，我想找你談談。我一（邊）喊着一邊擠到前面想給條子時，「燃六一」班的孫同學（他 1990 年代成為副部級幹部）一把抓住我的衣領，大聲喊：「楊繼繩，你想幹甚么？！」條子沒有遞上去。結果我被延長預備期一年。到了一年的期限，因我在四清工作隊，工作隊領導是外單位的。他們說，清華留下的問題回清華解決，直到 1966 年還沒有轉正。正是這個「疙瘩」，我對清華大學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見。我寫的大字報就是批評清華黨委的政治思想的工作。

如果某人在一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在下一輪政治運動中，這個「疙瘩」就可能成為這個人行為的動因。

進駐大學的工作組力圖維持秩序，用各種方式約束學生，對不聽話的師生進行打壓。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接二連三地貼出來了：6 月 13 日，數力系三年級學生王鐵成貼出〈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6 月 14 日，數力系二年級學生劉泉貼出〈工作組不可信任〉；6 月 15 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劉才堂貼出〈我們需要建立甚么樣的秩序？〉；6 月 16 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貼出了〈工作組往哪里去？〉。工作組迅速組織反擊，很多維護工作組的大字報貼出來了。6 月 19 日，劉少奇讓王光美到清華看大字報，6 月 21 日王光美參加清華工作組，為工作組的顧問。劉少奇也曾深夜到清華看大字報。劉少奇、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組，把蒯大富等反工作組的同學打成了反革命，剝奪了人身自由。6 月 24 日，工作組組織與蒯大富的辯論會。這次辯論會蒯大富占了上風。周赤萍將軍說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這句話被蒯大富抓住了狠狠地奚落了一番。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聽到后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¹⁰ 7 月 3 日晚上，劉少奇對他女兒劉濤談了幾點：（1）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3）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¹¹ 7 月 4 日蒯大富失去

¹⁰米鶴都：《歲月流沙》。

¹¹劉濤：〈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我的初步檢查〉，1966 年 12 月 26 日，清華大學《井崗山報》1966 年 12 月 31 日。後來劉少奇不承認劉濤揭發的

了自由，也剝奪了貼大字報的權利。批判蒯大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工作組的主持下，對蒯大富開了多次批判會，還組織全校師生大游行，萬人游行隊伍齊聲高喊「打倒蒯大富！」的口號。王光美在清華工作組的四十多天內，幾乎每晚回家同劉少奇交流看法。¹² 對蒯大富施加如此強大的壓力，是劉少奇的意思。在強大的壓力下，蒯大富態度極為強硬。他在失去自由中寫道：「高壓政策，本身就是軟弱的表現。不過，我再一次表明，對我的效果為零！要我承認我是反革命分子，這永遠也辦不到！就是上了絞刑架，我也將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堅決革命到底的！」「我有一千條理由、一萬條理由相信，這股黑風將被壓倒。我自己是甚麼樣的人總會弄清楚。」¹³「說實在的，我壓根兒沒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組要集中全部精力來把他『壓』下去。聲勢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寫大字報對付一個人，游行、示威、開全校大會、廣播等大手段都用上了。這樣的聲勢對蔣南翔都沒有使過，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¹⁴當時，我在長龍般的反蒯的游行隊伍里卻產生了另外的想法：對一個 21 歲的年輕人，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大批判，還舉行如此大規模的游行，是不是有點過份？我佩服蒯大富在政治高壓下不屈不撓的態度。多年來，我猜想，蒯大富如此強硬，是不是有人背後支持？後來確知，在壓力最大的 6 月底和 7 月初，並沒有人支持他。7 月 7 日，在他絕食抗議第二天時，北京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到清華見蒯大富，勸他不要絕食。直到 7 月 22 日，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來聽取蒯大富對工作組的意見。此時蒯大富還不知道甚麼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王力、關鋒是甚麼人。

一些高級幹部支持工作組。譚震林說：「清華學生向工作組提意見，實際上是攻擊王光美，攻擊王光美，實際上是攻擊劉少奇。」¹⁵

這三句話。劉濤說：「他否認他的，我揭發我的。」

¹²這是王光美檢查中的話，轉引自蒯大富：《清華文革五十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 年，第 78 頁，但在王光美 10 月 10 日的檢查中沒有這句話，可能在後來的檢查中，但沒有資料收錄。

¹³蒯大富：〈關於 6 月 27 日大會的聲明〉，1966 年 6 月 28 日。

¹⁴蒯大富：1966 年 6 月 29 日致工作組長葉林的信。

¹⁵1966 年 8 月 29 日譚震林接見農業大學工作組的談話，〈譚震林在文革初期的十三次

一些高幹子弟反對蔣南翔，卻保工作組。批判蒯大富的活動是賀鵬飛等組織的。賀鵬飛同班同學張鳳泉回憶：「在工作組批判蒯大富的活動中，賀鵬飛讓我班一些同學參加預演批判會，在蒯大富未到場的情況下，發言者輪流發言，然後評述需要改進之處。」¹⁶

工作組提出「反蔣必先反蒯」的口號。校一級揪出了蒯大富，各系和有的班也揪出「蒯派人物」，對「蒯派人物」進行隔離審查、查抄日記、批判鬥爭。6月20日，我班的調幹生吳文忠和我年級的李文藏與電機系的甘小杰三人到北京林學院抄回來一張大字報，題為〈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¹⁷，署名「李小忠」在學校張貼。他們被工作組打成了小「三家村」，在校大禮堂開會批判。吳文忠是我班的，作為文革小組長，我也參加了批鬥會的組織工作，多年來，我對吳文忠一直深懷愧疚。後來工作組的王茂林還要批判我班另一位同學，我反對，和他吵翻了。幸虧那時工作組已接近尾聲，否則我也要挨整。

在大家激烈批評工作組的時候，7月29日晚，王光美講話，這是她第一次向全校講話。她說：「工作組的問題，我有我的看法，現在不講，以後再講……」我聽了一半，就和我班宋書珍同學寫了一張大字報：〈王光美同志在定調子〉，貼在大禮堂前面，貼出後我班的黃宛也在上面簽了名。當晚，葉志江也貼了批評王光美的大字報。這是點名批評王光美的第一批大字報。

在工作組的主持下，全校700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自控系青年教師史明遠被迫自殺身亡。

王光美把她的「桃園經驗」拿到清華，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如果

講話〉，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公社遵義部隊」整理。

¹⁶張鳳泉：《延安紅衛兵，我們的那片雲——紀念吳綏符、張烏灶、崔文春》2011年3月30日於大連。

¹⁷6月20日，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22個問題）。「談話紀要中有『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露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霉了』，還說要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等。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遭受長期殘酷鬥爭。據此，薄一波把林院定為「反干擾」的重點學院之一。7月9日工作組召集12個學院4千餘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22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8小時之久，並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劉少奇把「清華經驗」推向全國，將給學生造成多大的災難?!

二、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組反右

進入各校的工作組，有的和學校黨組織一起壓制揭發校領導的學生；領導人已被上級點名為「黑幫」的學校，就設置一些條條框框限制學生。在這個期間，《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一篇又一篇宏文，號召學生起來造反。一些涉世不深的造反青年，怎能忍受工作組的壓制？他們起來反工作組，工作組對他們進一步打壓。因而出現了多起工作組鎮壓學生的事件。

6月3日，在劉少奇家里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劉少奇主持下，制定了限制學生的八條：(1)大字報要貼在校內；(2)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3)游行不要上街；(4)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5)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里鬧；(6)注意保密；(7)不準打人、污蔑人；(8)積極領導，堅持崗位。制定出八條之后，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說：「有了這八條就好辦了，現在需要向下講。」鄧小平說：「開個10萬人大會，一桿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李雪峰說：「還得準備，先分開講。今天晚上開第一次會，包括機關幹部；第二次包括學校，分開講。工作幾天再看情況。」¹⁸這八條是為了維持秩序，而毛澤東就是要打亂秩序，通過「大亂達到大治」。

6月10日，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亂。不一定派工作組。12日，毛在會上說，今年大學招考推遲半年，鬧半年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組太快了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¹⁹

6月14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6月21日，劉少奇、鄧小平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運動問題。鄧小平就工作組的工作方法等問題提意見。會議

¹⁸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4期。

¹⁹《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3頁。

精神貫徹下去以後，「無政府主義現象得到遏制」。6月28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制定一些便於掌握的具體政策。」²⁰毛毛在她的書中沒有介紹劉少奇、鄧小平這次會議講話的內容，但她寫道：「他們的做法，從根本上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²¹

6月10日，北京中央財經學院金融系10名青年教師和系里的一部份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揭發院系領導的問題，還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和工作組說這是「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10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強迫批評工作組的師生承認是「反黨」、「反革命」，要他們交代「反黨綱領」。還組織群眾不分晝夜地對他們圍攻、鬥爭、聲討、示威。²²

北京外語學院的「6.13集會」被打成「反革命集會」，反工作組的「6.16」趕工作隊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

6月20日，北京地質學院，院黨委常委李貴和部份幹部、教員、一起上書黨中央、國務院，揭發工作組的錯誤。很多學生支持他們，舉行了聲勢很大的示威游行，矛頭指向鄒家尤為首的工作組。當時的國務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筋、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何長工說地質學院有「地下司令部」，並指示工作隊抓李貴。薄一波後來在地質學院工作組整理的李貴的材料上批道：「看來李貴至少是個右派，可能還是個反革命頭子。」²³工作組搞反干擾運動，將李貴、王大來等13名批評工作組的幹部當作右派在全校批鬥。其它批評過工作組的師生，也受到壓力，面臨打成右派的危險。²⁴

6月20日早上，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等17位學生貼出了〈孫友

²⁰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0頁。

²¹同上。

²²八八隊金教「6.16」戰鬥組〈憤怒控訴資面級反動路線對我們的迫害〉，紅代會中央財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²³紅衛兵首都三司編：《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過大革命大事記（1963年12月-1967年10月1日）》。

²⁴王大賓：《王大賓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15年，第15頁。

余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得到了不少師生的支持。上午 10 時，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發表廣播講話，說這張大字報「別有用心」，「他們的命運與牛鬼蛇神聯系在一起」，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預謀活動」。於是，開展了「橫掃外圍」、「反干擾」的鬥爭。反工作組的學生中午又貼出了〈孫友余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當晚，對反對工作組的學生進行圍攻和批鬥，這些學生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黨」「反革命」等帽子，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²⁵

6 月 23 日，北京市新市委在北京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大好，「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出臺了。……有反革命也沒有甚么了不起，抓起來不就完了！」「情況復雜，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產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制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利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志。」「對右派趕工作隊一定要清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臺了。」他根據毛澤東說過的「一個游魚三個浪」的話，提出「抓游魚」，「反干擾」。李雪峰說，他這次講話「大體是按照劉少奇的意見講的，只是把語氣變了一下。」²⁶

北京各高等學校，先后傳達了李雪峰的「6·23」報告，把「反干擾」「抓游魚」推向高潮，高校和中學一片「白色恐怖」。工作組還整了一大批人的黑材料，準備以後算賬。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中引用王力的話說：「一百幾十個學生被打成反革命。」²⁷顯然這個數字是縮小了的。僅清華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有數百人，全市怎么才一百幾十人呢？7 月 13 日，北京市文教系統大學組根據 24 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隊統計：有 31,877 人被劃為左派（占總人數的 32%），57,235

²⁵紅衛兵首都三司編：《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 年 12 月-10 月 1 日》1967 年，北京，第 49-53 頁。

²⁶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 16?18」事件到「7.29」大會〉，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²⁷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3 頁。

人被劃為中間派（占總人數的 57.97。），10, 211 人被劃為右派（佔總人數的 10.1%）。工作組對右派的估計數比文教系統大學組的估計要多得多：在 24 所高校中，九成以上的黨委被定為三四類、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幹部六成以上被定為三四類。²⁸如果「反干擾」「抓游魚」繼續進行下去，這些被劃為右派的或被定為三四類的人，命運一定是悲慘的。

三、劉、鄧搞的新的反右鬥爭

毛澤東把整「當權派」作為文革運動的重點，手中有權的「當權派」自然要進行抵抗。文革后的官吏把「當權派」抵抗文革當作正面行為來歌頌。其實，早期的抵抗活動實際上是官僚們的一種自衛。他們將鬥爭矛頭從「當權派」轉向知識分子，轉向官員隊伍中異己分子和普通群眾，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打擊「階級敵人」。官僚們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制造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揪出一大批「牛鬼蛇神」和「右派分子」。他們沒有越軌，共產黨歷來是這樣做的。他們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次越軌了，官僚們的常規做法，和毛的戰略是針鋒相對的。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決心按照 1957 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如果說 1957 年是第一次反右的話，那麼，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更兇猛。

1966 年 6 月 23 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部署》〉時寫道：「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中學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於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²⁹

劉少奇批示的中南局的這份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

²⁸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 年，第 166 頁。

²⁹ 同上，第 165 頁。

間要抓 1% 的右派。1965 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為 67.4 萬人，教職工數 33.3 萬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為 1,431.8 萬人，教職工 110.5 萬人。³⁰1966 年沒有招生，也沒有畢業離校的學生，還是這個數。學生的 1% 是 15 萬人。教師中的右派比例會遠高於學生中右派的比例。1957 年那場反右鬥爭，近百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事業。如果劉少奇和鄧小平新的反右鬥爭真的搞起來了，受害者一定數倍於 1957 年！

在劉少奇這個批示之前，在高層不少人也想用 1957 年的辦法對付群眾。早在 4 月中旬，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武漢洪山賓館的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四清」加「反右」。4 月 25 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會議上說：「由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着文化教育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目標要針對知識分子。文革的結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總數 5-10% 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為新的右派。」³¹ 1965 年在校師生共 1,643 萬人，按王任重的比例，則有 82.15 萬至 164.3 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加上機關、工廠和其它部門，被打成右派的人數，會相當於 1957 年那場反右鬥爭的幾倍！

5 月 9 日，中南局宣傳部傳達陶鑄指示：「運動要轉入反右。」「這次運動的意義很大，比過去的反右鬥爭更長期，更深刻，更廣泛。」5 月 19 日，陶鑄在中南地區文化革命動員大會上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少數改造得比較好，多數人沒有徹底改造。有一部份人不僅沒有放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一有機會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6 月 22 日，陶鑄批示：大學中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職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³²

6 月 8 日，王任重提出，1957 年的〈湖北省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幾點意見〉可以作為當前運動的指導文件。為甚么王任重搬出了 1957 年的反右文件？他後來在自我檢查中回答說：「在 6 月 10 日前后一次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 1957 年差不多，要

³⁰《中國統計年鑒》1988 年，中國統計出版社，第 876、874 頁。

³¹徐海亮：《東湖風云錄——武漢群眾的文革記憶》，銀河出版社，2005 年，第 7 頁。

³²劉國凱：《文化大革命簡析》，博大出版社，香港，2006 年，第 10 頁。

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個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 1957 年反右鬥爭的老經驗來指導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的。」³³

6 月 11 日，劉鄧指示：「在北京以兩三個月時間搞反奪權，這是新的反右鬥爭。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黨團組織可以整黨、整團。要抓工作隊。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³⁴

劉鄧說的右派就是反黨委、反工作組的那些人。這些人被毛稱為左派，是文化革命的積極分子。劉鄧與毛完全對立。

此時，北京大學的一個事件，為劉少奇大抓右派找借口。6 月 18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北京大學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先後發生一些亂鬥的現象，鬥了 60 多人。在這些被鬥的人當中，有「重點」的人，也有些「有問題」的黨團幹部和教師，還有兩個「反動學生」。鬥爭時，發生了在臉上抹黑、戴高帽子、罰跪、少數人被扭打的現象。這種偏差本來是可以通過政策和引導加以糾正的。但是，工作組將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當夜北大工作組給中央寫了簡報，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簡報認為：「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6 月 19 日劉少奇以中央名義轉發了這份簡報，加上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這個簡報於 20 日下發。此后，各校工作組對學生的鎮壓更加激烈、更加集中。在 6 月 20 日前後幾天時間里，北京市有 39 所大學發生學生反工作組和工作組鎮壓群眾的事件。全國各地工作組都把群眾過激行動打成反革命事件。

毛澤東聽說北大「6.18 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就針鋒相對地說，「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

學生的暴力行為是多年政治引導的結果，也是工作組引導的結果。這些被打的人不是文革前被定為政治賤民（反動學生和有歷史問題的教員），就是工作組進校以後新確定的政治賤民（黑幫、反動學

³³徐海亮：《東湖風云錄——武漢群眾的文革記憶》，銀河出版社，2005 年，第 7 頁。

³⁴周良宵、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第 80 頁。

術權威)。工作組已經給這些人定了性，學生才打這些人。施暴者如果觸犯了刑律的可以依法處理，把施暴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顯然是不適當的。北大的「6.18」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以後，各地也依此照辦，一些沖擊「當權派」的行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一些學生和群眾被定為「反革命」。

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勢和我們的建議〉的報告，強調派工作組的作用和在知識分子、群眾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要「暴露牛鬼蛇神，徹底批倒批臭右派分子。」要「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³⁵

7月3日，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寫了〈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信中說：「要引蛇出洞，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子抓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³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西南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公開宣布：「這一次要捉20萬右派，叫馬識途帶着到大涼山開荒。」

³⁷

北京師大一附中工作組是劉少奇抓的「點」，他女兒劉平平是這所學校高一的學生。

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後，將近90%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77%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被「勞改」，有的受嚴刑拷打。³⁸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6月20日，學生陳永康，何方方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這張大字報和善意批評不一樣。」「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劉

³⁵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群眾的文革記憶》，銀河出版社，2005年，第27頁。

³⁶周良宵、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第94頁。

³⁷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72頁，馬識途很早參加革命，1949年後在四川省委任組織部長等職，是著名作家。

³⁸蕭喜東：〈1966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下面引用的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寫的資料都是轉引自蕭喜東這篇文章。

少奇要求工作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³⁹7月11日，劉少奇在工作組匯報時問：「那幾個人怎麼樣？姓牛的學生是他們的后臺嗎？陳永康、何方方能承認嗎？你們沒有打他們吧？現在都在學校嗎？」還說，這些人高三畢業后「不能到大學里去，……就留在你們學校」。「百分之幾的右派勢必是有的，不過這些人你們還沒發現，右派有5%，這就很好嘛。」⁴⁰從6月24到30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工作組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三次鬥爭會后，全校1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多名。⁴¹

7月13日，劉少奇聽取團中央領導人胡克實匯報北京中學文革時，提出對幹部教師分成一類、二類、三類和四類。一類的，職務要保留下來；二類的，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三類就是問題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職。……四類就是批判重點。」⁴²

北京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抓的「點」。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做出指示。

6月4日，團中央派出中學的第一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鄧榕揭發：運動開始，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⁴³顯然，鄧榕是在政治壓力下揭發的，但她不可能捏造事實。

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指示，工作組把反工作隊的人說

³⁹劉少奇：〈在聽取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匯報時的講話〉，1966年6月20日，載《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人民出版社資料室，內部發行，第669-670頁。

⁴⁰〈在聽取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匯報時的談話〉，1966年7月11日，載《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人民出版社數據室，內部發行，第674頁。

⁴¹〈「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學紅代會《兵團戰報》1967年4月10日；〈炮打劉少奇——控訴劉少奇在北師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學《革命串連報》1967年1月9日。

⁴²劉少奇：〈在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時的指示〉，1967年7月13日，載《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9月內部發行，第689頁。

⁴³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成是野心家……。學校里不僅鬥爭反工作隊的同學，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

文革中流傳的鄧小平對師大女附中的談話，在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沒有提及，也沒有否定，這需要等檔案公開以後才清楚。不過，文革中群眾組織發表的材料也可供參考：

以後進入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一些師生對工作組的作法不滿，6月，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甚么立場上〉的大字報。在工作組的組織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會后鄧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小平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為了鎮壓反工作組的學生，工作組搞了「全面開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組樹立的「樣板」抓右派。當時高二（二）一個班就鬥爭了12個被說成「右派」的同學。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癥。⁴⁴

胡啟立揭發：「6月20日，胡克實（當時的團中央書記）突然通知我說，要我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鄧指示我說：『那13個人并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13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19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13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我回來后，就趕快通知工作組，那13位同學不是積極分子，要堅決依靠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這樣必然造成工作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動了群眾鬥爭群眾。」⁴⁵6月27日，梁二同等18人又貼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讓卓琳打電話給劉志堅，要劉了解梁二同父親的情況，「企圖進行政治迫害」。

胡啟立揭發：「6月20日，胡克實指示我，應像師大一附中那樣

⁴⁴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調查組：〈斬斷鄧小平伸向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黑手——關於鄧小平殘酷鎮壓師大女附中無產階級革命派罪行的調查報告〉，載《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⁴⁵胡啟立：〈鄧小平是鎮壓師大女附中革命學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這是胡啟立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被迫寫的，但這裡引用的內容應當是真實的，胡啟立不會夸大鄧小平的錯誤。

在學生中組織辯論會，辯論和孤立那些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當時我有些猶豫。胡克實要我向鄧辦公室打電話請示。6月27日或28日鄧小平通過他在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女兒向工作組傳達鄧的指示說，對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分子不管不好，這樣會使他們越來越往那邊跑。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辯論也要有些力量。讓那些爭取過來的人也參加辯論。……7月5日，鄧親自找我和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及兩位學生代表到中南海開會。他又一次當面指示要組織辯論。當時一位同學代表說，反對工作組的人都不願意參加辯論怎麼辦？鄧說：『她們不來，缺席辯論也可以嘛！』⁴⁶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工作組就於7月7日到7月9日接連召開了三天的辯論會，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

鄧小平還對鄧榕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⁴⁷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對有些出身不好的班幹部，就撤換。⁴⁸五十天內，師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6個校一級領導幹部5個被鬥，6個教研組長也有5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左派」，是被認為「政治可靠」的人，是依靠對象。當「左派」是很光榮的。

從毛澤東這邊看，文革之初，反校黨委的是「左派」（如果校黨委被定為「黑幫」）；不久，反工作組的是「左派」。從劉少奇、鄧小平這邊看，保工作組就是「左派」了。

7月初，劉少奇、鄧小平制定了一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從7月23日開始，工

⁴⁶胡啟立：〈鄧小平是鎮壓師大女附中革命學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⁴⁷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原載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非行》，1967年4月。

⁴⁸同上，當時鄧榕是在政治壓力下揭發的，但鄧榕不會編造事實。

作組組織了包括即將退休的老教師和半退休病號在內的師大女附中幹部、教師「集訓」，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決他們「洗澡下樓」問題。每個幹部、教師都跟着一個「左派學生」，工作組把幹部、教師的排隊類別和主要材料告訴這些「左派」學生，他們隨時可以叫幹部、教師交代問題。集訓期間，幹部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去集訓就像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⁴⁹北京如此，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教師也進入了集訓班，接受檢查批判，他們的經歷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差不多，受害者不計其數。

中央一些部委也由部里派出工作組，也拋出一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外交部長陳毅說：外事口有三個最大的牛鬼蛇神：一個是李昌，是對外文委副主任，是階級異己分子，他母親是四川大地主，⁵⁰女惡霸，李昌一直養着她。第二個是外交部部長助理宦鄉，里通外國，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來了。第三個是浦壽昌，是周總理的外事秘書，後來放到外辦當工作人員，是美國博士。外交部派到對外文委的工作組長張彥，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牛鬼蛇神」。造反派要揭發外交部領導，工作組就打擊，只讓批判被拋出來的幾個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陳伯達到對外文委看大字報，支持造反派，反對張彥。陳毅說，張彥經過考驗的，是好幹部，是我派的。中央文革和陳毅形成了僵局。⁵¹

四、全國各地都抓右派

在高層反右的思想指導下，各地的反右運動如火如荼。

在6月間，南京市的19所高校共貼出24萬張大字報，被點名批判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多達5,700余人。⁵²另一個材料顯示，截止6月

⁴⁹新北大公社。02621 支隊調查組：《清算鄧小平在幹部、教師問題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6年6、7、8月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和校籌委在幹部、教師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1967年4月。

⁵⁰陳毅記錯了，不是四川，是湘西。

⁵¹《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31-32頁。

⁵²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公室《陳光傳》第22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日，全市47所中等學校被大字報點名批判為「牛鬼蛇神」的教職工達1,626人，占教職工總數的24%。⁵³這些被批判的人，一部份是貼大字報批評黨委的人，另一部份是被黨委「拋」出來的幹部和「學術權威」。

位於廣州的華南工學院學生高翔收到其妹從北京寄來的一封信介紹北京文化革命的情況，高翔等學生在6月24日貼出了「北京來信」，其中有這樣的話：「除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都可以懷疑。」頓時，學生奔走相告，爭相傳抄。高翔等，還寫了〈告全院學生黨員書〉的大字報。號召大家造反。當晚，廣東省委把「北京來信」定為反革命信件。25日凌晨1點，在工作隊和學院黨委第一書記張進的指導下，一些工農子弟和革命幹部子弟舉行了緊急會議，連夜寫出大字報，說「北京來信」是「反革命暴動的宣言書」，是「裴多菲俱樂部反革命綱領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亂的前奏」。工作隊還布置對有關學生進行監視、跟蹤。華南工學院蕭玉祥等18名學生寫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聯合起來」的信件，提倡串連，也被定為反動信件，進行追查。⁵⁴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1957年反右的最高階段」。⁵⁵在武漢大學工作組的指揮下，「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有232人，黨支部副書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的有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一般幹部100%被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漢大學的『三家村』⁵⁶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人來湊成一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一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

⁵³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油印本初稿第5頁，1985年。

⁵⁴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聯研究所。廣州《紅旗報》，1967年6月24日。

⁵⁵〈徹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組在武漢大學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武漢紅衛兵三司《東方紅》1967年5月11日。

⁵⁶6月13日，武漢大學工作組開始批判李達（校長）、朱勤天（黨委書記）、何定華（副校長）「三家村」反黨集團。

的大老板」。⁵⁷

運動一開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工作組和院黨委就在內部將學生分類排隊，劃為左、中、右。右是打擊對象，還被搜集材料。全校右派學生 250 人左右，占學生總數的 8%(後來清查「5·16」時，受害者也是這個比例)。工作組鼓勵師生給黨委貼大字報(引蛇出洞)，同時讓左派學生注意形勢發展。1966 年 6 月 13 日，農田水利系黨總支書記召開左派學生會議，分析運動形勢，明確指出到會者是左派，要大家注意動向，要「頂得住」。參加這次會議的學生郭明正(634 班團支部書記)想：運動剛開始，怎么就封了一批左派？他將會議內容告訴了董建平等同學，董建平就寫了一張大字報，公布了會議內容，在學生中引起轟動，工作組和院黨委組織人反擊。當權者定好了反擊對象：郭明正、徐海覺、晏成禹、李廣文、劉靜生等關心國家大事、獨立思考的學生。然後，組織福利科和機械廠的工人寫大字報：〈工人說話了〉⁵⁸、〈我們有話說〉等，6 月 18 日一大早張貼出來。廣播臺反復廣播工人的大字報。對這些重點學生組織圍攻和揭發批判，將透露左派會議的郭明正定為「造謠生事」、「破壞文化大革命」。7 月 15 日，全校開展了揭發、批判、鬥爭右派分子運動。原來給黨委寫大字報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7 月 17 日，召開全院大會，由省公安廳公開逮捕了郭明正。全院點名批判百餘人，張庭英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跳入長江而死，一個學生被逼瘋。⁵⁹

華中工學院在 37 天內 383 人被劃為「右派」。武漢醫學院被鬥學生 62 人。華中師範學院被鬥 300 多人。武漢郵電學院被鬥 23 人。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共 1,400 學生，就批鬥了 200 多人。建築工程學校，全校 500 多人，逮捕了 18 人，批鬥了 30 多人。省委重點抓的一類院校武漢大學、湖北大學，以及水運學院、鋼鐵學院、一冶一中，揭出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每一個「反革命事件」都涉及一批師生。⁶⁰

⁵⁷ 〈徹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組在武漢大學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武漢紅衛兵三司《東方紅》1967 年 5 月 11 日。

⁵⁸ 1957 年《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一篇從整風轉向反右的文章就是〈工人說話了〉。

⁵⁹ 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親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4 年，第 97-104 頁。

⁶⁰ 徐海亮：〈1966 年春夏的武漢〉，《往事》第 21 期，2005 年 8 月 29 日。

6月初，武漢墨水湖中學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領導壓制學生，省委領導人把大字報說成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6月21日，學校工作組按市委的指示，把寫大字報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7月11日，公安局將他們逮捕，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你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着你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你們是反革命，你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三個16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⁶¹

1966年6月1日晚上，河南鄭州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王相海等14位學生貼出了全校第一張大字報，批評了校黨委只批學術權威，壓制群眾運動，把鄭大運動搞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當天夜里，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召開會議組織反擊。6月3日，寫大字報的學生被打成「小鄧拓」、「小吳晗」、「反革命」、「小右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鄭州大學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鄭大不是北大」⁶²「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等大字報貼滿校園，鄭大呈現一片恐怖氣氛。6月6日凌晨，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學校派人到王相海家鄉開批判會；當天下午，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大。工作組進駐後，繼續壓制運動。6月7日晚，學生黨言川因同意王相海的觀點而被鬥爭。

7月2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指示，「要摸一摸各類人……排排隊。」貼大字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搗亂的，情況異常復雜」。7月3日，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解玉田在向相關部門領導傅衛恒的指示時，要求在大中學校機關幹部、教師、學生中劃分左、中、右、反四類人，並限令「抓緊時間完成」。一時間，不但許多貼大字報的教師和學生被劃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許多平時被看作「落后」、

⁶¹ 〈王任重鎮壓群眾運動的罪行——武漢墨水湖中學革命師生入獄記實〉，首都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批陶戰報》，1967年3月14日。

⁶² 「鄭大不是北大，王培育不是陸平，你們怕甚么？1957年右派搞我們，現在我們搞他們，讓他們放出來再說。」這是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對省委宣傳部長祝一清說的，見蒯大富《清華文革五十天》第301頁。

「不聽話」及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劃成「右派」或「反革命」，被劃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師生達三分之一。⁶³

1966年6月3日，陝西省副省長嚴克倫率領幾百人組成的工作組進駐西安交大。由於工作組對學生壓制，6月6日，工程物理系學生李世英貼出了〈工作組十大罪狀〉的大字報，還要向中央發電報「工作組不能領導文革」被制止；女學生劉維娜寫出了〈趕走工作組〉的大標語；工作組長嚴克倫被幾百名學生圍住辯論。工作組把「6·6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6月7日到9日連續三天對他進行批鬥。李世英吞服廣大量安眠藥，送到醫院搶救才免於死亡。工作組扣壓了他的遺書，還說，「中國7億人口，死一個沒甚么了不起，還可以省下30斤糧食。」（後來毛澤東說李世英是「交通大學的學生領袖，被工作組整死又救活者」。⁶⁴劉維娜脖子上掛着一雙鞋游街⁶⁵。每個班都開展「查上當，放包袱」活動。62級女生王永婷跳樓自殺身亡。工作組給她家發電報中說：「王永婷破壞我校文化大革命，於9日晨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望速來處理后事。」

東北也同樣鎮壓造反的學生。6月13日，東北人民大學（后改名為吉林大學）貼出反對校黨委的大字報。6月14日，吉林省委派長春市委書記處書記李一平為首的工作隊到東北人大「滅火」。工作隊進校后和師生發生了沖突。學生喊出了「李一平滾蛋」的口號。6月21日，市委工作隊召開全校黨員大會，號召黨員支持工作隊。黨員大會決定，晚上開群眾大會，還把市委工作隊升格為省市工作隊，仍由李一平任隊長。黨員大會的消息傳出后，群眾迅速從四面八方方向校大禮堂聚集。他們進入了禮堂后，發現臺上沒有國旗，毛主席像還歪掛着。三、四百名學生以擺正主席像、掛國旗為借口，沖上了主席臺。全場一片混亂。省市調來一批公安人員，又由各工廠、機關、學校臨時抽調270多名幹部到現場。對立雙方發生了沖突。這就是轟動全城的「紅旗事件」。「紅旗事件」被省市定為「打着紅旗反紅旗」

⁶³石名崗執筆：《文革中的山西》上冊，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74頁。

⁶⁴毛7月21日，22日兩次講到西安交大事件上，還講「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電話，打電報，限制人家上訪北京」，《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第262頁。

⁶⁵有不正当男女關係的女性被稱為「破鞋」，給女學生脖子上掛鞋游街，是嚴重的人身侮辱。

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搗亂」事件。省市委工作隊對學生進行排隊，把全校多名學生打成「反革命」。⁶⁶

6月6日，貴陽師範學院貼出了批評貴州省委的大字報。部份學生到《貴州日報》造反。6月8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將學生的行為定為「6·6反革命事件」，貴州人民廣播電臺反復廣播，攻擊省委、攻擊黨報就是反黨，就是「現行反革命」。省委派出147個工作組進入學校抓反革命分子。貴州大學打擊面占在校學生（不計下鄉參加四清的人）50%以上，貴陽醫學院在清查「6·6事件」中受株連273人，兩人被迫自殺。在這期間，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對他們進行批鬥、關押、勞改，到7月10日，被迫自殺的189人，其中身亡的107人。⁶⁷

在華東，發生在校園之外的沖突是南京「6.13」事件，6月12日江蘇省委拋出了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說他是「黑幫分子」。6月13日，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登出了一篇〈堅決支持南京大學師生的革命行動〉。南京的大中學生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和責問。認為文章把揪出匡亞明的功勞加在省委頭上，從而給省委定下不容懷疑的調子。6月13日中午，南京農學院兩位同學給《新華日報》貼了第一張大字報，題目是〈這裡有鬼〉。接着，發生了圍攻報社的群體事件，即「6·13」事件。這個事件被省委定為「少數壞人鬧事」。幾乎所有的大字報全部拍了照，並且把內容整理下來。作為以後打右派的證據。

⁶⁸

五、毛澤東反對派工作組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他的書中記載：

針對各校趕工作組的情況，7月13、19、22日，中央連續召

⁶⁶長春公社五〇三戰鬥隊編：《春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68年3月》，第14頁。

⁶⁷鄧振新：《貴州風雲》，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41-44頁。

⁶⁸〈炮轟《新華日報》——揭開「6.13」事件的蓋子〉，紅衛兵南京大專院校司令部《紅衛兵報》，1967年1月16日。

開三次會議，討論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說工作組壓制民主，給群眾潑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組。劉少奇憤而駁斥，并與康生發生爭執。素以沉穩着稱的鄧小平忍無可忍，一下子站起來，指着陳伯達說：你們說我們怕群眾，你們到前邊試試！并明確表態：「撤工作組我不贊成！」在會議上，中央一線領導和中央文革，從思想到言辭均已針鋒相對，鬥爭已趨白熱化。⁶⁹

親歷這場爭論的李雪峰回憶：7月18日下午⁷⁰，懷仁堂會議，劉少奇會上尖銳地批評中央文革，他說：「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鬥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裡有材料。」他的意思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他是反對撤工作組的。康生頂劉少奇：「少奇同志，我們這裡也有材料。」陳伯達和鄧小平吵了起來。會議正開着，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少奇打招呼。她在靠着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發上。她完全看到爭吵的場面。江青沒有記錄，只是聽。當時劉少奇、鄧小平非常激動，他們不會注意有人進來。⁷¹

陳伯達回憶說：「派到學校的工作組與群眾發生對立，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議，被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否定了，實際上還沒有拿到會上討論就否定了。……當時工作組已經把許多學生和教師定為『右派』、『反革命』。⁷²不撤銷工作組，那就回到1957年反右運動的狀況，不允許群眾批評領導，一批評就說人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給定為『右派』、『反革命』。……」據王力回憶，6月下旬，上海來電話給陳伯達，不贊成原來舊的工作機構派工作組。根據上海的意見（即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才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

⁶⁹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在「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1頁。

⁷⁰ 據《周恩來年譜》下卷，第41頁、《毛澤東年譜》5，第600頁，應為7月19日，李雪峰記憶有誤。

⁷¹ 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載張化等編《十年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650-651頁。

⁷² 陳曉農：《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312頁。

議，并和鄧小平發生爭執。⁷³

7月16日，73歲的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向全國顯示他強健的體魄，這是他從第二線遙控回到第一線直接指揮之前的一個政治行動。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劉少奇、鄧小平根本不知道他回來。毛澤東一回到北京，康生、陳伯達、江青先去。劉少奇聽到了就去、走到門口，被擋了駕。⁷⁴19日，陳伯達和鄧小平就工作組問題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爭論以後，會后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⁷⁵。23日，毛在釣魚臺12號樓聽取李雪峰、吳德匯報北京文革情況，陶鑄、康生等參加。毛說：「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甚么作用？起了阻礙作用。」⁷⁶劉少奇、鄧小平沒有參加聽匯報。⁷⁷

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一下子解放了北京被關押的學生。清華大學工作組7月20日就放了被關押的蒯大富，蒯大富不相信真的放了他。他事后回憶說：「我留了個心眼，下午大概3、4點鐘的時候，我就試着出去了，我沿着清華那個圍牆，在校園里面走，那一圈十里都不止。夏天草木很深，到可以擋的地方，我偷偷看后面有沒有人尾隨。我換了幾個地方看了幾次，沒有！絕對沒有！我才知道真把我放了，真的放了。」⁷⁸

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到清華大學找蒯大富談話，王力說：「我們兩人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聽聽你對工作組的意見。」蒯大富向他們講了二十多天挨整的情況。7月30日，周恩來約兩批清華學生到人民大會堂一個小會議室談話。⁷⁹7月31日凌晨2點，周恩來到清華大學甲所找蒯大富談話。周恩來對蒯大富說：「我受主

⁷³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31頁。

⁷⁴ 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載張化等編《十年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650-651頁。

⁷⁵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1頁。

⁷⁶ 同上，第601頁。

⁷⁷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朱石元等訪談、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10頁。

⁷⁸ 蒯大富：《清華文革五十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72頁。

⁷⁹ 第一批是批評工作組的學生，雷蓉、王小平、楊繼繩、張岱爾等10人；第二批是保工作組的學生，賀鵬飛、劉濤等10人。

席和中央的委托來聽你說說，請你從 6 月 1 號到 7 月 30 號，把你知道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詳詳細細、明明白白地給我講出來，你親耳聽到的，親眼看到的，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蒯大富談了三個多小時，周恩來的秘書孫岳認真記錄，周恩來自己也記。在聽匯報開始 20 分鐘時，賀鵬飛咚咚地敲門進來，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自述的話。」周恩來說：「不行。今天我們就聽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出去吧。」又過了 20 分鐘，賀鵬飛又一次敲門進來了，再一次請求：「周伯伯，我也想聽蒯大富自述的話。」周恩來生氣了，說：「我跟你說了，我今天就聽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不要其它人參與，從現在開始，你不要再進來了，不要再敲門了。」蒯大富一直談到天亮，周恩來打斷了蒯大富的話，說：「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下面我有個會，下午 7 點我派車接你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你今天說的情況是你一個人的經歷，而你呢，你被關了十五天，你被關的時候很多事情你不知道。這樣，今天晚上你找三個人一起談。你自己找，你找誰我接受誰。」蒯大富找了劉泉、劉才堂、沈台平三個人。晚上，聽蒯大富幾個人匯報的領導人，除了周恩來以外，還有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從晚 7 點談到 10 點，談了三個小時，周恩來說：「謝謝你們，我馬上向主席和中央匯報。」周恩來為他們安排了晚餐，是雞絲湯面。還安排車把他們送回學校。⁸⁰

周恩來從蒯大富那里得到的材料，成為毛澤東回擊劉少奇的重要證據。

對北京大學的「6·18 事件」，毛澤東事先不知道劉少奇有批示（即第 9 號簡報），只是表態「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毛回北京以後，看到這一期簡報和劉的批示，勃然大怒：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原來是劉少奇指揮的。毛澤東為此罵了劉少奇，也罵了康生（怪康生沒有早一點把這期簡報給他看）。⁸¹

7 月 19 日，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⁸²28 日由北京新市委作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決定 29 日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

⁸⁰蒯大富：《清華文革五十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4 年，第 87-91 頁。

⁸¹《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2 版，第 32-33 頁。

⁸²《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 5 卷，第 600 頁。

子大會。7月28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央文革小組說：「明天北京市召開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不同意見的人也可以參加嘛，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⁸³我班的吳文忠也參加了，他是工作組定為「小三家村」的成員之一。

7月29日晚，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代表北京市會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講了話。劉少奇在講話中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它人也不知道。」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形式不適合於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如果你們讓他們走他們就走，不讓他們走，你們要提意見就提意見，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夠了，沒甚么批的了，他們也檢討了，你們也覺得他們可以走了，就走。」劉少奇說：「清華大學一個學生，寫了這麼一個口號——『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⁸⁴。同學們，就揍他。這是反革命標語，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這是保護性拘留，如果你們保護他自由讓他活動，不揍他，讓他多寫點反動標語，多發表點反動言論，不妨礙大局嘛！過后再作結論。」劉少奇提出要保護少數，意見不同的要保護，這是正確的。歷史也證明這個標語是正確的。但是，在當時有人作另一種解讀：這個標語是擁護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反對毛澤東，這是支持劉少奇的，所以劉少奇讓保護寫這個標語的李世權。

劉少奇講完話以後也沒有人宣布，毛澤東從后面走出來了。參加過這次會議的鄧榕寫道：

大會結束時，毛澤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大會堂的主席臺上。他以無人企及的巨人風采向全體與會者頻頻揮手致意。會場立時沸騰，人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一個個熱淚灑面。為了看到

⁸³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化歷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93頁。

⁸⁴6月12日清華大學教師李世權在照瀾院附近貼出大標語：「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大家都認為這是反動標語，要斗爭李世權，工作組不讓斗，讓寫大字報批判。

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顧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盡情高呼「毛主席萬歲！」會議由開始時那種極端壓抑和沉悶，一下子變成了歡騰的海洋。⁸⁵

在全場經久不息的歡呼聲中，周恩來指揮全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澤東這一「行為藝術」收到了強烈的效果。我班被工作組當「小三家村」批鬥的吳文忠參加了「7·29」會議回來後，向我們興奮地講起當時的場景。蒯大富一回到學校，就寫了一張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當時，見毛主席是無尚光榮的事。蒯大富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工作組的：你們說我是反革命，我見到了毛主席！

劉少奇將大批群眾打成右派，毛澤東解放了這些群眾，從而得到了這些群眾的堅決擁護。北京被鎮壓的造反派最先翻身，外地的造反派還處於受壓狀態，他們得到了北京的消息，在各自被關押的地方低聲吟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等待平反；有的幹脆沖出牢籠到北京告狀，實現「自我解放」。被官僚集團鎮壓之後再解放的這些人，是反對官僚集團的中堅力量，有的成了各地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袖。毛澤東把劉少奇抓右派的這一作法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被毛澤東解放的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更為積極，從而使造反運動的聲勢越來越大。跟隨劉少奇整群眾的官辦紅衛兵也隨之垮臺。

⁸⁵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在「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3頁。

第六章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 的幾件大事



林彪取代劉少奇，成了毛的接班人。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在京西賓館黃永勝的住房里，陶鑄和黃永勝兩人有不短時間的談話。邱會作在旁靜聽。陶鑄說：「現在我們黨內不是一個中央……，毛主席說過幾次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前一段，主席還談到兩頭蛇的問題。主席說：顧名思義，兩頭蛇是一條蛇有兩個頭，一頭向東，一頭向西，總走不到一個方向。這有好受的嗎？」陶鑄臨走時對黃永勝說：「要帶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聞不出氣味，就會上錯了門。」1966年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會結束後，葉劍英有一次在京西賓館他的宿舍里也向邱會作轉述了毛主席說的「兩頭蛇」的問題。¹

參加過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邱會作回憶說：「全會是宣布了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產，毛主席與劉、鄧相對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²邱會作這裡提出兩個文化革命：劉、鄧的文革和毛主席的文革。他認為「二月提綱」是劉鄧的文革，抓右派也是劉、鄧的文革。這次會議是真正全面揭開了毛的文革大幕。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中共中央常委會由劉少奇主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夕，毛決心換接班人。那時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需要中央批的文件就由周恩來批了，沒有劉少奇批的了。把劉少奇換下來，十一中全會之前就定下來了。³本來毛這時已在二線，八屆十一中全會毛就回到了第一線，⁴「兩頭蛇」變成「一頭蛇」。

這次會議原決定7月21日在北京召開。7月17日，毛澤東從上海電告鄧小平：他將回來主持會議，在他回來之前，會議絕不能召開。所以會議通知7月24日才發出。⁵

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141人，列席代表47人。鄧小平宣布這次會議議程共四項：（1）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2）討論和批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

¹《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34頁。

²同上，第443頁。

³《王力反思錄》（下），第35頁。

⁴同上。

⁵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109頁。

施；(3)通過和發表會議公報；(4)補行批准5月中央局擴大會議關於中央一些人事變動決定的手續。劉少奇在大會上報告了十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他一方面說：「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個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接着又說：「在這一段時期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在工作組問題上，責任主要由我負。」。毛澤東插話，指責工作組「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90%以上的工作組都是幹盡了壞事」。⁶

8月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聲色俱厲地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反馬克思主義」，「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⁷ 劉少奇表示承擔責任，毛不依不饒，指着劉少奇斥責：「你在北京專政，專得好！」劉少奇當面頂毛：「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毛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時宣布原定當天的大會不開了。⁸ 這天下午，劉少奇在中南組的會議上發言，否定了他在北京大學關於「6·18」事件的9號簡報的批示，但還堅持抓右派：「現在右派鬧事，奪領導的權，不要怕，你讓他領導一個時候，不就看得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⁹ 晚上，參加全會的中央領導人和代表到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參加近2萬人的大會。清華師生都墊一張紙坐在地上。周恩來、董必武、鄧小平、李富春、陳伯達、李雪峰、陶鑄、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了。操場上臨時搭的主席臺，中央領導人也是坐在主席臺下面的小馬札上。李雪峰主持並在開場白中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清華工作組組長葉林作了檢查，承認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同學們認為他的檢查避重就輕。會上有9個同學發言，兩種不同的觀點對立。凌晨1點，周恩來作了長篇講話。他說，「我參加這個會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讓我過問一下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從今天

⁶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99頁。

⁷中央文獻研究室：《文革十年資料選編》，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125頁。

⁸同上。

⁹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191-192頁。

起，新的清華大學誕生了。」

8月5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後，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少奇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¹⁰ 在這次電話之前，劉少奇會見了贊比亞代表團。這應當是劉少奇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一、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這次會議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毛澤東親自寫了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劉少奇的。最高領導集團的第一把手給第二把手貼大字報，而且大字報寫得這麼尖銳，這是古今中外沒有的事。大字報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毛澤東

1966年8月5日

上述「大字報」的文字，是毛澤東用鉛筆寫在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報》上的。¹¹ 「大字報」就是寫在這篇社論的邊角上，後面還注明日期：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用毛筆在兩頁信紙上謄清了毛澤東寫在《北京日報》上的這段話。在謄清稿上，毛

¹⁰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6頁。

¹¹ 這張報紙登載了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親筆改動了幾個字，并加上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后面注明的時間是1966年8月7日晨3時。當天，這張「大字報」就印發給與會代表。8月17日，作為「中發文件」下發，傳達到縣團級。一年以後的8月5日，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毛說，過去兩個月是打我的，我是還擊。還說，這一段時間正確的是中央文革，不是中央。¹²

「大字報」中說的「1962年的右傾」是指大饑荒後採取一些後退措施，即「三自一包」、「三和一少」。這些都是得到劉少奇同意的。「1964年的形左實右」是指「四清」運動中劉少奇的指導思想和「桃園經驗」。

大概是8月20日，有人將這張大字報抄出來貼在清華大學大禮堂前，很多人不相信真是毛澤東寫的。然而，以後經過紅衛兵輾轉傳抄，〈炮打司令部〉迅速傳遍全國。「炮打」、「炮轟」中央各黨政部門和省市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的浪潮由此而起。

邱會作回憶：

會議中間的一個晚上，總理把參加會議的不少軍隊同志叫去，給我們吹風，我是跟楊成武一起去的。總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總理把主席的大字報念了一遍，直接了當地說：「劉少奇不成了，辜負了主席。林彪同志十年來一直是擁護主席的，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接着總理又說，可能大家沒聽清（總理念毛主席的大字報），我再念一遍，不過今天的會議內容不要外傳，聽安排，今後要把會開好，說完總理又念了一遍主席的大字報。¹³

吳法憲的回憶是，對毛的大字報，周恩來念了兩遍，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工作了，他辜負了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到北京，接替劉少

¹²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194頁。

¹³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46頁。

奇。」¹⁴ 吳法憲回憶，直到 1967 年秋，周恩來才告訴他一些情況。當時，他和周恩來同乘一輛車，周對他說：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他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合適。」他說完后，毛澤東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到北京來吧！」¹⁵

二、林彪成了接班人

林彪在大連休養，原定不出席中央全會，計劃國慶節回來。向中央請了假。¹⁶ 八屆十一中全會開了一個星期了，毛澤東堅決要林彪「出山」。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你來，一般會議讓葉群代表你來參加就行了。¹⁷ 8 月 4 日，毛澤東讓秘書給林彪打電話，爭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讓秘書回電話，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意見，但是他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會議。8 月 5 日，毛澤東把他的大字報內容通過電話告訴了林彪。8 月 6 日上午，毛澤東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一定要林彪來。

8 月 7 日晚，周恩來通知吳法憲 8 月 8 日派飛機到大連把林彪和葉群接回北京。上午 10 點半，飛機降落在西郊機場。接林彪的飛機還沒有到達機場，周恩來已經先期到達。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不進停機坪，就在跑道北頭停下，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登機去見林彪，代表毛來接林彪的汪東興也登上了機艙。他們在機艙里談了大約半個多小時。¹⁸ 林是上午回來的，按常規，毛剛睡覺不久。這天毛卻沒有睡覺，在專門等林回來，他們很快見了面。毛對林說：「現在形勢變化很快，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是出乎意料的。出了這樣大的問題，

¹⁴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 2 月，第 3 版，第 596 頁。

¹⁵ 同上，第 597 頁。

¹⁶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444 頁。

¹⁷ 管偉勳：《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 年 5 月，第 218 頁。

¹⁸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 2 月，第 3 版，第 594-595 頁。《毛澤東年譜》（5）第 609 頁說是 8 月 8 日晚回北京直接到人民大會堂見毛。吳法憲是接林彪的人，估計不會錯。

你現在是非回來開會不可了！」¹⁹ 林彪說是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勝任。毛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聞政事。當天晚上，林彪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還說：「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搞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着覺，無產階級也睡不着覺。」

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是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任務。8月6日，周恩來到毛處開會，商量領導人名單，會后，根據會議商定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林二人。毛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於第7位的陶鑄勾到周恩來之后的第四位。²⁰另據王力回憶，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是毛主席親自提的，經林彪、周恩來、江青同意。由原來的7人擴大到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云、李富春、陶鑄。周恩來把名單拿出來征求林彪、江青的意見。江青說：鄧小平犯了錯誤，怎么升了？原來第七位提到了第四位，這怎么行？就把陳伯達排在鄧小平前面。

江青又說：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提上來。這就成了陶鑄第四，陳伯達排第五，鄧小平排第六。毛澤東同意了。²¹江青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參與此等大事，實在不成體統。陶鑄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與會代表們見到陶鑄便向他打聽原因。陶說：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單時我也很突然。他立刻報告毛，請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答復說，名單已定，不更動了。²²

8月12日是會議最后一天，下午，林彪主持大會。大會內容之一是選舉。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六人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1位候選人全部當選，其中得全票的有四人：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康生。只少一票的有周恩來、陶鑄、陳伯達3人（有可能是他們沒有投自己的票）。其他人得票超過半數。

¹⁹《邱會作回憶錄》，第444-445頁。《心靈的對話》第35頁。

²⁰周恩來年譜1949-1967》下，中在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6頁。

²¹《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37-38頁。

²²馬恩成：《陶鑄在1966》，《百年潮》，1999年第11期，馬是陶陶鑄的秘書。

²³ 在中央常委排名中，劉少奇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從第六上升到第二位。這次會上沒有改選主席和副主席，而會后在所有的文件上，原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不再提了，林彪仍被稱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會議實際上確定了林彪接班人地位。

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以後，在高層領導人當中掀起了吹捧林彪的高潮。

葉劍英說：「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一個很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的第一個接班人。毛主席選了幾十年了，究竟誰來接班？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四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林彪同志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毛主席選定林彪同志這樣一個最親密的戰友為接班人，肯定說，不但對我們文化革命運動能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也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志的身體比我們任何人都好，我確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二、三十年是毫無問題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兩個人，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²⁴ 不久，他又說：「林彪同志從 1927 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 年上井崗山，以後一直在毛主席身邊，向毛主席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方面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幹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紀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 59 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醫生多年檢查，從頭腦到內臟沒有甚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想和健康。因此，他是最優秀、最健康、最年輕，是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這有極大的政治意義！」²⁵

周恩來說：一個人作歷史上的地位有高有低、貢獻也有大有小，或者也有可能在工作中犯有錯誤，這些都不是評介個人的主要問題，

²³ 王年一：〈漫談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 年 10 月版。

²⁴ 〈葉劍英接見北京十三個藝術學院師生代表的講話〉，1966 年 9 月 25 日。

²⁵ 〈葉劍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軍內十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10 月 5 日。

而唯一的標準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歷史上沒有犯過路線錯誤沒有反對過毛主席的就稱得起「一貫正確」，林彪同志就是黨內高級幹部中一貫正確的代表，是毛主席名副其實的親密戰友。²⁶

葉劍英、周恩來吹捧林彪的這些話不一定是出於真心。但是，作為朝廷高官，在重大政治關頭必須表態。在極權政治下的高官是很不安全的，迎合性的表態是他們自保的必要。然而，他們的這種表態又強化了極權政治。這就是極權體制下的政治生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作為黨的第二把手，林彪主持過幾次會議。但是，從8月24日開始，就改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除了身體不好的原因以外，也許是他看到毛對他的制約：葉劍英年初就做了軍委秘書長，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拔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進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灣住地原先是由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警衛，十一中全會後，加派由汪東興直接指揮的8341部隊，由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參謀長親自坐鎮，由兩個單位共同警衛林彪的住所。毛用林彪，卻懷疑林彪。林彪當然會感覺到。所以，他盡可能少管事，少發表意見。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回到「一線」來抓工作了，不再搞「一線」、「二線」了。毛回到「一線」，又不願意抓具體事務，林彪也不是抓具體事務的人，長於具體事務的周恩來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從國務院總理到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了。邱會作從對周恩來的長期接觸中認為：「以我與周恩來相處得知，他是真心擁戴毛主席，擁護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以積極態度參加的。他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和有力的執行者。」²⁷「周恩來不止一次深情地要大家支持文化大革命，否則就會晚節不保，個人的革命歷史也要一筆勾銷。」²⁸

八屆十一中全會組織者是周恩來，名義上是陶鑄。全會的簡報由陶鑄掌握。謝富治在小組會上發言批評鄧小平。謝的這個發言沒有編

²⁶程光：《心靈的對話》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43頁。

²⁷同上，第44頁。

²⁸同上，第63頁。

到簡報里，江青責問陶鑄為甚么保護鄧小平？²⁹

三、「十六條」

「十六條」是簡稱，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5.16 通知」發出以後，毛認為怎么搞運動，得有個條條框框。就讓陳伯達在北京搞個文件。6 月份陳伯達開始搞了，參加的人有王力、關鋒、尹達、穆欣，在釣魚臺十四樓辦公。在上海的毛澤東經常和起草小組溝通，提出他的意見，改了 20 多遍。毛從上海回到北京看了後，說大體可以，但太長，要換換手修改。³⁰ 毛澤東又讓陶鑄、王任重、張平化修改。陶鑄和周恩來商量，刪去了「黑幫」、「黑線」等提法，加了一些限制詞語。全會通過的是毛澤東 8 月 7 日審定的第 31 稿。³¹

1966 年 8 月 8 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這個文件。「十六條」簡述如下：

第一條，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指出文化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當前的任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後來簡稱為「一鬥，二批，三改」或「鬥、批、改」）。

第二條，主流和曲折。「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是這場文化革命運動的主力軍。」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運動的阻力是混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舊的習慣勢力。

²⁹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 5 月，第 38 頁。王力記憶有誤，鐵道兵是 1982 年被撤銷的，不是 1966 年。

³⁰《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 5 月，第 2 版，第 36-37 頁。

³¹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 年，第 114 頁。

第三條，「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各級黨的領導不要害怕眾，要放手發動群眾。指出「有些單位是被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着，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

第四條，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相信群眾，讓群眾運動用「四大」增長才幹，明辨是非，分清敵我。「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重申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第五條，執行黨的階級路線。依靠左派，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達到團結以上的幹部和群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六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不能壓服，要保護少數。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批評工作組和一些單位負責人前一段時間鎮壓學生的行為。「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后期酌情處理。」

第八條，幹部問題。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對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份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第九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這些是「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不是臨時的組織，而應當是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毛澤東想用巴黎公社取代國家機器，在這一條中有所體現。幹部要選舉，隨時可以撤換。

第十條，教學改革。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

第十一條，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要組織對那些混進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第十二章，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第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部署問題。

第十四，抓革命，促生產。充份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革命生產兩不誤。「文化大革命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第十五，部隊。部隊文革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第十六，毛澤東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十六條」公開發表時，全國歡呼，各地群眾敲鑼打鼓，列隊游行。但是，「十六條」中很多重要概念沒有法律界定，不僅不能落實，還會在運動中造成混亂。

例如，「十六條」說「幹部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結果幹部大多數都受到衝擊。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在文革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共 230 萬人，占文化革命前 1200 萬幹部的 19.2%，雖未立案審查，但被錯誤批鬥、關押的幹部和受株連的人為數更多。其中，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占同級幹部總數的 75%；有 6 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的冤假錯案近 2 萬件，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³² 既然「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甚么是「走資派」又沒有明確的標準，群眾發動起來以後，就很難掌握了。何況在極權制度下，官民矛盾一直是很尖銳的，一旦最高權威發出了整幹部的號召，所有的幹部都難逃浩劫。

又如，「十六條」說：「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

³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2 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967 頁。

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一般具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界限，一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受到了衝擊。各級黨委「拋出」一些知識分子，受到打擊更為嚴重。知識分子受到打擊的人數和比重遠遠超過領導幹部。

又如，「十六條」提倡群眾中不同意見可以爭論、辯論，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十六條」沒有想到，群眾中不同看法形成了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以後，各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都認為自己是左派。互不相讓，更是加強了對立。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持續不斷，以致釀成大規模的武鬥。

「十六條」提倡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實際上，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幹部人選，大多是由軍隊主持下內部協商的結果。沒有一家是選舉產生的。

「十六條」的基調是支持群眾造反的。「十六條」寫道，文化革命「只能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這等於放棄了多年堅持的所有政治活動都必須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進行的傳統，也等於放棄秩序和穩定。這正是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1966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十六條「貫穿着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經過十七年強力壓制的人們，有了「十六條」，就可以運動用「四大」表達自己的意願了。其中一些積極分子（當時稱為「造反派」），大力衝擊他們討厭的官僚體制，不僅使大批無辜的幹部受到迫害，這些積極分子最終也成了犧牲品。

四、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造反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還有一個件大事，8月1日，毛澤東給清

華附中「紅衛兵」寫了支持信，這是紅衛兵運動風靡全國的起點。

「紅衛兵」這三個字本來是寫大字報的署名。寫大字報得有署名，剛開始署真名，幾個人觀點一致的人同意這張大字報、就都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後來成立「戰鬥組」。甚么是「戰鬥組」呢？就是幾個觀點一致的人在一起寫大字報，在一起研究運動形勢，在一起收集運動信息。戰鬥組人數不定，多則十多人，少則兩三人，戰鬥組得起個名字，當時常用時髦的政治詞語。也有別出心裁的，如清華大學一號樓宿舍 114 房間的一個同學寫大字報就署名「114 獨立營」，山東話「營」、「人」同音。清華附中張承志等人在 1966 年五月就署名「紅衛兵」（開始曾叫「紅衛士」），意思是毛主席的紅色衛兵。

紅衛兵起源於中學。他們首先向教育制度造反。

十七年前的教育制度基本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這種教育的缺點是學制太長（清華大學六年制，一般大學五年制），學的課程太多（清華汽車、拖拉機設計專業學了 50 多門功課），學生負擔太重（我班 30 人有 4 人因病休學）。學生被動地接受老師的灌輸，創造性被壓抑。作為自學成才的毛澤東，當然看到了這種教育制度的缺點。他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但他還根據他深信的階級鬥爭理論，提出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階級鬥爭是學生的主課。毛澤東關於教育的指示已經深入到學生心中。1964 年 7 月 7 日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中強調年輕人要經風雨，「階級鬥爭。是你們一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1964 年 11 月 9 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的文件，從根本上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內容，規定了方向。

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本來就喜歡挑戰現狀，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為他們的挑戰提供了根據。不過，只有幹部子弟才会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膽量。秦曉回顧當時北京四中的情況：「當時的主流思想，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反修防修。……當時挑頭鬧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幹子弟，他們認為學校里有階級鬥爭，有的老師出身不好，就重點栽培出身不好的學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還有就是鼓勵走

白專道路。所以，學校里就應該搞四清，搞階級鬥爭。」³³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組織者之一駱小海回憶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是事出有因的。這個因，概括地說，就是對教育制度和教育界一些傳統的做法不滿。」

七千人大會以後，隨着經濟政策的糾偏，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政策也有所鬆動。1962-1963年這兩年高考錄取時，糾正了過份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比較重視分數。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只要考分高，也可以上清華大學。一些重點中學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其中主要是資本家和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在這些重點中學，幹部子弟和知識分子出身的學生，自然就有分明的界線。幹部子弟有家庭出身優越感，歧視出身不好的同學；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有學習成績的優越感，看不起學習成績不好的幹部子弟。作為老師，通常是喜歡學習成績好的學生。

1963年之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份論」演變。1965年6月，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發生了一個不大的學潮，稱為「四六八學潮」。參加學潮的主要是幹部子弟，其中不少是中央領導人子女。他們相互串聯，組織罷課。他們給中共中央寫了「進言書」，尖銳地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³⁴北京四中一位老師回憶說：「這些高幹子弟有一種優越感，或者說有一種特殊責任感，他們覺得中國未來的前途應該是他們的，自認為根紅苗正，對毛主席感情最深，對革命責任感最強。所以，這些人就按照當時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睜大了眼睛觀察學校階級鬥爭動向，認為四中的領導幹部都爛了。」³⁵在「四六八學潮」中，部份學生提出「寧要紅2分，不要白5分」³⁶的口號。

和其它中學一樣，清華附中的高幹子弟和高知（包括工商業者）

³³秦曉口述：〈走出烏托邦〉，唐欣、米鶴都整理。載《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口述歷史之一》，中國書局，2011年，第98-99頁。

³⁴孫言誠：〈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³⁵米鶴都：《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82頁。

³⁶當時是五級記分制。3分及格。5分是最高分。

子弟之間的相互對立愈演愈烈。從 1964 年開始，學校組織了「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對幹部子弟的拔苗助長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1964 年由於一次偶然的同學爭鬥演變成全校「階級路線」的大辯論。校領導把一個平民子弟和一個幹部子弟的打架，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路線」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兩派的大字報互不相讓，竟貼滿了半個大飯廳。一位高知子弟回憶說：「『革幹』『革軍』子弟們……對我，從來是斂容正顏的。他們與我之類的『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修正主義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階級』關係。」那時，清華附中成立了預科班。預科的教材由清華大學編寫，主課全由大學講師任任教。上了預科等於一只腳踏入了清華大學。誰進預科班？除了那些有嚴重家庭問題（例如：殺、關、管）的不在選拔之列，學習成績當然是主要的條件。高六十六屆的很多高幹子弟沒有被選入預科，高幹子弟對此很不滿意，這也成了他們後來在「文革」中批鬥萬邦儒校長的一條罪名。³⁷

在北京的中學中，最早向教育制度造反的就是這些高幹子弟。這些天之驕子，最不愿意受那種教育制度的嚴格約束。他們造反的另一個原因是，這種教育制度以分數取人，從而在實質上偏袒了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和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文革初期北大附中「紅旗」戰鬥隊的一篇文章說出高幹子弟的心態：「我們老子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可他們的後代反而低人三等，連那些資產階級的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黨中央、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自來紅』揚眉吐氣了！往日我們矮三寸，今天是頂天立地的人！」³⁸ 清華附中一張大字報中寫道：「我們工農革幹子弟要當家作主，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們面前必須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凡出身非工農革幹子弟者，我們可以隨意找來談話。他們在我們面前必須矮三寸！」³⁹ 這當然是那些數理化成績不怎么好的人的心聲。有一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幹部子弟當然沒有「矮三寸」的感覺，但階級路線他們也是很分明的，父輩給他們的優越感

³⁷蕭凌：〈清華附中與紅衛兵運動〉，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³⁸米鶴都：《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5頁。

³⁹清華附中高655班核心組：〈做頂天立地的人〉，轉引自米鶴都：《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37頁。

也是存在的。

1966年5月1日到3日，清華附中部份學生到北京西山戒臺寺郊游，請看他們的裝備：指南針、手表、晶體管收音機、照相機……，當時，我們清華的大學生，很多人連臺式電子管收音機都沒有見過，很多人從來沒有打過電話。而這些中學生卻把當時極為珍貴的晶體管收音機帶到郊外。可見他們生活條件之優越。這次郊游形成了批評校黨支部的思想」。⁴⁰ 1966年5月28日晚，他們在醞釀牆報署名，採用了高642班張承志小組牆報的署名「紅衛兵」。次日，5月29日下午，他們在圓明園召開會議，正式通過了「紅衛兵」的統一署名，他們認為學校黨支部執行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共青團這個官辦的青年組織之外，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當然會受到黨組織的打壓。但不到兩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廣播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6月2日，他們就以「紅衛兵」的署名貼出了〈誓死保衛無產階級政權，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公開向校領導挑戰。大字報首先亮出他們的出身和立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后代，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毛澤東思想。對一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懷着刻骨的仇恨。」然後說：「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你們既然挑起了這場鬥爭，那麼好吧！我們來者不拒，堅決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幫，不砸爛黑店，不取締黑市，決不收兵！」署名紅衛兵，下面留下的空白紙中簽名者100多人。6月8日，其它中學三千多名學生到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學校關了大門，僵持了10小時，校門終於打開。外校學生貼出了聲討清華附中黨支部和支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這些大字報也署名「紅衛兵」。⁴¹

6月21日，全校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選舉革命委員會。當工作組要求人選要有更大代表性時，遭到紅衛兵抵制。結果21個革委會委員基本由紅衛兵核心成員組成，主要成員多為高幹子弟。6月下旬，胡克實傳達了劉少奇、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復課鬧革命」和「消化紅衛兵」。工作組宣布成立新的共青團委取代紅衛兵。紅衛

⁴⁰ 《紅衛兵興衰錄》，德賽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路小海序，第17頁。

⁴¹ 同上，第17-21頁。

兵和工作組發生了衝突，6月23日，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強調左派要服從工作組，要團結大多數。6月24日，紅衛兵貼出兩張大字報進行反擊，〈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就是反擊的大字報之一。7月13日劉少奇對胡克實指示：「學生搞的自發組織還是要用黨團組織來代替。黨外、團外，都不能搞秘密組織、秘密活動。」⁴² 官方不承認紅衛兵的合法性，但不能阻止紅衛兵的發展。

十六、七歲的青年，本來有一種自然的叛逆性格，父輩光榮的革命經歷，家庭優裕的生活，使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有一種無比的優越感。他們經常高聲朗誦：「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他們想說什麼？想幹什麼？

他們想說的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他們想幹的就是破「四舊」。

1966年6月24日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說：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和靈魂就是造反。……要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

「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甚么『人情』呀，『全面』呀，都滾到一邊去！」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狂妄了嗎？我們就是要『狂妄』。……革命者以天下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7月4日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明顯地指出了鬥爭矛頭：

今天，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等產生修正主義的東西，都完全消滅了嗎？沒有！

⁴²劉少奇：〈在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時的指示〉，1967年7月13日，載《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9月內部發行，第691頁。

各地各單位的黑線黑幫都完全消滅了嗎？沒有！

現在消滅了的黑線黑幫，將來就不會產生新的黑線黑幫嗎？
不是！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消滅了嗎？沒有！沒有！沒有！！！！？

「再論」中還強調：「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就在我們手里。」

7月27日的〈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高調對毛澤東表忠心：「我們，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文章進一步以「造反」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你是革命者嗎？你就必然歡迎革命的造反、擁護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你是反革命嗎？那就出於階級本能，就必然罵造反，反對造反，抵制造反、鎮壓造反。」

這三篇短文以霸氣十足的文風，用極端的語言，重復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灌輸的極端思想。7月28日，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海淀區中學生大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骨幹成員駱小海和鄭桃生把筆記本上的「一論」、「二論」（本子上沒有「三論」）撕下來交給出席會議的江青，還匆匆寫了一個條子，大意是請毛主席看看是不是反動的。⁴³毛澤東一看，正中下懷。他於7月31日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口授）信：「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的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有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為防止年輕人過於偏激，毛澤東的信中要他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對犯錯誤的人也要給出出路。毛的這封信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在黨內高層公布。毛澤東這封信不僅支持紅衛兵造反，還肯定了這個群眾組織。十七年來，憲法雖然寫上了結社自由，

⁴³ 《紅衛兵興衰錄》，德賽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路小海序，第22頁。

直到這時，才真正有了這一自由。在文革期間，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后春筍地出現了。

毛澤東這封信還是黨內文件，還沒有廣為傳播，此時紅衛兵還沒有聲名遠揚。直到 8 月 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并在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以后，才掀起席卷全國的紅衛兵運動。

第七章

紅衛兵 紅八月



毛澤東和林彪等人乘車檢閱紅衛兵的情形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成為紅衛兵運動的推動力。為了進一步利用這些無知無畏的年輕人，毛澤東運用他的崇高地位，一次又一次大規模地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終於使紅衛兵運動的浪潮激蕩全國。當時還在臺上的各地的官僚們，也利用紅衛兵運動對十七年定下的政治賤民和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迫害。如果說，工作組專政的五十天大抓右派，是文革中的第一輪迫害的話，那麼，紅衛兵運動就是第二輪迫害。和第一輪迫害一樣，第二輪迫害也是以官僚體系為後臺的。這兩輪迫害發生時，各地執政者還沒有打倒，真正的造反派還沒有起來。第二輪迫害的時間是在 1966 年 7 至 9 這三個月。一大批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抄家、打死人、把大批政治賤民及其家屬趕出城市，都是發生在這個時期。

一、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

1966 年 8 月 18 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人大會。這一天，毛澤東清晨 4 點多鐘就到了天安門城樓，他一夜沒睡，為了接見紅衛兵，他半夜叫衛士長陳長江給他找了一件軍裝。其他中央領導人到天安門城樓看到毛穿上了軍裝，有的急忙回去換了軍裝再來，有的打電話讓家裏送軍裝來。林彪先是穿淺灰色華達呢中山服來的，他看到毛穿軍裝時，派人回去拿軍裝換上。¹毛突然穿起軍裝是重要的政治象徵，其他中央領導人必須緊跟。

早晨 7:30 慶祝大會開始。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毛澤東、林彪走出大廳，站在漢白玉的欄杆後面向廣場上的群眾招手示意。這時，「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百萬人手拿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熱情揮動，在天安門廣場上掀起了紅色浪潮。林彪發表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指揮下，好好的聽我們統帥毛主席的話，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順利發展，一定能取得偉大勝利！」周恩來也發表了鼓勵紅衛兵的講話。

¹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118，120 頁

在林彪、周恩來講話以後，聚集在東長安街上的數十萬紅衛兵通過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檢閱。他們已經等待了好幾個小時，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被檢閱的紅衛兵都是中學生。為了多看一眼毛澤東，通過天安門前時，隊伍行進得非常慢。看到毛主席招手，紅衛兵不願意再前進。有的前進了又回來。隊伍在天安門城樓下打轉，像激流中的漩渦一樣。有人提議，讓在觀禮臺上的紅衛兵維持秩序。經毛澤東同意，1500名學生上了天安門城樓。²周恩來對他們說，請你們來有兩個任務，一是毛主席接見你們，二是接見後下去維持秩序。一說接見，紅衛兵們激動了。開始還有秩序，很快就亂了。紅衛兵都往前擠，毛被困在人群中間，臉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一個一個地不停地握手。毛此時已經不是自主地和紅衛兵握手了，伸出的胳膊無法收回，只好任憑別人去握了。後來，汪東興說，那天，毛主席的手被握腫了，好幾天不能寫字。³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3千多人。⁴難怪手被握腫了。

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澤東問她叫甚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答：「是的。」毛說「要武嘛！」當時，毛澤東的話被稱為「最高指示」。「要武」，這個「最高指示」很快傳遍全國。有一位紅衛兵拿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袖章要給毛帶，毛不接受「毛澤東主義」這個提法，沒讓帶。毛接受了紅衛兵袖章，這表示毛澤東接受了紅衛兵。8月18日就成了紅衛兵的紀念日。「十六條」沒有提「紅衛兵」，現在毛澤東肯定了。紅衛兵運動在全國掀起了高潮。

這些中學紅衛兵雖然年紀小，後來被稱為「老紅衛兵」。這是因為它出現的時間早。「老紅衛兵」以高幹子弟為骨幹，「他們反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其中一些人反對「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的政策，帶有鮮明的血統論的色彩。因而反對當時的校

²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206頁，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還有其他說法：秦曉鷹、馬利《夢幻紅八月》說是事先安排、拿著紅請帖上去的。

³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45頁。

⁴ 駱小海：《紅衛兵興衰錄·序》第15頁，《紅衛兵興衰錄》，宋柏林著，德賽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

領導。說他們是老「紅衛兵」，是區別於 1966 年 10 月以後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出現的紅衛兵。

8 月 18 日是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在 8 月 31 日、9 月 15 日、10 月 1 日、10 月 18 日、11 月 3 日、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11 月 25 日、11 月 26 日多次接見了紅衛兵，也有人把 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合稱一次，把 11 月 25 日、11 月 26 日合稱一次，稱為八次。八次共接見紅衛兵 1200 多萬人。各次接見的方式不一樣，有時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紅衛兵從天安門前通過；有時紅衛兵站在馬路兩側，毛乘敞篷吉普車通過；有時紅衛兵乘大卡車通過天安門下，毛站在城樓上檢閱。

這麼多次如此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其中有一些曲折。

9 月 15 日接見紅衛兵的前三天，毛突然病了。9 月 13 日晚 7 點，毛給林彪、周恩來、陶鑄寫信，說「臥病三天，尚有餘溫，今天略好」。還說，如果後天能起床，就接見，如果不能起床，就請林主持，毛就不去了。9 月 15 日，毛還是帶著病後初愈的身體接見了百萬紅衛兵。

10 月 1 日晚 7 點多，毛澤東的車被紅衛兵圍在西長安街到南口。頃刻間，毛被包圍在人海之中。在危急時刻，林彪下車高喊：「我是國防部長，讓我們的车開過去，到天安門參加晚會！」紅衛兵也不理會，包圍圈越來越緊。局面難以控制。此時，警衛三師師長急速調來一個團的機動部隊，強行為毛澤東解了圍。

10 月 18 日，毛在接見百萬紅衛兵時，一位男紅衛兵跳上了毛左後側的吉普車（楊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還要繼續跳到毛的車上，說：「我是毛主席家鄉的人，我要上車看毛主席。」總參作戰部處長、首都工作組工作人員蔡洪江把這位紅衛兵拉住了，並推了下去。

11 月 25 日，氣溫零下 4 度，毛在凜冽的寒風中站了 4 個小時，天安門廣場接見了 65 萬紅衛兵。

11 月 26 日，毛乘車在釣魚臺、西郊機場接見了最後一批 185 萬紅衛兵。路被堵，毛的車不能回中南海，只好開向玉泉山，讓毛暫時在玉泉山休息，但到玉泉山下，車又被圍，警衛只好扶著毛步行進入玉泉山。這一次，散場混亂，一座小橋被壓斷，踩死了幾個人，擠傷

的更多。

由於在接見時人群擁擠，每一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一車一車的鞋子，踩爛的手錶每回都有好幾十塊。每一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

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北京要提供住宿、飲食、交通，北京的負擔很沉重。周恩來動員全北京市的力量解決了這些難題。每次接見都是一項複雜的組織工程。11月10日讓紅衛兵乘車通過天安門，毛在城樓上檢閱，需要6千多輛汽車。連夜從海陸空部隊和瀋陽、北京、濟南等軍區各抽調1千輛汽車。紅衛兵到北京串聯，數百萬人擠在火車上，影響交通運輸，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毛為什麼對接見紅衛兵這麼重視？他認為這是發動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好方法。他相信，他親自接見的紅衛兵回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就能把全國的群眾發動起來。如此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毛還有更深的考慮：他認為蘇聯之所以變修，一個原因是蘇聯人親自見到列寧的人太少了，讓更多的年青人看到他毛澤東，就可以防止他死後中國變修⁵。毛澤東以73歲老年之軀，不辭勞苦地一次又一次接見紅衛兵，頗有一點宗教色彩。他像佈道的主教一樣，將他的思想傳播到年輕人之中，希望在與他同代的官僚們去世以後，下一代就會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國社會。被接見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禮一樣，無比光榮，無比幸福。

在毛八次接見紅衛兵的同時，紅衛兵可以到全國各地「串連」。中共中央在1966年9月5日發出的通知中規定搞大串連「一律免費坐火車」，而且對大串連的人的生活補助也「由國家財政中開支」，早已停課的大中專學生便紛紛外出串連。開始是北京的紅衛兵到外地去「煽風點火」，支持各地的造反派，衝擊各地打擊造反派的領導人。因為當時各地造反派還是少數派，處於被壓制、被圍攻、被打擊的地位。後來更多的是外地學生到北京來「取經」，上訪，等待毛主席接見。幾千萬年青人流在全國各地激蕩，發動群眾，交流經驗、衝擊官

⁵張輝燦、慕安：〈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內情〉，《炎黃春秋》2006年，第4期。

僚體制。當然，對年青人來說，「飽覽祖國大好河山」也是不可少的。我也三次到外地串聯，先後到了東北、西南、華東、中南等十個城市和部分農村。火車擁擠不堪，坐位坐滿了，座位底下的空隙睡滿了，過道站滿了，廁所裏也擠滿了。一些人不得不雙腳分開站在座椅背上，雙手緊握住上面的行李架。大串連給運輸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中共中央又提倡徒步串連，又稱為「長征」。大批青年人組成各種長征隊，走遍大江南北，朝覲延安、韶山等革命聖地。各地設立長征接待站也是住宿免費。全國大串連從1966年8、9月持續到1967年底。1967年3月中共中央雖然發了停止串連的通知，但串聯還繼續，1967年8月我到湖北串連乘車還是免費的。到1967年底，不能免費乘車、免費吃住，大串連才停止。

二、「血統論」風潮陡起

中國共產黨很看重家庭出身，認為家庭出身對一個人的影響最大。大饑荒發生後，在追究一些縣委書記的責任時，有的縣委書記娶了地主女兒做妻子，也當作發生大饑荒的一個原因。周恩來在很多公眾場合檢討自己的家庭出身（他說自己是封建官僚出身，要不斷改造自己，說看一個人要查三代），以此來表白他的政治態度。當然，在正常情況下，共產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但是，「個人政治表現」如何，沒有明確的標準，只能由單位領導決定。雖然有「重在表現」，家庭出身總是一個人終生揮之不去的政治標記。有些老紅衛兵還把「重在表現」說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義階級路線」，加以批判。

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份論」進而向「血統論」演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產階級（前五種人被稱為「黑五類」，紅衛兵又將資產階級列入其中，成為「黑六類」）等是政治賤民，他們的子女也受歧視。與「黑五類」相對應的是「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當時最光榮的家庭是革命幹部：簡稱「革幹」。工人、貧農、下中農是依靠對象。革幹子弟是天之驕

子。當然，他們中間也有一些優秀分子，但不管是不是優秀，他們對出身也是很看重的。他們認為自己是革命先輩的後代，是當然的革命接班人。當然，時代變了，他們中的多數並不算像他們父輩一樣當革命家，而是要在國家建設中挑起大樑。所以，革幹子弟大在大學裏都是學習工程技術中的新興專業，當時列為「保密專業」。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強調，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其他勞動人民的，優先選拔升入高等學校。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一定要經過嚴格審查，對於那些政治上確實表現好的，也允許挑選適當數量的人升入高等學校。⁶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隨著中學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血統論」氾濫成災。紅衛兵只對「紅五類」開放，「黑五類」是不能參加的。

清華附中齊向東的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中說：「我們要造反，要奪權，要組織階級隊伍幹革命，就是要大講階級路線，就是要講成份！」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一成立就講究出身。他們在題為〈「自來紅」們站起來了〉的大字報中寫道：「有人誣衊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你們的誣衊使我們無上光榮。你們說對了，老子是哪個？大名就叫『自來紅』。我們從小長在紅旗下，或生長在紅色的部隊、家庭環境中，從小就飽受革命的教育。……我們純粹是無產階級的血統，我們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後一代。！而在反革命、大右派的環境中生長的你們，整天在家裏受到的是黑、黃、白等雜七雜八的教育。你們不改造，就會『自來黑』、『自來黃』、『自來白』。……革命的重擔落在我們的肩上，政權一定要我們掌握！這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最大權力，誰反對我們，就堅決專他們的政，要他們的命！」⁷

1966年7月1日，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紀念建黨日，對參加活動的人提出了苛刻要求。參加者回憶：「一律是幹部子弟，而且儘量穿黃軍裝。大會充滿紅色恐怖，臺上都是黃軍裝。……自編的『造反歌』響徹雲霄。真是大長了工農幹部子弟的志氣，真是大滅

⁶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第56-58頁。

⁷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2-33頁。

剝削階級子弟的威風。」⁸造反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地)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忠於革命忠於黨，刀山火
海我敢闖。革命後代舉紅旗，毛澤東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
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殺！殺！殺！——嘿！

幹部子弟中刮起「血統論」的風潮，從中學進入大學。

8月初的一天，我正從二號樓宿舍走出來，看到從圖書館、大禮堂那個方向走過了一支幾十人的隊伍，手裏舉著彩旗，一邊行進一邊高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呼口號）滾、滾、滾！滾他媽的蛋！」他們在一號樓、二號樓宿舍區轉了一圈後向西南方向去了，他們喊的前兩句是一幅稱為「鬼見愁」的對聯。他們認為，見了這個對聯發愁的就是「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對聯罵為「混蛋」，還不能「發愁」。這個對聯在學生中引起爭論，我是不贊成這個對聯的。

8月2日晚上，清華大學大禮堂舉行關於「對聯」的辯論。劉菊芬⁹主持會議，會上一邊倒、一言堂。還高喊「橫掃一切混蛋！」的口號，說：「這個對聯完全體現了黨的階級路線，……對聯從精神到內容都是符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大禮堂辯論的時候，誰要發言，首先就是要報出身。不主動報的，台下的聽眾就齊聲喊，逼著你報出身。聽到「革幹」「革軍」，就報以熱烈的掌聲。聽到「工人」「貧農」，也有掌聲，但熱烈程度小多了。要是「中農」「職員」，掌聲就寥寥無幾了。出身不好的，沒幾個人敢上臺的，即使上臺也要被噓下來。聽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就喊：「黑七類子弟算混蛋，紅五類子弟算背叛」。¹⁰

⁸ 《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賽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32-33頁。

⁹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劉甯一之女，自控系學生，當時是保守派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

¹⁰ 本書作者也進入了大禮堂，看到這種氣氛，聽一會兒就退出來了。



文革中上海某街道組織成員正在鋸掉高跟鞋的鞋跟

在紅衛兵中，對「對聯」也有不同的看法。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接見對對聯持不同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時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面」。他把那副對聯作了修改：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改為「理應如此」。陳伯達向紅衛兵們解釋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8月6日天橋劇場舉行了關於「對聯」的大辯論。出席會議的江青，建議把對聯改為「父親革命兒接班，父子反動兒造反」橫批「理應如此」，紅衛兵也沒有接受。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在辯論會上說：「你們一切評論的、一切辯論的、本質的東西就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而不是對聯要不要改幾個字的問題……你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到處革命，就是為了這一階級路線——毛澤東的階級路線而奮鬥，我對你們很敬佩！」

8月12日，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正文之子，時任北京工業大學三系文革組長）與別人聯名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大字報論述了「血統論」的合理性，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作為「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實行，要使之「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8月20日譚力夫又在北京工業大學辯論工作組和階級路線時作了講話：他公開聲明擁護工作組，說工作組一進校，「黨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就照亮了北工大」，他認為對聯「大長了好漢們的志氣，大滅了混蛋們的威風」，「我們要大聲疾呼『好得很』！」譚立夫口才很好，每講一段就引來熱烈的掌聲。譚立夫咄咄逼人地問：「到底有沒有右派？工大這麼個爛黑窩，怎麼沒有右派？可能今天這裏就有右派！（熱烈鼓掌）……」「有人對黑幫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現』給他那麼多甜頭，怎麼恨得起來？可是對工作組，對一些老革命同志，卻恨之入骨。知道哪一個犯了錯誤，大有雀躍之勢。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高興甚麼？他媽的！（熱烈鼓掌）」「一講階級路線，他也來講幾句。你怎麼配呀！（掌聲）說起階級路線，我們應是『既得利益者』了。同志們舉一個例子，很簡單：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鬥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麼會是同一種心情？！（熱烈鼓掌）同志們，這就叫『階級烙印』。」「我們對你們的老子專政，實行了仁至義盡的改造政策，給他

們重新做人的機會；……你們現在搬出『平等』『博愛』的垃圾來大講，我看還是到廁所裏講去！（熱烈鼓掌）就是團結，怎麼團結？鬥爭中求團結、先鬥你，七鬥八鬥，鬥得你背叛家庭，改造了思想，我們就團結了。（掌聲）」¹¹幾天以後，康生夫人曹軼歐給譚力夫打電話說：「阿寶（譚力夫的小名），你在學垓那個講話，王任重同志拿給康老看了。你康伯伯誇你講得好。」¹²

譚力夫講話受到幹部子弟的熱烈追捧，他們廣為傳播。劉濤、賀鵬飛領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大量印刷，向全國各地散發。譚力夫講話對「血統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血統論」的激勵下，一些幹部子弟穿著褪色的軍裝，提著銅頭皮帶，四處尋找「階級敵人」。在一些中學裏，對出身不好學生進行批鬥、拷打。有些地方上火車、汽車要自報家庭出身，進旅店、上醫院也要以成份論高低。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貼在教室牆上。紅衛兵命令10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子繞過這10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10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被指定坐在地板上。紅衛兵命令「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他們，把墨汁潑在他們身上。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遭到「鬥爭」和侮辱，服安眠藥自殺，後被搶救過來，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〇一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初三女學生吳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紅衛兵指控她撕了一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一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棟

¹¹文革後譚力夫改名譚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判《血統論》，署名老紅衛兵，把他血統論的主張推給了江青。1987年譚力夫以大校軍銜轉業到鄧朴方麾下的康華公司任人事部總經理，後任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館長、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和文化部辦公廳主任。

¹²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口述歷史之一》，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第295頁。

了起來)，因而遭到毒打，紅衛兵還把她和後來被打死的美術教員陳葆坤關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能獨立生活，始終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和受到種種侮辱。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 1957 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紅衛兵把她從廁所拉出來，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她的過程中紅衛兵突然把椅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臺上淋雨。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一學生楊愛倫，學習成績優秀還有文藝特長，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面被推來推去，強迫她寫「交代」，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¹³一星期後，8 月 8 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 1957 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她，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 15 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毒打。等紅衛兵回家吃晚飯時，她掙扎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不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甯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¹⁴

血統論在大學也有一定的影響，但不像中學那樣嚴重。當時，有人主張在清華大學成立「貧下中農子弟協會」（簡稱「貧協」，當時有

¹³原清華附中紅衛兵卜偉華說：「經向楊所在的高 652 班同學瞭解，並無此事。」卜偉華：〈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印章及所謂「清華附中模式」〉，載《昨天》第 18 期。

¹⁴原清華附中紅衛兵卜偉華說：「經向楊所在的高 652 班同學瞭解，並無此事。」卜偉華：〈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印章及所謂「清華附中模式」〉，載《昨天》第 18 期。

的學校有革幹子弟的組織。)，我班貧下中農子弟沒有人參加、這本是頭腦簡單的中學生做的事。「血統論」進入大學，除了持政治偏見的某些清華大學紅衛兵以外，沒有多少人理睬。8月4日周恩來在清華2萬人大會的講話中表示不支援在大學裏搞「貧協」組織。

「血統論」，通俗的說法是「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就打洞」。這種說法即違背了歷史常識，也違背了「遺傳和變異」生物學原理。為什麼這種說法能夠一時成為風潮？因為他們要世襲父輩打來的江山，要世襲父輩的特權。血統論實質上是宣揚權力世襲、利益世襲、社會地位世襲，是門閥權貴的願望表達。那些自認為「血統高貴」的高幹子弟摧殘他們認為「血統低下」的學生。那就不僅僅是特權世襲了。而是和希特勒的種族滅絕行為沒有什麼不同。「血統論」雖然風行一時後偃旗息鼓，但是，他們「血統高貴」的自豪感並沒有消失，他們的世襲要求總是可以滿足的。到了1990年代，在改革開放中，在文革中血統論的鼓吹者，不少人當了高官或成了大富豪。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在一切政策和制度的變革中，他們總是占盡了有利的先機。

1967年春天，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中學生進行軍訓。3月27日，負責學生軍訓的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對中學生中的一些高幹子弟的一次講話，他說：「你們在座的全是高幹子弟、幹部子弟，你們的爸爸媽在紅軍時代、抗日戰爭、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很大貢獻，你們要支援他們的精神」，還提出了「要接父母的班」的看法，從而引起了爭論。4月3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學生代表開會。陳伯達批評李鍾奇的思想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為了平衡中學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見了另一批中學生代表。本來家庭出身不同、對軍訓和文革的看法不同的中學紅衛兵就以這兩個日子成為「四三派」和「四四派」。從家庭出身看，「四三派」成員中「紅五類」比「四四派」要少一些，幹部子女更少。「四四派」中幹部子女要多一些。「四三派」反對「血統論」的人多一些，「四四派」傾向「血統論」的人多一些。「四三派」是中學生中的激進派，對軍訓團不滿，比較傾向大學生紅衛兵的「三司」的觀點。「四四派」比較支持恢復秩序。「四三派」中一些人同意

這樣的看法：「這些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和本來就是投機的革命分子，他們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就形成了特權人物，像各個歷史時期一樣地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很顯然，特權人物竭力再分配、再變革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的實質。……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的爆發。」¹⁵在1967年4月之後，北京的中學紅衛兵中的「四三派」、「四四派」鬥爭不斷。

三、清華「8·24」事件

我親歷的紅衛兵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清華「8.24」事件。

8月20日前後，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張大字報〉在清華學生中傳開，8月23日、24日，出現了一些「炮打」劉少奇的大字報。例如：〈改組黨中央 保衛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炮打劉少奇〉、〈捨得一身剮，敢把劉少奇拉下馬〉、〈厘清北方局中的黑線〉等。

清華大學「臨籌」¹⁶認為這是右派翻天，清華大學紅衛兵負責人賀鵬飛聯絡清華附中紅衛兵等12所中學的紅衛兵採取了強制行動。

8月24日下午，12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清華附中集合，召開誓師會，賀鵬飛在誓師會上說：「清華大學有一股反對中央領導人的妖風，我們要誓死保衛黨中央。只許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他佈置任務：先看守大字報，並抄錄或照相，以備秋後算賬，然後限令作者在24小時撕去大字報。下午4點50分，12校紅衛兵列隊跑步進入清華，嚴密封鎖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他們先廣播「安民告示」：「我12校紅衛兵大軍今天下午5點開進清華大學，消滅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們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我們矛頭直指混蛋，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誰敢阻擋我們大軍，誰敢窩匪，我們就消滅誰！一切願意革命的人們，我們歡迎！一切膽小

¹⁵ 〈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四三戰報》第1期，1967年6月11日，轉引自米鶴都的《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78頁。

¹⁶ 「臨籌」，即清華大學工作組組織的「清華大學文化革命委會臨時籌備組」的簡稱。由劉濤（劉少奇之女）、賀鵬飛（賀龍之子）、李黎風（李井泉之子）、喬宗淮（喬冠華之子）等高幹子弟為領導成員。

鬼，請你們躲在家裏，切勿自相驚憂。……」接著廣播「最後通牒」：勒令大字報作者 6 點以前撕去自己貼的有關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移入內部館。否則一切後果你們負責。其實，明明是反劉少奇的大字報，他們硬說是反毛主席的，當時沒有反毛主席的大字報。

有的學生對他們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就被這些紅衛兵抓住，強制他們圍著大禮堂前面的草坪遊街，然後用皮帶抽打。到晚上，所有的大字報被撕得精光，並且貼上了「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還對一些貼劉少奇大字報的「戰鬥小組」進行搜查。

6 點，在賀鵬飛的指揮下，紅衛兵們推倒了清華大學標誌性建築二校門。與此同時，中學紅衛兵和清華大學紅衛兵到「黑幫分子」和「五類分子」家裏抄家，對他們進行拷打。強迫中層以上的幹部到拆掉的二校門搬運磚石。跑得慢的用皮帶抽打，背不動磚石的而倒在土也上，就拉起來用棍子、皮帶瘋狂地抽打。在抽打和呵斥聲中，受害者連滾帶爬，哀聲慘叫。

這次暴行的規模和殘酷程度遠遠超過了北京大學的「6.18」事件。黨委副書記劉冰回憶了他挨打的情況：「他們把我的眼睛蒙了起來，幾個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腦袋往下摳，推著我往前走，並用皮帶抽打我的脊背，邊走邊打。……後來進了一個房子裏，不打了，讓我跪下，去掉蒙眼的毛巾後才知道是階梯教室。各系的總支書記、校黨委各正副部長、校行政各處處長，都集中在這裏，成行地跪在地上。天將拂曉的時候，把我們轉移到科學館，又轉移到了生物館。……把我們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後強迫我們互相打，不願互相打的，就打耳光，用棍子打脊背……¹⁷文革前擔任黨委宣傳部長的羅征啟記下了他經歷的一場劫難：

8 月 24 日晚上，……幾個人把團委書記張慕津架到審訊室，我剛想看一下，就挨了一下抽打，「不准看！」我就聽審訊室裏很重的抽打聲音和張慕津的呻吟。過了一會，一學生從審訊室裏出來，大聲說：「張慕津想逃過群眾的專政，被我們抓到了，現在他就要從審訊室爬出來……」這以後，走廊的南端又傳來一陣

¹⁷劉冰：《風面歲月—1964—1967 年的清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第 83—85 頁。

喧鬧，原來是幾個手執皮帶、木棍的人要黨辦主任何介人和宣傳部第一副部長林泰兩個人對打！我聽到喊聲：「使勁！」……接著審訊室內忽然傳出一聲呼叫：「賀鵬飛來視察了！」幾個人走出審訊室到樓梯口迎接。我們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來，跪好，低頭，手背在身後，頭距地面不能超過 20 公分，也不許頂在地上。快！」剛剛「整理」好，賀鵬飛就上來了，我還來不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像賀龍元帥，腳踏大皮鞋，手提一條皮帶。審訊室裏的人像是彙報什麼。賀鵬飛從我面前走過時看見我因為支撐不住他們的姿式，已經把頭頂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頭，並且厲聲說：「不許頂在地上」他這一踩，我頭上已經結了疤的傷口又滴下許多血。……我被帶回生物館，從昨晚搬運二校門的垃圾到現在，連水都沒喝一口，可以說是饑渴交迫。這時由幾個「革命群眾」押解，幾個「黑幫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幫分子們排成一排，一個學生在前面訓話：「你們要吃飯嗎，那就聽好，你必須說：『臭黑幫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 XXX 感謝毛主席給飯吃。』聽清楚了嗎？試一下。」第一個是錢偉長教授，他說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話語以後，那個學生又喊：你還得加一個『大右派』，重來！」於是錢先生又來一遍，加了頂帽子，領了口糧，站在原地等候。這時我認出這個學生好像是工程化學系的，以後工化系的輔導員告訴我，他姓楊，是個大個子。「第二個！」他喊。第二個是我，我沒有加多甚麼就過了關。第三個劉小石，也過了關。第四個是行政處長李思問……。下午，又有了新花樣，一個叫馬楠的學生帶了兩個「隨從」，來到生物館，審問我們這些人。聽說這馬楠是軍人後代，綽號叫「馬楠將軍」，到處打人抄家。第一個叫走了錢偉長……過了一會錢偉長回來了，我看他後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慘不忍睹。……忘了是第幾個，叫到我。我走進審訊室，馬楠嘴裏叼著煙捲，兩條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副兵痞模樣，一邊站著一個瞪圓了眼睛的大漢……¹⁸

¹⁸羅征啟：〈被遺忘了的「紅色恐怖」——記 1966 年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2008 年 8 月 20 日修改稿）。

文革中清華有人貼大字報，說蔣南翔「開後門」讓賀鵬飛進了清華。1978年，蔣南翔在天津市當革委會副主任，單身住在新華分社附近的第二招待所，清華校友常去看他，我問他：賀鵬飛上清華是不是後門？他講了事情的經過。有一天，賀龍親自給他打電話，說「南翔同志啊，我家小龍想上清華，你看怎麼辦呀？」蔣南翔回答：「那考一下吧？」結果考得很糟糕，蔣就讓他在附中補習了一年才進了清華。畢竟是帥門之後，文革後，賀鵬飛出任海軍副司令，中將。可惜他英年早逝（54歲），否則必是上將。

對清華「8·24」慘案，清華附中紅衛兵宋柏林日記作了記載：「與12個學校加上大學各系的紅衛兵，大鬧清華園。拉倒二校門，撕掉了那些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報。清華大學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¹⁹

第二天，中學生紅衛兵到清華大學遊行，並到一些「黑幫」家中揪鬥「黑幫」。強迫「黑幫分子」、「黑五類分子」和中層以上幹部繼續到二校門搬磚，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他們。校園裏貼出了〈8.24行動好得很！〉、〈就是要「紅色恐怖」〉、〈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

25日，清華「八八派」（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部分人到中央接待站（西安門大街22號）反映賀鵬飛帶領中學紅衛兵在清華搞「紅色恐怖」的情況。身穿灰色毛料中山服的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敷衍上訪的學生，他對賀鵬飛等人的行為沒有任何批評。

清華「八二四」事件標誌著：中學紅衛兵從造本校領導的反、造工作組的反轉向保衛劉少奇和他們自己的父輩。這時，他們的父親相繼被整。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把手王銘的父親受羅瑞卿的牽連被打倒。其他高幹子弟的父親也岌岌可危。前些時，他們批判校長、批判老師，現在批判到他們父親頭上來了，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怎麼能理解？何況，父母對形勢的看法對他們也會有影響。

清華二校門被賀鵬飛等推倒以後，1967年五一前夕，蒯大富領導

¹⁹ 《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紅衛兵手記》，德賽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第124頁。

的「清華井崗山紅衛兵總部」在這裏建成了一尊巨型毛澤東塑像。蒯大富想請林彪題詞，林彪應允。林彪的題詞「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被刻在主席像的底座上。「五一」節這天，《人民日報》等多家報紙都為此塑像發了消息，標題是「清華園升起永遠不落的紅太陽」。這是文革中全國第一座毛澤東塑像，在這以後，從北京到邊遠城鎮，從機關大院到公共場所，相繼建立了成千上萬的毛澤東塑像，這些塑像體量越建越大，材料越來越貴：從鋼筋水泥到大理石到不銹鋼。

四、破「四舊」惡風肆虐

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寫道：「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這就是紅衛兵破「四舊」的指導思想。在「十六條」發佈以前，毛澤東曾多次講過這個思想。

破舊立新有著長遠的源流。「五四」以來的激進思潮是不斷否定中國傳統的。1949年以後，中共政權利用意識形態機器不斷批判傳統，批判道德繼承論。文革中，中學生和社會上其他一些人用暴烈的手段「砸爛舊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破壞。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紅衛兵隊伍迅速擴大，大批紅衛兵走上了街頭，雷厲風行地執行破「四舊」的任務。

他們看到「奇裝異服」和「資產階級的」髮型，就強制改變，對燙髮的勒令剪掉，否則就按在地上剃陰陽頭²⁰。天津的紅衛兵「通令」全市禁止理「怪髮型」和穿「瘦褲腿」。天津街頭有一幅對聯：上聯是「剪子不留情，毀你瘦褲腿」，下聯是「推子要革命，剃你阿飛頭」，橫批是「興無滅資」。

²⁰陰陽頭，即強行將頭髮剪一半留一半，形成一邊白一邊黑的形狀。這是文革中通行的侮辱人格的辦法。

8月19日，北京紅衛兵砸爛了「全聚德」烤鴨店的招牌，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招牌。把烤鴨店的餐廳、走廊、職工宿舍掛的山水、草木之類的畫全部換成了毛主席像。在供外國人吃烤鴨的門口，原來掛的一幅畫是一隻大鴨子，紅衛兵把它撕了下來，換上了毛主席語：「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們把一張大標語貼在門前：「歡迎工農兵進餐」。並且要求烤鴨店增加五種菜，最貴的2角5分，最便宜的8分。

紅衛兵要求大家改掉帶「封、資、修」色彩的名字，用革命化的名字代替。一些人為適應形勢自己主動地改了名字。名字中有花、玉、金、寶等都改了過來，衛東、繼紅、赤兵、永革、反修等成了時髦的名字。商店、街道、廣場都改了名字。蘇聯大使館門前的一條路原來叫「揚威路」（也曾叫友誼路），紅衛兵改為「反修路」，並在蘇聯大使館門前舉行大規模的「反修大會」，「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震天價響。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被改為「援越路」。「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街」，舊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以經營古籍、字畫而聞名的榮寶齋的櫥窗裏，紅衛兵貼上了「黑畫店」的大標語。

在天津，「勸業場」改為「人民商場」，「惠中大飯店」改為「工農兵飯店」，「中原公司」改為「工農兵百貨商場」，「民園體育場」改為「人民體育場」，「玉清池」改為「工農兵浴池」……紅衛兵還建議把和平路改為反修路、革命路，市內各區也一度改了名稱。有些紅衛兵說：「我們砸爛的不單是商店名稱，砸爛的是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陳腐爛貨，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反動毒素，是散發腐朽氣息的陳規陋習。」²¹

「破四舊」的惡浪席捲各大書店和工藝美術商店，紅衛兵在那裏進行大清查、大銷毀。紅衛兵沖向寺廟、公園、博物館，進行大清理、大掃蕩。大批文物遭到摧毀，一些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被破壞。在天

²¹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自印本，2011年，第89頁。



文革期間，北京「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



破「四舊」惡風肆虐，1966年11月28日，北京紅衛兵在山東曲阜砸毀周公等古人的雕像。

津睦南道新華社天津分社西鄰一家，紅衛兵抄出一個翡翠西瓜，當場砸碎了。

「破叫傭」還要求改變一些多年形成的傳統作法，有時鬧到愚蠢的地步。例如，紅衛兵要求交通警用《毛主席主語錄》代替指揮棒指揮交通，他們認為，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指出正確的方向。紅衛兵這個幼稚的要求竟得到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批准。在一段時間，北京大街上出現了一個奇特的景觀，站在十字路口的員警，右手緊握《毛主席語錄》貼在胸前，汽車來了，平伸握著紅寶書的右手，左手指揮交通。紅衛兵還要求改變十路口的紅綠燈的功能，將綠燈放行改為紅燈放行。因為紅色象徵革命，不應當是阻擋前進方向的顏色。這個要求反映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邀請提這個要求的紅衛兵談話，才說服他們。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有紅衛兵提出要求：遊行隊伍不能從東向西行進，應當從西向東行進。因為西方代表資本主義，我們的隊伍怎麼能向資本主義行進呢？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是這樣說服紅衛兵的：我們習慣用右手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招手致敬，如果隊伍行進方向倒過來，就得用左手向毛主席致敬，多彆扭啊，同學們試試看？周恩來說：毛主席檢閱部隊時，向右看得變成向左看，這是不行的。他們這才甘休。²²

在「破四舊」過程中，伴隨著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紅衛兵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黃金和白銀，還在抄家過程中打死了很多「階級敵人」。一些擁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的家庭被定為房產主。紅衛兵發出命令，讓人們將房產交公。有房產的人為了扔掉「房產主」的帽子，到房管局上繳房產證，房管局門前排成了長隊。北京的 52 萬間私房被沒收²³。上海 124 萬平方米私房被沒收²⁴。

據不完全統計，在 1966 年 8、9 月，北京的紅衛兵共抄家 11.4 萬戶²⁵，抄走黃金 10.31 萬兩白銀 34.52 萬兩，現金 5,545.99 萬元，

²²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272-273 頁。

²³《北京晚報》，1987 年 2 月 23 日。

²⁴ 1955 年 4 月 9 日《人民日報》，全國政協委員馬永江發言。

²⁵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北京簡史》，北京出版社，2011 年，第 113 頁。

文物和玉器 61.36 萬件。²⁶抄家沒收的更多是生活用品。從鋼琴到席夢思床，從高跟鞋到尼龍襪，無所不有。一些體育館的運動場上抄收品堆積如山。²⁷從 1966 年 8 月 23 日到 9 月 25 日止，上海市共抄家 15.77 萬戶，占全市總戶數 241 萬戶的 6.5%。其中市區 11.45 萬餘戶，占市區 139 萬戶的 8.2%。²⁸據不完全統計，在武漢市共抄家 21,000 戶，抄出黃金 110 斤，白銀 1,800 斤，銀元 26.7 萬塊，現金存款 440 萬元，查抄打鬥致自殺案件 112 起，死亡 62 人，遊鬥折磨致死 32 人。²⁹到 10 月 13 日，濟南市抄家 20,075 戶，占全市總戶數的 13.11%。³⁰後來，有些地方將查抄財產退回給被抄戶，江西於都縣 1967 年 5 月 15 日成立「清理破四舊財物清理小組」，向被抄戶退回黃金 13 斤 9 兩、銀圓 23,135 枚、銀毫子 9,726 只、雜銀 275 斤 6 兩。但是，在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中，6 月 25 日又一次大抄家，這些被退回的財物又一次被抄走。³¹

據不完全統計，從 6 月至 10 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 428 億元，黃金 118.8 萬餘兩、古董 1 千多萬件，挖出所謂的「階級敵人」1.66 萬餘人，破獲「反革命」案犯 1,700 余宗；從城區趕走的「牛鬼蛇神」達 3,900 多萬人。³²

很多地方抄家是由當地黨委有組織地進行的。8 月 29 日到 9 月 3 日，上海市第一次大規模抄家。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的默許下進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後實際組織者。抄家物件的名單由公安局提供。各區名單集中後，再按所屬區分配下去；同時分配下去的還有五萬分之一的軍用上海地圖，以便紅衛兵尋找被抄家戶的地址。³³

破「四舊」衝擊了民主黨派，一些紅衛兵下令解散民主黨派，通

²⁶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71 頁。

²⁷米鶴都：《心路：透視共和國的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第 150 頁。

²⁸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105 頁。

²⁹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群眾的文革記憶》。

³⁰中共山東省婁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編著：《山東「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2001 年 3 月。

³¹《於都縣誌》，新華出版社，大事記，第 47 頁。

³²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文史精華》2008 年，第 1 期。

³³李通：《革命造反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 年，第 108、110 頁。

令收繳民主黨派的大印，多個民主黨派的大印都被紅衛兵收繳了。一些民主黨派領袖被批鬥。有的民主黨派辦公地被迫關了門。據統計，各民主黨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有 100 多人被紅衛兵批鬥或抄家，占總數的 36.5%。³⁴

宗教也當成「四舊」受到衝擊。共產黨是信奉無神論的，在文革前，宗教就受到破壞。以西藏為例，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 2,500 餘座，民主改革以後減少了 97%。無數佛像、佛經、佛塔被燒毀，被拋入水中，甚至把《大藏經》用於澆肥，把佛像、佛經用於制鞋原料。³⁵文革前內地的大量寺廟也遭到破壞。文革前，政府只是特意保護一些有名的寺廟和教堂。文革中，這些特意保護的寺廟、教堂、經書也被毀壞。在被破壞寺廟時，當地農民和一些和尚也參與了破壞活動。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珍寶玉馬被砸爛。

在破「四舊」中，文物、古跡大量被毀。北京 1958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 6,843 處文物古跡中，有 4,922 處被毀，其中大多數毀於 1966 年 8、9 月間。³⁶全國各地名勝古跡被破壞的不計其數。1966 年 11 月，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帶一些人，破壞了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這只是一個開始。1968 年 10 月，曲阜師範學院提出了「開發孔林，創辦五七農場」的具體目標，在這裏開荒植地、挖防空洞，挖地三尺，使孔林遭到根本性的破壞。有人要衝擊故宮博物院，周恩來下令保護起來了。

紅衛兵破「四舊」的戰績得了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肯定。8 月 23 日，《人民日報》在一版發表新聞就是「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副標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

³⁴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淮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 年，第 233 頁。

³⁵ 十世班禪大師：《七萬言書》。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公司，臺北，2014 年，第 158 頁、第 120 頁。

³⁶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淮劫》，香港中文大學，2008 年，第 233 頁。

都街道，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時在一版頭條、二條位置配發了兩篇社論。一篇社論的題目是「好得很！」，另一篇社論的標題是「工農民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

在宗教問題上，周恩來還算清醒，他在 1966 年 9 月 15 日接見西安學生時說：「北京大字報在街上貼了很多，有的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而鬥爭〉的大字報，這怎麼可能呢？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這是民族習慣。西北地方少數民族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在我國的西南邊，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蘭教的，東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蘭教的有 4 億多。伊斯蘭教是意識形態問題，是民族習慣問題。」³⁷但是，有些地方的清真寺被毀。

五、千家啼哭萬戶愁

1966 年 5 月成立首都工作組，其任務是保證首都安全。組長是葉劍英，實際由周恩來親自領導。清查清理社會人口、清查民間槍支彈藥，是他們的重要任務。³⁸這些任務由街道和派出所實施。

清查清理社會人口，就是把一些「有問題」的居民清出首都，當時叫「遣返」，即強制性地送回原籍。幾年以前，彭真就提出了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目標³⁹。真正付之行動是文革之初。這一行動造成了千家萬戶家破人亡。文革中第一批「遣返」發生在 1966 年 5 月，即首都工作組成立的當月，就動員了第一批「四類分子」去新疆等地。各大城市仿效首都。天津市公安局也將 4,500 多人遣返農村，監督勞動。⁴⁰文革初開了這個頭，文革一深入，大批「有問題的人被趕出了城市。這些被趕出城市的人們，在農村沒有住房，沒有土

³⁷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版。

³⁸首都工作組的其他任務是：負責警衛部隊的配置和調動；負責社會治安；清查民間團體無線電收發，清理收繳私設電臺；加強監督監獄服刑人員和勞教人員；外事保護和清理華僑。

³⁹彭真：「我們計畫要把北京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樣，沒有不勞動的人，沒有靠剝削性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掃乾淨，當然反革命也不能有。」引自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東方紅報》，1968 年 8 月 8 日。

⁴⁰米鶴都：〈「破四舊」的表與裏〉，載《炎黃春秋》2012 年，第 5 期。

地，沒有生計，孩子不能上學，處於十分悲慘的境地。直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當記者時還接待了不少當年被趕出天津，回來要求「落實政策」的上訪者。

按當時的政策，清查社會人口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過派出所和居民委員會，動員其遷出北京。周恩來雖然強調要注意政策，紅衛兵興起後，就顧及不到了。紅衛兵到處抓人、抄家、揪鬥、打罵、凌辱，甚至把人活活整死。一名受訪者說，她家住在東單，夫婦都是工人，因為曾經在一個出租小人書的店裏有 400 塊錢資本，這時候被指控為「資本家」，全家被驅逐到山東農村，一個人只准帶一個鍋一個碗，直到 1978 年底才獲准回到北京。⁴¹據「首都工作組」成員張民記憶，僅崇文區被迫遷出市區的就有 1 千多家，隨遷家屬五、六千人。⁴²官方文革史記載，1966 年 10 月 14 日以前，被指為「牛鬼蛇神」而從城市趕到農村的人數，全國共有 397,400 多名。1966 年 8 月底至 9 月底這四十多天，僅北京市就有 85,198 人被轟回原籍，33,695 戶被抄家。⁴³如果把文革初被趕到農村的人計算在內，從城市趕到農村的人比上述數字要多很多。北京近 10 萬人口被掃地出門，占當時城市人口的 1.6%。⁴⁴天津市共有 41,571 人被遣送農村。⁴⁵當時總人口的 0.9%。濟南有 7,400 戶、22,197 人被趕往農村。⁴⁶占當時總人口的 1.38%。1966 年全國城鎮總人口 13,412.7 萬人，其中，城市總人口是 9,394.2 萬人⁴⁷，如果按 1%的比例計算，全國城市人口被趕到農村的就有 93 萬人。當時，有些鎮（縣城都是鎮編制）也向農村驅趕居民。所以，100 萬是最低數。

被驅逐人員一般是有紅衛兵押送。只許帶簡單的行李，就是所謂

⁴¹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載《炎黃春秋》，2010 年，第 10 期。王友琴計算有誤，當時北京城市人口 465 萬人，被趕出 10 萬人，其比例為 2.15%，不是 1.6%。

⁴²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100 頁。

⁴³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316 頁。

⁴⁴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載《炎黃春秋》，2010 年，第 10 期。

⁴⁵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作者自印本，第 158 頁。

⁴⁶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編著：《山東「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1966 年月-1976 年 10 月）》，2001 年 3 月。

⁴⁷《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年，第 178 頁。

「掃地出門」。那幾天在北京火車站成了人間地獄！「候車室和月臺上跪滿了等候車的被遣送的人們，有的戴著花樣出奇的紙糊高帽子，有的傷痕累累裹著紗布。」⁴⁸

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要求公安系統積極配合紅衛兵抄哪些人的家，把甚麼人趕出北京，都是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提供的資訊。公安系統對紅衛兵的行為持歡迎態度，認為紅衛兵幫了他們的忙。首都工作組組長葉劍英元帥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樹立了不朽的功勳。例如，北京市有一萬多黑戶，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誰都沒有進去過，一些壞人就在裏面搗鬼，公安局、司法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能抓。有個聖修小學，是外國鬼子在我們中國搞了多少年的，誰也不敢動它。紅衛兵小將管你什麼法律不法律，一掃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也不敢動他，這一回小將們就把他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上的垃圾。」⁴⁹9月5日，譚震林副總理對農業大學黨委的指示中說：「要青年學生鬧一鬧，因為自1949年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一下，怎麼能把那麼些壞人清出來呢？」在破四舊的高潮中，毛澤東把吳德找去彙報情況。吳德回憶說：「我在彙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彙報一些真實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彙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地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⁵⁰但是，王力卻有不同的說法：「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瞭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毛主席對當時中央領導人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標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搞破四舊這些東西。8月20日紅衛兵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

⁴⁸ 中傑英：〈右派送偽鄉長〉，者永平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上，遠方出版社，1998年

⁴⁹ 〈葉劍英同志接見北京13個藝術院校部份師生代表時的講話〉，1966年9月25日，聯合編制組：《首長講話選編》，1968年3月，第169頁。

⁵⁰ 朱元石等訪談、整理：《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8月，第27頁。

日報》和新華社作了歌頌性報導，對此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的陶鑄不滿意。⁵¹事實上，毛澤東可能認為「破四舊」影響了揪「走資派」，但他從來沒有制止「破四舊」。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其中寫道：「紅衛兵上陣以來，所向披靡。……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興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9月17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說：「千百萬紅衛兵由學校走上街頭，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們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紅旗，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在破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樹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紅色恐怖升級⁵²

8月的北京籠罩著強烈的紅色恐怖的氣氛，批鬥「黑幫」和「反動學生」、「破四舊」、清查社會人口，這些政治行動伴隨著大規模的血腥暴力。當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話成了紅衛兵的行動指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當時，到處是紅衛兵的暴烈行動。

紅衛兵中也有理智人物。面對暴力的升級，8月6日，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所學校的紅衛兵，散發了一份表明反對打人立場的〈緊急呼籲書〉，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

⁵¹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52-53頁。

⁵² 本節資料除注明外，均取自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

嚴格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的行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它真正的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但呼籲書聲音微弱，沒有起甚麼作用。紅色恐怖繼續升級。⁵³

「血統論」的風潮帶來的是大迫害的高潮。「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在學校打「黑幫」、「打狗崽子」，在街頭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壞、右、資」。他們身穿軍裝，手揮銅頭皮帶，耀武揚威，出身不好的人聞風喪膽。進入8月，紅衛上造成的「紅色恐怖」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各地。

他們強迫「專政對象」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頭認罪。我認罪，我改造，我認罪。。不老實交代，死路一條，死路一條，死路一條。」紅衛兵要求，必須帶著認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許走調。如果唱的不合格，銅頭皮帶就會落到身上。

8月4日，在北京大學的萬人大會上，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8月3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小流氓」大會，會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主持，「小流氓」遭到毆打。首都的批鬥會上打人者向公眾表明：「十六條」以及報刊上的「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政策，僅僅是紙面文章，對群眾中的武鬥沒有約束力。

北京大學附中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裏。讓她跪在一張方桌上，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旁邊由人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已懷孕，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1966年8月5日午後。北京師大學女附中（今實驗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同時被毒打的還有副校長胡志濤、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

⁵³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紅衛兵：〈紅衛兵緊急呼籲書〉，載於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9月編印的紅衛兵大字報選編《問蒼茫頭、誰主沉浮？》。

的木棒打和用開水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

8月17日，北京一〇一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打死。一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由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爬行過程中，有一紅衛兵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踩碾一名女教師的手指。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以後，暴力升級。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爭北京教育局和這三所中學的領導幹部。1965年這三所中學發生過「四六八」學潮，當時被壓下去了，這個會是為「四六八」學潮翻案。20多個被鬥爭者跪在舞臺上。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前臺，掄起銅頭皮帶抽打他們。臺上無人阻止，台下齊聲叫好。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溫寒江，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讓他從兩公里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他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過去。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

8月19日晚，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在和平門）紅衛兵打死了教員張輔仁和張福臻。為了試驗他們是否已經死亡，紅衛兵先用冷水繞，又用開水澆，看到屍體全無反應才罷手。

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後改名為一五九中學）紅衛兵用皮鞭和捆著帶釘子的木棍，拷打校長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在1,600多人全校師生參加的「鬥爭會」上，被毆打至死。數學教師張梅岩（女）被抄家後服毒身亡，體育教員何世瑾（女）自殺。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女）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致殘。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

8月23日下午3點半，一隊紅衛兵沖進北京市文聯、文化局，他們把40多名老作家、老幹部趕到大院，在強烈的陽光下罰站，每個人脖子上掛上一個寫有「黑幫」的大牌子，男女紅衛兵手舉銅頭皮帶往他們背上抽打，其中有著名作家、全國文聯副主席老舍，他被打得

鮮血直流，兩腿搖顫，眼鏡被打在地下。打過之後，紅衛兵押著這些「牛鬼蛇神」到國子監孔廟，命令他們把倉庫裏的京戲服裝、道具搬到院子中央，命令這些人圍成一圈跪下，點火燒毀這些戲裝和道具。有的紅衛兵還拿起木刀向老作家頭上砍去，以示正法。老舍被砍得滿臉是血。⁵⁴老舍面對外面受辱、家人冷漠的情況。于8月24日凌晨投湖自盡。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學的紅衛兵到化學巧抄家，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紅衛兵先先把一批老教師剪了「陰陽頭」，接著在操場上焚燒學校圖書館的藏書，他們強迫一教職員圍繞火堆跪下，舉起胳膊伸向火堆，廣播喇叭裏大叫「不許後退」，以致他們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長林瑾被紅衛兵推到火堆上，整條手臂被燒傷，四十年後傷痕猶在。圖書館員沈世敏（女）被剪了頭髮並在火堆邊被燒傷，到醫院被拒絕治療，當晚在家中上吊自殺。數學教師杜兆南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臥軌自殺。語文老師王景清跳樓。數學老師李洋請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醫霍自岐服安眠藥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陳玉和服毒。這個學校共有八人被害。

北京房山縣房山中學的校長王哲在飽受折磨後「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屍體前面，一起「鬥爭」。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黨支部書記；樊希曼（女），學生曹濱海的母親。紅衛兵命令校長局雲站在烈日下暴曬，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

8月25日，北京二十六中的「赤衛軍」「鬥爭」了46名教師。校長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橛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橛子再打。高萬春被「鬥爭」之後自殺而死。這個學校同時期還有一名老教師跳樓，幸而未死，摔斷了腿。

紅衛兵的暴行激起了兩起反抗事件。一是崇文區的橛杆市事件，二是曹濱海事件。

⁵⁴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7頁。

8月24日，在當地的派出所員警和居委會的引導下，女十五中紅衛兵抄了崇文區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她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槍枝、黃金？哪有甚麼槍枝、黃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經在前一天上交了房產證，還說他是「房產主」。25日又到李家開鬥爭會，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用棍子打他們，李文波忍無可忍，抄起一把菜刀砍傷了紅衛兵後跳樓自殺身亡。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被押送公安局關押。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9月12日判處劉文秀死刑後立即槍決，同時也判處已死的李文波死刑。這起血案被稱為欄杆市案件。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說成是「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⁵⁵。「文革」後的1981年3月2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劉文秀無罪、李文波不予起訴。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曹濱海，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拿起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曹濱海被公安局抓走，曹的母親樊希曼被紅衛兵抓到學校活活打死。曹濱海從此精神失常。

這兩起事件發生後，高層迅速表態。8月26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代表大會上說：「昨天我們有的紅衛兵被壞蛋刺傷了，我們心裏很難過，想怎麼辦幫助你們。」同一天，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說：「剛從中央開會回來，講幾點：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這兩起事件被說成「階級敵人的瘋狂報復」，紅衛兵大肆宣傳，一些學校開會「聲討反革命分子殺害紅衛兵的滔天罪行」。進一步激起了紅衛兵的「階級怒火」，打擊「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聲響徹各個學校，8月26日到9月1日，打死的人比8月25日以前大幅度增加。⁵⁶

清華附中紅衛兵宋柏林在他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怒火沖

⁵⁵周恩來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⁵⁶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載《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

天，抄家中抄出英國指揮刀、日本大馬刀、北洋軍閥軍服、匕首等，真是階級報復，階級仇恨，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回去後幾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帶、竹條猛抽。這是階級鬥爭，你打他，他殺你，這是你死我活。」宋柏林沒有打人，在日記中自責「有些良恭儉讓，沒有最深的階級感情和階級仇恨。這很危險，對敵人恨得不深，就是對人民愛得不深」。⁵⁷

8月28日，在北京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20號，黃姓一家被紅衛兵打死5口。8月26日，黃家兒媳汪克寬從她供職的東方歌舞團回家，想從家裏找一些屬於「四舊」的東西拿回團裏交差，因為她們單位在破「四舊」。她從家裏找到一些唱片、樂譜、香水和一串假珍珠項鍊，裝在一個書包裏。她出門時碰上了租住他家的姜某的父親，姜老頭厲聲叫住了她，問她書包裏裝的甚麼，叫她「立即回屋，不能轉移財產」。汪克寬向姜老頭作了解釋。她沒有想到，薑老，這個街道積極分子把汪克寬「轉移財產」的情況報告了轄區員警羅某。羅某就通知在三十八中讀書的弟弟率紅衛兵來抄黃的家。抄家從27日持續到28日。紅衛兵從衣櫃裏搜出了子彈殼。這是汪克寬的丈夫黃瑞五小時候揀的。紅衛兵令黃瑞五交代子彈的來歷。黃如實說明，紅衛兵哪里相信？就對黃瑞五抽打。派出所得知他家男傭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就說他是「逃亡地主」。紅衛兵又抽打男傭，讓「逃亡地主」交代槍枝。因為有子彈必有槍枝。打完了兩個男人，紅衛兵說黃家三個女人（黃瑋班、陳玉潤、李秀蓉）「窩藏地主」，讓黃家第三代黃璋班打自己的母親陳玉潤。黃璋班喊：「不要打人！」這一喊激怒了紅衛兵，就將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活活打死。⁵⁸

據北京官方史料，從8月5日到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⁵⁹

1966年8月下旬，很多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到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還沒有死，沒有燒他，他又

⁵⁷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紅衛兵手記》，德賽出版公司，香港，2006年，第125頁。

⁵⁸李相：〈北京大紅羅廠二十號血案〉，《南方週末》2000年3月31日。

⁵⁹《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第2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62頁。

回了家。當時積壓了很多屍體，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為什麼十幾歲的孩子(其中很多是女孩子)如此殘忍？這與多年的意識形態灌輸有關。

自 1949 年以來，政權運用報紙、電臺、會議、課堂、文化娛樂活動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進行妖魔化，在紅衛兵看來，這些「階級敵人」死有餘辜。所以，紅衛兵們對這些人施暴時不僅沒有負罪感，反而有一種正義感。由於資訊封鎖、單一灌輸，那些「紅五類」們也成了由政權任意擺弄的政治愚民。一旦出現政治運動，這些政治愚民就很快變成了「階級敵人」的政治暴民。

不僅北京有老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其他大城市也發生同樣的情況。1966 年 9 月 20 日，西安成立了以高幹子弟為主要成員的「紅色恐怖隊」(簡稱「紅恐隊」)。「紅恐隊」學習北市的西糾，和西糾的高幹子弟來往很密切。他們打人、抄家，將四類分子家庭驅逐到農村，無所不用其極。西安九中的學生把汽油桶綁在老師的背上，用火點燃汽油桶都把老師活活燒死。西大街的城隍廟當時是西安最大的抄查物資倉庫，所有紅衛兵抄家來的東西都放在那裏，衣服、傢俱、收音機、圖書、字畫堆積如山，在火車站東邊一個倉庫關押著即將遣返的黑五類，不許他們說話，讓每人嘴裏都咬著鞋，鞋掉下來就挨打。凌晨 4 點左右，紅衛兵用手臂粗的木棍將被遣返的徐自簡股打致死，公安局以正常死亡上報。後來，「紅恐隊」還派人到北京參與聯動衝擊公安部。⁶⁰

七、「西糾」和「聯動」

在紅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況下，8 月 25 日，西城區 31 所中學的紅衛兵聯合發起成立了一個組織：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是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發起的，後來又有 19 所中學加入，

⁶⁰董勝利口述，白晶記錄整理：〈關於西安紅色恐怖隊的口述回憶〉，2004 年 10 月 3 日，載《記憶》第 10 期。

後來又發展到四、五十所中學。據說成立「西糾」是為了整頓紅衛兵內部的秩序，控制紅衛兵亂打人。對於西糾在文革中的作用，幾十年爭論不休，有人肯定西糾在「抑制混亂方面所起的作用」，說「他們的歷史功績，不可埋沒」⁶¹；有人說，這個組織是紅衛兵搞紅色恐怖的繼續和發展。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從它成立時自定的任務、發表「公告」的內容、他們的實際行動、「西糾」成立以後紅色恐怖是收斂還是發展等幾個方面分析。

「西糾」成立時宣告，「糾察隊是革命的造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他們的職責和權力是：

「堅決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

「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

「有權撤銷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

「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

「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

「在其他各區糾察隊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暫由西城分隊代行保衛職權」等。

他們自定任務中心是繼續堅持「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不僅第一次把資產階級列為鎮壓對象，還把他們的「孝子賢孫」（資產階級子女）也列入了鎮壓物件。西糾的任務中沒有制止打、砸、搶、抓、殺的內容。它這些「有權」不是任何合法程式獲得的，而是自授的特權。

「西糾」的成立和活動，得到了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陶鑄、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幹部的支持。周恩來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指導糾察隊的活動，並指示周榮鑫幫助「西糾」解決用房、交通工具，印刷等問題。⁶²顯然，這些中央領導人是希望「西糾」能夠擔負起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在首都工作組有一種說法：「一物降一物，鹵水點豆

⁶¹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75 頁、77 頁。

⁶²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172 頁。

腐」，「能管紅衛兵的只能是紅衛兵」。⁶³

西糾自成立之日起，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活動中陸續發出十個通令。摘要如下：

第一號通令

撤銷紅一中關於不許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從現在起各新華印書店開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第二號通令

一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查首長宿舍。違者，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嚴加處分！

第三號通令

(1) 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大量印製和出售各種毛主席畫象和毛澤東紀念章，誰膽敢阻止工農兵群眾和我們革命紅衛兵學習毛主席著作，誰膽敢摘去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就和他們拼命！把他們砸個稀巴爛！(2) 沒有中央的許可，沒有新市委的決定，沒有糾察隊的命令，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宣佈戒嚴，都無權以任何藉口攔截和檢查來往車輛和行人，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3) 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4) 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5) 為了給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革命造反活動提供交通方便，我們認為，在路燈通明的馬路上騎車，可以不必點燈。(6) 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今後，生產部門要立即砸爛一切舊商標，創立革命的新商標。我們紅衛兵決不許可任何舊商標的產品出廠！(7) 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8) 查抄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⁶⁴的家，一定要通

⁶³同上，第 170 頁。

⁶⁴過去一直把地富反壞右稱為「黑五類」，這個通告把資產階級也列入打擊物件，稱為

過本單位的紅衛兵總部，一定要與當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員會取得聯繫，所繳獲的一切財物都要歸公！在查抄時，要提高警惕；要以文鬥為主，後發制人，要嚴防壞人搗亂，鑽空子。

第四號通令

我們提出以下七項規定。(1)要深入調查研究。哪些人屬於黑六類？哪些人不屬於黑六類？一定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可以搞「紅衛兵」、「派出所」、「居民委員會」三結合，通告組織系統去調查。不是黑六類的家一律不查！國家負責幹部的家絕對不許查！(2)要通過組織在查抄黑六類的家之前，一定要通過本單位的紅衛兵總部，要持有證明信；一定要與當地的派出所取得聯繫；可以與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員會取得聯繫，取得他們的協助；還可以徵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單位的意見。(3)要文鬥。要提高警惕，後發制人。(4)一切繳獲要歸公。

(5)區別對待，打擊少數，孤立敵人。(6)鬥垮敵人，教育群眾。我們要把那些老寄生蟲，老吸血鬼，殺人的劊子手統統揪出來，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廣眾之前，把他們的累累罪惡公諸於世，組織群眾進行鬥爭，進行控訴，進行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教育運動。(7)給出路。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現行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置外，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第五號通令

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壞、右分子，也是這樣。

第六號通令

對第五號通令中要文鬥，不要武鬥作出了更加具體的說明。跪、趴、彎腰、負重、遊街、長時間站立、長時間舉手、長時間低頭、時

「黑六類」，資產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廣大的所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樣就擴大了打擊範圍。

間做重活，等等，都屬於體罰及變相體罰，都不是我們應採取的鬥爭方法。「掛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頭」等，都屬於侮辱人，都不是我們所應採取的鬥爭方法。

第七號通令

從農村或外省市逃亡、流竄到北京，或隱瞞成份，隱瞞歷史，隱瞞罪惡活動而混入國家機關和廠礦企業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確實查明後，要勒令其離開北京，回原籍監督勞動，實行改造。喪失勞動能力，原籍又無人撫養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為了避免加重農民負擔，一般可以不離開北京，就地監督改造。但如果民憤極大，群眾要求鬥爭，必須滿足群眾的一切要求。

資本家不必離開北京，可以繼續留在原單位接受改造。

右派分子不必離開北京，繼續留在原單位，由原單位通過組織系統進行處理，更便於對這類人的鬥爭、監督和改造。

有歷史問題，已徹底向組織交代，經組織上作過結論，摘掉帽子，並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權利，本人沒有現行反動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單位繼續工作，接受改造。

對於限期離開北京的四類分子要有組織手續。其戶口遷移手續要由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單位直接負責。要保證其所必須的生活費用和生活物品。對沒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一律不要查收。要切实給予他們生活上的出路。不要對他們進行武鬥，要保證他們在路上的安全。

第八號通令

我們要嚴厲警告那些妄圖反攻倒算，變天翻案的混蛋們：你們想利用群眾運動中的一些缺點，倡狂反撲，進行階級報復，這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我們每一個糾察隊員完全有權力、有義務協助革命群眾，堅決鎮壓一切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

在此，我們對於第六、七號通令作以下補充和說明：

（一）我們再次說明，對於頑固不化，拒絕改造，民憤極大的資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其反動家庭立場上的四類分子子女，必須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進行嚴肅處理。

（二）關於第六號通令中的不要長時間低頭和站立的決定，應根

據鬥爭的需要，由革命群眾權宜處理。

(三) 所謂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包括剝削得來的財物。

(四) 資本家留在城市裏，發動受其剝削壓迫，最瞭解其罪惡活動的工人來監督改造他們。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上與資本家相同。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負責任地把髒水潑到別人的院子裏。

第九號通令

(一) 形勢；(二) 任務；(三) 幾項規定：(1) 充分利外賓參觀、訪問、開座談會、個別談話的機會，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讓他們把毛澤東思想的火種帶到世界各地，燒起世界革命的烈火。(2) 以主人翁的態度熱情對待外賓，尊重他們的風俗習上、思想上去影響他們，啟發他們。(3) 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做好外賓保衛工作。(4) 不要阻攔外賓的車，不要圍追外賓，除了個別的別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不阻攔外賓照相，保證他們的正常活。

第十號通令

全國革命大串連是偉大的創舉，熱烈歡迎外地來京串連的革命同學；要求串連同學學習林彪、周恩來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的講話，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北京要克服困難做好接待工作。

這十個「通令」充滿了幹部子弟的霸氣和特權思想。其積極方面是聲明了「要文鬥，不要武鬥」，聲明「對沒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一律不要查收」(後來又說「剝削得來的財物」也有政治意義)，縮小了強令離開北京的人員的範圍(第5號和第6號和第7號通令)但是，第8號通令基本否定了第5號、第6號和第7號通令中比較寬鬆的內容。這十個「通令」多次強調的內容是保護高級幹部的安全，維護高級幹部的生活。「一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不得搜查首長宿舍。違者，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立即扣押！」(一號通令)「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二號通令)「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三號通令)「國家負責幹部的家絕對不許查！」(四號通令)

當然，保衛高級幹部的安全是應該的，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說明「西糾」把保衛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都工作組的一位成員在回憶錄中說：西糾「一度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班禪、郭沫若、傅作義、李宗仁、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程硯秋等國家領導人和文化界名人的住宅安全」，⁶⁵這可能是事實，但西糾在保護社會弱勢群體方面乏善可陳。相反，他們還是用「血統論」的指導思想，對非「紅五類」進行強力打壓。「八號通令」說：「我們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出於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們的家，打了你們的人，給你們戴了高帽子，牽你們去遊街示眾，趕你們回原籍勞動改造。我們認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遊了，趕了就趕了，沒有甚麼了不起的！」

自從8月25日西糾成立以後，紅色恐怖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強化。這與前面說的李文波事件和曹濱海事件有關，也顯現出西糾制止武鬥沒有效果。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100人變為超過100人。從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50%。從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一天內有228人被打死。⁶⁶「西糾」成立後展開活動的幾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殺人數最多的幾天。而在這幾天裏，在北京市被虐殺總人數中，數「西糾」主要活動的西城區死亡人數最多，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總和還多。⁶⁷

王友琴女士將西糾成立前後打死人的資料製成了下面圖表⁶⁸，這個圖表證明，8月25日成立的西糾，在制止暴力方面沒有任何效果。

西糾不僅沒有制止紅色恐怖的效果，西糾成員自己還在繼續製造紅色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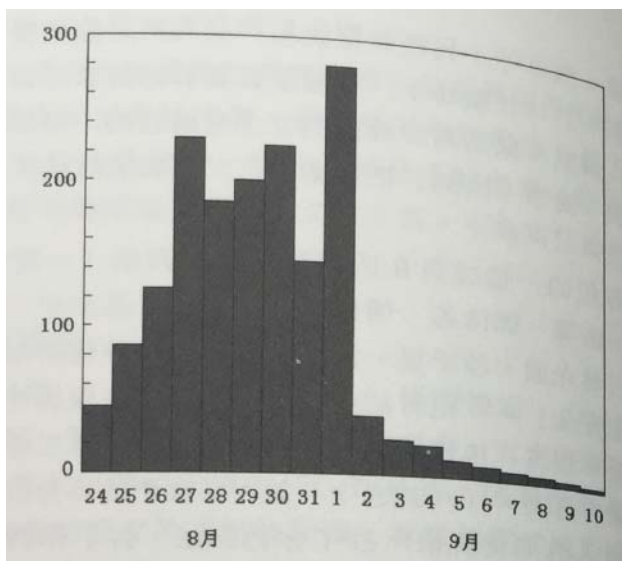
由於「西糾」狂妄地自授權力，是紅衛兵的「憲兵」，它的權力是無限的，其指導思想還是「血統論」和階級專政，在某些方面的殘

⁶⁵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74頁

⁶⁶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

⁶⁷杜鈞福：〈西糾的真相必須澄清〉，載《記憶》第58期。

⁶⁸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燕南社區，2003年。



酷行為比一般紅衛兵有過而無不及。「西糾」在北京六中的表現就是一例。

座落在天安門西側不遠的北京六中，是「西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私設刑堂，自立「勞改所」，打死學生，其殘酷程度駭人聽聞。

六中「勞改所」有崗樓，崗樓上有一盞四面轉動的探照燈、射擊孔、瞭望孔、警鈴、汽槍。崗樓上日夜設崗，嚴密地監視著校內外過往的行人。迎面牆上就有一條刺眼的紅色標語「紅色恐怖萬歲！」，據「勞改」成員說：字原來準備是用人血寫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紅漆寫成後還時常用人血向上塗抹。「勞改所」裏，滿地都是刑具，從木槍、長棍、鞭子、尼龍繩……。在這裏被毒打的有 50 人之多，一段時間裏，「勞改所」天天都會傳出鞭打聲，慘叫聲和狂笑聲，所有的男女「勞改犯」都擠在這二丈長，七、八尺寬的屋裏裏，平時不許交談，睡時不許睜眼，不許翻身，不許打呼嚕，連上廁所也要排隊聽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們的名字就被號碼所代替。六中紅衛兵對「勞改」成員施用鞭笞、棒打、「拳擊小腹」，「刀背打臉」、「坐土飛機」「開水澆人」等殘酷的刑罰。「坐土飛機」就是由幾個人

分別抓住受刑者的手腳，像打夯一樣，把人拋起一米多高，一齊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堅硬的水泥地上。他們在打人時卻說：「這是文鬥，不是武鬥」，「這叫文武結合，是最高形式」。他們讓「犯人」連續幾個鐘頭背誦毛主席語錄，有時還要跪在棍子腿上、頭上頂著東西背誦，一直背誦到頭昏眼花、汗流滿面。背誦得不好還要重新背誦。

19歲的六中高三學生王光華，出生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串連。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回到北京，被六中紅衛兵西糾隊員關在「勞改所」進行令人髮指的折磨後，活活打死。王光華死後，沒有通知王的家長，當夜12點鐘送到火葬場燒了。在許多天之後，他們才到王光華家去，說：「王光華是反革命，被我們打死了。」他們向王光華的母親勒索了28塊錢，說是火葬費。還威脅說：「不許把這件事說出去，否則把你家滿門抄斬。」

六中退休老工人徐沛田，1940-1956年在北京六中當工友。退休後，單身一人，一直在六中生活。由於他父親是洋車（三輪車）廠主，六中紅衛兵把徐沛田揪出來，讓他口叨著破鞋在操場上爬行。一直爬到廁所，又將徐推入小便池，並在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又用開水澆徐的頭。徐回宿舍後奄奄一息，4點多鐘又毒打徐，再用開水澆老人頭部。百般戲弄，讓老人唱歌，跳舞，還讓他吃屎喝尿。最後將尼龍絲繩子套在徐的脖子上，把這位老人活活吊死了。死後屍體放在後院，暴屍三天。⁶⁹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發出〈重要通告〉，通告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重要通告〉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別到六中、東安市場等地取締私設的監獄。據戚本禹說，他帶《解放軍報》記者連夜趕到東安市場，一個「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橫飛。鞭子是用銑床旋下的彈簧狀的鐵屑，一鞭下去，白肉都會翻出來。他們命令紅衛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萬歲！」事後，軍報記者曾寫一報告，擬送呈毛澤東。陳伯達看了說：「太陰暗，不能送。」就壓下了。⁷⁰

⁶⁹北京六中北京公社：〈劉鄧路線在六中的滔天罪行〉。

⁷⁰ 1966年12月17日，〈中央首長在全國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江青，陳伯達、周恩來等。

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會上，江青發言中說，西城糾察隊、東城糾察隊、海澱糾察隊，這些所謂的糾察隊有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今天，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們對他們教育的不好，40幾歲的人，60幾歲的人沒有把他們教育好。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甚麼東西！可是我覺得周榮鑫是負有責任的，雍文濤也負有責任的，王任重也是負有責任的。讓他們向你們檢討，他們是怎樣支持他們這一小撮壞蛋向你們做憲兵工作的。……我希望你們對這些青年，犯了錯誤的同學們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幕後的、頑固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死不回頭的要鬥倒、鬥臭、鬥垮！要不要周榮鑫、雍文濤站出來看看？（眾高呼：要！讓他們兩個低頭！周榮鑫、雍文濤低頭站在台前）」

1966年12月17日，北京和外地來京的師生、幹部10萬多人在北京體育場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派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勝利誓師大會」，江青、陳伯達批評了糾察隊之後，周恩來說：「中學的小傢伙，糾察隊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違反了中央規定，做了一些壞事，……經過我們多次教育，屢教不改，所以逮捕起來教育、改造他們。」「糾察隊在歷史上，本來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出現的，叫工人糾察隊，是保衛工人階級，鎮壓工賊、資本家走狗、反革命員警、憲兵的。但紅衛兵糾察隊起了相反的作用，變成管紅衛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對頭了，逐漸被壞分子利用了，成為打擊紅衛兵革命行動的工具，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玷污了。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⁷¹

12月27日，在紅衛兵首都三司召開的大會上，周恩來說已被壞分子用來打擊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糾察隊。報紙上點名西糾是反動組織。西糾的負責人孔丹被捕。

從上面多方面分析得知，西糾沒有起到制止「紅色恐怖」的作用。

另一方面，把8月25日西糾成立以後的「紅色恐怖」的責任完全算在西糾頭上也不完全公正。在一次周恩來出席的會上，西糾負責

⁷¹ 1966年12月17日，〈中央首長在全國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

人之一秦曉等人把西糾發佈的通令等材料送給周恩來，還附了一個條子說：「總理，怎麼把我們打成了反動組織了呀？你不是支持我們的嗎？」周恩來在結束講話時聲明：「剛才有人給我遞了西糾的材料，西糾的東西我一直沒有看過。」周恩來一口否定了。⁷²

1966年秋後，鬥爭矛頭真正指向了當權派。領導幹部大部份被揪鬥，被凌辱，被打倒，其數量是空前的，其殘忍程度也是空前的。這些官員是官僚制度的支柱，是維持社會穩定、保證社會秩序的骨幹力量。科層官僚制度窒息了社會，壓制了底層，出現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特權和腐敗，但責任不全在這些官員，而是制度。制度的罪責不能完全由他們來承擔，他們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摧殘。但是，毛澤東已經也們置於被批判、被「火燒」的地位，他們只能成為群眾運動的犧牲品了。雖然毛澤東說是「燒一下，不要燒焦」，但相當多的幹部被「燒焦」了。群眾運動是不能自發地掌握「火候」的，在官民矛盾相當尖銳的極權社會，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親自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點燃的肯定是不可控制的熊熊烈火！

對領導幹部大規模的迫害，高幹子弟家破人亡，流落街頭，倍受欺凌。他們老子已經從「英雄」變成了「反動」，他們自己從「好漢」變成了「混蛋」。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動」，更不甘願自己成為「混蛋」。他們不能容忍的是，一個月抽向「黑六類」銅頭皮帶竟然抽向了他們的父母！

正是這個原因，西糾被取締後，又出現了一個新組織。這個組織就是「聯動」。「糾察隊」轉為「聯合行動委員會」，是1966年11月底的事情。聯動的主要發起者是「海糾」——海澱區紅衛兵糾察隊那裏一〇一中、八一中學、十一學校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幹部子弟「成堆」。由宮小吉執筆的〈成立宣言〉，將聯動的任務定為反對「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這句話前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指對文革運動的壓制和對造反派群眾的打擊，這是毛澤東定的調子。而後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則是指對老幹部以及他們家庭的大規模衝擊和迫害，這個定義是

⁷²米鶴都：《心路：透視共糊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89頁。

聯動這些中學生們自己做出來的。

1966年11月27日，一些中學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發起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意為「東城區糾察隊」，「西城區糾察隊」和「海澱區糾察隊」的聯合體。1966年12月5日，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鄒建平等爬上了西直門城牆，刷下了一條几十米高的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同時高廣場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現「聯動敲響中央文革的喪鐘！」「堅決保衛革命的老幹部！」等大標語。這一天，應當算是聯動正式成立的日子。⁷³

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紀念毛主席誕辰，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這次會議呼喊的口號有⁷⁴：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妄了！

全國革軍革幹子弟聯合起來！

堅決擁護軍委四位副主席⁷⁵的講話！

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來發表的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

一切單位、一切部門都要置於軍委領導之下！

反對縱容鼓勵支持反革幹革軍子弟的行動！

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

誰敢亂捕革幹革軍子弟，小心狗頭！

強烈要求釋放被無理拘捕的全體幹部子弟！

沉默就是死亡！戰鬥以求生存！

大概是在1966年12月底或1967年1月初，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大字報區，我看到了一張很長的大字報，看這張大字報的人圍得裏三層外，人們只是默默地看，沒有人發表議論。大字報的內容我不記得，但其中的一句話幾十年我沒有忘記：「堅決粉碎中共中央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兩主席」顯然是指毛澤東和林彪。「幾個委員」顯然是指中央文革成員。在那個時候誰有這個膽子細看，才知道是聯動通告。當時我聽說中學生有個聯動組織，沒想到他們竟然

⁷³張光渝：〈告別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60-64頁。

⁷⁴米鶴都：《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39頁。

⁷⁵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四位元帥發表了與中央文革不一致的講話。

這麼大膽！最近才在網上找到了這個通告。摘要如下：

聯動的通告宣告聯動的任務是：

——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貫徹，保證中共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

——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種反動造反組織。

——堅決地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內的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曉夫分子。

——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

——保衛黨的各級優秀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

通告說：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 1960 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切行動指示。⁷⁶

聯動提出「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毛澤東放出的魔鬼最終撲向了毛澤東自己！這應當是毛澤東面對的最早反對文化革命的力量，也是最早公開發出的「取消一切專制制度」的呼聲。這個呼聲比林立果的「571 工程紀要」要早三年。值得注意的是，聯動通告和「571 工程紀要」，都是專制制度最高層的子弟們發出來的聲音。可見，專制制度的最高層有著反對專制的力量。

最近讀了米鶴都的書，他說上面這個通告是「偽聯動」發佈的。真聯動的負責人都否定這是他們的作品。米鶴都還說這個通告的作者至今不詳。⁷⁷這真是一件怪事，在當時，張貼反對毛澤東、林彪和中

⁷⁶張光渝：〈告別元老〉，第 65-66 頁，聯動「中央字 003 號通告」的內容，沒有提中央兩主席。

⁷⁷引自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 年，

央文革遊的大字報，還說他們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比張志新等有過而無不及，難道毛、林聽之任之？難道公安部門不盡力偵破。

聯動提出「取消一切專制制度」，並不表明他們有什麼民主共和思想。一位聯動成員的一封信⁷⁸，雖然是晚於1967年4月寫的，也有助於瞭解他們的心態，摘引如下：

北大附中井崗山兵團的混賬王八蛋們：

別看你們今天他媽的鬧的歡，將來小心你們的驢頭。崽子別狂，等著瞧，二十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你們靠邊站！你們今天鬥了我們的人，這血恨一定要報。小王八蛋們別高興得太早了。

不管你們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反正革命的重擔不會落在你們身上。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崽子們，考慮考慮你們的後路吧！

幹部子弟要掌權！

天下是我們的！

北京一〇一中你們的爺爺——老紅衛兵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中所期待的——「二十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果然都變成了現實！其實，只要共產黨還處於執政地位，只要這個制度不改變，官員子女世襲現象是不可避免的。

聯動成立不久，毛澤東說：「這些紅衛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⁷⁹聯動這樣的組織不僅北京有，西安有「紅色恐怖戰鬥隊」，瀋陽有「紅後代」等。這些組織都是以幹部子弟為骨幹，都以保老幹部為目標，反對中央文革，反對造反派。這些被稱為「十二月黑風」⁸⁰的一部分。

第217頁-218頁。

⁷⁸引自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217頁-218頁。

⁷⁹《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175頁。

⁸⁰「十二月黑風」是指1966年12月發生的一股反對中央文革的小風潮，以「聯動」

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11日，北京的聯動連續六次衝擊公安部，喊出「火燒謝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劉少奇萬歲」的口號。說「戚本禹不過是十七級幹部，算老幾？」說要開汽車把關鋒撞死。1967年1月中旬，經過毛澤東同意，把聯動定為反動組織，毛澤東說：「這些頭頭不能讓他們自由行動，要集中起來，進行教育改造。」⁸¹公安部長謝富治說：「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聲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組織和一些工廠造反派，在公安機關的協助下，對設在北大附中的聯動總部及各校骨幹分子採取突然行動，逮捕了100多人，聯動被正式定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聯動從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兩個月時間。後來，一些「聯動分子」又開始到天津活動。周總理派記者前往天津，向天津革委會籌備組負責人解學恭傳達他的指示。其內容只有11個字，就是說：「注意『聯動』動向，並採取措施。」周總理還特別要求記者一定把這一指示記在腦子裏，不要見諸文字，只能當面口頭傳達。⁸²1967年3月上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先後參觀了八一學校的聯動展覽，這是北京軍區高幹子女寄宿學校，學生在校生活條件之優越令普通百姓側目。

一些幹部子弟被抓，引起了中央高層一片反對聲。這是「二月逆流」時老師們發牢騷的一個內容，聶榮臻批評抓聯動成員。可能是元帥們的意見起了作用，恰好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寫了一封血書，請求毛原諒在革命中犯了錯誤的年輕人，血書通過汪東興的兒子遞到毛的手裏，毛決定釋放被抓的人。

毛澤東事後說：「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⁸³1967年4月22日，周恩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人員接見

為代表，人數不多，很快被鎮壓下去了。

⁸¹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179頁。

⁸² 張春亭：〈我擔任「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的難忘往事〉，載《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

⁸³ 毛澤東1968年7月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話。

聯動部分成員。江青對他們說：「今天要你們回家，是主席決定的，你們表現不錯，回家繼續學習，參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隊，不要再站錯了。」還給每人發一本書，孩子們一片歡呼，感謝毛主席，感謝江青阿姨。⁸⁴

到 1967 年初，北京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垮臺。從毛澤東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開始，到聯動被抓，紅衛兵僅僅四、五個月。和以後的造反派紅衛兵相比，雖然他們年紀、由於他們發起早，垮臺早，他們稱為「老紅衛兵」。正是「老紅衛兵」造成了文革中的第二波劫難。這一波劫難受害的是教師、知識份子、「地、富、反、壞、右、資」及其子女。大批文物也是在這一波劫難被毀。這一波劫難高潮的時候，除彭、陸、羅、楊及其受牽連的人以外，高級幹部還掌握著權力，這一波劫難有當權者作背景。1967 年以後，這批「老紅衛兵」歷經家庭劫難、上山下鄉、參軍、工農兵學員，逐漸拋棄了「血統論」和政治狂熱。到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紀，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⁸⁴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2 版，第 180 頁。

第八章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在大批判中，發現「反革命分子」，即實行「專政」。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炮打」當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很多地方和單位的黨政領導機受到衝擊。這是毛澤東所期待的。然而，「堅持黨的領導」是多年不可逾越的重要政治原則，自 1957 年反右運動以來「黨委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十七年形成的官僚體系科層結構的勢力十分強大上下左右盤根錯節。造反群眾的衝擊和官僚的反衝擊尖銳對立，在全國各地出現一個又一個「事件」。而在這一輪鬥爭中，各地造反派還是處於弱勢。官僚體系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因勢而變，因時而宜，變換手法鎮壓造反派。

一、各地官僚們為自保壓制造反

在 1966 年 5 月至 12 月，省、市、地、縣黨委領導人對文革群眾運動的態度經歷了幾次變化：開始，他們一方面拋出一批知識份子和幹部中的異己分子（一般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幹部），讓群眾批判，一面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劉、鄧的指導思想，向各級學校和文化單位派出大批工作組，抓右派，鎮壓起來造反的人。7 月底 8 月初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後，各地撤出了工作組。8、9 月間，各地黨委領導人又採取了新的措施：一方面通過扶植各單位官辦的「文革領導小組」的辦法，繼續掌控群眾運動的主動權，另一方面又通過扶植保守派群眾組織來和造反群眾組織對立。

對於官僚們的對抗行為，當時有一個的詞語：「反撲」。1966 年 12 月 4 日，周恩來對造反派紅衛兵說：「現在確實像上午同志們分析的，存在反撲，要給予反擊，反撲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撲，機關裏有，學校裏就更多了。有鬥爭的反復可以鍛煉我們。」¹

北京

在各大學裏，工作組從前門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聯絡員、觀

¹周總理接見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樂團四單位三司所屬紅衛兵組織代表的談話紀要，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 501 頁，1967 年 2 月。

察員、巡視員、顧問從後門進來，繼續控制學校裏的運動。新市委利用保守派還處於多數的有利時機，限令各校幾天之內選出「文革籌委會」、「文革小組」等領導機構。所謂選舉，實際是暗中操縱，預先指定。這些文革領導機構，立即轉入門「黑幫」，阻止少數派批判工作組。在工作組期間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並未得到解放，依然被視為作「痞子」。各大專院校大辦「勞改隊」，把大批中層幹部和教授送進「勞改隊」。

上海

市長曹荻秋佈置人力調查北京來串聯的紅衛兵的歷史，將查出「壞人」的資料，送給北京市紅衛兵所屬的單位，希望單位黨組織整這些南下的紅衛兵。上海市委組織幹部、工人、學生同北京紅衛兵開展辯論²。佈置「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和「五好工人」發電報給中央、毛主席，為上海市委歌功頌德，還把這些電報印成傳散，散發全國。市委組織了 15,000 多名工人，加上官辦紅衛兵、文藝工作者和機關幹部來保衛市委機關，防止造反派衝擊。³上海市委還一手包辦成立了全市的紅衛兵組織。事先，市委指定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負責組織紅衛兵。1966 年 8 月 23 日上午，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有 3 萬多人參加的上海市紅衛兵成立大會。大會發言人是經市委審查同意的，發言稿也是張文豹審定的。市委和軍隊領導人以及勞動模範出席了會議。會上確定的紅衛兵總部頭頭們，大部份是市黨政軍領導人的子女。⁴

廣西⁵

8 月 5 日，在桂林的廣西師範學院的造反派（即在該校是多數派，後來的桂林「老保」的骨幹力量）在工作隊撤離時，貼出了「送瘟神」

² 《上海黨內頭號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最近交出假檢討》（供大批判用），1967 年 7 月，上海市報刊發行處發行，第 20 頁。

³ 同上，第 21 頁。

⁴ 張文豹：《1966 年四見陳丕顯》，《炎黃春秋》，2011 年第 7 期，張文豹時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⁵ 《韋國清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忠實執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桂林市大專學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報》1967 年 5 月 10 日。

的大字報。8月7日，當局調動成千上萬名工人、農民對廣西師院造反派進行圍攻、毆打。後稱為「8.7事件」。接著又發生了桂林「8.19事件」：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先後調動解放軍駐桂141師5個連進駐桂林市內。在8月末的一次廳局長會議上，韋國清說：「桂林『多數派』是右派人，他們有800多人，加上南下串連隊和一些人，有兩千多人，雖然不會都是右派，但是他們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隨後，又發生了南寧「9.9事件」，南寧的造反派和南下紅衛兵，為聲援桂林造反派，抗議區黨委，於9月9日在廣西區黨委院內進行靜坐絕食。區黨委調動「盾牌兵」、「赤衛隊」等保守派群眾組織來圍攻，造成一次轟動全區的事件。

貴州⁶

1966年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聯隊和省商校、省藝校、貴陽女等校學生約3千餘人到省委大樓前要求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接見，請他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關問題。賈啟允躲到省軍區不見面。這批學生便在大樓前開揭發批判會、靜坐示威。省公安廳出動100多名「機關紅衛兵」保衛省委大樓。省文革領導小組以上街宣傳「十六條」名義，調動幹部、工人、居民12萬人，對這批學生進行分割、圍攻、鬥爭，大圈套小圈，實行車輪戰，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從9月5日至8日，貴陽市街頭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圍鬥造反派學生，這一事態被稱為「9.5」事件。按照賈啟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貴陽市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因其紅衛兵袖章上有編號，被造反派稱為「號碼兵」）。9月28日又成立官辦的紅衛兵糾察大隊。10月15日，為了對付造反派，按賈啟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糾察隊聯絡站，由省總工會主要負責人具體負責上下聯絡。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貴州省糾察隊，其聯絡站設在貴州省總工會。

「號碼兵」和工人糾察隊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賈書記是焦裕祿式的好書記」。南下串聯的北京紅一下火車就被他們包圍，要求表態「省委是革命的」，如果，不作這樣的表

⁶彭振新：《貴州文革大事集》（第五次增補稿）。

態就要受到圍攻。

寧夏⁷

工作組撤離學校後，寧夏區黨委扶植的文革籌備小組領導運動。迫於形勢，區黨委為因反工作組而受壓的學生平反，拋出了與寧夏黨委主要領導人關係不好的幾位幹部作為「寧夏區黨委內的黑幫黑線進行批鬥。在區黨委的控制下，銀川成立只允許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參加的「紅衛兵總部」，其頭頭大多是區黨委和軍區領導人的子女。他們大破「四舊」，並壓制對他們父輩的造反。「十六條」發佈後，銀川的工廠和政府機關裏出現了一些零星的反對單位黨委的行為，但這些行為被扣上了「反黨」、「反革命」的帽子。9月2日，寧夏大學的激進學生召開批判校黨委書記江雲大會，並把鬥爭矛頭指向寧夏區黨委。此後，甯大學生產生了對立的兩派，保守派佔有絕對優勢。9月12日，自治區副主席陳養山作報告稱：「寧夏的工作組並沒有犯路線錯誤，只是犯了方法錯誤；楊靜仁領導的區黨委執行文革中的正確的道路。」此後，銀川大街上貼滿了攻擊寧夏大學造反學生的大字報，批判區黨委的大字報消失。對此，銀川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的支持下策劃了更為激烈的行動。但此時銀川造反派在數量和勢力上都處於弱勢，在銀川處處受壓，而且北京來的紅衛兵還被驅趕。直至9月底，銀川文革基本在自治區黨委掌控之中。

湖南⁸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長沙的高幹子弟組織以省委領導的子女為頭頭的「紅色政權保衛軍」，他們宣誓：「誓死保衛省、市委和共產黨紅色江山。」聲言要打擊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市委書記孔安民模仿毛澤東，身著軍裝接見這些紅衛兵。⁹8月19日，湖南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到市委所在地示威遊行。市委將工廠的黨團員組成「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保衛市委，湖南大學

⁷武麗麗、趙鼎新：《「克裏斯瑪權威」的困境：甯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

⁸除另有注明外，都引自楊大慶：《張平化的9.24報告與抓「黑鬼」運動》。

⁹楊小凱：《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中國之春》1993年5月號。

的造反學生被幾千人圍攻、毆打，這事件稱為「8.19」事件。

「8.19」事件後，湖南局勢越來越混亂，湖南省委已無法控制局勢，中央決定讓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不久的張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一書記。9月初，回湖南的張平化心裏沒底，派華國鋒赴京找陶鑄、王任重摸底。華國鋒從陶鑄和王任重那得到的資訊是：中央有組織反擊的意向¹⁰。張平化聽後心裏有了底，就沿襲反右鬥爭的經驗，決定對「向黨進攻的階級敵人進行反擊」。9月15日，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必須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要堅守崗位，堅持黨的正確領導；要挺起腰杆，挑起擔子，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湘潭市委副書記、湘潭電機廠黨委書記程貞茂聞風而動，抓出了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廠黨委宣傳部長蘭雲飛。9月20日，省直機關舉行幹部大會，由程貞茂介紹湘潭電機廠的經驗；張平化、王延春做總結發言，認為「8.19事件」由「壞事變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來了」。9月24日，湖南省委召開地、州、市委書記和省直屬各部門負責人會議，張平化發表講話，認為形勢已經發生變化，應該是進行反擊的時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反右鬥爭本是官僚們得心應手的行當，號令一出，行動迅猛，大批「黑鬼」迅速落入網中。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工人、幹部大都被打成「黑鬼」，被單位關押、批鬥，有的被迫自殺。參與文革的「地、富、反、壞、右」都受到打擊。

湖南省委第二書記王延春抓「黑鬼」時說：「原來說，對革命運動不理解，現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來是這樣搞的！」

「抓黑鬼」打擊面越來越大，張平化怕難以收場。9月28日，張平化作報告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止抓「黑鬼」。然而，正在反右興頭上的官僚們豈肯甘休？

9.28報告兩天後，《紅旗》13期社論，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打擊的「黑鬼」紛紛赴京告狀。來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張平化完全瞭解中央的態度，於10月12日，以個人名義發表《鄭重

¹⁰王碧峰：《中共湖南簡史》（1921～200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

聲明》，承認抓「黑鬼」是執行「資反路線」。

湖北¹¹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大批北京學生南下武漢串聯。到武漢的北京學生有兩撥，一撥是中學紅衛兵，以宋要武（宋彬彬）為首。因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為她改名而全國聞名。她是王任重請來的保省委的，受到湖北省委熱情的接待。另一撥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趙桂林為首的一批大學生，到武漢支持造反派，矛頭指向省委。省委把趙桂林這個大學生視為心腹大患。組織保守派紅衛兵對趙桂林等圍攻、驅趕，掀起了一股「大抓南下一小撮」的熱潮。

從9月1日起，湖北省委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形勢和對策，不斷向在北京的王任重請示。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查清南下學生的名字，以便運動後期處理。

由於反省委的北京學生住在湖北大學（現為中南財經大學）28號樓、29號樓，湖北省委指示湖北大學寫「呼籲書」。「呼籲書」說，北京來的「一小撮」是一股逆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漢來混水摸魚，破壞湖北、武漢的文化大革命。省委號召人們行動起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堅決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確路線。武漢市委也發出了「呼籲書」，組織保守派紅衛兵每天晚上在省委門前圍攻「南下一小撮」，高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在「大抓南下一小撮」的時候，9月12日，保省委的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在武漢大學成立。湖北省委、武漢軍區領導人乘30輛敞篷吉普車檢閱紅衛兵，以震懾南下造反的學生。

9月15日，省委在洪山禮堂召開大會，省長張體學「代表3千萬湖北人民控訴」趙桂林等「南下一小撮」。張體學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你要造我的反，造個卵子！」「九頭鳥」本來是罵湖北人的話，否定了文革以後，由於胡張體學這一故事，「九頭鳥」成了褒義詞了。

¹¹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電學院文革親歷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第114～117頁。

四川¹²

1966年8月上旬，各大專院校的官辦文革領導小組或官辦文革領導籌委會，在四川省委的統一部署下，接過「十六條」中「鬥、批、改」的口號，在學校全面開展「批三鬥四」（將學生和老師按政治分類，三類、四類是打擊物件）運動。他們計畫一樣一系抓一兩個人進行重點批鬥，作為試點。取得經驗後，再以教研組、班為單位廣泛開展批鬥活動。爭取一個半月批鬥完，以後就是改，在國慶日拿出成果，向國慶獻禮，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就可鳴金收兵。成都工學院被揪出來的「三、四類」教師就有216人（不包括當權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及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在內），其中還有個別學生，占全院教師總人數的26.2%。還有當權者暗中掌握的「三、四類」的教師。明的和暗的「三、四類」教師加起來400多人。「三、四類」教師每天掛著黑牌勞動，還常常逼迫他們唱「牛鬼蛇神歌」，如有反抗就被罰站、挨打。有的同時還被剃了陰陽頭、畫花臉。其他大專院校的情況也大致如此。¹³

9月初，一名省委負責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專院校「聯絡員」會議上說：「學生由於未抓到省委什麼大問題，總想藉口在成都地區製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責強加在我們頭上。要組織學生戳穿這一陰謀。」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現在革命幹部沒有發言權，工農兵說話就是圍攻學生。革命幹部和工農兵只有通過他們的子女來說話，因此，要組織工農送子參加紅衛兵，還要登報宣傳」，即宣傳「送子參軍」（即參加官辦的紅衛兵），並說：「這與革命戰爭時農民送子參軍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在成都和重慶以及南充、自貢、富順、新律彭山等地，官辦紅衛兵成了鎮壓造反學生的主力。

南京

在江蘇省委的支援下，南京地區成立「南京工礦企業工人赤衛隊」

¹²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總站教育系統聯絡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¹³ 蕭喜東：《文革中的領導與群眾：話語、衝突和集體行動》

（簡稱「赤衛隊」）。與剛成立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省紅總」、「省工總」對抗¹⁴。赤衛隊的骨幹成員是各工礦企業的黨團員、基層幹部、勞動模範和政治積極分子。省委為赤衛隊提供了經費和物資。¹⁵從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當造反派群眾組織將鬥爭矛頭指向省、市委主要領導人時，赤衛隊和保守派紅衛兵則將鬥爭矛頭指向已經被拋出來的原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和其他被省委拋出來的替罪羊——如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省社科所負責人孫叔平等人。當造反派群眾組織圍困省、市委的時候，赤衛隊和官辦紅衛兵全力保衛省、市委。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都發生了圍攻造反派的事件。如西安「8.16」事件，哈爾濱「8.17」事件，上海「8.25」事件，合肥「8.27」事件，青島「8.25」、「9.1」事件，等等。

為了防止造反派學生的衝擊，各地黨委動用軍隊、出動員警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為此，8 月 21 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1 月 22 日，中央發出《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但是，這些措施還沒有扭轉形勢。9 月 7 日毛澤東對《長沙、青島、西安等地情況報告》的批示說：「青島、西安、長沙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¹⁶9 月 11 日，中共中央發出四條指示：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凡是這樣做的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平息糾紛，絕不能把責任推給群眾等。¹⁷《人民日報》也於同日發表了《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¹⁴ 《地下省委復辟記》，載《工人造反報》，1968 年 1 月 21 日。

¹⁵ 《江渭清御用工具赤衛隊罪行錄》，《江蘇紅總》、《農奴戟》合刊，1968 年 1 月 3 日。

¹⁶ 《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 12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68 年，第 124 頁。

¹⁷ 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第 150 頁。

二、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為了阻止各地官僚們對造反派的鎮壓，把群眾發動起來搞文革，毛澤東出了新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實質，是各級黨委為了抵制造反、阻止文革進一步發展，對造反派群眾實行鎮壓。

據當事人王力回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說法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周恩來曾問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或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主席用用英文作了回答，說原來用 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 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 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周恩來說：「我懂得了。」¹⁸官僚們出於自衛和維持政權穩定的目的鎮壓造反派，是沿用共產黨的慣例，如果說這次鎮壓反對黨委的群眾是資反路線，那麼，1957年反右是最大的資反路線。

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社論說：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社論特別指出：「但是，兩條路線鬥爭並未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對資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採取折衷主義」。

當時認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也可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如徐向前1967年2月1日接見總後系統部份造反派時說：軍隊裏大多數當權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都是資產階級陣營裏的人。邱會作對第二醫科大學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邱

¹⁸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42～43頁。

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邱會作要保。¹⁹

毛認為，現在批判的不是工作組，不僅是五十天，而且是批判工作組撤出以後、那些採用新形式抵制群眾運動、控制群眾、不讓群眾造反的人，概括起來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部份群眾來保自己的人。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五十天（即工作組時期）要檢查，兩個月（即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8、9兩月）也要檢查。²⁰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周恩來，周下面就是陶鑄。全國範圍出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和陶鑄當然難辭其咎。但是，當時毛認為主要是陶鑄。三個月以後陶鑄被打倒，這應當是重要原因。

批判資反路線也暗含著對十七年的質疑：哪一次政治運動，群眾不受到資反路線的迫害？1957年反右運動就是最嚴重、最殘酷的資反路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催生出了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否定十七年的造反派。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紅極一時，是和批判資反路線相聯繫的。9月6日成立的「三司」，是北京地質學院的造反組織「東方紅」聯絡多所大學的造反組織建立起來的。「三司」的領導人是地質學院的學生朱成昭。8、9月間，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多次到地質學院瞭解情況，和地質東方紅總部的領導成員朱成昭、王大賓、田春林、伏慶是、劉長風等建立了聯繫。²¹這個背景使得「三司」成為衝擊資反路線的一支重要力量。「三司」的成立對全國造反派影響巨大，各地被官僚們打成「反革命」的造反者逃到北京來告狀時，不少人得到了「三司」的幫助，從「三司」那裏得到了資訊和膽量。湖南的楊曦光、重慶的黃廉的回憶中都談到三司對他們的影響。「三司」設在全國各省的「聯絡站」，大力支持當地的造反派，在各地衝擊資反路線和奪權時起了重要作用。

後來朱成昭成了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的戀人，他後來站在反對中

¹⁹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98頁。

²⁰ 同上，第44頁。

²¹ 王大賓：《王大賓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15年，第20～23頁。

央文革的一邊，也許與葉劍英有關。²²這是後話。

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意圖，10月6日，「三司」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10萬人的大會，會議的橫標是：「全國在北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陶鑄、張春橋及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出席了大會，陳伯達主持大會，他先讓江青講話。江青說：「我們支援你們這種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英勇行為！我們學習你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堅決和你們站在一起！」江青讓張春橋宣讀了中央軍委的《關於軍事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中有「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在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個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本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周恩來說，張春橋宣讀的這個「緊急指示」，「那不但是對全軍的指示，同樣適用於我們大中學校。」

參加這個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他們中間很多人在當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以後，衝破本單位封鎖、冒著風險來北京告狀的，有的還寫了血書。周恩來在講話中先肯定了江青的話，表示了對造反派的支持，回答了造反者提出的問題，要求各地黨委對來北京告狀的造反者「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要保證人身安全」，「工資照發」。²³朱成昭讓蒯大富代表三司宣讀三司誓詞。「蒯司令」的稱呼由此而來。實際上，蒯大富沒當過司令。

大會通過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通電，呼籲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千上萬被「當權派」鎮壓的造反派們，拿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武器，砸開了自

²²王大賓：《王大賓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15年6日，第100～105頁。

²³周恩來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6日，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己身上的枷鎖。

批判資反路線，首先得為運動初期打成「右派」、「反革命」平反。雖然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這些被打擊的人已經獲得了自由，但名譽沒有恢復，整他們時的材料（當時稱為「黑材料」）還在當權派手裏。有的當權者想把這批材料留下來，在運動後期「秋後算賬」。所以，造反派問當權派索要「黑材料」，有的單位衝擊檔案室，查抄「黑材料」。對當權派來說，這批「黑材料」很難處理：交出來，就是自己鎮壓群眾的罪證，也失去了「秋後算賬」的資本；不交出來，萬一被造反派發現，就會「罪加一等」。有的當權派就私下燒毀。1966年10月底，武漢水電學院有人發現行政大樓裏有人燒東西，造反派要當事人交出「黑材料」，但對方說沒有。造反派撬開櫃子，看到了不少各系上報的「黑材料」。造反派將這些材料公佈於眾，激起了群眾的憤怒，進一步擴大了造反派的隊伍。²⁴

被毛解放了的造反派，積極回應毛的號召，把鬥爭矛頭指向了鎮壓他們的「當權派」。成千上萬「當權派」遭受了空前的劫難。

三、十月中央工作會議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這個會，還請地方一些造反派頭頭在會上發言。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靠邊站了，工作組也撤了，為什麼還要召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中央工作會議呢？親歷者王力說：「以前批判資反路線主要是批判十一中全會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劉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發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十一中全會已經解決了。這次批判資反路線主要是解決8、9兩個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主要是總理、陶鑄）以及各省市領導人的問題。」「毛

²⁴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電學院文革面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124頁。

主席認為兩條路線鬥爭十一中全會以後在繼續……工作組撤走了以後，如果還是舊的組織原封不動，還是舊的機器、舊的紀律、舊的方式法，只是換了一種形式，還是不行。」「毛主席認為這一段沒有支持那些堅決擁護革命路線的、過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人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²⁵

毛認為，8、9 兩個月雖然搞得轟轟烈烈，群眾的積極性要保護，但沒有抓住主要點，沒有把主要矛頭對準走資派，沒有給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²⁶中央工作會議就是要排除干擾，進一步發動群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

會前，毛澤東向陳伯達講述了他的思想，陳伯達這個報告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後來下發時題目改為「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0月16日，陳伯達代表中央作了這個報告。這是這次會議的主題報告。報告高度評價前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和群眾的造反行動，指出形勢大好。報告分析了各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的表現形式，批評了各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行為。他批評了「血統論」，並尖銳地指出：「為什麼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撐權？難道是他們的血統高貴嗎？」「最好讓工農子弟和普通幹部子弟來擔任。」報告要求各級幹部去掉「怕」，放手發動群眾。他批評了「用宗派主義來代替黨的階級路線」，要求「堅持用毛主席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毛對這個報告評價很高，10月24日晚11時批示：「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二本。」²⁷

陶鑄的秘書馬恩成參加編會議簡報，他在回憶文章中談到，參加會議多數幹部對陳伯達上綱上線不理解，有的還對造反派的衝擊有怨言。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發言說，現在群眾分成兩派，兩派是革命群眾，都應該支持，不能支一派壓一派。張春橋聽後馬上指責說：群眾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另一派保守，代表資級反動路線；你兩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線是非，「和稀泥」。天津市委第二

²⁵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42頁，第44頁。

²⁶ 同上，第50～51頁

²⁷ 《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68年，第141頁。

書記趙武成發言中抱怨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被紅衛兵逼得心肌梗死而猝死。於是，趙武成就成了小組裏的批判重點。康生來這個組參加會議，當他聽說萬曉塘猝死後，保市委的一派群眾上街遊行時，聲色俱厲地指著趙武成說：「你們這是拿死人壓活人，公開反對毛主席！」其他組受重點批判的，有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中南局第三書記兼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華東大區則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各組的批判火藥味很濃，都上綱上線。²⁸

會上印發了一些各地鎮壓造反派的材料。例如，四川南充一位婦女受南充地委打壓的材料。中共南充地委把2千多名學生打成了反革命。這位婦女說：「如果這兩千多學生都是反革命，那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委教育的。如果出這麼多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有問題。」

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全體大會上作了檢查。

劉少奇9月14日就寫了檢討，給毛寫信：「把我作為錯誤典型，把我拿出來批評，對黨對人民有利，對推動文化大革命有利，我願意這樣做。」²⁹毛當天就對劉少奇的檢查作了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³⁰毛說的後半段是指劉不但檢討了五十天，還檢討了1962年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³¹在工作會議期間，10月23日劉再次檢討，是在9月14日檢討的基礎上作了些修改補充，會上印發全黨。³²這個一萬多字的檢查中說：「我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把革命的群眾運動中出現的正常現象和運動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點，看成『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因而作出錯誤的判斷，這就勢必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路線。」³³

²⁸馬恩成：《陶鑄在1966年》，《百年潮》，1966年，第11期。

²⁹《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34頁。

³⁰《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68年，第47頁。

³¹《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47頁。

³²同上，第48頁。

³³《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1966年10月23日》，載史實編《文革中的檢討書》，時英出版社，臺北，2011年，第16～25頁。

鄧小平在檢查中說，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他承認派工作組是犯了嚴重錯誤，進一步上綱上線：「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志指導方針的。」談到文革，「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他對林彪當接班人表明態度：「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毛主席請示彙報，既最瞭解主席思想和意圖，也最瞭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準和領導水準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的向林彪同志學習。」³⁴

10月24日，小組會上開展對劉少奇的批判，與會者爭先恐後地發言，好像誰不批劉少奇誰就不忠於毛主席，誰就不革命了。

10月25日，毛澤東在大會發表講話，他說：「想要使國家安全，蘇聯史達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是搞了個一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談到文革，他說：「文化大革命這把火是我點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不那麼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

³⁴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1966年10月23日》，載史實編《文革中的檢討書》，時英出版社，臺北，2011年，第116～123頁。

的，是自然的。」他安慰並勉勵幹部們：「路線錯了，改了就是了。誰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³⁵

會後不僅下發了陳伯達的報告，還向全黨全國公佈了毛澤東 8 月 5 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成為進一步發動群眾「炮打司令部」的思想武器。

四、批判資反路線的後果

中央工作會議將要結束和結束以後，各地學生先後召開的大規模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將造反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這一輪鬥爭 10 月間在學校首先發動，11 月發展到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 11 月中到年底。「十六條」雖然提出放手發動群眾，由於各級領導的阻撓，實際沒有發動起來。批判資反路線以後，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1957 年反右以後，一個小單位的黨的領導人都是黨的化身，誰冒犯他，誰就要倒楣，至於省市黨委書記那樣的高官，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現在，毛澤東批評他們打擊造反群眾是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地方各級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這對造反派來說，是一件多麼值得高興的事！造反派有一種被解放的痛快感。在他們受壓制時唱「抬頭仰望北斗星，我們想念毛澤東」，他們解放後就高喊「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他們更加無所顧忌、勇往直前了。當然，也有人借機對過去整過自己的官員們發洩仇恨、施行報復。

10 月初，我到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串連。10 中旬到 11 月，我又到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湖南、上海、青島等地串聯，看到工廠、機關、商店的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批判會一場又一場，大字報貼滿牆壁。學生和工人結合起來，揭露和批判資反路線。一些人控訴在文革初期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不過，申訴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得不到支持，因為當時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³⁵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10 月 25 日，引自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第 2 版。

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轉折。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聯繫的。這裏說的真的造反派是指矛頭指向「當權派」、即指向特權階層的那一些個人和組。這一批人在運動初期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在工作組的五十天鎮壓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們雖然得到了自由，但還沒有從陰影中走出來。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才真正走上政治舞臺。

在批判資反路線以前，各級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用種種名義，用各種方式，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造反的群眾；在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造反派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官僚集團。造反的洪流猛烈地衝擊官僚體系，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受到衝擊。大批官員家庭面臨厄運。在這以前，群眾中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在這之後，由於保守派是執行資反路線的力量，官辦的群眾組織徹底瓦解。造反派紅極一時，但由於沒有保守派的對立，在這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開始出現分裂。

如果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使得大批中學生用「紅色恐怖」的方式「破四舊」的話，那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則是較為成熟的大學生和部份工人，採取激烈的方式衝擊官僚體制；如果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只是在校園裏掀起波濤，那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後，在全國各個領域都掀起了波濤。批判資反路線，毛澤東解放了一大批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他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更高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更親了。

批判資反路線時學生到工廠串連，發動工人參加文革。這時還不能組織跨行業組織，只有少數大膽的年輕工人和學生走到一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從學校燒到了機關、工廠、農村。在前一段時間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教師，對待官僚體系的態度更為激烈，對政權的衝擊更為猛烈。

上層的軍政官僚們，他們對打倒彭、羅、陸、楊是支持的、積極的，對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更是積極。但是，當全體官員都受到衝擊，他們就不滿了，從而出現了反彈。

10月27日，在中央召開的大區及省市第一書記的會議上，書記

們提出了很多緊急問題。散會時向外走著，葉劍英元帥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詩詞：「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忽然發現大家注意到他，就不念了。這是葉劍英按《虞美人》詞牌韻律填寫的一首詞，詞的下半部份是：「嚴關過盡艱難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為公，共產宏圖大道正朝東。」陳毅元帥為此手書「絕妙好詞」。穀牧說：「葉帥這首詞反映出的是更多不理解和準備再一次戰鬥的決心。」穀牧說的「再一次戰鬥」就是1967年的「二月抗爭」。³⁶

這時，有的地方的官僚們作了一個很無奈、很愚蠢的反抗，他們組織人用紅色油漆把大門、街頭大片牆壁塗成紅色，搞所謂「紅海洋」。他們以為，這樣群眾就沒有地方貼大字報了。青島市的「紅海洋」最為突出。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為此發了專門通知³⁷，制止了「紅海洋」的氾濫。

批判資反路線的衝擊波，沖跨了官僚體系，黨的組織全面癱瘓，各級政權也處於半癱瘓狀態。在這個情況下，根據毛澤東的意思，造反派向各級政權機構實行了全面奪權。

³⁶ 《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22頁。

³⁷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制止大搞所謂「紅色海洋」的通知（1966年12月30日）

第九章
群眾組織的興起、
活動和消亡



紅衛兵抄家后查封的私宅

1966年8月，毛澤東恩準老百姓有結社自由的權利。這項權利本來是寫進憲法的，但中國不是憲政國家，憲法只是一紙空文。毛澤東給了這個權利，群眾組織就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這些群眾組織開始只限于本單位，後來發展到跨單位、跨行業的大規模組織。群眾組織打破了單位黨組織的約束，沖垮了官僚機構，沖垮了舊的秩序，實現了毛澤東期待的「天下大亂」。在準許建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時，毛澤東留了一手：不允許建立跨地區的全國性組織。這條限制是防止群眾組織調動全國性資源與中央政府抗衡。盡管設下了這一限制，但是，群眾組織，這個毛澤東從魔瓶里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難以降服。這個實現「天下大亂」的工具，在以后實現「天下大治」的過程中，就成了障礙。那時的毛澤東，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復秩序的鐵腕官僚們，鎮壓他曾經支持的群眾組織，群眾組織的頭頭們都成了犧牲品。

為了發動文革，毛澤東除了恩準結社以外，還給予老百姓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各個群眾組織都可以辦小報，當時紅衛兵小報有五千多種（也有人估算為八千多種）¹有的發行量很大，如清華《井崗山》報在全國多個城市有航空版印點，郵局可以訂閱。每個人都可以印傳單，傳播各種信息。1998至2003年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文革中曾在國家計委機關刻鋼板、印傳單。學生（實際有一些工人和教師）可以到全國各地串連，人們在短期內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一、紅衛兵和造反派

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不知道紅衛兵和造反派有甚么關係，實際上，紅衛兵是群眾組織，造反派是眾多造反群眾組織匯合起來的一個派別。從總體上看，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有兩個大的派別：造反派，保守派；此外還有逍遙派，即哪一派組織也不參加的人（運動初期逍遙派很少，隨著運動的進展，逍遙派隊伍逐漸擴大）。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紅衛兵；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保守的，就

¹ 王銳：〈有關文革小報的幾個話題〉，載《昨天》，2012年，第10期。

是保守派紅衛兵。在一個城市可能有很多紅衛兵組織同屬一個派別。就造反派而言，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但這些派別全都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都是在毛澤東的恩準下造毛澤東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說是「跪著造反」：跪在毛澤東的面前，看著毛澤東的臉色造官僚們的反。就我親身的經歷來看，當時區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矛頭向上，向黨內走資派「開火」的派別是造反派；矛頭向下，和掌權者一起打擊反黨委、反工作組的群眾的派別，為保皇派（後來周恩來說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造反派開始是少數派，隨著運動的深入，造反成了時尚，隊伍不斷擴大。後來，這個群眾組織反對這一位領導幹部，卻保護另一位領導幹部；那個群眾組織保護這個領導幹部，卻反對另一位領導幹部。因此可以說，除了官辦的紅衛兵、赤衛隊（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參加群眾組織的人都是「造反派」。他們的差異僅限于「造反」對象的不同。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對地、富、反、壞、右，都是排斥和打擊的，都盡力保持隊伍的「純潔性」。不過，保守派隊伍更為「純潔」。

紅衛兵開始出現是造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號才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出現后，其他學校仿效，也成立紅衛兵。也有的學校不叫紅衛兵，北大附中就叫「紅旗戰鬥隊」，「紅旗」的頭兒彭小蒙很受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隊」。這些老紅衛兵造誰的反？造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反，造「四舊」的反。如果按照嚴格意義上來說，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強。老紅衛兵反學校領導是因為他們父輩地位高于學校領導和老師，他們又得知內部消息，所以他們不應當算造反派。破「四舊」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風險的，而老紅衛兵造老師的反是有恃無恐的。後來，文革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紅衛兵的父親被打成了「走資派」，他們就不加掩飾地保護幹部、打擊造反派，成了是名副其實的保守派。

大學的紅衛兵是在中學之后出現的。以清華為例，蒯大富被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打成了反革命之后，出現了一批比較溫和的反工作組的學生，成立了一些「戰鬥小組」，寫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本書作

者就是其中之一。我們這些反工作組的學生本來是繼蒯大富之后起來的，但蒯大富已經被工作組搞得很臭。給他平反以后，他想參加這樣的群眾組織，沒有人敢接納他。這說明工作組的影響很深。工作組主政期間扶持成立了以賀鵬飛（賀龍之子）、劉濤（劉少奇之女）、李黎風（李井泉的兒子）、喬宗淮（喬冠華的兒子）等為首的「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臨籌」），我們稱之為「偽臨籌」。「臨籌」成立時，我在大禮堂草坪南頭日晷附近的席子上貼了一張幾十個字的小字報：「毛主席說『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高干子弟沒有吃過苦，他們不可能是左派；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必須是左派，高干子弟不是左派怎能當『臨籌』的領導？」「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是毛澤東和他侄子毛遠新的談話中的一句話。這個談話在文革前就傳達了。「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必須是左派」是當時公認的政治標準。這張小字報貼出后，周圍寫滿了批評和支持的批語。

「臨籌」領導成員是工作組倚重的對象。8月7日，「臨籌」提出結束對工作組的批判，把斗爭方向轉到批「黑幫」，即「八七建議」²。顯然，「八七建議」是保工作組的，背后是保王光美、保劉少奇。8月8日，反對工作組的一派學生組織「八八串聯會」，否定了「臨籌」的「八七建議」。8月9日，支持「臨籌」的劉菊芬³等針鋒相對地成立了「八九串聯會」，堅持「八七建議」。「八九串聯會」是在王光美的建議下組織的。清華大學就這樣分為「八八」派和「八九」派，一派要批工作組，一派要立即批蔣南翔。當然，「八八」派并不保蔣南翔，只是說肅清工作組的影響以后再批蔣南翔。「八九」是多數派，是和「臨籌」一體的掌權派。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后，「八九串聯會」一下子就翻牌成為「清華大學紅衛兵」（8月4日，劉菊芬組織了「自控系紅衛兵」這是大學生中較早的紅衛兵組織）。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不到一個月改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我也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系里的頭頭

² 閻淮回憶說：王任重指示「臨籌」，根據總理講話精神，提出「八七建議」。見孫怒濤主編《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49頁。

³ 劉菊芬，清華自動控制系學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寧一之女。

之一（我系的紅衛兵是我和任彥申⁴等人組織起來的）。8月22日，周恩來第二次到清華召開萬人大會，我們爭取到了參加保衛周總理的機會（保衛工作實際是中央保衛局做的，我們只是在會場周圍帶著紅袖章站崗）。官辦的「清華大學紅衛兵」有紅綢子做的袖章。我們把王敬同學的紅床單撕了做紅袖章，其他班也是自己想辦法弄的各式各樣的紅袖章。當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少數派，在強大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面前，我們感到勢單力孤。自控系的孫銀基寫了一篇〈少數贊〉，對我們鼓舞很大，孫銀基（后改名為孫怒濤）也在造反派中一舉成名。

從清華大學的群眾組織可以看出，「清華大學紅衛兵」是反校黨委的（他們從父母那里得到信息，最早反蔣南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反工作組的。但「清華大學紅衛兵」只反校黨委，不反工作組，即不反劉少奇。隨著運動的深入，「清華大學紅衛兵」就成了保守派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造反派嗎？當然是。但是，它不願意接納蒯大富。蒯大富就想另外成立組織。蒯大富回憶說：「張春橋見我獨往獨來，建議我要有自己的組織，朱成昭、韓愛晶⁵也建議我成立一個組織。」⁶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9月24日，蒯大富等組織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正式成立，成員只有和他一起被打成反革命的幾十名「蒯式人物」（這是工作組對他們的稱呼，是政治上的貶義）。它的宗旨是：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清華大學紅衛兵，徹底為「蒯式人物」平反。他們想在校廣播臺上廣播成立宣言，賀鵬飛不同意。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三司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等人參加並發表支持的講話，清華井岡山才發展起來。

北京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先后成立了三個松散的全市性組織。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27所院校的29個群眾組織參加了一司。北京輕工學

⁴ 任彥申，文革以后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

⁵ 朱成昭，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地質東方紅的負責人；韓愛晶，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北航紅旗負責人。

⁶ 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38頁。

院的汪彥群（汪東興之女）任指揮，「一司」是保守派紅衛兵的聯合組織，到年底就解散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紅旗」，也有保守派紅衛兵。臨時總指揮是周太安（海軍副司令周希漢之子），除了「北航紅旗」以外，參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組織。這個司令部由於成員混雜，沒有搞甚么大的活動。

9月6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成立，稱為三司。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參加了三司。三司的負責人是地質學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組織，成員很多是在資反路線中受到打擊的學生。三司在全國造反派中很有影響。

1967年春夏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組織又重新組合為「天派」和「地派」。

「天派」主要成員有：「北航紅旗」、「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團派）。因「北方紅旗」是骨干力量，所以稱「天派」。「地派」主要成員有：「地質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公社」、「清華井岡山」（四一四派）等。因「地質東方紅」是骨干力量，所以稱「地派」。

「天派」和「地派」沒有甚么大的原則差別，同一派內部的看法也不一樣。如「地質東方紅」和清華的團派觀點比較接近，而清華四一四卻參加了「地派」。天地兩派之間也沒有甚么大的沖突，有時搞一些小動作，如天派的韓愛晶和蒯大富在北師大扶持了一個和「井岡山公社」對立的小組織，和譚厚蘭作對。

二、造反派的隊伍狀況和政治訴求

文革之後，「造反派」成了「罪惡」的代名詞，人們把文革中所發生的一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實際上，1966年5月到8月，將大批學生、老師、工人、普通幹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將成千上萬的市民趕出城市，將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對「五類分子」的大屠殺和清查「內人黨」等駭人聽聞

的重大慘案與造反派無關。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對大批無權者殘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⁷。殺害遇羅克、張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驅，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規模的迫害者都是當權者決策和組織實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無辜。他們是毛澤東制造「天下大亂」的主力，對中國文化、中國優秀傳統的破壞有重大責任。他們在沖擊官僚體系的時候，也是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殘酷迫害。造反派群眾組織互相爭鬥，甚至制造大規模武鬥，殃及無辜。他們是實現毛澤東烏托邦的推手，是堅持毛的極左路線的先鋒。如果他們的主張（即毛的主張）得逞，中國要倒退很多年，會更加遠離現代化。

對於文革中的批判，周恩來有一個說法。他說：「堅持維護主席路線的當然是左派，搖擺不定的當然是中間派，右派就是比較保守派，我建議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⁸按周恩來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一些中央領導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動起來的。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十六條」都是鼓勵造反的。

「十六條」一方面制止各級黨委打擊造反群眾的行為，另一方面也給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讓大家放心大膽的造反。當時，「矛頭向上」（批評「當權派」）才是鬥爭的大方向。被批評的「當權派」的級別越高，批評者誰就越革命。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說：「整個中南海，包括我在內，都可以反對，只有除了黨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對，還有我們的林彪同志。」⁹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起來的。離政治中心遠的地方，造反派起來晚一些，大城市一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從重慶「8·15」、成都「8·26」、遼寧「8·31」等大學生造反組織的名稱可以看出他們起來的時間。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廠的造反組織是在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出現。

⁷ 郭建、王友琴認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有的單位由造反派掌權，應當對迫害行為負責任。如北京農業大學。

⁸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066年10月28日。

⁹ 陶鑄7月27日衛生部的講話。

上海「安亭事件」以後發展起來的。可以說，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起的；也可以說，造反派是被資反路線逼出來的。

為甚么學生會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標準，使得班上同學逐漸地分成了界限不很分明的兩個群體：一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進步，靠攏黨組織，因而得到了黨組織信任；另一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黨組織保持距離，政治運動不積極，通稱為政治上落后的學生。前者是優勢群體，后者是劣勢群體。前者在入黨、提干、畢業分配等方面都占有優勢地位。當然，優勢和劣勢隨著政治運動是有變化的。有的優質學生，父親在「四清」中出了問題，他又沒有和父親「劃清界限」的突出行動，就會成為劣質分子。

筆者 1955 年 10 月以後到十幾個城市串聯所看到的得知，優勢群體參加保守派，劣勢群體參加造反派的現象，在社會上也比較普遍。

處于優勢群體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出生于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人。這些人不僅在入黨、當官、分配工作、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他們的優勢地位是文革前十七年制度給予的，當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維護者。他們肯定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團。

處于劣勢群體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調增工資、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權者的壓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這些人一直感到官員們對他的壓制，他們看到官員被打倒，有一種痛快的感覺。

保守還是造反除了社會地位的影響以外，還有一些淺層次的原因。

處于保守地位還有以下情況：吸取了 1957 年的反右鬥爭和其他政治運動的教訓，心存恐懼，不敢反對黨委和工作組；由于多年宣傳，對革命領導幹部心懷崇敬、一直把領導幹部當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謹小慎微、膽小怕事的人，是不會輕易造反的。所以，一開始造反派是少數，隨著運動深入，這些人膽大了，看到揭露出來官僚的問題，造反派的隊伍不斷擴大。保守派并不反對文革，只是反對顛覆現存秩

序，反對褻瀆多年崇敬的權威。

參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幾種人：頭腦簡單的年輕人，他們真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響應號召造反；平時「思想活躍」、不尊重領導的人。如果某人在上一次政治運動中收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就可能成為造反派。

造反派的頭面人物，大多是處於優勢地位的人，他們愛說話、愛表態，好打抱不平，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小鄧拓」、「新右派」、「反革命」，是當權派把他們「逼上梁山」的。他們「根紅苗正」，不怕對立面「抓辮子」。在講出生，「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氣氛下，作為造反派頭頭，沒有這樣的政治條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當多的是獨立思考、敢作敢為的人，他們反秩序、反權威的特點，是毛制造「天下大亂」時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時，他們必然是恢復秩序的官僚們打擊的對象。毛澤東設想「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如果還是在極權的官僚體制下的「大治」，就包含著造反派當犧牲品的殘酷結局。

一些單位群眾造反的一個原因，是當權者在群眾中搞宗派，拉攏一部分人，歧視一部分人。在武漢水電學院，工作組進校前，黨委將師生分為左、中、右三類，左是依靠對象，中是爭取對象，右是打擊對象。1966年6月中旬，對此知情並且不滿的學生貼出了題為〈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揭露了將學生分類的內幕，引起了轟動，師生自發聚會抗議。黨委對抗議學生施以鎮壓，制造了「6·18事件」。被鎮壓的師生就成了造反派。¹⁰1966年11月，重慶江陵機器廠技術員高德安到技術科找支部書記張角光談事情，偶然看到張書記的辦公桌上的一份技術科人員「排隊」名單。黨組織把群眾分成四類，一類是依靠對象，二類是團結對象，三類是批評教育對象，四類是打擊處理對象。高德安手疾眼快，從書記辦公桌上抓起來就看。張書記急了，兩人就在辦公室里拉拉扯扯，追來跑去，高德安一邊躲閃一邊看，看清了才還給了張書記。高德安離開支部辦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

¹⁰ 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電學院文革親歷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第95、97-100頁

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隊」名單情況考訴了其他人，在他們這五個人里，沒有一個人排在一類，排在三類的有兩人，高德安被排在四類！高德安為甚么被排成四類呢？后來才知道他在北京工業學院讀書的時候，因為「言論」問題被學校記入了檔案，運動一來，首先被劃入打擊對象。五個人憤憤不平，就向技術科職工講了，絕大部分職工聽到后都表示不滿，并希望他們去找書記把問題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一上班，他們五人要求張書記把「排隊」名單一事說清楚，張書記堅守秘密。怎麼辦？高德安提議：現在社會上已經開始成立各種戰鬥隊了，我們也成立一個「尖刀戰鬥隊」，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戰鬥隊」的逼迫下，張書記說出了「排隊」是廠黨委讓搞的。此事傳開以后，各車間、各科室紛紛向黨支部交出「排隊」名單并當眾銷毀。高德安是尖刀戰鬥隊的隊長，后來是紅軍戰鬥團的團長，再后来成了軍工井岡山江陵兵團的「一號勤務員」。¹¹

在社會上，長期受到打壓的「地、富、反、壞、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們沒有造反的權利。造反組織也不敢吸納他們，怕被對立面指責「隊伍不純」。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如當過右派的武漢軍區作家白樺¹²，寫了支持造反派的詩篇，并親自在街頭散發。

到底參加哪一派，要觀察形勢，判斷大局，從而作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如果說，文革初期是反黨委還是保黨委將人們分為兩派的話，以后發生的層出不窮的事件，迫使人們不得不做出選擇。每發生一起重大事件，人們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支持誰？反對誰？當時的說法是「站隊」。多年殘酷的政治運動，使得多數人選擇政治風險小的這一派。「站錯了隊」是很危險的。在政治瞬息多變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斷地「站隊」，不斷地辨別政治方向，不斷地表忠心。當時流傳一句話：「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站錯了隊就要挨整，寫檢查，請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是他們做選擇的主要依據。然而，

¹¹ 何蜀整理：〈李木森回憶〉，《往事》第32期。

¹² 1980年代，白樺寫電影劇本《苦戀》（拍成電影改名為《太陽和人》）受到批評。

對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不同的理解，就參加不同的派別。前面說的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是他們的底色，在選擇時起著潛在的作用，但到底參加哪一派還是依勢而定。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還有人際關係因素。上海柴油機廠的政工系統的干部，從廠黨委到車間黨支部，基本是轉業軍人干部，生產和行政系統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這兩個系統的干部平時就談不到一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時終於顯現兩派。以政工干部系統為核心組成了「東方紅總部」，其成員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車間級黨支部干部居多。這種社會地位的人群應當參加保守組織，但因為反對生產系統的廠長朱文斌，說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認為朱的問題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結論，保護了他，所以「東方紅」就反對上海市委，因而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參加過「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總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會¹³。除了這種群體性的人際關係以外，一般成員派別的選擇，個人關係也是一個因素。與自己關係好的人在這一派里，就跟著參加了；這一派有兩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就不參加這一派。

從表面看，造反派反對的只是偏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當權派。從深層看，造反派中的激進的一翼是否定十七年的。但是，否定十七年，並不是說十七年因政治上專治而剝奪了人權、因經濟上統制而極度貧困，而是說十七年是「資產階級黑線主導」。在信息單一灌輸的年代，在當時的話語條件下，對老百姓來說，「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就是「壞」，就是「惡」，他們借反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制度的「惡」。造反派中除了極少數人外，沒有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訴求，這在當時是滔天大罪，是要殺頭的。

當時造反派的訴求主要包括：揭批當權派和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被當權派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

¹³ 李遜：《革命造反的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2，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856-865頁。

群眾，清查和燒毀所有整人的「黑材料」¹⁴；深入全國各地煽風點火，鼓動受害群眾起來造反；壓制、瓦解、摧毀保守派組織。這些都是中央十月工作會議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訴求超越了十月會議的目標：河南的造反派紅衛兵從一開始就追究前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大饑荒」的責任；貴州的造反派組織調查大饑荒的情況。有少數造反者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崛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學生紅衛兵那樣搞「血統論」，「破四舊」，他們的鬥爭矛頭很明顯：當權派。至於這位當權派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先打倒再說！在批斗當權派和反對保守派時，他們也沿用老紅衛兵的一些作法——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示眾，以及各種形式的身體摧殘。他們也在批斗當權派時有時將「反動學術權威」甚至「地、富、反、壞、右」抓出來陪鬥。他們也採取過幾次影響巨大的「破四舊」行動。如譚厚蘭為首的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破壞了山東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是積極地表現自己的革命性，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你們走資派，我們的走資派比你們的走資派職務更高。一些省市，職務最高的當權派時各派群眾組織爭奪批鬥的對象。「革命競賽」是文革中極端手段出現的原因之一。

三、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鬥爭

工人造反組織一般是由學生「點火」並依靠學生造反組織而興起的。1966年7、8月間，工人還沒有結社自由，個別勇敢分子和造反學生串聯，被本單位打成了反革命。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得到了解放，成了工廠造反派的頭面人物。1966年11月發生上海「安亭事件」以後，各地工人造反組織風起雲湧，上海「一月風暴」

¹⁴ 中共號召群眾相互檢舉、揭發，檢舉、揭發材料都裝在被揭發者的檔案袋里，政治運動中，還要整理、收集被整者的材料，這些材料也裝進被整者的檔案袋里。造反派稱這些材料為「黑材料」。

以后，工人造反組織占領了舞臺中心。學生紅衛兵的角色不斷轉變：從到工廠企業「點火」者，到工人造反組織初期的參謀，轉而成為政治舞臺上的輔助力量。工人造反一旦登上政治舞臺，其氣勢、其力量、就大大超過了學生。學生紅衛兵的行為主要出于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工人造反派的行為，除了受意識形態的指引以外，還出于社會實際情況。

保守派群眾組織 1966 年底垮臺以后，造反派群眾組織成了主流。按照毛澤東的意願，如果這些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按他的要求建立新的秩序，就可以實現「從大亂走向大治」。但是，造反派群眾組織成了主流以后，各組織之間展開了無休止的「派性鬥爭」。「派性鬥爭」的激烈程度和殘酷性，遠遠地超過了早些時候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不少地方還動用了現代武器，相互間大開殺戒。1967 年春，有些省、市黨委和當地駐軍借「二月逆流」的機會，把已經垮臺的保守派重新扶持起來（有些中小城市的保守派組織一直沒有垮臺），參與「派性鬥爭」。這就出現了造反派之間、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大混戰。毛澤東的「天下大治」目標成了泡影。

同樣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造反，為甚么相互還打起來了？主要原因大體有三個方面，一是認識方面的差別，對某些重大問題或某主要領導幹部持不同的看法；二是不同的「山頭」之間的鬥爭。在一月奪權中，為了權力分配，不同「山頭」之間的分歧激烈化、公開化。造反派群眾組織一旦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組織，社會上不同的勢力就會介入，支左部隊中不同觀點（如野戰軍和省軍區）各支一派，派別鬥爭就更尖銳、更持久了。

造反派群眾組織出現「山頭」，有其自然的過程，從根本上說，還是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和制度根源。造反派一旦成了頭頭，階級鬥爭的思想、權力鬥爭的手腕、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概、「以我為中心」的權力欲望，就會表現出來。沒有民主法治的指導思想，沒有制度創新的合理目標，造反派組織一旦壯大起來，就會成為獨霸一方的「山大王」。

以南京為例。

南京大學是南京地區重點大學之一。文革的「火種」主要是通過

南京大學傳播到南京地區的。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廣播以後，南大隨後發生「6·2 事件」，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被打倒¹⁵。南大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南京大學出現了三個不同類型的紅衛兵組織，即「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南京大學 8·27 革命串聯會」（簡稱南大 8·27）和「南京大學紅旗戰鬥隊」（簡稱「南大紅旗」，批判匡亞明，保工作組）。「南大紅旗」參與社會上的保守組織垮臺以後，就剩下「南大紅色造反隊」和「南大 8·27」。這兩個造反的學生組織走向社會，與工人結合，推動了社會上造反派跨行業組織的建立。

隨著對資反路線的批判，官辦的「南京紅衛兵總部」和「南京工人赤衛隊」等保守組織垮臺。1966 年 11 月 1 日成立的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省紅總」），是南京最大的「山頭」，這是一個激進的造反組織。該組織的發起單位和核心力量是「南大紅色造反隊」。主要頭頭包括南大政治系中年教師文鳳來、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戴國強（戴因違反了新華社記者不能參加當地群眾組織的規定，被姚文元點名撤銷記者職務）、南京市新華書店職工孔繁潔，南大外文系法語專業學生施威、姚金璜、耿昌賢等。「省紅總」包括很多下屬組織，其中最具有戰鬥力的是「省工總」和「省紅總中專總部」。

「省工總」（全稱是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是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成立於 1966 年 11 月中旬，成立時得到周恩來的同意。「省工總」原來成員比較複雜，1967 年 1 月 28 日改組後，以大中型企業的產業工人為主。領導成員包括晨光機器廠「革聯」頭頭朱開地、長江機器廠「紅旗」頭頭魯學智等人。改組時原「省工總」部分頭頭拒絕交出權力。於是形成「新工總」與「老工總」并存的局面。

南京造反派另一個「山頭」是「南京 8·27」。它是「南大 8·27」的推動下建立的。成立於 12 月 20 日。「南京 8·27」包括部分工人和農民，但是其主體依然是大中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南京 8·27」雖然

¹⁵ 聶元梓大字報廣播以後，南京大學也貼出了針對校黨委的大字報。匡亞明將 270 多個卷入大字報事件的老師、學生定性為「反革命」和「右派」（溧陽分校事件）。這個情況被匯報到中央後，康生依據毛澤東對北大問題的處理意見作出裁決：南大師生貼大字報是「革命行動」，匡亞明的鎮壓反映了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這時劉少奇在北京主政，打到匡亞明和打到陸平、蔣南翔應該是同一種指導思想。也有人認為，搞匡亞明跟江蘇省委江渭清有關係；北京拋出了北大的黨委書記陸平，江渭清把匡亞明揪出來以保住自己。

也是造反派，但與「省紅總」相比，其政治立場較為穩健、溫和。

1967年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帶動下，南京市不同「山頭」的頭頭召開聯席會議，商議奪權問題。會上「省紅總」與「南京8·27」就相互之間的統屬關係發生爭議。「南京8·27」方面以退出行動相威脅，加入抵制活動的還有其他小「山頭」。但「省紅總」領導人不顧這些抵制，繼續組織其他激進勢力發動了「1·26奪權」。「南京8·27」內的激進派成立了一個「南大8·27奪權大隊」，轉入了「省紅總」陣營。南京軍區對奪權行動表示了支持。隨後以「省紅總」及其支持者為主體的「奪權委員會」宣布接管權力。收到排斥的「南京8·27」及其支持者不甘心。他們很快策動了一場關於「1·26奪權」的爭論。南京地區的造反派由此分成兩大陣營：以「省紅總」（「省工總」是其中的主力）等這些「山頭」為一方，以「南京8·27」等另一些「山頭」為一方。前者說「1·26奪權好得很！」，后者說「1·26奪權好個屁！」南京造反派就分為「好派」和「屁派」。此后，「好派」和「屁派」之間展開了持續的派性鬥爭。¹⁶

類似南京造反派中「山頭」間的鬥爭各地都有。此外，同一個造反派組織分裂為不同的組織，分裂後出現新的「山頭」，期間的派性鬥爭也是各地的普遍現象。

造反派為甚麼會分裂呢？還是以我親身經歷的清華為例。

1966年9月底，清華大學有三個學生組織：以劉濤、賀鵬飛等為首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以「八八派」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保守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逐漸式微，到1966年年底解體。剩下的兩個組織都是造反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溫和一些，「清華井岡山兵團」激烈一些。清華大學紅衛兵解體以後，其中很多人歸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旗下。在江青的說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19日，清華井岡山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合為「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此時保守派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造反派在清華一統天下。

¹⁶ 董國強：〈南京文革群眾運動的起源和派性認同〉，載《記憶》2011年8月/總73。

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總部就是管理清華的最高領導機構。

雖然聯合了，井岡山兵團內部在一些問題上常有爭論。例如，1967年「捉鬼隊」通過欺騙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華，在西大操場批斗，號稱「智擒王光美」。原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的很多人持批評態度。1967年4月，由于對待幹部問題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的「四一四串聯會」，這個串聯會的主要內容是落實幹部政策。這實際上是「清華井岡山兵團」之外的一個組織。由于蒯大富要在5月30日成立以他們為主體的革委會，「四一四」釜底抽薪，5月29日正式從清華井岡山兵團里分裂出來成立「井岡山四一四總部」。這樣，清華就出現了兩個對立的組織：「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老團兒」，是掌權的多數派）和「井岡山四一四總部」（簡稱「四一四」，「老四」，主要成員是原來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在野的少數派。）我也成了「老四」。

清華的造反派為甚么分裂為兩派？從人員構成上，四一四中「優勢」學生較多，「團派」中「劣勢」學生多。「優勢」學生雖然造反，但比較溫和。團派比較激進。這種差別，在他們合并以前就有顯示。這兩派還有看法上的分歧，關鍵是對十七年的看法。

「團派」認為十七年的教育路線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廣大的幹部都是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所以，十七年必須全面否定，舊清華必須「徹底砸爛」。「四一四」派認為十七年成績是主要的，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只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廣大的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絕對不能「大翻個兒」。

蒯大富不承認「四一四」是造反派，說他們是「掛著紅布條的小地主」，¹⁷后者當然不樂意。「團派」當然是「響當當的造反派」了。那個時候，「造反派」是多麼光榮的稱呼！

清華的「團派」和「四一四」持續了一年半的鬥爭。在這一年多的鬥爭中，兩派頭頭們採用了種種政治鬥爭的手段對付對方。我當時說過一句話：「清華有很多重要的機密專業，向學生傳授很多重要的

¹⁷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在革命高潮到來時，一些小地主也掛上紅布條參加革命。

機密技術。現在，最重要、最機密的技術——權術，已經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群眾組織頭頭們，都產生在極權制度下，都尊崇階級鬥爭理論，難道還期待他們有甚么政治文明嗎？看到兩派頭頭們不停地耍權術，多數人是厭惡的，外出串聯的，當逍遙派的越來越多了，欣賞權術表演的觀眾越來越少了。

然而，已經登上舞臺的演員們還得繼續表演。毛澤東支持蒯大富，不喜歡「四一四」。周恩來是同情「四一四」的，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兩派是明顯地感覺到了的。「團派」想憑借他們的優勢地位，實現兩派聯合、盡快建立以他們為主導的革委會，「四一四」不同意「團派」提出的條件，一直無法聯合，革委會遲遲不能成立。

革委會成了泡影，兩派更加尖銳對立。蒯大富看到聶元梓用武力解決了她的對立面，「北大井岡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發起武斗。四一四頭頭們也不是等閑之輩，在4月23日之前就到處占樓、修工事。雙方武斗從1968年4月23日開始一直持續到7月27日，號稱「百日大武斗」，11位大學生在武斗中失掉了年輕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人的「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了武斗，兩派群眾組織同歸于盡。

全國各地造反派分裂比清華大學要復雜一些，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隨著運動深入產生了不同的政見。種種不同的政見歸納起來大體有兩種：激進的，對十七年持否定態度，認為十七年是「黑線為主」；溫和的，基本肯定十七年，認為十七年「紅線為主」。（2）在「大聯合」和「奪權」中爭權力，爭地位，當然，爭權力和爭地位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見。一派掌權以後，另一派舊沒有說話的權利，這是專制制度的特點。造反者沒有跳出專制思維，沒有民主的辦法。（3）背後有不同的支持者。支左部隊中支持這一派、壓制另一派；在搞「三結合」時，一部分老干部向這個組織「亮相」，另一個部分老干部向另一個群眾組織「亮相」，這些都促進了群眾組織分裂，加劇了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

不論是原來組織造反組織時產生的「山頭」，還是同一組織分裂成不同的「山頭」，一旦獨立存在，就和其他「山頭」或聯合，或斗

爭，或者今日聯合，明日斗爭。這些「山頭」背后常常有人插、操縱。這些背后插手、操縱者是共產黨高層不同派別、不同觀點的軍人或老干部。他們時隱時現，或明確表態，或幕后活動。群眾組織的派別斗爭與共產黨本身的宗派相結合。

進入 1967 年，群眾組織之間的斗爭，發展為武斗。1967 年初，軍隊開展「三支兩軍」¹⁸直接介入地方文革。毛澤東要求軍隊支持左派，即支持造反派。但是，相當多的軍隊卻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地方軍隊把 1966 年底將要垮臺的保守派扶持起來（如武漢的「百萬雄師」，廣西的「聯指」），這樣，相當多的地方，保守派站在支左部隊一邊，造反派站在反對支左部隊一邊。由于軍隊介入，軍隊支持的一派比較容易得到武器（當時叫「搶武器」，如果軍隊不願給，手無寸鐵的群眾怎能搶得到？毛澤東曾經指出了這一點）。另一派也想方設法弄到武器。因而出現了使用現代武器的大規模武斗。

1968 年 5 月，發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派別是階級的一翼。」¹⁹這就把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斗爭上升為階級斗爭。毛可能是想用這頂大帽子阻止派性發展。但武斗的每一派都認為自己這一派是無產階級，對方是資產階級。

四、毛澤東告別造反派

毛澤東告別造反派是 1968 年的事，為了敘述方便，這裡提前說一說。1967 年 7 月，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一個說法：「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²⁰1968 年 7 月，毛澤東在召見北京「五大領袖」時說：「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后來不行，延長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說三年就三年嘛！」²¹到 1968 年，「天下大亂」

¹⁸ 所謂「三支兩軍」是毛澤東派出軍隊支持左派，支持農業生產，支持工業生產，對一些單位實行軍事管制，對大中學校學生實行軍事訓練。主要是支持左派，簡稱「支左」。

¹⁹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乘風破浪〉，1968 年 5 月 1 日。

²⁰ 《李作鵬回憶錄》，第 592 頁。王立德回憶是：主席講，對文化大革命一年發動，一年勝利，一年掃尾，《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2 班，第 251 頁。

²¹ 韓愛晶記錄整理《毛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載獨立作家啟之編：《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臺北，2014 年 3 月，第 157 頁。

兩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還沒有影子。此時，毛澤東急切地期待恢復秩序。「大聯合」、「三結合」、建立革委會，是1968年的主調。已經復職的官僚們和支保部隊的軍事官僚，借恢復秩序的機會全力擠壓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願地被邊緣化？有的地方搞「反復舊」反對支左部隊和革委會（沒成立革委會的就反對「革籌」），有的地方造反派頭頭們采取了一些極端的對抗行動。廣西造反派「4·22」為了迎戰用支左部隊的槍支武裝起來的「廣西聯指」，竟然搶劫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為此發了嚴厲的針對廣西和全國造反派的「7·3 布告」，要求恢復秩序的態度十分強硬。7月24日，中央又頒布針對陝西和全國各地造反派「7·24 布告」，要求「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7·3 布告』，不得違抗」。

造反派，當初作為毛為整治官僚們的「石頭」，現在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的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不僅是恢復了職務的官員和支左部隊，還是支持文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都全力對造反派進行打壓。造反派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各省一些造反派頭頭們聚集北京尋找對策。1968年7月17日，由廣州「紅旗」派負責人，中山大學「8·31」頭頭武傳斌等，在北京航空學院聚會，參加者有貴州「4·11」、廣西「4·22」、青海「8·18」、遼寧「8·31」、河南「二七公社」、廣東「紅旗」、四川「反到底」、黑龍江「炮轟派」等全國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聽了一會兒就走了。這是造反派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尋找出路的聚會，卻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黑會」。1968年7月25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在接見廣西來京的兩派群眾組織頭頭和軍隊幹部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口徑一致地嚴厲斥責造反派，審判式地追問這個「黑會」的詳細情況。

毛澤東對造反派已經沒有耐心了。「7·3 布告」、「7·24 布告」、7月25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對造反派頭頭的嚴厲批評，說明毛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群眾組織問題。而軍管、派龐大的工作隊是最有效的辦法。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3萬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

隊進駐清華大學，結束了武斗，接管了清華大學的全部權力，兩派群眾組織同歸于盡。這支接管部隊是由中央警衛隊（8341 部隊）和由這支部隊支左的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單位的工人組成，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進入清華。從這一天起，毛澤東利用造反派的戰略終於結束。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

7月28日毛澤東在召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時警告不聽話的造反派：「有人講，廣西的布告只適用於廣西，在我們這里不適用。陝西的布告只適用陝西。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事後，一些地方不聽話的造反派真的當土匪被圍剿了，廣西「4·22」10萬人被屠殺。其實，搞極端行為的不單是「4·22」，他們的對立面「廣西聯指」也是搞了的。軍隊和復職的老幹部支持「廣西聯指」，「4·22」沒有發言權了。

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結束時，韓愛晶記下了這麼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

一個女工作人員，表情異常平靜，她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廳里走幾步，掀起一個黑色的布簾，走過去，布簾放下，留下林彪、周總理、中央領導和我們五個。我們又分別跟林彪、周總理、江青、中央領導握手告別。沒想到，在我們和其他中央領導握手告別，還站著說話的時候，那個黑色的布簾又掀開了，毛主席又回來了，我們又趕緊迎上去。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崩大富，所以又回來了。」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崩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毛主席說了一會兒，我們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捨地，看著那個女工作人員，又掀起那個黑色布簾扶著毛主席走了。

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又回過頭來交代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澤東這次召見，是造反派的歷史終結。人們已經受夠了無政府狀態的折磨，是該恢復秩序的時候了。怎樣恢復秩序呢？一是要

告別破壞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復被造反派沖垮的官僚體制。在沒有制度創新的情況下，恢復秩序以後還得依靠原來的官員，官員們還是用原來的方式來行使權力。響應毛的號召起來沖擊官僚體制的造反派，注定成為犧牲品。

毛澤東 7·28 召見時，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領袖」這些激進的造反派，多次批評溫和的造反派「四一四」，最使他不滿的是「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中「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說法。毛所指的不是共產黨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產黨已經坐穩了天下（毛搞文革是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應當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體系來恢復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經使造反派和官僚們結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復秩序，只能讓官僚們坐天下。官僚們坐了天下，造反派勢必成為官僚們砧板上的魚肉。

在 7 月 28 日那次召見中，毛澤東和造反派都流淚了。造反派是因為被邊緣化而流淚，毛澤東是因為對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淚。

1968 年 7 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大學生被送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從 1966 年 10 月到 1968 年 7 月 28 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學生造反派在政治舞臺上活動只有二十個月。

1969 年 8 月 28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第四條規定：「一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堅決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部門、按單位的革命大聯合。所有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頭、重拉隊伍，都是非法的，要強令解散。」²²毛澤東恩準的結社自由到此結束。群眾組織退出政治舞臺。社會上的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

總的來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如果說文革是「十年動亂」，造反派就不可能是動亂的主角。而造反派承受的打擊就不只是三年了，且不說他們開始造反時收到的鎮壓。在此後的「一打三反」、「一批三查」、「清查『5·16』分子」、「清理階級隊伍」

²²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研究室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第 366 頁

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造反派都受到打擊。

本來，造反派和官僚們都是毛澤東王朝的臣民。毛澤東只會一部分臣民（造反派）打擊另一部分臣民（官僚）。這種打擊可能是錯誤的。事後，皇帝還是那個皇帝，朝廷還是那個朝廷，主義還是那個主義，官僚們一方面繼續稱頌「聖主英明」、堅持原來的主義，一方面報復奉「聖主」之命打擊過他們的造反派。官渡之戰曹操打敗了袁紹以後，發現袁紹那里有曹操營壘里的人寫給袁紹的「效忠信」，曹操看也不看，全燒掉了。共產黨的官僚沒有曹操的胸懷。

1976年10月開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幫的「黑干將」、「黑爪牙」的「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運動，在不少地方演變成爲一場專門針對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成千上萬的參加過造反的群眾又一次被鬥爭被關押，致傷、致殘、自殺不在少數。這些情況，本書後面將專門介紹。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護了官員。官員們是非常感激他們的。加上保守派有維護既有的秩序，維護領導的權威的基本素質，適合於文革后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進入80年代，保守派的頭頭多數受到重用，有的成了顯赫的高官，他們在文革中的錯誤不加追究。至於在文革中維護官僚利益殘殺群眾的官員，文革以後，不僅不加追究，反而受到重用。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軍區政委韋國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揮軍隊和他操縱的群眾組織「廣西聯指」屠殺了近10萬群眾。文革后不少人和受害者家屬紛紛上書中央，要求清查這一廣西最大的「三種人」；但是，韋國清官至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內蒙古原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副司令滕海清製造「內人黨」特大冤案的罪魁禍首之一。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發指的刑訊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殘87,188人。但滕海清晚年照樣在他的大軍區副司令級別上頤養天年。相反，內蒙古師院學生造反派東方紅縱隊的頭頭之一的高樹華，在當時僅是內蒙古革委會常委，曾經對「內人黨」這一冤案提出過異議，但卻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的運動中被逮捕入獄四年，成爲滕海清等人的替罪羊。

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顛覆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十七年重刑，蒯大富在辯護中問公訴人：

「1966年我21歲，至少有幾個問題沒有看出來：第一，毛主席犯錯誤；第二，林彪、江青是隱藏的壞人；第三，不知道劉少奇是冤枉的。請問公訴人：你比我大10歲，1966年，你以為毛主席犯錯誤了嗎？你當時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你從來沒喊過『打到劉少奇』？」公訴人無言以對。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領袖胡厚民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說：「我認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錯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得到了各種優厚的照顧；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仍然背著各種罪名（包括其子女及親友仍然遭到歧視和排斥）……不是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我想在這裡也應該是平等的。造反派這邊傷害了那邊的問題，我願承擔一切責任，那麼『百萬雄師』那邊傷害了這邊的人，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接著，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漢軍區搞所謂的「鎮反」一夜抓成千上萬的群眾，1968年軍人政權搞得「清理階級隊伍」和1969年在武漢鎮壓所謂的「5·16集團」和「北決揚分子」等迫害造反派的運動。這些運動都造成成千上萬人被斗被關，致傷致殘，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後說：「如果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實，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甚么樣的責任？以上問題如果真正得到了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

第一〇章

工人造反派和 上海「一月風暴」



準備出擊的武斗人員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真正起來了，群眾組織風起雲湧，文革之火開始燒向機關、工廠和農村。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3周歲的生日。他請部分人參加了他的中小型生日宴會。吃飯時他說，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他在席間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¹

一、工人造反派走上政治舞臺

文革前中國工人階層狀況。²

終身在一家工廠就業。用行政辦法把勞動者統一分配到企業以後，勞動者和企業保持終身固定的勞動關係。90%以上的職工在一家工廠從青年干到退休年齡。就業穩定，但勞動者不能根據個人的愛好和特長選擇職業和工作單位。

充分就業。對城鎮戶籍人口，政府強調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飯吃。實際是「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干，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工廠冗員約占職工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工資由國家統一定級、統一調整。企業利潤全部上交國家，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沒有關係。實行八級工資制，幾年一次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調整工資，每次只能有一部分人能提級。1963年以後工資幾乎凍結。職工家里幾乎沒有任何財產，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機廠調查，發現80%以上的工人都是二級工，月薪為41元。

就業、分配、保險三者合一。進了工廠就按國家定的級別分配收入，就有了醫療、養老保險。工資、住房、保險都在就業的單位里落實。離開了單位，就沒有收入，就失去了一切保障。每個人都是「單位人」，單位決定工人的命運。

工人居住條件十分惡劣，工作了幾十年連一間像樣的住房也沒有。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積

¹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4-25頁

² 楊繼繩：《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第184-187頁。

下降到3平方米。祖宗三代人擠在一間十多平方米房間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鉛吸收、笨中毒、汞中毒、汞吸收，矽肺等職業病相當普遍。

廠長平均工資相當于工人平均工資的3倍左右，差別不是很大。有權力的人的優勢並不表現在工資上，而是表現在住房、醫療、短缺商品供應、子女的教育和工作安排等方面。政治理論和報刊輿論上強調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不少工人也以此自豪。但是，從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對企業重大事情的發言權上，工人們並沒有主人翁的體驗。

文革前工人階層的狀況表明，他們是比較穩定的階層，不容易讓他們起來造反；但他們是非常貧困的，社會地位是低下的，是受底層官員直接控制的。他們和官僚集團有著深刻的矛盾，一旦鼓動他們起來造反，他們的反抗力量是強大的。

文革開始以後，讓不讓工人造反，有著激烈的爭論。

1966年7月2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時發出了工交企業開展文化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時期，部分產品質量下降、事故增多、設備維修計劃完成得不好、某些產品產量開始下降」，通知要求工交企業和農村的文革要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有領導、有計劃、分期分批地進行，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建設雙勝利」。這個文件壓制了工人造反。毛當時在外地，看到這個文件很不高興³。

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不久，毛澤東就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革命。毛認為中國革命最早都是從學生開始，學生起來後，還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來不行。他說文革工人最早也是曾經起來的，可是沒有很好的引導。毛讓陳伯達起草個文件，陳伯達和王力起草了12條（即〈關於工礦文化大革命12條指示（草案）〉）。上海「安亭事件」之前，毛讓把「12條」公開征求工人的意見。⁴11月10日至13日，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認定工人跨行業聯合組織制造「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而「12條」強調工廠文革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安亭事件」後，這個提法就變得保守了。

³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60頁。

⁴ 同上，第82頁。

1966年11月16日，中央委托國家建委主任谷牧⁵石油工業部長余秋里主持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這個會有5部7市及各中央大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討論工交戰線如何開展文革的問題。陳伯達和王力起草的「12條」交給工交座談會上討論，卻遭到工交戰線的領導干部們的激烈批評。會議的發言者對工交戰線十七年的成績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由于生產不能中斷，工交企業文革因與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有所區別，應當分期分批地進行，不能全面鋪開；不贊成在工人中成立聯合造反組織。⁶工交座談會之前，谷牧看到了「12條」，認為「12條」會搞亂工礦企業的正常秩序。⁷在工交座談會上，大家認為，文革如果在工交系統一下子全面鋪開，后果難以預料。認為文革是「革命熱情」加「兒童遊戲」，是「孫子斗爺爺」。認為「黨政工團加民兵，還有職工代表大會，工廠里組織不少了，還成立甚么群眾組織」。會上，呂正操、段君毅、劉瀾波、呂東、徐今強五位工交領導人走到周恩來面前，說：「我們挨批挨斗沒有關係，生產建設無論如何不能亂搞！」情緒激昂。⁸公交座談會上搞了一個「15條」（〈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

陳伯達看來「15條」很生氣。11月21日，他把谷牧和余秋里叫到他那里，說：「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看不起，現在你們也看不起，把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他們二人覺得無法和陳伯達理論，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周說：「明天我和陶鑄再聽你們一次匯報。」晚10點，李富春在電話中對余秋里說：「你講的問題，總理和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1）工廠的業餘文革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2）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在業餘時間鬧革命；（3），文件提出后谷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4）同意把『忘本、自私、壓制群眾』等幾類人的提法刪掉，不要把『當權派』

⁵ 谷牧（1914-2009），文革前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文革中協助周恩來抓經濟工作。文革后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對外開放。

⁶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113頁。

⁷ 《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15頁。

⁸ 同上，第216頁。

劃寬了。」⁹

12月4日至6日，林彪在懷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谷牧關於「15條」稿修改情況的匯報。已靠邊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叫來參加。谷牧匯報時說工交戰線有三個特點：第一，工交戰線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不存在「黑線」問題；第二，工交戰線的職工隊伍基本是個好隊伍，沒有領導權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的問題；第三，工業生產的連續性和協作性要求生產不能中斷。企業黨組織工作不能停止。谷牧可能忘記了毛對甘肅白銀廠和洛陽拖拉機廠的批示，毛在批示中明確指出有些工廠的官僚主義者成了和工人階級對立的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他提的前兩條顯然和毛澤東的估計相差萬里。谷牧的匯報招來了猛烈地批評。早已得知毛的意圖的中央文革成員一馬當先。王力說：「按照你說的三個特點，工交系統就不搞文革了？完全是走資派的論調。」王力還說這個匯報受到陶鑄的影響，他問：「試問北京哪個工業黨委能統一領導？統一領導就是鎮壓革命。」康生說：「資本主義要復辟，工礦企業這一環問題很大，一個國家的變修，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基礎，還不在於文教部門。」江青、謝富治也對谷牧的匯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周恩來在會上說：「谷牧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拿出來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擺出來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狀況，反映了現實情況，我們的干部對文化大革命還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條后，找你們談，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沒有通，還有些意見。林總問我有沒有一個通的，我說我接觸到的沒有，多數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當頭。」，他還分析了「怕」的三種情況。¹⁰

12月6日，林彪作總結報告。他徹底否定了工交座談會上提出的「十五條」。他說：「工交座談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不對頭，要來180度的大轉彎。匯報提綱里的那三個特點的頭兩點要徹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個東西就無所謂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必須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地把它擴大起來，深入起來，堅持下去。」他還說：「干部

⁹ 《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18頁。

¹⁰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2月6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是關鍵問題，這個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運動。干部貪權這么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非蛻化變質不可。這一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一下！要讓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當權派都睡不著覺。」¹¹

當天，周恩來將谷牧的〈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座談會的匯報提綱〉送給毛澤東批閱時，同時附信說：「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的共同認識，受到黨委幾位同志特別是文革小組同志的嚴厲批評，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¹²

12 月 9 日，毛澤東出席、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通過了陳伯達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這個文件提出「堅持八小時生產」和「業余鬧革命」，但是，它強調工廠可以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工人「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可以在業余時間在本市進行革命串聯」。學生和工人之間可以互相串聯。12 月 10 日，這個文件以中發 [66] 603 號下發。¹³

陶鑄參加了中央處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會議，知道毛澤東支持上海「工總司」這的跨行業工人組織，卻搞出了這個與毛的態度相反的「十五條」，毛很不滿意，否定了「十五條」。毛否定「十五條」的會，陶鑄參加了，他已經知道了毛的態度，谷牧拿出匯報提綱，他不制止。毛認為陶鑄在劉鄧時期就是這種思想，這次還是堅持這個觀點。12 月 4 日至 6 日開了三天會，對工交座談會、「十五條」、匯報提綱進行批評，批評谷牧，批評的內容都與陶鑄有關。林彪等 12 月 6 日大發言不僅針對谷牧，而且針對陶鑄。¹⁴陶鑄倒臺和工交要不要搞文革，如何搞文革有關。

陶鑄 1958 年積極支持大躍進，對毛搞個人崇拜也很賣力。毛也

¹¹ 《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220 頁。

¹² 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版。

¹³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 6 卷，第 22 頁。

¹⁴ 《王力反思錄》（下），第 61 頁。

很信任陶鑄，讓他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后調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林、周之后的第四號人物。進入中央以後，陶鑄說了一些過激的話，如：可以破除「內外有別」，把大字報貼到街上去；除毛、林以外都可以懷疑，都可以打倒。但陶鑄認為，運動要由黨組織統一領導，群眾組織要服從原來黨委的領導。他經常充當「保皇」和「滅火」的角色，和毛的意圖頂牛。毛澤東下決心把他拿下。毛讓周恩來主持會議批判陶鑄。在周主持的批陶會議上，中央文革成員一起向陶進攻，說陶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劉鄧路線的代理人」。1月4日，江青、陳伯達在群眾會上點名打倒陶鑄。

1967年1月8日，毛在中央會議上講話中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極不老實。當時問陶鑄這個人怎麼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后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里照片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¹⁵毛說的照片里有劉鄧的鏡頭，是新華社發稿前把鄧小平的頭置換了陳毅的頭，當時被稱為「換頭術」事件。「換頭」的原因是鄧小平是政治局常委，陳毅不是，而公開發表照片時常委不能缺席。陶鑄被打倒還與他的一個哥哥寫的一份材料有關，這份材料提供了陶鑄在國民黨監獄里的一些表現。他這位哥哥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由此，陶鑄戴上了「叛徒」的帽子。¹⁶

陶鑄被打倒后，中央一些老干部提意見，說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臺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是不合程序的。毛對這些意見不能置之不理，於是，在2月10日的中央常委擴大會上，他假惺惺地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到一個常委。這種批評，

¹⁵ 毛澤東關於陶鑄問題的講話：1967年1月8日，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¹⁶ 程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后口述會議》（修訂版），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358頁。

令人費解。既然打倒錯了，為甚么不能推翻陳伯達的講話讓陶鑄繼續工作呢？

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73歲生日宴會上說：「有人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任何阻擋這場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沖掉。我同陶鑄的爭論的實質就在這裡。」¹⁷

從此，工交戰線突破了各種框框，各種群眾組織成立了起來，工廠的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了。

工廠是生產單位，不管誰掌握了工廠的權力，除非弱智，都得重視生產。據我當時得到的情況，雖然工廠黨組織被沖垮了，造反派掌了權，生產還在繼續，工人還能堅持8小時工作。1966年12月，由于厭惡清華校內的派性鬥爭，我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名為「紅色徒工戰鬥組」，到清河北京毛紡廠住了一個月。我們每天半天到車間勞動，半天調查工廠文革情況。這個廠造反派頭頭洪某原來是廠里的醫生，開始因造反被打成了「反革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掌了權，洪某成了廠負責人。聽說他們揪斗了黨委組織科長，鬥爭會上組織科長的頭發被人揪下了一撮。組織科是廠里最有權力的部門之一，對他的過度報復使我們不安。但這個廠的生產秩序沒有亂，工人堅持8小時工作，生產也沒有下降。不過，由于破除了工廠的一些規章制度，工廠里的知識分子又受到了排斥，企業管理和技術工作的確是削弱了。

在學生造反的時候，一些比較活躍的青年工人，早就突破工廠的禁令支持學生，甚至把造反學生引進工廠。這些人被廠黨委打成了「反革命」、「新右派」，批斗、隔離審查、監督勞動，甚至由公安局拘捕。這些被整的工人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工人運動的領袖。工人造反派

¹⁷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8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沒有收這一段話。

在文革中的能量遠遠超過了學生造反派，到 1968 年初就完全取代了學生造反派，他們對社會影響巨大。「九大」進入中央委員會的紅衛兵只有陳敢峰¹⁸和聶元梓（其實聶是官員），而工人進入中委的卻有 20 多人（其中有的人是上面指定的，不是造反派）。

二、「安亭事件」

1966 年 6、7 月間，上海的工廠里出現了第一批大字報。主要是廠黨委和駐廠四清工作隊，起因大多是對某些具體問題處理的不滿。在寫大字報的同時，各單位出現了一些各種名稱的「戰鬥小組」。這些「戰鬥小組」大多受到本廠黨委的打擊。因造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工人就到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靜安區愚園路 311 號）求助，要求北京來的紅衛兵幫他們平反。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堅定支持工人造反派。不過，多數北京來的紅衛兵沒有在上海長期停留，北京美術學院雕塑系學生包炮（原名包常甲，因毛的〈炮打司令部〉而改此名）長期留在上海支持工人造反者。北京來的紅衛兵和上海的工人造反者認為，分散在各廠的造反組織勢單力薄，最好建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

11 月 6 日，來自上海 17 家工廠的 30 多人，在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開會，主持人是包炮。會議從下午開到晚上，與會者先是控訴因造反而受到迫害的情況，有 11 家工廠將造反工人打成反革命。接著，討論成立全市性工人組織。晚 10 點，有人家里有事，每廠留下一個代表繼續討論。謝鵬飛（上海鐵路裝卸機械廠工人）認為自己的出身成份不好，推薦同廠另一人留下來，自己退出。這 17 人當中有王洪文（國棉 17 廠保衛干事）、潘國平（玻璃機械廠工人）、葉昌明（合成纖維研究所工人）、戴祖祥（上鋼三廠工人）、陳阿大（良工閥門廠鉗工）、黃金海（國棉 31 廠工人）、范國棟（保溫瓶二廠工人）、岑麒麟（822 廠的技術員）等。經反復討論，決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

¹⁸ 陳敢峰，上海同濟大學城建系學生，造反組織「同濟東方紅」負責人，文革中任同濟大學革委會主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九大」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71 年后被審查，下廠當工人。文革后被判刑八年。

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然後推選負責人。候選人有五位：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戴祖祥、陳阿大。包炮要求大家報家庭出身和自己的基本情況，在候選人中潘國平和王洪文兩人給人的印象最好。潘國平比較活躍，能說會道，造反精神十足。王洪文，貧農出生，共產黨員，在朝鮮打過仗，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干事。黃金海提名王洪文，認為王洪文是黨員，又比潘國平穩重。包炮也認為王洪文比較可靠。最終王洪文當選。¹⁹

「工總司」成立後，工人們最擔心的是這個組織的合法性。如果非法，不僅這個組織不能存在，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將會受到打擊。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公民有結社的自由。實際上一直禁止民間結社。如果民間力量組織起來，就可能打破共產黨的政治壟斷。文革初期退了一步，但也只允許工人在廠內成立寫大字報的「戰鬥小組」，不能成立跨行業組織。11月9日，「工總司」在上海文化廣召開萬人大會，要求市長曹荻秋參加大會，承認他們是「合法組織」。上海市委堅持十七年來的政治底線，採取「不參加、只承認、不支持」的方針，市長曹荻秋拒絕出席成立大會。市委還組織保守群眾兩次沖上主席臺，阻止「工總司」成立，兩派發生沖突。「工總司」到市委大樓造反。工人要求市長曹荻秋接見，等了幾個小時沒有見到市委領導人。上海市委通知他們到南京西路上海展覽館集中，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根據市委「三不」方針，宣講中央有關不能成立跨行業組織的精神。此時已是10日凌晨，天下雨，工人們連午餐也沒有吃，又冷又餓，就此回廠又怕日後挨整。在混亂中，有人提著喇叭高喊：「我們要到北京去！我們要見毛主席！」自行車三廠工人孫福祥編造了一個「特大喜訊」并用喇叭廣播：「周總理來電，曹荻秋不接見，我接見」²⁰大家信以為真，王洪文等組織隊伍上北京告狀。在群體事件中，謠言常常對事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

¹⁹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275頁。徐景賢：《十年一夢》，2004年，第29頁說是安亭事件後，工總司排座次王洪文要求大家報出身，以自己的優勢得到了第一。

²⁰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297-298頁。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總司的一群人沖進北站，他們擠上了已經載滿乘客、即將開往北京的626次客車，王秀珍在這批人中間。王洪文、潘國平見這趟車已滿，就率1千多人擠上了開往鄭州的756次客車。國務院接到上海市委報告后，讓勸說工人下車，不要影響正常發車。勸說無效，王秀珍、戴祖祥登上的626次于上午5時發車，王洪文上去的756次臨時改為602次列車上午7時發車。周恩來不同意這麼多人北上，讓鐵道部運輸局下令立即停車。上午8時17分602次停在安亭。這是連上海人也不知道的一個小站。車頭已摘走，只有列車趴在卸煤的岔道上。王秀珍、戴祖祥上去的那趟626次列車中午被停在南京車站。

滬寧線是中國的主要交通動脈。工總司這一行動，造成滬寧線行車中斷31小時34分。²¹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上海市委速報中央。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處置辦法。會上確定，分別給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發電報。這兩個電報都是陳伯達起草的。給華東局的電報是要他們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攔車是革命行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上海說服工人。給工人造反派的電報說：「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就是大道理。」「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²²1966年11月11日晚10時左右，張春橋乘空軍專機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張春橋一抵機場就給中央打電話，問：是先到上海市委，還是先到群眾中去？陳伯達的回答是：先到群眾中去，阻止群眾來北京，就地把問題解決了。²³

張春橋趕到安亭已是11日夜12點。現場十分混亂，找不到領頭者。原先在安亭做說服工作的市委干部找到了潘國平和包炮。後來又

²¹ 《徐景賢的最后回憶》，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54-55頁。

²² 陳伯達的電報長達一千字，恩威并用，真切動人，全文見《徐景賢的最后回憶》第55-57頁。

²³ 程曉農：《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第341頁。

找來了王洪文和幾名工人。張春橋和他們談判。12日凌晨，談判開始。張春橋到達安亭前滬寧線已經通行了。談判的中心內容是讓工人回到上海。張春橋一開始就先聲奪人：「你們這樣離開生產崗位，攔截火車，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規定，光憑你們破壞交通命脈，就夠殺頭的了。現在你們給我回上海，今天商量是回去不回去的問題，有甚么事，到上海再說。」王洪文、潘國平聽了很緊張。北京來的紅衛兵對張春橋的斥責不買賬。王洪文、潘國平覺得這是一個下臺階的機會，同意動員大家回上海，但提出了條件：承認工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承認他們這次行動是革命的；這次事件的責任在市委等。

潘國平從附近的工廠找到了兩輛卡車，裝上了高音喇叭。開到卸煤廠工人聚集的地方。張春橋、王洪文、潘國平站在卡車上，天下雨，王洪文替張春橋打傘，張不要，大家都在淋雨。張讓王洪文、潘國平動員大家回上海，王潘同意。潘國平向工人宣布談判結果時，大家就轟了起來，說他背叛造反派。張春橋接過來講話，第一句話就是「工人同志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望你們！」下面群情激奮，「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經久不息。張春橋講了近一個小時，最后要大家回上海。包炮等紅衛兵指責張春橋不支持工人。接著工人控訴當權派對他們的迫害，大家爭先恐後地發言。工人的控訴從12日上午8點持續到下午3點多。聽了工人的控訴，張的語氣有所鬆動，承認上海市委執行了資反路線，說這些情況他負責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張春橋事後對徐景賢說，工人的過激行為是有原因的。他們要求成立組織是符合憲法也是符合中央「十六條」精神的，他來上海前中央文革的意見也許是應當改變的。²⁴但是，他還沒有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沒承認工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只是說先回到上海，到上海再談。

整整13個小時，在雨中的張春橋和全體工人都沒有吃飯，沒有喝水。張看到再拖下去沒有結果，讓王洪文宣布最后決定。王洪文拿起話筒宣布，工總司決定，全部人員回到上海解決問題。張春橋接著講話：「工人同志們，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回廠抓革命促生產，要

²⁴ 《徐景賢的最后回憶》，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58頁。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派我來上海，是來解決問題的，我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處理好，解決不好，我絕不回北京！」中午，國棉 17 廠派出汽車來接工人，王洪文帶頭上了車，其他人也陸續回到上海。

工總司的合法性問題沒有解決，回到上海的工人怕回廠后被打成反革命。既然張春橋承諾回上海談條件，他們就直接去文化廣場要求和張春橋見面。²⁵黃金海直接把工人從安亭帶到文化廣場。其他人也聚集到文化廣場。

張春橋半夜才回家，由于淋了一夜雨，感冒發燒了。下午到文化廣場和工人見面。上海市委得知張春橋要和工人見面，中午召開了書記處會議，張春橋參加了。會上決定不能承認全市性的跨行業組織；不能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怕這個口子一開，就會全面失控。

11 月 13 日，天氣很冷。聚集在文化廣場的人們都頭戴工作帽，身穿工作服。黃金海布置廠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下午 2 點半，張春橋到了文化廣場。在小休息室和潘國平等入談判。王洪文把自己工廠的工人安排回廠、回家后就趕到參加談判。人太多，又換到大休息室談判。

在談判中，「工總司」提出五條，要張春橋簽字。這五條是：（1）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2）承認 11 月 9 日的大會及工人被迫上北京告狀是革命行動；（3）這次行動的后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4）曹荻秋必須向群眾公開作檢查；（5）今后對「工總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當時，張春橋不斷地到另一個房間打電話，每次回來很焦急的樣子，不是電話沒打通，就是沒有得到明確的指示。他干脆不打電話了，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屋子里來回走著，從這個牆角走到另一牆角，反復地畫對角線。²⁶最后，他像下了決心似的回到談判桌上。他在第二條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后面加了一句話：以后碰到類似情況應

²⁵ 《徐景賢的最后回憶》，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 年，第 58 頁。

²⁶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 年，第 331 頁。

派少數代表」。最后簽上「張春橋 1966、11、13 于上海」。²⁷

13 日晚，張春橋給陳伯達打電站，匯報了他談判「五項協定」的經過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張春橋電話剛放下，陳丕顯就給陳伯達打來了電話，氣壯如牛，非常氣憤，批評張春橋，說他不該簽字，說他不跟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說他目無法紀。陳丕顯的態度代表了上海市委的態度。陳伯達說：「我的老鄉，不要生那么大的氣，好好商量，已經簽了字，怎麼辦，再研究。」²⁸

的確，這是一個關鍵而危險的簽字。說它危險，一是因為突破了工人不能搞跨行業組織的規定，而他出發前陳伯達已讓他帶來電報原稿中已有明確的態度；二是一旦工人像學生那樣參加文革，對生產、對社會影響的后果無法估計。史學界對張春橋為甚么敢簽字，有著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認為他事先從毛那里得到了「密旨」²⁹；第二種看法是屈服于工人的壓力。但知情者提供的情況是，張在承認工人造反組織的文件上簽字后，十分緊張，不停地打電話，不停地抽煙、走動，焦急地等待北京的反應。³⁰這說明張沒有從毛那里得到「密旨」，但張對毛的思想有著比別人更貼近的理解。1958 年他寫〈論資產階級法權〉表述了毛澤東的想法，得到了毛的肯定。1966 年 12 月，毛要將文革推向工礦企業的意圖，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他當然也知道，而承認上海「工總司」的五個條件，是將文革推向工礦企業的一個好機會。張猜想毛會支持他，但得到毛的肯定之前，他還不放心。

11 月 14 日下午 3 時，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云沒有參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說：上海「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關於張春橋沒有向中央請示就簽了五項協議的事，毛說：「可以先斬后奏，總是先有事實，后要概念。」³¹

²⁷ 《徐景賢的最后回憶》，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 年，第 62-63 頁。

²⁸ 《王力反思錄》（下），第 57-58 頁。

²⁹ 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第 196 頁。

³⁰ 顧訓中：〈關於上海文革的幾個問題——與毛澤東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記憶》第 66 期，2011 年 1 月 14 日。

³¹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 6 卷，第 16 頁；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第 199 頁說是 16 日：《徐景賢的最后回憶》，星克爾

工人成立自己的組織，本來是合乎憲法規定的。但由于多年的政治壟斷，這個合法要求被虛偽的政治制度所剝奪。工人只能通過非法手段抗爭，才實現了自己的合法要求。

北京和上海是毛澤東最看重的兩個大城市。他在北京扶持了學生紅衛兵。在上海扶持了工人造反組織。上海的產業工人在中國具有代表性。上海「工總司」這個跨行業組織的合法化，在全國起了示范作用。此后，全國各地跨行業工人組織如雨后春筍，迅速發展。跨行業的工人造反組織成了文革運動的主角。

上海在文革中能在全國起帶頭羊的作用，除了「工總司」以外，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機聯站」）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機聯站」的負責人是徐景賢，他原來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12月18日，徐景賢帶頭造反，並成立了「機聯站」，在上海市委的核心爆炸了一顆「炸彈」。³²機關幹部造反在文革中也是一種普遍現象。當時中國幹部實行任命制，下級干部的命運由上一級領導人決定。與領導關係不好的人很難提升，有獨立人格的人還要受到打壓。一般干部和上級領導之間常有積怨。

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全市性組織，保守派也相繼成立了全市性組織。「安亭事件」剛結束，11月15日，李劍鈺³³等去市委接待站，去華東局，要求澄清「工總司」的「五項協議」。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宮接見他們，李劍鈺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組織，我們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組織與造反派抗衡？曹荻秋建議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為好，靈活，如果中央以後不同意，也有退路。市委當時有個精神：

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64頁說是16日。

³² 徐景賢後來成為上海的第三把手，「四人幫」倒臺之後，被判刑十八年，2004年突發心臟病去世，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很多，花籃花圈擺滿一屋。挽聯上寫著：「用權不徇私有錯善反思？人品貴真誠勤奮伴一生。」「文革」十年間，他身居要職，親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在外地插隊多年，他也沒讓他們調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參軍，他不給他們開後門。他父母單獨住在老舊的石庫門內數十年，沒煤衛設施，他說：「等到周圍鄰居家家戶戶都安裝煤氣之後一起解決，我們不能特殊。」——沙葉新：〈參加徐景賢的遺體告別〉。

³³ 李劍鈺，文革前是國棉31廠黨委組織科干部，中共黨員。文革初期是國棉31廠「工人赤衛隊」的發起人。

多數派（即保守派）要成立組織，就讓他們成立吧。³⁴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衛隊成立。這個組織得到官方的默許，發展很快，最多發展到80萬人。

赤衛隊一成立就和「工總司」發生沖突。第一次沖突是「解放日報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12月1日。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辦的《紅衛兵戰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紅革會」要求這份報紙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以便「消毒」。「解放日報社領導請示市委以後拒絕了「紅革會」的要求。於是，「紅革會」進駐報社并提出三項要求：（1）將《紅衛兵戰報》夾附在30日《解放日報》內同時發行；（2）《解放日報》必須轉載〈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這篇文章；（3）把上海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及上海市委對報社的有關指示告訴「紅革會」。雙方僵持不下，《解放日報》停刊。造反派這一行動得到了在上海的聶元梓和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的支持。造反派的行動引起了保守派強烈不滿，大批赤衛隊員到報社附近游行示威，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並對「紅革會」進行圍攻辯論。當時，進入報社數以千計的造反派和在報社外面圍攻的數以萬計赤衛隊對峙。12月2日，紅革會請求工總司支持。12月4日，「工總司」派出隊伍支持「紅革會」，使得《解放日報》事件進一步擴大。經過八天八夜的爭鬥，12月8日，上海市委終於承認了紅革會的「三項要求」。

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市中心人民廣場召開大會，要求曹荻秋市長到會。會上提出了與「工總司」相對立的八點要求，要曹荻秋簽字，曹開始不簽，一直糾纏到凌晨3點，曹又急又累，曾經昏厥過去，最後只好簽字。第二天，上海市委開會，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批評曹荻秋不該簽這個字，要他給赤衛隊做工作，妥善解決這個問題。12月25日，「工總司」也在人民廣場開批判大會，令曹荻秋到場，迫使他當場宣布，給赤衛隊簽的字作廢，赤衛隊是保守組織。曹荻秋

³⁴ 李遜：〈馬驥、李劍鈺回憶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衛隊〉，《記憶》第31期，2009年4月30日。

的這一宣布激怒了赤衛隊。從 12 月 27 日起，赤衛隊調動大批隊伍包圍了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這個本來是保守派組織，也反起市委來了。到 28 日晚已有一萬多人，還在繼續增加，一直增到 3 萬。28 日下午，「工總司」也調集數萬人的隊伍進入康平路。從四面八方包圍了康平路，兩支觀點不同的隊伍對峙著。市委領導們早已從康平路撤走，院里住的只有張春橋妻子文靜和已故的原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家屬。28 日晚，赤衛隊在牆上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標語。28 日半夜，張春橋同他妻子文靜通電話，文靜向張訴說了康平路的情況。張春橋對文靜說：「現在赤衛隊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請徐景賢轉告上海各造反組織，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果實奪走了！」29 日早晨，文靜將張春橋的意見轉告了徐景賢。徐景賢立即布置，一方面把原來的口號進一步升級為「打倒陳、曹！打到上海市委！」。29 日半夜過後，「工總司」向赤衛隊發起了沖鋒，從凌晨 2 點發起攻擊，到凌晨 6 點，圍攻康平路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91 人受傷，最嚴重的是腿骨打斷，沒有死人。³⁵繳下袖章六大堆，餅干幾百箱。7 點鐘，近 2 萬名赤衛隊員排成隊列，分成 6 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聽取教訓後釋放回家。

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赤衛隊挨了打，怎能善罷甘休？1966 年 12 月 31 日，他們仿效「工總司」的安亭事件，率 2 萬人沖進了北站，要乘車上北京告狀，在北站被阻後，又轉移到昆山。上海鐵路分局調度員王玉璽³⁶是赤衛隊負責人之一，在他的影響下，調度所多數人離開了崗位，滬寧全線停運。

1967 年 12 月 31 日午夜，周恩來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讓他停止養病，到第一線工作，先把王玉璽抓起來，盡快恢復滬寧鐵路交通。³⁷1 月 1 日凌晨，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指出

³⁵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 15 頁。

³⁶ 王玉璽，中共黨員，從 1960 年開始擔任上海鐵路局調度所任副主任，將 602 次列車停靠安亭是他調度的。後來是上海赤衛隊負責人之一。

³⁷ 《徐景賢的最后回憶》，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 年，第 104 頁。

了鐵路停運的嚴重情況，要求盡快恢復，告訴了周恩來給陳丕顯打電話的情況，對徐景賢說：「不過，現在陳丕顯的話可能不靈了，所以，我打電話給你，你可在會上說一說中央精神，做一做工作……」³⁸

上海市委按周恩來的意見召開會議。陳丕顯穿上軍裝（他是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出席。他說：「我剛才接到總理的電話，總理說：要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做好赴京上訪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秩序要搞好。」他說，接到總理電話后，就按總理的要求把王玉璽扣押了起來。陳脫下軍大衣，繼續說：「赤衛隊要北上告狀，現在被阻攔在江蘇昆山一帶。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 80 多名工作人員中，有 70 多人是赤衛隊員，都離開了崗位。滬寧線的鐵路交通已完全中斷。從 12 月 30 日到現在的 26 小時中，已停開列車 26 列，有 5 萬多名旅客不能上車，還有 5 萬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飯都成了問題；停開貨車 38 列，中途停下的還有 22 列，貨物積壓了好幾萬噸。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上海市只剩一個星期的存糧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麼來扭轉這個局面？」³⁹

造反派頭頭們聽了陳丕顯說的嚴重情況，不僅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意思，還指責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不出張春橋所料，陳丕顯的話果然不靈。徐景賢站在陳丕顯對面，對造反派頭頭們說：「造反派的戰友們，現在當務之急，是把散在昆山和其它地方的幾千名赤衛隊員弄回廠里去，使滬寧鐵路暢通，把上海的社會秩序和生產恢復起來。究竟誰應該對這個局面負責？應該是你，陳丕顯！你這個市委書記長期在幕后指揮，讓市長曹荻秋站在前臺，你們先是不承認工人造反隊，扶持了工人赤衛隊，然后又把赤衛隊甩掉，你們才是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禍首，這筆賬我們以後跟你算！」接者，徐景賢念了張春橋的電話記錄。會場立即安靜下來，有的造反派頭頭離開現場把張春橋的電話記錄印成傳單「中央特急來電」散發。徐景賢順勢出主意：根據中央文革來電，各造反組織起草一個聯合聲明，號召全市把矛頭對準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員回到崗位

³⁸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 21 頁。

³⁹ 同上，第 22 頁。

抓革命、促生產，……大家同意這個建議，并逼問陳丕顯同不同意，陳丕顯表示同意之后，由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交大的幾位紅衛兵執筆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簡稱「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陳丕顯等候在旁簽字付印。陳丕顯簽字后責成《文匯報》立即印刷 20 萬份全市散發。徐景賢、王洪文立即赴昆山解決赤衛隊員的問題。⁴⁰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1月5日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說：「1967年將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面崩潰徹底瓦解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走資派「煽動大批被他們蒙蔽的工人赤衛隊員借口北上『告狀』為名，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以達到他們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革命工人同志們，緊急行動起來！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人人要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范」。這份文件有「工總司」為首的 11 個群眾組織簽名。

1月3日，《文匯報》內的造反組織奪了報社的領導權，接管了報紙，4日發表奪權聲明〈告讀者書〉。1月5日，《解放日報》內的造反組織奪了報社的領導權，6日發表奪權聲明，宣布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

1月8日，毛澤東召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峰、戚本禹、唐平鑄、胡癡等開會，談到上海兩家報紙奪權的情況時，他說：「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4日造反。解放日報6日也造反。兩張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這兩張報出來，一定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上海市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⁴¹毛還說，〈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得是上海市問題、是全國性的。⁴²《人民日報》1月9日轉載了〈告全市人民書〉，編者按中轉述了毛1月8日談話的主要內容。

⁴⁰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公司，第 22-23 頁。

⁴¹ 《毛澤東年譜 1946-1976》第 6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29-30 頁。

⁴² 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 年 1 月 8 日，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版。

1月9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的32個造反組織署名的〈緊急通告〉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通告」指出走資派與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相結合，「以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斗爭大方向，挑動群眾斗群眾，造成工廠停工、鐵路中斷」，「他們任意揮霍國家財富，隨意增加工資、福利，濫發各種補貼費，煽動群眾強占公房」，為此提出了十條通告。通告指出：「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工作崗位」，「說服動員在各地串連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超額完成1967年生產計劃」等。

〈緊急通告〉是針對「經濟主義風」的。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本書第11章介紹，這裡只作簡單說明。「經濟主義風」始於1966年底、1967年初。處於社會底層的臨時工、外包工、學徒工等等人群，乘文化大革命之機，希望借機解決自己的問題，還組織了各種名目的造反組織，逼迫直接主管、甚至市級領導簽字同意。一些領導或無法抵擋群眾壓力，或為贏得群眾好感，紛紛簽字同意，銀行存款大量取出。王洪文等工總司的頭頭，向張春橋、姚文元緊急匯報情況，要求制止。對那些底層社會的人來說，「經濟主義風」是爭取自己權益的合理要求，但當時是不可能解決的，把注意力引向這方面，無疑會干涉當時的斗爭方向。

1月10日，毛澤東批示，要中央文革小組「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⁴³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32個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說：「〈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號召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⁴³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122頁。

毛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在「天下大亂」時如何保持社會生產正常進行，如何防止老百姓乘造反之機向政府索要多年來失去的經濟權益。上海的〈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恰好解決了這兩個難題，而且是造反派提出來的，毛怎能不高興？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也提高了「工總司」等上海造反組織的聲望，為他們全面奪取上海市的權力作了輿論準備。當然，其影響不僅是在上海。1月22日，周恩來在外地來京群眾有線廣播大會上的講話⁴⁴指出了它的全局意義。周恩來說：

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組織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宣告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鼓掌）

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的戰鬥任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鼓掌）在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無產階級革命派要聯合廣大革命群眾，把被這些分子竊取的黨權、政權、財權奪回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鼓掌）

只有革命群眾奪了權，才能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斗倒，斗臭，斗垮。

只有革命群眾奪了權，才能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才能有力地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打倒經濟主義。（鼓掌）

四、上海「一月風暴」

1966年12月下旬，毛澤東認為「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

⁴⁴ 主會場在人民大會堂，各分會場總人數80萬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廳1967年1月24日印發稿，以及清華大學「鎖妖風」戰鬥組速記整理稿。

此時，保守派組織「赤衛隊」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為了不讓赤衛隊「奪走勝利果實」，根據毛澤東對上海形勢的估計，1967年1月2日，「工總司」等20多個造反組織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委會」，決定1月6日召開大會批判上海市委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1月4日來到上海。張春橋對徐景賢等人說：「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到上海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後向中央報告。」張春橋讓徐景賢等不要公開他們到上海的消息。

1月5日，張、姚二人在武康路二號樓接見「工總司」負責人。張春橋說：「現在赤衛隊垮了，你們這支隊伍步調是不是一致，關係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兩百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工人要能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別是外地學生的操縱。」「現在對市委不必再報甚么幻想了，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要害部門都控制起來，包括海港、鐵路、電廠、水廠、煤氣、電話等。」⁴⁵

1月6日，「工總司」等30多個造反組織聯合開批判上海市委負責人的大會。這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演出的第一場大戲，也是「工總司」的重頭戲。這一天，天氣陰霾，地上的殘雪被人們踩成泥漿。幾十萬人聚集在人民廣場（後來公布10萬人）。這只是中心會場，另外369個分會場。四條大馬路、12個交通要道安裝了上千只喇叭。還用電視轉播實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一、馬天水、王一平、楊西光、王少庸、梁國斌等被帶到臺上成為批斗對象。還把幾百名廳局級領導幹部揪到臺上陪斗。在被斗的干部的脖子上掛著大紙牌，牌子上顛三倒四地寫著他們的姓名，并用紅筆打上幾個大叉。站在后面的紅衛兵讓他們面向臺下群眾低頭彎腰。王洪文在大會上做題為〈揭發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批判發言，這個發言稿經過張春橋修改多次。最後，北京來的一位女紅衛兵代表各群眾組織宣讀了大會的三號通令：

第一號通令：（1）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

⁴⁵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公司，第30頁。

書記；(2) 責成大會服務團在會后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并批准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3) 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造反派監督勞動，并責令其徹底坦白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行。

第二號通令：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第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徹底交代。

第三號通令：責成大會服務團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報告黨中央，請示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市委各書記、常委和各部門負責人，在改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崗位上負責生產和日常工作，接受群眾監督，不得消極怠工。

三個通令中對陳丕顯和曹荻秋區別對待，是因為有毛的「最高指示」：對陳丕顯「燒一下可以，不過不要燒焦了。」張春橋來上海之前，中央的意見讓陳丕顯出來工作。張來上海后和陳丕顯談話時把中央的意見告訴了他，陳丕顯說：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出來工作有困難⁴⁶。陳被打倒已是既成事實。

張春秋、姚文元沒有出席大會，在賓館里看電視轉播。事后張春橋對徐景賢說：「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濕的，站在那里幾個小時，一動也不動，真有紀律，真有紀律，了不起！」⁴⁷

根據張春橋的提醒，徐景賢在會后把大會的發言稿、通令和致敬電等一式十五份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

毛澤東極力肯定上海奪權。1月8日，他同陳伯達、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癡等人談話中，肯定了上海兩家報紙奪權，還說：「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他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沒有右派，我們也要翻天。他們以為沒有他們不信，不要相信那么回事。」⁴⁸

1月11日，經毛澤東簽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給上海32個「革命群眾組織」的賀電發往上海，還在

⁴⁶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公司，第45頁。

⁴⁷ 同上，第42頁。

⁴⁸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第95頁。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1月12日，人民廣場召開了有10萬人參加的「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誓師大會」。身穿軍裝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出現在主席臺上，向群眾亮相，發表了他回上海后的第一次演說。此時他們的身份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小組成員」，實際上，張春橋、姚文元和工人造反組織成了上海的新主人。毛主席奪權的概念形成以後，讓王力通知張、姚，要他們參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權機構，要他們作為「三結合」的領導成員公開亮相。⁴⁹

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對「上海經驗」作了概括：「這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並說：這是毛澤東「在新形勢下所採取的又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措施將推動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一個新的飛躍。」

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策劃下，1月8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掌握了上海鐵路、海港、郵電以及工礦企業的領導權。又建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接替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權力。用「造反組織聯絡站」代替上海市委。其他造反組織豈能讓「工總司」獨享勝利果實？別的造反組織不滿張、姚的作法，都想把權力奪到自己手里。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出現幾次奪權行動。其中「紅革會」的奪權行動影響最大。

在上海，「紅革會」（全稱「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是除了「工總司」以外，影響最大的造反組織。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署名中「紅革會」排名第二，〈緊急通告〉的署名中排名第三。在「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等大型造反事件中，「紅革會」都是僅次于「工總司」的主要力量。

1月24日晚，「紅革會」組織了十幾支紅衛兵隊伍，闖進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機關，以及上海13個區級機關工23個領導單位，奪走了全部大印。隨後，「紅革會」總部發出通告，

⁴⁹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20頁。

宣布「紅革會」已把上海市的全部大權奪到手了。⁵⁰這些年輕學生以為掌握了「印把子」就掌握了權力，真是天真。他們這一行動遭到張、姚的批評。「紅革會」對張、姚十分不滿。1月27日，「紅革會」復旦大學的紅衛兵把徐景賢綁架到復旦大學，意圖從徐景賢那里打開缺口，進而找到「炮打」張春橋的材料。1月28日，「紅革會」召開常委擴大會，決定進一步「炮打」張春橋。

1月29日晚，在復旦大學禮堂，以「紅革會」為主，聯合其他組織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準備第二天再人民廣場召開10萬人「『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會後舉行全市大遊行。張春橋、姚文元通過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向中央文革告急，毛澤東對此十分關注，親自抓，不斷掌握上海的動態，他不允許把斗爭目標對著張春橋、姚文元。⁵¹1月29日，中央文革向復旦大學紅革會發出「特急電報」，指出：「復旦大學紅衛兵某些負責人，最近把斗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陳丕顯和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張春橋等出動一切宣傳機器，大力宣傳「中央文革特急電報」。「紅革會」被迫放出了徐景賢，取消了全市大會和大遊行。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紅革會」終於垮了臺。張春橋、姚文元等對組織和參加「1·28炮打」活動的青年學生實行鎮壓，受到打擊迫害的達2500人，其中隔離審查的200多人，被辦學習班的400多人。逼死5人，逼瘋6人，不少人被打致殘。⁵²

對待另一個反對派「上柴聯司」則是大打出手。1967年8月4日早上，上海市革委會常委、上海工總司頭頭之一耿金章帶領上海市的工總司、上體司、消革會和紅三司等所組成的文攻武衛大軍，圍剿上柴聯司。耿金章先從水陸兩路包圍上海柴油機廠，截斷聯司的一切後路，再切斷水源和電源，然後用25噸履帶式大吊車在前面開路，大部隊後面跟進，強行沖進柴油機廠。「上柴聯司」群眾見大門被破，

⁵⁰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公司，第48頁。

⁵¹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第100頁。

⁵² 金春明：《大變動年代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9年，第117-118頁。



被上海「文攻武卫」组织抓起来的所谓「犯人」

只好退守廠內的各幢大樓。他們把樓下的門窗關緊，在樓上的許多窗口，扔下各種磚頭瓦片等雜物進行抵抗。耿金章通過工總司的下屬單位消防隊的造反組織，調來救火車和云梯。用高壓水龍頭向窗內猛烈地射擊之后，再把全副武裝的戰鬥人員直接送進窗口。「上柴聯司」雖然頑強抵抗，最終還是被「砸爛」。

砸「上柴聯司」成為一個樣板，以后很多地方對反對革委會（或反對革委會籌備委員會）的群眾組織都採取這個辦法，有的成功，有的造成更大的混亂。

五、探索新的國家組織形式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報》提前轉載《紅旗》2月3日的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這一社論是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后發表的。文中提到奪權時說：「我們當然不能把它現成地接收過來，不能採取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的新的組織形式。」「去年6月1日⁵³，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形式。」毛澤東1月30日審閱時批示說：「此件我看了，認為很好。」⁵⁴

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創造國家機器的新的組織形式，這是來自巴黎公社原則，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然而，當造反者發現「新的組織形式」并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則、批判這種組織時，這個組織就以種種罪名將大批造反者投入監獄。這是后話。

奪權的勝利者根據毛的指示，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2月2日，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提議，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的41個單位，在新華社上海分社開會，決定「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過渡性最

⁵³ 據路陽研究，毛澤東「6月1日」稱「北京人民公社」的說法不確，毛澤東首次提出「北京公社宣言」和其它類似的說法是在1966年的7月。路陽：〈對「北京人民公社」名稱由來的考查〉

⁵⁴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10頁。

高權力機構，正式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⁵⁵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當天發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說：「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那麼，需要打碎的舊的國家機器是甚麼呢？與其說是「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權力的國家機構」，不如說就是在中國皇權專治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官僚們的權力不是來自人民的選票，他沒有必要對人民負責，只對任命他的人負責。這個官僚體系按照等級享受著種種特權，而且逐漸腐敗蛻變。官僚集團和億萬百姓就形成了一種對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尖銳。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一，但他對這個制度是不滿意的。毛澤東一直尋找出路，他相信馬克思說的「巴黎公社」「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織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社會人為力量。」⁵⁶「應當拋棄關於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公團』，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字，相當於法文中的『公社』。」⁵⁷他想把國家改為「公社」，相信「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那麼是甚麼呢？列寧說：「雖然是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形式。」⁵⁸它既可以有效地行使國家政權的公共職能，又能限制國家政權壓迫和官僚統治的弊端。

毛澤東欣賞巴黎公社，也不是全盤接受，例如「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他是不會同意的，至少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

⁵⁵ 《徐景賢的最后回憶》，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421頁。

⁵⁶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3頁。

⁵⁷ 這句話來自1875年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轉引自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頁。

⁵⁸ 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頁。

不會同意的。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在「十六條」的第9條中也單獨列出，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說：「群眾選舉新的幹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⁵⁹他這個設想一直沒有付諸實踐。但他希望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國家機構的嶄新形式」。

他設想的「國家機構的嶄新形式」的大體框架是：

（一）「三結合」的政權，「既當官，又當老百姓。」：（1）要有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無產階級造反派；（2）黨政機關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幹部；（3）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駐軍負責幹部。毛明確說：不是「三結合」的奪權就不承認。不是「三結合」的奪權就不能叫為奪權。⁶⁰在「三結合」中，「要有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無產階級造反派」是首要的，也是最為關鍵的，沒有這一條，就不能說是新政權。毛澤東認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造反派「代表廣大革命群眾利益參加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這就使得各級革命委員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革命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對各級政權機構實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監督」。⁶¹

（二）消滅社會分工。軍隊里「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學起來」，「工也是這樣，以工為主，兼學軍事、政治、文化」，「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會使「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實現了「個人全面發展」。⁶²

⁵⁹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7年1月16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61頁。

⁶⁰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02-203頁。

⁶¹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革命委員會好〉，1968年3月30日。

⁶² 馬克思：〈對德國同人當綱領的幾點意見〉，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頁

(三) 實行供給制，消滅工資級別。⁶³在分配上，反對物質刺激，堅持政治掛帥。

(四) 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他認為這是產生資產階級和不平等的土壤。建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從而消滅剝削。

(五) 黨政不分，議行合一。

(六) 司法不獨立；砸爛舊的「公、檢、法」，實行「群眾專政」。

(七) 「精兵簡政，對舊機關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實行深刻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員會開始那樣做，領導班子小，辦事人員少，克服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現象，防止官僚主義莠草滋生」⁶⁴

以上些內容，在開始時特別強調「大聯合、三結合」、精簡機構和機關工作革命化。

對於政權組織形式的名稱，開始毛澤東曾考慮叫「人民公社」，曾通知上海和黑龍江都採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兩個電話都是王力打的。⁶⁵1967年2月5日，上海舉行了100萬人的大會，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牌子被摘了下來，用鐵錘砸碎，換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會後舉行了慶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游行。

但是，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還是放棄了「公社」這個提法。2月12日，毛讓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回到北京。王力把他們從機場接到毛的游泳池。毛肯定了上海的工作。說：我們考慮成立北京公社，但後來想到這個問題涉及面太大，涉及到整個國家體制問題，修改憲法問題，特別涉及到外國承認問題。毛說，上海公社還是改回來，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⁶⁶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

⁶³ 1966年12月6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到：「現在要實行供給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礎打好。」王力回憶，1966年12月，毛曾明白表示，要實行供給制，取消薪金制。

⁶⁴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革命委員會好〉，1968年3月30日

⁶⁵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09頁。

⁶⁶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36頁。

委員會。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送進了博物館。上海市革命委員主要領導成員是：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王少庸（老干部）、徐景賢、王承龍（機關幹部）、王洪文（工人造反派）。⁶⁷

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毛的理想主義在現實面前的妥協與折衷。放棄「公社」這個提法，並沒有放棄他對新政的構想。

當時的革委會實際是一個甚麼樣的情況呢？一開始，頗有一點接近群眾的味道。例如。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這一天，市革委會委員和市革委機關工作人員在原市委大樓集中，掛「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招牌，在地下室吃憶苦飯。吃的是粗糧摻糠蒸的窩頭和熬的粥。吃憶苦飯前，由革委會主任解學恭講話：「我們今天吃憶苦飯，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要永遠……永遠……」革委會工作人員學習解放軍的生活作風，一度住在機關集體住宿，早晨起來出操、跑步。要求進入「三結合」領導班子的幹部接受群眾監督，不能「穿新鞋，走舊路」。外出辦公不乘小轎車。

在行政機構上，把原來各種機構合并，減少機構、裁減人員。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委會成立時，設一室、二部六組，即辦公室、工業生產指揮部、農業生產指揮部、文教組、經濟計劃組、政法組、財貿組、外事組、接待組。共414人。即：把原來的市委辦公廳和市政府辦公廳合并為「辦公室」；把原來的經委、建委、交通局、工交政治部等合并「工業生產指揮部」；把原來的農委、農林局、水利局合并為「農業生產指揮部」；把教育局、衛生局、文化局、體育委員會合并為「文教組」；把經濟計委員會改為「經濟計劃組」；把原來的法院、檢察院合并為「政法組」；把財政局、一商局、二商局、物資局合并為「財貿組」；將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機構合并為「外事組」；將接待來訪的各種機構合并為「接待組」。三個月後，進一步精簡，改為兩部四組，即政治部、生產指揮部，辦事組，文教組，供給服務組，

⁶⁷ 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界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上海市委書記排位是：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周純麟（軍隊幹部）、徐景賢、王秀珍（工人代表）。王洪文地位上升，成為代理張、姚主持上海工作，直到王1972年9月上調中央工作。此後，上海工作主要由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主持。

人民保衛組，由原來 414 人減為 200 人。即：把原來市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的功能合并為「政治部」；把三個月前成立的「工業生產指揮部」和「農業生產指揮部」合并為「生產指揮部」；把三個月前新成立的「辦公室」、「外事組」、「接待組」合并為「辦事組」；把三個月前成立的財貿組和物資局合并為「供給服務組」；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合并為「人民保衛組」。原來是政府下屬的局級機構也大為精簡，如把公共汽車公司、自來水公司、房管局等合并為「公用事業局」。各級領導班子都叫「勤務組」，領導成員稱為「勤務員」。等等。文革前，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共有幹部 1 千多人，新機構的 200 多人中有相當一部份是軍隊來的。原來市委和市政府 80% 以上的幹部被精簡，送到「五七干校」勞動。⁶⁸

國家一級政權機構也大刀闊斧地精簡，國務院原來機構為 90 個部委單位，1970 年 6 月決定精簡為 27 個部委單位；原有機關工作人員 53,784 人，只規定編制 9,710 人，僅占原有人數的 18%。⁶⁹

當時從國務院到中央各部委到省市，各級領導機構都稱為「組」。沒有部長、局長，只有組長。縣一級是組長，國務院也是組長。「大組套小組，上下一般粗」，界限不清，權責不明，從上到下，管理混亂。

現代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社會管理、社會服務日益復雜，科層制（即官僚體制）是無法逃避的命運，只有從制度上、法律上加強對權力的制衡，才能減少官僚體制的弊端。新成立的革委會，沒有用現代政府管理思想確立政府的職能，更沒有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分擔一些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任務。新成立的革委會還是全能政府，政府職能的邊界是無限的。由于事權沒有變，原來黨政機構干的事情還得繼續有人干，就設置了很多臨時機構，從基層調了很多「借調人員」。1970 年以後，原來的政府機構又逐漸恢復。到 1972 年，不僅政府機構基本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還比原來更加膨脹。可以說，革委會建立之日，

⁶⁸ 天津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王輝向本書作者提供的情況。

⁶⁹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99 頁。

就是舊政府開始回歸之時。舊政府的回歸，是為了收拾難以為繼的混亂局面，當時是受多數人歡迎的。⁷⁰但是，對那些相信和堅持巴黎公社原則的那些人來說，就政府的全面回歸是不能容忍的。

各級革命委員會里的群眾代表（一般是較溫和的造反派領袖），從一開始就沒有讓他們掌握最重要的權力部門，但在革委會內部還可以代表一定的民意。有的在革委會內部充當反對派角色。他們或在革委會內「頂牛」，或在會外組織群眾施壓，貼大字報。但是，這些革委會內「頂牛」的群眾代表，很快以消除「派性」等種種名義被排擠出來，有的在清查「5·16」中被打成「5·16」分子投進了監獄。

革委會里的群眾代表還在原單位領取工資，沒有特權。王洪文後來任中央副主席，其工資還在上海領取。吳桂賢任國務院副總理，還在西安的工廠里領取原來那份工資。作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孫健，他妻子還在天津一家街道小廠里當工人。這家小廠名為天津墊圈廠，只有十幾臺沖床幾十名職工，廠址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合作里宿舍院的一個平房裏。國務院開會，參加會議的領導人還要付茶葉費。新的領導機構這些新氣象沒有堅持多久。

新的領導機構沒有解決權力制衡的問題，不可能制止腐敗。當時，社會上稱之為「不正之風」。買自行車、手表等一些緊俏的生活用品得托關係、「走后門」。群眾最不滿意的的是大學招生「走后門」。那時廢除了高考，上大學靠「推薦」。被推薦的很多是有權勢或和權勢人物有關係的家庭的子弟。老干部恢復職務以後不久，特權也悄悄地恢復。軍人搞腐敗更大膽、更野蠻。天津支左部隊利用職權，大量占用民房，引起了群眾公憤，我當時在新華社天津分社當記者，和另一名記者合寫了一篇調查報告，通過新華社「內參」送到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批示，作為中共中央 1972 年 28 號文件轉發全國，令全軍退出占用的民房，僅北京軍區就退出占用的民房近百萬平方米（北京軍區占用民房 300 多萬平方米）。

⁷⁰ 楊繼繩：〈天津市經濟工作的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第 2053 期，1972 年 1 月 7 日。楊繼繩：〈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2 年 10 月 21 日。

六、奪權！奪權！奪權

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左派力量發展很快。」「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他對接管的內容作了一個界定：「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讓原來的人去做，我們只管監督。」⁷¹1949年共產黨剛接管政權時也是讓留用人員做業務工作。但是，隨著奪權運動的深入，多數地方和部門突破了「只管政務，不管業務」的界限。不過，接管是文革中奪權的開始，一建立了革委會，新政權機構就全面行使權力了。

1月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用黑體字標出毛澤東的話：「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段話使青年造反者熱血沸騰，使當權派膽顫心驚。

對各級政權不加區別的全面奪權，中央領導人在認識上也有反覆。1月15日的北京工人體育場的10萬人大會上，陳伯達說「自下而上的奪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周恩來同意陳伯達的講話。但形勢發展很快，周恩來也轉變了態度。1月21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話說：「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呢？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該奪過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以後，是甚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后期再判斷。」⁷²結果，國務院各部都奪了權，工交系統23個部門都奪了權。後來毛說，這樣不行，對奪權要有個規定，不能都奪，該不該奪，哪些部門不能奪，特別不能讓外面的人來接管。如部隊、公安部、財政部、外交部、經委、國家計委，還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紅旗雜

⁷¹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7年1月16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61頁。

⁷²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45頁。

志、廣播電臺、解放軍報，都不能奪。⁷³這些不能奪權的單位大多實行了軍管。

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這篇社論是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說：

「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

「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奪權！」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號召下，各地的奪權鬥爭如火如荼。奪權過程也是毛說的「全面的階級鬥爭」過程，即對領導干部全面批判鬥爭的過程。領導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殘，有一批領導干部在群眾的沖擊中失去了生命。此時，周恩來對被批鬥的省委書記伸出援手。

1967年2月19日晚10點鐘，有人找到挨批斗后被關押在醫學院的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對他說：「楊得志司令員接到周總理的指示，說要接你到北京去。明早8點鐘，總理派來的專機在機場等你。楊司令派我先接你先到機場休息。」在困境中譚啟龍「激動得真是無以名狀」。他在機場專家樓里「美美地洗了一個澡，吃了一頓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到了北京，住進了京西賓館9樓的一個套間里。譚啟龍發現華東地區的省委書記，差不多都住在這裡。周恩來並沒有一直保護譚啟龍，4月27日，周恩來讓譚啟龍回山東，周是應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的要求才這樣做的。譚啟龍一下飛機，就被揪斗。⁷⁴

但是，各地奪權鬥爭伴隨的「全面的階級鬥爭」，並不是沿著毛澤東期待的「大聯合」的方向發展，造反派的各個「山頭」都要「以我為核心」，對其他「山頭」進行排斥和打擊，相互爭權、搶權。毛

⁷³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93頁。

⁷⁴ 《譚啟龍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第646-650頁。

期待的「天下大治」也遙遙無期。毛澤東說：「有些事情，我們原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斗，也沒有想到。」⁷⁵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大力量介入才能夠實現「大聯合」和「三結合」，才能夠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天下大治」。於是，毛澤東拿出了他手中的「王牌」——中國人民解放軍。讓軍隊介入文革。他沒有想到，軍隊介入文革以後，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它帶來的問題比它能解決的問題多得多。這方面的情況以后再作專門介紹。

⁷⁵ 毛澤東同阿中友協代表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8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65頁。

第一章

經濟維權者的悲劇



上海民兵在南京路上行進

與上海工人總部的造反不同，還有另一只龐大的勞動者造反隊。他們造反不是被意識形態所鼓動，而是維護自己的權益；不是政治狂熱，而是政治訴求。然而，當他們把文革從理想的夢幻拉回利益訴求的時候，引起廣大夢幻群體的狂怒。

文革前的中國，不僅有 10% 左右的人被歷次政治運動打成政治賤民，處於社會最底層。這些人在文革中抱有一絲希冀，企圖在批判官僚、砸爛國家機器中得到翻身的機會。但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斥責和嚴酷的「公安六條」，完全剝奪了他們參與文革的權利。然而，還有一批處在生活底層的人，他們希望通過造反，尋求社會公正，爭取他們應當得到的權益。這些人是：文革前被迫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各種名義下放到農村的城市職工；臨時工和合同工；每次調整工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職工。上述這些群體的人們不是政治賤民，「公安六條」管不了他們，他們是可以造反的。他們造反的目的不是「反修防修」，而是爭取自己應得的經濟權益，應而被稱為「鬧經濟主意」，他們的造反曾經形成很大的聲勢。不幸的是，他們的利益訴求，被中共中央和造反派共同扼殺了。

一、底層勞動者的權利訴求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國勞動者群體當中，處境最好的是國營工廠的工人。他們被稱為「領導階級」，工作十分穩定，住房、醫療有最低的保障。但是，這個社會群體經濟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居住條件和工作環境惡劣，患有各種職業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領導關係處理得不好，調工資、分配工種就會受到歧視。

在勞動者隊伍中還有一批人的政治經濟地位比國營工人低，這就是臨時工、合同工。這是劉少奇提倡的，他在 1964 年說：「我們現在只有一種勞動制度，固定工，有勞動保險，招來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難。以後，我看勞動制度不要只是一種，要盡量用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轉正，我是反對的，不贊成這件事，但是反對不了，還是轉了。轉了好啦，去年前年動員工人下鄉，也算吃了苦頭了。今后增加工人，

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勞動保險制度也要修改。」¹根據劉少奇這個指導思想，從 1964 年開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臨時工、合同工。劉提出臨時工、合同工的發點是想克服單一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開放的 80 年代，中國國有企業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上億農民工都是臨時工。但在文革前，社會保障和就業是聯在一起的，即醫療保險、勞動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是在就業單位里得到的，不是這個單位的固定職工，就沒有社會保障，臨時工、合同工生老病死無法得到解決，還有隨時被辭退的危險。他們的工資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經濟待遇，他們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職工低。臨時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參加工會，入黨更是難上加難，他們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劉少奇被打倒後，他們借批判劉少奇的名義要求改善他們的境遇。

在大饑荒後期，為了減輕城市糧食需求的壓力，根據陳雲的建議，1961 年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 1960 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 2 千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一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1962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從 1961 年到 1963 年，全國減少職工 1, 833 萬人，城鎮人口減少 2, 600 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 2, 800 萬人²。這兩三千萬城鎮人口都是勞動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強制他們離開城市的，農村不歡迎他們，很多人回農村後生活無著，他們中的部份人，一有機會就上訪告狀，要求解決他們的困難。

毛澤東時代是統制經濟制度。一切都由政府統制：資源的收取和配置高度集中於政府、經濟決策和執行高度集中於政府，這樣，矛盾也必然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統制經濟的最高層總是感到有很大的壓

¹劉少奇：〈關於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制〉，1964 年 8 月 22 日，《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70-472 頁。

² 1963 年 7 月 31 日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報告〉中有次數字。

力。為了緩解城市的壓力，政府把農村當作緩解城市矛盾的蓄水池。從 50 年代中期開始，就讓大城市青年到農村或到邊疆。當時主要是黑龍江省的北大荒和其他土地較多的地方墾荒。1964 年 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把上山下鄉明確定為青年就業的一項長遠方針。1964 年開始了全國範圍內運動式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文化大革命前的 1966 年，下鄉知青就 150 多萬人。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重慶市下放到達縣專區的就有 14,000 多人，湖南下鄉知識青年人數達到 8.3 萬余人。³上海市更多一些。儘管有些人下鄉是出于建設農村的理想，但絕大多數是無奈的，是被迫的，他們的父母在城市里很多是被歧視的群體。他們被取消了城市戶口，和城市的父母天各一方。他們從生存環境較好的城市被迫到生活環境較差的農村。到農村以後，不僅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面臨種種困難的歧視。

大批勞動者應有的權益被侵害，文革前他們分散在各單位，勢單力孤，無法提出自己的訴求。文化革命開始以後，他們終於找到了機會，上面介紹的幾個勞動者群體，紛紛起來造反，多年積累的怨氣一下子爆發出來。他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組織，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國營農場紅色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第一線戰鬥隊」等。這些全國性的組織在很多省設有分支機構，成為當地造反派中激進的一翼。他們利用造反的機會開展活動，提出訴求。

開始，下鄉知青在農村就地造反，很快，他們得知知青問題不是在農村能夠解決的，問題出下面，根子卻在上面。文革開始後，湖南約 6 萬多知青借串聯之機返城。「湖南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聯合調查團」還到外地調查各地知青生存狀態，除了臨湘的黃蓋湖農場、平江的時豐茶場等知青集中地外，還去了湖北的洪湖與赤壁，與當地的武漢知青進行了交流。他們「回城鬧革命」的活動之一是「造戶口反」，即要求相關部門的領導幹部解決城市戶口、糧食、工作和「革命經費」

³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共產黨志》，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 年，第 221 頁。轉引自向前：〈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造反〉。

問題。有的知青趁亂威逼相關單位工作人員辦理戶口遷移，拿到蓋有公安局鮮紅印章的那張紙時，欣喜若狂，淚流滿面。⁴湖南省委機關群眾組織「永向東」貼出傳單〈造戶口反無理〉，參加反迫害組織的張揚（80年代代寫《第二次握手》名噪一時）寫了約七、八千字的傳單稿〈評《造戶反無理》〉，該文章鉛印了八千份，張貼散發到長沙的大街小巷，因為文字較好，說出了千千萬萬知青和他們家長的心裏話，造成很大的影響。⁵

1966年8、9月間，廣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佔領了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砸開檔案櫃，公佈了某些奸污迫害下鄉女知青的案例，開辦接待站接更多的來京造反知青，還多次召開大會對安置辦領導進行批判。

鬧「經濟主義」者的訴求大體是以下幾個方面：

——下放職工要求復職，並補發下放費、退職費等。

——沒有下放的職工中有些人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應補發差額和獎金、補貼等。

——非正式職工要求享有職業保障，工廠不得辭退臨時工、合同工及外包工。

——取消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就業制度；要求在政治上、經濟上與國營企業職工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工資與勞保福利，將計件工資、日工資改為月工資，享受醫療保險和病假工資等等。要求提高政治地位，例如能夠加入工會，建立自己的群眾組織。

——反映與單位領導的摩擦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要求懲罰這些領導幹部、伸張正義。

——要求發放各種文革活動經費，如串連費、宣傳費、袖章費，或要求脫產參與運動期間工資照發，或要求單位提供運動所需的設備工具，如擴音器、喇叭、汽車、自行車等。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要求回城，要求將戶口遷回城市。

⁴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共產黨志》，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年，221頁。轉引自向前：〈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造反〉。

⁵張揚：〈我當年研究「上山下鄉」〉，未刊稿，轉引自向前：〈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造反〉。

必須指出的是，從情理上看，這些訴求是合理的，但當時國力不可能滿足。被送到農村的職工和青年也不可能讓他們回來，當時城市沒有這麼大的承受能力。國家財政也沒有能力給臨時工、合同工補發工資。政府對勞動者欠債太多，無法一次還清。如果他們強制要求實現自己的訴求，必定會發生對抗。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和「高尚」目的，這些為利益而爭的勞動者的行為和文革大方向完全不一樣。他們的結局必然是悲劇。

二、「全紅總」的組織狀況及其活動

在爭取經濟權益群眾組織中，影響最大的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

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地因造反而遭到鎮壓的人們逃到北京。他們中有一些人被安排在西直門內大街的冶金部第二招待所（當時臨時改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招待所」），其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合同工、臨時工。相同命運聚集在一起，增加了造反的勇氣。他們經多次協商醞釀，11月8日，「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在冶金部二招成立。發起人來自北京、江蘇、安徽、廣西、貴州等省市自治區。「全紅總」領導核心很不穩定，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間，「全紅總」的領導核心「五人小組」，共有三屆，第一屆：王振海（北京）、蕭碧璜（又名方圓、周牧，貴州）、羅運泉（湖南）、廖閣夫（湖南）、郝維奇（北京）第二屆：王振海（北京）、方圓（貴州）、李晉瑄（北京）、金展雲（北京）、郝維奇（北京）。第三屆：方圓（貴州）、楊政（湖南）、李晉瑄（北京）、金展雲（北京）、郝維奇（北京）。

「全紅總」成立的當天，就組織了50多人到全國總工會會議廳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承認他們的合法性，給予注冊登記。但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王志傑等不予理睬。因此，這一靜坐就是十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數由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王志傑代表全國總工會在口頭上承認了「全紅總」是合法的造反組織。

王志傑等看這聲勢越來越大，連忙向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馬純古、

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報告，馬純古又聯名向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工交口的副總理李富春作了報告。12月8日，全國總工會經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臨時工表示：支持他們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無故解僱合同工、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報國務院。⁶

12月5日，「全紅總」北京分團宣告成立，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近3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接著，貴州分團、湖南分團、黑龍江分團、廣西分團、廣東分團、江蘇分團、上海分團、河北分團、內蒙古分團、安徽分團、江西分團等相繼在各地成立。在北京的「全紅總」總部和全國各分團緊密聯繫，每天收到各地寄來的幾千封信，信件內容大多是各地臨時工、合同工被解僱、受壓迫的嚴重情況以及維護權益的強烈呼聲。「全紅總」要求就改善臨時工、合同工待遇問題，同國務院勞動部談判。

12月22日，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共同答覆「全紅總」，確定23日在勞動部禮堂舉行三方會談。但到時又一再拖延。一再拖延說明這兩個部門有難處，但兩次延期激怒了「全紅總」的總部委員們。「全紅總」總部會議決定：如果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再拖延日期，就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他們還擬定了活動口號：

向劉老闆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徹底鏟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

我們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

反解僱，反迫害，反欺壓！

要平等，要同工酬，要生活保障！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12月25日下午2點，北京分團開著數輛宣傳車進入了天安門廣場。數萬人把金水橋的兩側都站滿了。人越來越多，長安街的交通被阻斷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王振海發表鼓動性講話後，隊伍在宣傳車的帶領下向勞動部行進，下午5點左右到達，把勞動部圍得水洩不通。直到8、9點鐘，隊伍才慢慢散去。「全紅總」的頭頭

⁶ 6王年《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4-155頁。

們還在勞動部會議室沒有離去。中央文革聯絡員通知他們，中央領導人要接見「全紅總」15名代表。

12月26日晚8點，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進入人大會堂東會議廳，隨同的有《解放軍報》代表編輯胡癡、《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唐平鑄。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江青情緒激動地說：「合同工也是無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工人，你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甚么合同工，簡直就像包身工！」合同工在他們（指在座的部長）眼里簡直就像後娘生的。」江青聽了代表們控訴後流著淚說：「我淚流不是軟弱，是因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謝你們，你們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課！」當代表們控訴到有的工人們因為被解僱後投河上吊，賣兒賣女的時候，江青哭著說：「同志們，我不知道事情會這麼嚴重，我對不起同志們啊！」「他們都是老爺（指那些部長），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個通知（大意如下）：

(1)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2)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得解僱臨時工合同工，必須照發工資。從1966年6月1日以後解僱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單位上班，工資補發。(3)現行反革命分子例外。」⁷

周恩來也持這樣的態度，他說：「現在發現臨時工、合同工問題很大，合同工、臨時工，還有半工半讀，實際上完全是資產階級剝削思想。半工半讀，在生產總額中算進去，但工資總額不算，編制也不增加，學徒工每月20多元，而半工半讀每月十幾元，半工半讀到工廠不是學生又不計報酬，半工半讀每天勞動多是6至8小時，剝奪了勞動果實，這是新的剝削方法，這種剝削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文化大革命以來到處鬧事，最典型的是大慶油田，油田儘管存在二派，生產還是很平穩的，形勢是好的，8千多人現在放假鬧革命，每月拿十幾塊錢，你剝奪我的勞動果實，我不幹了！到處串連，白天睡覺，晚上打砸搶，把一個最高級的設備破壞了，這就是處罰。列寧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對機會主義的處罰，主席加了一句話：『是無政

⁷方園：〈自由工人運動的先驅——紀念獨立工會「全紅總」成立三十週年〉

府主義對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處罰。』劉少奇就是機會主義，他所發揮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在工廠就為這個鬧事很多，多半是合同工臨時工不轉正，不享受公費聽，沒有勞保，把工人階級一分為二，當然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要麼轉正，要麼不上班。」⁸

12月27日，全國總工會派出汽車，把「全紅總」的頭頭們接去，讓他們在全總大樓辦公，住宿在小灰樓。全總陷入癱瘓，「全紅總」主持了原全國總工會的一切工作。直到「全紅總」被取締。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與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簽署〈聯合通告〉。〈聯合通告〉基本內容是江青提出的三條：（1）為了保障「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僱。（2）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僱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僱期間的工資。（3）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聯合通告〉簽發後，立即送《工人日報》印刷廠套紅大字鉛印30萬份，同時向中央文革和國務院報告。1月4日一大早，中央文革決定緩發〈聯合通告〉，接著決定銷毀已印好的〈聯合通告〉。但是，「全紅總」不願將爭到手的成果毀於一旦，有人在昆明將〈聯合通告〉大量翻印，發往全國。希望在有些地方造成既成事實

1月8日晚8時，「全紅總」召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在西苑飯店大會議廳召開。100多名各國外交官、駐京記者、左派組織、駐京代表、援華專家參加。「全紅總」全體總部委員出席了會議。會議由李敦白⁹擔任司儀和英文翻譯，由蕭碧璜主持。王振海代表「全紅總」講話，其他的總部委員介紹了本地區的臨時工合同工的悲慘遭遇。「全紅總」幾位代表發言後，外國記者紛紛提問，由蕭碧璜和王振海回答。會議進行到近12點鐘才結束。解放軍報記者（此時為中

⁸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衛生系統有關代表的講話，1967年12月10日。

⁹李敦白（1921_），美國人，1945年來中國支持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專家，文革期間積極參與造反，被打成「國際特務」予以關押。1979年回美國經商。

央文革《快報》組成員）邵一海出席會議，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記者近 20 人到會採訪。會議結束後大家合影紀念這張合影照，成為「全紅總」頭頭們「里通外國」的證據，也是以後逮捕他們的線索。

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次會議，說：「你們就是不聽話，不聽打招呼。在外國人面前哭哭啼啼，象甚麼話！家醜不可外揚嘛！置中央於何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以後，中央文革和「全紅總」就很少聯繫了。邵一海雖然經常來，但多是默默地觀察，很少發表意見了。

1 月 16 日晚「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會前周恩來要求大會要提兩個主要口號號：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另一個「抓革命，促生產」。他要「全紅總」通過這個大會做好來京臨時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們立即離京返回原地。1 月 17 日，在接見首都紅衛兵一、二、三司和解放軍文藝團體和國務院各部造反派的會議上，江青改變了原來支持「全紅總」的態度，還讓首都的造反派把全紅總「壓回去」。1 月 19 日，周恩來辦公室通知：不能有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讓「全紅總」的人回到各地抓革命促生產。

1967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一律撤銷。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文革期間對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處理問題的通告〉。其中指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 1967 年 1 月 2 日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以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廢」，「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決定以前，仍按原來的辦法進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眾，可參加本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眾組織」。

從 1967 年 2 月 24 日起，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北京市衛戍區分別逮捕了「全國滅資軍造反團總部」、「全國國營紅色造反兵團」、「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捍衛真理革命造反

團]、「全國農墾戰士革命造反團」、「國際紅衛軍中國之隊」、「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聾啞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等組織的領導人 40 多人，前三個組織被定為反革命組織。¹⁰

1967 年 3 月初，全國各地的「全紅總」各級負責人大都被捕，因此收到株連的群眾無法統計。「全紅總」貴州分團被抓捕 26 人。判重刑 5 人，其中「全紅總」貴州分部負責人蕭碧璜刑期二十年。蕭碧璜為貴陽市建築臨時工，貴陽「六六時間」時因看過學生張貼的反省委的大字報，在現場發表過議論，被打成「反革命」，他赴京告狀住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他自己寫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讓住在這裏的臨時工、合同工傳閱，引起共鳴，對成立「全紅總」起了重要作用。他回貴州后成立「全紅總」貴州分部，成員達 3 千多人。¹¹

三、上海的經濟主義和反經濟主義¹²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也是鬧經濟主義比較集中的地方。在上海，最先提出經濟要求的也是沒有穩定職業的零時工、合同工和外發加工的外包工；接著是大饑荒年代被迫回鄉的上海職工；以後又進一步發展到支援內地的職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在上海的造反組織最初名為「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不久，為與全國的這類造反組織統一，改稱「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他們要求享有職業保障，工廠不得辭退臨時工、合同工和外包工；要求取消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的用工制度。要求與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同等待遇。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廠辭退了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恢復工作。此類人員召開大會，逼干部簽字，在江青 1966 年 12 月 26 日接見全國臨時工、外包工造反組織代表並表達同情的講話傳到上海

¹⁰周良宵、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8 年，第 320 頁。

¹¹鄭振新：《貴州風云》，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2014 年，第 73 頁、79 頁。

¹²關於上海經濟主義風的內容，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李遜〈革命口號下自主利益追求——1967 年發生在上海的「經濟主義風」〉，載于網絡雜誌《華夏文摘》，1998 年增刊第 39 期（總第 158 期）。

後，臨時工、合同工的造反活動達到高潮。大批被解雇的臨時工、合同工紛紛回到工廠要求復工。

上海在 1961 年到 1963 年共精簡國營單位職工 31.2 萬人。其中 18.3 萬人回農村，12.9 萬人到上海城鎮街道。¹³當年精簡城市職工時，其他地方的精簡對象是 1958 年從農村來的新工人，上海是老工業城市，1958 年的新工人不多，不得不將很多老工人當成精簡對象。到 1967 年初，當初被動員回農村的 18 萬人中，有 5 至 6 萬人回到上海，他們提出：「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復工！」的口號。¹⁴那些當年被辭退到上海街道城鎮的 12.9 萬人，雖然以後有一半左右陸續進了小集體所有制的里弄生產組或街道工廠，但他們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體所有制的原廠工作。¹⁵

60 年代上海為減輕就業壓力，曾動員許多當時被稱為「社會青年」的無業青年和剛從中學畢業的學生去上海郊縣農場或遠在新疆的農場工作，這種動員大多是半強制性的。「文革」中他們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將戶口遷回上海市區，不願再待在艱苦的農場或邊疆，如上海郊縣的長興島，各農場共有下鄉青年一萬多人，跑得只剩 100 人。文革前，為了搞三線建設，上海一批職工被調往內地。現在這些職工也返回上海鬧戶口。僅儀錶、化工、機電一局三個局支內的 26,000 名職工中有 2 萬返回。¹⁶

在國有企業裏，有些單位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有些單位的職工提出，本單位的領導在過去加工資時，沒有按照有關文件辦理，壓低了工資標準，因此要求按當時的文件重新評定自己的工資級別，並補發這些年的差額。如上海圓珠筆廠工人提出過去評級不合理，要單位領導同意將凡工資低於 1963 年該廠平均工資的，一律提

¹³上海市統計局編：《新上海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1989 年，第 107 頁。

¹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1966 年 11 月-1967 年 3 月 15 日〉（討論稿），1967 年 3 月 17 日。轉引自「文革博物館」321《上海的「經濟主義風」》（世紀中國）。

¹⁵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1967 年 2 月 15 日。轉引自「文革博物館」321《上海的「經濟主義風」》（世紀中國）。

¹⁶《徐景賢的最後回憶》，星克爾出版社，香港，2013 年，第 396 頁。

高到平均工資水平，并自 1963 年開始補發，共補 7 萬多元。¹⁷國務院規定學徒工的學徒期限可以因工種的繁簡分為技術工三年、熟練工二年。上海卻一律規定為三年。學徒工沒有工資只拿 18 元津貼，正式工起點工資便是 42 元。而一些學習技術工的被分配到熟練工的工種，這部份人紛紛要求縮短學徒期并補發工資差額。上海第二商業局 1967 年初，曾補發工資 63.7 萬元，主要便是用于學徒轉正期三年改兩年這一項。¹⁸上海港務第四裝卸作業區為此一次補發近 4 萬元，平均每人補發 300 到 400 元，有的近千元。¹⁹

面對各類人員越來越高的經濟要求，各級干部處于兩難困境：簽字意各種要求，不符過去的政策；但若頂著不簽字，又可能激怒群眾，使事態擴大，還可能被扣上和革命群眾對抗的帽子。

為了緩和矛盾，上海市委在 1966 年 11 月中旬的「安亭事件」后不久，同意將上海郊縣的「亦工亦農」回鄉工人的收入從與生產隊四六分成改為百分之一百歸回鄉工人²⁰。11 月 22 日，中共華東局代表，華東局工業辦公廳主任黃宇齊與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于水實簽字同意臨時工、外包工六項要求；11 月 23 日，上海市勞動局局長王克在支農鄉工人的要求上簽字，市勞動局將這兩份簽字的協議於 12 月 2 日作為正式文件下發²¹。11 月 29 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長宋日昌為首的勞動工資接待小組。

1966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主持市委會議宣讀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的指示：「現在很被動，要爭取主動，對他們的要求，要盡量解決。」12 月 15 日，市勞動工資委員會向中央打報告希望給予明確答覆。12 月 26 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確指示的情況

¹⁷文革時期的傳單：上海人民銀行小東門分理處革命群眾、上海市南市區人民銀行滿江紅革命造反團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電報，1967 年 1 月 6 日。轉引自「文革博物館」321《上海的「經濟主義風」》（世紀中國）。

¹⁸上海市第二商業局：〈關於刮經濟主義妖風的情況彙報〉（67）滬二商財王字系 70253 號，1967 年 6 月 6 日。

¹⁹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1966 年月-1967 年 3 月 15 日〉（討論稿），1967 年 3 月 17 日。

²⁰同上。

²¹同上。

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與群眾協商時對幾個具體問題的暫行處理意見〉，共七條。內容不但包括臨時工、外包工等的工資福利，還包括全民和集體所有制職工的勞保待遇、病假產假工資、學徒期限、交通補貼等等。²²

1967年1月1日，市委副書記、市長曹荻秋在有關會議上傳達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意見：「經濟問題放鬆些，不要頂。」²³會上討論了五條：（1）1958年以後精簡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廠安排工作；（2）社會青年要積極安排工作；（3）街道工業可以先戴「國營」的帽子，適當增加勞保福利；（4）郊縣五類地區的工資可考慮升到八類地區的標準；（5）長期臨時工和外包工改為長工。²⁴第二天，市勞動局又配合市委的五條制定了兩個具體方案並將方案向下傳達。

市委領導的讓步，激勵了為權益造反的工人們，他們迅速抓住這個機會，尋找各種理由與當權者談判。幾天之內，這股風便迅猛地席卷了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所有的局長、處長、科長都成了寶貝，被人們爭先恐後地搶來搶去，逼著在各種經濟要求的紙條上簽字。僅鐵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共簽了63份工資福利協議，金額達3,050萬元。²⁵

幹部讓步、工人們得到了一些利益以後，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經濟要求。許多工廠和生產單位，人們無心工作，日夜包圍著各級幹部進行各種經濟談判。上海海港近6千人離開生產場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裝卸量從日常的9萬噸下降到3.5萬噸²⁶。其他單位也出現了生產下降的情況。

由於給這些造反者發放種種補貼，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

²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²³上海市勞動工資委員會紅色造反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是大颶風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罪魁禍首〉，1967年6月27日。

²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計（討論稿）〉（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1967年03月17日。

²⁵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²⁶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銀行門前都擠滿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一支出現現金 2,800 萬元²⁷。由於提款量大、單位多，上海各銀行的現鈔幾乎被擠兌一空。

拿到各種補發款項的人們，馬上購買久已渴望的商品。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中百一店 1967 年 1 月 1 日至 8 日的總銷售額比上月同期增加了 25.1%。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36.3%。1 月 8 日早上，中百一店一開門，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擁而進，300 多人衝向縫紉機櫃臺，100 多人衝向自行車櫃臺；手錶是最熱銷的，甚至平常不大人買的 400 至 500 的進口手錶也幾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許多商品脫銷，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²⁸

上海住房極其擁擠。搶佔房子也是經濟風的一個方面。徐匯區天平路有 200 多戶搶佔了房子，長寧區天山房管所一個星期就把 1,600 間房（可住 1200 戶）全部搶光。²⁹

本來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實行「經濟問題放鬆些」的指導思想以後，加速了自己的垮臺。張春橋等敏銳地看到了對他們有利的時機，就鼓勵堅持政治造反的「工總司」對經濟造反者重拳出擊。1 月 7 日，工總司在國棉 31 廠召開會議，討論經濟主義風潮。王洪文提出必須制止，他要求工總司馬上發傳單。當夜，以工總司的名義發出了〈緊急通令〉的傳單，呼喚工人不要脫離生產崗位，不要搶佔住房，不要為工資造反，矛頭要指向走資派。工總司要大家回去動員工人把領到的錢統統退回去。

1 月 8 日日下午，30 多個造反組織在錦江飯店開會，討論起草了制止經濟主義風潮的〈緊急通告〉，陳丕顯讓朱永嘉坐在自己旁邊記錄會議發言。朱永嘉將大家的發言歸納為十條，修改後定名為〈緊急通告〉，陳丕顯最後審定。1 月 9 日，以「工總司」為首的 32 個造反

²⁷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各產業局會議記錄〉，1967 年 2 月 27 日。

²⁸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1966 年 11 月-1967 年 3 月 15 日〉（討論稿），1967 年 3 月 17 日。

²⁹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上海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7 年 3 月 17 日。轉引自宋永毅等文革資料庫。

組織署名的〈緊急通告〉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

〈緊急通告〉指出：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工作崗位，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動員到各地的上海工人、機關干部和各單位工作人員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文革，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各單位當權派簽發的外出串連證明立即作廢，各單位發出的串連費由當權派簽發者追回，除了必要的生產經費、工資開支、文革經費、辦公經費和其他正當開支以外，各企業、事業單位的流動資金一律凍結，保證國家經濟不受損失；關於工資調整、工資補發、福利待遇等放到運動后期再做處理；不準任何人強佔公房，已入住者限一周內搬出等。

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32個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說：「〈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號召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干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1月11日，毛澤東要求向全國廣播〈緊急通告〉，《人民日報》轉載並發編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通知說：

有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轉移鬥爭目標，挑動不明真相的少數人大鬧經濟主義，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他們用各種經濟收買的手段，企圖把一些群眾引向經濟主義的邪路，不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單純追求個人的暫時利益。他們不但要恢復而且要擴大過去關於工資，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錯誤措施。他們煽動一些群眾要晉級加薪，隨便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物質。他們煽動前幾年下放到農村業且已參加農業生產的群眾，鬧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經濟要求。有些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不按國家規定，強行到銀行提款。地富反壞右分子也乘機妄圖擾亂國家經濟生活，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央認為，必須立即制止這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立即制止這種大間經濟主義的傾向。

中共中央這通知發佈後上海的經濟主義風潮還沒有停息，1月17日，「上海支農工人回滬造反總司令部」組織六、七萬人到人民廣場靜坐示威，並帶上大量的被子、草包、要求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他們說：「我們是老工人，不屬於當年精簡下放的範圍，中央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不針對我們。」他們高喊：「一天不見，一天不散！」「我們要復工，我們要飯吃！」「問題不解決，死也要死在人民廣場！」³⁰「工總司」對他們軟硬兼施，這些人終於屈服。在強大的「工總司」面前，他們還是弱勢。

經濟主義風不僅在上海一地發生。湖北省長張體學在檢查中承認：「一月風暴席卷全國，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派，孤注一擲，喪心病狂的刮起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在這一時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嚴重錯誤。我說『娃娃們要熱鬧些，多給幾個錢』。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把文化大革命這場嚴肅的政治運動，引向了經濟主義的邪路。」³¹

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聲勢，各地抓捕了一些搞經濟主義的群眾組織頭頭，解散了這些組織。經濟主義風被壓下去了。然而，廣大勞動者對自身權利的要求是壓不住的。到196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不得不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中發（68）10號，1968年1月18日），重申了關於工資、福利、獎金、附加工資、補貼以及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關係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運動後期處理。還威脅說：「一切革命群眾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識破階級敵人利用反革命經濟主義破壞革命、破壞生產陰謀，堅決把那些隱藏在背後進行挑動和破壞的壞人清查出來，交由革命群眾組織和專政機關嚴肅處理，情節特別惡劣的，必須依法懲

³⁰《徐景賢的後後回憶》，星克爾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398頁。

³¹張體學的書面檢查，1968年1月18日。轉引自王光照：《這裏那時潮起潮落——武漢鍋爐廠文革紀事》，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73頁。

辦。

從這個文件看，經濟主義和反經濟主義實際是國家利益和勞動者利益的博弈，國家要維持計劃經濟體制，只能用強力打壓勞動者的合理訴求。但是，職工的合理訴求一直沒有停止，內蒙古「石拐溝煤礦工潮」就是一例。1969年春夏之交，礦務局革委會在清理過期檔案時，發現一份文革前煤炭部下發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礦工人的附加工資（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4元）這對於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但烏蘭夫當時以財政困難為由，沒有執行這個文件。消息傳開，全礦5萬多工人向革委會施加壓力，要求補發這筆錢。由於數額太大，革委會不敢作主。於是，工人長時間的罷工。全礦工人十分團結，本來已分為兩派的群眾組織并肩作戰。在數萬工人的圍攻下，礦革委會主任楊秀（領導幹部）和副主任呂華（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簽字，另一個副主任（軍代表）不同意。最後，提款了，也分了，工人皆大歡喜。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12月19日，中央對內蒙古全面軍管以後，軍管會對礦革委會突然襲擊，由全副武裝軍人包圍了大禮堂，當場逮捕了楊秀和呂華。宣布周恩來代表中央對工潮的定性：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主義妖風，是性質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楊、呂兩人判處死緩，補發給職工的工資再從工資中逐月扣回。³²

³²程楊潔：〈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宋永毅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回憶》，第748頁。

第一二章

「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



譚震林



葉劍英



陳毅



李富春



徐向前



李先念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老紅衛兵被打垮，「聯動」分子被抓，大批幹部被打倒、被批斗。「一月奪權」以後，各級官僚機構癱瘓了，黨的組織活動停止了，造反派大亂天下。革命元老們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開始抗爭了。當時稱「二月逆流」。伴隨著北京的「二月逆流」，全國各地的軍政官僚們對造反派施行了新的一輪鎮壓，當時稱為「二月鎮反」。這一輪對造反派的鎮壓，從1967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夏天。

一、革命元老們的抗爭

邱會作回憶說：當造反派鬥爭的矛頭指向我們時，高級幹部自發起來反抗。有的通過「抓生產、抓業務」的方式來「壓革命」；有的搞純學術批判打「死老虎」；有的放手讓群眾亂，任其自流；自己作壁上觀；有的組織勞動模範、黨團骨干參加「四大」；大膽的就刁難造反學生，暗中記賬，想日後整他們。我屬於最後一種類型的人。¹

一批革命元老們對造反派不滿意，對中央文革不滿意，他們經常在一起議論。葉劍英家里是元帥們的議論中心。同住西山的聶榮臻常去葉那里，住在外邊的陳毅也常去。陳毅和葉劍英都是美食家，空軍常從南方給葉帶來一些穿山甲、果子狸、蛇和山龜，他們邊吃邊談。不在軍隊工作的元老們也有一個議論中心，是在李富春家里。李富春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和夫人蔡暢又是毛的朋友，元老們想通過李富春把他們的看法傳到毛澤東那里。²這種不滿發展為抗爭：2月11日、2月16日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的抗爭和中央軍委會上的抗爭。這些抗爭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猛烈地批評中央文革小組。

老帥和副總理們不是貿然地公開批評中央文革的，他們抓住了一個機會：毛澤東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毛澤東的態度是捉摸不定、反復無常的。陶鑄本來是毛澤東要打倒的，但他對陳伯達、江青在1967

¹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2011年，第51頁。

² 同上，第110頁。

年 1 月 4 日接見中南地區群眾會上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作法又不滿意。12 月 10 日，毛召開了一次常委擴大會。毛在會上罵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指陳伯達）打倒一個常委（指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么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然後罵江青：「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干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只有陳伯達說了話，江青插了話。」毛還講：「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在這個地方說，在中央文革小組里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談。」但是，葉劍英向老師們和其它人講了，李富春向副總理們和其它人講了。³毛批評中央文革，元老們很高興。

那時，不管是哪種政治力量，都以毛的是非為是非，大家都知道堅決搞文革的，即使要批評中央文革，也要看毛的臉色，也要利用選出創造的機會。這次毛批評中央文革了，反對中央文革的人認為機會來了。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大軍區也受到衝擊。1967 年 1 月上旬至 2 月中旬，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後移至西山）召開擴大的常委會，商討在軍隊里搞「四大」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師與江青、陳伯達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江青、陳伯達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指摘軍隊里的運動沒有搞起來，總政和中央文革唱對臺戲，責任在總政，說蕭華是「資產階級政客」。並責令蕭華到當晚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的 10 萬人大會上作檢查。葉劍英、聶榮臻提前退出會場以示抗議。周恩來說：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到大會作檢查。周和葉一起到毛澤東那里請示匯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但是，還沒等毛的保蕭指示傳達，軍內造反派就連夜到蕭華家抄家抓人。蕭華從後門逃脫，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第二天，軍委常委繼續召開。參加會議的軍隊高級將領們知道了毛保蕭的態度，紛紛批評中央文革。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江青也不示弱，追問蕭

³ 《王力反思錄》（下），第 2 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 5 月，第 235～237 頁。

華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葉劍英拍案而起，說：「如有窩藏之罪，我來承膽！」還批評中央文革：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結果！說話間，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這就是后來說的「大鬧京西賓館」。⁴會后，葉劍英以召集人的身份的向林彪告了江青和陳伯達的狀，把他們攻擊軍隊的說法全部向林彪說了出來，提出了要穩定軍隊的強烈要求。為了平息軍隊的憤怒，1月22日，毛接見了這些軍頭們，一方面要求軍隊站在左派一邊，另一方面又耐著性子聽軍頭們訴說挨整被斗的情況，還表示贊成老師們穩定軍隊的意見。林彪本來對中央文革批評軍隊有意見，看到毛的態度，就站到軍隊一邊，把江青叫到家中，對她大發脾氣。⁵

1967年2月11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葉劍英斥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又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拍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聶榮臻對抓「聯動」成員強烈不滿，他說：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⁶

1967年2月16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的中央碰頭會。參加者有譚震林、陳毅、李先念、葉劍英、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謝富治、陳伯達、康生、余秋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這個會議原來

⁴ 另據一位知情者說，葉劍英拍桌子是針對徐向前的。在軍隊「四大」的問題上，葉、聶、徐的態度是不同的。其實在整個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初期，面對面地對江青發火是沒有，老師們都很老練，不會得罪毛的夫人；文革中期，黃永勝跟江青面對面頂撞過，這裡沒有林彪支持，也有汪東興的誤導：汪總是說毛和江是兩回事。一位知情者：〈讀李曉航文〉，《記憶》第21期，2009年4月30日。

⁵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194～197頁。《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651～654頁。

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788頁。

是準備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的。會議開始前，譚震林質問張春橋：為什麼不讓陳丕顯到北京來？張春橋說：我們回去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說：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咧！你們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們把老干部一個一個地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級干部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干子弟就抓，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就是用反動血統論來反對反動血統論。蒯大富是個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我從來沒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沒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李先念說：我也哭過幾次。譚振林越說越激動：「我不該早年參加革命，我不該很早入黨，不該活 60 歲。我不干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站起來要退出會場，周恩來叫他回來。陳毅對譚說：「不要走，跟他們鬥爭！」「這些家伙上臺，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陳毅還說：「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了嗎？他一上臺不是搞修正主義嗎？」「現在搞的是什麼革命？比當年王明還王明！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陳毅還提到延安整風，他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溥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了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要證明。」陳毅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年延安整風的積極分子劉少奇、彭真這一批人現在反毛澤東思想很起勁，現在搞文革的積極分子將來也會變。李先念說：「老干部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就是從《紅旗》13 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干部統統打掉了。」周恩來問陳伯達和康生：《紅旗》13 期社論這麼大的問題，為什麼不跟我們打個招呼？吵到下午 7 點，周恩來宣布散會。這個會沒有宣布開會，只宣布散會。⁷在會議中間，周恩來知道事情嚴重，

⁷ 《王力反思錄》(下)，第 2 版，香港北星出版社。其中陳毅的話是高文謙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文革十年資料選編〉，本書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 26 版，第 201 頁。

他主持的會議，恐怕脫不了干系，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毛派汪東興來聽會。⁸

這就是以後說的「大鬧懷仁堂」。

會后，王力、張春橋、姚文元作了追記，由王力執筆寫成一個記錄稿，經陳伯達、周恩來修改，周恩來作了幾處補充，加了幾處字數不多的插話。王力和關鋒把周恩來、陳伯達修改后的記錄稿交給了中央文革辦公室的王廣宇，讓他騰清后找一個可靠的印刷工人排版、校對，印 15 份后馬上拆板。王廣宇對周恩來修改印象最深的一處是：譚振林氣呼呼跟我說地說：「我不干了，叫你們干吧！」時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會場，這時，周總理拍了桌子厲聲說：「回來！坐下開會。」王力的原稿沒有這句話，是周恩來自己加上去的。記錄稿后面的署名是張春橋，王力，姚文元追記」。當晚，王力給王廣宇開列了一份分送記錄稿的名單，大約十來位有主席、林彪、總理和部分參加了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還有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江青、戚本禹。⁹看過原件的高文謙指出周恩來增加的內容是：在陳毅說總理在延安挨整的后面加上了「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我從來沒有意見。」還特別注明：「陳毅先挑撥康老，后挑撥周。」在陳毅明顯針對林彪并影射毛的話后面加上「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¹⁰

周恩來宣布散會后：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告訴了江青會上的情況。江青說要立即報告毛主席，晚上 10 點左右他們三人一起到毛那里。張春橋說：今天發生一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著把下午發生的情況向毛匯報了一遍。匯報前面情況時，毛光笑，講到陳毅發言時，毛臉色變了，不再笑了。¹¹張春橋還匯報說，周恩來對《紅旗》13 期社論沒有送他審查有意見。毛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并叫張春橋同周恩來談一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¹²

⁸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 年，第 26 版，第 203 頁

⁹ 王廣宇：《我是「二月逆流」會議記錄稿的唯一見證人》，載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 年，第 193 頁。

¹⁰ 《2 月 16 日懷仁堂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 202、210 頁。

¹¹ 《王力反思錄》（下），第 2 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 5 月，第 239 頁。

¹²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第 127 頁。

譚震林覺得在懷仁堂話沒有說完，2月17日，他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罵中央文革，把江青比作武則天。說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過的。許多高級幹部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我們黨被丑化到無以加復了。信中說：「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心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干。總理已被他們整夠噲，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拼下去。」¹³林彪把這封信給毛澤東，并附了一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胡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毛澤東批了「已閱」。¹⁴16日晚上，江青帶王力向林彪匯報懷仁堂會上的情況，林彪只是聽，沒講多少話，談到徐向前，林說：「他不能代表解放軍。」還說：「陳伯達是一個書生。」¹⁵

在大鬧懷仁堂以後，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會議，那天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除了康生以外，文革小組其它人都沒有參加。康生作了詳細記錄。毛在會上大發脾氣。他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干脆請美國、蘇聯一塊兒來吧！」又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周恩來勸毛不要這樣生氣，他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好。緩和了一下空氣。當時決定召開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的「生活會」，還要他們三人「請假檢討」。康生回來後對中央文革的人說：「我跟主席這么多年，從來沒見過他發這么大的脾氣。」¹⁶毛還在會上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

¹³ 中央文面研究室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編》上輯，1967年洲了日。轉弓郵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08頁。

¹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2003年，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474頁。

¹⁵ 《王力反思錄》（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40頁。

¹⁶ 《王力反思錄》（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40～241頁。

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97%是正確的。誰要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¹⁷

2月19日，陳毅得知毛澤東的看法后，深感問題嚴重，便連夜找了周恩來，並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請求見毛當面說清，但毛卻回信說陳毅「歷來犯錯誤」，「改也難」等，暫不見。¹⁸

元老們的抗爭被說成「二月逆流」。毛澤東深知，要反擊，必須穩持林彪。在毛召開會議大發雷霆的前一天晚上，毛突然找葉群到他中南海的住處談話，一開始，毛就怒氣沖沖地說：「葉群，我準備帶你和林彪到南方去。」「陳毅、譚振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解放軍不跟我，我和你們到南方去另外組織一支解放軍，重上井岡山，重新開始。」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著毛主席，永遠忠于毛主席。勸毛保重身體。毛說：「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今后中央常委會議和中央文革碰頭會，由你來參加，回去以后，把會議情況向林彪同志匯報。」¹⁹葉群的地位由此提高了。

毛澤東大發雷霆之后，讓周恩來主持了「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會議從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對「二月逆流」的幾位元老進行批判。在此期間，陳毅是白天作為中國外交部長進行外事活動，晚上挨批判。中央文革的人在會上發言十分激烈。康生說：「毛主席發怒了，是無產階級之怒。這是十一中全會以后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是政變的預演，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江青說這些元老搞的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幾位元老一個個作了檢討。

在內部批判幾位革命元老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等向北京的學生造反派領袖人物譚厚蘭、聶元梓、蒯大富等人透露了高層鬥爭的情況，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因此，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譚震林！」「堅決反擊『二月逆流！』」的大標語。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也以反擊「二月逆流」的名義，加劇了與

¹⁷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06頁？

¹⁸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出版，第98頁。

¹⁹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658～659頁。

保守派的軍人對抗。

通過「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的批判，反對中央文革的老人被整得潰不成軍。原來由周恩來主持的、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毛澤東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江青不買周恩來的賬，周恩來逆來順受，江青權勢增大，在政治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周恩來對江青、張春橋等人說：「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²⁰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過去的中共中央書記書和中央政治局。

和那么多元老鬧翻了，畢竟不是一件好事。毛澤東雖然強硬，但深諳一張一弛之道。1967年4月下旬，為了緩和一下與黨內元老的關係，毛澤東親自出面和他們談話，說，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的意見，是老帥們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板，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我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²¹，「五一節」，周恩來乘毛澤東緩和之機，讓這些元老上天安門亮相。周又怕這些元老又鬧，寫了一封信²²：

陳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位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的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復。你們在人民中，黨內信用將要喪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

為著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為言之不預。

周恩來

1967年5月5日

²⁰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09～213頁；《王力反思錄》（下），第2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5月，第241頁。

²¹ 轉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16頁

²² 這封信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16頁

正如周恩來所警告的，毛澤東並沒有放過「二月逆流」這件事。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判「二月逆流」是一項議程，再一次對他們進行清算。這一點后面再作交代。

二、各地的「二月鎮反」

北京的「二月逆流」是在會議室里對文革勢力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而全國各地的「二月逆流」則是對造反派的血腥鎮壓。所謂「二月鎮反」是從2月開始的，一直持續到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67）117號）后有所抑制，7月20日武漢事變被平息后才完全制止。

部隊支左以後，一些受部隊壓制的群眾組織沖擊軍隊。為了穩定軍隊，1月28日，中央軍委發出「八條命令」：「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八條命令」是各地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依據。關於軍委「八條命令」，本書后面再介紹。2月上旬，毛對如何處理部隊受沖擊的問題作了一個批示，大意是，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沖擊軍隊，但要處置妥當，首先要做說服工作，他們占了一樓，部隊退到二樓；他們占了二樓，部隊退到三樓。如果他們進一步搶占三樓，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的右派骨干。林彪讓他的秘書張云生把這個批示送給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葉劍英立即向軍委擴大會上傳達了毛的批示。葉說，從這個批示看，主席對軍隊的穩定非常重視、非常小心。²³這樣，軍頭們就得到了可以開槍的許可。當時毛心中當是保守派。但是從穩定軍隊這個角度來看，沖擊軍隊的都是右派。

對造反派的鎮壓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反對文革的黨政官僚和保守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實行的，這種類型的「二月鎮反」的思想傾向，是和大鬧懷仁堂的「二月逆流」相通的。第二種情況是在革委會成立前，支左軍隊和一部份造反派鎮壓另一部份造反派。鎮壓的理由是這一部份造反派反對革委會（或革委會籌備小組）。第二種類型的「二

²³ 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86～89頁。

月鎮反」和北京的「二月逆流」沒有共同的思想傾向。青海「二二三」事件屬於第一種情況，貴州的鎮壓屬於第二種情況。從 1967 年 2 月到 5 月，全國規模的鎮反的慘烈程度超過了 50 年代初期的鎮反運動。不過，沒有像 50 年代那樣槍殺 70 多萬人，而是投入監獄。在這幾個月的鎮反中，全國抓了數以百萬計的造反派，有的地方監獄裝不下了，把寺廟改成監獄關人。下面介紹 1967 年 2、3 月間幾個地區鎮壓造反派的情況。

青海「2.23」事件

大饑荒時代，青海大量餓死人，按青海省官方公布的資料計算，非正常死亡人數 10.29 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 5%。²⁴實際上的非正常人數遠超出此數。1961 年春，周恩來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到青海任第二書記兼省長，同時，將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楊植霖調任西北局書記，兼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黨、政日常工作主要是王昭。為了解決大饑荒問題，王昭在青海做了很多好事，但在處理大饑荒問題中傷害了一些人，在以后的四清運動中又過左，傷害了更多的人。王昭傷害的多是一些上層人物，文革前夕，多數已甄別平反，這些人影響著文革初期的輿論，王昭就成了造反派要打倒的對象。文革一開始，羅瑞卿已被打倒了，王昭到青海前是羅瑞卿的副手，這也是造反派要打倒他的原因。

1966 年，《青海日報》發表了題為《大進攻、大反攻、大革命》的社論，轉述了 4 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精神（《青海日報》社長程光遠兼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較早知道毛的講話），號召群眾起來造反。雖然程光遠和社論起草人陳逸因這篇社論一度被打成「陳程反黨集團」，但青海高原上造反的烈火還是燒起來了。保守派的反擊也很激烈。到 8 月底，青海群眾組織分為兩大派：一派是「青海 8.18 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8.18」），堅決打例王昭，王昭也反對 8.18；另一派「紅衛兵總部」「貧下中農紅衛軍」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后三個是保守派。兩派群眾組織發生了一連串的衝突。

²⁴ 楊繼繩：《墓碑》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第 977 頁。

1967年1月13日，在上海「一月風暴」影響下，青海「8.18紅衛兵司令部」等27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接管了《青海日報》。

中共中央發出軍隊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之後，1967年1月23日，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主持召開了省軍區常委會，學習中央決定，下午6時，通過了支持「8.18」的方針，上報了蘭州軍區、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和多數幹部不接受這個決定。軍區常委會後，軍區機關幹部便召集會議，成立了「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派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要求取消支持「8.18」的決定。副司令員趙永夫表示支持。青海省軍區內，趙永夫的支持、追隨者是多數。當晚9時許，他們沖進省軍區機關揪斗劉賢權，扒掉了他的帽徽領章：劉賢權被軟禁，電話切斷，門口放雙崗，警衛、秘書均不能接觸。後來劉賢權被保守派揪到軍區機關批斗、毒打、隔離，家也被抄了。²⁵洗恒漢憶錄說，趙永夫整倒劉賢權「事先事後都未向蘭州軍區請示報告，完全是一種非組織活動，性質非常嚴重」。²⁶洗恒漢當時是蘭州軍區政委，周恩來讓他主持甘肅、青海、寧夏、陝西四省的支左工作。

軟禁中的劉賢權起草了電報：「青海8.18是真正的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捍衛隊是保守組織，界限非常明確，我們堅決支持8.18。」他要求發給中央，機要員卻把電報稿退了回來，答復是：「趙副司令不同意發。」劉賢權的夫人安紹杰把電報稿用紗布纏在腿上，穿上棉褲，請假到了蘭州。蘭州軍區把電報發給了中央軍委，沒有回音。

1月25日，趙永夫邀請青海駐軍各部隊負責人開會，解放軍總後勤部青藏辦事處（即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支持。趙永夫成為青海省實際最高領導人。

此時，中共青海省委內部也意見不一。王昭早於1月中旬離開青海治病，省委第一書記支持楊植霖支持「8.18」打倒王昭。楊植霖幾次召開會議，支持「8.18」奪權。1月29日，青海省委、省人委的權。「8.18」名義上奪了權，其實只是得了幾枚公章，並無任何實際權力。

²⁵ 《劉賢權將軍》，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第331頁。

²⁶ 《洗恒漢憶錄——風雨八十載》，電子版。

他們能控制的，只是《青海日報》社。

《青海日報》為造反派大造輿論，報社成了青海造反派的中心。報社里「8.18」占絕對優勢，編輯部 80% 的人是「8.18」這一派的。趙永夫視《青海日報》為眼中釘。冼恒漢在《風雨八十載》中稱，趙永夫曾多次電報請示蘭州軍區，要用部隊強行接管報社，蘭州軍區態度明確，堅決不同意。

2月3日，以趙永夫為核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西寧地區部隊聯合指揮部」動用青藏公路使用的 250 多臺戰備車輛，進行「支持革命派，鎮壓反革命」的武裝游行。

2月14日，趙永夫等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的名義發布公告稱，《青海日報》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的操縱下，歪曲事實，制造謠言，進行虛假的宣傳報導，欺騙中央，欺騙青海省廣大革命群眾，對青海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決定自即日起，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事管制。按這個公告，軍管小組準備進入報社。報社職工堅決抵制，20 多所學校的紅衛兵涌進報社，「保衛報社」。進入報社參與保衛的造反派超過了兩千人，住在臨時搭建的帳棚里。軍隊要求報社中的「8.18」撤離，「8.18」堅持守不退。西寧市各「8.18」成員組織劃分地段守衛報社。軍隊包圍了報社，通向報社的主要道路和被軍隊封鎖，成百人趟過刺骨的河水，給守報社被圍的人員送飲食和棉衣。

15日，趙永夫支持的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衛隊等連日游行支援對《青海日報》社軍管。

19日，「8.18」等組織游行示威反對軍管《青海日報》途經《青海日報》社時遭對立派阻攔。「8.18」的車輛不慎壓死了捍衛隊成員張桂蘭，矛盾更加激化。當天，趙永夫和張曉川主持會議，擬將「8.18」定為反革命組織。

雙方在《青海日報》社僵持的幾天當中，省軍區向中央軍委發電報，說「8.18」在報社里「大搞打砸搶，對報社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幾個人被活活打死」。說「8.18」「擁有槍支、彈藥」，「呼反革命口號」。據當時林彪的秘書張云生說，青海軍區發來十來份電報，林彪

「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著急。」²⁷

21日，趙永夫再次主持會議，確定23日取締「8.18」，武裝占領《青海日報》社。

23日上午八時，西寧全城戒嚴，街上空無人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司令部發布通令：立即取締反革命組織8.18，如再非法組織活動，一定嚴加懲辦；對該反革命組織中罪大惡極的首要分子，幕后軍師及其死黨，立即逮捕法辦。省軍區調動獨立師、獨立團的部隊，計十三個連，團團圍住《青海日報》社，并截斷了與外界的一切通信聯絡，斷絕了由西寧通向蘭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準一切車輛通行。趙永夫在臨近的賓館指揮。報社地勢較低，架在周圍樓房、高地的機槍居高臨下。針對軍人的行為，8.18廣播站不斷發出抗議的聲音。

11時10分，軍隊槍擊8.18的廣播站，所有喇叭頓時全啞。下午2時，賓館（趙永夫的指揮所）和報社后門橋頭先后發出信號彈，頓時槍聲大作，十幾分鐘，幾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死傷群眾347人，其中亡169人，傷178人。

一位現場目擊者（報社女工作人員）的回憶：

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晚上，在軍區政治部工作的一個熟人悄悄透信給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報社，那里將有重大行動。我立即意識到即將發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1967年2月23日，我剛起床，就有一個同志神色倉皇地來我家告訴我，從北大街通向報社印刷廠（那時報社人都在印刷廠上班）的北門已經實行戒嚴，禁止人車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臉，隨來人一起疾行至北門坡想看個究竟。在離北門坡大約還有50米的地方，就已感覺到氣氛異常。坡上坡下布滿了武裝崗哨，戰士們個個表情嚴肅，嚴密監視著周圍動向。坡下通往報社的馬路已被機槍嚴密封鎖，除非有當時的特別通行證，否則，任何人休想通過。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頭的封鎖線外，擠在人群中踮腳翹首向下遙

²⁷ 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91頁。

望。大約上午 10 點鐘光景，報社方向忽然槍聲大作，它告訴人們鎮壓行動確已開始了。……為了了解確切情況，槍聲一停，我便隨著人流抄小路（小西門的城牆缺口）涌到報社印刷廠附近，這裡正是多日來兩軍對壘的地方。我踮腳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只見一排排尸首倒臥在血泊之中，沾滿血跡和塵埃的衣服、鞋、帽，散各付到處都是，有的掛在樹梢上，有的飛到低矮的屋頂上。可以想見那些手無寸鐵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彈真的向自己射來時，是如何地驚慌失措。我萬沒想到和平時期鬥爭竟會如此殘酷。」²⁸

事件發生後的當天下午二時，總參作戰部打電話問及蘭州軍區青海西寧發生了什么事？為什麼軍隊、地方電話都打不進去？接電話的副政委王文英當時還不太了解情況，經他與趙永夫聯系後，回話說：

「西寧市『8.18』群眾組織發生武裝暴亂，首先開槍打死打傷幹部戰士，軍隊為了自衛，實行了還擊，現已平息暴亂。」晚八時許，有位軍委領導給趙永夫直接打來電話，稱贊「打得好，是一個很漂亮的仗」，「軍委支持你」，並要他「徹底肅清殘餘的反革命」。趙永夫接電話後，對別人說是「林副主席」給他打的電話。²⁹實際上，打電話的是葉劍英。《葉劍英年譜》1967 年 2 月 23 日的條目也證實了葉劍英對趙永夫屠殺的稱贊。

趙永夫為了欺騙視聽，將現場做了一些安排後，搞了個「尸體展覽」，讓群眾參觀，說這是「走資派劉賢權支持的『8.18』犯下的滔天罪行」，還押解著劉賢權、張江霖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尸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干上到處是斑斑血跡，有的尸體還在燃燒，發出熏人的惡臭。被丟棄的帽子、鞋子一大堆。³⁰

「2.23」事件後，省軍區對「8.18」派實行了「大捕、大打、大斗、大抄家」。劉賢權說：「被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達 10157 人，

²⁸ 轉引自余汝信：《「趙永夫事件」淺析——洗恒漢回憶錄補正》。

²⁹ 《洗恒漢回憶錄——風雨八十載》，電子版。

³⁰ 《洗恒漢回憶錄——風雨八十載》，電子版。

其中逮捕 4331 人。採用各種刑法對群眾實行逼、供、信，不僅本人遭到毒打、捆綁、抄家，而且株連到親屬和小孩。同時大搞『請罪』，人人過關，人人寫檢查，有的集體跪倒『請罪』長達四、五小時。繼「2.23」事件后，24 日又鎮壓了民族學院的學生，打死打傷 12 人。」

31

3 月初，解放軍總政治部要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三人到北京參加軍以上幹部會。劉、張是武裝押送來的。趙永夫卻多次在北京這個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他成了「平暴英雄」。可見中央軍委支持趙永夫，偏聽了趙永夫的匯報。

不久，中央文革接待了大量的群眾來信、來訪，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則哭訴孩子去青海串連生死不明。

3 月 11 日，毛澤東、林彪分別批示，要求對青海問題進行調查。

3 月 24 日晚至 25 日凌晨 2 時半，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安徽廳主持處理「2.23 事件」的會議，這是第三次調查。趙永夫、張曉川等當事人、群眾組織代表和北京到青海串連的紅衛兵參加。會上，進一步查清了「2.23」當天的一些細節。證實「8.18」沒有槍枝彈藥。³²最后周恩來宣布了中共中央對青海問題的決定。然后大聲說：「解放軍同志，把他們三個帶走！」解放軍上去揪趙永夫、張曉川、王昭的領章、帽徽，把他們押了下去。王昭在門口哀叫：「我和他們沒有關係！」

3 月 29 日晚九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召集緊急會議，蘭州軍區洗恒漢和康建民參加了會議。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對青海問題的決定》³³這個決定稱：根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3 月 11 日對青海問題進行調查的批示，經向各有關方面進行了反復的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

³¹ 1967 年 4 月 10 日下午劉賢權在青海軍管小組長和機關幹部會議上的發言，引自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第 2 版，首長講話欄。

³²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 462 頁說：「調查完全是先入為主的，基本上只聽 8.18 的控訴，根本不聽趙永夫等人的辯解。」但該書對「2.23」事件的敘述，與本書上述介紹沒有大的差別。

³³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1967 年 3 月 24 日中發（67）110 號。

本清楚：「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后，勾結二零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8.18』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 300 余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8.18』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8.18』群眾，並沒有槍枝。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枝槍。」

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并由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向群眾宣布「8.18」為革命群眾組織。2月23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曉川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干部，一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十年后，葉劍英兩次指示洗恒漢，讓他把趙永夫從監獄里放出來，給予平反。在葉的一再催促下，洗恒漢把葉的指示向當時的青海省軍司令員張江霖和政委宋長庚作了傳達，張江霖和宋良庚認為：「趙永夫的事件是中央決定的，周總理親自宣布處理的。這麼嚴肅的事情，沒有中央的重新決定，就憑葉劍英一句話，我們不敢放人，也無權平反。日后出了問題，空口無憑，我們去找誰負責？」此事不了了之。1976年夏季，葉劍英又親自派遣總政的兩個干部來蘭州，向洗恒漢傳達他的指示，要洗出面把張江霖和宋長庚叫到蘭州談為趙永夫平反的事。洗將張江霖和宋長庚叫到蘭州后，總政的來人當面向他們傳達了葉劍英的指示：盡快把趙永夫從監獄里放出來并給予平反。張江霖堅持沒有中央正式文件，僅憑葉帥個人一句話，我們不好辦。洗提議：總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葉帥報告，最好由中央下達個文件，便于下面執行，也好給群眾解釋。在1977年6月處理甘肅問題時，葉劍英幾次提到洗「不聽」他的「話」，不執行他的「指示」。不但將洗打成「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張江霖也成了「四人幫」在青海的「掛帥人

物]。³⁴趙永夫還是按葉劍英的意願獲釋，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后以正軍職干部離休。

內蒙學生被槍殺³⁵

1967年2月5日中午，數百名內蒙古造反派學生和和工人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軍區大院的南門外靜坐，抗議內蒙古軍區鎮壓造反派，當時周圍還有上千的圍觀者。一個20多歲的學生拿著擴音器帶領大家呼口號：「強烈要求軍區檢查錯誤！」「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軍區辦公大樓前筑起了臨時工事，主樓頂上還架起了機槍，對準門外靜坐的造反派。中午12時15分，一名軍官右手插在褲兜里，從軍區辦公室出來，到大門口朝那個帶頭喊口號的學生喝道：「不許胡喊，這裡是軍區！」學生回答：「就喊！」軍官威脅道：「再喊就斃了你！」學生的回應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那軍官突然從褲兜里抽出手槍，對著這名學生連開兩槍，學生應聲倒地，鮮血從前胸汩汩涌出。3個小時后，那位學生傷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韓桐，內蒙古師範學院外語系四年級學生，是學生造反組織「呼三司」的成員。

開槍殺人者是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

四川鎮反

由于支持保守組織「產業軍」，成都軍區受到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強烈反對。他們到軍區靜坐示威，沖擊軍區。1967年2月17日，葉劍英簽發了中央軍委致「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公開信，嚴厲斥責造反派，警告造反兵團頭頭，如果繼續煽動群眾把矛頭指向軍隊，沖擊軍事機關，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必須由他們負全部責任。成都軍區用飛機在全省範圍內散發80萬份《2.17公開信》。成都市實行全城戒嚴。

一輛輛軍車載滿裝滿槍彈實彈士兵，分別開到一些造反派集中的單位，在保守組織「產業軍」的積極配合下，成都軍區與地方公檢法聯合行動，逮捕了大批「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頭目和積極分子。「成

³⁴ 《洗恒漢回憶錄——風雨八十載》，電子版。

³⁵ 《「文革」中軍隊向學生開的第一槍》，《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

都工人造反兵團」被定性為反動組織，從總部到基層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到了3月中旬，成都地區這個最大工人組織土崩瓦解。「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領導和骨干成員大批被抓，其餘的成員則被要求承認錯誤，檢舉揭發「壞頭頭」，揪出「黑后臺」。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關係密切的造反派，包括許多機關造反派、教師造反派乃至街道居民的造反派，都受到株連。全省取締造反組織1100多個，共抓捕造反派頭頭和骨干分子8萬多人，其中，成都地區抓了33000多人³⁶。成都市的監獄暴滿，不得不把寺廟改成監獄關押人了。³⁷另一個數字是抓了10萬人。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你叫搞『二月逆流』，一抓就十萬人？……你抓錯放了就是了。你說問題得解決嗎？不是都放了嗎？（張國華：還剩500人，都是壞人。）你放了99,500嘛，還不是自己搞錯了，放了就是了。」³⁸

在四川第二大城市重慶，也實行了對造反派的強力鎮壓。據當時公安局「革委會」統計，全市從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軍隊支持的群眾組織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文革』后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公布，在「二月鎮反」期間，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³⁹造反派提供的鎮壓數字比官方提供數字大得多：被鎮壓的「反到底」派的重慶「公安紅一方面軍」在一個文件中稱：「據不完全統計，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762個。」重慶的「二月鎮反」不是保守派鎮壓造反派，而是軍隊和一部分造反派（8.15）鎮壓另一部份造反派（反到底派）。全國各地的「二月鎮反」中，軍隊都是主角。

1967年2月22日，四川萬縣軍分區的高音喇叭隊宣布：造反群

³⁶ 范碩：《三支兩軍的起緣與「七二零」事件的暴發》，《中華兒女》2001年，第2期。轉引自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革命的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59~460頁。

³⁷ 王料力，袁訓會：《認識文革 反思文革（上）——共識網專訪徐友漁》，2012年9月24日。

³⁸ 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68年10月13日

³⁹ 反到底派重慶公安紅一方面軍：《公安反到底》第7期，1968年2月26日，轉引自何蜀：《文革時期重慶群眾組織發展演變概述》。

眾組織「主力軍」是反革命組織，「赤旗」是反革命幫兇，還反復廣播在一些地段實行戒嚴的通告。學生不服，上街游行抗議。接著學生、幹部和市民也加入了游行隊伍。軍人沖進「主力軍」駐地「真元堂」（原來是一座教堂）不由分說地一陣掃射，當場打死 5 人。打死人更激怒了群眾，更多的人要沖進「真元堂」搶屍體。在場軍官下令開槍，又有 18 人被當場打死。加上馬路上誤傷致死 1 人。共 24 人死亡。造反群眾抬著 18 具屍體開展了全城大游行，后稱此事為萬縣「2.22」鎮反事件。接著，軍區又開始大搜捕，幾乎各單位都抓人。幾派頭頭被抓后，押到各單位批斗。⁴⁰

湖北：〈3 月 21 日通告〉

3 月 21 日武漢軍區發表〈通告〉，將武漢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武漢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并勒令解散。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迅速死灰復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各級武裝部支持的、以武裝基干民兵為基本隊伍組成的「紅武兵」。一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組織批判造反派的「壞頭頭」。軍區還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讓一些支持軍區觀點的、和造反派對立的領導幹部，通過「抓辦」行使行政權力并壓制造反派。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在以后的「7.20 事件」后的檢查中，也檢查了 2、3 月間鎮壓造反派的情況。他說：「亂用『八條』來鎮壓革命，為什麼鎮壓呢？因為我已經是個資產級分子，已經蛻化了，已經有很多問題了。李迎希起來，李迎希和造反派結合在一起，有些聯系。……在軍內捉了兩百多。」「把一些當權派塞進來，張旺武、閻鈞、姜一、夏世厚都塞進了『抓辦』。周總理去時說：『抓辦，抓辦里壞得很』。武漢的『抓辦』，人武部領導的『抓辦』，支持保守派，打擊造反派。」「扶植保守勢力，扶植『三字兵』⁴¹，這個大專院校『三字兵』，中等學校的『三字兵』，都是保舊省委。已經幾個月的斗爭了，有的跑出

⁴⁰ 劉國平：〈萬州的「二月鎮反」和「六三事件」〉，《炎黃春秋》2013 年，第 1 期；另據《萬縣志？大事記》記載，此次事件死亡 33 人。

⁴¹ 「三字兵」是武漢保省委的紅衛兵，名稱只有「紅衛兵」三個字，而造反派紅衛兵名稱前有「毛澤東思想」等，所以稱保省委的紅衛兵為「三字兵」。

去了，基本上散了。……我們承認它的組織，把它又恢復了起來。」「發表『321』通告，解散工總，抓了工總負責人。……叫后勤出汽車，先說抓二百，抓三百，結果一夜抓四百七。」⁴²實際上，在「3.21」通告發出的前幾天，即3月16日晚3月17日晨，全市統一行動，逮捕了「工總」領導人朱鴻霞、胡厚民、夏邦銀和各分部頭頭500多人。
43

陳再道說的李迎希是井岡山時期的老革命，1955年授少將軍銜。他雖為少將，卻在1955年至1965年為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還是行政六級，在全軍少見。1967年2月后陳再道停止了他的工作。1967年7月下旬，我和幾位清華南下串聯的同學到他家（茶港軍區高干別墅區的一幢小樓里）訪問過兩次。他是一位清癯的老人，他向我們介紹了武漢軍區高級干部的腐化情況，他談到軍區一位干部貼了題為〈茶港臭氣熏天〉的大字報，揭露軍區高層的腐敗。李將軍還向我們介紹了井岡山時期殺「改組派」的情形。他對軍隊軍銜制度不滿，說：「什麼少將，中將，死了都成豆腐醬！」

福州鎮反

2月11日，福州20萬軍民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一次新反撲誓師大會」。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在大會上批評了造反派沖擊軍區的行為，說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3月9日，在萬人大會上公開逮捕了造反組織「紅九二」總部負責人王金泉、福建省教工赤衛隊負責人蔡肇基、吳丘陵等人，並宣讀福建省軍管會通告，勒令解散一些造反派群眾組織。3月22日，又召開大會搜捕了多人。據福建省軍管會統計，全省各地軍隊、人武部和軍管部門出面搜捕和拘留二千多人，取締和解散了80多個群眾組織，逮捕了軍內、軍區機關違反「八條命令」8人，拘留65人。⁴⁴

⁴² 《陳再道的口頭檢查》，1967年12月1日。

⁴³ 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電學院文革親歷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第153頁。

⁴⁴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革命的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60頁。

貴州鎮反

1967年2、3月間，貴州全省有52萬群眾的218個革命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有2千多人被關進監獄。這就是貴州的「二月鎮反」⁴⁵。貴州的鎮反是借中央文革的手進行的，而且是在革委會成立之後。沒有被吸收進入革委會分享權力的造反組織（激進的造反組織由于阻礙「大聯合」和「三結合」，因而被排除），或進入革委又被排斥的造反組織，起來反對革委會這個「紅色政權」，因而受到鎮壓。這種情況在1968年在各省發生的更多。

湖南鎮反

在湖南被鎮壓的是以「工聯」與「湘江風雷」組織為主的造反派，其成員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廠的產業工人為多，人多勢眾。這次鎮壓是湖南省軍區借陳伯達之手實施的。1967年2月初，湖南省軍區向全軍文革小組寫了報告，說長沙有個「湘江風雷」的群眾組織，搞打、砸、搶，火燒樓房、破壞公共財物，擾亂社會治安，是一個暴行累累的保守組織。省軍區將「湘江風雷」這個造反組織說成是保守組織，正全中央文革的胃口。全軍文革小組則將這份報告又報到中央文革，文革辦事組則將這個內容編進了他們每天都要編的〈要事匯報〉中。2月4日，陳伯達就是在這份〈要事匯報〉上，做了批示：責成湖南軍區把「湘江風雷」頭頭抓起來，并把「湘江風雷」定為反動組織。

46

「湘江風雷」本來是一造反組織，是反省軍區的。省軍區得到陳伯達「2.4」批示後，立即取締了「湘江風雷」，大小頭目大約幾萬人被關、抓。保守派帶路，軍人荷槍實彈，監獄、看守所容納不下，省軍區禮堂用來關人。有人統計，這次二月鎮壓中全省被抓的人超過10萬。

但事隔半年，武漢「7.20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中，推翻了「2.4」批示，

⁴⁵ 鄧振新：《貴州風雲》，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145頁。

⁴⁶ 王廣宇：《我所知道的陳伯達》，載《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第354頁。

為「湘江風雷」平了反，全部釋放了所有因「湘江風雷」案而被捕的人員，並宣布「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

河南取締「二七公社」

河南文革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總」，一派叫「十大總部」。「河造總」和「十大總部」連手、共同對抗「二七公社」。1967年3月初，河南省軍區發布「聲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組織」，抓了幾千人。駐河南開封的第一軍也向示威群眾開槍。3月8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幹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鄭大聯委（持二七公社觀點）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代罪惡，48小時內寫出象樣的檢查。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告全省人民書〉。一批學生被斗，讓他們低頭、彎腰、翻戴帽，40多名鄭大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3月9日，鄭大聯委頭頭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開封師院「8.24」的陳紅兵、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申茂功相繼被捕。

1967年2、3月，很多地力都發生過鎮壓甚至屠殺造反派的事件。

為了鎮壓造反派，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下令將坦克開進城。許世友對軍內造反派更是強硬，他說：「沒有叫你搞『四大』，你偏要搞『四大』，把你抓起來，那有什麼可說的？」南京軍區機關和駐三省一市的所有部隊有22人被捕、8人被開除，475人看成管或隔離反省，南京市有十個造反群眾組織被取締，330多名造反派領袖被關押。⁴⁷吉林駐軍用飛機撒傳單批判造反組織「長春公社」，強迫「長春公社」成員打著白旗「請罪」。駐軍還實行「三個徹底」：即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改組，迫使「地院兵團」、「工人造大」、「光機八一五」瓦解。廣州軍區在廣州市逮捕了群眾組織領袖450人，廣州以外地區逮捕了群眾組織領袖328人。在廣州商品出口交易會前的3月22日至28日，一周內逮捕群眾組織領袖508人。⁴⁸

⁴⁷ 李文卿：《近看成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第29～30頁，轉引自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456頁。

⁴⁸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革命的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被關在監獄里造反派，低聲吟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期待北京解救他們于水火之中。

三、對「二月逆流」的反擊

對各地軍政官僚鎮壓造反派，中央文革和造反派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北京的造反派召開「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師大會」，「打倒譚震林」巨幅標語貼滿了北京街頭。

3月11日，以首都紅代會及農林口⁴⁹機關造反派為主體的近百個群眾組織，聯合成立「首都徹底擊潰譚振林自上而下資本主義復辟聯絡站」。下午，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等32個單位齊集農業部前召開「揪譚」誓師大會。

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萬人示威游行，反擊「二月逆流」。游行隊伍高呼口號：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打倒譚震林！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聶榮臻！

3月16日，178個單位13000人在北京農業大學召開聲討譚振林大會。3月19日，農口革命造反組織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判譚震林大人。

造反派的領袖們紛紛發出反對鎮壓造反派的呼聲，如蒯大富發表〈迎接八個回合〉的文章，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存在著一股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這是自文革開展以來兩條路線的第八次交鋒。

面對保守派對文革的挑戰，面對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強烈反應，毛澤東舉起了他的左手，向保守派施加壓力，支持造反派。

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中發〔67〕117號）。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隊提意見，或對本地區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

第458頁。

⁴⁹ 國務院「農林口」、「工交口」、「財貿口」等，由不同的副總理分管，「農林口」包括農業部、林業部等部門及有關院校，由譚振林分管。

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文件強調「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文件要求軍隊「堅決地、正確地支持革命群眾組織，各左派革命群眾組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支持一方，打擊另一方」。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中加了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沖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請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一事看得太嚴重了。」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指出，現在有一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將的某些缺點錯誤不放，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經垮臺的保守派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一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

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強調「不準隨便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對過去沖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既不追究」等。人們普遍認為，軍委「十條命令」是對軍委「八條命令」的糾偏。

這一系列信號，鼓舞著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他們熱切地交換各種信息，轉抄和翻印北京動態，舉行大大小小的集會游行，到處刷出大標語，「徹底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各地提出打倒當地「譚振林」口號，武漢提出「打倒武老譚！」，成都提出了「揪出四川的譚氏人物！」，被搞垮的造反組織紛紛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在成都，冷清多時的市中區又熱鬧起來了，常常可以見到人們在自發地辯論，有的直到深夜還不肯散去。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眾在人數上和氣勢上都明顯地處于上風。⁵⁰

在反擊「二月逆流」之後，中央對處理各地的問題的基調是支持造反派，壓制保守派，促成以造反派為主體的「大聯合」。例如，5月7日，中央發布了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十條決定就明顯地體現了這個精神。這個決定明確指出，「產業軍」是保守組織，成都軍區在前階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區最大的走資派。這個決定還對成都軍區加以改組，由張國華出任成的都軍

⁵⁰ 胡平：《成都地區文革親歷記》。

區政委，梁興初擔任軍區司令。

在 1966 年底，毛澤東估計 1967 年底以前可以結束文革。1967 年 1 月開始奪權以後，毛澤東說過「今年 2、3、4 月看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更長一點時間」。⁵¹1967 年 3 月 7 日，毛澤東批轉了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的經驗，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社論，要求師生回到學校「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中央還下文件，要求在外地串連的學生一律在 3 月 20 日前返回本校。毛澤東還派解放軍對大中小學生分期分批實行軍訓。中央還要求各地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實行按單位、按部門大聯合。這些，說明文革開始進入收攏階段。

然而，1967 的「二月逆流」和反擊「二月逆流」這一重大反復，使文革形勢發生了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變化。

反擊「二月逆流」鬥爭的興起以後，出現了新的一波造反高潮。「復課鬧革命」無法實行，解散跨班級、跨單位的群眾組織的要求也不能實現。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中重新崛起了造反派，組織規模急劇擴張，其橫向寬度甚至比先前更大。在 1967 年初，「川大 8.26」和「紅衛兵四川部隊」只是大學生組織。其它單位造反派組織有的在觀點上傾向「川大 8.26」，有的傾向「紅衛兵四川部隊」（簡稱「紅成」），在組織上還是獨立的。反擊「二月逆流」以後，許多組織直接打出「8.26」某某分團或「紅成」某某支隊的旗號，一些外地外縣的造反派也從組織上拼入了「8.26」或「紅成」。這一來，「8.26」或「紅成」不僅成了跨行業的行業，而且還成為跨地區的全省性組織。與此同時，串連活動也再度興起。造反派的學生們下廠下鄉，趕赴郊區外縣，幫助扶植和恢復那里的造反組織，發展壯大自己這一派的力量。⁵²經歷了「二月逆流」這一反復之後，運動非但沒有收攏，反而更加寬展、更加深入了。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關於在各地實行以造反派為主體的大聯

⁵¹ 引自周恩來 1967 年 4 月 18~19 日在廣東群眾組織代表和駐軍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⁵² 胡平：〈成都地區文革經歷記〉。

合，進而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的指導思想，遇到了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隊的強力抵制，造反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和重組。保守派組織和造反派組織之間的鬥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的鬥爭，曠日持久，日趨激烈，毛澤東的「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的期待成了泡影。

第十三章
文革中的軍隊和
「三支兩軍」



文革中的軍隊

毛澤東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要一段時間裏「天下大亂」，要把幹部都「燒一下」，這樣，社會就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然而，社會生產是一天也不能停的，必要的公共服務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社會秩序是不能長期混亂的，靠什麼維持局面呢？靠軍隊。在「天下大亂」以後，軍隊是唯一的有組織的強大力量。當時，這支力量可以壓倒一切。更重要的是，軍隊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是毛信得過的。

在民主國家，軍隊是國防軍，不為某一黨派所用，在政治鬥爭中保持中立。中國的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中國共產黨用來奪取政權，保衛政權的工具。所以，每逢政壇上出現的權力鬥爭，軍隊必首當其衝。由於軍隊是權力鬥爭中最為敏感的部份，所以，在軍隊高層集中了權力鬥爭的一切黑暗：陰謀、虛偽、欺詐、殘酷。軍隊以「三支兩軍」的方式加入地方文革、領導地方文革，使地方文革更具有複雜性。「三支兩軍」，使軍隊進入了社會，促使地方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實現「聯合」，進而建立軍人、幹部、群眾「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軍隊介入文革也給毛澤東帶來了無窮的後患，毛林衝突由軍隊介入文革而來。毛、林衝突，無論是對文革還是毛自己都是最為沉重的打擊。

為了理解軍隊「三支兩軍」中的作為，有必要介紹一下軍隊自身的情況。

一、八屆八中全會後的軍隊領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在新的政權裏，如何制衡恃功自傲的軍人勢力是一大難題。1954年高崗事件¹給這個難題以解

¹ 高崗，中共陝北根據地創造人之一，1949年後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1952年11月，高崗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畫委員會主席。1953年1月，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對饒漱石說：「現在黨內，劉少奇有個圈，周恩來有個攤攤，咱們要搞個根據地大圈圈。」還說：「我們黨實際上有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根據地黨，也就是軍隊的黨，另一個是白區的黨；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槍桿子的黨，那裏有什麼白區的黨。」當時，毛對劉少奇也不滿意，曾向高崗透露對劉少奇不滿意的話。高崗在高層散佈這些話。高崗的言行被認為是分裂黨，1955年被定性為「高饒反黨集團」，後高崗自殺身亡。

決的機會。高崗曾有「白區黨，根據地黨」的說法，認為「白區黨」壓制了「根據地黨」，即劉少奇山頭壓制了軍隊。高崗失敗，這種說法被批判，鞏固了以劉少奇為主的非軍人在權力機構中的地位。將領們對劉少奇的不滿情緒壓抑下來，成為文革中推倒劉少奇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 1959 年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力。總參謀長黃克誠也被打入「彭、黃、張、周」²反黨集團，被撤職。這個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 1959 年 8 月 17 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林彪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任第二副主席，聶榮臻任第三副主席。

1959 年 9 月 26 日，中央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決定對軍委進行改組，成立新軍委，毛澤東仍為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副主席，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常委是：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葉劍英、羅瑞卿、譚政。羅瑞卿為秘書長，副秘書長為蘇振華、蕭向榮，很快又增補蕭華為副秘書長。10 月 10 日，決定在軍委常委下設一個辦公會議，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組成，以處理軍委的日常事務工作。

林彪提出羅瑞卿當總參謀長，他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託羅瑞卿、蕭華他們。」以後，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是羅瑞卿具體負責。³當然，林彪對軍隊的工作不是什麼都不管，他管得最多的事就是「突出政治」。1960 年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了「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四個第一是：在武器和人的關係上，人的因素第一；在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係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係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關係上，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風」是指三句話、八個字。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

² 指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

³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 2 月，第 3 版，第 540 頁。

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大力宣揚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林彪這些作法十分讚賞，大力支持。提出「全國學習解放軍」的號，並在全國掀起了學習解放軍的高潮。

文革前的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不是軍委成員。但由於歷史原因，周恩來對軍隊的影響力、控制力很大。鄧小平在軍隊裏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劉少奇、陳雲對軍隊的影響力遠不及周、鄧。

文革前的軍委領導班子是在 1959 年反彭德懷的鬥爭中上臺的。1965 年底，打倒羅瑞卿的上海會議以後，葉劍英就取代了羅瑞卿主持日常工作。1965 年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撤銷彭、陸、羅、楊的職務的同時，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1966 年 8 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增補為政治局委員，軍隊的政治地位更加鞏固，這是因為毛澤東在文革中需要軍隊支援。在十大元帥中，葉劍英排名最後，文革始後，葉劍英的地位上升，超過了林彪以外的其他元帥。

二、「山頭」林立 嚴重腐敗

中共黨內長期存在著「山頭」，這是「打天下」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為中國共產黨「打天下」作出貢獻的，有馳騁南北的軍隊；有革命根據地，即通過軍事割據建立的「國中之國」；有潛伏在「白區」的地下工作者。各根據地之間關山阻隔，各支軍隊都有不相同的歷史淵源，「白區」工作自成體系。從大的方面講，根據地和軍隊是一塊，「白區」黨組織是一塊。從小的方面講，一塊根據地就是一個「山頭」，一支部隊就是一個「山頭」。一個大「山頭」下又有許多的小「山頭」，軍隊中有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中又有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由於毛澤東強悍的性格、超人的智慧和權謀，也由於他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中的卓越貢獻，各個「山頭」都對他臣服，他也具有駕馭和平衡各個「山頭」的權威和手腕，他成了各個「山頭」的共主。對待這些「山頭」，毛澤東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逐步消滅

「山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軍政的權力佈局和人事安排上，毛澤東還是採取這個方針。在建國以後的黨內鬥爭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山頭」問題的影響。在文革複雜的鬥爭中，「山頭」也起作用。

毛澤東開始搞軍隊時，在井岡山和朱德建立的部隊是紅四軍，以後擴大結合了彭德懷的部隊，組建了紅一方面軍，也就是中央紅軍。林彪的紅一軍團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是紅一方面軍的主力。紅一方面軍和毛澤東一起長征到陝北，與毛澤東關係很密切。但最密切的還是其中的林彪為首的紅一軍團。紅一軍團與毛的歷史淵源最深，是嫡系中的嫡系。在戰爭年代，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一直配合得很好，有時是互相指揮，但兩支軍隊也有矛盾。

建國後，毛澤東掌管軍權是靠紅一方面軍的人，首先用的是彭德懷紅三軍團，即「紅一三」（紅一方面軍紅三軍團）的人。打倒彭德懷以後，才開始用「紅雙一」（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把軍隊指揮權部交給「紅雙一」，毛澤東既放心也不放心。說放心，因為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和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支持他；說不放心，林彪也是一代梟雄，完全依靠他一個人，也有危險性。葉劍英雖然是元帥，但一直從事參謀工作，沒有帶過大的隊伍，沒有自己的「山頭」。沒有「山頭」的葉劍英在文革中地位上升，也許是毛應對這個危險的一著棋。

軍隊的生命力在於戰爭，和平是對軍隊最強的腐蝕劑。自從朝鮮戰爭以後，軍隊很少打仗。和平年代軍事官僚的腐敗程度比行政官僚更嚴重、更大膽、更野蠻。

1967 年「720」事件後，陳再道在他的檢查中是檢討他自己的，實際上也是軍隊的狀況，他說：「一天就是看到那裏房子好，走到那裏看到設備好，回來就搞設備。汽車、釣魚、獵槍、表、沙發、生活方式極端腐化，至於說勞動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進城以後，總是學資產階級的東西，看到那裏有地毯，自己搞個地毯，買沙發、買餐具，燉甚麼果子醬、麵包。都是學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蝕，生活糜爛，流氓作風，看見女同志，護士，就是流氓習氣，動

手動腳，生活糜爛，亂搞女人。」⁴陳再道說的在高級將領中不是個別現象。有的將領玩過的女人可以編一個連，因而被稱為「連長」。軍事將領沉于酒色可以消磨他們的政治野心，皇權專制時的最高統治者對此常常放縱。同時，軍隊是自成體系的封閉系統，封閉系統內部的腐敗對地方影響不大，所以，只要軍隊聽他的話，毛對軍隊裏的嚴重腐敗基本是容忍的。

然而，軍事官僚們的嚴重腐敗，畢竟是人們所詬病的，也與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指導思想相悖。所以，「5.16」通知中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裏把「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劃進了文革鬥爭物件之內。但是，毛澤東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鼓動學生「炮打司令部」、「反對資反路線」，另一方面又防止「反軍亂軍，毀我長城」。明明是「5.16通知」裏提出要打倒軍隊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但關鋒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時，又將此作為罪狀，把關鋒打倒。毛在軍隊內部的文革上，是反反覆覆，出爾反爾的。這反映了他的兩難選擇：既要在軍隊裏「反修防修」，又要保持軍隊的穩定。軍隊真的亂了，文革也就沒有支撐力了。

三、軍隊裏的造反和鎮壓

毛澤東既想利用軍隊支持文革，又想保持軍隊穩定。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態度是：一是希望軍隊穩定，不要像地方搞得那麼亂；二是希望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⁵這兩點是一致的，一旦軍隊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就很難保持自己的穩定。

在劉小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文革初期，按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規定，軍事院校、軍事科研單位、和軍隊文藝團體，這些非戰鬥部門是文化革命的重點部門。按照中央的部署，總政讓各單位「摸底排隊」，把「革命物件」找出來，整理了材料。⁶一些批評軍隊領導的人受到打

⁴ 陳再道檢查。1967年12月1日。

⁵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615頁。

⁶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57頁。

擊，被扣上種種政治「帽子」，顯然，這是這是利用劉少奇抓右派的指導思想進行的。劉、鄧垮臺以後，這些被整的人就造反，要求開展「四大」，要求銷毀「黑材料」。

1966年5月間葉劍英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林彪提出的軍隊文化大革命的總方針：軍隊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既要搞好革命，有要保持戰鬥力，加強戰備，對地方文革採取不介入的方針。葉劍英、聶榮臻都反對在軍隊內搞「四大」。在一次軍委常委會上，葉劍英說：「現在有人組織什麼造反突擊隊，並公開說『主席表揚了聶元梓，軍隊為什麼不可以出聶元梓？』這種想法要不得呀！」聶榮臻插話說：「軍隊幹部不許造反，什麼人要造反，我們同他涇渭分明。」⁷

1966年3月25日，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關於執行中央「5.16通知」的通知》，明確指出軍隊的運動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

1966年6月14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規定師以下戰鬥部隊著重進行正面教育，軍隊一律不准上街遊行，一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軍隊文革只在軍內宣傳，文化部門有限度地開展。

1966年6月21日，中央軍委發出「六條指示」，要求對軍事院校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決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

1966年8月下旬，中央軍委常委會議繼續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軍隊文革一認定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

1966年9月3日，中央軍委以總政治部的名義下發「不准軍隊院校學生來京串連的三條指示」，即軍人不准組織「紅衛兵」，不准地方到軍隊串連，不准軍人到地方串連。

這些，都反映了軍方領導人的意志，也反映了毛澤東穩定軍隊的願望。從根本上說，它和「5.16」的精神相悖，和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意志相悖。更重要的是，軍隊領導人以軍隊特殊為名，對軍事院校裏批評領導的學生實行殘酷鎮壓。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軍隊中受

⁷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53頁。

打擊的人要求翻身，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軍內造反提供了理由。

《紅旗》第 13 期社論發表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不得不緊跟。1966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發（66）515 號，簡稱：「緊急指示」）。這個檔指出：「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的領導過分強調了軍隊院校的特殊性，至今還有壓制民主的現象，不許班、系、校串連，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動學生鬥學生，打擊左派，嚴重違反了十六條。因此，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應當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緊急指示」是如何出臺的，有不同的說法，邱會作認為：這是劉志堅、楊曼村、謝鏜忠等全軍文革的人搞的，幾位元帥沒有擋住。⁸王力回憶說：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當時是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和另一位姓屠的高幹子女到林彪家裏反映軍事院校鎮壓群眾的情況，因此，林彪決定發一個緊急指示，說軍隊院校要按地方院校的搞法。這個檔是林彪聽取情況後口授的。⁹

「緊急指示」一下達，軍隊院校學生的造反潮流如決堤之水，大批穿軍裝的學生湧入北京，矛頭指向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領導機關。這樣，原來堅持軍隊不搞四大、壓制和打擊造反派的軍隊幹部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100 多所軍事院校的班子全癱瘓了。毛澤東高興地說：「軍隊院校咄咄（111 所院校），的確有妖。」¹⁰不過，「緊急指示」還規定，軍隊和軍事院校不參與、不加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但地方的造反派組織還不斷衝擊軍隊領導機關。他們為什麼要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軍隊安中央規定代為保

⁸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455 頁

⁹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第二版，第 41 頁；餘汝信：《1966 年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由來》中認為，是林豆豆拿著錢信莎的東西向林彪反映，與陶斯亮沒有關係。

¹⁰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458 頁。本書作者當年在清華聽江青也講過這句話？

管省委重要檔案材料，而造反派懷疑其中有省委整群眾的「黑材料」；二是軍方有些單位提供秘密住所為群眾要揪鬥的「走資派」避難。

為了使中央軍事領導機關能正為工作，經林彪同意，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10萬人大會，動員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生同校參加文革。陳毅在講話中警告造反派，「搞路線鬥爭可能立大功，也可能犯大錯誤」，「有人說，噢！你陳老總今天在體育場又是潑冷水了！潑冷水不好，但是頭腦太熱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處的」，「你們有問題，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過限度，不能採取直接行動，不能衝破大門，不能占大樓，砸窗戶，剪電話線。這樣搞不好。」葉劍英講話說，批判資反路線的「二醫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過分了，搞過了頭就錯了。」「我們是閉一個眼睛，睜一個眼睛的。閉一個眼睛，儘量地放；但是，我們還是睜一個眼睛的，這雙眼睛是雪亮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只占三分之一、二、三，以前有人鎮壓學生運動是不對的，挑動群眾鬥群眾是錯誤。但是，現在轉過來不許人家改正錯誤也是不對的。」，「我希望同志們不要被敵人利用，」「獸醫大學紅反色造反團有個戰士叫李繼才，遞了一個條子給蕭華同志，問我們：今天這個大會經過林副主席批准了沒有？他懷疑這個大會是偷著開的，同志們信不信？（回答：不相信）讓我代表軍委和總政全體同志除李繼才以外的全體同志表示感謝。」……他說他是獸醫紅色造反團的戰士，他不是戰士！（眾：把他揪出來！）李繼才你聽到了嗎？」造反派對二位元帥的批評不滿，會場局部出現騷動，蕭華和劉志堅立即宣佈散會，並護送老師們離開會場。11月29日，總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次軍隊院校來京人員大會，陳毅和葉劍英再次批評了造反的軍校學生。回擊了上次大會後造反派對兩位元帥的批評。¹¹

為了回應兩位元帥批評造反派的兩次會議，中央文革準備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召開同樣規模的會，以地方學生造反派為主，點名讓陳毅、葉劍英等幾位元帥和軍隊領導人參加。打算對他們展開鬥爭。由於陳毅、葉劍英等不出席，會議取消了。學生在體育館白等了一天，

¹¹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622~624頁。

挨餓了一天，火冒三尺，事後，打倒陳毅、葉劍英的大字報就多了。1966年12月31日，中央文革在京西賓館召開了一次兩千人的會議，指名要葉劍英作檢討¹²，劉志堅主持會議。葉的檢討還沒有念完，就遭到學生的圍攻。會議結束後，有關情況反映到林彪那裏，林彪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毛說他事前不知道這個會議，說：「這件事一定要追查。」中央文革把責任推給了劉志堅。1967年1月4日，劉志堅被江青點名，撤銷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職務，不久，被隔離審查、關押。¹³劉志堅被打倒後，林彪在一次會上宣佈，徐向前任全軍文革組長，江青為顧問，空軍政委余立金和海軍副政委王宏坤等任副組長。

為什麼讓徐向前當全軍文革組長？邱會作說，江青為了抓軍隊，突然向林彪提出徐向前元帥的使用問題。按當時的規矩，徐向前有兩個歷史包袱：一是他是四方面軍的，和張國燾關係密切，二是1936年率紅軍西征，2萬多人全軍覆沒，徐單身回延安。其實，西征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責任還是中共中央，責任不在張國燾，更不在徐向前。但徐向前是張國燾那個「山頭」的。四方面軍的一號人物張國燾走了，二號人物陳昌浩被毛澤東長期放逐蘇聯，回來後又壓著不用，毛就把徐作為四方面軍的代表人物，給了一個元帥，算是承認四方面軍這個「山頭」，但不讓徐管軍隊，讓他管民兵，他索性說身體不好，在家賦閒。1966年11月初，有關軍隊文革問題，江青連續幾次找林彪。最後一次江青直截了當地說：「要搞軍隊文化革命非有元帥升帳不可。我提議徐帥任總政治部主任兼全軍文革組長。」林彪看到江青的態度很堅決，江青走後，立即向毛主席報告：「在當前情況下，徐帥任全軍文革組長是可以的。軍委的日常工作仍由葉劍英同志

¹² 根據毛澤東「檢討一下，了此一案」的指示，葉劍英不得不在全軍院校代表和駐京軍隊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為兩次十萬人大會上的講話作出公開檢討。

¹³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625～627頁。據餘汝信提供的資料：全軍文革小組院校組瞭解到大會要點名批判的有陳毅、葉劍英、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當晚，周恩來、康生、江青、蕭華、楊成武等再次接見大會籌備處全體人員，對他們召開大會竭力勸阻，並力求將其注意力引向全軍文革小組和劉志堅，以保護陳毅、葉劍英。

負責。」毛同意林的意見。¹⁴

江青任全軍文革小組顧問，實現了她介入軍隊的願望。徐上任的第一次會議上，他提出軍隊文革的三條方針：第一，不要怕亂；第二，要徹底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三，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這三條完全符合當時毛澤東的想法，當然也符合江青的想法。他除了講這三條之外，還號召向地方造反派學習。他說：「現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革命！」他批評蕭華怕群眾，是膽小鬼。徐的講話使到場的高級將領很不滿意，陳毅調侃地說：「徐帥今天說不要怕群眾的話，我們是理解的。過去你也同我們一樣害一樣的病吧？現在你的病好了。」聶榮臻說：「我確實有病，但我決不怕死！」¹⁵

為了搞好軍隊文革，全軍文革小組主張調幾個造反派來軍隊領導機關搞好文化大革命。各路造反派來京後，徐講話表示支持。據邱會作說，這樣一來，「全軍院校，從亂到垮了，省軍區以上的機關除總參機關外全都亂了」。¹⁶一些高級將領被揪鬥，邱會作差一點被整死。

1967年1月上旬，經請示毛澤東同意，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開了軍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開了三個月。林彪委托葉劍英主持會議。會議的目的的一方面是想把軍隊領導幹部接到北京保護起來，避免當地的群眾揪鬥，二是研究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來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對群眾揪鬥領導幹部極為不滿。南京軍區的八位領導被揪鬥、被罰跪。司令員許世友為此經常喝酒，還跑到了大別山，並警告說，誰要揪他，他就開槍。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說：首都三司跑到福州來胡鬧，弄得戰備工作無法進行，如果再這樣搞，我就上山打遊擊了。¹⁷

在這個軍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制訂了17個檔：〈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1967年2月14日下發）、〈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1967年1月28日下發）、〈中央軍委關於軍

¹⁴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95～497頁。

¹⁵ 同上，第496頁

¹⁶ 同上，第495～497頁

¹⁷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647頁。

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2月11日下發)、〈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2月23日下發)、〈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決定〉(3月19日下發)。……顯然，這些檔都是毛澤東提出或同意的，軍委擴大會只不過是討論一下。

葉劍英說，這次會議是把領導幹部叫到北京避一避造反派的鋒芒，是一種保護，是林彪交代這麼做的。葉劍英讓與會者探望被造反派打傷後被營救出來的邱會作，激起了大家的憤怒。有些人當場圍住葉劍英，讓他向毛主席反映：中央文革有什麼特權這麼整老幹部？！

俗話說：「可憐的人常有可恨之處」。邱會作差一點被造反派整死，值得同情。但群眾整他也是原因的。文革一開始，邱會作將總後政委李聚奎、副部長湯平、副政委李躍等作為重點批鬥對象，到1966年底，就批鬥軍以上的幹部22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矛頭就指向了邱會作。¹⁸1967年1月12日，總後政治部一些群眾貼出了《靈魂何其醜也》等一些大字報，揭露邱會作的生活作風問題。批判邱的會上，一位被邱會作從陸軍總醫院弄到他家當保姆的護士泣不成聲地控訴邱會作如何把她當泄欲工具的惡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邱會作的秘書呂玉潤揭發邱要搞秋後算賬，說「反我的將來一個也不能要」，「文革完了要抓10萬個右派」等等，又把反邱怒火引向高潮。1月12日在批鬥邱會作時就實施了武鬥，1月23日、24日，總後又連續召開大會批鬥邱會作，對他進行了各種刑罰。會後，二醫大的學生又把他關了起來。他妻子胡敏求葉群，林彪和陳伯達兩人聯名寫了條子，二醫大才把邱放了出來。¹⁹

¹⁸ 張金昌：《往事回敘》，北京時代文化發展公司，2012年，第63~64頁；為什麼要整李聚奎等人？《邱會作回憶錄》第524頁解釋說：「1966年9月6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講賀龍問題時，順便點了李聚奎、饒正錫是彭黃漏網分子。」

¹⁹ 唐光學回憶錄：《青春似火，夕陽更紅》，自印本。2012年，第172~175頁；張金昌：《往事回敘》，自印本，2012年，第64頁；2016年1月13日，邱會作兒子邱路光給本書作者說：「造反派開了個會認為已經沒有退路，不打倒邱，運動後期自己就是反革命，現在只有拿生活問題把邱搞臭。他們找到這個保姆，把她關起來，威脅她，並教她怎麼編瞎話，讓她在大會上發言（她發言了），控訴邱會作調戲她。沒出一個月，林彪、毛主席中央又保了邱，周總理出來講話。這個保姆又說是被迫的，自己汗箆了邱部長。」

1967年3月底回總後重新主持工作，他提出抓「三個一小撮」，對整過他的人施行加倍報復。他對總後專案人員提出「三狼」的方針：「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滅他，這是專案工作必須站穩立場」。「應當狠鬥（堅決地打擊他的反革命態度）、狠審（可以連續多少天進行審訊）、狠專（敵人拒不交代就審他）。」「專案人員心裏要狠，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呀！手軟就是右傾機會主義。」²⁰原總後軍械部副部長梁冰，因反對邱會作，給他施加了23種刑罰，身體致殘，親友中12人被株連，其中四人死亡。²¹邱會作在總後機關炮製出大大小小的集團假案29個，如李（聚奎）饒（正錫）盧（南樵）反黨集團35人；叛國外逃特務集團295人；「1.12武鬥邱會作事件」181人；梁（冰）桑（仲林）反黨集團43人等等，共有七、八百人。為了搞專案，邱會作私設監獄七處，動用300名戰士看管。在邱命作「三狼」方針下，總後整死、逼死143人。在總後「一人反邱，全家遭殃」，邱會作讓專案組上報「黑家屬名單」，並指示把這些家屬管好，看好，從他們身上打開缺口。在總後系統，被邱會作「重點審查」的幹部、群眾3200多人，被株連的家屬親友數以萬計。邱會作成為九大政治局委員以後，將總後系統中曾經反對的人進行組織處理：1005名幹部送到工廠、養馬場、農場、倉庫長期關押、勞動和降級使用；3302名幹部流放到寧夏賀蘭山總後「五七」勞動學校勞動；4738名幹部作了復員處理；147名幹部調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²²

「軍委八條」是為了解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造成的混亂，對造反派的行為作了一些限制。關於「軍委八條」的產生過程，吳法憲和邱會作都根據親身經歷寫了回憶。

²⁰ 唐光學回憶錄：《青春似火，夕陽更紅》，自印本。2012年，第208～209頁；《邱會作回憶錄》第519頁對此回答說：「鄧小平這些人為了政治需要，是需要謠言的。他們一方面整肅反對他們的『三種人』，同時又撈起反對我們的『三種人』作為工具來打擊我們。」邱會作認為張金昌等人是『三種人』。什麼是「三種人」？見本書第二十九章。

²¹ 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535頁。

²² 唐光學回憶錄：《青春似火，夕陽更紅》，自印本。2012年，第225、235、247頁；邱會作回憶錄中否定他整了這麼多人，他說：「三個造反組織合起來有千餘人，……對他們的處理，受到紀律處分的，包括處理錯了的是不多的。後來，公審時起訴書造了無數的謠。」《邱會作回憶錄》（下冊），第519頁。

1967年1月下旬，由於軍隊領導機關受到衝擊，一些軍隊領導人被揪鬥，林彪緊急約見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和楊成武。林彪說：「軍隊這樣下去很危險，要搞一個條條。」林彪就口授秘書寫下「軍委命令」七條。在場的軍隊領導人都同意。但在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江青和幾位中央文革成員不同意。林彪就帶徐向前見毛澤東，毛同意了七條，加了一條「加強對子女的教育」。顯然，毛澤東加的這一條是針對高級幹部子弟搞「聯動」而言。就成了八條。毛不在檔上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說：「主席你簽了個字，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呀！」²³

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正式頒佈了《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這個檔規定：「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聯。」1月29日，葉劍英向軍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委八條」，在講話中既興奮，又憤怒，說到「誰想把部隊搞亂，絕不會有好下場！」時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致使右手掌邊端骨折。²⁴有了「軍委八條」，中央軍委決定對部隊造反分子一律實行紀律制裁。內蒙古軍區警衛營300多人集體到北京要求搞「四大」，葉劍英代表中央軍委動用了相當兵力把這300多人全部捉拿送到63軍訓練改造，然後，大部分遣散回家了。²⁵各地軍隊領導人也利用「軍委八條」鎮壓造反派，有的省軍區向造反派群眾開槍，造成流血事件。「軍委八條」成了「二月鎮反」的政策依據。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當然為不會讓這種鎮壓造反派的狀況持續下去。

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67〕117號）。這個檔指出：「不得隨意宣佈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隊有意見，或對本地區奪權有不同意見，而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

²³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648頁。

²⁴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66頁。葉劍英傑斷指有三種說法，另一種說法是，在京西賓館的一個會議上，陳伯達批評軍隊後，葉和陳伯達爭論拍桌子，見《吳法憲回憶錄》第652頁；還有一種說法是在1967年大鬧懷仁堂時拍桌子。本書作者曾就此事問葉劍英的養女戴晴，她也說不清楚。

²⁵ 《邱會作回憶錄》，第456頁。

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檔強調「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檔要求軍隊「堅決地正確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眾組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援一方，打擊另一方。」

在《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之後，在毛澤東要求軍隊支持造反派的壓力下，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佈了「十條命令」。「十條命令」和4月1日的中發（67）117號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對「八條命令」的否定。強調「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對過去衝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毛澤東對「十條命令」的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十條命令」加上批判「二月逆流」，造反派又起來了。對「十條命令」軍隊裏有抵觸的，陳再道坦言「這還了得啊，又要來沖啊，又要搞亂啊」，他「不執行十條命令，不貫徹，不討論。」²⁶

由於《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軍內造反派占了上風。但軍內保守派是不甘心的。當時有北京軍區文工團「燎原戰鬥隊」組織海軍、空軍、工程兵、二炮等軍事單位的文工團聯合起來排練節目，並數次在北京軍區禮堂組織演出，和這幾個單位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也聯合起來了，成為「老三軍」派（也稱「三軍無革派」）。這一派擁擠「八條命令」，支持黨委工作，反對搞亂軍隊。在空軍擁護吳法憲，在海軍擁護李作鵬，在總後擁護邱會作。由此引起對立面觀點也組織起來，是軍隊的造反派，稱為「新三軍」派，這一派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軍委「十條命令」，得到中央文革和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支援。

從上面的介紹可知，軍隊對造反派的態度走了一個「之」字路：1966年10月5日，中央軍委發出「緊急指示」，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頒發「軍委八條」，鎮壓造反派；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頒發了「十條命令」，支持造反派。

為什麼走「之」字路呢？這源於毛澤東對軍隊的矛盾態度：既想讓軍隊支持選擇派，又想穩定軍隊。在這條「之」字路上，每向左拐

²⁶ 陳再道檢查。1967年12月1日。

一次，一大批領導幹部受到打擊；每向右拐一次，一大批造反派受到鎮壓。

1967年4月初的這一次左拐，軍隊內的造反派「老三軍」占了上風；「老三軍」處於劣勢。造反派力量最強的是炮兵、軍藝、後勤學院、海軍、空軍、北京軍區文工團、二炮文工團等的單位。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鬥各單位領導幹部。軍隊的領導人和「老三軍」決心要把造反派佔優勢的形勢翻過來。

四、「5·13事件」：美女轉乾坤？

怎樣扭轉軍內保守派的被動地位？一位美女起了重要作用。這位美女名叫劉素媛。

劉素媛，空政文工團歌劇演員。她1958年入中南海伴舞，時年18歲，從此與毛澤東結下了特殊關係。由於她可以經常到中海和毛澤東跳舞，有機會和毛澤東說話。當時，空政文工團分兩派，一派是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政委余立金的，另一派立場相反。劉素媛是保守派，她這一派只剩下5個人，常受另一派的圍攻。劉素媛找毛澤東哭訴，並向毛摸底：「對吳法憲應當採取什麼態度？」毛澤東回答說：「吳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能打倒。」於是，她這一派就堅定地保吳法憲了。有了毛的態度，空政文工團形勢急轉直下，劉素媛這一派一下子成了多數派，劉素媛成了這一派的頭頭，人稱「劉司令」。²⁷空政文工團就成了「老三軍」的一支重要力量。

劉素媛對毛說：為慶祝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北京部隊各文工團想搞聯合演出。毛說：「你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彪打招呼，告訴葉群支持演出。林彪得知這事後反覆掂量：主席是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主席對打擊造反派高興，但他還是要軍隊。林彪看到一個支持保守派從而穩定軍隊的機會，他讓葉群馬上約見劉素媛等人，支持「老三軍」聯合演出。葉群對劉素媛等說：「林彪同志和你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要怕當老保，

²⁷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641～642頁。

只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葉群還說：「軍隊和地方不同，地方衝擊的是劉鄧司令部，軍隊衝擊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即使有壞人，也不許衝擊。」²⁸

「老三軍」搞演出，「新三軍」當然不高興。他們不知道是毛澤東支持「老三軍」的演出，就組織隊伍衝擊演出會場。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為了保護演出，防止「新三軍」衝擊，蕭勁光、王宏坤、余立金、曹裏懷、李天煥、吳烈、熊伯濤、傅崇碧等海、陸、空高級軍事將領，聚集在小劇場東側小樓，由衛戍區調兩個連來制止武鬥。李作鵬回憶說，由於有軍隊保護，「新三軍」最終沒有沖進去，一場不太嚴重的武鬥幾十人受傷。「老三軍」演出成功。²⁹而「新三軍」的一位進入現場的人回憶說，「新三軍」沖上了舞臺，「舞臺上已經是我們的人在揮舞佔領中央高地的大旗；樂池裏空無一人，一些大型樂器胡亂丟棄在那裏……」後「老三軍派已經調集大批人馬將我們反圍困在劇場裏面，如果不立即衝破包圍圈，我們就出不去了。於是，我們就趕緊聚集人馬沖了出來。」接著聽到廣播：「林副主席辦公室來電話說，衝擊紀念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演出是錯誤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辦讓我們撤走。現場的大專院校主要組織現在都要撤了。」³⁰沖派和造反派學生撤走以後，「老三軍」則重整旗鼓演出。

「老三軍」和「新三軍」在展覽館激戰時，劉素媛在毛處。劉對毛說：「革命派勝利了。」毛說：「你高興個屁！過一會兒造反派還會翻過來。」邱會作說：「毛是支持劉素媛的，幸虧劉是革命派，如果劉是造反派，毛也會支持她。」³¹老三軍演出時，周恩來、陳伯達、蕭華、張秀川等人在大會堂。蕭華認為最好是兩派聯合演出、任何一派單獨演出，把另一派拒諸門外，難免發生武鬥。周不知道毛、林態度，還在人大會堂做兩派頭頭的工作，希望能夠聯合演出。劉素媛趕

²⁸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527～528頁。

²⁹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38頁。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51頁，說200多人受傷，數十人重傷。

³⁰ 白而強：《我策劃了衝擊三軍演出事件》，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

³¹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528頁。

到人大會堂，告訴總理，毛主席是支持她們的。周總理得知毛的態度以後，立即告訴造反派不要衝擊演出會場了。當時人大會堂很亂，總理就站在椅子上高喊：「不要衝演出會場，再沖就沖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周還讓陳伯達、蕭華到演出現場制止衝擊。³²一位小小的女演員，憑靠她的美色，能夠自由行走於中南海、人大會堂這樣的政治核心場所，連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得對她惟命從，這在皇權專制時代也不可能出現的情形，卻在共產黨領導的制度下出現了！

「三軍革命派」演出成功以後，又大造聲勢。5月14日在北京全城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還組織遊行示威慶祝。5月16日，他們召開慶祝演出成功的大會，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戚本禹來發表支持的講話。³³5月23日，在天安門廣場搭起臨時舞臺，進行了長時間的演出。6月9日，又在人大會堂小禮堂演出，中央領導人都來觀看，並上臺和演員合影，給「老三軍」撐腰。

「5.13」演出以後，軍事官僚們對軍隊內造反派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軍隊內的造反派紛紛瓦解。從此，軍隊幹部認為，打擊造反派，穩定軍隊才是擁護毛主席。黃永勝主持的軍委辦事組對軍隊內部的各大單位，凡是造反派力量強的，都從組織上進行了調整。不便調整的，就用特殊辦法處理。例如，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是上海一月風暴造反奪權的主要單位之一，上海是造反派的天下，是沒有辦法進行組織調整的，於是，軍委辦事組就以「換防」名義把這所學校遷到西安，然後在西安進行調整。³⁴所謂調整，就是對造反派進行清洗和打擊，黃、吳、李、邱壓垮了軍內造反派，維持了部隊的穩定，也強化了軍委辦事組的權力。「5.13」事件成就了林彪、黃、吳、李、邱，從而形成了後來說的「林彪反黨集團」。

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了「老三軍」打敗「新三軍」的原因，在全面奪權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大軍區在支左中都支

³²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月，第3版，第529頁。

³³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83頁。

³⁴ 程光：「心靈的對話」，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403頁。黃永勝之子2016年1月12日對本書作者說：上海二醫大從上海搬遷西安，不是為了鎮壓造反派，而是為了防止派性，因為在原地與地方上群眾組織派性太多，換地方就擺脫了派性糾纏。

援了「保守組織」，因而被認為犯了「路線錯誤」。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決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穩住北京軍內局勢。通過穩定北京軍內局勢，達到穩定全軍局勢的目的；通過穩定全軍局勢，達到穩定全國的目的。1967年5月13日起實行這個決策。5月13日以後，「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消滅了它的對立面（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從此，解放軍的總政、總後、空軍、海軍先後被吳、李、邱掌握。北京軍內局勢很快穩定下來。³⁵黃、吳、李、邱把持的、林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代替了軍委常委，全面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陸、海、空三軍都在他們控制之下。有軍事實力的林彪集團由此形成。

王年一說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然應該包括毛，而且以毛為核心。毛既然有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穩住北京軍內局勢「秘而不宣的決策」，那麼，劉素媛的要求毛支持她這一派，肯定是符合這個決策的。毛並不是因為和她有特殊關係才支持她所在的保守派。劉素媛只的通過毛撥弄的一個棋子，通過支持她來實施這個決策。沖派一位頭頭事後察覺到，「毛澤東事先就知道三軍要聯合演出並且對立面要衝擊的消息，然後再指示女文工團員去找葉群。」³⁶毛這樣做，顯然是執行「秘而不宣的決策」。美女轉乾坤只是表面現象。

五、「三支兩軍」：軍隊全面主導文革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奪省委書記李葆華的權，為此召開萬人大會，要求軍隊保衛會場，南京軍區向中央軍委打報告請示。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在南京軍區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林彪同志，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接到毛的這個指示後，林彪立即行動，第二天，軍委擴大會議就通過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

³⁵ 王年一：《大動亂時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6～287頁。

³⁶ 白而強：《我策劃了衝擊三軍演出事件》，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

中發〔67〕27 號檔指出：「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文件規定：

(1) 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廢；(2) 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求軍隊援助他們，軍隊應常派出部隊去支援他們；(3) 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4) 重申不當保護「走資派」和保護「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防空洞；(5) 全軍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教育，進行對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這一指示傳達到解放軍每一個戰士。

中發〔67〕27 號檔顯然是讓軍隊為各地造反派護航。這個檔看起來旗幟鮮明，但是，對什麼是「走資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都沒有明確的界定。這些模糊不定的概念為軍隊「左派」還是「支保」留下了自由選擇的空間；而且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自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都要求軍隊支援自己鎮壓對方。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3 月 19 日，中央軍委又發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這就是「三支兩軍」，其核心是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是維持社會穩定。這個決定指出：「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的『四大』，一般在 3 月底左右暫告一段落。除了照顧戰備、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工作。」「各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包括各軍區所屬的這些單位），可在整風告一段落後，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

從此，「三支兩軍」成了軍隊的一項重要任務，從 1967 年 2 月開始，到 1969 年底，解放軍先後派出 280 萬指戰員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全國實行軍管的省有 9 個，實行軍管的大城市有 25 個，幾十個專區和數以百計的縣實行軍管。那些沒有實行全面軍管的省、市、縣，也有部分軍管。縣級以上革委會軍人擔任主任的達 80% 以上，其中雲南、湖北達 97%。³⁷一些中央部委實行軍管，如，鐵道部、交通

³⁷ 《心靈的對話》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380 頁；《邱會作回憶錄》，第

部、郵電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實行軍管。

「三支兩軍」以後，軍隊成了文革的主導力量。當時軍隊的任務是：促進「大聯合，三結合」，以保證奪權和社會穩定，推進革委會的成立，軍隊幹部參加「三結合」和革委會。

軍隊本身是秩序的化身，軍隊是靠紀律和秩序維持戰鬥力，「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軍人看到不服從的造反派從心裏就反感。讓軍隊支持破壞紀律的造反派，是勉為其難的事。毛澤東讓造反派「火燒」官僚集團，而軍隊裏的高層和官僚集團是一體的，而且是官僚集團中的核心，最腐敗的一部分。他們怎麼回支持造反派呢？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軍隊裏的高級將領，大多數人是對造反派不滿的。葉劍英、陳毅等幾位元帥，以及在文革中主持「三支兩軍」的軍委辦事組的幾位成員都持保守態度的。其中，在軍委辦事組中具體負責「三支兩軍」工作的邱會作，文革初期鎮壓造反派，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造反派對他實施報復，差一點被打死。他對造反派懷有刻骨仇恨。所以，讓軍隊「支左」，勢必「支保」。在文革中除了從外地新調入駐地的 21 軍（軍長胡煒，1967 年把 21 軍從山西調進陝西）、38 軍（1967 年 2 月從吉林調河北）、12 軍（軍長李德生，1967 年 8 月從江蘇調安徽）等部隊以外，幾乎都是反對造反派的。特別是省軍區管轄的地方部隊，和駐地官僚有密切的關係，鎮壓造反派更為普遍。

山東左派是王效禹，是山東省革委會主任，青島市左派楊葆華是青島市革委會主任。北海艦隊和駐徐州和連雲港地區的 68 軍卻不支持這兩位造反派。³⁸

在廣西，開始支左部隊是 6984 部隊，他們是支持「4.22」這一派，後來 6984 部隊要調走，「4.22」哭著挽留，當然留不住。6984 部隊一走，「4.22」一派大批慘遭屠殺。

新疆造反派要打倒王恩茂，但新疆保守派和造反派旗鼓相當，僵

540 頁。說：先後派出「三支兩軍」近 300 萬人。另有資料稱：至 1971 年底，全軍有 22 萬余幹部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劉志青：《「9.13」事件後軍隊的揭批運動》，《黨史博覽》，2005 年，第 7 期。

³⁸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567 頁。

持不下，周恩來就把新疆的黨委、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領導請到北京開會，一談就是幾十天。軍委辦事組維護王恩茂、丁盛一派，周恩來知道完全支持王恩茂在中央文革那裏通不過，就請出賽福鼎出來主政，實行了兩派聯合，賽福鼎是聽王恩茂的。軍委辦事組又從湖南軍區把龍書金調到新疆，任軍區司令員和革委會主任。「9.13」事件龍書金垮了台，新疆亂了一陣，粉碎「四人幫」以後，王恩茂又回新疆主政。

四川是造反派力量較強的一個省。劉結庭、張西庭是兩位造反的老幹部，得到中央文革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不支持劉結庭、張西庭，但軍區政委張國華比較接近造反派。司令員和政委的態度不一致。為了加強壓制造反派的力量，軍委辦事組調炮兵政委陳仁麒任成都軍區第二政委。「9.13」以後，梁興初，陳仁麒被定為「上了林彪賊船」，四川又開始混亂。1975年趙紫陽從廣東調入四川省委書記。

軍隊支左一開始，就暴露了軍事官僚的本質，很多地方發生軍隊鎮壓甚至屠殺造反派群眾的慘案。這些慘案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为血腥的一部分。

毛澤東及時對執行支左任務的軍隊加以引導。21軍進入陝西以後，就把西安交大造反派學生領袖請到軍隊，奉為上賓，聽取他的意見，表示支持。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中央文革編的1967年4月21日的《快報》1940號上登了此事，毛澤東指示：「林彪、周恩來同志：建議將此材料印發軍委擴大會議各同志。軍隊這樣做是正確的。希望全軍都採用此種做法。」軍長胡煒一時成了支左明星。³⁹

葉劍英因青海「2.23」事件遭到責難，楊成武主持軍委辦事組時，就在軍隊和文革之間走「踩鋼絲」。軍委辦事組從全軍挑選支左幹部，邱會作具體負責支左幹部的選派工作。由於軍隊幹部文化水準不高，熟悉地方工作的幹部很難找，周恩來急著要人。有一次，周到京西賓館，邱會作和吳法憲正在打羽毛球，周悄悄走到邱身後揪著邱的耳朵，開玩笑地說：「你給不給我派人來？」邱會作說：「給給給，一會

³⁹ 《毛澤東年譜》6卷，第75頁。

開會把名單給你，你看中誰給誰！」⁴⁰

軍事官僚是官僚集團的重要部分，毛希望依靠軍事官僚支持造反派，從而實際整治官僚集團的目的，這本來是一個悖論。毛對軍事官僚集團採取矛盾的態度：批評他們抵制文革的行為，卻保護他們，讓他們免受衝擊。批評是虛的，而保護是實的。官僚集團和文革集團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而隨著秩序的恢復，文革勢力不斷消弱。軍事官僚集團的力量不斷坐大，最終必然造成軍事官僚集團和毛澤東的衝突。

其結果兩敗俱傷：以林彪為首的軍事官僚集團覆滅和毛澤東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創。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軍委發出於《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附：《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檔提出：「凡是實行軍管的地方和單位，軍宣隊應撤回部隊」，「地方各級黨委建立後，各級支左領導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應即撤銷」。此後，持續了五年多的『三支兩軍』工作隨之結束。

六、詭譎的楊、余、傅事件

在軍隊參與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楊，余，傅事件」。從這個事件中看不出「路線」，「觀點」的鬥爭，卻可以看出文革中軍內鬥爭的詭譎、骯髒，陰暗和殘酷。楊成武，代總參謀長；余立金，空軍政委；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1968年3月24日，他們三人同時被打倒。在這之前，他們都是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

1967年9月23日，楊成武、李作鵬、余立金陪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宣佈，把原軍隊四人小組⁴¹正式改為軍委辦事組。成員為：楊成武、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

⁴⁰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41頁。

⁴¹ 1967年7月17日成立的中央軍委四人小組，又稱看守小組，成員有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吳法憲為組長。實驗室是軍委辦事組的前身，任務是負責看管總政和駐京部隊、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

楊成武為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楊成武、吳法憲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⁴²軍委辦事組把全軍文革小組和總政治部的工作集中於一身，它有三項任務：（1）領導軍隊文化大革命；（2）加強戰備，領導軍隊日常工作；（3）組織全軍的「三支兩軍」工作。羅瑞卿倒臺以後，軍隊裏林彪以下的核心人物就是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葉劍英比林彪大 10 歲，蕭華有肝病，大家心照不宣，認為楊成武是林彪的接班人，葉劍英、蕭華相繼失勢後，楊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

楊成武也極力討好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但有些討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解放軍報》當時由軍委辦事組領導，蕭力（即李納，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是報紙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拉蕭力參加軍委辦事組的一些活動，對蕭力畢恭畢敬，只要蕭力答應到會而未到會之前，一定要等她來才開會。1967 年冬，楊成武署名發表了《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的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這篇文章本來是總參大批判組寫的，楊成武拿了過來組織人多次修改。楊說：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統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福州軍區一個戰士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楊成武下令審查這位戰士，把這位戰士復員回家了。⁴³（「9.13 事件」以後，楊成武卻說這篇文章是林彪那裏搞的，硬逼著以楊成武的名義發表。⁴⁴文章發表後幾天，毛澤東說：「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的，是形而上學！」接著，毛又作了批示：「絕對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⁴⁵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在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跨下來。」

⁴²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539～540 頁。

⁴³ 楊成武倒臺後，這位福建戰士又被請回部隊。據說毛對戰士有批示。

⁴⁴ 《邱會作回憶錄》，第 543～544 頁。董保存：《楊余傳事件真相》，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第 91～97 頁。

⁴⁵ 《毛澤東年譜》6 卷，第 146 頁。



被指「陰謀奪取空中權」的三位主角，左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楊成武親自主持編寫《黨史綱要》，調集了幾十位筆桿子集中在京西賓館做這件事。在完成的初稿中，毛澤東的地位和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都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地位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名字擺在第三位。周恩來的名字出現過，但不占重要位置，其他領導人榜上無名。《黨史綱要》不僅點名批評了陳獨秀、李立三、龔秋白，還點名批評了朱，是經毛同意的。⁴⁶大約在1968年2月間，楊成武可能得到了什麼風聲，下令把《黨史綱要》初稿，全部銷毀，一份也不准留下。

在編寫《黨史綱要》的同時，毛、林都很器重楊成武。1966年5月9日，邱會作、李天煥在楊成武家裏，李天煥吹捧楊成武說：「總長同副統帥的關係，早就是同桌辦公了。在我軍高級幹部中，早已明確：楊總長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楊成武面帶笑容，聲音很大地說：「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兵，百年之後，林副主席的事業，總要有人繼承的！」⁴⁷楊成武在同高級幹部接觸中，常談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樣器重、培養、信任他。⁴⁸楊成武常在辦公室談他和江青的關係。有一次他故意問吳法憲和邱會作：「江青同志找你們單獨談話沒有？」二人說沒有。揚說：「江青同志對我太關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裏談了幾次話。江青同志說：『不是最親近的同志，我不在家裏談話；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別人講我自己的苦難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貧苦，江青同志一面講一面流淚。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淚。」楊成武自以為有江青的信任，有些忘乎所以。有時打著江青的牌子對付林彪。林彪傷心地說：「人一失去友情，就什麼也沒有了。」⁴⁹楊成武也不是完全疏遠林彪，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林彪軍團長教我當師長》的文章，歌誦林彪，表示他和林彪有密切的關係。

邱會作認為，楊成武踩在林彪、江青兩隻船上，最後翻船落水。

50

⁴⁶ 《邱會作回憶錄》，第546頁；《吳法憲回憶錄》，第713～714頁說：《兩條路線鬥爭史綱》，只提毛、林、江三人，沒有周恩來是江青不讓寫周恩來。

⁴⁷ 《邱會作回憶錄》，第533頁。

⁴⁸ 同上。

⁴⁹ 《邱會作回憶錄》，第549頁。

⁵⁰ 同上，第549頁。另有一種說法是，北京弄到了一些有關江青30年代的材料，放在

楊成武下臺的導火線是一件兒女小事。楊成武大女兒楊毅在《空軍報》工作，她愛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書單世充。單世充也願意。單的老婆縱素梅發現後到空軍領導那裏鬧。⁵¹吳法憲讓空軍辦公室主任王飛和周宇馳找單世充談話。談話成了僵局，王飛和周宇馳就把單世充軟禁起來了。吳法憲認為王飛的作法是有意擴大事態，就批評周宇馳並讓他馬上把人放出來。周宇馳不服，就通過林立果向葉群告了吳法憲的狀。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你說周宇馳就是說立果，因為他們兩人是在一起的。」剛放下葉群的電話，就接到楊成武老婆也是楊成武的辦公室主任趙志珍的電話，讓吳法憲到楊成武家。吳法憲到了楊家，楊成武不見，趙志珍對吳法憲大發脾氣，說把單世充抓起來是為了把楊毅搞出空軍。回家以後，吳法憲向葉群打電話告知此事，葉群說：「余立金早就和楊成武串通一氣要奪你的權了。」第二天上午，趙志珍帶著余立金到林彪家。余立金對葉群說是他讓單世充多關照楊毅的，還說：「吳法憲這個人很專制，我這個政委沒有權，什麼都得聽吳法憲的。許多人反映，劉亞樓時是吳（無）政委，現在是餘（多餘）政委。」葉群把趙、餘的談話告訴了林彪。林彪很生氣，下午就把吳法憲叫去，對吳說：「趙志珍和余立金告你狀，看成樣子是要奪空軍的權，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這種行為是錯誤的，你要堅持原則，要勇於和楊成武鬥爭，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硬起來，要頂住！」⁵²恰好這時，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要北京派專機，說他們從敵偽檔案裏發現余立金是叛徒，要親自給毛主席送來材料。材料中說，在 1941 年皖南事變中，余立金被俘，辦了手續獲釋。余立金身份一落千丈，楊成武很沮喪。

王一年認為，武漢《7.20 事件》後，楊成武隨毛視察華東、華南、

楊成武那裏，一直未動，江青為此大發脾氣，說：「你放長線釣大魚嗎？」見於南《林彪集團興亡初探》（《十年後的評說》，第 82 頁）。

⁵¹ 另一種說法，楊成武秘書接到空軍機關的人寫匿名信，揭發空軍黨委辦公室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王飛等人胡作非為的醜行。楊把信轉給了林彪。這封信最後轉到了周宇馳等人手裏，周宇馳等人分析筆跡，是余立金秘書寫的。他們就誣陷余的秘書和楊成武女兒有不正当的關。見董保存：《楊余傅事件真相》，第 117~124。林彪集團垮臺後董保存訪問過楊成武，顯然這是楊成武的說法。

⁵²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 2 月，第 3 版，第 717~721 頁。

華中三大區時，反京後，楊成武把毛在視察的談話向幾位老師作了傳達，但沒有告訴林彪。葉群多次追問毛對林怎樣評價，楊成武一直避著沒有回答。《無產階級司令部》要楊成武對老師停發檔，楊成武一直沒有照辦，這些，為林彪、江青忌恨。⁵³當時毛、林並沒有什麼分歧，毛視察三個地區沒有批評林彪，楊成武為何要瞞著林彪？王一年的說法還得有更多的資料證明。

邱會作說 1968 年 3 月中旬，林彪找吳法憲商量，解決楊成武問題的原則是「爭取平息」。但林彪說服不了楊成武，才讓葉群向毛報告。毛親自召開四次會議，反覆詳情聽彙報。毛感到不拿掉楊成武是不行了。在彙報楊成武問題的時候，江青發現楊成武耍橫的本錢在於她，她就一反常態，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堅決要打倒楊成武。

54

楊成武被打倒的原因還有一種說法，就是關於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歷史檔案問題，江青早年一邊從事文藝工作，一邊參加革命活動。1933 年入黨，1934 年 9 月，她作為「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參加抗日救亡的遊行被捕。兩個月後教聯求保獲釋，但和黨組織失去聯繫。作為一名電影演員，她有不少緋聞。1937 年 7 月中旬赴延安，10 月恢復黨籍，改名江青，1938 年 11 月與毛澤東結婚。由於江青影壇緋聞和被捕問題，對毛江結婚中共高層有不同意見，新四軍政委項英還根據楊帆提供的情況，向中央發電報提出批評。1954 年 3 月，江青收到一封的匿名信，信中說「你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已寫了材料送中央組織部」。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偵查寫匿名信的人，多年沒有破案。直到 1961 年公安部門才查出匿名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林伯渠的妻子朱明寫的，朱明當即自殺身亡。後來江青得知，當年偵破此案的檔案放在上海。1967 年 4 月，葉群、戚本禹、楊成武組織了總參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陳虹帶領王育民、王成恩、朱鐵錚到上海查「黑材料」。在上海警備區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這是偵查匿名信的過程中形成的 23 個卷宗，裝在一個一尺四寸的小箱子。

⁵³ 王一年：《大動亂的年代》，河南出版社，1988 年，第 288 頁。

⁵⁴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 1 月，第 554 頁。

其中有匿名信，800多人的筆跡照片、偵情簡報、偵查對象調查材料，江青的卷宗，（其中有報紙上發表的江青寫給她丈夫唐鈞的公開信和劇照等）。陳虹給楊成武打電話，報告任務已經完成，準備夜航返京。楊成武說，「關於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報告了周總理、江青同志，他們說，管他什麼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來再說。江青還特別交代，一個字也不能丟！」這個箱子帶回北京以後，楊成武說，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們看一下，別人不得插手，不許擴散，看後向中央報告。

陳虹和王育民審閱了材料後寫了一個報告，建議仍由公安部專人負責處理。報告送上去，江青大為不滿。她到林彪那裏說，保存這材料就是要整她。林彪對江青說，這事好辦，讓他們重新寫個報告，將材料銷毀。林彪讓楊成武落實。

過了一個多星期，楊成武又找陳虹和王育民到他的辦公室說：「報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說案子已經破了，作案人朱明自殺身亡，材料也沒有必要保存了。」1967年7月7日，按楊成武口述的內容，由陳虹和王育民署名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林彪看成後用紅筆批示：「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關鋒四人負責集體銷毀。」並將批件轉給了周恩來。周閱後加批：「連同北京圖書館保存的材料和吳（法憲）傅（崇碧）送來的一包材料一起銷毀。」轉呈毛主席。

然而，7月13日起，楊成武和汪東興隨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8月關鋒又被抓起來。因此，銷毀材料的事被閣了下來。

9月23日，楊成武隨毛主席由南方間到北。謝富治告訴楊成武，江青幾次大發脾氣，說是楊成武要放長線釣大魚。楊成武將實情向周恩來報告，請示如何處理。周指示：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三人監銷。他們通知王育民將材料送到汪東興那裏，先按目錄核實材料，然後由謝富治動手點火，王育民負責向火裏一卷卷扔。他們三人坐在一邊守著，燒完後，三人都在報告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此後，江青多次說楊成武整她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接見中央專案一、二、三辦全體人員時，江青當著周總理的面說：「『二辦』饒漱石這個專案是我負責的，而楊成武卻對我封鎖，還給我立了一個專案。讓陳虹、王

育民、朱鐵錚三人整我的材料。」⁵⁵

在尋找和銷毀江青的材料過程中，楊成武是直接負責人，可能江青對他們行為有猜疑和誤會，成為楊成武倒臺的一個推動力。陳虹也被關押了六年。

3月23日凌晨一點，吳法憲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要他到毛澤東那裏參加一個會議。吳法憲到達時，會議已經開始了。會場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對吳法憲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已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過了一會兒，毛問林彪：「誰來當這個總長呢？」吳法憲這才知道，在他來之前，已經決定把楊成武拿下來了。林彪推薦了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毛同意了。對余立金怎麼處理呢？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判吧！」接著江青提出，北京衛戍區這個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楊成武的關係很密切，為了防範，還是動一動為好。毛澤東同意了，決定調傅崇碧到瀋陽軍區當副司令員，讓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接替傅崇碧。人事問題定了以後，毛對林彪說：「下面的事就交給周恩來去處理，我們兩個退出會場，休息去吧。」毛、林離開以後，周恩來繼續主持開會，對毛、林的意見作了具體安排。⁵⁶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駐京軍事機關、部隊、院校團以上幹部的萬人大會，這個會議從晚上9點等到25日凌晨才開始。會議宣佈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撤銷傅崇碧衛戍司令的職務。林彪首先講話，這個講話事先和毛商量過，毛要林講三個問題，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三是講一講哲學上的相對的絕對問題。⁵⁷林彪講話說：「主席說這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問題。」，「最近從空軍裏發生楊成武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

⁵⁵ 陳虹：《我參加饒漱石專案組的遭遇》，《炎黃春秋》2015年，第10期。

⁵⁶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722~723頁。

⁵⁷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727頁。

的地位相上下的人」。林彪說：「過去在總參或在總參以外，被楊成武反對的，譬如像王尚榮、雷英夫、張愛萍等等。他們有自己的帳。當時反對他們，批判他們，是做得對的，是黨領導的、中央批准的。王尚榮、雷英夫是賀龍的人，……這些人不能夠因為這些事情來翻天的。」林彪在講話中特別讚揚了江青：「很顯然的，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很傑出的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採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瞭解她，在這個文化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作用。」⁵⁸

周恩來在會上講話說：「根據剛才林副主席已經作了具體的指示，那種錯誤是屬於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錯誤，是屬於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兩面派的錯誤，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在進行這些陰謀活動的時候，他是用封鎖林副主席的極其卑鄙惡劣的手段，實際上也是同樣的封鎖了毛主席，封鎖了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這種卑鄙的活動，使我們極其憤慨！」⁵⁹

周在講話中用較大篇幅批判「二月逆流」後說，楊余傅事件「可以說是一個新的『二月逆流』，而這個新的『二月逆流』還是繼續去年的『二月逆流』。半年以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有「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是邪風」的提法，可能就是指楊、余、傅的某些行為。楊、傅二人與「二月逆流」主要人物聶榮臻是晉察冀山頭的，余立金在新四軍中是「二月逆流」主要人物陳毅部下，整這三人是對「二月逆流」再一次打擊。

接著，周恩來高調稱讚江青。他說：「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30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三十

⁵⁸ 林彪：《在軍隊幹部大會上講話》，1968年3月24日。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

⁵⁹ 《中央首長在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江青、陳伯達，1967年3月24日。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

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為人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周恩來還講到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物迫害」，講到江青在文藝改革和文革中的功績。周恩來講完話，又領著全場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接看，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講話。在這之後毛澤東突然出現在主席臺上，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3月24日的大會以前，就對楊成武採取了措施。這些措施都是周恩來安排的。

周恩來先派王新亭用中央警衛團把楊成武家裏的警衛換掉，把楊成武家全部控制起來。然後，周恩來對邱會作說：「你帶二個人去把楊成武帶來，就說我讓他到人民大會堂來開會。」邱會作對周恩來說：「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總理給我打個條子我把人給你領來。」周看了邱一眼說：「對楊成武隻字不留。」楊成武過去很注意儀錶，今天他的胡茬很長，頭髮既長又露出白頭發茬，（文革前老幹部只有個別人染發），像病了很久的人一樣。他用鄭重而悲慘的聲音問：「你們要把我搞到那裏去？」⁶⁰邱會作等帶著楊成武下樓時，楊的家屬被集中在門口的會客廳，老婆和孩子發出了淒慘的叫聲。只有二女兒楊俊生站在柳丁上說：「爸爸你放心吧，不要惦記家裏，這裏有我們呢！」楊一走，王新亭帶人抄了楊的家，封存了文件。

楊成武和徐向前家是一牆之隔，周恩來佈置衛戍區更換警衛部隊時，引起了徐家工作人員的警惕，徐的秘書未經請示報告，就將徐向前元帥也扣了起來，並收繳了徐保密櫥櫃的鑰匙，引起了一場誤會。⁶¹中央領導人的警衛人員，受雙重領導。除了直接服務的首長之外，還必須受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徐的警衛員除了保衛他的安全以外，還

⁶⁰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1月，第556~557頁。

⁶¹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14頁。程光：「心靈的對話」，第177頁說，中央警衛團剪楊家電話時，誤剪了相鄰的徐家的電話線，從而引起徐家警衛員的誤會，以為中央要清算這個「老機會主義分子」。

負有監視他的任務，所以才發生這樣的誤會。

23日上午10時左右，林彪、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全體成員同楊成武談話。林彪說：「今天找你談話，主要是處理你的問題，你的錯誤是什麼呢？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你和傅崇碧勾結在一起要打倒謝富治，和余立金勾結要打倒吳法憲。你想排擠許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等。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黨委第一書記職務。」楊成武想申辯幾句，但沒有讓他講，林彪接著說：「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會堂已經給你找了一個住的地方，你先在這裏休息。中央已決定，要你離開北京，住到武漢東湖，可以帶上全家，包括你母親、老婆孩子一起去。要用的東西可以統統搬走，你到那裏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好好休息一下。」⁶²

楊成武下臺以後任命黃永勝當總參謀長。林彪提的是「代總長」，毛說不帶「代」字了。1968年3月22日深夜，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永勝同志，請你馬上趕到北京來，我已經叫吳法憲派了專機到廣州。」周還讓黃永勝帶上夫人。黃問周有什麼事，周說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人選問題。3月23日，黃永勝在吳法憲的帶領下進了人大會堂一個廳裏，黃對周恩來和葉群說：「總理、葉主任，我到了。」周示意讓他二人坐下。此時，周向警衛人員做了手勢，對面的一道門簾掀開，楊成武在兩個高大的軍人伴隨下走了出來，臉色蒼白，精神萎頓。周恩來面對面地對楊成武說：「楊成武，你犯了嚴重錯誤，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攤子交給黃永勝，自己好好檢討錯誤。你回去吧。」楊成武看了黃永勝一眼，聲音嘶啞地答了一聲「好」，就被兩個軍人帶了出去。⁶³

楊成武先是被帶到武漢，不幾天被人發現了帶到洛陽。楊的母親死在洛陽城裏的一家醫院，楊要求去送終，周恩來沒有批准。⁶⁴

傅崇碧為什麼被打倒呢？因為傅崇碧和楊成武是關係密切的「老華北」，掌握著北京的要害部門，把他打倒是為了安全，是預防性的。

⁶²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725頁。

⁶³ 黃正：《軍人永勝》（下），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35頁。

⁶⁴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1月，第559頁。

⁶⁵李作鵬回憶說，傅崇碧於3月5日接受了江青給予的任務，到某處尋找被遺失的魯迅的書信手稿，結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很高興，於3月8日沒有請示批准，就帶上秘書（秘書手提公事包）乘車親自到釣魚臺江青住處報告情況。到江青處後，傅的秘書過於緊張，一進會客室就被地毯絆腳，「咄」的一聲倒地，皮包拋到江青身旁，把江青嚇了一跳。這就成了「衝擊」中央文革的大罪。⁶⁶

當時在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的李傅俊目睹了傅崇碧「衝擊」文革的情況：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臺十六樓找魯迅手稿，當時釣魚臺東門警衛電話請示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帶著他的秘書進了十六樓。傅崇碧進來後，直接往會議室走，氣衝衝地說：「我是衛戍區司令員，這是我管轄的地盤，誰敢攔我！」他是很不滿意的。這個時候，楊成武（當時是代總參謀長）也來到了十六樓。他們剛一到，江青就過來了（江青住在釣魚臺十一樓），她聲音特別大：「誰讓你們進來的？還發脾氣！你們有什麼資格衝擊中央文革！」這是我親耳聽見的，這時她已經在會議室了。江青跟楊成武吵了起來，我在值班室聽到聲音特別大，江青還拍了桌子。接著，江青就通知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等陸續來到了十六樓會議室，江青大聲指責他們倆非法衝擊中央文革！楊成武連忙解釋說是總理交給的任務，找魯迅手稿，而且強調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魯迅手稿的。江青馬上反駁：「胡說！我們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魯迅手稿，誰指使你們來的？」這個時候江青就胡說了，指著傅崇碧說，「你的秘書還要拿手槍把子打我！」——我在現場，根本沒有這回事。這個秘書很緊張，我看見他直流虛汗，有點虛脫。後來我才知道魯迅手稿確實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員卜訓榮說，魯迅手稿

⁶⁵ 程光：「心靈的對話」第174頁。

⁶⁶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14頁。

後來是在保密室找出來看，裝在幾個箱子裏。卜訓榮他不知道那幾個箱子裏有什麼東西，所以沒有告訴江青等人）。⁶⁷

逮捕余立金是周恩來安排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和吳法憲完成的。吳法憲回到家裏，通知空軍副參長梁璞和警衛營長田廣林至他家。楊德中已經到了。吳法憲讓秘書通知余立金到吳法憲家來一趟。院子裏黑黝黝的，靜悄悄的，余立金走進了院子，楊德中走上前對他說：「余立金，你被捕了！」緊接著幾個警衛戰士把余立金帶走。⁶⁸

196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10萬人的大會。題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首先周恩來宣讀了中央對楊、余、傅的決定。然後，江青、康生、陳伯達、周恩來都作了講話。

周恩來說：

我在這裏要提幾句江青同志的奮鬥的生平，我們要曉得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的，特別是30年代，她當共產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分子，國民黨的反動派對她的迫害（會場喊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致敬！）她在那個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像魯迅那樣硬骨頭似的敢於向迫害、摧殘誹謗、造謠的人反攻，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所以當時江青同志是戰鬥過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來讀一讀，那是紅文章。至於有些反動派誹謗者他們寫的壞東西，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這些黑幫、壞分子收集的臺灣、香港、美帝蘇修的材料。（黃永勝：「學習江青同志戰鬥革命精神！」）……

在抗日戰爭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為我們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懇的學生，她確實是緊跟毛主席，緊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體不好的時候，也能勤懇學習毛主席著

⁶⁷ 李傳俊：《我在中央文革辦事機構的見聞》，轉引自《往事》第115期，2012年7月3日。

⁶⁸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724頁。

作，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裏，還參加了我們解放戰爭。到了解放以後，這些黑幫分子，就是剛才說的，從大叛徒劉少奇起，劉、鄧、陶、彭、羅、陸、楊、彭德懷、賀龍，一直到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還有譚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視他們，敢於跟他們鬥爭，所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我們就看見江青同志的表現嘛，1964年的戲劇革命，八個樣板戲劇到今天還是光輝燦爛！（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這個反革命！」）在1966年，彭真起草的那個二月提綱的時候，正是林副主席委託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軍進行的文藝會談紀要發表的同時，你看一看鮮明的對照，一個是黑的，一個是紅的，多麼鮮明的對照啊！光輝的紀要，值得我們大家學一學，再重新學一學。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每一歷史時期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裏，江青同志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也是嚴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澤東思想的尺度，來考察每一個同志，分清敵我的界限。當著是同志的時候，她非常誠懇熱心地幫助同志；當著判明是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勇敢地把他端出來。這種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所以我們要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總理學習！向總理致敬！」）我不敢當，我還要學。（伯達：「互相學習。」）因此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要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的人民解放軍，誓死保衛我們廣大的革命群眾，誓死保衛我們的紅衛兵，還要誓死保衛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和紅色政權。

楊成武倒臺時林彪和周恩來高調歌誦江青，讚揚江青的歷史，這說明江青的歷史檔案有問題，是楊成武倒臺的一個重要原因。

3月25日，改組軍委辦事組，新的軍委辦事組組成如下：組長黃永勝（總參謀長兼廣州軍區司令員，以後丁盛接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副組長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成員葉群（林辦主任，軍委辦公黨委常委）；李作鵬（海軍第一政委，1968年9月後兼副總參

謀長)；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1968年9月後兼副總參謀長)。3月28日，毛澤東在同林彪接見黃永勝等時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⁶⁹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常委，其權力在軍隊裏至高無上。物極必反。這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事變埋下了種子。

高文謙認為，「楊余傅事件」是林彪和江青兩大集團最後一次大合作。⁷⁰

⁶⁹ 《毛澤東年譜》6卷，第157頁。

⁷⁰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65頁。

第一四章

「全國山河一片紅」



「祖國山河一片紅」版紀念郵票

毛澤東本來設想，通過「天下大亂」摧毀舊的政權之后，建立革命群眾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和軍代表「三結合」的「新生的革命政權」。在「新生的革命政權」的領導下搞「斗、批、改」，通過這個途徑走向「天下大治」。他估計三年就可以完成這個過程。但是，現實比毛澤東設想的要複雜得多，實現「大治」過程極其艱難複雜。

一、建立革委會的艱難歷程

毛澤東面臨兩個難題。

一是軍政官僚集團的抵制。從表面看，由于毛澤東的威望，官僚們唯恐緊跟而不及。但是，從深層看，文革觸及了他們的利益，他們還是千方百計地抵制。1966年表現為建立官辦紅衛兵，派工作組抓右派，鎮壓群眾；1967年軍隊介入后，除了「鎮反」以外，支持保守派、或在造反派中支持一派、壓制一派。

二是無法無天的造反派違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當時官方把造反派的這種行為稱為「派性」。如果沒有明確而嚴格的法律約束，全面放開結社自由，其結果必然是群眾組織山頭林立、各行其是。毛澤東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權威，以為他自己支持的造反派能夠「令行禁止」，實際上，他的「最高指示」群眾組織也是拿來為我所用。

對第一個難題，毛澤東從原則上是不讓步的，但在策略上有進有退，有剛有柔。他對搞「二月逆流」的革命元老就是這個態度：在對文革的問題上不讓步，對具體個人則盡可能採取團結的方針。毛的進與退、剛與柔，也是他對寵大的官僚集團的無奈之舉，他要改造官僚，又離不開官僚。他要把官僚機器送進修理廠，但還得讓這部處於修理狀態的機器繼續運行。

毛澤東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幹部，都打倒了誰支撐這個政權？但是他希望對幹部要「燒一下，不要燒焦」，就是讓所有的幹部都接受一次群眾批判的洗禮。在1966年全國性的「炮轟」、「火燒」的高潮中，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遭到攻擊。進入建立新政權的階段，就得把「燒了一下」的幹部解放出來，讓他們參加「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強調：「必須足夠重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堅持無產

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他們可以成為奪權鬥爭中的骨干，可以成為奪權鬥爭中的領導。」¹于是就讓幹部「亮相」。甚么叫「亮相」？就是從思想路線上作出深刻的檢查，表明自己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從而取得群眾組織的諒解和信任，還要表明站在哪一個群眾組織一邊，即「站隊」。當然要站在造反派這一邊。但是，造反派分裂成不同的組織，幹部「站隊」就很難。所謂「革命領導幹部」，除了毛和中央文革「欽定」的以外，各派有各派的結合對象；這一派支持的另一派要打倒；另一派支持的這一派要打倒。

對於群眾組織，毛開始是毫不含糊地是站在造反派這一邊的。1966年冬到1967年初，省委第一書記被中央定為走資派的地方、或者中央沒有明確表態要保護的省委領導的地方，保守派都垮臺了。中央明確表態保護的領導人所管轄地區（如廣西），保守派沒有垮臺。在「二月逆流」以後，有些地方已經垮臺的保守派又在軍隊的支持下恢復了（如武漢）。1967年夏，中共中央對武漢「7·20」事件的表態旗幟鮮明，「百萬雄師」頃刻垮臺，各地的保守組織也大多隨之垮臺，但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看到了保守派「百萬雄師」的勢力那麼大，從而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沖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此時，毛澤東對造反派出現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提出「武裝左派」，另一方面提出「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

1967年7月18日晚，毛對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鍾漢華的談話中說：「為甚么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7月21日，江青就在北京講造反派要「文攻武衛」。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提出要武裝左派，要搞第二武裝。毛在信中說，75%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革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武裝左派。²「武裝左派」的口號提出來以後，全國武斗從拳頭、棍棒升級為真槍實彈。1967年8月上旬，南京、長春、沈陽、重慶、長沙等地接連發生大規模的武斗。

¹ 1967年《紅旗》雜誌第3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毛澤東1967年1月30日修改，2月3日發表。

²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256頁。

這裡說的武斗是指群眾組織之間的武裝沖突，不是指在批判會上對被批判者拳打腳踢，也不是指掌權者對無權者的屠殺。武斗開始發生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以後是造反派不同派別間的武斗。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發生規模性武斗事件 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³早期武斗是用冷兵器，後來發展到真槍真炮。群眾組織手中有多少槍？據不完全統計，到 1969 年 9 月，被搶奪的各種槍 1877,216（枝、挺），收回 2131,036（枝、挺）；被搶奪的各種火炮 10,266 門，收回火炮 14,828 門；被搶奪的各種槍彈 44,217 萬發，收回槍彈 34,004 萬發；被搶奪的各種炮彈 390,642 發，收回炮彈 294,259 發；被搶奪的手榴彈 2,719,545 枚，收回手榴彈 2,734,381 枚。⁴收回的數字大於搶去的數字，是因為搶的數字中沒有統計從軍工廠中流失的武器。群眾組織是怎樣得到這麼多槍？當時說是搶的。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能到武裝的軍隊里搶到槍？還是毛澤東說得坦率，是部隊送的。毛澤東要求「支持左派」。誰是左派？這就由軍隊作主了。軍隊支左，大部份支持了保守派，槍當然送給自己支持的一派。軍隊介入以後，造反派與軍隊的矛盾、保守派與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中不同派別的矛盾都更加激烈。軍隊介入以後，文革從口水戰、棍棒戰發展為槍炮戰。

從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看到壓制軍人的危險性，就在軍隊和造反派二者之間搞平衡，天平傾向了軍隊。先是批判與「5·16 通知」中相近的提法——「揪軍內一小撮」⁵；不久，拋出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三位中央文革小組中激進的、但沒有實力的人物。毛澤東這些玩平衡的舉動，為支持保守派的軍隊和保守力量鼓了勁，各地造成了新的反復。

為了恢復秩序，對桀驁不馴的造反派紅衛兵採取的措施先是停止串聯⁶，由解放軍對他們搞軍訓，接著是中學生上山下鄉，大學生送進

³ 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供的數位。1978 年 12 月 13 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閉幕式上的講話時，又說武鬥死亡 23.7 萬人。

⁴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轉引自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 591 頁。

⁵ 「5·16 通知」中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中間就有「揪軍內一小撮」的意思。

⁶ 文革中「大串聯」從 1966 年 9 月開始，1967 年夏、秋兩次叫停，但到 1967 年底才

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到1968年7月底，工宣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完全退出了政治舞臺。最麻煩的是工人造反派組織。

毛澤東用「大聯合，三結合」的方針來解決群眾組織的問題。他要求：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前提下奪權。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奪權，中央不承認，但是，各個山頭的聯合，有「以誰為主」的問題，即權力分配問題。各個造反組織堅持己見，互不相讓，武斗不止。當時稱之為「派性鬥爭」。1968年「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強調「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在造反派各山頭爭奪主導權的時候，軍隊、行政官員也介入其中，增加了「大聯合，三結合」的複雜性。

在文革中的對毛的任何一個指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有意將毛的指示為我所用，使運動不按毛的戰略部署發展。「圍剿派性」也逃不出為我所用的陷阱。軍政官僚們用整「派性」來打壓造反派，中央文革針鋒相對地提出對「派性」要作階級分析，認為「無產階級的派性」是必要的。對「派性」的為我所用，使得「派性鬥爭」愈演愈烈。

當時中央還有相當的權威，各地矛盾難以在當地解決，就是讓那些省份「軍、干、群」各方人物集中到北京來，找個賓館住下來辦「學習班」。參加學習班隊伍龐大，有的省一兩千人；學習班的時間很長，通常是一兩個月，最長的達八個月。在「學習班」上，關起門來談情況、論是非、講條件。學習班上吵一陣，有點進展，中央領導接見一次，講一次活；再吵一陣，有進展，中央領導人再接見一次，講一次話。有的地方學習班要接見五六次、八九次，才能達成「大聯合、三結合」的協議。顯然，這樣的協議是折衷的、「和稀泥」的、和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目標大相逕庭。學習班基本是周恩來起主導作用，九大以前，中央文革的人都參加，「九大」以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人參加。有的地方連「稀泥」也和不了，就實行軍管。

文革到了1968年，「天下大亂」快三年了，毛急切地希望各省成立革委會。這時，他們不管這個「新政權」是否符合巴黎公社原則，

停止。

沒有一個省、市革委會是按巴黎公社原則選出來的；也不管「新政權」的作為，「撿到筐里就是菜」，不管周恩來「和」出甚么樣的「稀泥」，毛澤東也只得接受。

就造反派和軍政官僚集團的關係而言，各地大體有如下的經歷：群眾造官僚集團的反，官僚集團鎮壓造反者（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澤東為被鎮壓的群眾平反，官僚集團軟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團之間博弈（1966年7月底到10月初）——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派取得主動權，各地官僚政權癱瘓（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奪權，造反派分裂為不同的山頭，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混亂（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後兩年）——軍方鎮壓反革命，中央軍委下達「八條命令」，大批造反派頭頭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毛對「二月逆流」的反擊，中發（67）117號文件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的貫徹，釋放了被抓的造反派頭頭，第二次為造反派平反，大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派不同山頭間的鬥爭更加激烈（1967年4月中旬開始，以後各地時間段不同）；——毛促進「大聯合、三結合」，軍方在組織「大聯合」中支一派、壓一派，被壓的一派和軍方及軍方支持的一派鬥爭；——1968年9月5日，各地軍方起主導作用的革委會全部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軍政官僚控制的革委會「復舊」，造反派「反復舊」；——鎮壓反對革委會的造反派，鞏固革委會，第三次鎮壓（1968年到1972年，各地時間不同）。1968年7月，是造反派面臨厄運的一個月：7月27日，毛澤東派3萬軍人、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7月28日，毛澤東召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和造反派訣別。——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再次抬頭，部份被整的造反派得到翻身的機會，第三次為部份造反派平反；——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對造反派再一次鎮壓，以各種名義將造反派頭頭趕出革委會；——1975年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部份造反派最後一次得到翻身機會，第四次為部份造反派平反；——1976年十月政變成功，造反派隨之徹底覆滅。

文革以後，主流輿論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這完全違背歷史事實。就文革中大量死人這個突出問題上，絕大多數被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勢的時候，而是死在鎮壓造反派的過程中和

軍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死于專政機器對普通群眾有組織的大規模虐殺。「造反派」得勢時確實也很野蠻，但鎮壓他們的人更野蠻，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勢只有兩年，而造反派被整卻長達八年，文革以後還遭到更加殘酷的整肅。「造反派」的受難人數和程度百倍於「當權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體，他們是文革的犧牲品。

文革像一個長期革命過程的濃縮、巨大革命畫面的微縮：開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舊的秩序破壞以後，反潮流內部分裂，相互斗爭，經歷了反反覆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今天這一派得勢，明天那一派掌權；今日座上客，明日階下囚；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戰友，明日的仇敵。再接著是不同派別的聯合、吞并，由動亂向穩定轉變，主流社會思潮和人的行為由革命趨於保守，價值觀念和初始相反：昨是而今非。最後革命波濤完全平息，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1966年到1976年這段歷史中，可以找到1911年到1949年的蹤跡。

政治運動，特別是大國的全民政治運動，一旦發動起來，是很難控制的。被鼓動起來廣大的人群中，有多種利益取向，勢必形成多種政治派別。誰也不能完全控制各種派別在每一個節點上的態度和行為。毛澤東雖然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也不能控制每一步事態的發展。不能讓文革完全按照他的設想進行。

上面介紹的運動的大體發展線索，各省情況千差萬別，很難進行歸類分析。

以正式成立奪權後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先后為準，排列順序如下：

黑龍江省，1967年1月31日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成立，3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龍江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潘復生為主任。

山東省，1967年2月3日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

(3) 上海市，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成立（後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張春橋。

(4) 貴州省，1967年2月13日，成立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

員會（后改為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

(5) 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

(6) 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成立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

按照毛澤東的估計，這種「全面奪權」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來。但是，事情遠不是他所設想的那么簡單。「大聯合」困難重重；「三結合」難以形成。一些省份的奪權不是難產，就是不為中央所承認。近四個月沒有革委會成立。

(7) 青海省，1967年8月12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劉賢權，副主任有張江霖、達洛等。

(8) 內蒙古自治區，1967年11月1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滕海清。

(9) 天津市，1967年12月6日成立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

(10) 江西省，1968年1月5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

(11) 甘肅省，1968年1月2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洗恒漢。

(12) 河南省，1968年1月27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勛。

(13) 河北省，1968年2月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雪峰。

(14) 湖北省，1968年2月5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

(15) 廣東省，1968年2月2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黃永勝。

(16) 吉林省，1968年3月6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

(17) 江蘇省，1968年3月2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

(18) 浙江省，1968年3月2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南萍。

(19) 湖南省，1968年4月8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黎原。

(20) 寧夏自治區，1968年4月10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康健民。

(21) 安徽省，1968年4月18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德生。

(22) 陝西省，1968年5月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

(23) 遼寧省，1968年5月10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陳錫聯。

(24) 四川省，1968年5月3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張國華。

(25) 雲南省，1968年8月1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

(26) 福建省，1968年8月1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韓先楚。

(27) 廣西自治區，1968年8月26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

韋國清。

(28) 西藏自治區，1968年9月5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曾雍雅。

(29) 新疆自治區，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委會。主任龍書金。

從1967年1月6日上海奪權到1968年9月5日最後一個革委會成立，經二十個月社會大動亂的多次反復，除臺灣省外的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才先後勉強成立革命委員會。官方喜稱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

在這29省市中，革委會主任只有潘復生（黑龍江）、王效禹（山東）、張春橋（上海）、劉格平（山西）、解學恭（天津）、李雪峰（河北）、劉建勛（河南）、李瑞山（陝西）8人是地方幹部，21個革委會主任都是軍人。最初成為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那些人，都在中共九大上成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從這些人在文革中的沉浮可以看到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以後政局繼續動蕩。

在九大以後不久，遭到整肅的，共有5人：山西的劉格平，1969年7月被免職；貴州的李再含，1969年10月被撤職；山東的王效禹，1971年3月被撤職；黑龍江的潘復生，1971年6月被撤職；內蒙的滕海清，1971年5月被免職。

劉格平、李再含、王效禹、潘復生這四個人都是文革早期出來表態支持造反派的幹部。在以後的反復中，他們或者是卷入了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無法控制局面；或者是得罪了軍方實力人物。滕海清是因為清查「內人黨」搞亂了局勢而下臺。

這一波革委會主任下臺，接任者多是軍隊幹部。到「林彪事件」為止，29名主任中的軍隊幹部上升到23人，占79.3%。毛澤東依靠軍隊穩定局勢。

「林彪事件」使5位革委會主任下臺，他們是：河北的李雪峰，1971年1月被撤職。廣東的黃永勝，1971年9月被撤職（1969年6月已經調任，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接任）。浙江的南萍，1972年被撤職。江西的程世清，1972年被撤職。新疆的龍書金，1972年被撤職。此外，因工作調動，有5位省革委會主任回軍隊任職。他們是江蘇的許世友、湖北的曾思玉、安徽的李德生、遼寧的陳錫聯、福建的韓先

楚。

年 8 月，中共十大召開。除了去世的 3 人（北京的謝富治、四川的張國華 1972 年病逝，云南譚甫仁 1970 年遇刺身亡）以外，26 名在世的主任當中只有 15 人成為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占 57.7%。「林彪事件」以後接任省革委會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幹部。

年十月政變以後，各省市革委會主任又一次大換班。有 4 人遭到整肅：上海的張春橋；吉林的王淮湘，1977 年免職，后被開除黨籍；甘肅的冼恒漢，1977 年被撤職；天津的解學恭，1978 被免職，1987 年被開除黨籍。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召開，24 名在世的省革委會主任當中，進入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總只有 10 人，為總數的 42%：他們是許世友、解學恭、劉建勳、曾思玉、黎原、李德生、李瑞山、陳錫聯、韓先楚、韋國清。如果加上十一大後不久被撤職的解學恭，則為 9 人，占在世的中央委員的 37.5%。最初的 29 名省革委會主任當中，先後遭到整肅的一共是 16 人，占 55.2%。在成立革委會時擔任主任職務的軍人，除了因林彪事件牽連外，調回軍隊的人都進入了十一屆中央委員的行列。

二、「復舊」和「反復舊」

以軍人為主導的「新生的紅色政權」並不「新」。它沒有制度創新，沒有從權力制衡上防止官僚主義，也沒有解決政府的職能的問題。但確實裁減了人員，壓縮了機構，進入了造反派群眾組織頭頭。開始時也有一番新氣象。但這番新氣象很快就沒有了，出現了「復舊」。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如果不被官僚同化，就會被排斥。進入革委會的老幹部，大多是「穿新鞋，走舊路」（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造反派認為，「復舊」就是恢復舊權力機構、舊的辦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排斥和打擊進入權力機構的造反派。「復舊」也表現為行政權力不斷擴張，特權日益嚴重。辦公用房的擴張是行政權力擴張的一個表現。以天津為例，文革前，天津是河北省轄市，河北省會設在天津。1966 年，天津成為直轄市，河北省委遷到保定（後來遷到石家莊）。1972

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會領導機構和所屬各部委辦（當時稱一級組、二級組）占用辦公用房總共 82,500 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當時稱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當時稱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四家的辦公用房還多出 26,000 平方米。官僚特權隨著官員職務的恢復而恢復。他們充份利用權力為子女謀取利益，為逃避上山下鄉而參軍、「走后門」上大學。軍事官僚搞起特權來比行政官僚更為肆無忌憚，他們赤裸裸地以權謀私。天津市和平區文革初期共壓縮（即減少原住戶的面積）、查抄了 9,190 戶，壓出房屋 13,404 間。私產被接管需要處理的 5,384 戶，房屋 3,025 所、24,321 間。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和各類高級統戰人士，騰出的房子大多被軍官家庭占有，一個團級干部就占一棟小洋樓。有些幼兒園的小洋房也被軍隊干部占作私宅。在天津駐軍 20 個單位即 66 軍、警備區、獨立師、八分部、05 部隊、海軍航海保證部、空軍高炮二師、空軍燈三團等，在文革中占用民房 108 處、9167 間，共 400,853 平方米。⁷這還是不完全的統計。軍隊占用民房不是天津的個別現象。北京軍區一個文件稱，全軍區共占用學校 161 所、醫院 13 所，工礦房舍 111 處、黨政機關、事業單位 396 處，共 239 萬平方米。其它各省、市、自治區的支左部隊也占用大量民房。

軍政官僚們復舊，造反派就反復舊。山東、湖北、甘肅、福建、江蘇、山西、黑龍江等地，造反派都開展了反復舊活動。山東的反復舊是省革委會會主任王效禹發動的。

王效禹，1938 年 6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 年 4 月任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反右時，因不同意將四位下屬劃為右派，被貶到德州國棉一廠任副廠長，行政級別從 10 級降為 13 級。他的右傾問題被甄別后，1965 年任青島市副市長。1966 年 8 月 25 日，紅衛兵反青島市委，市委調動工人保青島市委，王效禹公開支持紅衛兵。9 月 7 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肯定了王效禹。1967 年 2 月 3 日，山東成立革委會，王效禹任革委會主任。

濟南軍區支左部隊中多數不支持造反派。在「大聯合，三結合」

⁷ 楊繼繩：〈1972 年：全國軍隊大搬家〉，載《炎黃子孫》2010 年，第 4 期。

中，一些造反派受到排斥，在省以下單位成立革委會時，造反派也受到擠壓。1967年北京的元老們搞「二月逆流」，濟南軍區的將軍們也有表現。在北京反擊「二月逆流」的時候，王效禹在山東也搞「反逆流」。1967年3月至6月，王效禹與跟「三支兩軍」的軍隊負責人矛盾開始激化。1967年4月26日，周恩來、康生、楊成武、蕭華等人在北京當著王效禹和山東造反派的面，批評在場的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袁升平。1967年5月，正是楊得志、袁升平與王效禹矛盾沖突的時期，經毛澤東批准，軍委5月18日發布命令，任命王效禹任濟南軍區第一政委，他雖然深受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信任、但和濟南軍區的將軍們格格不入。

1967年7月，王效禹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徐州地區（徐海地區駐軍68軍隸屬濟南軍區，支左由濟南軍區管）解決兩派群眾組織的矛盾，改組了徐州革委會，讓許世友信任的軍人革委會主任下臺，扶持徐州鐵路分局一位年輕造反派替代。徐州屬江蘇省，是許世友管轄地。王效禹由此得罪了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

1968年10月14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社論提出了「反復舊」的問題。社論批評了「統統是原班人馬，沒有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的領導班子，說這樣的領導班子「把敢于向階級敵人沖鋒陷陣的、敢于堅持階級斗爭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復舊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原則基礎上的團結，常常形成兩個中心」，「『獨立王國』氣味甚濃」。毛澤東審閱這篇社論時，將原安排在目錄中的第四篇提到第一篇⁸，可見毛對此文的重視。王效禹和社論的思想一拍即合。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東省革委會舉行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決定開展「反對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和復舊傾向」，簡稱「反復舊」運動。

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連續發表文章為「反復舊」造輿論。這些文章說「在一些單位和部門，扶植一直沒有轉過來的保守勢力，為去年的逆流翻案。并極力重用舊機構的原班人馬，大搞獨立王國，

⁸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80頁。

與革委會鬧獨立，或妄圖把省革委會「架空」。] 這裡說的「獨立王國」，指的是軍人把持的省革委會的生產指揮部和組織部。

山東的「反復舊」運動做了幾件事情：

——派工宣隊官隊進駐省革委會的生產指揮部。生產指揮部的職能相當於「文革」前的省政府（相當於湖北省的「抓辦」），正副組長由軍人擔任，吸收到幾名前省政府的老幹部。王效禹等認為，生產指揮部成了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基地，成了不服從革委會領導的「獨立王國」。山東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組織的工宣隊進駐生產指揮部后，奪取了生產指揮部的一切權力，撤銷了生產指揮部領導小組，成立了生產委員會；召開了「反復舊」大會。

——工宣隊進駐省革委會的組織組下屬的材料組。材料組是由 18 位軍隊幹部組成的審干小組，負責審查省革委會以及所屬各室、組的領導成員。王效禹等認為，組織組整了造反派的黑材料，排擠造反派。工宣隊進駐后，查封了材料，并驅趕了軍隊人員。

——派工宣隊進駐軍隊中的開展「四大」的單位，由工人組織去領導這些軍隊的單位。

——由「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接管公安派出所。公安系統已被軍管，但王效禹等認為公安系統復舊嚴重，還認為「派出所整了省、市革委會負責人黑材料，妄圖顛覆省、市革委會」。1968 年 12 月 17 日，「濟南市文攻武衛總指揮部」以清查黑材料為名，強占濟南市館驛街派出所。1969 年 1 月 25 日，「濟南市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市區的 4 個公安分局和 38 個公安派出所，聲稱「公、檢、法一切大權歸文攻武衛」。

——在反復舊風潮中，被邊緣化了的老造反派再次奪權，全省短時間內約 40% 的縣、市革委會被推翻或改組。聊城地區地、縣革委會被工宣隊奪權，90% 的基層革委會被改組或沖垮重建。

山東「反復舊」的實質是，以王效禹為首得省革委會及其造反派勢力奪取軍隊控制的地方權力。

王效禹的「反復舊」激怒了將軍們。將軍們通過各種管道多次向中央狀告王效禹，要求解決山東問題。「九大」會議期間，各地軍隊領導人就「反復舊」對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澤東仍舊保王效禹。4

月 28 日，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特別提到山東問題，並說是人民內部矛盾。5 月 1 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要求楊得志「要搞好團結」。

但是，王效禹的對手是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和其它有關大軍區的眾多將軍們，中央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也站在軍隊一邊反對王效禹「反復舊」。

毛澤東不能得罪这么多的將軍。從 1969 年 11 月至 1971 年 3 月，中央陸續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項職務，由楊得志擔任山東省革委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袁升平擔任山東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這時，全省各級權力機構和重要生產部門幾乎全是軍人掌權，人們說山東是「軍人政權」。

山東的反復舊顯示了軍人和文革派的矛盾。在 1969 年的山東，文革派的王效禹失敗了；在 1970 年的廬山會議，文革派張春橋勝利了。這是后話。

黑龍江和山東的情況大體相似。1958 年，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被打成「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另兩人是書記處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棟）。他們挨整的主要問題是對階級鬥爭、農業集體化、統購統銷持消極態度。潘復生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撤職下放到農場勞動。1962 年平反后，調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黨組書記。1966 年 1 月，調中共黑龍江省委任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66 年 8 月他站出來支持黑龍江的造反派，1967 年 1 月 31 日，潘復生成為全國第一位省革委會主任。1967 年 5 月 10 日，毛澤東任命潘復生為沈陽軍區政委（黑龍江省屬沈陽軍區防守）。1968 年，潘復生搞「反右傾，反復舊，反復辟」，一大批已結合到革委會里領導幹部以「復辟」、「復舊」的罪名被撤職。據統計，在「反右傾，反復舊」鬥爭中，全省被揪斗的大隊以上的幹部 29,091 人，受株連被觸動的達 5 萬多人。⁹他這一行為不僅得罪了一大批官員，也違反了毛要求「走向大治」的戰略部署。1971 年，潘復生被撤銷一切職務，由軍人汪家

⁹ 《黑龍江省志，第 70 卷，共產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47-249、262 頁。這組數字是潘下臺以後反對他的人統計的，可能有誇大。

道任革委會主任。

「從大亂到大治」，就是恢復秩序。既然沒有制度創新，只能恢復文革前的舊秩序。恢復舊秩序就是否定文革，「反復舊」又和毛澤東走向「大治」相悖。所以，毛對反復舊持矛盾態度。他先是通過 1968 年 10 月 14 日《紅旗》社論鼓動反復舊，當反復舊沖擊了「新生紅色政權」時，他又說：「反復舊必復舊，反復舊就是復舊」¹⁰周恩來說：「『九大』以後，產生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革命委員會。……有的地方還要鬧，還要奪權，你奪誰的權？不是要奪無產階級的權嗎？」¹¹反復舊的造反派都遭到了鎮壓，鎮壓的名義是「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

1971 年「9·13」事件後，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垮臺，各省革委會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因和林彪有牽聯而倒臺。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亞、湖北省的曾思玉、劉豐、浙江省的南萍等。進入 70 年代，毛澤為削弱軍隊對地方的控制力，將八大軍區司令員互調，在革委會里的軍人有的回到部隊，有的轉業到地方。在革委會里的造反派頭頭被邊緣化。這樣，革命委員會只剩下了被結合進去干部了，省與省以下的地方基層政權，又重回到文革前就執掌政權的官僚們的手中。

既然成立革委會不能建立毛期待的「新的國家機器」，那只能是恢復十七年的國家機器。這就標志著文革的失敗。從這個角度說：「全國山河一片紅」之日，就是文革失敗之時。何況實現「一片紅」以後，還有多次反復。在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復雜過程中，廣大群眾反復多次地經受了血與火的折磨。「全國山河一片紅」，是廣大群眾的鮮血染紅的，其中，主要是造反派的血。從下面介紹的幾個省的情況可見一斑。

¹⁰ 康生在 1969 年 12 月 27 日〈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委、成都軍區赴京學習班全體同志的重要講話〉中傳達。

¹¹ 周恩來第四次接見武漢造反派領袖時的講話，1969 年 5 月 27 日。

三、湖北：長江濁浪

湖北省是我的家鄉，1967年2月到3月、4月16日到6月28日我兩次到湖北串連。「7·20」事件發生后，7月24日，我又到到武漢，直到8月31日回京。下面的情況除了我自己的記憶以外，還參閱了徐海亮先生的《東湖風云錄》、吳焱金口述、鍾逸整理的《四十三年望中猶記》、鍾逸先生的《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的生與死》等文獻資料。

保省委，抓右派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一方面拋出一批高校的領導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另一方面在群眾中抓「右派」。

在省委抓右派的思想指導下，1966年7月，武漢市很多工廠、機關、學校、醫院、都揪出了「三家村」，批斗會一個接一個，全市數萬人被關在各單位自辦監獄中，「五類分子」再一次受到打擊。游街、抄家、戴高帽，「紅色風暴」席卷整個武漢，不少人投江自殺。

8月19日，省委出面組織的官辦紅衛兵正式成立（造反派稱他們是「三字兵」。「三字兵」到處掃四舊、破壞文物、古跡，還將歷次運動中被打成的「牛鬼蛇神」和資本家揪斗游街，抄他們的家。在這個期間，因「反抗和破壞文革罪」，武漢全市被捕400多人（其中中學生159人）¹²。武鋼綜合經營廠工人龐玉來，被同廠四清積極分子黃連生貼大字報，說他曾被資本家收養。龐認為自己不過是個小工人，又不是當權派，就撕下了大字報，與黃發生沖突，誤傷一位勸架女工。事發十幾天之后，即7月5日，在武鋼、一冶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以「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將龐玉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時狂風大作，雷鳴電閃，大雨傾盆。¹³6月20日，湖北大學發生工作組整師生的「6·20」事件，11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分

¹² 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辦公室：《武漢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1966年5月-1976年10月）》。

¹³ 徐正全：《雪地足跡》，轉引自《昨天》2012年，第7期。曹承義初稿，鍾逸整理：《悲喜交集話文革》第5-6頁。

子」，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點名批判即將被打成「右派」的學生40多名。¹⁴

1966年8月2日，按照北京的步調，中共武漢市委根據省委指示，決定逐步撤出工作組（隊），並開門整隊，要求各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革小組，接替工作組（隊）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當然，這種文革委員會和文革小組都是保省委的。

1966年8月以後，首都紅衛兵南下武漢煽風點火、炮轟湖北省委，到12月22日止，全市陸續接待外地學生共400萬人。¹⁵湖北省委發動「三字兵」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省運動的起落與陶鑄和王任重兩個人的命運相關。毛澤東很器重王任重，曾說王「有總理之才」。陶鑄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個創意早於林彪。¹⁶毛澤東發動「文革」，陶、王也都是緊跟的。6月1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奉調北京任中央文革顧問，後又成了排在毛、林、周之後的第四把手。王任重則接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們二人一方面在北京緊跟毛的部署，另一方面，盡力防止後院起火，在中南地區壓制反派。後來毛澤東說陶鑄是「兩面派」大概就是指這種情況。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陶、王被打倒了，但他們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運動思路，在湖北省幹部和群眾當中還有很深的影響。

造反派崛起

湖北的文革研究者老田說：「在工作組時期，封了一批左派，抓了一批右派，這為以後武漢群眾中的派系鬥爭播下了種子」，「武漢的造反派主要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的，而是當權派『反向動員』出來的」。他說的「反向動員」就是因為挨整而被「逼上梁山」。¹⁷的確，造反派頭頭大多數是被官僚集團逼上梁山的。

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王任重

¹⁴ 吳焱金口述、鍾逸整理：《四十二年望中猶記》（電子版）。

¹⁵ 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辦公室：《武漢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1966年5月-1976年10月）》。

¹⁶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冊，南方出版社，海口，1999年，第359頁。

¹⁷ 張建成：《歲月留痕》，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4年，序，第3頁。

迅速轉彎，武漢的造反派立即掀起了批判「資反路線」的高潮，要求給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平反，批判黨政干部所犯壓制群眾的錯誤。10月18日，王任重就武漢文化革命問題寫出檢查，公開承認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1966年9月，成立了官辦的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一司」）一度是多數派。10月下旬，全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派）商討成立統一司令部，由于席位問題沒有達成共識，湖北大學、華中工學院代表退出聯合，後來各自成立了「新華工」（第一號頭頭張立國和「新湖大」。加上「新華農」合稱「新派」。10月26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即「二司」）武漢測繪學院黨員學生楊道遠是二司的負責人。

1966年11月10日，全市性的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第一把手是重型機器廠工人朱鴻震，第二把手是武昌造船廠工人胡厚民。「工總」，在省委洪山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張體學和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修到會，張體學講話，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張體學授完旗就走了。接著是趙修講話，他很明確地告訴全體與會者，省委不能承認工人總部這個名稱，要改成聯絡站。人們感覺被愚弄了，這時臺上有人對著麥克風叫：「我們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於是，數百人搶上火車到了北京。那時上海工人正在安亭臥軌。陳伯達給上海工人發電報，說服上海工人「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武漢工人打著「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旗幟來到中南海西門，貼出標語：到底革命是「大道理」還是生產是「大道理」？我們認為陳伯達把「大」「小」顛倒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¹⁸

武漢工人總部成立以後，12月8日，「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成立（簡稱「工造總司」，一說是11月10日成立），第一把手是電子扳金工吳焱金。12月12日，武漢鋼鐵公司造反派組織「毛澤東思想9·13戰鬥兵團」（簡稱「9·13」，以1958年9月13日毛主席視察武鋼的時間命名）成立，第一把手是武漢鋼鐵公司電焊工李湘玉。

11月16日，二司等造反組織及北京來的紅衛兵游行到《湖北日

¹⁸ 徐正全：〈雪地足跡〉，轉引自《昨天》2012年，第7期。

報》社造反，他們要求徹底改組編輯部，勒令該報停印。11月17日，省委通知一司紅衛兵保衛黨報，驅趕造反紅衛兵。兩派在報社紅旗大樓激烈衝突，發生流血事件。11月18日，省委負責人張體學、趙修（此時已改名趙立公）、張華，凌晨4時到報社與造反派談判，張體學承認造反派是「革命的行動」。

12月初，在武漢市委的支持下，部分職工在武漢機床廠召開倡議成立全市的「革命職工聯合會」，¹⁹很快發展為40萬人的保守工人組織。「革命職工聯合會」反對批判省委，要求解散「工人總部」，反對學生到工廠串連。

1967年1月1、2、4日，武漢數十萬造反學生、工人在新華路體育場連續兩次批判斗爭王任重。張體學、趙修等省市領導參加陪斗。王任重患有肝炎，中央讓他在廣州休養，造反派把他從廣州揪回來。批斗時給他戴了高帽子，患著嚴重肝炎的王任重臉色發青。造反派工人姜詩存把自己的大衣脫下給王任重穿上。批斗王任重之後，各單位都組織批斗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一時，領導幹部站在汽車上被游斗，成為武漢三鎮的一大景觀。武漢各個學校、機關和工廠黨委癱瘓，許多單位被造反派控制了權力。

奪權流產，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年1月26日上午，學生和工人造反頭頭在湖北大學召開奪權籌備會議。會議由工人總部負責人朱鴻霞主持。因革委會常委名單分配而激烈爭吵，「二司」代表憤然退出了會場。下午2時，在朱鴻霞的主持下，在洪山禮堂舉行了奪權大會，發布了「奪權公告」和「一號通令」，宣布奪取省、市委的權力。二司搶走了省委的全部公章，「工造總司」代表搶走了武漢市委的全部公章。洪山禮堂象征性的奪權大會之後不了了之。奪權因各造反組織意見不一而流產。

「1·26」奪權流產加深了造反派組織間的矛盾。在武漢三鎮，反對「工人總部」、「9·13」、「二司」等造反組織的聲音強烈起來、

¹⁹ 武漢文革親歷者和研究者商欣仁認為，「職工聯合會」雖是保皇派，但比較守紀律，比較溫和。和後來由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支持組建的「百萬雄師」保皇派組有很大區別。

很多地方貼出了「工人總部、二司大方向錯了」、「工人總部、二司的頭頭修了」、「砸爛工人總部」、「工人總部、9·13 組織嚴重不純」等標語、口號。造反派哪能忍受？2月8日，「工人總部」、「9·13」、「二司」等12個激進的造反組織在他們控制的《長江日報》上聯合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簡稱「2·8 聲明」）。「2·8 聲明」對上述批評進行了反擊，聲明不僅表達了造反派的激進情緒，還指責「工造總司」、「新湖大」、「新華工」是「右傾機會主義」，是「托派」，指責他們要下山「摘桃子」²⁰。還提出：「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這篇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工造總司」、「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等造反派組織認為這篇文章是「大毒草」。「工人總部」、「九一三」、「二司」等組織認為文章是「大香花」。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軍隊鎮壓造反派

2月18日，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2.18 聲明），認定「『2·8 聲明』大方向錯誤，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制造分裂、挑動群眾斗群眾、轉移了斗爭大方向」，聲稱部隊將對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2月22日，朱鴻霞、胡厚明、楊道遠三人署名文章〈資產階級復辟與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長文在《長江日報》上發表，此文與軍區的「2·18 聲明」針鋒相對。「工人總部」、「二司」等組織了10萬人大游行，抗議「2·18 聲明」。武漢的激進派造反組織和軍區直接對抗。2月23日下午，武漢部隊出動70余輛軍車，乘載3千多名全副武裝的軍人游行，高呼「2·8 聲明是大毒草」等口號，同時，飛機大量散發「2·18 聲明」的傳單。武漢部隊還把大批解放軍指戰員推上第一線，極力宣傳「2·18 聲明」。武漢軍區這些行動給造反派強大的壓力。而造反派高唱〈紅軍想念毛澤東〉。廣播中經常播送《坐牢算甚么》、《就義歌》等歌曲。

3月4日，本來是「毒草派」的「新派」控制的《湖北日報》發表社論〈解決粉碎「秋后算賬派」的反攻倒算〉批評軍隊造反派的壓

²⁰ 下山「摘桃子」是毛澤東1945年批評蔣介石的話。他說，抗戰八年，蔣介石躲在峨眉山，抗戰勝利了，就下山「摘桃子」。

制，軍隊認為這篇社論是大毒草。

3月6日，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成立（簡稱「抓辦」），並宣布即日起開始辦公。「抓辦」擔負起了原來省政府的工作，由軍隊代表、幹部代表、群眾代表三者組成。3月15日，武漢軍區在新華路體育場召開抓革命促生產幹部大會。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鐘漢華，副司令員韓東山等出席大會。會上，軍區負責人嚴厲批評了造反派。「抓辦」由軍代表控制，造反派稱「抓辦」是「軍政府」。「抓辦」用行政權力和造反派對抗。周恩來說：「抓辦，抓辦，抓辦里壞得很。」²¹

3月17日夜晚，以落實「軍委八條」的名義，軍警聯合行動，逮捕工人總部500多名大小頭目。3月21日武漢部隊發表通告（「3·21通告」），認定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是「反革命組織」，宣布予以取締。工總有幾百名頭頭被抓以後，保守派空前活躍，「踏平黑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大標語貼遍武漢三鎮。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等保守組織以各種名義迅速死灰復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各級武裝部支持的、以武裝基干民兵為基本隊伍的「紅武兵」。手執鐵矛、頭戴柳條帽的「紅武兵」²²，威武地站在一輛又一輛卡車上呼嘯而過。一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開始批斗造反派的「壞頭頭」。

軍隊的強力鎮壓促使造反派內部已經分裂的「香花派」和「毒草派」重新走到一起。他們共同喊出「揪武老譚²³，為工總翻案！」的口號。3月27日，「新華工」組織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漢的譚震林！」。4月11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工總造司」沖擊軍區。

²¹周恩來1967年7月14日對陳再道的談話，見〈陳再道的口頭檢查〉，1967年12月1日。

²²「紅武兵」，即「紅色武裝基層民兵」，一號頭頭俞文斌是武漢市機械工業局武裝部副部長。由於省軍區及市人武部的支持，幾天就發展到27萬人，手上都有槍。「百萬雄師」就是「紅武兵」發起的。一號頭頭也是俞文斌，市武裝部派兩名警衛戰士24小時保衛他。

²³「武老譚」即武漢的「譚震林」，因為譚震林在「二月逆流」中鬧得最厲害。1967年春夏，全國各地造反派都反抗當地的「譚震林式人物」——當地鎮壓造反派的軍政領導人。

1967年5月1日，「香花派」和「毒草派」在武漢三鎮聯合舉行大規模的游行。游行隊伍高喊：「陳大麻子算老幾，老子就是敢揪你，抽你的筋，剝你的皮，看你復辟不復辟！」面對造反派的聯合抗爭，由武漢軍區支持、市人武部等籌辦的「百萬雄師」于5月16日正式成立。參加「百萬雄師」的保守組織有四、五十個，人數約92萬人，後來發展到129萬人。6月4日搬到中共武漢市委大院辦公，市委100多位老干部集體亮相支持，²⁴他們的口號是「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牛鬼蛇神」名義是指「地、富、反、壞、右」，實際是指造反派。

6月4日，武漢部隊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公告〉（即「6·4公告」）。「6·4公告」指出，當前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不得把矛頭指向解放軍。「6·4公告」發布后，百萬雄師加緊了對造反派的武裝打擊，發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6月17日，百萬雄師在漢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一帶殺死造反派群眾多人。²⁵6月24日，百萬雄師武裝攻打「工造總司」，同時攻打漢陽軋鋼廠和位于武昌楊園的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工造總司」成員被殺死28人，重傷60余人。²⁶

在強大的壓力下，武漢造反派在自己組織的名稱前面加了一個「鋼」字：「鋼工總」、「鋼9·13」、「鋼二司」，合稱「三鋼」。與「三鋼」并肩戰鬥的是「三新」：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鋼」和「三新」經常組織數十萬人的抗議游行。著名詩人白樺是現役軍人，他在「百萬雄師」圍攻造反派的武斗現場散發他的組詩：〈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這些詩被抄成大字報貼遍武漢三鎮。作家姚雪垠寫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詩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油印成小冊子散發。他把3月21日武漢軍區發表鎮壓通告這一天稱為「新馬日」，比作1927年湖南長沙軍閥何鍵鎮壓革命群眾的「馬日事

²⁴ 榮根：〈武漢「7·20」事件40周年——「百萬雄師」頭頭翁文斌、章迪傑探訪記〉。

²⁵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第34頁。榮根：〈武漢「7·20」事件40周年——「百萬雄師」頭頭翁文斌、章迪傑探訪記〉中說，指揮這場武鬥的「百萬雄師」江漢分站沈浩然說死了23人。

²⁶ 吳炎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電子版）。

變]。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北京的「文革」是學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革」，武漢的「文革」則是學生與工人聯合的「文革」。²⁷這話有道理，但還得加一個特點：武漢的造反派因奪權而分裂為「香花」和「毒草」兩派以後，又重新團結起來反抗鎮壓他們的軍隊，這在全國是少有的。

7月1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達武漢，周恩來還通知在西南處理昆明、成都、貴陽問題的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到武漢。毛澤東坐鎮武漢，準備就地解決武漢問題。他們態度鮮明地支持造反派，說「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明確指出武漢軍區犯了路線錯誤。毛、周的態度遭到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的強烈抵抗，釀成了轟動全國的「7·20事件」，當時稱為「武漢兵變」。這一事件使得武漢軍區領導人倒臺，保守派全軍覆沒，一些人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徹底翻身，到處張貼「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標語。這個事件深深刺激了毛澤東，開始他提出「武裝造反派」，同時又怯於軍方鬧事，調整了完全支持造反派的指導思想。關於「7·20事件」本書另辟一節敘述。

「鋼派」和「新派」實現大聯合

「7.20事件」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打倒，中共中央讓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原沈陽軍區副司令），政委劉豐（原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空降兵15軍軍長方銘，政委張純青主持湖北、武漢的工作。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是「曾、劉、方、張」為首的軍人掌權。

「7·20」事件後，造反派得勢，百萬雄師鳥獸散，其成員在一些單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報復。由於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外面壓力消失，「鋼派」和「新派」的矛盾又突顯出來。

「鋼工總」是中央點名的、全國有名的「響當當」的造反組織，他們希望全市所有的造反組織都在「鋼工總」的旗幟下實現大聯合，提出了「鋼化江城」的口號。「新派」認為，我們提著腦袋為「工總」翻案，死了那麼多人，朱鴻霞沒有半句感謝的話，還要收編我們，這辦不到。工造總頭頭吳焱金建議「新派」工人組織建立統一思想、統

²⁷ 王海光：〈武漢「文革」的口碑歷史——《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序〉。

一行動的「新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司令部」（「新武漢」）。軍方沒有批准，周恩來也批評了這一行動。「鋼化江城」沒有實現，「新武漢」胎死腹中。

1967年10月8日，周恩來陪同來訪的外賓來武漢，抽空接見了武漢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周恩來說：「我說以鋼派為主實現大聯合，鋼派就歡迎，新派不高興；我說以新派為主實現大聯合；新派歡迎，鋼派不高興。我看還是不要鋼，不要新，成立一個革命的工代會好不好？」結果全場熱烈鼓掌，周總理說：「大家通過了，就這樣聯合起來，你們高興，我也高興。」²⁸

在周恩來的推動下，武漢造反派籌備成立工代會、農代會。在「曾、劉、方、張」的領導下，造反派頭頭和軍隊幹部開了多次會議，最終達成協議，實現了大聯合。1968年1月20日，武漢市革委會正式成立。方銘為市革委會主任。8位副主任中，軍人3人，幹部3人，「鋼派」工人1名，「新派」工人1名。27名常委人，軍人5人，幹部5人，其餘「鋼派」和「新派」的群眾代表。1月22日，《人民日報》就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雄的武漢人民熱烈祝賀〉。

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委會成立。主任曾思玉，副主任有劉豐、張體學，還有幾名造反派頭頭成為副主任。《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長江萬里起宏圖〉。

進入革委會的群眾組織代表大多沒有實權。「鋼工總」頭頭朱洪霞雖然任省革委會副主任，實職卻是湖北省防汛抗洪指揮部總指揮；「鋼9·13」頭頭李想玉雖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實職卻是武漢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工造總司」（新派工人造反組織）頭頭吳焱金亦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實職卻是武漢市修舊利廢辦公室主任；至于學生組織「新華工」、「鋼二司」頭頭張立國、楊道遠名義上是省革委會副主任，實際只有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革委會主任的實職，1968年秋「工宣隊」進校后，他們都回到班上接受「再教育」。

「復舊」和「反復舊」

²⁸ 吳炎金口述、鍾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電子版）。

革委會成立以後轉向斗、批、改，按「十六條」規定，斗，是斗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而武漢的斗批改卻針對造反派。工造總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焱金的感受是：「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謂資產階級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級革委會；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臺，將走資派扶上去。」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革委會沒有制度創新，文革前的官僚勢力占主導地位，軍人和官僚看法一致。當然，與造反派桀傲不馴也有關係。

1968年，很多單位利用「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整造反派。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準學習班」（將造反派集中起來，不準打電話、不準打電報、不準寫信、不準外出、不準會見來訪人員），大批造反派代表成了項目審查對象，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當局認為造反派掌權的單位是「馬蜂窩」，要「捅」掉。很多單位出現了「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²⁹

1969年4月10日，在漢口市中心水塔貼出了朱鴻霞、李想玉、吳焱全三人署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高調發出了「反復舊」的號召。他們認為，「復舊」就是恢復舊權力機構舊的辦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把造反派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就是把造反派趕出各級革委會。這張大字報迅速轉抄到武漢三鎮，又鉛印大量散發。造反派紛紛響應。朱、李、吳還在武漢三鎮作了十多場「反復舊」的報告，每場聽眾都是數萬人。4月27日在漢口中山大道工藝大樓門前召開反復舊誓師大會，到會有十幾萬人武漢反「反復舊」運動達到了高潮。

「反復舊」期間，正逢中共的「九大」召開。4月29日上午，中央請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楊道遠、張義國五人到北京去解決武漢問題。5月2日，中央令胡厚民等省、市革委會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眾組織代表到京，1969年5月份一個月內，周恩來和其它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四次接見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群眾帶表。中央領導人嚴厲批評了「反復舊」行動。康生說：「現在形勢大好，復甚么

²⁹ 吳焱金口述、鍾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電子版）。

舊？黨的九大召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嘛，你們是反哪個的復舊？」³⁰5月27日晚上，中央領導人第四次接見武漢造反派領袖時，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復舊』問題的報告」〉（中發〔69〕28號），中共中央認為，「所謂『反復舊』運動，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把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置于市一切之上，這樣做，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一元化領導的教導的。」此后，「反復舊」偃旗息鼓，但造反派與革委會的對抗情緒沒有消除。

「北決揚」案和清查「5·16」

在文革之初，伴隨著造反大潮就有一股「新思潮」的進展，「新思潮」紛紛出現。隨著文革的進展，「新思潮」紛紛出現。³¹1967年秋天以後，隨著「大聯合」和「三結合」的推進，造反運動漸入頹勢，被打倒的幹部逐漸恢復職務，造反派頭頭們卷入了革委會的席位之爭，革委會並沒有使政權帶來新氣象，很多人失去了方向，逍遙派越來越來越多。一些對文革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們感到困惑，他們開始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我們以極大熱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何在？文化革命如何繼續下去？中國向何處去？1967年秋，毛澤東一段話激發了青年人思考和探索，他說「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夠思考問題而不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為曇花一現的人。」³²然而，在毛澤東時代，民間很難接觸到其它思想，能閱讀到的就是毛澤東的著作和馬列著作。「新思潮」還是來源於馬、列、毛，當然是馬、列、毛著作中批判社會的一面。這些表達「新思潮」的文章詞鋒犀利、文

³⁰ 吳炎金口述、鍾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電子版）。

³¹ 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生喬兼武合社文革貼出大字報〈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文博貼出大字報〈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不就，他又和其他學生一起貼出大字報〈大大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革新社會主義制度〉。1967年6月11日，北京中學紅衛兵「四三」派貼出理論文章〈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1967年周全鏗〈四一四思潮必勝〉等。

³² 抄自我當年的日記。這段話當年對我很深的觸動——一本書作者。

采飛揚，表現了作者非同凡響的才華和學識。當然，異端思想一旦成為思潮，就會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就會突破毛澤東思想的局限成為它的對立面。革委會成立以後，「新思潮」表達了青年們對文革現實的不滿，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林彪，周恩來乃至毛澤東，甚至整個社會體制。在武漢出現的「北決揚」也屬此類。

以華中工學院學生魯禮安、馮天艾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北斗星學會」，並在漢口水塔民主牆上張貼了〈北斗星學會成立宣言〉。宣言的結尾說：「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將是誰主沉浮？」魯禮安等人12月下旬又組織了「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出版了《揚子江評論》。社會上稱他們為「決派」，當局後來把他們簡稱為「北決揚」。他們的人數最多時才20多人，沒有甚么聲勢，但其思想很有穿透力。「他暢快淋漓的文章、唇槍舌劍的辯才、揮斥方遒的意氣、俠肝義膽的豪情，曾經成為武漢三鎮的傳奇。」³³他們觀點激進，公開批革命委員會、批軍區、主張武裝斗爭、批周恩來、批張春橋。由於他們走得太遠，鋼、新兩派頭頭都不支持他們，新華工等還批判過「決派的極左思潮」。

中共中央看到了這股思潮的危險。9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文件〈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中發（69）67號），文件說「北決揚」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必須堅決取締」。說《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縱的反動刊物，必須查封」。這個文件提出「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

這個文件無端構陷這些青年人，顯示了中共中央穩定革委會的急切心情。「7·20」事件後，武漢的造反派強大到難以駕馭，中共中央借曾思玉、劉豐鐵腕軍人的手，以清理階級隊伍、清查「北決揚」和「5·16」的名義對造反派狠加打壓。1968年5月17日，魯禮安到黃石市為印刷《揚子江評論》找紙張，在鐵山被新派抓獲，長達十一年

³³ 著名作家方方為魯禮安《仰天長嘯》一書所作的序言。

的關押沒有審判，1979年宣布免予起訴。馮天艾也在監獄里關押十年。湖北的清查運動長達四年，至1973年底基本結束。據當時統計，作為「5·16」、「北決揚」被審查的共33,659人。³⁴另有資料說整了60萬人。³⁵

為了克服「派性」，中央又把造反派頭頭集中到北京加以整治。1969年11月5日，武漢市抽調有關人員及鋼、新兩派大小頭頭共1,319人到北京，集中在空軍學院，參加中央開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加上中途也加入了北京學習班的共1,600人）。在學習班上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據陳伯達的指示，要「上掛劉（劉少奇），下聯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燒頭」，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錯誤和罪行，深入揭、批「北決揚」和「5·16」，對造反派的頭頭，批判、逼供、誣陷。先是將鋼工總頭頭、漢陽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劉萬泰、鋼「9·13」頭頭張鵬程、工造總司頭頭、武漢市革命委員常委王錦銘3人定為現行反革命，在全體學員大會上批斗后宣布逮捕，押回武漢。后来又將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逮捕押解回武漢批斗后關押。1970年6月底，長達八個月的北京學習班結束了，他們分別回到各自的單位繼續作檢查，接受群眾的批判。

1971年「9·13」事件后，劉豐被定為林彪死黨，自殺未遂，被開除黨籍。曾思玉被定為林彪「活黨」，繼續在湖北工作。1973年1月6日，中共武漢的「三支兩軍」軍代表回到部隊。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曾思玉與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換了位置。趙辛初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

在1974年1月28日的10萬軍民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之后，造反派一度翻身。3月2日，省市公安機關釋放胡厚明，李想玉等人，3日，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汽車游行，慶祝胡、李獲釋。一部份造反派參加了「反潮流」游行，獲釋的造反派頭頭恢復了他們在省、市革委會的職務。胡厚民被「補臺」到省總工會任副主任。1975年初至1975年底鄧小平搞治理整頓，造反派頭頭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

³⁴ 吳炎金口述、鍾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電子版）。

³⁵ 曾思玉，張禮學都說過60萬。

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接下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造反派頭頭們又活躍了一陣。1976年10月6日，北京逮捕王、張、江、姚「四人幫」，12月28日，湖北「四人幫」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被捕。夏邦銀，中共黨員，第九，十屆中央委員，原漢陽軋鋼廠工人，判刑十三年，2001年逝世。朱鴻霞，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判刑十五年。胡厚明，中共黨員，武漢造船廠工人，省革委會常委，判刑十三年，死于獄中。張立國，共青團員，華中工學學生，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判刑十三年。其它造反派頭頭也判了重刑。二司頭頭楊道遠判十二年，刑滿后經商，因收中介費3萬元，以貪污罪判刑十五年，共坐牢二十七年。任愛生，原中共湖北省委委員，省農村工作部主任，「文革」初期堅定地支持造反派，支持「鋼工總」，后任省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后期被判刑。

四、貴州：雷聲不息³⁶

貴州是全國第四個實現「一片紅」的省份。《人民日報》為貴州奪權勝利發表了題為〈西南的春雷〉的社論。但是，革委會成立后，貴州依然是雷聲滾滾。

從「6·6事件」到革委會成立

貴州的「四清」是在劉少奇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貴州「四清」工作團認為，「貴州已爛掉了」，「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四清后改組了中共貴州省委，省委第一書記周林下臺，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1965年1月，毛澤東找西南局幾個負責人談話，并當即對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貴州省委周林復職」。李井泉把周林安排為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賈啟允為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取代了李大章。

1966年5月，由賈啟允任第一書記的中共貴州省委，把「四清」時就遭過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汪小川拋了出來，作為貴州

³⁶ 這一段內容依據鄧振新：《貴州風雲》，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香港，除關鍵資料外，不再注明頁碼。

「文革」第一個犧牲品。

年6月6日,《貴州日報》用三個版面刊登了長篇署名文章〈解決拔掉汪小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本質〉,文中的小標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省略了主語「汪小川」。貴陽五中有學生蒙住內文突出小標題,就說「這些小標題是反動標語」,得到很多師生認同。自從1964年開展全民革命大批判以來,青年學生睜大眼睛尋找「階級鬥爭新動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當天傍晚6、7點鐘左右,五中師生將《貴州日報》報社圍困起來,要求報社交出在《貴州日報》上刊登反動標語的反革命分子。要求郵局停售當天「刊登有『反動標語』」的《貴州日報》。並張貼大字報,認為批汪小川是「舍車保帥」,提出要「徹底揭露省委『舍車保帥』的陰謀」,「徹底揭開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同日,貴陽師範學院出現批判貴州省委的大字報。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開緊急會議,把向省委和報社寫「質問信」、貼大字報等行動定為「6·6反革命事件」。

省委抽調幹部130人組成7個工作組和一個觀察組分赴8所大專院校,對「6·6事件」全面反擊。據不完全統計,在「反擊」中,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關押、勞改。至7月10日,貴陽地區被迫自殺的達189人,其中身亡107人。³⁷

貴陽醫學院是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的文革試點。這個院黨委是四清後新建立的。在「6·6事件」中大抓反革命,教職工總數的15.9%的人被批斗。賈啟允緊跟毛澤東,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師生平反。8月22日,賈啟允派人到貴陽醫學院召開大會,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紅旗」。貴醫「紅衛兵·紅旗」是由被省委平反的人為骨幹,擁護省委、反對院黨委。

6月27日,南下串連北京學生「炮轟」中共貴州省委,貴陽部份學生響應,形成了「炮轟派」。貴陽醫學院保黨委的師生成立了「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成立,站在反對省委的「炮轟派」一邊。

月31日晚,首都南下串聯學生和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

³⁷ 鄧振新:《貴州風雲》,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44頁。

所、貴州師範學院等 200 多人造反。省委組織數千人圍攻造反者，地化所有 11 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書記被迫自殺。地化所是 1966 年 2 月從北京搬遷到貴陽的。這裡集中了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和北京聯系密切，在貴州造反中起了重要作用。

9 月 5 日，3 千多名學生到省委要求賈啟允接見，要他回答問題。省委組織 12 萬人，對學生進行分割、圍攻、斗爭，高呼「打到牛鬼蛇神」的口號。省委的這一作法激起了更多人造反。

9 月 15 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在北京見到了毛主席的貴州學生，回到貴州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大多以 9 月 15 日這一天命名。如貴州工學院「9·15 紅衛兵團」、貴州大學「9·15 革命造反團」。

為了應對炮轟派的沖擊，按照賈啟允指示，9 月 8 日成立了貴陽市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9 月 28 日又成立紅衛兵糾察大隊。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擔任紅衛兵總隊的政治輔導員，不久就成為省文革領導小組成員。

10 月 9 日，在首都南下串連紅衛兵的幫助下，貴陽地區大中專學生成立了炮轟省委的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

10 月初，工人造反組織「毛澤東思想工人紅衛軍」（簡稱「紅衛軍」）成立。「紅衛軍」迅速發展成勢力最強大的工人群眾組織，號稱 33 萬之眾，頭頭李鐵乃是貴陽市一家汽車修配廠的工人。省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李再含公開支持「紅衛軍」。

按賈啟允指示，于 11 月 15 日正式成立了貴州省工人糾察隊。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工人糾察隊力保省委。他們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賈書記是焦裕祿式的好書記」。造反派的口號是「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11 月底，炮轟派成立了「貴陽市統一行動指揮部」，紅衛軍、地化所等所有炮轟派組織都參加了。這是貴州造反派大聯合的最初形式。

李再含成為省文革小組成員以後，先後向中央文革和林彪發出 18 份反映省委情況的電報，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贊賞和支持，12 月

10日，李再含在給林彪轉毛澤東、黨中央的一封電報中說「省委已完全癱瘓」，「全盤機器已完全失靈」，「有影響三線建設的危險」等。

12月3日，貴陽市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開車壓死兩名「紅衛軍」工人，市公安局沒有及時出面處理。李再含為了取得「紅衛軍」的信任，將市公安局長王玉奎撤職，并帶頭簽字同意在全市停產三天，游行追悼。次日，造反派「統一行動指揮部」舉行追悼會，李再含與賈啟允聯名送花圈，并致悼詞，還追認這兩名死者為「烈士」。事后，「紅衛軍」要求解散「工人糾察隊」，把躲在省軍區地下室的賈啟允揪出并扣押起來，轟動省城。「紅衛軍」聲威大震。李再含和「紅衛軍」頭頭李鐵乃被人們并稱「二李」。此時，「二李」是反對省委的風雲人物。

12月5日，「紅衛軍」以查抄「黑材料」的名義，從《貴州日報》社抄出很多材料運回總部。李鐵乃聲稱掌握了李再含的「鋼鞭材料」，說「李再含比賈啟允更壞」。「二李」之間的關係起了變化，李再含對李鐵乃的態度變為「一看、二幫、三警惕」。

12月27日，李再含找李鐵乃和地化所造反派頭頭徐英年到省軍區商量大聯合問題。李再含讓李鐵乃把領導權交給徐英年。李鐵乃不同意，不久就宣布退出「統一行動指揮部」，另行成立了「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有「紅衛軍」、「赤衛隊」等74個大小組織參加、并舉行了「打倒折衷主義」大游行。

1967年1月初，李鐵乃經昆明、重慶前往北京告狀、在京貼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標語，舉行了記者招待會。1月3日，李再含從「紅衛軍」中扶持另一個頭頭成立「紅衛軍造反聯絡站」。

1月20日，李再含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文革發出電報，電報說「紅衛軍及其頭頭把斗爭矛頭任指向軍隊，綁架戰士并奪走武器彈藥……」21日，根據李再含的電報，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了李鐵乃，押回貴陽批斗。李鐵乃從此經歷了十五年的鐵窗生活。「赤衛隊」的黃世明、「貴州兵團」的施其利等工人群眾組織的頭頭也在貴陽被捕。這些工人造反組織的總部被瓦解。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對李再含的電報批示：「總理：似應將李再含、軍區司令員、省委個別革命干部及若干群眾革命造反派的可

靠領袖，共若十幾人，找來北京，加以研究，確定政策，然後叫他們回去執行。請與文革小組商量決定。每個省市似可都照著樣辦。一個一個地解決。」³⁸

根據毛澤東批示，1月24日，周總理派飛機接李再含、何光宇等貴州代表團12人到大北京。25日至30日，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先後五次接見貴州代表團。

1月25日，貴州省和貴陽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行動，奪取了中共貴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貴陽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權，成立了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表了〈奪權通告〉。

1月26日凌晨，貴州某師部隊和省公安廳，查抄了「紅衛軍」總部和「紅衛軍」甘蔭塘分部，抓了100多人。省軍區認定「紅衛軍」是反革命組織。

1月27日，貴陽煤礦發生保守組織「工人糾察隊」向紅衛軍「反奪權」，「紅衛軍」有54名成員被捆綁吊打。貴陽鋼鐵廠、貴州水泥廠等單位也發生類似事件。這些單位早些時候被「紅衛軍」奪權，「工人糾察隊」反奪權後紛紛到省軍區報喜。

1月28日，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貴州代表團。聽了省軍區司令員何光的介紹後，江青說：「李鐵乃是流氓！他想當西南王。情況我們搞不清楚，我們是根據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況和電報決定逮捕的。」代表團中的南下串聯的北京紅衛兵反映了「紅衛軍」在貴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來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遭遇。江青說：「紅衛軍當然不是反革命組織。對廣大群眾，不能這樣說。主要頭頭已經抓了。」

2月1日，《人民日報》以「西南的春雷」為題發表社論，祝賀貴州奪權勝利。貴州是全國第四個奪權的省份，僅在黑龍江、上海、山西之後。

1月13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擔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紅色政權」的反對派

³⁸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6頁。

李再含總結的貴州奪權經驗是「上奪下掃，左右開弓」，其含義就是：上奪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的權，下掃李鐵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擊「紅衛軍」，向右打擊「工人糾察隊」。奪權期間「紅衛軍」總部被瓦解，「工人糾察隊」宣布解散。

「上奪下掃，左右開弓」是一種鎮壓政策。據不完全統計，1967年2、3月間，全省有52萬群眾的218個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有2千多人被關進監獄。這就是貴州的「二月鎮反」、與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貴州的「二月鎮反」是新成立的革委會實施的。

鎮壓必然帶來反彈。李再含用再鎮壓來消除反彈。

2月26日，李再含出動2千余人，其中有三個連的武裝部隊，對貴州醫學院「紅衛兵·紅旗」進行反奪權（由于這個組織最早反對黨委，成了該校的掌權者）。被反奪權的「紅衛兵·紅旗」當天就成立了反對省革委會的貴醫「2·26兵團」。

3月3日，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貴州報》發表社論稱「我們就是要行使鎮壓之權」，進一步壓制革委會的反對派。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后，李再含決定召開貴州省紅衛兵代表大會，用革委會的力量把紅衛兵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但他無法處理已經分裂為兩派的紅衛兵組織。

例如，貴陽醫學院一派是貴醫「紅衛兵·紅旗」（「貴醫2·26兵團」），其群眾基礎是「6·6」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因「文革」初期「內革外保」（反校黨委、保省委），不讓他們參加貴州省奪權另一派是「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但因他們「內保外革」（保校黨委、反省委），在社會上獲得造反派身份，參加了貴州奪權。在籌備省紅代會時，貴陽醫學院被允許參加省紅代會的只有「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紅衛兵·紅旗」（「貴醫2·26兵團」）被排斥在省紅代會之外。

4月10日省紅代會在貴陽市六廣門體育館舉行開幕式，貴醫「2·26」兵團、「東方紅」戰鬥團和貴陽六中「狙擊兵」沖擊會場。4月11日，省紅代會在軍隊掩護下繼續開會。貴陽師範學院、貴州工學院、貴州大學、貴州農學院、貴陽市六中等支持貴醫「2·26」的行動，吹起沖鋒號，再次沖擊會場，會場頓時混亂，代表們紛紛離場。接著，反對派游行示威，要求省紅代會休會，省革委會拒絕接受休會

的意見。4月12日，要求休會的紅衛兵在貴陽市舉行示威游行，人數達一萬多人。

4月12日晚，省革委調動了解放軍、公檢法和支持革委會的群眾，舉行了數萬人的示威游行，口號是：「紅代會，好得很，堅決支持開下去！」「打倒無政府主義！」「誓死保衛紅色政權！」。4月13日和4月17日，省紅代會第三次、第四次被沖。沖擊者高呼口號：「紅代會，大雜燴，不能開，快休會」。這就形成了「支紅派」和「反紅派」。

省紅代在4月20日宣布結束，產生了45名委員，成立了由9人組成的常設委員會，都是從「支紅派」選出來的，更加劇了「支紅派」和「反紅派」的對立。

4月11日沖散紅代會后，要求休會的各校隊伍未解散，而是從六廣門游行到郵電大樓前廣場開大會。在會上簽到的有77單位，成立了「4·11」紅衛兵聯絡站，從此形成了省革委會的反對派——「4·11」派。

李再含說「與『4·11』斗爭是路線斗爭。是左右派的較量」。4月18日，貴州省公安廳拘留了貴陽醫學院教師李吉杰，說他是「貴醫2·26沖紅代會的黑后臺」。5月13日，由17所院校組成的紅衛兵代表200多人前往省公安廳，要求釋放李吉杰。沒有達到目的人們進入公安廳禮堂靜坐示威。李再含說參加靜坐的男生是「沖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5月19日，李再含在貴陽市郵電大樓前廣場的萬人大會上發表講話，宣布對「4·11」要刮「十二級臺風」，揚言要在半個月內，將「4·11」徹底摧垮。

李再含在已成立革委會的地區和單位普遍成立「捍紅中心組」、「保衛紅色政權聯絡站」、「衛紅兵團」等等，形成了遍及全省的自上而下的、跨行業的「支紅派」隊伍。廣泛宣傳「『4·11』的要害在于反奪權」、「攻擊紅色政權」、「要搞垮省革委」。省革委會辦事機構和各部門中持「4·11」觀點工作人員，都被清除出去。各大中學校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進行重新登記，凡「4·11」觀點的一律取消紅衛兵資格。

為了成立支持李再含的「新貴陽醫學院革命委員會」，省革委調動了一萬多人保衛成立大會會場，貴醫「2.26」奮起反抗，雙方發生

衝突，90人受傷，3人重傷。5月27日，在貴陽師範學院，李再含強行成立第二個一派掌權的革命委員會，布置了兩個假會場作掩護。6月2日，李再含緊接著又在貴州大學成立第三個一派掌權的革命委員會，調來公檢法等外單位人員三千多人保護會場、布置了兩個假會場作掩護。上述三所高校一派掌權的革委會的成立，通過《新貴州報》的大力宣傳，成為全省各單位、各縣市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樣板。

支持省革委會的學生組織「支紅串連會」成立不久，與其對立的群眾組織紛紛成立。6月8日，貴陽市大中專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4·11兵團，貴陽地區工人支持「4·11」聯絡站同時宣告成立。8月中旬，支持「4·11」的各個工人組織聯合籌建了「貴陽地區4·11工人兵團」。

為了「保衛紅色政權」，李再含組織了專業武斗組織「貴州8·18兵團」，對「4·11」進行武力圍剿，僅在貴陽地區從4月18日至8月16日的四個月內，就先后調動2萬多人進行了十三次圍攻，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1967年8月，省革委會在「打倒劉鄧陶，踏平4·14」的口號下，對反革委會的群眾組織進行大規模的圍攻。這個行為被稱為「八月踏平」。

「八月踏平」使得「4·11」學生、工人和干部，紛紛外逃。外逃的6萬多人，他們分別在北京、上海、武漢、鄭州、徐州、長沙、株洲、衡陽、桂林、柳州、昆明、重慶、成都以及烏魯木齊等地、向公眾揭露李再含在貴州武裝一派、鎮壓一派的作法，堅持同李再含作鬥爭。

1967年11月，「4·11貴陽前線指揮部」在貴陽秘密成立，以「隊自為戰」和「人自為戰」的方式開展地下鬥爭。

1967年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貴州『4·11』全省代表大會」在北京清華大學主樓舉行，在清華大學成立貴州「4·11」總司令部。并和貴州的「4·11」地下組織保持聯系。

年3月6日上午「4·11」地下組織在貴陽市郊華家山開會，上午9點多鐘，「8·18兵團」出動了近1千人，荷槍實彈，把華家山團團包圍，由山腳往山頂搜捕。「4·11」到會200多人，除少數突圍外，被抓住170多人。

對「4·11」的鎮壓，保證了地、縣革委會的建立。1968年4月14日，全省85個縣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些革委會大多是一派掌權，因而很不穩定。

李再含下臺，藍亦農主政

1968年11月18日前後，在貴州的野戰部隊換防。原來在貴州的支左的7611部隊（49師）調到雲南省保山地區，0276部隊（41師）從雲南調到貴陽。新來的部隊支左方向和原來的部隊不同。「貴陽地區4·11兵團」很快重建，在不少地方建立了「據點」，繼續同李再含進行鬥爭。貴州形勢更趨複雜。

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決貴州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軍委發出〈對貴州省當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給貴州部隊的指示〉，指示內容各有五條，人們稱之為「雙紅五條」〈對貴州省當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要繼續鞏固和發展已有的革命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和「要堅決支持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擁護新生的紅色政權」。為了緩和矛盾，李再含把關在監獄里「4·11」幾個頭頭放了出來、解散了武斗組織貴州「8·18」兵團。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針對山西和全國造反派的布告（簡稱「7·23布告」），要求制止武斗、懲辦壞人和恢復生產。李再含以落實「7·23布告」為由，下決心在8月份之前拔掉「4·11」據點迎國慶，開展了對「4·11」的據點的武力圍剿。7月29日，在貴陽市林庵廣場發生了大規模流血事件，打死54人、傷100多人。

1969年8月下旬，周總理在看過新華社記寫的調查材料後，將貴州省、地區的頭頭87人調到北京進學習班、由中央直接領導解決問題。

9月2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在呈送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由於李再含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使省軍區領導人之間長期分成兩派。41師和獨立師，軍分區、人武部內嚴重對立，各支一派，這是貴州問題長期未能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因。

年10月19日凌晨，中央領導人接見貴州匯報團時嚴厲批評了李

再含。周恩來說：「造成目前這種情況，就是省革委核心組織對抗毛主席，對抗中央，這種對抗就是兩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個典型」。「可以告訴你李再含，中央在某種程度上對你失掉了信任。雖然沒有完全失掉。你過去反對李井泉、賈啟允，還有點功勞，但你尾巴翹到天上去了，那么霸道，一次講話、插話，就搞掉 18 個縣革委。我們聽了毛骨悚然！就連李立三也沒敢這樣膽大妄為。」陳伯達、康生也嚴厲批評了李再含。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下達（69）71 號文件，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奪權以後，大權在手，頭腦膨脹，逐步陷入了資產階級派性，搞兩面派，鬧『獨立王國』，對抗中央，鎮壓群眾，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個文件宣布：調昆明軍區副政委藍亦農兼任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調 43 軍軍長張榮森擔任貴州省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並統一領導全省駐軍支左工作。

為了落實中央（69）71 號文件，1969 年 11 月至 1970 年 4 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舉辦貴州問題學習班，全省共 2,019 人參加。兩派頭頭都作了自我批評，促進各派群眾組織大聯合。「4·11」主動解散了組織。

1975 年 5 月 17 日至 22 日，省革委會舉行「補臺」協商會議，對省革委會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5 月 23 日，中央中央批准貴州省革委會補臺意見：

藍亦農為貴州省革委會主任，張榮森為第一副主任，副主任多達 15 人。「4·11」補臺進入省革委會的委員 9 人，其中副主任 1 人，常委 2 人。撤銷李再含貴州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貴州省革委會主任職務。5 月 20 日，中央軍委發出命令，撤銷了李再含在軍內一切職務。

1971 年「9·13」事件後，全國各地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藍亦農說，我不會「賣友求榮」，對批林持消極態度。1972 年 9 月 3 日，中央令貴州的藍亦農、張榮森、賈庭三等 13 人到北京，在中央領導人指導下，對全省批林整風匯報會議進行了總結，9 月 15 日中央發出關於貴州省的「中發（72）38 號文件」。文件指出：「藍亦農、張榮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黨集團一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

誤。藍亦農同志的錯誤更嚴重。」藍亦農調離貴州，下放勞動。

1972年9月16日，中央決定調魯瑞林到貴州工作，任解決貴州問題工作組組長。197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魯瑞林任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委員主任。1977年2月，魯瑞林在貴州工作五年後離任，馬力接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這些都是后話。

五、重慶：炮火連天³⁹

重慶是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幣和水陸交通樞紐。抗日戰爭時期，南京淪陷之後，重慶是中國的陪都。文革前夕，重慶是四川省轄市，轄八區三縣，人口400多萬，是當時的全國八大城市之一。

文革之初，中共重慶市委仿效北京的作法，揪「三家村」、打「黑幫」，《重慶日報》副刊《巴山漫話》雜文專欄主持人和作者被打成了「三家村」，將1963年已受到批判處理的所謂「蕭、李、廖⁴⁰反黨集團」定為「三家村」的「黑后臺」。6月21日將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定性為「黑幫」，在《重慶日報》上點名批判。市委派出200多人的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校、系兩級領導幹部90%以上「靠邊站」，發動師生員工揭發批判校領導人。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央文革成員穆欣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文中說到「周揚的一個追隨者攻擊魯迅」時，在注釋中點明，這個周揚的追隨者就是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任白戈。《紅旗》雜誌這一條注釋使任白戈當即下臺。書記處書記魯大東代理第一書記主持重慶工作。

保守派 造反派

按市委領導的布置，1966年8月24日，重慶全市各大專院校統一成立了赤衛軍。9月3日，經重慶市委「建議」，重慶市毛澤東主義

³⁹ 這一節的資料來源除注明外均系採用何蜀先生的《重慶武鬥大事記》和他的專著《為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

⁴⁰ 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副秘書長李止舟、辦公廳主任兼團市委書記廖伯康。

紅衛兵成立。9月15日，重慶市委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將中學生紅衛兵合并，統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根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指示，成立了重慶工人糾察隊。重慶還有一個文化系統的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革命軍」。

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工人糾察隊和文藝革命軍這四大官辦組織，被造反派群眾譏稱為「保皇四軍」。

破「四舊」、抄家是主要保守派組織的行為。據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統計，全市共有13,160戶「牛鬼蛇神」被抄家。

重慶造反派最早的發源地是重慶大學，與其它地方不同的是，重慶大學的造反派不是反對校領導，而是為校長鄭思群鳴不平。鄭思群，早年留學日本并參加中共，行政七級幹部，在學生中有很高威望。鄭被重慶市委正式點名批判后，市委工作組組織師生對其進行了多次批判圍攻。8月2日凌晨5時，鄭用半片剃須刀割頸動脈自盡。8月3日晚，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市委領導人魯大東到場宣布市委決定：鄭思群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開除黨籍。8月3日晚，電機系學生周孜仁貼出大字報：〈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接著，貼出了很多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直接批評市委工作組和市委的大字報。8月13日，周孜仁起草的號召向市委造反的大字報得到全校數千人的簽名。從而形成了學生周家喻、查正禮、熊代富、黃順義為骨干的造反團體，反對工作組的一派占優勢。

8月15日，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反工作組一派師生向重慶大學求援，重慶大學數千師生前往聲援，與師範專科學校保工作組一派展開辯論，附近學校的學生和居民也加入辯論，雙方爭執不下，聚集了4千多人。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前來解決問題，被造反學生們糾纏至深夜。這稱為「8·15」事件。1966年8月26日，重慶大學造反派以這個日子為名成立了「8·15戰鬥團」。

9月3日，位于重慶市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成立了造反派學生組織「8·13戰鬥縱隊」。9月29日，造反派的重慶市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成立，10月更名為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小說《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于9月2日成立了重慶市文聯紅衛兵戰鬥組。使文聯成為重慶市最早實現了造反派奪權的單位。

重慶最早的造反者都受到黨委或工作組組織的圍攻、揪斗、游街、強迫請罪，一些頭頭被打成反革命。南下串聯的北京學生的，如首都三司的紅衛兵支持他們。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是在造反派學生支持下建立起來的。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于1966年9月30日成立，頭頭黃廉是復員軍人。文革初期，他被本單位批斗、關押。北京南下串聯紅衛兵將他揪出來參與文革運動。

進入10月，在批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被鎮壓的造反派紛紛起來批判各級當權派。

10月11日晚上，100多名工人到市委請願，要求市委領導承認「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是合法的群眾組織，要求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市委領導拒絕接見和答復他們的要求。10月15日，「工人造反軍」600多人的「北上告狀團」步行北上。重慶市委聯系重慶駐軍派出軍車，將告狀團全部送到永川火車站改乘火車北上。「北上告狀團」人員在北京參加了11月3日舉行的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和游行。11月中旬，在北京鼓足了信心和勇氣的「北上告狀人員」回到重慶后，正式成立了「工人造反軍總部」，很快發展為重慶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

到了11月下旬，重慶市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已經形成較大聲勢，同「保皇四軍」分庭抗禮。

1966年12月4日，重慶「工人戰鬥軍」（由李井泉支持的工人糾察隊更名）在大田灣重慶市體育場召開「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造反派認定這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陰謀」，沖擊會場，引起激烈沖突，數百人受傷，還傳出「『工糾』打死造反派」的傳言。這次武斗被稱為「12·4」事件。

隨著批判資反路線的深入，很多與「8·15」觀點相同的造反組織匯合形成了龐大的「8·15」派。在1966年文革之初，54軍是支持保守派的，軍長和政治部主任都奉命擔任了保守派學生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總輔導員，因此還曾遭到「8·15」派的批判。在批判資反路線的大背景下，中央支左命令下達后，54軍轉而明確支持「8·15」派。此時重慶的保守派已經瓦解。

奪權使造反派分裂

1967年1月奪權以後，重慶造反派出現了「8·15」為核心而形成的重慶「8·15」派得到軍隊支持，在全市占主導地位；以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工人造反軍等則與「8·15」派對立。

1967年1月24日到26日，「8·15」派等50多個群眾組織，在54軍支持下，宣布奪取了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組成了以54軍軍代表為首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會」（簡稱革聯會）。2月1日，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南師範學院「8·13」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1·24奪權」是「假奪權」。他們提出「砸爛革聯會」的口號。反對「革聯會」的這一派群眾組織被稱為「砸派」。

2月8日，「1·24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54軍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出任「革聯會」主任。

「1·24奪權」形成了「8·15」派和「砸派」的尖銳對立。由於造反派沒有實現大聯合，「1·24奪權」沒有得到中央承認。

「革聯會」自認為是新生的紅色政權，他們動用專政工具、利用「8·15」派群眾組織，對「砸派」進行鎮壓。從2月中、下旬開始，「砸派」的群眾組織被駐軍、「革聯會」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被查抄、砸爛、圍攻。大批人被逮捕、捆綁、毆打、罰跪、游街。「工人造反軍」頭頭黃廉等被抓入獄。小說《紅巖》作者之一的羅廣斌因反對「革聯會」被逼自殺身亡。從2月24日到3月18日，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群眾組織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公安紅一方面軍」稱，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762個。「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公布，在「二月鎮反」期間，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⁴¹此間重大「8·15」出動20多卡車人員，浩浩蕩蕩開到北碚去，把反革聯會核心組織——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的隊部砸了個稀巴爛。十多

⁴¹ 反到底派重慶公安紅一方面軍：《公安反到底》第7期，1968年2月26日，轉引自何蜀《文革時期重慶群眾組織發展演變概述》

天后，北碚區的駐軍宣布西師 8·31 是「右派組織」，勒令解散，對其核心成員，在學校批斗后實行逮捕。

批判「二月逆流」，「反到底」崛起

196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1967 年 4 月 6 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這兩文件都強調：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兩個權威文件，加上全國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形勢，被「革聯會」取締的群眾組織迅速恢復，受到打擊的人立即活躍起來，組織了「反擊二月逆流，砸爛非法革聯會」的集會和游行。

在二月被抓的「砸派」頭頭從監獄中放出，其中有反到底的頭頭黃廉。他們和 54 軍參謀長耿志剛等軍隊干部一起去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5 月，「砸派」大專院校學生組織「重慶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成立。

1967 年 5 月 16 日，毛澤東批准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中發（67）159 號，重慶人當時稱「紅五條」），這個文件認為支左部隊「是有顯著成績的。他們支持的是革命群眾組織。他們的缺點錯誤在於，在 2、3 月間，……錯誤地支持了一方，壓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門錯捕革命群眾，把一批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文件要求「對被錯誤宣布為『非法組織』或『反動組織』的革命群眾組織要平反，對錯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要釋放、并恢復名譽」，「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并指定 54 軍副政委藍亦農為組長、副軍長白斌為副組長，負責組織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革籌組」）。

《中發（67）159 號》文件回避了兩大派矛盾的焦點「革聯會」，還讓支持革聯會的 54 軍領導人擔任「革籌組」負責人。

5 月 17 日，「砸派」在市內舉行擁護「紅五條」和「歡呼革聯會壽終正寢」的盛大集會游行。5 月 18 日，「8·15」派在市內舉行「誓死保衛革聯會」的示威游行，對「紅五條」未承認革聯會公開表示不滿和抗議。

在 54 軍領導人的勸說下，「8·15」派明白了「革聯會」、「革籌

組」只是名稱不同，實質都是支持「8·15」派的54軍領導掌權，重新舉行了擁護「紅五條」的游行。

「紅五條」下達后，「革聯會」不能再作為「臨時存在機構」存在，將有關工作移交給「革籌組」。「砸派」不承認這個傾向于「8·15」派的「革籌組」。

1967年7月中旬，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劉結挺提議，將「砸派」名字改為「反到底」派。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現。

「8·15」派和「反到底」派成了陣線分明的兩大派別。

全面內戰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斗，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一派。重大「8·15」支持西師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注射麻醉劑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后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一些專業武斗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斗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斗）、302部隊（專事校內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7月1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一院武斗，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于可被鋼釘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于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于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5」派控制的（北碚）紅巖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斗，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斗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斗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

2人，鋼釘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斗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隊使用了私設的電臺聯絡。

7月14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9時發布停止武斗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斗14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千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斗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斗，「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7月25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于連結沙坪壩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一座山坡上，對來往于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學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一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枝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斗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7月27日至28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并向廠外同一派群眾組織擴散。

7月30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斗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斗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5噸，傷亡各一人。

7月31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斗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18間。8月1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斗和進行救護人員遭到槍擊，死2人，傷10人。

8月2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斗，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斗隊3人被擊斃，重傷致殘1人。

「8·15」派占領全廠后，將從家中抓出并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并拖往石灰窯焚尸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8月3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斗。「8·15」派占據的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筑（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斗隊的高射炮擊沉，解放軍3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并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槍殺。

8月5日，「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斗，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斗中死25人，傷數十人。

8月8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斗隊交戰，打死24人，打傷百人，打沉船只3艘，打壞12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8月11至13日，「8·15」派攻打設于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斗，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8月13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斗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金猴」武斗隊被打死10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沖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廠部

隊衝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于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斗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一體。市二輕局大樓位于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7月7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一線展開大規模武斗，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一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余萬元。陳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斗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斗，「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一行30人于下午6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表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余公斤。

參加武斗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一切的革命精神，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斗的特急電報：(1)立即停止對一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并撤除包圍。(2)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3)

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并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一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斗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動大批武斗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斗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臺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7、8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瀰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⁴²。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斗、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斗趨于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千余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崗山」趕出學校后，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一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一派，近于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余人沖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斗，多人被打傷。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沖突，會后游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⁴²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1967年9月5日：中發（67）288號。這個檔在全國各地張貼。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員將返校「復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崗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一樣，分為對立的兩派，一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一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斗又進一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一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一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斗，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桿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斗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

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 10 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6 月 12 至 13 日，兩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斗，死 6 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斗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 3 人被暴戶街頭示眾三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并手提沖鋒槍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斗，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 月 7 日至 9 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 242 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后字 242 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 月 9 日至 12 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斗，一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 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 月 16 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一派的武斗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一空。周恩來聞訊后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任張國華稱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一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 年 7 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后，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持。在重慶陷得很深的 54 軍也換防到云南。武斗漸趨平靜。8 月 22 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 4,500 余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后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9 月 23 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于 10 月 15 日前無條件上繳一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斗工事、據點，解散一切專業武斗隊。

10 月 15 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

銷，此后，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一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斗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斗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⁴³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斗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千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⁴⁴。武斗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六、廣西：血涌邕江⁴⁵

要了解廣西文革，必須了解韋國清這個人。韋國清，廣西人，1913年生，1955年授上將軍銜。50年代，他帶領的軍事顧問團，幫助胡志明打勝了越南奠邊府戰役，為建立北越紅色政權立下了功勳。

1955年后，一直在廣西擔任軍政高層職務。1964年兼任廣西軍區第一政委，1966年8月24日，中央中央免除了韋國清廣西第一書記的職務，調任中南局第二書記，任命喬曉光代替韋在廣西的職務。但是，韋國清沒有到中南局上任，還是在廣西當第一書記。這是因為抗美援朝需要他，廣西地處抗美援朝前線。1967年3月，中央對廣西實行全面軍管，讓韋國清任軍管會主任。當時，由于他執行資反路線，「站不出來」，周恩來說「我們做工作」。⁴⁶1968年任廣西壯族自治區

⁴³ 轉引自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第303頁。

⁴⁴ 兩點：〈重慶文革武鬥為甚麼那樣暴烈〉（文革武鬥發生44周年祭）

⁴⁵ 這一節資料來源除了已注明外都來自《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7月。

⁴⁶ 〈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引自《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明鏡出版社，第73頁。

革命委員會主任。從文革開始，到文革結束，韋國清不僅沒有被打倒，反而一直處在廣西最高的領導崗位上。這樣的領導人在全國各省委書記中是很少的。

韋國清雖然是廣西壯族人，但他卻一直嚴厲打擊「地方主義」、「民族主義」，重用中央委派的南下幹部，壓制廣西本地的民族幹部。而與廣西相鄰的廣東，「地方主義」使毛不放心，又能親自打壓。韋國清對中央的向心力深受毛澤東的信任。韋國清又深受毛澤東的朋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信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國和越南交戰。1967年12月19日，毛澤東表示：「7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⁴⁷抗美援越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戰略重要的一局，韋國清在這個棋局上可以起重要作用。

韋國清善于揣摩聖意，緊跟形勢，這也是他在文革中成為「不倒翁」的一個原因。1966年9月3日，他在廣西大學貼出大字報——〈歡迎大家向我開炮——我的一張大字報〉，說「你們向區黨委（特別是我）貼出的大字報還不夠多，火藥味還不夠濃」。1967年1月29日，韋國清貼出第二張大字報——〈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說劉少奇、鄧小平是「潛藏在黨內的危險人物，是兩顆定時炸彈」，1967年2月1日，韋國清貼出了他的第三張大字報——〈揭發兩面派陶鑄〉，說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頑固地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王任重倒臺以後，1967年2月5日，他又貼出了第四張大字報——〈揭發王任重的幾個問題〉。⁴⁸需要指出的是，韋國清揭發劉、鄧、陶、王的大字報，帽子扣得很大，卻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所以，文革結束後他又取得了鄧小平的信任。

長期在廣西工作，不能被打倒的韋國清，和廣西官僚們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他不可能支持反對廣西官僚們的造反派。被毛澤東鼓動起來的造反派和一個不能打倒的、廣西最大的當權派對立。這就決定了廣西造反派的悲慘命運。

⁴⁷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6卷，第147頁。

⁴⁸ 〈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引自《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明鏡出版社，第565-572頁。

兩派衝突和中央調解

廣西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全國各地一樣，也出現了反對和保衛當地黨委的兩種觀點。各種觀點都有一些群眾組織。廣西第二大城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造反派起來得較早一些。因為南下支持造反派的北京紅衛兵到桂林的較多。1966年10月下旬，我和同班的幾位同學到桂林串聯，是支持造反派的。桂林吸引我們的還是七星巖和蘆笛巖。當時蘆笛巖開放不久，從桂林市區到蘆笛巖沒有公路，我們是從田間小徑步行去的。桂林的造反派到1966年冬就成了多數派（簡稱「老多」）。在全國各地奪權的1月，桂林造反派已成主流。

省會南寧造反派起來稍晚一些。1967年3月，廣西軍區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要求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領導廣西文化大革命，自治區直機關的幾個群眾組織則主張無條件支持這一提議。另一部分群眾組織持反對態度。於是，圍繞著「支韋」還是「反韋」問題，各個群眾組織中形成了兩大派。4月19日，自治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賀希明、候補書記霍泛聯合發表聲明，聲明表示：「在對韋國清同志的錯誤沒有揭深批透，他本人沒有認真悔改以及這股逆流（指當時壓制造反群眾、扶持保守組織）的策劃真相沒有澄清以前，堅決支持韋國清同志站出來搞『三結合』是錯誤的。」後來，伍晉南被打成「伍晉南修正主義集團。」

1967年4月22日晚，「廣西紅總」、「南寧8·31」、「紅衛兵聯絡站」、「新工總」等數十個「反韋」組織萬余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南寧『4·22』火線指揮部」（後改為「廣西『4·22』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廣西「4·22」）。在廣西各地都有和「4·22」同觀點的群眾組織。桂林「老多」也屬此派。他們的口號就是：「達到韋國清，解放全廣西！」

5月25日，「支韋派」打著「維護軍管，保衛《廣西日報》」的旗號，在區工委大樓成立了「5·25」革命行動指揮部（後改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廣西聯指」），在廣西各地也有「聯指」同觀點的群眾組織。

「聯指」雖然保韋國清，卻反對自治區副主席伍晉南。他們積極批判「伍晉南修正主義集團」說他們是保守派是因為他們保的是廣西

權勢最大的當權派。

1967年初夏以後，「支韋」和「反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在此期間兩派都組成龐大的上訪隊伍到北京，向中央反映各自的意見。自治區的領導幹部也參與上訪：支韋的喬曉光、安平生；反韋的伍晉南、賀希明、霍泛等都到北京上訪。

6月1日至12日「4·22」大批人員，六次沖擊廣西軍區，強行進入軍區院內貼大字報，塗寫標語，在軍區大門口和院內，機會和示威游行，控訴「黨政軍內一小撮」的「罪行」。在此期間，「聯指」組織成千上萬人馬，紛紛集會，六次到軍區院外周圍示威游行，抗議「4·22」沖擊，進駐軍區。

6月上半月，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三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盡力調解兩派群眾組織，但效果甚微。雙方沖突不斷發生。「聯指」幾次組織農民進城圍攻「4·22」據點，造成大量傷亡，國家物質損失嚴重。

6月26日「聯指」從糧食廳方向攻入文聯大樓，「4·22」600多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區物資局院內，其中部分人被捆綁、蒙眼、審訊，有些還遭到毒打。

6月29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代表，主要聽取「4·22」代表的意見。周恩來總理對廣西出現武斗流血事件極為關注，對制止武斗作了指示。但武斗沒有停止。大批「4·22」群眾被趕出。

7月13日，「聯指」組織部分人到省軍區警衛連和6984部隊搶走步槍、沖鋒槍300多枝、輕機槍三挺、六零炮一門及部分彈藥。

1967年8月9日晚飯後，廣西「4·22」赴京匯報團和北京造反派200多人，沖進京西賓館，打傷韋國清和警衛戰士數人。

8月18日晚11時左右，「4·22」組織300多人到金雞村搶劫軍用列車的援越炮彈4千多發。20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交還，「4·22」才將炮彈大部分交還部隊。

8月20日晚，南寧「聯指」攻打東方紅醫院和民族電影院等「4·22」據點。醫院被嚴重破壞，死10人（「聯指」1人，「4·22」

9人)。有些「4·22」人員被俘后慘遭殺害。武斗后，「聯指」把10具死尸和一具醫院原死尸，共11具，當作是本派被「4·22」殺害的罪證，現場陳尸展覽。

8月25日，「聯指」以「保衛邕江大橋暢通」為由，動員所屬組織武力攻打「4·22」設在邕江大橋附近的據點。南寧地專「聯指」出動三、四百人，參與攻打南寧市郵電局、民族電影院、邕江橋頭等處「4·22」據點。槍聲響徹夜空。

1967年8月24日，中央領導人第五次接見廣西群眾代表。周恩來還明確指出：「過去軍區支左錯了，現在軍區決定支持『4·22』。」周恩來要求：「要把廣西局面穩定下來，第一步停止武斗；第二步把武器封存起來；第三步被趕出的同志歡迎他們回去。他們的組織還可以存在，不同的觀點可以辯論。」周恩來對「4·22」眾代表說：「軍區過去拉一派，打一派，是不對的，你們『4·22』造反派是不錯的，很有勁，矛頭向上，精神不錯。但你們把韋國清從京西賓館拉出來打，過火了一點。現在，軍管轉過來支持你們了，你們不要反過來去壓人家。」周恩來要求立即釋放被軍隊抓起來的「工人總部」頭頭熊一軍、丁友儀，恢復被解散的工人總部。

1967年8月26日，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立即停止武斗的協議〉。又經過中央領導人的反復調解，11月8日，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14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接見廣西兩派在京匯報團。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中發[67]353號文件〈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文件肯定了兩派在北京達成的這些協議，並宣布，中央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鑄、孫鳳章、焦紅光、郝忠云、王斌、伍晉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11月23日下午3時，在京的廣西革籌小組成員和兩派赴京代表團乘專機回南寧。在南寧的革籌小組成員王斌和廣西「4·22」、廣西「聯指」及駐軍數千人到機場歡迎。

廣西問題終於有了解決的希望。

風云再起

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人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之後。「4·22」派乘機加強政治宣傳攻勢，壓「聯指」。「聯指」有的群眾倒戈，有的發表聲明退出；有的原表態「支章」的領導幹部也改變觀點，發表聲明支持「4·22」。

廣西軍區也檢討了支一派壓一派的「放心路線錯誤」，表示支持「4·22」。但是，口頭上表態只能是一句空話，省軍區仍然暗中支持「聯指」。在籌建革委會的過程中，「聯指」和支持他們的軍隊還是占主導地位。地、縣的武裝部起主要作用。

11月下旬，廣西軍區根據中央指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報告」後，廣西「聯指」集隊沖進軍區大院，聲稱要揪出「出賣原則」的軍區負責人。桂林地區12個縣的農民代表桂林市慰問「聯指」。接著武斗頻頻發生，廣西各地「4·22」派仍然處在受壓制的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公開圍剿「4·22」派的軍事行動，一些地方的「4·22」成員被「聯指」屠殺。

1967年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市縣「4·22」造反大軍組成「反屠殺控訴團」，赴南寧到軍區靜坐和游行，強烈要求革籌小組和軍區制止武斗，嚴懲殺人兇手。12月29日，「4·22」在軍區院內召開反迫害、反屠殺的萬人大會。

1968年1月5日，「聯指」大、中學校紅衛兵1千多人來到廣西軍區大院游行示威，聲稱區革籌小組成員伍晉南和賀希明、霍泛犯下了「嚴重罪行」，把伍晉南拉倒軍區球場批斗。當晚，「4·22」在南寧「造反樓」前召開萬人大會，強烈抗議「聯指」揪斗、圍攻、折磨伍晉南。

1967年1月中下旬以來，兩大派的造反組織都企圖採取武力鎮壓對方，摧毀對方，以爭取一派掌權，致使不少地方發生大規模武斗。不少幹部、群眾被打死，有的全家慘遭殺害。省軍區支持的「聯指」，是武力鎮壓的主要責任者。

1968年2月，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下令，將支持「4·22」的軍

隊（6984）調走⁴⁹。2月12日「4·22」5千多人到廣西軍區舉行挽留6984部隊的大會。當時「4·22」派的小報上有一首詩：

邕江的水啊流呀流，我們從來不挽留。
可是我們的6984啊，絕不能走啊不能走。
如果6984一走，就會失去千萬個人頭。
我們跪在毛主席像前，千叩頭、萬叩頭，請您把6984留。
6984啊，你們不要走啊，不要走！

2月18日下午，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對「4·22」挽留6984部隊的行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6984部隊掉走后，廣西「聯指」就部署向「4·22」據點進攻。

在兩派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1968年2月下旬，自治區革籌小組一周之內連續兩次發出〈關於建立專區、市、縣革委會的通知〉。為了落實這個通知，一些地方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口號，連續發生成批殺人的事件。對「4·22」的屠殺為建立革委會掃清了道路。此后各地區、市、縣革委會在武力鎮壓下陸續成立。

2月28日，廣西「4·22」常委黃達升等在南寧市新聞電影院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廣西「4·22野戰軍」。他說「野戰軍」的主要任務是抗擊「聯指」的大屠殺。3月16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請示報告說：「4·22野戰軍」是由「黑手」、壞人和極左分子操縱的組織，他們把斗爭矛頭指向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提出要向「4·22野戰軍」武裝包圍。4月3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就「4·22野戰軍」問題向中央再次報告，說「4·22」所屬的「野戰軍」是「干擾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主張採取行動。

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4·22」為「反動組織」，繼

⁴⁹ 被調走的是55軍，副軍長孫鳳章為支持「4·22」挨整，跟軍長一起支持「4·22」的文化科長寧國學被隔離審查兩年七個月，不讓家屬見面，直到「9·13」事件以後才解決——甯國學夫人（承德黨校校長）2012年11月5日在《炎黃春秋》雜誌社向本書作者介紹。

續壓制「4·22」，⁵⁰所謂「大聯合」，實際是吃掉「4·22」；所謂「三結合」，就是在「三結合」的領導成員中盡可能減少「4·22」的席位。

5月5日晚12時至次日凌晨4時，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組織3,800多人，出動汽車45輛，火車一列，到南寧市長崗嶺軍區軍械庫搶走各種槍支7,044支，其中輕機槍479挺，高射機槍48挺，60炮4門，炮彈60發，子彈120萬發，望遠鏡50架。這是「文革」以來廣西搶槍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事件。周恩來三次命令：5日搶槍事件要嚴肅處理，搶走的武器彈藥限期交回。5月10日，柳州「聯指」搶奪6985和519部隊武器裝備。共搶去各種槍支316枝，子彈11056發，60炮、迫擊炮2門，四〇火箭筒2具，並打傷幹部戰士47人，其中重傷2人。⁵¹

5月14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發出當前廣西階級鬥爭形勢的情況報告（並報廣州軍區）。說全區已有5個專區、兩個市、65個縣成立了革委會，另有兩個專區已批准成立革委會。但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滅亡，他們大搞右傾分裂主義」，「南寧『4·22』新指揮部已成為當前運動的阻力，是急需解決的一個主要矛盾，必須迅速解決」。17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共發出報告說：「我區破獲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文革後，中共中央派出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調查組（簡稱「處遺」）認定，「反共救國團」子虛烏有。

5月21拂曉，柳州市「4·22」一派「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等人，以對付柳州「聯指」的武裝圍剿為名，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援越子彈11,888箱，共計1700多萬發。並以「李向陽」⁵²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下了「收據」。25日，駐柳部隊對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的幾個「據點」實行武裝包圍，強行收繳「造反大軍」和「工機聯」一方的武器彈藥，接著，柳州有數萬群眾對前

⁵⁰ 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一：廣西在文革期間大批死人問題的情況報告〉，1981年7月15日。

⁵¹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電子版，第51頁、52頁。

⁵² 李向陽，一部電影中虛構的抗日英雄，他率領部隊搶奪日本人的戰略物資。

來包圍據點的解放軍實行反包圍。群眾高呼：「反對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造反大軍』不能空手等死！」……解放軍被群眾包圍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隊 20 多人受傷，二人重傷后身亡。群眾反包圍又奪解放軍 700 多枝槍。從此，柳州局勢進一步惡化。

「聯指」搶省軍區的武器連連得手，實際是半搶半送。「4·22」很難搶到軍區的槍，就到鐵路上搶援助雲南的武器。

4 月 4 日，「4·22」在南寧朝陽廣場舉行 8 萬多人參加的「反右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師大會」，發表聲明說，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批准成立的南寧市革委會是「派委會」，強烈反對成立。8 日，「聯指」3 萬多人集會，「敦促南寧市革委會成立」。13 日南寧市革委會成立。兩派發生沖突。《廣西日報》一版報道：「南寧市革命委員會在階級斗爭風暴中勝利誕生」。

5 月 30 日廣西「4·22」常委決定拔除距本派據點區展覽館僅一路之隔的廣西「聯指」的林業廳據點。中午由闕家穩帶領 12 人，喬裝打扮，冒充解放軍，進入林業廳，沖上大樓，搗毀「聯指」據點，殺害「聯指」成員 12 人，開槍打傷一人，搶奪據點里的兩挺機槍，十多枝步槍及一批財務，炸壞辦公樓和宿舍大樓各一幢。「聯指」總部發現后，組織反攻，一直打到晚上。「4·22」撤退時，被「聯指」打死二人。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把派性殺人的「5·30」事件定為「極端嚴重的反革命犯罪行為」。

6 月 4 日，「聯指」所屬的「后備軍」等十三個組織，約 3,500 人，第二次到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共搶去各種槍枝 1,859 支，六零炮 8 門，子彈 100 多萬發。連日來，桂林、柳州、南寧各專區、各縣人武部、革委會和「聯指」調集數萬武裝人員進城圍殲「4·22」。

6 月 19 日，「聯指」武裝攻打區水電設計院「4·22」「火種」大樓據點，殺害 62 人，投尸于邕江。

6 月 23 日，廣西「聯指」所屬的航運「紅聯」攻打「4·22」「航運工總」控制下的南寧北大路碼頭，打了幾個小時攻不下，要求「聯指」指揮部通知河南片「聯指」給予炮火支援。南寧糖紙廠民兵炮連立即把一門三七炮拉到西園飯店后面河邊，向「桂宏」號船開炮，接著南寧化工廠「聯指」也拉來一門炮參加轟擊。打到第二天下午 3 點

多，停泊在河邊的「桂宏」、「東風」號等 40 多艘船只被炮火擊中，全部起火焚燒。

「聯指」和「4·22」雙方武斗頻頻，互相殺戮。得到區和革籌支持的「聯指」占盡優勢。「4·22」搶援越的武器，引起了周恩來的震怒。

「7·3 布告」發出以後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針對廣西問題發出布告（簡稱「7·3 布告」），布告列舉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連續沖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抗美援朝鬥爭，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7·3 布告」是中共中央根據廣西軍區匯報的情況寫成的。

「7·3」布告要求保證鐵路暢通，收回被搶的援越物資和武器，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駐廣西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

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明明知道廣西革籌小組和省軍區與「4·22」是對立的，「7·3 布告」卻讓「廣西革籌小組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來解決廣西問題，這實際是將「4·22」置于省軍區的砧板之上！「7·3 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成了他們屠殺「4·22」的尚方寶劍。

7 月 6 日《廣西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德保縣革命委員會「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穩準狠打擊階級敵人」的消息。這一報道，對全區各地發生的亂殺人的嚴重局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7 月 8 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7·3 布告」傳單 8 萬多份。駐南寧部隊組織 51 個宣傳隊，南寧市有 5 千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 660 個學習班，有 5 萬多人參加。強調「7·3 布告」是鎮壓「階級敵人」的銳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學，人手一冊。全區共翻印散發「7·3 布告」1 千萬份，要求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7 月 11 日，各地、市、縣所在地都召開干部群眾大會，「熱烈歡呼中央

『7·3 布告』，全區共約有 300 萬人參加大會。

7 月 8 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各地發出〈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當時，所謂流竄人員，實際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后，進城逃命避難人員，「聯指」以清理「流竄犯」為名，追捕、屠殺「4·22」一批人。

7 月 12 日至 8 月 3 日《廣西日報》連續發表 9 篇社論，號召「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

7 月 15 日，廣西軍區，區革籌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 15 萬人參加的，堅決維護貫徹和捍衛「7·3 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動員報告中號召：嚴懲一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前來參加大會的河南片「聯指」通過邕江大橋時，遭到「4·22」據點開槍射擊，打死群眾二人，傷二人。大會宣布「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對抗中央『7·3 布告』的反革命事件」。下午，解放軍和廣西「聯指」及數縣「聯指」武斗隊向「4·22」在南寧的據點和控制地區（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進行了包圍。

16 日，從中午 12 時至晚上，「4·22」控制區——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解放軍和「聯指」炮擊。同日，南寧市革委會、廣西「聯指」遵照區革聯小組、廣西軍區 8 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 280 多人，殺害 33 人，一些人生死不明。

17 日，解放軍、廣西「聯指」和數縣「聯指」武斗隊全面包圍廣西「4·22」控制區——南寧市解放路一帶，槍打炮轟，雙方互相投汽油彈，使南寧市的水寧街、和樂街、上國街、自強路、滅資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燒。部隊和「聯指」圍攻解放路一帶時，「4·22」航運「工總」所據守的停泊在邕江河邊的船只遭到「聯指」炮擊，「興無」號和「反修」號等一批船舶中彈燒毀。「聯指」從邕江兩岸據點向航運「工總」據守的船只開槍射擊，1431 號和 1404 號兩艘船內裝汽油 1,426 桶、航空機油 24 桶，因中彈全部燃燒。共燒毀船只 166 艘。當時船舶裝載有物資 3,600 多噸，全部燒毀。事后，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和廣西「聯指」宣傳廣播說「4·22 匪徒」防火焚燒停泊在邕江邊的船舶，船上載有援越物資，破壞抗美援朝斗爭，犯下

「滔天罪行」。

7月18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調動部隊以及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圍攻廣西「4·22」控制區——南寧市解放路一帶。「4·22」所控制的幾條街道被「聯指」和部隊炮擊起火，同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和廣州軍區發出報告，栽贓到「4·22」頭上。19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調四個連和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包圍、炮擊「4·22」解放路一帶據點，幾條街道硝煙瀰漫，一片火海。南寧警務區發表公開信，說這是「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災」

7月25日，周恩來和康生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和廣西黨政軍負責人，所有中央首長講話都一致地對「4·22」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語氣之尖銳，措辭之激烈，是少有的，把廣西發生的問題（包括搶槍、鐵路不通、南寧大火等）全部都加在「4·22」頭上，並不允許「4·22」派代表申辯發言。在接見中，康生說：「我現在要問問你們：你們反美不反美？（眾答：反！）你們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眾答：支持！）現在援越抗美物資被搶去了，火車不通了，說高興？美帝高興！蘇修高興！叛徒、特務高興！你們口里喊革命，實際上是反革命！」周恩來說：「『7·3布告』是鎮壓反革命的，你們說是『宣判了韋國清的死刑。』韋國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廣西革籌小組負責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戰爭中有過貢獻，今天越南人民還把他看成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老戰友。你們貼出這張標語，對中央是甚么態度？你這張標語是向誰宣戰？是向『7·2布告』宣戰。你想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面對越南人民的國際主義的老戰友，中央這樣信任他，你們還這樣搞！」⁵³

27日，廣西「聯指」攻打南寧百貨大樓，動用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后坐力炮，以及發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將大樓東北面墻炸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和機關宿舍中彈起火燃燒，而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司、廣西「聯指」當時廣播說，是廣西「4·22」自己爆炸了百貨大樓。

⁵³ 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1968年7月25日1時5分至6時15分，地點：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1968年8月，廣西武裝部隊和「聯指」共三萬人，圍攻「4.22」據點，屠殺一萬多人，圖為部分被俘人員。



在南寧武鬥中遭受嚴重損毀的百貨大樓

7月28日，在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區、自治區革籌小組命令，「用武力圍剿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路、百貨大樓、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船只等4·22派據點。」會后，調集了南寧地區14個縣的武裝民兵，調動了6912、6966、6939部隊和軍區警衛營、99部隊部分官兵，以及聯指派武裝人員共3萬多人，向4·22這些據點發起猛烈地攻擊。動用了八二迫擊炮、無后坐力炮、火箭筒、炸藥包等。7月31日猛攻開始，當天下午攻下了展覽館，8月8日圍剿結束。屠殺了萬余人。僅南寧火化場就有5千具屍體。有人看見，解放路被打下后，多輛翻斗車拉了三天屍體，有的拉到廢棄的煤礦坑道里，有的丟盡了邕江。當時邕江下游的西津水電站的閘門被屍體堵住了。一些被俘的人也被殺害。⁵⁴

據區委書記范慶濤1981年對中央調查組說，最少死了6千人。⁵⁵躲進南寧地下人防工程里的幾千人，軍隊和「聯指」無法攻入，便用「水攻」，大批人被淹死。⁵⁶

據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一帶，共燒毀33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294,820多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⁵⁷

圍攻解放路勝利后，廣西「聯指」從總部到基層組織都召開「慶祝大會」，大擺筵席。

8月10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毛澤東、林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處理南寧市解放路一帶問題的情況報告〉，將燒掉解放路一帶33條街（巷）和河邊的船舶的責任全加在「4·22」一方。

8月19日，在北京學習班的廣西「4·22」的九個頭頭：白鑾平、廖偉然（柳州）、章英、農烈（南寧）、王反修、李振林、錢文俊（柳

⁵⁴ 晏樂斌：《廣西「文化大革命」運動》，未刊稿。

⁵⁵ 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一：廣西在文革期間大批死人問題的情況報告〉，1981年7月15日。

⁵⁶ 徐勇：《韋國清屠殺廣西「4?22」派》。

⁵⁷ 轉引自黃家南：《壯鄉悲歌——廣西文革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29頁。

鐵)、劉振林、劉天償(桂林)被在京一起學習的廣西「聯指」頭頭當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廣西「4·22」赴京控告團的427人,也成了「聯指」的俘虜,被押回廣西關押、摧殘。

軍隊和「聯指」攻克「4·22」展覽館據點后,在展覽館舉辦所謂「反革命罪證」展覽,展出時間52天,先后組織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489,365人前往參觀。展覽分三個館,第三館是「活人展覽」,將攻打展覽館和解放路一帶抓獲的「戰犯」、「叛徒」、「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在鐵籠里,當作禽獸讓「無產階級革命派」觀賞了52天,然后將他們送進警司,長期關押。

「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為了加速建立一派掌權的革委會,南寧以外的地方也動用武裝力量對「4·22」派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這一天,人武部長馬政華召開緊急會議,他說:「為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每個鄉可干掉個把罪大惡極、民憤大的四類分子或壞頭頭。」從3月8日至27日的二十天里,全縣連續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被殺者630多人。3月11日和13日,向都區祥元鄉的兩起殺人事件,被殺者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3月17日,崇左縣人武部長張洪恩帶領崇左縣15人,前往天等縣祝賀該縣革委會成立。回崇左后召開會議,張洪恩講話:「天等縣紅色政權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我們要向天等學習,也要用槍桿子來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崇左縣在籌備成立革委會前發生94人被害的事件。⁵⁸

在「7·3布告」發布之前,桂林市軍分區就調集了12個縣7,800多名武裝民兵圍剿「老多」,「7·3布告」后還繼續圍剿。6955部隊進入兩派武斗前沿,實行武裝隔離,要求兩派在8月12日前停止武斗。軍分區政委陳某向「老多」表示,只要「老多」交槍,保證「聯

⁵⁸ 中共南寧地委整黨辦公室:《南寧地區「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1976)》,1987年5月11日。

指」也會交槍，并保證不抓人。「老多」交出了 3 千多枝槍，撤出了據點。「聯指」只交出 30 枝槍，不撤據點，還以市革委的名義，將「聯指」武裝人員改編為「工人糾察隊」，把「4·22」交來的槍枝部分配給他們。8 月 20 日凌晨 5 時，駐軍派出近一個團的兵力，配合上萬名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和各單位「聯指」成員，按事先劃好的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地搜捕「4·22」成員，全市共抓了 7 千多人。被抓人員都遭到嚴刑拷打，一大批被殺死。⁵⁹臨桂縣直屬機關被抓 318 人，僅獲釋 25 人，其餘 293 人全被殺害。⁶⁰

賓陽縣縣革委會主任、6949 部隊副師長王某親自布置大屠殺。從 7 月 26 日至 8 月 6 日的十一天里，被殺害 3,681 人。⁶¹

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7 月 24 日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的「聯指」武裝人員 3 千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4·22」、「造反大軍」的據點，抓獲 70 多人，立即槍殺 25 人。這次共打死 146 人。他們在良上村見一婦女背著一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個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又補了一槍，婦人死了，年僅 2 歲的小孩大哭，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

1983 年，融安縣受迫害的干部、群眾上訪團向中央「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反映：「從 1968 年 8 月 14 日縣革委會成立到 9 月底一個半月的時間里，全縣殺了 3 千多人。其中縣革委會機關所在的長安鎮，殺了 800 余人。大將公社小墟鎮龍妙街殺死 45 人，成了寡婦街，至今每逢過年過節到處是悲慘的哭泣聲。」⁶²

只要 24 萬人的上林縣，被殺 5 千人，1968 年 7 月的一個晚上就

⁵⁹ 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三：桂林「8·20 事件」的情況調查》。1981 年 7 月 6 日，這個調查報告把「8·20」事件的責任推給了調查時已被定為「林彪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黃永勝身上，似有為韋國清開脫之嫌，當時韋國清正受到鄧小平的重用，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⁶⁰ 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一：廣西在文革期間大批死人問題的情況報告》，1981 年 7 月 15 日。

⁶¹ 中共南寧地委整黨辦公室：《南寧地區「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1976）》，1987 年 5 月 11 日。

⁶² 晏樂斌：《廣西文化大革命——參加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此文在《炎黃春秋》2012 年 11 期，發表時有刪節，這裏引用的是晏樂斌給本書作者的原稿。

殺死 250 人，屍體堵塞河道，鮮血染紅河面。⁶³

革命老根據地鳳山縣「革老派」（屬「4·22」）是多數派，1968 年 2 月占領了縣城，「聯指」逃往東蘭縣。8 月 12 日，廣西省軍區調集 11 個縣的武裝民兵配合 6911 部隊圍剿「革老派」，協助逃到外地的「聯指」打回鳳山建立革委會。革委會成立后，全縣抓了 6 千人左右，批斗了 5 千多人，殺死了 2,700 到 3,000 人。⁶⁴

8 月 25 日，《廣西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題為〈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親切關懷下，廣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空前大好〉的消息，聲稱：全區以「7·3 布告」為武器，在勝利地鎮壓「階級敵人」的凱歌聲中，各專區、市、縣终于在 8 月 25 日前全部成立革委會，實現了廣西大地「一邊紅」。

1968 年 8 月 26 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并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副主任歐致富、魏佑鑄、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堂、曾春生。同日《廣西日報》在頭版套紅通欄標題下，刊登預告消息：「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于今天舉行」。二版發表社論〈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熱烈歡呼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的凱歌聲中勝利誕生〉。在成立大會上韋國清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要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肅清國民黨殘渣余孽」，講話傳達后，全國各地又對不服從革委會的人大開殺戒。「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鮮血。

⁶³ 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六：來信來訪摘要〉。

⁶⁴ 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一：廣西在文革期間大批死人問題的情況報告〉，1981 年 7 月 15 日。

第一五章

「武漢事變」和毛澤東 的戰略轉變



「7·20」事件中武漢公檢法部門保守派組織成員揮舞手槍和長槍在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外示威。

1967年1月，毛讓軍隊支持左派，但大部分軍隊都支持保守派。毛澤東必須調整軍隊的支左方向，他選擇了武漢軍區。如果讓位於九省通衢的武漢軍區轉彎，不僅可以解決中原幾個省問題，對全國部隊轉變「支左」方向也就樹立了一個樣板。以毛澤東絕對權威親自坐鎮武漢，動員武漢軍區轉彎子，本來是不很困難的事情。毛澤東信心滿滿，還準備解決問題以後，在長江暢遊一番。但是，毛沒有想到，就在他停留武漢期間，爆發了轟動一時的「7·20事件」。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階段，有三個城市直接影響和左右了全國運動。第一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奪權」的策源地；第三是武漢，震驚中外的「7·20事件」的發生地。這三個城市事件構成了「文革」運動不斷激化的三個波次，終於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推到了頂峰。¹

武漢「7·20事件」發生後，清華「4·14」讓我到武漢支持造反派，由我寫了聲援信，鉛印了上千張準備到武漢張貼。7月24日到了武漢，但清華「團派」已經走在我們的前面，武漢造反派更歡迎他們，再張貼「4·14」的聲援信沒有意義。我住進了武漢軍區第三招待所，直到8月31日才回北京。住在軍區第三招待所的有清華「4·14」的幾十人，「4·14」總部委員張雪梅成為臨時的頭兒。在武漢這段時間，我們經常到軍區大院參加活動。在此期間，武漢軍區保衛科長王振英還專門向我們介紹了營救王力的經過。但是，當時的筆記本已經丟失，只留下一些印象，感受一些氣氛。這一章的內容主要是採用徐海亮等研究武漢文革的專家的著作和王力、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等當事人的回憶錄。

一、1967年春夏武漢文革形勢

要瞭解「7·20事件」，先得介紹7月20日以前武漢文革的形勢。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委一方面拋出一批高校的領導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報紙上大加批判，另一方面在群眾中抓「右

¹ 王海光：〈武漢「文革」的口碑歷史——《武漢「7·20」事件實錄》序〉。

派」。遊街、抄家、戴高帽，「紅色風暴」席捲整個武漢。

1966年7月底，按照北京的步調，湖北省委停止了各院校的「反右」鬥爭，決定撤出工作組，改派聯絡員觀察、指導有關單位的運動。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武漢市出現了造反派學生組織「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和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九一三」、「工造總司」等。

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奪權流產。「工人總部」、「9·13」、「二司」等12個激進的造反組織在他們控制的《長江日報》上聯合發表了「2·8聲明」，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2月18日，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2·18聲明」），認定「2·8聲明」大方向錯了。組織部隊上街武裝遊行，對激進造反派施加了強大壓力。

3月17日夜晚，以落實「軍委八條」的名義，軍警聯合行動，逮捕工人總部近500名大小頭目。「3·21通告」認定「工總」是「反革命組織」，宣佈予以取締。保守派空前活躍，「踏平黑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大標語貼遍武漢三鎮。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以各種名義迅速死灰復燃。一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批鬥造反派的「壞頭頭」。

雖然武漢軍區支持「毒草派」，打擊「香花派」，但軍隊的強力鎮壓促使「香花派」和「毒草派」走到一起。他們共同喊出「揪出武老譚²，為工總翻案！」的口號，上街遊行抗議。面對武漢造反派的聯合抗爭，5月16日，由武漢軍區支持、市人武部等籌辦的保守派聯合組織「百萬雄師」正式成立。這個組織從上層到基層，都有現役軍人指揮，配備了軍用卡車、柳條帽、長矛、鐵棍等武器，是一支准軍事隊伍，造反派無法與之抗衡。³6月4日，武漢部隊發佈的「6·4公告」指出，當前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乘火打劫」，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6·4公告」發佈後，百萬雄師對武漢造反派佔優勢的學校、工廠、廣播站採取了武裝掃蕩，試圖一舉清除造反

² 「武老譚」即武裝的「譚震林」，因為譚震林在「二月逆流」中鬧得最厲害。1967年春夏，全國各地造反派都反抗當地的「譚震林式人物」——當地鎮壓造反派的軍政領導人。

³ 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電學院文革親歷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第164頁。

派，實現奪權。6月8日，百萬雄師發佈〈反逆流緊急動員令〉製造了一系列的流血事件。6月17日，百萬雄師在漢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一帶殺死反派群眾多人。⁴6月24日，百萬雄師武裝攻打「工造總司」，同時攻打漢陽軋鋼廠和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工造總司」成員被殺死28人，重傷60餘人。⁵

在強大的壓力下，武漢造反派在自己組織的名稱前面加了一個「鋼」字：「鋼工總」、「鋼9·13」、「鋼二司」，合稱「三鋼」。與「三鋼」並肩戰鬥的是「三新」：新華工、新華師、新華農。「三鋼」和「三新」經常組織數十萬人的抗議遊行。

武漢造反派組織和保守派組織的力量都很強大，軍隊深深陷入保守派之中。「百萬雄師聯絡總站」就設在8201部隊軍管的3506軍需工廠裏。作為平衡兩派、維持局面的支左部隊已失去了維持局面的資格。更激烈的鬥爭正在醞釀之中。中共中央打算讓武漢軍隊領導人和群眾組織頭頭到北京彙報，在北京解決武漢問題。

二、中央對武漢問題的處置方針

7月10日，周恩來通知陳再道：可以不到北京彙報了，我們到武漢，在武漢解決問題。毛澤東要親自到武漢。

武漢地處中國東西南北水陸交通要衝，號稱九省通衢。毛澤東準備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湖北問題，自有一番考慮。為了確保毛澤東在武漢成功，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跟隨毛澤東左右。周又打長途電話給在四川的謝富治、王力一行，要他們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⁶

對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毛、周心中有底，即同正在解決中的河

⁴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第34頁。榮根：〈武漢「7·20」事件40周年——「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中說，指揮這場武鬥的「百萬雄師」江漢分站沈浩然說死了23人。

⁵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電子版）。

⁶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227頁，明鏡出版社，2003年。陳再道認為，周恩來只讓謝富治到武漢，王力連夜和關鋒電話密謀，硬要到武漢，陳再道：〈武漢7·20事件始末〉，轉引自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1988年，第514頁。

南、湖南問題一致的：支援造反派，瓦解保守派組織和團結保守派群眾，最終實現以造反派為核心的大聯合。為實現這個方針，先解決武漢部隊的問題。如果軍區領導承認錯誤，可以不打倒。

毛澤東 14 日凌晨 3 時乘火車離京，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同行。當晚 9 時到達武漢，住東湖賓館梅嶺一號別墅。周恩來等乘飛機當日早晨到達武漢，住東湖賓館百花一號。由於毛要在武漢游泳，讓海軍司令李作鵬參加陪同，李作鵬同周恩來同機到達。⁷周恩來、李作鵬飛抵漢口王家墩機場時迎接的是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政委蕭前。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軍先行接了總理，心裏十分納悶，很不高興。⁸

6 月 20 日，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和幾位北航紅衛兵（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吳介之）組成的中央調查組到西南處理昆明、成都、貴陽的問題。接到周恩來 7 月 13 日電話後，14 日到達武漢，先到武漢的李作鵬到機場迎接。⁹毛讓謝富治來武漢，除了關心西南的形勢以外，還有一個重要意圖，即武漢駐軍中的一支部隊曾是謝富治的部下。老陳謝兵團（陳賡為司令謝富治為政委）的 9 縱，改編為第 15 軍，也即 1967 年的空降兵第 15 軍。

周恩來先趕到武漢後，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把賓館的人都換了。原來賓館的工作人員分兩派，毛來漢以前工作人員多是百萬雄師這一派的，周恩來換成了另一派。可見，中央對武漢兩派已有明顯的傾向性。對換班心懷不滿的個別工作人員，20 日凌晨帶路，領著百萬雄師衝擊了百花二號——找謝富治論理，這是後話。在安全部置上也表現出中央的看法，周恩來不讓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負責毛的安全，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¹⁰周恩來把 8201 部隊（獨立師）的警衛換成中央警衛團的了。獨立師蔡炳臣政委不滿意，幾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說把東湖客舍警衛換了，不相信他們。

⁷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 592 頁，《王力反思錄》（下）第 252 頁。

⁸ 陳再道認為，讓劉豐接機不讓他和鐘漢華接機是中央文革和吳法憲的陰謀，違反了周恩來的意願。見陳再道：〈武漢 7·20 事件始末〉，轉引自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第 514 頁。

⁹ 《王力反思錄》第 2 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251 頁。

¹⁰ 同上，第 252 頁。

7月16日，毛澤東召集會議，聽取周恩來彙報武漢地區文革情況，楊成武、汪東興、謝富治、余立金、王力、李作鵬參加會議。毛聽完彙報後說：「要為武漢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造反派頭頭。武漢軍區對兩派都應該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武漢兩派要達成協議，發表聲明聯合起來。要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承認錯誤，改了就好。要把百萬雄師的工作做好，要把軍隊工作做好，轉過來就好。」又說：「軍隊犯錯誤，要承認得快，改正得也要快。」¹¹

7月17日上午，毛在東湖客舍聽取謝富治、王力彙報雲南、四川的情況，研究武漢地區的問題。毛說，武漢軍區起草個稿子，發表個公開聲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錯嘛。支工支農有功，支左就有錯嘛。「工人總部」要平反，抓的「工總」幾個頭頭沒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陳再道只要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倒。¹²下午，周恩來等在百花一號樓召集武漢軍區領導和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會議，聽取情況彙報。有軍隊幹部彙報了「工人總部」的「十大罪狀」，「百萬雄師」「十大好處」。中央首長插話希望部隊同志要以兩條路線鬥爭為綱，抓住事物的本質，提高路線覺悟。¹³

從17日到18日，周恩來、謝富治、余立金、王力連續召開會議，繼續聽取武漢軍區領導人的彙報，也透露了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用這些原則說服軍區領導人。周恩來希望武漢軍區承認支左錯誤，並改正錯誤。周說：「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陳再道仍表示思想不通。彙報會上，中央領導人和武漢軍區領導人的意見十分對立，會議沒解決問題。¹⁴

7月18日下午，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師級與二級部長會議上作總結報告。報告指出，「『2·8聲明』儘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二司』在『3·21公告』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這一工總『十

¹¹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2-593頁。

¹²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100-101頁。

¹³ 徐海亮：《7·20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592頁。

¹⁴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3頁。

大罪狀』發到農村，農民就說工總翻不了案」，「百萬雄師是不是人武部的？（『抓辦』搞的）在軍區開過會，6月8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周恩來最後提出幾點建議：第一，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工人總部的解散。出圖片¹⁵，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有關案子。第二，肯定「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是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報復，這工作中央幫助來作。第五，「紅三司」是群眾組織，偏保。第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組織農民進城來參加武鬥。第七，軍區除承擔責任以外，更要作部隊教育工作。第八，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對解放軍的行為要澄清。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¹⁶

楊成武證明，周恩來的講話提綱是經毛澤東審定過的，是經他的手將周的講話稿送給毛，毛批示後又是他還給周的。¹⁷

當時陳再道不知道毛澤東在武漢，他聽了周恩來這個總結報告後十分激動。他把軍區整的工人總部的材料給周，這些材料集中了工人總部的種種問題。還說，你可以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他是想不通的。他還說，毛主席說要相信大多數。幹部的大多數、軍區戰士的大多數、群眾中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去做，我做不通。他拍桌子說：「周鬍子，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他指著周的講稿說：「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話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周也拍著桌子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辦法。」¹⁸

¹⁵ 即醜化造反組織的圖片，大量印發散發。

¹⁶ 周恩來在武漢軍區湖北軍區師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7月18日，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2006年。《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第252-253頁也有相同的內容。

¹⁷ 楊成武回憶的《微行——楊成武在1967》中說：「7月17日深夜（楊）剛從周恩來那邊過來」，「將幾頁紙交毛澤東」，並說「……總理有個總結講話，這是總理擬的講話提綱，請主席審閱」。「毛澤東破例地沒有留下處理，當即看一遍，還給楊成武說：『同意，他講吧。』」

¹⁸ 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電學院文革親歷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第183頁。

18日晚，周恩來帶陳再道、鐘漢華到東湖客舍見毛澤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王力、李作鵬參加接見。毛澤東對陳、鐘說：四川問題很嚴重，你們武漢還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沒有那麼嚴重。軍委『八條』一出來，軍隊就有勁了，於是就抓人，解散組織。『十條』出來了，造反派又有勁了。你們要做百萬雄師的工作，犯錯誤不要緊，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不那麼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現在主要是做軍隊和百萬雄師的工作，很快轉過來，否則他們被動。談話結束時，毛把陳再道送到走廊上，對東湖賓館的幾位元服務人員說：再不要打倒你們的陳司令了吧！¹⁹毛在對陳再道、鐘漢華談話中還說：「第一，你『三支兩軍』有錯也有功，支左支一派，錯了，支農、支工有功勞；第二，要檢討，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第三，路線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他們（周恩來）要做工作，一起做到群眾擁護你陳再道為止。」²⁰在毛講話後，陳再道、鐘漢華表示同意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意見，願意做好部隊的說服工作。會開到9點半，周恩來於11點半乘飛機回北京。²¹臨行前，周又強調讓武漢空軍絕對保證毛主席的安全。本來武漢空軍司令員是傅傳作，因為有人說他「是賀龍的人」，周恩來決定由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蕭前負責。

三、武漢軍方抵制中央的處置方針

在中央領導人來武漢以前，武漢軍區的領導人就有了確定的看法。7月9日武漢軍區常委會定調子，7月10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統一口徑，統一思想：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工人總部不能翻案，批判「2·8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²²

中央這麼多要員來到武漢解決武漢問題，引起武漢兩派群眾組織的強烈關注。7月14日深夜，王力、謝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

¹⁹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6卷，第102頁。

²⁰ 程光：《心靈的對話》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46頁。

²¹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594頁，《王力反思錄》，第253頁。

²² 〈陳再道的口頭檢查〉（1967年12月1日），載史實編《文革中的檢討書》，時英出版社，臺北，2011年，第322頁；《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33頁也有武漢軍區統一口徑的記載。

對圍觀群眾透露了中央的一些精神。消息迅速傳開，造反派刷出標語表示是歡迎。東湖賓館的燈光（武漢大學可以看到）顯示中央來人。各學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來》，可見他們還不知道毛也到了武漢。15日到18日中央大員和軍區領導人的多次會議期間，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已經透露。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很難保密，軍隊、「抓辦」和百萬雄師本來靠得很緊，中央的精神很難讓「抓辦」和百萬雄師不知道。7月16日，武漢街頭出現了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

「抓辦」和百萬雄師的情緒影響軍區領導人；軍隊的態度也影響百萬雄師的群眾。軍民互相依靠、互相推動，使情緒更加激烈。

18日晚周恩來離開武漢以後，他當天的講話通過兩個管道向全市公開了。

第一個管道是軍隊。周恩來再三向武漢軍區領導交代，他的講話不要向下傳達。但軍區政委鐘漢華同意8201部隊傳達。8201部隊蔡炳臣政委立即傳達到團以上幹部。次日傳達到排級、戰士。並把派到地方單位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軍代表又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²³蔡炳臣除了介紹周的講話以外，還說：「中央首長來了四天，聽了三天彙報，作了一天報告。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彙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彙報。鐘政委在彙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鐘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彙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指師長和政委）」，「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傳達這些時，群情激憤。牛（8201師長牛懷龍）、蔡二人說：「你們對外不要講是總理說的。」暗示把矛頭指向王力。蔡又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消息那麼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這是百萬雄師中傳出的謠言）。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這是從公安

²³ 鐘漢華的檢查：「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代不要向下傳達，我批准蔡炳臣傳達了，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根據1967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下午，在湖北省學習班全體人員大會上兩次檢查交代記錄綜合整理，整理稿經本人同意。

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彙報。」²⁴2007年，「百萬雄師」常委兼聯絡部部長章迪傑接受採訪時說，「四點指示」是從部隊傳出來的，「百萬雄師」的各個分站都是軍代表傳達的，傳達時都說是王力講的。²⁵

第二個管道是王力和謝富治。18日晚，謝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來之後，由機場直奔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這裏是工人和學生造反派「逃難」聚集的地方。王力等向在場的數千人發表了講話：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要為工人總部平反；「三鋼」、「三新」、「三司革聯」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²⁶他表達了對武漢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19日，武漢造反派在全市廣播「四點指示」，更是激起百萬雄師群眾和部隊指戰員的強烈不滿，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街頭。²⁷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淡化他在武漢水電學院的講話，是推脫責任。中央黨校教授、文革史專家金春明聽了王力講話的錄音，的確有相當的煽動性。²⁸武漢的造反派說，軍隊傳達周的講話在先，王力在水電學院講話在後²⁹。實際上，這兩個管道幾乎是同時進行的，不過軍隊可能行動更快一些罷了。

武漢軍方把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歸罪到王力顯然是一種策略：只反王力個人，不反中央。7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河南軍隊幹部時說：「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的工人總部，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³⁰

²⁴ 徐海亮：〈武漢「7·20事件」——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觀點〉，載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田園書屋出版社，2010年，第466頁。

²⁵ 榮根：〈武漢「7·20」事件40周年——「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

²⁶ 在水院親歷者徐海亮認為，王力沒有在群眾中講「四點指示」。「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也認為王力在水院沒有明確講「四點指示」。王力向中央也否認他講了「四點指示」。

²⁷ 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辦公室：《武漢「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1966年5月-1976年10月）》。陳再道認為：「謝富治、王力這天晚上的活動，成為爆發『7·20』事件的導火線。」陳再道：〈武漢7·20事件始末〉，轉引自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1988年，第515頁。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533頁說，查閱王力講話記錄得知，王力支援造反派，但未具體講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四點方針。

²⁸ 金春明教授2011年7月10日在他家中同本書作者和王友琴的談話。

²⁹ 張建成：《歲月留痕——武漢水電學院文革親歷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第184頁。

³⁰ 周恩來、康生、謝富治接見河南省部隊領導幹部的講話，1967年7月25日，見宋永毅等

四、「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行為

7月19日下午，在武漢軍區小禮堂召開軍區黨委擴大會，師以上的幹部參加，由謝富治傳達周總理18日的講話。王力講文革的理論問題，陳再道、鐘漢華作檢查。王力講話時獨立師（即8201部隊）師長牛懷龍要求發言，被制止。政委蔡炳臣氣衝衝離開會場，牛懷龍跟著離開，回到洪山下的師作戰部。牛師長在部下面前，拍桌子，摔椅子，大喊：「拼了！」。接著，數十名獨立師幾個戰士沖進武漢軍區大院，要謝富治接見並回答問題。他們質問軍區領導人：「王力憑什麼把擁有120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晚上11時半，獨立師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政委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此時，已有200多名獨立師的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阻止軍區作檢查，阻止軍區為工人總部平反，要求見王力、謝富治。19日晚，獨立師所屬的307醫院聽說軍區要為工人總部翻案，連打三次電話問師部是不是有這麼回事，師部作了肯定的回答後，大批工作人員湧向軍區，要揪出王力和謝富治。³¹

軍代表向「百萬雄師」各分站傳達「四點指示」後，「百萬雄師」各分站的人湧到軍區大院。據19日晚統計，各分站到軍區的車輛有273輛，1萬3千餘人。「專揪王力指揮部」就設在武漢軍區對面的武漢鐵路局大樓的七樓。³²

19日，陳再道、鐘漢華已經按中央的調子認錯，起草、印刷公告，準備去釋放造反派頭頭。前兩天，軍區有人讓另一群眾組織派小車將百萬雄師主要負責人接去，告訴他們，毛主席就在東湖，有什麼問題，可以將自己的意見向中央反映。³³一些人決定找毛當面反映「百萬雄師」的意見。最先衝擊東湖賓館的人是「百萬雄師」下屬的「武漢公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2版。

³¹ 徐海亮：〈武漢「7·20事件」——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觀點〉，載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田園書屋出版社，2010年，第466-467頁。

³² 榮根：〈武漢「7·20」事件40周年——「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

³³ 多年後，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說，7月17日晚，「省直聯司」的一號頭頭楊以才（文革前為省監察廳辦事員，文革後為省冶金廳廳長、省司法廳廳長）把我拉著就走，開車到東湖，他神秘地告訴我，毛澤東在武漢。你要去見見。還說毛主席也要見見你。——榮根：〈武漢「7·20」事件40周年——「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

安」。在 7 月 20 日零點 30 分，「武漢公安」14 人，乘車衝擊東湖賓館西門（在省博物館邊的後門，靠近毛澤東下榻的梅嶺院落），高喊：「我們要謝富治、王力接見！」軍區保衛科科長王振英等趕到北門，攔住 14 人。他們拿出武昌區公安局軍代表——獨立師某團政治部主任王某開的介紹信，口氣十分強硬，「今天晚上來了 14 個人；來，就是準備鬧事的。要是天明還不接見，就要來幾千人！」謝富治副總理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們要找他。告訴你們，謝副總理住哪個房子，我們都知道，這裏面我們熟得很，你不傳達，我們就沖！」在大門內 100 米處，雙方對峙下來。王振英立刻報告中央警衛團，汪東興讓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³⁴趕到北門。王振英又電告鐘漢華，鐘已入睡，王振英要求鐘漢華立即採取措施，秘書才去傳達，但始終未有回音。王振英又急忙給軍區值班的首長報告，要他電告軍區領導，立即調 29 師（即 8199 部隊）來。張根成向「武漢公安」來人解釋，說明天下午就準備接見你們和其他群眾組織的代表，你們先回去。但來人硬往裏面沖。凌晨 3 點左右，29 師奉軍區之命帶了一個排戰士和秘書科長、偵查參謀趕到，手挽手攔住來人。「武漢公安」領頭的說：「你們不是 8201 部隊，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你們這是武裝鎮壓我們。是誰派的？交出幕後指揮！」並向 8201 衛兵說：「他們不相信你們，派另外的部隊來了。」³⁵

「百萬雄師」屬下的「園藝軍」受命控制東湖賓館水路、碼頭，首先衝擊賓館西門（前門）和後門（北門）。在統一調度下，「園藝軍」東湖分部雷某帶一車人，從北門衝擊賓館，眾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沒有找到謝富治，雷就帶領賓館內的彭、唐、畢、王等十余人，向西越過第二道崗，率先沖入謝富治住的百花二號院落。隨後，集結在武漢重型機器廠一帶的「百萬雄師」的群眾手持長矛、腰插匕首、頭戴安全帽，分乘五輛汽車，一輛車同「武漢公安」結合，封鎖北門，其餘四輛沖進西大門，他們不聽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圍了哨兵，控制了電話機，然後沖進百花二號，包圍了謝王的住房，要見謝、王。謝

³⁴ 張根成，部隊團級幹部，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文革中調任中央文革工作人員，文革後在秦城關押七年。

³⁵ 徐海亮：《7·20 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 年，本書此自電子版，下同。

出來說：「我就是謝富治。」又問：「你們是哪里的？來幹什麼？要綁架嗎？我們準備今天下午接見你們的代表，你們這種行為是非常錯誤的。」一些群眾自覺理虧，悄悄退出，還有五、六個人仍在糾纏。³⁶

20日5點10分，8201部隊軍車21輛，宣傳車6輛，3輛吉普，1輛小轎車，從前、後門沖進賓館；緊接著41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3輛大型救火車也沖進來了。由獨立師的某副營長帶隊，端著衝鋒槍的獨立師軍人，槍口直接對著謝、王，有人直沖進王力房間翻箱倒櫃搶材料，又跑到草坪。首先碰到陳再道，戰士用槍托毆打陳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陳大叫：「我是陳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場的獨立師某股長忙叫「這是我們的陳司令員！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扶起陳再道。這時已是20日早上6點左右。軍區王振英科長聞訊與8199部隊的張昭劍商量，留下8199秘書科長滕某帶一排戰士守北門，其餘人直奔西門。他們趕到百花一號後草坪，見「百萬雄師」打人。張昭劍等趕到用身體阻攔，肋骨被打斷。隨謝富治等來武漢的北航學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車。張根成、北航兩個學生被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帶走。牛懷龍師長當時就在西門。軍區王振英科長忙叫來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綁架王力的車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說：「不要搞得這麼凶嘛！搞這麼凶幹什麼？把機槍收起來！」說完轉身就走。³⁷

當時緊張的氣氛籠罩在毛的住地內外，有傳說已發現有人從東湖對岸，嘴銜著小刀遊了過來。汪東興向機要員謝靜宜和樊一民交代：「手裏時刻拿著火柴，萬不得已時燒掉密碼，把密碼機從窗戶上沉入湖底。」為了安全起見，領導讓工作人員（包括新華社攝影師）手中拿一個木棒。³⁸

張根成回憶，7月20日他被抓進獨立師部隊以後，門口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有人回到：「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蔡炳臣政委進來以後，對張根成說：「領導通了好辦，下邊不通，領導

³⁶ 徐海亮：《7·20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³⁷ 餘言《也說「7·20事件」中的「8201」——致余汝信先生》2005年2月25日《楓華園》，文革博物館（Bwg535）。

³⁸ 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58頁。

的話不聽，我也，沒辦法。」並問：「你們那裏還有檔嗎？（指總理講話稿和其他關於處理問題的文件）」又叫人把被撕下來的領章、帽徽還給了張根成。這時，師政治部一位主任進來問：「那個人怎麼樣了？」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那個老頭。」張根成知道「那個游泳的老頭」就是指毛澤東，心裏頓時咯噔一下：「這不是造反了嗎？」³⁹

他們把王力揪到了軍區大院，很多人頭戴柳條帽，手執長矛，整整齊齊地坐在兩邊，讓王力從中穿過。把王力揪到一間房子以後，打他，搶走了手錶和鋼筆。政委鐘漢華在講臺上向群眾磕頭，哀求說：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放他回去。⁴⁰上午，在軍區大院二號樓 3 樓 46 房，獨立師人員和「百萬雄師」圍攻王力。一個人拿起話筒照著紙條問：「我們提幾個問題要你回答！第一，你們四點指示到底有沒有？要沒有，就當面闢謠！第二，你到武漢這幾天，到三新二司裏幹了些什麼？要回答！第三……」這時現場秩序大亂，牛懷龍師長叫喊「靜一下，好錄音！」眾人反剪著王力雙手，將他推到四號樓二樓平臺，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群眾逼迫王力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

41

20 日上午 10 點後，除部分人仍在軍區圍攻王力外，保守派軍民進行武裝大遊行。遊行隊伍有各種車輛 396 部，其中消防車 27 輛，空軍軍車 15 輛，打 8201、8216 旗幟的車 83 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十輛。「百萬雄師」群眾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嘴銜匕首，軍人荷槍實彈、刺刀寒光逼人。軍人們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領章，拉開風紀扣，站在車門邊和坐在車頂上。車頭架著輕重機槍，子彈帶搭拉在車上。車子開到湖北大學前，一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沖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一人。宣傳車喇叭高叫「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

³⁹ 徐海亮：〈武漢「7·20 事件」——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觀點〉，載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田園書屋出版社，2010 年，第 473 頁。

⁴⁰ 《王力反思錄》第 2 版（下），2011 年，第 253-254 頁。

⁴¹ 餘言：〈也說「七二零事件」中的「8201」——致余汝信先生〉，2005 年 2 月 25 日《楓華園》，文革博物館（Bwg535）。

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宣傳車廣播的口號聲，消防車的尖叫聲，形成了強烈的恐怖氣氛。接連兩三天，「百萬雄師」圍攻和衝擊武鋼、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一附中等十多個單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學生、教師 200 余人。「百萬雄師」從 20 日凌晨 2 時開始對武鋼圍攻，由百餘輛卡車、十多輛消防車，包圍了 33 街坊的新一冶、業餘大學、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闖進工人宿舍和造反派辦公室，抓捕 100 多人。⁴²

20 日晚，武漢市「抓辦」副主任紀輝召集「百萬雄師」會議，會上提出：(1)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了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2)在未揪到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每天要有 20 萬人上街遊行迫使中央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逃離武漢；(3)全面奪取省、市委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⁴³

21 日上午，「百萬雄師」在 3506 工廠召開奪權動員會議，商討如何利用「百萬雄師」佔優勢的條件，奪省市的權。還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⁴⁴

那時，「百萬雄師」完全控制了武漢市的電信系統，新華社湖北分社發往總社的有關武漢文化大革命情況的稿件，都逃不過他們的檢控。為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分社記者所寫稿件大都站在「百萬雄師」的立場上說話；此時，分社還特意派出一位元記者住在總社，待分社稿件發到總社後，先由該記者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加以改寫，再交總社編審交發稿。在新華社湖北分社周圍，有「百萬雄師」的人監視。⁴⁵

⁴² 徐海亮：《7·20 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 年。

⁴³ 徐海亮：〈武漢「7·20 事件」——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觀點〉，載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田園書屋出版社，2010 年，第 471 頁。

⁴⁴ 徐海亮：《7·20 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 年。

⁴⁵ 張春亭：〈我擔任「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的難忘往事〉，載《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

五、中共中央的應對措施

周恩來 7 月 18 日深夜從武漢飛回北京，19 日凌晨接見湖南來京人員，解決湖南鐵路中斷問題。20 日的上午，周恩來正在北京釣魚臺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楊成武從武漢來的緊急電話打到會場，告知武漢的亂象。

周恩來立即告訴楊成武，根據情況將毛主席隨時轉移到安全處所，並決定安排一下北京的事，馬上飛到武漢。下午，林彪與中央文革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商議武漢問題對策，周隨後也趕到。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發一個檔，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求武漢軍區轉變立場。並且要求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公開表態，支持武漢造反派。會議還要求，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打電話給所轄的駐武漢部隊，做好工作。吳法憲就給武漢空軍司令員傅傳作、政委簫前和副司令員劉豐打電話，要求他們按中央決定辦。⁴⁶會上確定海軍在武漢的艦隻上的水兵上岸行動，空 15 軍隨即進城維持局勢。

20 日下午 4 點，邱會作奉命到人大會堂見林彪，李文普帶他先見葉群。葉群告訴邱會作：「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說：『反革命分子已經沖進來了，快沖到主席住處。』」「江青哭哭啼啼地找林彪，要死要活地求林彪、葉群親自到武漢去保證毛主席的安全。」⁴⁷林彪寫了一封勸毛離開武漢的信，交給戚本禹修改，陳伯達、關鋒參與修改，信的末尾簽的是江青的名字。⁴⁸林彪派邱會作帶上江青的信立即乘飛機去武漢。行前，葉群帶邱會作見了林彪，林給邱交代任務：(1)向毛主席報告全國形勢；(2)建議主席轉移一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安全就是黨的安全」，你就說這話是我說的；(3)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而陳再道又不聽指揮，設法告訴總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著，

⁴⁶ 《吳法憲回憶錄》，第 684-685 頁。吳法憲回憶說，周恩來回京當晚就主持了中央文革碰頭會，時間似乎不確，因為周恩來晚 11 點半從武漢起飛，到北京已凌晨了。《周恩來年譜 1949-1976》說是 20 日是可信的。

⁴⁷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533 頁。

⁴⁸ 錢嗣傑、顧保孜：《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 1964-1968》，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年，第 259 頁。

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說：「你如果無法和總理靠近，就在王家墩機場設立指揮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聯繫。武漢地區的 29 師和空降軍已經做好戰鬥準備。」林彪說：「你要告訴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要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絕對保證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⁴⁹邱乘飛機於 20 日晚 11 時左右到了武漢王家墩機場。⁵⁰與邱會作同時離京赴漢的還有解放軍總醫院的醫療隊。

周恩來 20 日下午飛回武漢，但他的行蹤已經暴露。百余名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的卡車沖進王家墩機場，來人帶著武器，大叫：「我們要看周總理！要向周總理告狀！」⁵¹據吳法憲回憶，山坡機場的安全性遠不如王家墩機場，他接到武漢空軍劉豐電話，說有十多輛汽車沖進了王家墩機場，只好降在離武漢 60 公里的山坡機場。⁵²

周恩來的隨行醫生張佐良回憶：「這次飛武漢的除了周恩來的專機以外，還有兩架飛機，載有 8341 部隊指戰員。飛機抵王家墩機場低空盤旋時，看到下面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機長走到周面前說了些什麼，飛機又拔高向另一方向飛去，十多分鐘後降落在山坡機場。此時大約 5 點鐘。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又上飛機飛到王家墩機場。為了不暴露目標，待到天黑以後，周恩來穿上便服，帶上墨鏡，帶上少數隨從人員乘兩輛吉普車，由空軍派人引路開往東湖賓館。周到達百花一號，迅速安排毛安全撤離。空 15 軍上甘嶺特功八連調至武昌護衛毛澤東到漢口機場支線專列上。」

邱會作 20 日晚 11 點左右到達武漢王家墩機場後，立即和周總理通電話。周說：「好，你在機場待命，過一會兒有人找你。」21 日凌晨 3 點多，楊成武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邱知道毛已安全轉移出來了。邱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開往毛主席在漢口機場支線的專列。毛在專列上接見了邱，說：「興國佬來了。你那個總後勤部還聽你的話嗎？文革是個好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去表演

⁴⁹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533 頁。

⁵⁰ 《邱會作回憶錄》，第 533 頁，吳法憲回憶是 20 日下午 2 點多到武漢，《吳法憲回憶錄》，第 687 頁。飛機是吳法憲安排的，邱會作是乘飛機的，還是邱會作的話可信。

⁵¹ 徐海亮：《7·20 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 年。

⁵² 《吳法憲回憶錄》，第 687 頁。

的。」邱把江青的信和林彪關心毛的話轉告了毛。毛從東湖轉移出來後只是叫人通知陳再道找回王力，對自己是否離開武漢還沒有發表意見。毛看完邱會作帶來的信後，可能是感到情況嚴重，說：「準備飛機，我們離開武漢。」凌晨 2 時許，毛澤東和劉豐、楊成武、李作鵬乘坐武漢空軍的小車，在中央警衛部隊的保護下，直奔機場。楊成武問：「是準備專機還是坐空軍的飛機？」毛說：「都準備。」快上飛機時，毛才告訴楊成武：「坐空軍的飛機。」機長問：「往哪個方向飛？」毛說「先飛起來！」飛機離開了大地，在武漢上空盤旋，毛才說：「往東飛，去上海。」⁵³中央過去有規定，為了安全，毛外出一概不乘飛機。這次破例乘飛機是迫不得已。

7 月 21 日上午 11 時，毛澤東等人的飛機抵達上海。執行飛行任務的是飛行團副團長潘景寅。他就是 1971 年「9·13」為林彪開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溫度爾汗的那位元飛行員。⁵⁴

毛澤東離開武漢後，周恩來留在武漢繼續處理「7·20 事件」。周和李作鵬住在同一別墅裏的不同房間，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換房間住，但李住周的房間還按周的開燈時間開燈，以迷惑外界。21 日上午，周在別墅裏再次接見陳再道，李作鵬在場。周要陳把王力找回來，陳說：「我不知道王力在什麼地方。」周說：「你派人去找回來。」陳說「我找不回來。」看到陳這樣的態度，周很生氣，「啪」地一聲拍了桌子，站起來大聲說：「你這是什麼態度？你不要以為你有「百萬雄師」撐腰，「百萬雄師」算什麼？如果把你反對中央決定，威脅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員的事情通報全國，8 億人民就要起來反對你們。你看 8 億人民力量大，還是「百萬雄師」力量大。你既然採取這樣的態度，你離開這裏到北京去！」陳再道低著頭，告別了總理。⁵⁵

周總理急著尋找王力。「百萬雄師」獨立師的人審問了王力後，孔慶德進去了。孔慶德叫「百萬雄師」頭頭劉敬勝、謝敏華退出去，

⁵³ 顧保孜、錢嗣傑：《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 1964-1968》，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年，第 259-261 頁。

⁵⁴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534-535 頁，徐景賢回憶，毛是 7 月 21 日凌晨 2 點到達上海的，見《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第 215 頁。

⁵⁵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595 頁。

把王力交給了 29 師領導人張昭劍，張帶著王力往山上跑，深一腳、淺一腳，慌不擇路，把腿摔傷了。張昭劍把王力保護在 29 師二連，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從張昭劍處找到了王力。劉豐救王力，是因為吳法憲事先打了招呼，要劉豐不要聽武漢軍區的。⁵⁶到 21 日上午周恩來還不知道王力的下落。21 日下午劉豐向周恩來報告，才知道王力在 29 師。找到後，劉豐秘密將王力轉移到武漢空軍的一個部隊隱藏起來。總理聽到後很高興，表揚劉豐立了大功。⁵⁷

21 日深夜，周恩來指示，由李作鵬和劉豐兩人到武漢空軍部隊接王力並負責護送到山坡軍用機場。在機場，周恩來召開會議佈置穩定武漢局勢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隊調動。

7 月 22 日凌晨 3 點鐘，李作鵬、王力、劉豐乘車從武空司令部下屬部隊到山坡機場。不久，周恩來、謝富治一行，也在空 15 軍王銀富科長帶領與特功八連護送下趕到機場。連鬍子都未刮的周恩來上樓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趕到裏屋，總理緊緊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親了又親，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憶，周還流下眼淚。）

22 日下午，周恩來把王力、謝富治送上飛機，周和李作鵬的專機後來起飛。到北京後，周讓王力乘的飛機在天上繞圈⁵⁸，以便周恩來和李作鵬早一些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周先趕到機場迎接王力。迎接王力的群眾達萬人以上。⁵⁹王力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儀式的氣氛非常熱烈，仿佛是歡迎打了大勝仗、載譽歸來的英雄。王力穿了一身不太合體的空軍幹部服，由人扶著走下飛機，因他的腳傷了，周恩來和江青在兩側攙扶著他，一瘸一拐地接受聚集在機場上的人群的熱烈歡迎。⁶⁰

23 日凌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謝、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

⁵⁶ 榮根：〈武漢「7·20」事件 40 周年——「百萬雄師」頭頭命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

⁵⁷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596 頁。

⁵⁸ 陳再道說是林彪、江青為了擴大聲勢，讓飛機在空中繞圈，陳再道：〈武漢 7·20 事件始末〉，轉引自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1988 年。

⁵⁹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596 頁。《王力反思錄》（下）第 255 頁，據王廣宇回憶，歡迎隊伍只有幾千人，王廣宇：〈「7·20」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的幾件事〉，《記憶》第 16 期。

⁶⁰ 王廣宇：〈「7·20」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的幾件事〉，《記憶》第 16 期。

武漢三鎮頓時爆炸了，幾天來四下躲藏的造反派和普通民眾紛紛奔相走告，很多地方貼出了「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標語。

獨立師部隊和「百萬雄師」轉不過彎，除了繼續遊行以外，還有大批人乘火車到北京。武漢造反派通知了北京的造反派。獨立師的軍人在北京永定門車站被北京的造反派圍堵，有的被抓到各大學裏做說服工作，實際是圍攻，圍攻中領章、帽徽也被撕掉。

7月2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30萬人大會（一說100萬人），歡迎中央代表團回到北京。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全體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王力坐輪椅在最中間的位置，林彪和周恩來站在他兩邊。王力反對高規格的機場迎接和天安門廣場的歡迎大會，這一系列作法是林彪主持的，林彪、江青等人說：這樣作法，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主席。⁶¹

7月26日，經中共中央討論、毛澤東批准後發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指出，「7·20事件」「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軍區領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宣稱「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堅決支持『鋼工總』、『鋼二司』、『鋼9·13』、『三司革聯』、『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堅決同他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同一天，〈中共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的覆電〉中說：「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覆電連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一起以中共中央檔（中發〔67〕227號）下發。覆電指出，「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7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給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革命委

⁶¹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5頁。

員會籌備小組)，軍事管制委員會，各軍區，各省軍區、各總部發電報指出，中央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在全國城鄉廣泛張貼。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說：「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凱歌正在鼓舞著全國」，「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解散『工總』這個革命組織，並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們逮捕很多革命組織的群眾，也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這些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應當堅決平反，一律釋放」。

7月26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對陳再道、鐘漢華進行了批鬥。陳再道、鐘漢華等是按林彪、周恩來的安排，於7月24日押到北京的。在26日的批鬥會上，周恩來說：「你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為！」吳法憲、劉豐等人撕掉了陳、鐘兩人的領章、帽徽，還對他們做了「噴氣式」，吳法憲還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⁶²

7月27日，陳再道、鐘漢華被撤職，曾思玉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劉豐任武漢軍區政委。「7·20」事件後，造反派得勢，「百萬雄師」鳥獸散，其成員在一些單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報復，官方公佈的數字是：打死600人，重傷6萬4千人。輕傷18萬4千人。⁶³官方這個數字是誇大了的。武漢文革研究者商欣仁（彭祖龍）提供的數位：打死17人，打傷400餘人。這個數字顯然是縮小了。

六、八月失控和毛的戰略轉變

武漢「7·20事件」發生時，北京流行的說法是「武漢兵變」。7月22日早上，蒯大富傳達戚本禹的電話指示：「你們要去西山遊行，

⁶² 《邱會作回憶錄》，第532-535頁；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540頁。

⁶³ 商欣仁、彭祖龍：《灑向人間都是怨——武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綱要實錄》（電子版）。

懂嗎？」北京西山是軍隊領導機關所在地。蒯大富參加了7月25日天安門廣場歡迎王力的大會，上了天安門城樓。蒯大富回憶說：「群眾代表在天安門大會上發言呼喊『打倒軍內一小撮』、『打倒陳再道』等口號時，林彪也都舉了手。在天安門城樓休息時，林彪對周圍的人說，武漢『7·20事件』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與王力談話中，我認為到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時候了。……下一步的戰鬥任務就是專門解決各大軍區的問題。」⁶⁴北京的造反派一下子把矛頭指向了軍隊，蒯大富還派人抄了徐向前元帥的家，說他是陳再道的後臺（都是四方面軍的）。原屬四方面軍的徐海東將軍也受到衝擊。林彪垮臺後有人認為，這是林彪曾企圖借武漢事件清除非「紅雙一」的勢力，但沒有搞下去就終止。

毛澤東從武漢飛到上海還沒有冷靜下來，說不僅不反對「揪軍內一小撮」，還提出了「武裝左派」的問題。毛在武漢時就有了武裝左派的想法。7月18日晚上毛對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鐘漢華的談話中說：「為什麼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毛還說武漢「鋼工總」在水電學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要親自去看一看。⁶⁵7月22日，江青就在北京接見河南代表時講「文攻武衛」。

1967年8月4日，毛澤東在上海的時候，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調動十幾萬人，以棍棒、長矛、木槍為武器，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武力鎮壓了反對派組織「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當天晚上，毛澤東坐著蘇聯造的鋼甲防彈轎車親自到外灘巡視，親眼看到了手執長矛、短棍、稱為「文攻武衛」的「工總司戰士」。他還觀看了上海電視臺播放的「工總司」沖砸「上柴聯司」的紀錄片，稱讚雲梯上的人真勇敢。張春橋說，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趣。張春橋趁打完「上柴聯司」取得成功的機會，向毛請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毛回答：「武裝上海10萬工人。」張春橋問：「可不可以發槍？」毛回答：「每人先發一根棍子。」⁶⁶毛很快同意向造反派發槍。

1967年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提出要武裝左派，

⁶⁴ 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化歷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89頁。

⁶⁵ 《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6頁。

⁶⁶ 《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3年，第223-224頁。

要搞第二武裝。毛在信中說，75%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革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武裝左派。這封信還提出「群眾專政」，說「北京過去大體上就是這麼做的」。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信頭的稱呼是「江青」，署名是「潤之」。⁶⁷毛武裝左派的號令一出，各地迅速行動。當年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在一次談話中說：

武裝左派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四川有幾個地方已經武裝了經得起考驗的革命左派，一個是萬縣，一個是涪陵，還有瀘州。萬縣、涪陵革命派經過幾個月同保守組織的鬥爭是經起了考驗的。所以在前幾天把他們武裝起來了。革命派的武裝要成為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護國家財產，維護社會秩序，防止壞人殺害革命群眾的強大力量。武裝革命派要有計劃、有步驟的實施，要經中央批准後再作，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裏。我們這兩個地方都報了中央，經中央批准才作的，不能隨便武裝。需要武裝的革命派必須有這麼幾條原則：(1)武裝的必須是左派；(2)革命派手頭的槍，只准自衛，不准進攻，不許拿槍去鎮壓群眾，那是不容許的；(3)武裝要按單位（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來解決，不能跨行跨業，跨行業不行，那種武裝搞法有危險；(4)武裝起來的單位，即革命派必須絕對聽從調動，聽從當地駐軍最高的指揮員調動。在成都來說，要絕對聽從警備司令部的調動，服從指揮；(5)必須是造反派佔優勢的地方，解放軍要派人去加強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⁶⁸

軍隊「武裝左派」只給他們信任的一派發槍，另一派當然不服，就搶槍。很多是半搶半送。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接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周恩來陪同。毛對客人說：「兩邊都發槍，一

⁶⁷ 《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6頁。

⁶⁸ 〈張國華同志在四川省農業生產計畫、財貿、金屬材料生產供應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8月28日。原載東方紅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造反總部主辦《蓉城快報》第1期，1967年9月。轉引自《昨天》，2012年，第3期。

共發了 100 萬枝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周恩來補充說：「名義上是搶槍，實際上是送槍。」槍枝流到群眾手中的數字比毛說的 100 萬枝要多得多。

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都接過了「文攻武衛」的口號，使武鬥全面升級，從長矛、棍棒發展到真槍實彈。

由於支左部隊大部分是支持保守派的，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受到軍隊的壓制。「武漢 7·20」事件一出，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衝擊支持保守派的軍隊。在中央文革的引導下，一度出現了「揪軍內一小撮」（「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的高潮。「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來自在「5·16 通知」中的毛澤東親自加上的那一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以後這種提法在《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權威文章中多次出現過。

據王力回憶，他們從武漢回到北京以後，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⁶⁹7 月 27 日中央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也有「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

不在於「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有沒有合法性，而在於「7·20 事件」以後，這個提法變成了全國造反派的實際行動。受軍隊壓制的造反派，借陳再道倒臺的機會，紛紛起來衝擊軍隊。當時各軍區，包括大軍區和省軍區的告急文電，雪片似地飛向中央、飛向中央文革小組，報告各地在揪「本地的陳再道」。⁷⁰在幾個月前的「二月鎮反」中，很多地方的軍隊實行了鎮壓造反派的行動，現在是造反派翻身的時候了。

全國造反派都起來衝擊軍隊，而文革必須依靠軍隊來支撐局面，這是一個沒有迴旋餘地的剛性矛盾。如果軍隊像地方政府那樣全面癱瘓，那就無法收拾了。軍隊受到全面衝擊以後，表示出強烈不滿情緒。

⁶⁹ 《王力反思錄》第 2 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255 頁。

⁷⁰ 閻長貴：〈我所知道的關鋒〉，《同舟共進》2013 年，第 4 期。

毛雖然是政治強人，但他還必須權衡各種力量，使自己處在各種力量的平衡點上。只有這樣才會有掌控各種力量的主動權。為了平衡，他不惜犧牲忠於自己的左右兩邊的極端力量，也不顧他前些時發表的一些言論。毛澤東從武漢「7·20」事件中冷靜下來以後，改變了文革的戰略。

在這期間，外交戰線也出現了失控。年輕的學生們認為外交部對帝、修、反太軟弱，就採取了種種激烈的行動。同中國已建交和半建交的 40 多個國家中的近 30 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⁷¹最突出的是 8 月 22 日一把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情況，本書第 29 章有介紹。

外交部本來是周恩來分管的領域，外交部的造反派「革命造反聯絡站」一成立，就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造反派基本上還是執行了周恩來所定並得到毛澤東同意的「領導運動，監督業務」的原則，並沒有奪取外交部的業務大權（只是在業務上有一些越權行為，如擅自批發了一些電報）。

從武漢回來的王力，風頭正健，頭腦一時膨脹，8 月 7 日，他主動找外交部造反派談話。他說：「毛主席和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在主席那裏說的。」他說：「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就這麼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的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你們 1 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動一動班子？」「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點綴品。」「你們要充份利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20 歲可以當中央部長，毛主席說的，為什麼不可以？……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掌握，有點權才威風。」⁷²

王力講話以後，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奪了政治部的權。奪權後新的領導小組向駐外使館拍發幾十件電報，其中使用了「打倒

⁷¹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 558 頁。

⁷² 王力講話時外交部專業速記員葉紀文記錄，轉引自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119-121 頁。

劉、鄧、陳」的口號，陳就是陳毅。

陳毅在「二月逆流」中言詞激烈，毛很惱火，希望造反派對陳毅施加一些壓力，但不準備打倒他。王力8月7日講話以後，批判陳毅升級。「打倒陳毅！」的口號滿天飛。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國語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批陳聯絡站」，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參加的「批鬥陳毅大會」，陳毅遭到批鬥。

在武漢「7·20」事件以後的8月，全國各個領域、各個地區的造反派一時狂熱，出現了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需要控制局面。

他拋出了幾個沒有實力、根基不深的文人作為犧牲品，他們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1967年8月1日，《紅旗》雜誌第12期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的文章。該文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是當前的大方向」，「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該文由《紅旗》雜誌編委林傑起草，關鋒修改後由陳伯達簽字發表。

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篇社論，指出要「還我長城」⁷³。「長城」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8月12日，毛澤東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不策略。⁷⁴「軍內一小撮」沒有被揪出來，關鋒卻倒楣了。倒楣的還有王力和戚本禹。

王、關、戚倒臺周恩來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凌晨1時，周恩來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了控制。王力有一個「八七講話」，一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飛往上海向毛報告。8月26日上午，楊成武向毛轉述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正在「治」、「亂」之間作選擇的當口，聽了楊成武的彙報。⁷⁵8月26日，毛澤東對楊成武說：王力、關鋒是破壞文化大革

⁷³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7頁。

⁷⁴ 《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7頁。

⁷⁵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41頁。

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個人報告，要把他們抓起來，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單獨向總理一人報告，由總理負責處理。可以先解決王關的問題。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⁷⁶毛還對王力的8月7日的講話批示：「大、大、大毒草」。⁷⁷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飛回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彙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晚上，周恩來在釣魚臺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來宣佈：「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隨即，周就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指示。⁷⁸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閻長貴回憶說：「總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場」，「對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⁷⁹第二年1月，對戚本禹也作了同樣的處理。在文革十年中，他們下獄八年多，在這期間，趕上1975年獄犯大赦，毛特加限定「除陳伯達和王關戚外」，文革後戚本禹又被判刑十八年。他們的家屬也受牽連，戚本禹的年幼的孩子被弄到空氣稀薄的青海格爾木。

王關戚倒臺是周恩來力促的結果。與周恩來、鄧穎超有私交的英國作家韓素音在她的書中寫道：「周把中央文革小組中的王、關、戚三人清洗掉了，幹得乾淨俐落，削弱了毛夫人一派勢力。」⁸⁰韓素音沒有提毛澤東，只說是周恩來。也許她說的有道理，周恩來在關鍵時刻通過楊成武向毛進言，清除了中央文革中激進的一翼，使文革鋒芒頓挫，這正是「清君側」的良好效果。《王力反思錄》中說整他的是江青和康生，說周總理保他⁸¹。這是因他寫反思錄時江青和康生已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而周恩來是中共唯一的光輝形象。

王關戚倒臺以後，周恩來找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副主任吳德、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談話，要求把與王關戚有關的人員清理出市

⁷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926頁。

⁷⁷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83頁。

⁷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928頁。

⁷⁹ 閻長貴：〈戚本禹、閻長貴說「文革」〉，《往事》，第119期，2013年3月29日。閻長貴，當時任江青的秘書，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注：應修改為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人員）

⁸⁰ 韓素音：《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72頁。

⁸¹ 《王力反思錄》第2版（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58-260頁。

領導機關。原來北京市革委會裏，學部（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人很多，多是戚本禹派進去的。按照周恩來的意見，清理出了一百四、五十人。⁸²

王力的地位在一個月間從天堂掉進了地獄。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來了一個 180 度的轉變。對王力態度的轉變是毛澤東文革戰略轉變的一個環節。毛雖然權高一切，但他的行為還要受各種力量左右。他是「偉大的舵手」，舵手得見風使舵，逆風使舵會翻船的。表面上看，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實際上他也有他的難處。此時，王海容⁸³就王力的事向毛摸底，毛對王海容隨口念了兩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⁸⁴（毛引用的是唐朝羅隱的《籌筆驛》中的兩句）毛在這裏講的「時」、「運」就是大勢，就是風向。

毛從武漢飛到上海後，就採取有別於上海、黑龍江等地的方針處理南京問題。南京地區群眾組織分兩大派，一派是南京軍區支持的「8·27」，另一派是上海張春橋支持的「紅總」。紅總力量佔優勢，他們聯合江蘇、浙江、安徽的造反派反對南京軍區，反對許世友。許世友跑到大別山軍區農場躲避，還說，誰要打倒他，他就在大別山打遊擊。毛讓張春橋到大別山把許世友請到上海，立即接見許世友，說許世友是好同志。⁸⁵許世友也不是後來宣傳的愚忠莽漢，而是一個乖巧的人。許一見面就跪在毛澤東跟前，毛將他扶起來，說了一些安撫他的話。他在大別山打了兩隻豹子，一隻送給楊成武，一隻送給張春橋（官史作者為了貶低張春橋，說送給張春橋的是兔子），還送張春橋一箱茅臺酒。許世友還主動積極地為王洪文的得力幹將馬振龍介紹物件。⁸⁶

9月1日，中央文革幾位領導人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宣佈了文革戰略轉變。江青一反過去支援造反派的常態，說：

⁸²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朱石元等訪談、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66頁。

⁸³ 王海容，毛澤東的表侄孫女，外交部官員，是當時能見到毛澤東的少數人之一。

⁸⁴ 宗道一：〈「王八七講話」和外交部「奪權」鬧劇〉，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6版，第242頁。

⁸⁵ 《李作鵬回憶錄》，第601頁。

⁸⁶ 顧訓中：〈上海「文革」期間的軍政關係——「九一三」事件40周年訪問朱永嘉〉，《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第70、73頁。

「我認為北京應該帶頭搞好鬥批改，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如果不搞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個年頭呢？你們想過沒有？」「不要怕人家說你們右傾。」「要堅決反對反動的無政府主義。」她批評造反派：「你們鬥爭鋒芒完全錯了，不是對準劉鄧陶，而是對準所謂『軍內一小撮』，到處抓『軍內一小撮』指向革委會。」「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是錯的，打亂了我們的軍隊，這是自毀長城，……即使我們軍隊老幹部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但一旦打起仗來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陳伯達說：「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是代表小組的，代表中央說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的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這些激進的文革領導人都在講話中批評造反派的過激行為，要他們支持解放軍。周恩來最後歸結幾點：(1)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形勢的估計。一年來全國佈局已經搞好，現在第二年就是爭取勝利的一年，第三年掃尾。(2)軍隊的將領大多數都是好的。要支持解放軍，不要自毀長城。(3)動員在北京的外地群眾回去。制止武鬥。(4)停止串聯，所有外地串聯的馬上回本單位。(5)今年每個單位都要把大聯合、三結合搞好。(6)抓革命、促生產。生產是最後結果。(7)1966年畢業生從9月1日起開始按畢業生待遇。

從1967年9月開始，1966年的畢業生雖然還在學校，卻領到了46元的月薪。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等接見安徽群眾代表。康生說：「中央關於當前的重要問題是形勢問題，關於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堅決擁護解放軍的問題，這都是大的方向問題。」江青講話中再次強調，「抓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強調克服無政府主義和派性，重申中央6月6日通令⁸⁷和8月25日發出的〈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9月16日，毛澤東離開上海，經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回北京，他沿途找這些省的負責人談話。他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發

⁸⁷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通令〉，1967年6月6日；中發（67）178號。要求「維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保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正常進行，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

出了〈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重要指示〉，這個檔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接著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在談到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毛說，什麼「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說，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正確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鞏固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⁸⁸毛的南巡講話，一改文革綱領性檔「5·16通知」的凌厲，也沒有他那〈我的一張大字報〉的鋒芒。「7·20」事件後，已經「天下大亂」，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走向「天下大治」了。

為了安撫軍隊，毛把軍隊各總部、各兵種和各大軍區領導人安排到北京辦學習班。像1966年接見紅衛兵那樣，毛一次又一次接見參加學習班的幹部。1967年9月26日，中央軍委辦事組請剛從南方回來的毛澤東接見軍隊學習班的代表。接見開始時，毛大聲問：「陳再道來了沒有？」陳趕快站起來，大聲回答：「主席，我在這兒！」毛向他招手點頭，說：「好！好！來了就好！你學習一段時間好！不要洩氣，要繼續革命。」⁸⁹「7·20事件」的功臣已成了階下囚，「7·20事件」的禍首卻成了座上客。這只有兩個月時間！

幾年以後，陳再道、鐘漢華都安排了重要工作。1972年春⁹⁰，江青在廣州療養的時候，在廣州機關部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她講到武漢「7·20事件」時說：「我們怎麼搞的，搞錯了，是王關戚搞的。」

⁸⁸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2，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85-390頁。

⁸⁹ 程光：《心靈的對話》第185頁。

⁹⁰ 陳再道說是1974年批林批孔期間，江青在廣州接見鐘漢華說：「我對不起你們，我也是上了林彪的當，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門，我也跟著上了天安門。林彪當時是一箭雙雕，通過「7·20事件」既打倒陳再道同志，又謀害毛主席。」陳再道：〈武漢7·20事件始末〉，轉引自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1988年，第524頁。陳再道和丁盛說的可能是一回事。

鐘漢華那時是廣州軍區副政委，聽了以後很感動，很激動。⁹¹

⁹¹ 《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236頁。

第一六章

清查「5・16」之謎



清查「5・16」分子的兩個場面

文革中整人時間最長、受害者最多的運動是清查「5•16」運動。這個運動發端於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10萬計。¹《「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對本書作者說：「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5•16』一直不清楚。為什麼1967年對『首都5•16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5•16』？為什麼九大以後還清查『5•16』？清查『5•16』是怎樣進行的？為什麼專案組長李震自殺？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清查『5•16』是個謎。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金春明說：「關於清查『5•16』的檔案在公安部，80年代我曾申請看，沒有批准。」
2

在檔案沒有開放以前，這個歷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這個大案是官員整群眾，而且目標是對著造反派的。這個運動，不僅把造反派的激進分子打盡殺絕，還殘害了大批無辜百姓。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一樣，是官員整老百姓的運動。「民整官」的運動（即衝擊「走資派」）只有一年多時間，官方文革史卻大寫特寫，「官整民」的運動持續時間之長、被整人數之多，手段之殘酷，遠遠超過「民整官」的運動，官方文革史卻惜墨如金。

一、起因：激進學生惹起禍端

周恩來在文革中一方面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意圖，另一方面也在不違反毛的意圖下乘機對一些老幹部施與一些力所能及的保護。周恩來是支持造反派的，當然這是順著毛的意圖；但周對造反派中的激進勢力也採取了一些壓制。1967年春夏，各地造反派都遭到軍隊的鎮

¹王力說，清查「5•16」全國搞了1千萬人，抓了350萬人，成了文革中整人最多的冤案，《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61頁。

²金春明在他家中同楊繼繩和王友琴的談話，2011年7月10日。宋任窮回憶說，清查「5•16」的檔案在中組部，見《宋任窮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8月，第77-78頁。

壓，死了不少人。造反派認為劉、鄧已經垮臺了，在中央一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後臺，那就是周恩來。1967年3月22日晚，在鋼鐵學院「革造」紅一團的內部會議上，張建旗作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發言，說周恩來「是毛主席的同路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了中央文革的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等等。有30多人支持張建旗的觀點。北京外語學院和北京商學院也有反周恩來的活動。³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檔下達，沒有公開發表。1967年5月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一些年輕人以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劉少奇，這次公開發表也會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團」，6月2日，張建旗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信〉的大字報，提出23個問題質問周恩來。⁴與此同時，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劉令凱為首的「6·16」戰鬥組公開攻擊周恩來。一些激進的造反派認為，劉少奇被打倒以後，主要矛盾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毛澤東嚴厲批評「二月逆流」以後，有人認為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黑後臺」。然而，無論是北外「6·16」，還是北京鋼鐵學院「5·16兵團」，都是人數很少的學生戰鬥組，用「兵團」一詞是虛張聲勢。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這些反對周恩來的學生組成的「首都5·16紅衛兵團」，在北京外語學院召開了第一屆代表大會，大會決議上寫道：

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一員幹將，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解放以來兩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戰略階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風⁵的煽動主角，是全國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總後台，是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改造基

³首都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反革命陰謀組織「5·16兵團」罪惡活動大事記》，1967年12月。

⁴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記錄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69頁。

⁵所謂「12月黑風」是指1966年12月出現的反對林彪、反對中央文革的一股風。如，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紅衛兵伊林、滌西，在清華大學貼出了〈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12月1日，北京林學院紅衛兵李洪山在辯論中提出：「中央文革的產生不符合『十六條』」等。



文革中激進學生肆意破壞文物

本完成以後，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是最近全國發生一連串大規模屠殺的客觀支持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企圖把水攪混，篡黨，篡軍，篡政伸手來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果實的中國第二個赫魯雪夫式的個人野心家。我們「首都 5•16 紅衛兵團」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幹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餘秋裏，穀牧等決一死戰！⁶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記者站的一位元通訊員，得知北京鋼鐵學院「5•16 兵團」準備貼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就將情況報告了中央文革記者站。中央文革記者站北京記者組負責人袁光強，及時向中央文革報告了這一情況。中央文革沒有制止。午夜後，「5•16 兵團」貼出反周恩來的大字報後，馬上就有人用其他內容的大字報覆蓋上了。幾天以後，由戚本禹出面叫辦事組的專職黨總支書記王道明組織人調查「5•16 兵團」背景和活動情況。調查結果是：(1)所謂「5•16 兵團」是北京鋼鐵學院的一個小群眾組織，參與攻擊周恩來活動的人很少。(2)有的人懷疑中央文革記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5•16 兵團」反總理活動的通訊員，同「5•16 兵團」骨幹分子有密切聯繫。這位元通訊員外出採訪用的是《紅旗》雜誌記者站通訊員的名義（當時中央文革記者站對外活動都是以《紅旗》雜誌記者站的名義出現）因此這事又和《紅旗》雜誌社掛上了鉤。(3)在調查中，從「5•16 兵團」骨幹分子的筆記本中，發現記載著《紅旗》雜誌社編輯周英的電話號碼，而周英是《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關鋒的妻子。在審查一位「5•16」骨幹分子時得知，他們同《紅旗》雜誌社編輯部負責人林傑有聯繫。這樣又進一步分析，「5•16」兵團同《紅旗》雜誌有瓜葛。⁷但是，到底有什麼瓜葛，也沒有查出什麼。

8月8日，5•16 兵團在西直門、北海、王府井、師大、農大、政法、商院等處散發「把軍內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十九個為什麼？」等五種傳單，攻擊周恩來，並把矛盾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傳

⁶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2版。

⁷王廣宇：《「5•16」反革命案發生的真相》，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第137-145頁。

單說：「扭轉了的乾坤我們再扭轉過來，恢復其本來面目！」8月9日，在北京市許多單位，公共場所，出現了「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傳單、標語和大字報。⁸此間，來自長沙的造反派也參加了北京的反周活動。

反周活動當時就遭到多數造反派組織的批判和抑制。據當時報導：「8月26日，首都及全國在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共1千多個單位在鋼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516兵團』大會，會上鬥爭了5•16的頭目張建旗等五人。」⁹

1967年8、9月，除了召開大會批鬥學生中的「5•16」頭頭以外，還抓捕了這些學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頭頭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事後，中央文革小組的記者調查組，曾經向中央文革及時寫了調查報告，說明「『5•16』是一個人數不多的組織，已被徹底摧毀，不復存在」。9月10日，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接見中學紅衛兵代表時說：「5•16」兵團「他們人數不超過50人，真正的壞人不超過十幾人，可能有後臺老闆，走資派。」9月12日，北京紅衛兵召開10萬人大會，慶祝粉碎「5•16」分子的勝利。¹⁰

到1967年10月，北京學生組織「5•16」兵團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該結束了。然而，這僅僅是開始。

二、升級：扭轉形勢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曾考慮1968年結束文革。但是，到1967年夏秋之間，出現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漢「7•20」事件之後，各地造反派乘機衝擊1967年春夏之交曾經鎮壓過他們的軍隊，軍隊有可能被搞亂；反對周恩來，反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舊政府」，這使得在文革中維持局面的政府機構搖搖欲

⁸首都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編《反革命陰謀組織「5•16兵團」罪惡活動大事記》，1967年12月。

⁹同上。

¹⁰周良宵、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486-487頁。

隧；「大聯合」「三結合」阻力重重，新成立的革委會都受到衝擊，很多地方「新生的紅色政權」處於動搖之中；火燒英國代辦處，形成了影響很壞的國際事件；在中南海周圍建立「揪劉火線」，10萬紅衛兵，晝夜不停地廣播，要把劉少奇揪出來批鬥，這是向中央施加壓力；武鬥不斷升級，很多地方發展到真槍實彈的戰爭。……

這些亂象，都是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的結果。這些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大多是堅定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為毛澤東衝鋒陷陣的人。至今，毛澤東這個政治魔術師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漢「7·20」事件後，毛對文革有一個戰略轉變，即運動衝擊的重點從官僚集團轉向造反派中的「壞人」，從壓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從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拋出「王、關、戚」是這個戰略轉變的第一步，接著，就要打擊堅持「王、關、戚」看法的造反派頭頭。「王、關、戚」看法就是毛在運動初期的看法，現在戰略轉變，這些看法也隨之被拋棄。毛澤東1967年夏秋視察華中、華東、華北的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清查「5·16」是毛澤東的緊箍咒，造反派不聽話，就念這個使造反派頭痛的咒語。毛澤東念這個緊箍咒降服「魔鬼」，結束混亂。他說「要警惕煽動極左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結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儘快穩定局勢的意見。¹¹

此期間，北京市送上有關北師大的一個報告，報告中說：「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這句話旁批示：「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還批評北京市不抓「5·16」。¹²「這就好了」是什麼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辦法了。這個辦法就是抓「5·16」。什麼是「5·16」？應當是毛說的「煽動極左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澤東一旦把鬥爭矛頭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對立的軍隊、運動初期被造反派整過的官員、革委會中的新貴，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澤東給的這個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

¹¹毛澤東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的談話記錄，1967年9月，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95頁。

¹²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記錄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68頁。

派。群眾組織也利用這個機會抓對立組織中的「5•16」分子。

毛澤東戰略轉變意圖在中央形成了共識。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紛紛出來發表口徑一致的講話。

1967年8月11日，陳伯達和江青在講話中說：「『5•16』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周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5•16』組織，混水摸魚，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從兩方面，『左』的或右的來動搖中央。」¹³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不能再搞大串聯，要求造反派在本單位搞「鬥、批、改」，要相信軍隊，她講到「『5•16』以極左面貌製造混亂。」¹⁴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軼歐等第三次接見安徽群眾代表。江青說：「目前拿北京來講，就有這麼一個東西，我叫它是東西，就是因為它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組織叫『5•16』。它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穩定。而真正的幕後人是很壞的人。」接見後，安徽兩派群眾組織表示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中央很快發出通知，批轉〈安徽「P派」和「G派」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康生、江青同志的「9•5」指示〉¹⁵，這個通知說：「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陰謀，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來破壞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人民解放軍，破壞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事物，各個革命群眾組織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撥離間、混水摸魚、挑起武鬥、大搞破壞活動的壞頭頭、黑後臺劃清界限，揭穿其罪惡陰謀，不讓他們搞亂我們的陣線，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同時發聲，批評「極左」，批評「懷疑一切」。他們批評的正是一年前他們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

¹³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對大學紅代會、工代會及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講話，1967年8月11日

¹⁴江青、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等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文化部機關革命戰鬥組織聯絡站翻印，1967年9月1日。

¹⁵中發（67）306號，1967年9月23日。

書》，這篇文章說陶鑄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這兩本散文集是劉少奇「黑《修養》¹⁶」的姊妹篇。這時陶鑄已經被打倒，在全國高呼「打倒劉鄧陶！」的時候，發表這篇文章沒有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但是，這篇文章中有一段話，卻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取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謂「5·16」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過來，反戈一擊，切勿上當。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份現在還不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這一段話中，「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份現在還不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是毛澤東在審定姚文元的文稿時親自加上去的。這篇文章毛作過三次修改，¹⁷完全體現了毛的意圖。

毛親自修改、審定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中，列出的「5·16」的兩條罪狀來看：分裂中央領導，即反周恩來；反對解放軍。這兩項是造反派中激進的一翼的行為。毛澤東搞文革，一是離不開軍隊，二是

¹⁶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當時是全國批判的對象，稱為「黑《修養》」。

¹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2，第401-405頁。

離不開周恩來。軍隊是保持政權穩定的柱石。沒有周恩來主持政務，國家機器難以運轉；沒有周恩來執行，毛澤東的意圖難以貫徹。

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清查「5•16 反革命陰謀集團」號令，一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終於開始。

三、清查「5•16」的幾個高潮

第一個高潮：1967年8、9、10月。

8月17日，通過北京鋼鐵學院的群眾組織「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團組織部長李芳（女）。8月20日，又通過鋼鐵學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團頭頭張建旗。在此期間，其他一些「5•16」兵團的學生頭頭也相繼被捕。

抓了學生以後就抓「黑後臺」。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級幹部陳家康¹⁸，9月5日抓了外交部機要局的王煥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經周恩來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林傑（《紅旗》雜誌編輯）、周景芳（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兼秘書長）、趙易亞（《解放軍報》總編輯）和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等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左派都當做「5•16」的「黑後臺」，一個一個被投入監獄。

9月12日，學部「革命大批判指揮部」召開「憤怒聲討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洪濤反黨集團罪行大會」。

10月26日，中央軍委辦事組開緊急會議，會上傳達軍委首長指示：「要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取締反革命組織『5•16』兵團的決定。」軍委辦事組表示：「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這些反革命挖出來！挖不出來死不瞑目！」軍隊清查「5•16」，目標對準1967年「5•13」演出的「沖派」，即軍隊內的造反派。

¹⁸運動初期，外交部黨組將副部長陳家康、王炳南等打成反黨分子。批資反路線時，解放了陳家康等人。以後陳家康就站在造反派一邊，他揭發：陳毅曾在文革初的部黨委學習會上，說過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乾綱獨斷」。周恩來罵陳家康此舉是「跳樑小丑」，是「壞人」。

清查「5•16」的第一個高潮之後的幾個月，似乎沒有大的動作。

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3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的大會，卻說楊、余、傅是「5•16」的「黑後臺」，和楊、余、傅有關的人被清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向知識份子集中的單位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造反派的歷史終結。自1967年秋後，一些進入了各級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相繼被邊緣化，但有些造反派骨幹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臺，在一些省市搞「反復舊」，反對革委會，這使得清查「5•16」運動又開始升溫，一批「反復舊」的人成了「5•16」分子。1968年底，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68到1969年，清查「5•16」運動時斷時續地在一些單位內部進行，在全社會並沒有很大的聲勢，這可能是由於的確沒有「5•16」這個所謂「反革命陰謀組織」，難以進行下去。

第二個高潮：保衛紅色政權。1968年9月5日，隨著新疆革委會的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很多地方的革委會在權力分配上排擠了造反派，或利用革委會的權力鎮壓造反派（很多地方槍斃進入了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如山西槍斃了楊成效，天津槍斃了程國富，槍斃前遊街示眾。當時公佈了他們的罪行，即使這些罪行屬實，也不夠槍斃）。造反派哪能心服？所以，革委會成立以後還不安定。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後，中央領導集團恢復秩序的願望更加強烈，而被邊緣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運動初期的指導思想繼續造反，這就引發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周恩來在1969年9月20日晚講話中說：「『九大』以後，產生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還要鬧，還要奪權，你奪誰的權？不是要奪無產階級的權嗎？這就不簡單是極『左』。如果不改，還要鬧，後頭就必然有壞人。」「他們的這種做法，其基本性質上是1967年的『5•16』活動。」「原來搞『5•16』、挖『5•16』的時候，我們提了四條：第一，不要擴大化；第二，不要讓老保翻天；第三，要區別對待；第四，要促進大聯

合。提了這四條，當時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強調了不擴大化，就不敢動了，就縮手縮腳了。中央各單位還沒有搞深搞透嘛！」¹⁹

1969年10月29日，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學部的講話中說「『5•16』反革命集團是很兇惡的敵人，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動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親自領導、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時，這個反革命集團把矛頭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他們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他強調，「要放手發動群眾，把清理階級隊伍搞透，特別是把『5•16』反革命集團搞深搞透」，「要堅決搞，放手搞，發動群眾搞，不要只是少數人搞」。

1970年1月24日，周恩來、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並講話。周恩來說：「『5•16』不單是在1967年發表了『5•16』通知才有的，活動是有根據的，早就存在，通過兩年半，逐步認識，得到了一些資料，現在比以前認識清了。……現在還是要繼續揭發、批判。」周恩來指出「5•16」有兩個系統：「大的以學部為中心，還有外事口、政法口、農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傳、民族、統戰。軍隊一個口，大的是方面軍，軍隊是沖派，是『新三軍』……還有學校叫小『5•16』，大專院校以學生為主。」康生說：搞清「王、關、戚、楊、余、傅、肖華是怎樣陰謀篡奪機要大權，這是『5•16』專案的主要問題。」江青說：「『5•16』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單線聯繫，他們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兒女，他們搞秘密活動，這是不許可的。」²⁰

第三個高潮：「3•27通知」。經過緊鑼密鼓的動員，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中發（1970）20號）（通稱「3•27通知」），這個檔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檔一方面提出防止擴大化（有的單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5•16」分子），另一方面又說「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麼

¹⁹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2版。

²⁰周恩來、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講話，1970年1月24日晚8點30分至25日凌晨零點40分，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2版。

組織就叫什麼組織，是什麼性質就定什麼性質，不要一律叫『5•16』。

當時清查「5•16」時都追查什麼時候參加「5•16」組織，填什麼表格，由於根本沒有這個組織，追查不出結果。「3•27 通知」提出不追查是不是參加了「5•16」組織。半年以後，周恩來進一步闡述了「3•27 通知」，他說：「搞陰謀活動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稱是什麼」，「重點不在這個組織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要重在罪行」。²¹這樣一來，只要參加了某些活動，就要當作「5•16」分子進行追查，從而使清查進一步擴大化。有些單位本來清查有困難，由於「3•27 通知」中有反擴大化的內容，就松下來了。1970 年 11 月 20 日，周恩來說：「今年 3 月 27 日發了個通知，他們又抓住『3•27 通知』中提到防止擴大化，變成一風吹了。運動規律就是這樣，幾番起伏。這次無論如何要追到底……」

1971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 5•16 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發〔1971〕13 號）（通稱「2•8 決定」），宣佈成立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以楊俊生、黃作珍、于桑等為組員共 13 人組成中央「5•16 專案聯合小組」。這個檔規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一系列罪行，將它一個一個落實，而不是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號召大家認真學習 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還要貫徹執行毛主席在當時關於『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指示。至於現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當然不在此例。」

外語學院「紅旗」成員章含之向毛澤東寫信，告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的狀，說謝在外院支持的一派「6•16」兵團是反總理的，海軍在外語學院的支左坐在「6•16」這一邊。毛對章的信作了指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5•16」，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請周總理

²¹周恩來接見外事口核心組軍宣隊工宣隊負責人時關於清查「5•16」的指示，1970 年 11 月 1 日。

出面解決外語學院的問題。周就調走了來自海軍的支左部隊的大部份，改為 8341 部隊，加強了外交部系統對「5•16」的清理。²²

北京市群眾揭發涉及到 5 萬多人，觸動的有一萬四、五千人，下面報上來的重點人 700 多人，3 千人進入了留宿學習班。²³

清查「5•16」運動中，由追查是否參加「5•16」組織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確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參與者。這使「5•16」的罪行面不斷擴大。1967 年 8 月，「5•16」罪行只有兩條：反軍和反無產階級司令部；「九大」以後，又加了一條：反對革委會。到 1971 年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幾乎包括了文革以來造反派所有的行動。1971 年 6 月 30 日，清查辦公室負責人陳偉（部隊幹部，原秦皇島航校校長）在講話中提到「5•16」的 11 項罪行和 15 件事。15 件事是：燒英國代辦處；「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揪軍內一小撮；搶劫國家機密檔案；衛生部黃樹則專案，洩露中央領導人的健康機密；利用搞專案為幌子，搜集整理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的材料；1967 年 5 月 13 日沖三軍演出；1968 年 6、7 月在北京航空學院等地開會成立全國無產階級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演黑戲，出黑書，開黑會包括天津黑會，砸爛公檢法²⁴，等；7 月 27 日，清華大學開槍打工宣隊，等²⁵。有的地方以掌權的軍政領導人劃線，把反對當地軍政領導人的活動也作為清查「5•16」的內容，如四川省列出全省清查「5•16」的 12 個「重大事件」中，把「發動打謝運動」一事，也排了進去，謝是四川支左部隊負責人謝家祥。²⁶南京將反對過許世友的人都當做「5•16」分子清查。按這樣清查，所有的激進造反派都

²²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記錄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第 67-68 頁。

²³同上，第 72 頁。

²⁴施義之《我在公安部十年》第 18-19 頁寫道：1967 年「7•20」事件後謝富治一行從武漢回來，在公安部的歡迎大會上，謝富治在講話中正式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謝富治對公安部副部長李震說：「毛主席說：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這句話要插下去。用什麼方法，你們研究」，「我聽毛主席說『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1970 年 11 月召開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大家對這個口號意見很大。為此，李震執筆以部領導小組的名義請示毛主席。毛指示：「『砸爛公檢法』這個口號不科學，應該提『公檢法徹底鬧革命』。『砸爛公檢法』本來是毛提出的，卻作為「5•16」的罪行。

²⁵ 1971 年 6 月 30 日，陳偉關於清查「5•16」運動的講話。

²⁶謝家祥：〈我的檢查和交代〉，1972 年 6 月 20 日（謝家祥，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不能倖免。

清查「5•16」運動成了不可收拾的亂局。清查運動的重點就是要挖出「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臺」。誰是黑後臺呢？開始說黑後臺是「王、關、戚」。楊、余、傅被打倒後，又說「黑後臺」是「楊、余、傅」。「3•27 通知」又把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都列為操縱者。1970 年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倒臺以後，又說清查「5•16」專案組的組長陳伯達是「黑後臺」。在各省，一些與掌權的軍政官僚不一致的老幹部都成了「5•16」的「黑後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以前，批評林彪是「5•16」的一條重要罪狀，反對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以後，又說林彪是「5•16」的「黑後臺」。

更為蹊蹺的是，1973 年 10 月 22 日，「5•16」聯合專案組副組長、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組組長、部革命委員會主任李震，被發現死於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熱力管道溝內，死亡時間初步判定為 21 日夜間，死亡原因不明。開始中央認為是他殺，還對有關人員採取了措施。後又定為「畏罪自殺」。李震雖然是聯合專案組副組長（組長吳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但他兼管專案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就設在公安部，「5•16」專案組具體由公安部負責。李震在公安部管業務工作，承辦中央直接交辦的事，直接向周恩來彙報。「畏罪自殺」，什麼「罪」？沒有公佈。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生前已經弄清，全國並不存在一個「5•16」組織，但作為全國抓「5•16」「總司令」的周恩來，始終沒有表過態，更不用說認錯了。

四、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運動，是毛澤東直接關注和周恩來自始至終具體掌握的。外交部是全國抓「5•16」的先行單位和樣板單位。²⁷

文革之初，在陳毅部長的指示下，以姬鵬飛常務副部長為首的外

²⁷宋以敏為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書寫的〈寫在前頭的話〉。

交部黨委，進行「橫掃外交部的牛鬼蛇神」運動，部黨委將一批大小幹部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長王炳南、陳家康、部黨委委員兼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孟用潛和一批司局級幹部，組織群眾對他們進行了殘酷鬥爭。後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造反派抄出 8 個麻袋材料，是部黨委對所謂有問題的幹部與群眾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 年 12 月 20 日，外交部的 200 多人發起成立了造反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外交部黨組織力圖予以解散。12 月 26 日，周恩來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眾組織。得到周恩來的支援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員迅速增加到 1700 多人，而當時外交部全部人員也就 2200 多人。

1967 年 1 月 18 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決定向部黨委奪權。周恩來與陳毅都支持這次奪權行動，並祝賀奪權勝利。對於外交部的奪權方式，周恩來卻明確規定：外交大權在中央，不能奪。外交部奪權應是領導運動，監督業務，成立部、司兩級業務監督小組。周總理還態度鮮明地指示：（今後）沒有部（造反派）監督小組簽名的檔，我不看。

2 月 16 日陳毅參與了大鬧懷仁堂，在反擊「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一些人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由於毛澤東並不想打倒陳毅，而只想讓造反派對陳毅「燒一燒」。因此，造反派搞了兩個多月的「打倒陳毅」活動，沒有實質性進展。陳毅雖然因「二月逆流」挨批，還是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參加外事活動。得知毛澤東底牌的周恩來，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每次都是旗幟鮮明的保陳毅。結果，想打倒陳毅的造反派，就對周恩來不滿，一些人將鬥爭矛頭指向了周恩來。

5 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數人，也以「5·16 縱隊」等戰鬥隊名義，公開貼出了影射周恩來的大字報。毛澤東得知出現反周大字報後，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 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上書毛澤東，反映外交部和社會上有一股攻擊總理的風氣，毛澤東批示說：「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

的。」²⁸

10月18日，副部長韓念龍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開全部大會。宣佈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周恩來的指示一公佈，長期得到周恩來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頃刻瓦解，所屬成員紛紛退出。

在1967年5月，外交部開始了抓「5•16」的運動。當1968年中央正是部署開展抓「5•16」運動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為運動中心。當陳伯達表示抓「5•16」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時，周批評說，運動才開始怎麼能講擴大化，這會對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強調，抓「5•16」主要看罪行、查證據，不要專門追查是不是參加了「5•16」組織，是不是填了加入組織的表格。「姚登山參加『5•16』，難道還要填表嗎？」姚登山就被定為外交部頭號「5•16」分子，在工人體育場萬人大會上批鬥，後送入秦城監獄關了九年。²⁹

姚登山，1936年入黨，解放戰爭時期任獨立團團長兼政委。他是一位直來直去、城府不深的幹部。1966年3月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參贊。1967年，蘇哈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蘇加諾政權，殺害了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和大批共產黨人。中國一直是印共的堅定支持者，大力向印尼輸出革命。蘇哈托政變也隨之引發了反華浪潮，大批人圍攻中國大使館，斷絕了大使館的供水和糧食，中國駐印尼大使應招回國，留下姚登山任臨時代辦。姚率領使館工作人員與印尼圍攻使館的勢力進行鬥爭，受到毛澤東的表揚。1967年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驅除姚登山，他一下子成了英雄。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達北京，一下飛機，受到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5月1日晚，周恩來又讓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焰火晚會。毛澤東接見了他並和他合影留念，第二天，毛主席接見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上。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的姚登山一舉成名。回北京後，姚登山捲入了外交部的鬥爭，站在造反派「聯絡站」一邊。被「聯絡站」核心組負責人聘為顧問。周

²⁸ 《何方自述——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報出版社，2011年自印簡體字本，第355頁。

²⁹ 同上。

周恩來點名說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和王力一樣，因外交部的文革問題一下子從大紅大紫的英雄變為秦城監獄裏的囚徒。

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來到外交部親自動員。他找外交部造反聯絡站一些頭頭和骨幹，動員他們坦白交代，讓他們起帶頭模範作用。新聞司科員成綏三和黃安國響應號召，承認他們是外交部「5•16」的組織部長，還供出上百人。周恩來動員林兆南坦白交代，林交代了，後又不承認，姬鵬飛又動員，又交代，又不承認，被人們傳出「七進七出」。林兆南是一位老幹部，文革後出任駐土耳其大使。³⁰

和中央其他部門一樣，清查「5•16」分子很長時間是在「五七」幹校裏進行的。由於逼供信，幹校的大部份人都變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何方那個班裏連一個黨小組長也找不到了，只好請外單位隨丈夫到幹校的一名非黨員執行黨小組長的職責。³¹

1968年秋，突然將外交部屬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漫畫家朱根華關了起來，說他是「5•16分子」。他被關在一個暗房裏，24小時不見陽光，大小便都在室內。1969年，他被兩人押往湖南攸縣的外交部「五七」幹校。還將他妻子和兩個孩子下放到甘肅，一去十年，家庭從此離散。在幹校裏，除了勞動以外，經常是24小時連續審訊。多次挨打。1970年5月5日，幹校開批判大會，當場戴上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鬥會上被扭斷了手臂，成了終生殘疾。³²

1970年4月5日，蘇歐司唐賢耀被逼自殺，死後說他是「死不悔改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埋在幹校附近的山上。後來幹校撤銷了，唐的孤墳很長時間還留在那裏。外交學院的青年教師彭甯也在審查「5•16」中被逼自殺。³³

外交部清查「5•16」的運動有三個階段：1967年底至1969年底，為摸底排隊時期；1970年至1971年，為全面鋪開時期；1972年至文

³⁰ 《何方自述——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報出版社，2011年自印簡體字本，第356頁。

³¹ 同上，第359-360頁。

³² 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19-223頁。

³³ 同上，第213-214頁。

革結束，為「戴帽」掃尾時期。

外交部清查「5•16」運動取得了「輝煌戰果」，在1972年的定案人數分別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20人；劃為敵我矛盾性質待處理的31人；因「5•16」問題給予各種處分的80餘人；定為犯嚴重錯誤的170多人；因「5•16」問題而屬一般錯誤的1,408人；共計1,700多人。受到懲處的人占外交部總人數的一半以上。³⁴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20名幹部，80年代都獲平反，並分配了工作。文革結束後，直到80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員給予平反，恢復待遇，分配工作或離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但還留下「留黨察看一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處分。1980年8月姚恢復行政11級，1985年6月離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五、農林口清查「5•16」

譚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將。毛澤東批評「二月逆流」之後，各院校的紅衛兵紛紛進駐農林口³⁵的各部機關，到處尋找攻擊譚震林的「炮彈」。他們發現：當年創建解放軍「南京路上好八連」有功的上海警備區政委秦化龍，在農林口機關被作為反黨分子受批鬥。他的秘書和同情者也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批鬥秦化龍是根據譚震林的意圖。秦化龍曾是解放軍上海警備區政委，後調任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任農林口文革小組組長，參與中央文革彙報活動，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按當時的政治邏輯，既然整秦化龍的是譚震林，現在譚震林搞了「二月逆流」，秦化龍該平反了。於是，紅衛兵強烈要求周恩來為他平反。但是國務院農辦的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對為秦化龍平反。造反派認為，「延安公社」的這種態度實質就是保譚震林。周恩來建議群眾組織就秦化龍問題進行辯論，通過辯

³⁴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258頁；楊榮甲的《共和國外交部秘辛》第224頁說「總計抓出了1500-1700名『5•16』分子」；《何方自述——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第312、361-362頁。

³⁵「農林口」包括農業部、林業部、水產部、農墾部，國務院農辦等以及相關院校和科研單位，譚震林副總理是農林口負責人。

論統一認識。造反派對周恩來不滿意。

1967年5月16日，進駐國務院農辦、農政機關的北京農業大學紅衛兵，宣佈成立「農業大學東方紅公社5•16兵團」，並貼出「成立宣言」，宣稱要「堅決反擊『二月逆流』，『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宣言要求「旗幟鮮明地為秦化龍將軍平反、翻案」。宣言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農大東方紅5•16」的行為受到批判，在政治壓力下，他們馬上貼出大字報承認錯誤，解散「5•16兵團」，停止一切活動。「農業大學東方紅5•16」雖然只有一兩天的歷史，但後來卻給大家帶來了災難。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紅衛兵代表會上，突然宣佈：「革命小將們，秦化龍不是好人，你們要提高警惕啊！他是「5•16」反革命黑後臺，還有新疆叛徒集團的問題。你們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擊，立新功啊！」

1967年9月16日，周恩來接見農大東方紅³⁶的代表。周說：「你們很主動嘛！四個『5•16』分子首先是你們抓的，你們又揪出了學校裏的八個『5•16』分子，秦化龍你們又揪出來，說明你們劃清界限了。」經周恩來批准，農大「東方紅」將秦化龍扭送北京衛戍區，周恩來親自給衛戍區領導人傅崇碧、黃作珍寫信，令其「請予接收、監護，聽候中央處理」。³⁷

這僅僅是清查「5•16」的開始。1969年9月以後，國務院農辦、農政和農林口各部機關幹部，分別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農村辦「五七」幹校。

不久，中央機關的「五七」幹校按照上面的統一部署，大規模開展清查「5•16反革命」運動。國務院農辦、農政機關軍代表宣佈：中央已將秦化龍定為「5•16反革命黑後臺」，正式批准逮捕關入秦城監獄。那些保秦化龍的幹部，被劃為「5•16反革命」骨幹分子，被隔離審查，殘酷鬥爭，強迫他們交代「5•16反革命」罪行。1970年元旦

³⁶農大東方紅是造反派組織，原來是要求為秦華龍平反的，聽了中央領導講話以後主動揪秦華龍。

³⁷周恩來接見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9月16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2版。

剛過，幹校軍代表召開逮捕大會，宣佈：經中央批准，將農林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吳文平（上海警備區宣傳部原副部長）作為「5·16 反革命骨幹」，由公安機關正式逮捕入獄。會上，農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揚、宣傳部長黃天祥、教育處長劉子兵和秦化龍的秘書許人俊，分別作為「5·16」反革命後臺和骨幹陪鬥。隨後，「5·16」專案組趁熱打鐵，突擊審訊，大搞逼供信。他們實行三班倒審訊法，有一次，對許人俊連續 72 小時殘酷審訊。一些幹部不堪侮辱虐待憤而上吊或跳井自殺。

38

1970 年 3 月，清查「5·16」的「3·27 通知」下達後，農林口機關的清查運動進一步「深挖」和擴大打擊面。

1970 年 11 月 29 日，紀登奎到農林部給核心組成員的指示中說：「『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很兇惡的階級敵人，不肅清會有後患。農林部的『5·16』問題沒有揭開蓋子。」紀登奎要求追查以下問題：(1)有沒有人去沖中辦學習班的？沖中辦學習班是整汪東興同志的材料，抓汪聯絡站就在水產部大樓辦公。(2)農林部有沒有人去圍困中南海（即「揪劉火線」）？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嗎？(3)有沒有人參加秦化龍的八七黑會？回來怎麼貫徹的？交代了沒有？(4)砸機要室，搶檔案有沒有？(5)農林口各部與吳傳啟、潘梓年、農大「5·16」的聯繫要查清。(6)在抓「5·16」時出現的反動標語「抓『5·16』防止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查清了沒有？持續四年的清查「5·16」運動在農林口繼續進行。³⁹

1971 年 9 月，林彪事件發生後，專案組突然召集被清查的人開會宣佈：「你們『5·16』反革命集團的後臺林彪，已經徹底完蛋了！」被清查的人聽後面面相覷，哭笑不得。

林彪集團垮臺後，農林口幹校清查「5·16」專案組搖身一變，又成為反林彪的英雄，他們繼續對被清查的人進行審查。天天讓清查對象反覆讀〈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要求聯繫思想，活學活用，交代「反革命」的活動和組織。

³⁸許人俊：〈我所經歷的清查「5·16」運動始末〉，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 年 8 月 17 日。

³⁹紀登奎到農林部給核心組成員關於清查「5·16」的指示，1970 年 11 月 29 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第 2 版。

1974年，設在湖北沙洋勞改農場的國務院農辦、農政「五七」幹校宣佈撤銷，清查「5•16」專案組也解散了。被關押隔離審查五年多的清查對象，終於獲得自由，被允許回北京同家人團聚。

但是，清查「5•16」並沒有宣佈結束，要清查物件在北京家中繼續等待處理。後來，政治形勢有所變化，清查物件們不甘心當「5•16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麼是「5•16」，以便營救仍然身陷獄中的秦化龍和吳文平。有一次，清查對象許人俊和上海警備區黨委辦公室原主任劉子兵相約，一起去見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

劉傳新曾經擔任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龍是他的老領導，吳文平、劉子兵和許人俊都是他的老部下。「文革」期間，劉傳新隨部隊進北京執行軍管任務，任北京市公安局長。多年不見，劉傳新在天安門附近的辦公室熱情接待他們。對老首長秦化龍和老部下吳文平的悲慘遭遇，劉傳新早有所聞，也深表同情。許人俊等希望從他那裏探聽一些有關「5•16」的資訊。劉傳新眉頭緊鎖，指著辦公桌上的一大堆檔案說：「你們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許多『5•16』，關在監獄裏，材料一大堆，至今我還不知道怎麼處理呢！」劉傳新還傷感地向許人俊等訴說：「我在這裏抓『5•16』，我妻子在江蘇卻被人家當做『5•16』抓起來，至今還關押審查啊！究竟什麼是『5•16』，我也說不清！」⁴⁰文革結束後，劉傳新因鎮壓1976年的「四五」運動、參與了其他「四人幫」的活動接受審查，1977年5月19日自殺身亡。

六、糧食部清查「5•16」⁴¹

在糧食部，軍代表製造了「糧食部『5•16』陰謀集團」的冤案。這個「集團」以朱相遠（原糧食部科學研究設計院綿陽所技術員，文革後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廖祝南（原糧食部辦公廳辦事員、文革後為國家糧食儲備局的司局級幹部）為「黑頭

⁴⁰許人俊：〈我所經歷的清查「5•16」運動始末〉，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8月17日。

⁴¹本節內容資料來源除了注明以外都來自陳其陣：〈我經歷的糧食部清查「5•16」〉，《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

目」，陳國棟（原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文革後為糧食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浦通修（原糧食部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文革後為教育部副部長）為「黑後臺」，原中監委駐部監察組副組長蘇生（行政 10 級⁴²）、原計劃司司長吳園宏（行政 10 級）被打成「黑顧問」。原中監委駐部監察組監察員竇桂林（行政 12 級）、原農村糧食管理司價格處處長馬洪柱（行政 12 級）、原機關黨委辦公室主任顧志達、原政治部組織處處長徐銳、宣傳處處長秦煥民、原計劃司計畫處處長鄭志勳、原辦公廳宣傳處處長吳碩等 7 人被打成「黑參謀」。原機關黨委辦公室辦事員陳其陣被打成「集團」第五號人物。在遊行集會人群後邊搖旗吶喊的司機、電工、理髮員、收發員、服務員、保育員都未能倖免。多人被打掉牙齒、打聾耳朵、打斷胳膊，兩人被整死。糧食部被打成「5•16」分子 123 人，占幹部總數六分之一。另外，據保衛科幹部王某的統計，糧食部還有「壞分子」和各類「階級敵人」共 300 多人，占部裏總人數近一半。⁴³

1967 年 9 月，國務院決定向各部委派軍代表。9 月 20 日，解放軍總後勤部營房部副部長樊省軒，進駐糧食部任軍代表。當天兩派群眾實現了大聯合，坐在一起開大會歡迎他。在群眾組織大聯合實現不久，樊對原來兩派成員從親一派、疏遠一派發展到支一派、壓一派。陳其陣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談，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被壓的一派就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寫信。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聯名，共寫了十來次。結果，這些信轉回到軍代表的手裏，他以「鬥私」、「圍剿派性」等名義辦學習班，批評寫信的人，說有人要把軍代表趕出糧食部，要這些人檢討。寫信的人拒作檢討。軍代表認為階級鬥爭複雜、敵人隱藏很深。

1969 年 8 月，國務院將糧食部、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併，先合署辦公。9 月，糧食部留下三十餘人搞業務，搬到三裏河，樊留在北京，副軍代表翟夢僧率領六、七百人

⁴²當時幹部級別從 1 級到 25 級，數字越小級別越高，13 級以上為高級幹部。

⁴³廖祝南：〈「我經歷的糧食部清查【5•16】」一文補漏〉，廖祝南給《炎黃春秋》雜誌的信，未刊登。

到河北省固安縣的「五七」幹校搞鬥、批、改，運動的重心移到「五七」幹校。

1970年1月18日軍代表在北京召開糧食部清查「5•16」動員大會，傳達了中央領導人關於清查「5•16」的講話。樊省軒在會上聲稱：「『5•16』的魔爪伸向了糧食部，朱相遠、殷嵩義有問題，給他們辦學習班。」於是，這幾個人被隔離審查。殷是糧食部科學研究設計院安陸所的技術員，是糧食部造反組織「大聯委」12名「勤務組」成員之一。動員大會以後，樊省軒到固安「五七」幹校坐鎮指揮清查。

2月5日，給陳其陣辦「學習班」，對他隔離審查。審查陳其陣的專案組有5個人，不許他走出房間，上廁所要請假，經允許後，由「學習班」的人陪同去。買飯，由「學習班」的人代辦。不許和外界聯繫。讓他解下腰帶、鞋帶，交出刮臉刀，搜走了所帶的東西。與此同時，派人到陳其陣妻子單位，要那裏出人到他家裏搜查。隔離審查期間，每天要他交代和「5•16」關係和活動，不按要求交代就讓他到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腰，幾個小時至十幾個小時。後來，將陳其陣轉移到離生活區200米以外的一所房子裏。房內有兩間屋。陳其陣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戶用木板釘死，與大屋隔板上有一塊玻璃，二尺見方，也從外麵糊死。靠下方留了一個火柴盒大小的瞭望孔。室內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給一暖瓶熱水，供飲用、洗臉、漱口。每天拂曉，准他出屋一次，倒尿尿，接一臉盆涼水。專案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來當天，組長就掄開膀臂，一連打了陳其陣五、六十個耳光，問：「厲害不厲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後幾乎每天挨打受罵。除拳打腳踢外，還用木棍子、木板子、門上的彈簧弓子、捅爐子的鐵鉤子打。除專案組兩人打以外，隔幾天還從連裏（「五七」幹校採用軍事編制：連、排、班）找四、五個人來，打兩三個小時後揚長而去。到了冬天，室外溫度降到零下十幾度，沒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後凍成冰棒。這樣的冬天，把陳其陣的棉衣褲扒下來，剩下貼身衣服打。胯部以下至腳踝，被打得由青變紫、變黑，像焦炭一樣，兩個多月不能邁步，走路得慢慢蹭。專案組長用鐵爐鉤子打他的手，打一下問一句「說不說」，打得手指手背青腫，無法握拳，拿不住東西。頭髮長了，不准理髮；鬍子長了，不准刮臉。十來個月沒有換洗

衣服。沒有腰帶，站起來就得手提褲子。

12月上旬，專案組組長讓陳其陣看糧食科學研究院翻譯胡某寫的「認罪書」，胡承認是「5•16」，還描述了參加的經過。過了幾天，專案組又把陳其陣押進一間空屋，收聽「5•16集團」另一個人的認罪錄音。他在供述「罪行」時，點了陳其陣的名，編造了「策劃陰謀」時陳其陣說的話。收聽後，組長說：「你上邊的交代了，下邊的也交代了，同夥都交代了，你想想怎麼辦吧？」陳其陣被折磨得難以忍受，就向專案組說1967年4月19日參加了「5•16」和以後的活動。專案組窮追不捨，逼他交代更多問題。他無法再編下去，就對專案組說：「我不是『5•16』，前兩天說是『5•16』，那是假的。」組長一聽，頓時火冒三丈，劈頭蓋臉地打他。他的手指把陳其陣太陽穴的血管劃破了，鮮血成串地滴到地上。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說：「把你以前交代的假情節給我改掉了！」陳其陣說：「都是真的。」「都是真的？為什麼叫『5•16』，不叫『4•19』？」，陳其陣現在才知道，「5•16」反革命集團是5月16日才有的，他的日子早了，便急忙表示：「我端正態度。」專案組說：「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防止再翻供，組長問陳其陣：「跟你們活動的那夥人，你說誰不是『5•16』吧？」陳其陣說了一個尊敬和信賴的人名，組長說：「他承認了！」第二天，專案組又叫來兩個是陳其陣的好朋友，看見他倆，陳其陣泣不成聲。他倆語意雙關地對陳其陣說：「抗是抗不過去的，都各奔前程了，爭取個好出路吧！」陳其陣看到這麼多人頂不住了，心想：「我頂得了嗎？那就編吧！」他就開動腦筋編造。1971年2月16日幹校召開群眾大會，叫陳其陣「認罪」。陳其陣宣讀他編造後經專案組審改的「認罪書」，說「1967年5月下旬，先後經三人介紹，三次參加『5•16』陰謀集團」。認罪以後，專案組宣佈軍代表決定改善他的待遇：可以給家裏寫信，可以和「學習班」的其他人一起到食堂買飯；可以去小賣部買東西；上廁所不必請假。但仍不許和外界聯繫。

其他被清查的人同樣經受像陳其陣這樣的遭遇。1974年1月14日至16日，已經恢復工作的陳國棟在幹校召開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參加的座談會。一些被整的人訴說了自己挨整的情況。原糧食部政治處的龔誠說，他被打掉八顆牙齒，胳膊打斷。手不能動了，飯拿來，

用嘴從碗裏舔，像狗吃食一樣。半年沒洗腳，頭髮長了，鬍子長了，不能理髮，不能刮臉。原儲運司科員牛夢辰說，「李×（五連指導員，原財會司 15 級處長）打李有發（原財會司辦事員）一百多個耳光，一邊打還一邊問：『我打過你嗎？』」儲運司科員范大林說：「我從 1970 年 2 月 4 日起被管制，到 1972 年 3 月被放出，780 天全在幹校。我脖子上被掛八塊磚，一掛就是兩三個鐘頭，甚至三、四個鐘頭，連續有 80 天。打我，打斷了幾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張強（原政治部 17 級幹部，被打成「集團」第四號人物）說：「點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糧食部副部長、中監委駐部監察組組長、老紅軍）是後臺，把大便打到褲子裏，坐『老虎凳』（把腿綁在長凳上，往腳下加磚）從下午 2 點到 6 點，四個小時。」原糧科院翻譯胡××說：「杜子誠（原糧科院翻譯，因被整，上吊身死），死了還紮個稻草人，召開批鬥會。還派人到他妻子那裏（廈門）去，拿了兩張照片，說杜有作風問題。」

被打成「5•16」骨幹分子的廖祝南 2010 年給《炎黃春秋》的投稿中寫道：「天寒地凍，屋內無暖氣，我穿著棉衣棉褲坐在小板凳上，冥思苦想，殫精竭慮，卻實在『供』不出什麼『5•16』分子。白天寫三、四千字的材料，晚上又構思新『故事』，都不對他們的『胃口』。專案組人員便刑訊逼供，揪頭髮、扇耳光、跪地板、潑冷水、拳打腳踢。專案組還將 20 多斤重的『鐵疙瘩』，用粗繩捆結實後，掛在我的脖子上，低頭彎腰。掛了不到五分鐘，我便氣喘吁吁，大汗淋漓，雙腿發抖，腰酸背痛。晚上 12 點，未寫完交代材料不准上床；即便上了床，也經常會在半夜被叫醒『審訊』。他們用粉筆在地上劃一個鍋蓋大小的圓圈，讓我站在中間，每天從早到晚站 16 小時。期間，只給幾分鐘小解時間，三頓飯站著吃。站久了，支持不住，昏倒在地，專案組人員用涼水把我潑醒，或猛踢幾腳，勒令暈厥的我馬上站起來。」

1973 年，對糧食部清查的結論是：「經清查，原糧食部沒有發現『5•16』反革命組織，也沒有發現『5•16』分子。」

七、其他中央單位的清查「5•16」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是清查「5•16」的重點單位之一。1966年6月2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向學部派出了以國務院文辦主任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工作組進駐學部後，即與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相結合，共同領導學部的運動。潘梓年⁴⁴當了學部文革主任，吳傳啟⁴⁵也成了學部文革領導成員。由於他們和關鋒有一些關係，積極參與造反，後來自然成了清查「5•16」的重點。文革期間，學部成立了幾個觀點不同的群眾組織，他們從王、關、戚等管道得到上面一些資訊，看風造反，互相攻擊。這幾個組織的頭頭也成了清查「5•16」的重點。學部被打成「5•16分子」占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於非命，我中學的一位同學、在歷史所當研究生的尹思德也不明不白的死了。「9•13」事件後，由於沒有向重點審查物件傳達林彪問題，清查對象故意在大會小會上繼續交代「反對林副主席的罪行」。為了阻止這樣的交代，11月初專門召開了這部份人的會議。會議開始後，支左部隊66軍一個師的副政委宣讀檔後說：「你們這些『5•16』骨幹分子，交代了二、三年，連你們的黑後臺都還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們，你們的黑後臺就是林彪！你們必須老實交代與林賊的黑關係！」⁴⁶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有100多人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是物理所建所以來的最大冤案。⁴⁷

衛生部也是一個清查重點。1967年3月10日，衛生部的造反派開了一個會議，批判「城市老爺衛生部」，會上把一些中央領導人享受醫療特權的事也暴露了，揭露了高層腐敗情況。周恩來說：「孫正搞了個『3•10』。……把老爺衛生部和中央首長的病歷混同在一起……

⁴⁴潘梓年（1893-1971年）江蘇宜興人，1927年3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為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黨組書記，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哲學研究所所長。

⁴⁵吳傳啟、林聿時文革前是學部哲學所的司局級幹部。他們於1966年5月23日率先貼出批判楊述《青春漫語》的大字報，成為學部的造反派。

⁴⁶孟祥才：〈我成了學部「5•16」政委〉，《炎黃春秋》2008年，第9期。

⁴⁷杜鈞福：〈我是怎樣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載《記憶》2009年8月13日，第20期。

劉維棟在《衛生戰報》第 49 期上把對方許多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集中起批評對方，把內部東西公開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來。拘留是為了防止擴散。」李先念說，搞「3•10」會議的這些人都是特務。周恩來說著名醫學專家、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葉心清是個江湖醫生，葉被打成了「5•16」分子。⁴⁸

中央樂團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5•16」運動中，有 4 人不堪誣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殺。首席小提琴手楊秉蓀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楊被判刑十年。合唱隊員王芾被判刑八年。同時，近百位元嫌疑物件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樂團兩派造反派組織「井岡山」、「東方紅」幾乎全軍覆沒，骨幹人物都成了「5•16」分子。有的人先審查別人「5•16」，後來自己也成了「5•16」。交響音樂《沙家浜》創作組組長、在交響音樂《沙家浜》中飾演郭建光的演員張雲卿也成了「5•16」分子。近百位元嫌疑對象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改造。⁴⁹

八、各地清查「5•16」

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國各地都開展了清查運動。以廣西為例，在自治區清查「5•16」領導小組的部署下，各地、市先後成立了清查「5•16」領導小組，組成 4219 人的專案隊伍。在清查過程中，全區列出清查事件 68 起，涉及幹部群眾數千人。大批人被搜查抄家。有的被刑訊逼供、捆綁、毆打，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致死。⁵⁰

各省清查「5•16」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反軍」、「反對大聯合」「反對革委會」（或反對「革籌」）都是「5•16」的「罪行」。這次運動的鎮壓者是支左部隊或是革委會，被鎮壓者是造反派中激進分子和大批無辜百姓。有些地方與「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相交叉，

⁴⁸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衛生系統有關代表的講話，1967 年 12 月 10 日。

⁴⁹周光蓁著《中央樂團史》。

⁵⁰〈關於對廣西「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案平反的決定〉，桂發（1983）37 號，1983 年 6 月 22 日；區黨委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領導小組，1983 年 6 月 15 日。

各省所用名稱也有不同。貴州踏平「4•11」⁵¹。天津清理「二黑一砸」⁵²。江西為「三查」⁵³。廣東和廣西為貫徹「7•3 佈告」、清查「反共救國團」。湖南為貫徹「1•24 指示」，批判「省無聯思潮」。湖北為貫徹「9•27 指示」，清查「北、決、揚」。四川先為貫徹「12•25 批示」，批判劉結挺、張西庭，後為「一批雙清」，省革委中的軍隊負責人大整「8•26」派，全省抓捕和判決了數萬人。⁵⁴由於各地群眾組織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各派利用清查「5•16」的機會打擊對立面，軍政官僚集團的各種政治勢力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對各自的政治對手實行鎮壓。清查「5•16」運動，全國各地大小監獄再次爆滿。整死、逼死的人無數。

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除了中央單位大規模的清查「5•16」以外，北京市屬單位也無一倖免。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搞文革的試點單位，當時被當作執行政策的樣板。1970年3月，8341軍管會在二七廠開展清查「5•16」運動，全廠被打成「5•16反革命」的職工數以千計。其中，徐鎧名列第一，被軍管會隔離審查，多次組織全廠大會批鬥，1972年11月被宣佈為「5•16反革命的骨幹」，實行群眾專政，1978年12月23號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10月1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徐鎧七年徒刑，從1970年3月到1983年9月徐鎧失去自由十三年多。徐鎧何罪？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23歲，是鑄工車間一名工人，任車間團總支書記，他響應號召參加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北京市要二七廠推選一名工人群眾代表，籌備北京市工代會，為建立北京市革委會做準備，一開始讓工具車間的劉鐸喜去了籌備組，因為他職稱是技術員，而北京市要求是工人，劉鐸喜回到二七廠。經過討論，認為徐鎧出身好，是翻砂工，就推選他到北京市工代會籌備組。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後，徐鎧被推為北京市革委會常

⁵¹ 「4•11」是反對李再含的一派群眾組織，省革委會對其殘酷鎮壓，提出「八月踏平」的口號。

⁵² 黑會是指在天津召開的全國文藝界造反派的一個會，黑戲是天津話劇團排演的《新時代的狂人》，「一砸」是砸爛公檢法。

⁵³ 「三查」：一查叛徒，二查特務，三查走資派的活動。後來被當權者搞亂了，凡是他們認為要查的都進行打擊。

⁵⁴ 蔡文彬：〈一個造反派眼裏的趙紫陽〉，《昨天》2012年，第9期。

委，工代會第一副組長。這是他被打成「5•16 骨幹分子」的主要原因。當時加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純屬子虛烏有。⁵⁵

從江蘇清查「5•16」運動的情況可見一斑。

武漢「7•20」事件發生後，南京軍區內的造反派與地方的造反派（主要是「紅總」這一派）聯手，幾次衝擊南京軍區首腦機關，要揪鬥司令員許世友。毛澤東力保許世友。1968年3月23日，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許世友被中央任命為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許世友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反軍是「5•16」的主要罪狀，反對許世友就是反軍，許世友又是毛澤東信任的中央領導人，這樣，又可以將「5•16」的另一主要罪狀——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加在江蘇造反派的頭上。

許世友不寬恕反對他的人。他在一次會上說：「江蘇的主要工作是『兩挖』，一是挖煤，二是挖『5•16』！」說到這裏，他舉起拳頭怒吼：「都是挖黑的！」挖煤就是回應毛澤東要改變中國「北煤南運」的情況，在南方找煤。許世友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找煤，結果是勞民傷財，以失敗而告終。抓「5•16」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當時許世友等人認為，「5•16」組織在江蘇已遍佈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具有群眾性、隱蔽性、頑固性、欺騙性，十分反動，十分危險。根據這一判斷，全省作出了「破口、圍點、掃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場全殲「5•16」的「人民戰爭」。

省市縣各級，設立了由軍隊「支左」人員組成的第二專案辦公室（簡稱「二辦」，南京稱「320」辦公室），統管清查工作，有權拘留、逮捕、關押、審訊「5•16」涉案人員。省「二辦」還設立了關押「5•16」要犯的看守所，並從部隊調來一個連負責看押警戒。受許世友委託，省「二辦」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員吳大勝獨管。省「二辦」為了深挖全殲「5•16」，還列出31個問題（事件），不管有沒有填表參加「5•16」組織，只要沾上其中一條，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許世友調往廣東，彭沖主持省

⁵⁵二七廠老工人聯名反映徐鏜的冤案，2008年8月24日。

委工作。江蘇省在清查「5•16」運動中受害者的人數才有所透露：

1975年春，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彭沖說：「江蘇清查『5•16』，不算徐州地區，被定為『5•16』的有13萬人。」⁵⁶

當時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從各地市縣法院收集的資訊，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千多人，傷殘人數更多。根據後來官方公佈的資料，在1970年和1971年運動高潮期間，江蘇全省有13萬多人受到「5•16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訊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證其罪，有6千多人在關押審查期間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體或精神殘疾。⁵⁷

據江蘇省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統計：江蘇省在清查深挖「5•16」運動中，全省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多達26萬多人（其中被關押批鬥的13萬多人），死傷6千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蘇省的清查深挖「5•16」運動，比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傷害面要大20倍。⁵⁸

一些被確定為清查運動「重點」的單位，被害者人數令人震驚。例如在南京電子管廠，3,800多名幹部職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審查，1,226人被認定為「5•16分子」，7人死於刑訊逼供⁵⁹。在南京市政建設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審查，約占該單位幹部職工總數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5•16分子」。⁶⁰

1970年4月開始清查時，首先將南京大學作為突破口，吳大勝親自抓，派省革委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委尚未恢復）成員遲明堂蹲點，要求造出聲勢，搞出經驗，推動全省。

經過四個多月的清查深挖，南京大學關押「5•16分子」108人，點名「5•16分子」248人，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1154

⁵⁶王春南：〈終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蘇的清查「5•16」運動〉。載《昨天》第47期。

⁵⁷劉定漢主編《當代江蘇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第235頁；《江蘇省志•中共志》，2002年，第320頁；潘祝平：〈江蘇清查「5•16」冤案〉，《炎黃春秋》2007年，第11期。

⁵⁸丁群：〈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須有——江蘇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運動〉，轉引自王春南：〈終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蘇的清查「5•16」運動〉。

⁵⁹劉定漢主編《當代江蘇簡史》235頁。

⁶⁰南京會議資料彙編，1974年，第44頁。

人，共有 1510 人捲入了「5•16」漩渦。其中有 21 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⁶¹

南大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打出成批「5•16 分子」？主要靠所謂「軍事壓力」，大搞逼供信。連續戰鬥幾晝夜（最多 13 個晝夜）的疲勞審訊。為了攻下「頑固堡壘」，對被審查者施用十幾種刑罰。校體育室一位老職員的妻子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對清查「5•16」運動不滿，寫了一封匿名信寄給《新華日報》，很快就被查出來了，軍宣隊就在一次全校大會上宣佈了她的「罪狀」，然後直接從大操場拉出去槍斃了。⁶²

在南京大學蹲點抓「5•16」的遲明堂，是一位 1938 年參加革命的地方領導幹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層幹部檢舉他是「5•16」，遲明堂於 1971 年 10 月被隔離審查，不久，投進監獄。這一「突破」後，省「二辦」對全省地廳局級以上地方領導幹部進行排隊摸底，查出涉嫌「5•16」問題的人，在省級領導幹部中占 72%，廳局級領導幹部中占 38%，15 個地市領導幹部中占 41%，地市一把手中占 69%。⁶³

在江蘇「支左」的軍級要員吳大勝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被打成「5•16」骨幹的人洩憤檢舉⁶⁴。雖未能觸動吳大勝，但另兩位「支左」要員，一位被無端懷疑，一位被蒙冤審查。

在南大突破後，就重點清查省級機關。當時省級機關連同省「五七」幹校共 5 千人左右，清查「5•16」在兩部分人員中進行。一部分是省革委會機關的「留守人員」，另 60% 以上的人進入省「五七」幹校的「脫產人員」。在省級機關「留守人員」中清查「5•16」的高潮在 1971 年。經過「春季攻勢」，到 1971 年 6 月，被打成「5•16」的人占 33.4%。為了擴大戰果，不久又發動「秋季攻勢」，到 1971 年

⁶¹潘祝平：〈江蘇清查「5•16」冤案〉，《炎黃春秋》2007 年，第 11 期，董國強在杜聞貞老師的回憶錄裏看到全校大概有 1,100 多人被列入「5•16」審查名單，有 359 人被定性為「5•16」分子，有 248 人被全校大會點名，有 158 人被關押審查，有 20 多人被整死，見董國強等：〈蔣廣學教授訪談〉，載《記憶》第 30 期。

⁶²董國強：〈王繼志教授訪談〉。

⁶³潘祝平：〈江蘇清查「5•16」冤案〉，《炎黃春秋》2007 年，第 11 期。

⁶⁴另據資料，揭發吳大勝的人不是洩憤，而是被整得神經錯亂，見董國強等：〈蔣廣學教授訪談〉，載《記憶》第 30 期。

11月，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多達2400余人，連同已經打成「5•16」的，竟占省級機關幹部總數的70%以上。⁶⁵

軍隊幹部也未能倖免。據1975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在省「二辦」秘密檔案中發現，被整理材料的軍內幹部有298名，其中軍級以上幹部84名，僅南京軍區機關的軍級領導幹部就有11名。⁶⁶

省革委會常委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軍隊「支左」幹部。其餘除吳大勝、楊廣立、蔣科三位「支左」領導人外，都掛上了「大名單」，作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審查。省革委會領導人之一的彭沖竟也被掛上了「大名單」。⁶⁷

在省「五七」幹校是清查的重點。到1971年底，幹校3千多人中，點名為「5•16」審查的有1,600多人，掛上「大名單」的還有400多人。⁶⁸幹校已變成集中審查關押「5•16」的勞改營。

在幹校被審查的對象一律與他人隔離，不分晝夜對清查對象搞車輪戰，經常罰站十多小時。不少受害者實在吃不消，被迫承認參加了「5•16」，又繼續窮追猛打逼交「同夥」，清查物件像滾雪球般的擴大。一時間幹校出現了一種景象，幹校內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幹校外的「5•16」審查物件一批批送進來，雪球越滾越大，「5•16」越滾越多。

為了做到「一個不漏、一網打盡」，幹校還發動「以毒攻毒」，要被審查者檢舉揭發專案人員和小分隊成員中的「5•16」。這就給被審查者洩憤檢舉的機會。以幹校一大隊為例，一名小分隊長今天鬥人，第二天進了密封室；一名大隊核心小組成員，今天要「5•16」繳械投降，第二天就要他繳械投降；大隊的一名主要負責人也掛上了「大名單」，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結果，在幹校引起了一場混戰。

南京市被認定為「5•16」大本營。三年多時間內，全市各條戰線

⁶⁵潘祝平：〈江蘇清查「5•16」冤案〉，《炎黃春秋》2007年，第11期。

⁶⁶同上。

⁶⁷同上。

⁶⁸同上。

各個領域，從上到下先後組織了 2 萬多人的清查「5•16」專案隊伍，舉辦了各類揭批鬥學習班 3,900 多個、2 萬多期次，進入學習班的多達 20 多萬人次，全市上下共召開坦白會、批鬥會、寬嚴會等 1,200 多場，收到舉報材料 2 萬多件。在 1971 年 6 月至 10 月，四個多月內就有 5 千多人打成「5•16」分子，其中骨幹 600 多人。到 1972 年底，2 萬多人打成「5•16」分子，逼死 300 多人，僅市商業系統就有 33 人自殺身亡。⁶⁹當時南京有一句順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親來就是友」。

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劉中，在「文革」初期即因歷史問題冤案被關押批鬥開除黨籍，清查「5•16」時又被掛上鉤。此時劉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卻要劉中「先查思想後查病」，結果因延誤治療而早逝。原副市長房震戴上「5•16」黑後臺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圖房震「酒後吐真言」套取口供。原市級領導成員中一位女幹部在學習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認了是「5•16」黑後臺，仍不放過，直至逼交出 300 多名「5•16」組織網路後才甘休。⁷⁰

南京歌舞團副團長、女演員李香芝在清查「5•16」運動中慘遭殺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來造反，並被推選為省歌舞團造反組織「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她貼了一張反對找女演員為首長陪舞的大字報，並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但未寄出。最後，審查者抓住她挨整後說的瘋話，將其判處死刑，於 1971 年 9 月 2 日舉行公審，然後押赴刑場槍決。⁷¹

江蘇其他地市也步步緊跟地清查「5•16」。以鹽城地區為例。原地委常委 13 人，打成「5•16」的 6 人，掛上「大名單」的 4 人；中層幹部 84 人，打成「5•16」的 43 人，占 51%。地區公檢法機關 500 余幹警，打成「5•16」的 327 人，占 65%。⁷²徐州在抓「5•16」運動中整了 6 千多人。⁷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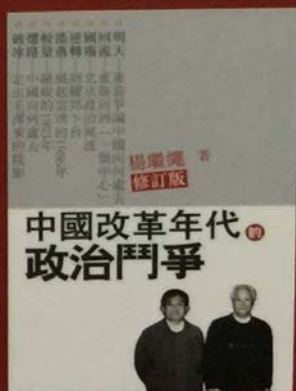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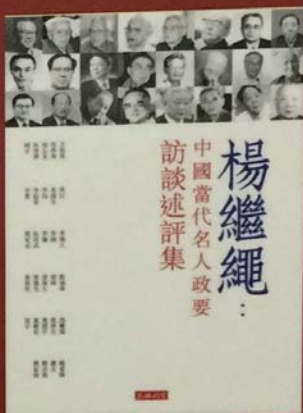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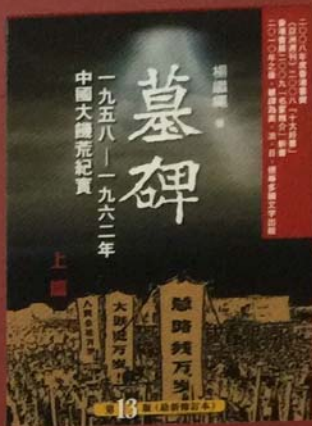
⁶⁹潘祝平：〈江蘇清查「5•16」冤案〉，《炎黃春秋》2007 年，第 11 期。

⁷⁰同上。

⁷¹余姚後人：〈許世友與江蘇「兩挖」〉。

⁷²潘祝平：〈江蘇清查「5•16」冤案〉，《炎黃春秋》2007 年，第 11 期。

⁷³ 1975 年 5 月 29 日，鄧小平說：「清查『5•16』徐州搞了 6 千多人，這是很嚇人的數字。」見《鄧小平文選》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0 頁。



「文革」十年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規模最大的暴風驟雨般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將全國十億多的民眾捲入其中，是一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持續最久的天地翻覆的「革命」，這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神州大地，幾乎每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隨着「四人幫」的覆滅，「文革」正式落幕。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這場持續了十年，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文革」定性為「十年浩劫」，徹底予以否定，並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抉擇。時隔五十年，《人民日報》於2016年5月17日發表的文章重申了官方對十年文革的否定之定性。

著名作家王蒙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天機》的書中說過：「誰能解釋與進一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也就是說，「以史為鑑」是為了中華民族更好地前進。

三十多年來，「文革史」題材寫作一直是數以億計中國親歷者關注的讀物，但對「文革」的褒貶之議不斷。這個話題也成為海內外「當代中國史」的一門持續重要課題，本書就是中國學者的一個新的嘗試。

從2007年起，本書作者楊繼繩窮近十年之功，撰著了這部長達九十萬字的力作，不僅從「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追溯起源，且「清明上河圖」式地展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本着「敘事客觀，分析深入」的寫史原則，力圖用客觀、公允、中立的理性角度來還原歷史本來的面目。而且，希冀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普世價值的觀點來研究與反思文革。本書分為上、下二部，上篇從「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到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謎」；下篇從「清理階級隊伍」至「文革落幕」。全書合共32章，既有史實的細節考證，又有新穎、獨特的史論，成一家之言。尤其是長文「導論」就文革對中國社會五十年之變局及現狀的探索，值得當代讀者掩卷長思。

ISBN : 978-988-8257-54-6



9 789888 257546

(上、下二冊)

H.K.\$ 328.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